责任编辑：熊志庭

封面设计：吴颖辉

ISBN 978-7-81113-485-8

9 787811 13485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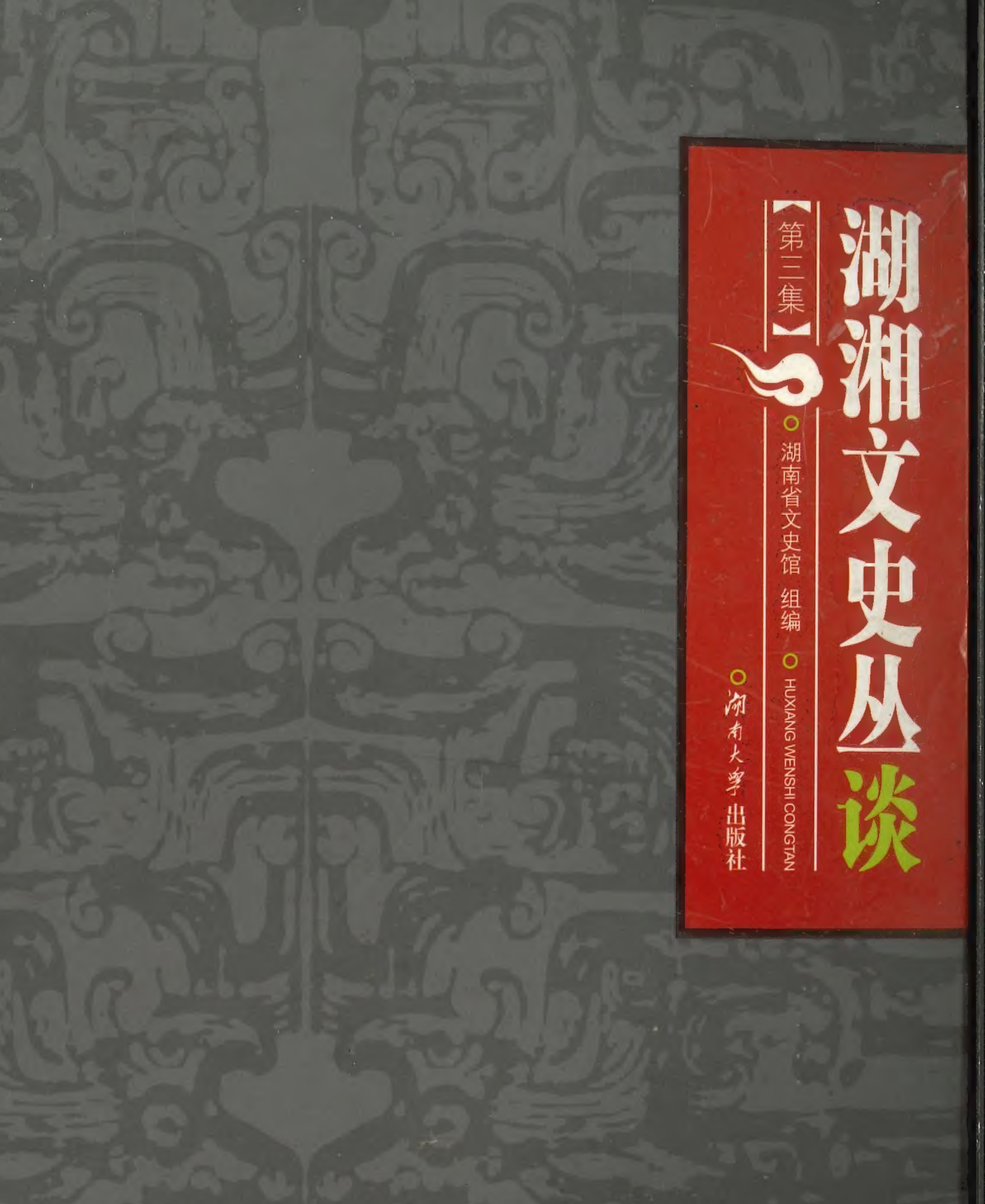
全套定价：160.00元

湖湘文史丛谈

第三集

湖南省文史馆组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



《湖湘文史丛谈》

主　编　阳盛海

副主编　伏家芬　熊治祁

刘泱泱　陈书良

胡渐逵　李治湘



# 湖湘文史丛谈·第三集

湖南大學出版社

2008年·长沙

# 目 次

湖南居民与民族的历史变迁 …………………………………………… 伍新福 (1)
苗族姓氏考……………………………………………………………… 伍新福 (13)
新晃——夜郎古邑考…………………………………………………… 弘 征 (22)
李东阳与茶陵诗派……………………………………………………… 伏家芬 (30)
《潇湘八景图》考 ……………………………………………………… 刘国强 (45)
魏源与佛教的因缘……………………………………………………… 胡光曙 (52)
湖湘学与洛学的思想渊源关系………………………………………… 陈先枢 (57)
简说湘军及其历史影响………………………………………………… 刘泱泱 (66)
邓湘皋为湘学复兴之导师
——兼论近代湖湘文化…………………………………………… 弘 征 (71)
左宗棠平议……………………………………………………………… 刘泱泱 (78)
从黎氏八俊看湖湘文化精神…………………………………………… 彭文忠 (83)
沈从文风雅拾遗………………………………………………………… 伏家芬 (90)
清代方志形成高峰的原因及清代湖南方志的主要特点……………… 李龙如 (97)
浅谈烟花诗词 ………………………………………………………… 刘 旭 (103)
唐代长沙窑几件诗文瓷壶赏析 ……………………………………… 谈雪慧 (107)
湖湘文化信息源的采集与分析 ……………………………………… 李 湘 (114)
樊锥及其维新思想评述 ……………………………………………… 罗海兵 (121)
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三题 …………………………………………… 杨 柳 (126)
易祓与识山楼 ………………………………………………………… 易凤葵 (130)
一片丹心长报国
——忆先父刘公武在抗日战争前后的艰难岁月 ………………… 刘 晓 (135)
白马将军方鼎英 ……………………………………………………… 叶 浓 (140)
抗日将领霍揆彰佚事 ………………………………………………… 刘才武 (144)
吴剑学将军传 ………………………………………………………… 吴容甫 (148)
漫谈近现代湖南外交的几位名人 …………………………………… 周千里 (155)
张经武的传奇人生 …………………………………………………… 任志伊 (161)

"其奈长沙后进何?"
——毛泽东与易白沙 …… 黄露生 (166)
黄宜人行述 …… 杨昌济 (171)
张百熙的政治理想及其崇高风范 …… 谭承耕 (173)
磨剑室主与知生靡乐斋主
——柳亚子和傅屯艮的交谊 …… 李海珉 (180)
几间老屋万卷藏书
——晚清数学家丁取忠 …… 王晓利 (187)
教书育人 潜心学术
——皮名举教授 …… 李长林 (190)
胡元倓先生评传 …… 刘瑞清 (194)
杰出的教育家匡互生 …… 张志浩 (206)
湖湘现代名人刘建绪 …… 谌 震 (210)
湖南著名教育家周调阳 …… 曾弥高 (214)
刘永济生平及著述 …… 程千帆 (219)
忆恩师柳敏泉先生 …… 马少侨 (230)
回忆外祖父陈墨西 …… 王 璧 王 延 (235)
怀念羊春秋 …… 李 蟠 (238)
贺绿汀与严怪愚 …… 严 农 (245)
怀念四哥陈云章 …… 陈述征 (251)
瑕瑜互见的蔡季襄 …… 彭青野 (256)
湘剧名票胡绳荪 …… 胡渐逵 (260)
送别俞润泉同志 …… 李 锐 (262)
从周达武故宅谈到长沙蜕园
——关于刘蜕的故事 …… 谭绪缵 (265)
胡林翼对左宗棠的推荐与评价 …… 胡有猷 (268)
湘潭历史上的状元、榜眼与探花 …… 赵 斐 (273)
旧时代的帮会 …… 李寿冈 (276)
张舜徽先生治学著述轶事 …… 李绍平 (282)
程潜组织诗社为毛泽东祝寿 …… 黄 琳 (289)
旧时报人悲愤录 …… 伏笑雨 (294)
仓石日记中的杨树达、皮锡瑞、陈寅恪 …… 段 炼 (299)
黎氏三院士与广益中学 …… 刘 磊 (302)
钱基博先生在蓝田国师 …… 彭锦棠 (305)





巍然资水一高台
——著名音韵学家曾远乾与桃江凤凰阁 …… 龙玉牛 胡则丘 (311)
傅熊湘先生二三事 …… 廖新民 (315)
夏鼐与湖南文物普查 …… 吴铭生 (318)
鸿才鸿图 大德大年
——记湖南日报原社长朱九思同志 …… 柏 原 李冰封等 (321)
出师未捷身先死
——章士钊先生在香港 …… 陈书良 (330)
终生相知
——章士钊与陈独秀的友谊 …… 徐德驹 (334)
由长沙往昔的租书社想起 …… 许 康 (342)
近代湖南茶业的勃兴 …… 陈先枢 (350)
毁家兴学 为国育才
——先父胡有猷先生创办林翼中学纪实 …… 胡渐逵 (355)
三湘子弟兵南丹剿匪记 …… 龙德强 (362)
唱土地：梅山文化中的独特民俗 …… 胡光曙 (367)
少数民族服饰的审美意识 …… 刘 洋 (374)
有趣的侗族择偶求婚 …… 君 林 (377)
引人注目的少数民族头巾和头帕 …… 君 林 (382)
妙趣横生的"挤油尖" …… 杨盛科 杨光清 (385)
湖南首次发现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回眸 …… 吴铭生 (386)
诗圣之哭泣与启示 …… 余德泉 (389)
韩愈在湖南的手迹和碑刻 …… 刘国强 (395)
岳麓山的抗战遗迹 …… 胡滔滔 (403)
遭日寇枪杀从血泊中滚爬出来
——我亲身经历的日寇厂窖大屠杀暴行 …… 杨乃一 (411)
两张文书藏品见证"衡阳保卫战"的血雨腥风 …… 张才军 (415)
奇特的江永女书 …… 田武登 (419)
靖港古镇的记忆 …… 王晓利 (423)
千年古庙
——陶公庙今昔 …… 周 敏 (429)
黄鹤将军访谈录 …… 戴铁珊 (433)
汪炳璇联艺管窥 …… 胡静怡 (435)
湘"目连"与湘风 …… 文忆萱 (440)

钟王易顺鼎优秀诗钟选评 ………………………………………… 吴容甫（448）
《万里平生师友品题》序……………………………………………… 虞逸夫（458）
张家界史话 ………………………………………………………… 戴楚洲（459）
五溪访古散记 ……………………………………………………… 李鸣高（463）
后　记…………………………………………………………………………（471）





# 湖南居民与民族的历史变迁

伍新福

湖南是中国内地一个以汉族居民占多数，但还有土家、苗、瑶、侗、回、白等民族聚居的多民族省区，而其居民内部结构和民族关系的历史变迁又相当大。近几年因承担编撰《湖南民族关系史》的任务，有机会涉猎和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并对有关问题进行探究，形成了一些看法。现仅就湖南境内的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源流、形成、发展及其分合演化的基本史实和本人的观点，作如下概述。

## （一）湖南地区的初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古人类栖息和生活于湖南境内。至今全省范围内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和地点共200多处，出土的各种旧石器数以千计。遗址的分布，以沅、澧二水流域为多，但在湘、资流域也有发现。其中，年代最早的，如浏阳市永安旧石器遗址，属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距今约15——20万年。1992年12月，在石门县燕儿洞旧石器文化遗址内，发现1件人类右股骨残段化石。这在湖南是史无前例，填补了长期以来湖南境内无人类化石的空白。考古界将留下这段股骨化石的古人类称之为“石门人”，其生存年代为晚更新世，距今在2万年以上。

距今9千年前左右，湖南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据初步统计，目前湖南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址达2千多处，分布范围很广，遍布全省各地区。生活遗址的大量增多和分布地域的扩大，说明新石器时代生活繁衍于湖南境内的先民人数，较旧石器时代已大有增加。同时，各地的新石器文化的内涵和风格往往各具特点，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根据现有资料，考古界将湖南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区，湘、资水中游和湘中区，沅水中上游和湘西区，以及湘东、湘南区。这种划分是地区性的，主要反映了地区文化差异。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不同族群和不同族系的某些区别，并且与后来所形成的不同民族已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龙山文化时期，湖南大多数地区，特别是湘西北、湘北和湘中地区，其文化特征可归为长

江中游的龙山文化同一文化范畴，与前期的屈家岭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同当时活跃于这一地区“三苗”和“荆蛮”族群有着明显的关系；湘中部分地区和湘东、湘南所出现的以印纹硬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华南、两广的新石器文化是一个范畴，考古界一致认为与古越人族系有关；沅水中上游地区不见鼎等三足器的文化遗存，与西南文化有明显联系，并同当地土著、后来称之为“蛮濮”民族的族群有渊源关系。

## （二）湖南先楚时代的族群

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即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界称屈家岭文化时期），湖南主要为“三苗”部落集团聚居地。据先秦文献记载，“三苗”是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集团，在同炎黄部落集团战争失败后，向南退却在南方所形成的一个新的部落集团。其地域是“左彭蠡（今鄱阳湖）、右洞庭”，即今湖南、湖北、江西，以及安徽、河南一部分地区。还有史料说，“三苗”曾“建国于长沙”，即以长沙为首都建立了国家。这虽然不可信，但说明洞庭湖沿岸至长沙一带是当时“三苗”聚居和活动的中心地带。《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因此遭到尧、舜、禹的多次征伐。结果“三苗”集团被打垮和瓦解。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同中原华夏族人融合了，或远徙他乡，但大部分依然留居长江中游和洞庭南北，只是暂避山林而已。后来建立楚国的楚人，及苗、瑶、侗等民族，同“三苗”都有渊源关系。

夏、商、西周三代，“三苗”已不再见诸史籍。但商、周之际，南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大的部落集团，即史籍所载的“荆蛮”，或称“蛮荆”。据史籍记载，所谓“荆蛮”和“蛮荆”，即指“荆州之蛮也”。而古荆州之域，主要在荆山至衡山一带，即今长江中游湖北、湖南，及相邻地区。这正是原“三苗”活动的中心地区。故学术界一般认为，“荆蛮”就是当年被瓦解的“三苗”部落成员的后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发展和形成的新的部落集团。“荆蛮”族人构成当时湖南的主要居民。由于势力日趋强盛，他们成为中原商、周王朝多次大规模征伐的对象。此外，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湘江、资水以东地区和湘南，存在商、周时代的大量越文化遗址和遗存，说明当时除“荆蛮”之外，古越人在湖南居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沅水中上游和湘西地区，还存在既不同于“荆蛮”，又与越文化有别的文化遗存，说明商、周时代同西南文化有关联的土著居民和族系，在该地区继续生存与发展。

西周以前二三千年中，湖南主要为“三苗”、“荆蛮”和古越人及其他土著族系所聚居。但中原族系，即炎、黄部落和华夏族人，随着南征的军事行动，或由于其他原因，也有部分南迁进入湖南的。不过因为人数不多，很快也就融合于湖南境内的土著民族。流传下来的有关神话和传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





了这种历史情况。如：由于同黄帝族争逐失败，部分炎帝族人被迫南迁，他们某一支系曾进入湖南，因而在原茶陵县留下了炎帝陵及其相关传说，有关帝舜“南巡狩”，道死苍梧而葬于九疑的传说，以及舜二妃自溺湘江、舜弟鼻和子叔均在湘南一带的传说，应是对帝舜南征“三苗”及其族人入湘的历史追忆和附会。还有在湖南境内留下的祝融峰、禹王碑等遗迹和传说，同中原的祝融族人徙入湖南，以及大禹治水和征伐“三苗”曾进入湖南有着明显的联系。在湖南宁乡、长沙、湘潭等地发现和出土的大批商、西周的青铜器，有一部分明显具有中原风格，甚至同中原商、周青铜器如出一范。考古界认为，其中，有些就是南下的商人和周族成员带来的，有些器物（特别是中原未见的铜镈），应是当地铸造的，但同南下的商、周族人带来的技术还是分不开的。此外，在湖南还发掘了少数商人墓葬。最近在宁乡县炭河里发现了大型西周遗址。这都证明，确有部分商人和周族成员迁移到了湖南境内。当然，他们大多也逐步同占绝对优势的土著民族融合了。

## （三）楚国时代湖南的民族结构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楚国的征服和军事、政治势力在湖南的扩张，楚人和楚族逐步成为湖南境内的主要居民。湖南的楚人和楚族，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发迹于湖北荆山、丹水和析水一带，作为“三苗”和“荆蛮”一个主要支系的楚人，其中有楚王室宗亲、贵族、南征将士及家属、派遣的地方官吏和楚灭国移民，以及随军而来的平民和商人；另一部分，是与南来楚人融合的、原湖南另一部分土著的、但同样属于“三苗”和“荆蛮”族系的居民。此外，还融合了先已南下的部分华夏族成员和被征服的部分古越人和“蛮濮”族系成员。近几十年来，在湖南各地所发掘的楚人墓葬已达4千多座，遍布三湘四水，其数量和分布地域均远远超过古越人及其他土著族系。这证明，当时楚人和楚族在湖南居民中确实已逐步占据了优势和主导地位。

若按司马迁《史记》所编排的商周以前的帝王世系，楚人乃高阳帝之苗裔，而高阳为黄帝之孙意昌之子，楚人则属炎、黄部落和中原华夏族系。对于这种传统观点，楚史和民族史学界现在已多持否定态度。楚人有自己独特的习俗，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即《孟子》所称的“南蛮鴃舌之人”，应是南方土著的“蛮夷”，原为“三苗”的一部分，后属“荆蛮”集团中的一个支系，只是他们较早接触到中原的华夏文化，比其他“蛮夷”发展更快些，在南方建立和发展起一个赫赫大国——楚国。并逐步“华夏化”，后来成为南方和湖南汉民族最初的主要来源和基本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我在《中国苗族通史》以及《楚人、楚族与苗族》等专论中已有详细论证，这里不再赘言。

从已发掘的文化遗存和考古材料看，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湖南，人数和分布

地域仅次于楚人而居第二位的是古越人。但自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湖南的古越人有明显的变化。春秋早、中期，越人墓葬广泛分布于整个湘江流域及资水中上游地区，即湘北、湘东、湘中和湘南各地，而以湘南地区最集中。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对湖南全境的征服，湘北、湘中地区，越人或被消灭，或被驱逼南迁，留居当地的土著越人已大大减少。反映在考古文化上，是这些地区越人墓葬的基本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遍布各地的楚墓。湖南地区则不同，在整个战国时期，仍然聚居着大量越族，构成当地居民的主体。如资兴县旧市所发掘的 84 座战国墓，其中 40 座是越人墓，而在其他楚墓中也多见古越人文化的因素。学术界大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今天湖南及湘、桂、黔三省的侗、壮民族，主要就是由这些古越人的后裔演化而成的。

在湖南西部地区，澧水和沅水中、上游，即史称的“武陵五溪”地区，春秋战国时代，居住着土著“蛮、濮”民族及部分“巴人”。所谓“蛮”，即原“三苗”和“荆蛮”集团中尚未同南下楚人融合的一些支系和族群，楚人统称之为“群蛮”。“濮”，有时也称为“蛮”，由于支系和族群繁多，楚人统之为“百濮”。楚王蚡冒和楚文王向沅水中游地区扩张时，名之曰“启濮”、“伐濮”和“开濮地”，这说明当时这些地区，除“蛮”之外，还居住着许多属于西南“濮”人族系的居民。近一二十年来在湘西地区所发掘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中，有一批带龛的土坑竖穴墓，其形制和随葬器物不同于楚墓，很可能就是当地土著“蛮濮”民族的墓葬。这些墓葬出土了一种形制和风格均有别于楚式剑、越式剑的青铜短剑。湘西和相邻的黔东北地区，还出土了大批中原和楚人的遗物中所未见的青铜錞于。考古界认为，这些青铜器应属当地“蛮濮”民族的遗物。今天自称“毕兹卡”（即“本土人”）的土家族、苗族、瑶族和仡佬（革佬）族洞“武陵五溪”的这些土著“蛮濮”族群，都有着直接的联系。（一说今天的侗族也源于“濮”，可进一步研究。）

古代巴人，相传最初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周初建立巴子国。进入战国时代之后，受强大的楚国势力所逼，巴国势力逐步向西退缩，其中心地出鄂西转至川东（今重庆市地）。由于湘西与鄂西、川东毗邻，春秋时代可能即有巴人进入湘西相邻的益阳等地出土的“巴式剑”，以及属战国后期的带虎钮的錞于，应是巴人的文化遗物。此外，在沅水中游还发掘出少量的巴人墓。这说明最迟在战国中、后期，确实有部分巴人进入了湘西和武陵五溪地区。后来这部分巴人融合于当地土著“蛮”人部落，成为土家族的来源之一。

### （四）湖南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结构变迁

秦汉数百年间，中国境内主体民族、统一的汉民族初步形成。在作为秦汉统一封建国家一部分的湖南，汉民族同样也逐步形成并成为湖南境内的主体居





民。但湖南汉民族的主要成分，并不是中原的华夏族系，而是在春秋战国的 500 多年间已逐步“华夏化”的楚人和楚族。其中，当然也包括着秦汉时代，由于多种原因，从中原和关中地区不断南下进入湖南的原华夏族系的成员。如秦始皇从关中征调 50 万大军“戍五岭”，分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一军“守”九嶷。镡城，即今靖州、会同、黔阳、通道等县地：九嶷，指九嶷山，今宁远、蓝山、江华等县地。即五分之二的来自关中的秦军驻屯在湖南境内，后来落籍湖南的当不在少数。又如据《后汉书》（卷六十二）记载，东汉永初二年（108），黄河流域“连年水旱灾异”，故将一大批“饥困”百姓徙往当时的荆州，即今湖南、湖北一带。正是这些相继进入湖南的北方和中原华夏族系成员，与已逐步“华夏化”的楚人，以及部分土著“蛮越”族成员相融合，形成了湖南境内的汉民族。而近几十年来所发掘的，遍布湖南各地、形制和随葬器物均有别于楚墓的成千上万的汉墓，以及统一文字（秦篆、汉隶）和统一货币（五铢钱）等在全境的通行，都说明汉民族和汉文化确实已在湖南占据了优势地位。

此后的一千多年，汉族一直是湖南境内的主体民族。但其结构和成分曾多次发生变迁。特别是国家处于分裂战乱之际，或王朝统治动荡和新旧更替期间，变迁就更大。从东汉末三国鼎立到南北朝对峙的近 400 年间，大部分时间战乱频仍、灾祸连年，因此北方和中原人口多逃亡江南，至西晋末年形成严重的“流民”问题。南朝萧梁时湘州（治今长沙市）刺史张缵任内，招纳“流人”，结果“户口增益十余万”。（《梁书·张缵传》）如南北朝的著名诗人阴铿，其祖本甘肃姑臧（今武威）人，就是在东晋末年辗转南下，后移居南平郡作唐县（今湖南安乡县），遂落籍湖南，繁衍子孙。

唐朝“安史之乱”后，战乱频繁，又引起北方人口大批南迁。据记载：“中原多故，襄、邓百姓及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旧唐书·地理志》）“江、湘”，即当时的江州、湘州，今湖北、湖南。唐末五代，河南鄢陵人马殷率 10 万大军入踞湖南，以长沙为中心建立楚国，实际上也是中原人进入湖南的一次移民浪潮。马氏楚国灭亡后，马氏家族及其亲信虽被强迫迁往金陵（今南京）等地，但这只能是当年进入湖南的 10 万兵将的一小部分，其中除横尸沙场者外，大部分后来都只能落籍湖南了。在马氏家族进入湖南的前后，还有一些大姓豪族也从境外徙入湖南。如马楚任命为天策府十八学士之一的廖匡图，其先世为虔州赣县（即今江西赣县）人，唐昭宗光化元年（898），举族 3000 多人迁入湖南，后落籍衡山。又如，天佑三年（907），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刺史彭玗率所部及其族 1000 余人归附马楚，马殷以玗为郴州刺史，其弟为辰州刺史。还有与廖匡图同为天策府学士的徐仲雅，原籍

陕西秦中，也是唐末五代移居长沙的，遂成为湖南长沙人。这都增加了湖南境内汉民族中的外来移民的成分。

宋、金对峙时期，北方人口再次大批南徙，又大大增加了湖南汉民族中外来移民，特别是北方移民人口的成分。据记载："靖康之难"后，"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千万人"，移居"有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的"荆湖、两浙"。（《文献通考·田赋考》）"荆湖"即今湖北、湖南。当时进入湖南境内的应不在少数。如湖南汉族中的张姓，不少都源于唐末出长安（今西安市）南下、避难于四川绵竹的国子监祭酒张琳。南宋时宰相张浚为绵竹张氏之后。张浚东下抗金，长期滞留湖南，卒葬衡山脚下。其墓在今宁乡官山。子张栻留居长沙并主讲岳麓书院多年，弟杓落籍于湖南宁乡龙塘。后张氏子孙在湖南繁衍，散居于宁乡、安化、益阳、新化、邵阳、祁阳、汉寿、沅陵、溆浦、泸溪等地。南宋灭亡后，在安化、宁乡一带起兵抗元的张虎，即张栻的曾孙。张虎兵败被杀。其子张惟考遂隐居安化三洲，为今天当地张姓之祖。又如，南宋末年进士、官至大理寺丞的杨大异，醴陵人。先世原籍弘农（今河南灵宝），避中原丧乱南迁，遂落籍湖南醴陵。

由于汉民族自魏晋以后的这类主要由北而南的不断迁徙，至宋元之际．在湖南境内汉民族居民中，南来的北方和中原人的成分显著增加，而原以楚人为主的土著居民所占比例则大为减少。这是湖南汉民族内部结构的第一次大变迁。

湖南汉民族人口最大的一次流徙和内部结构又一次大嬗变，发生在元明之际和明朝初年。与此前历代大多由北而南流动不同，这次主要是从东往西迁移，即史称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原因是元末明初的连年战祸兵燹，使湖南大部分地区田园荒废、庐舍为墟，原有人口大量散亡。而流入当时地广人稀的四川的湖南人又特别多。据记载："历朝鼎革，荼毒生灵，惟元明之际为惨"。结果湘中地区的湘潭（含今株洲）一带的原居民，即唐宋前的土著，仅剩下"数户"。"后之人多自豫章来"。（嘉庆《湖南通志》卷六十）豫章，即今江西省地。湘东的醴陵县，"古老相传，土著亦仅存十八户，余皆无复存在"。后来的居民，均明初从外省迁来的，而"尤以江西为最多"。据统计，醴陵县境内明代从江西共迁入296族，而其中200族是洪武年间迁来的。（同治《醴陵县志》卷六）湘西地区，据光绪《永定乡土志》所载：大庸（今张家界市永定区）38大姓60始祖中，有24姓33始祖是明初从外省迁来的，而其中20始祖来自江西。沅陵县，"今所指土著十之九皆江西人"。（民国初《沅陵县志》卷六）

明代所发生的人口大流动，导致湖南境内汉民族的成分和结构发生了一次





根本性的变化，即原土著和宋元以前来自北方和中原的汉族居民，大部分或外迁，或灭绝，原籍江西以及江浙地区的移民在湖南汉族人口中占据优势地位。从明清以来所撰修的谱牒看，现今湖南境内汉族各主要大姓，几乎都是说自己祖籍江西某地，或江苏、南京，而且大多数都是明代移居湖南的，这应是可信的和有据可考的。如以王夫之、王文清、王闿运、王先谦，即"湘学四王"为代表的湖南望族王姓为例。王夫之属衡阳王氏，其祖原籍江苏高邮，明永乐年间入湖南，落籍衡阳。王文清属宁乡王氏，系江西吉安王氏的分支，其祖于永乐初以指挥使屯长沙卫（今宁乡铜瓦桥一带），遂落籍。王闿运属湘潭王氏，源出太原王氏，其祖元末避乱居江西赣州，两代后再徙湖南。始迁衡阳，再迁湘潭，后子孙繁衍于湘潭、长沙各地。王先谦属长沙王氏，先世为江宁府（今南京）人。正德年间，有王沾者通判岳州府，遂留居湖南，落籍长沙城北福善坊，是为长沙王氏之祖。湖南王氏四大主要支派，两支来自江西，两支祖籍江苏，而均为明代迁入湖南。

清初，湖南为李自成农民军余部和南明势力抗清的重要战场，后又有"三藩之乱"和吴三桂叛踞湖南。数十年战乱，再次使湖南的居民大批家破人亡和流离失所，造成湖南历史上汉民族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较大的流徙。但这次流徙与明初相同，主要也是由东而西，即江西等地居民迁入湖南，而湖南人又再次大批进入四川、贵州。故魏源依然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古微堂内外集》卷六）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湖南汉民族中江西等地的移民的比重。

明清之际，汉族人除主要从东而西迁入湖南之外，其中也有一些支系和族群由南而北回徙，进入湖南。这主要是聚居于湘东和湘东南的酃县（现名炎陵县）、桂东、汝城、茶陵、攸县，以及平江、浏阳部分乡镇的"客家"人。如据1990年的统计，酃县全县总人口为175759人，其中"客家"人占60%，即10万以上。"客家"为汉族中的一个重要支系和族群，唐宋时南迁，主要聚居于广东东南部。湖南酃县等地的"客家"人，主要就是明清之际从广东迁来的，少数来自福建。如酃县"客家"的饶、邬、叶、伍等姓氏，都是清康熙、雍正年间从广东梅县迁来的。在酃县所调查的164支家族中，有60支是清代由广东迁来的"客家"，9支来自福建。（新编《酃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又如浏阳县，原籍可考的"客家"人共39支，其中36支祖籍广东平远等地，清初迁入的有黄、刘、叶、邓、周等姓31支。他们聚居于东乡和南乡山区，一直保留了"客家"语言。（新编《浏阳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版。）

自明清的大迁徙后，湖南汉民族内部结构基本稳定下来，在湖南的分布格

局亦大体确立，此后再无什么大的变迁。与此相对应的，是近代湖南汉语的几大方言区的形成。湖南汉语现在分为四大方言："湘语"区，以湘中和湘、资二水中游地区为主，包括长沙、湘潭、益阳以至衡阳等各市、县。这与扬雄《方言》中所称的"南楚"、"江湘"、"湘沅"方言区基本一致，应渊源于楚人和唐宋之前湖南土著汉族居民的方言。"西南官话"区，主要包括湘北、湘西和沅、澧二水中下游地区，从岳阳、常德、张家界、沅陵、吉首，至怀化、洪江、靖州等市、县，以及湘南部分所谓"双语"（即土话与官话）区。这种"官话"，主要是由宋元以前历代的北方和中原移民所形成的，对所谓"湘语"亦产生很大影响。"赣语"区，主要是湖南的东部，由北而南的平江、浏阳、茶陵、攸县，以至资兴等各县市地区，此外在湘中、湘西也有分布点。这是直接由明清之际的江西移民所形成的。"客家话"，主要分布于酃县、桂东、汝城等县。这是由广东北迁的"客家"人所形成的。当然这四大方言和湖南汉族内部主要支系区分，都只能是大体上的，交错混杂和相互影响的现象很多，而且虽属同一方言和同一支系地域性差别也相当大。

### （五）湖南其他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变迁

秦汉以后，在汉民族形成发展的同时，湖南境内的其他土著族群，也历经分合演化，相继形成和发展为各个单一的民族，现统称之为少数民族。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称谓、结构及分布地域，变迁较大。

在两汉时期，先秦时原以"蛮濮"、"夷越"、"巴"人等名相称的族群，常常被统称之为"蛮"，且按所处地域的不同，又常在"蛮"之前冠以不同的地名。从史籍记载看，当时湖南境内主要有"武陵蛮"（又称"五溪蛮"）、"长沙蛮"、"零陵蛮"、"桂阳蛮"等。这是一些以郡名相称的族群。此外，还有不少冠以县邑或其他小地名的"蛮"。如"澧中蛮"、"溇中蛮"、"酉溪蛮"、"零阳蛮"等。"澧中"即澧水中游一带；"溇中"指澧水支流溇水地区，今桑植、张家界市永定、慈利等地。"酉溪"即酉水，又称北江、白河，沅水支流，源于酉阳地区，流经龙山、保靖、永顺、沅陵。这些地区两汉时均属武陵郡。又有记载："长沙蛮反叛，屯益阳"；"零陵蛮人长沙"；"武陵蛮六千余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度尚"击零陵、桂阳蛮夷"。（《后汉书·南蛮传》）可见当时湖南四大郡，包括湘、资、沅、澧四水流域，都有"蛮夷"民族分布和聚居，而其中武陵郡内又最为集中。他们甚至屯兵益阳、攻人长沙，往北一直打到湖北江陵，其人数应相当多，势力颇为强大。此时的"蛮"，完全是地域性的族群称呼，实际上包括着湖南土著的土家、苗、瑶、侗等民族的先民。史籍将"武陵蛮"、"长沙蛮"，都说成是"盘瓠之裔"，不符合史实。

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蛮"和"五溪蛮"、"零陵蛮"，依然相当活跃，其





范围内也还有"天门蛮"、"黔阳蛮"、"酉溪蛮"等局部地区性称呼。"长沙蛮"的称呼再未见诸记载，但同时对"蛮"又有一些新的称号。如"巴陵马营蛮"、"湘州蛮"、"衡阳蛮"等。"巴陵"，即今岳阳、临湘等地。说明当时湘北也有"蛮夷"族活动。西晋永嘉元年（307），始析荆州之长沙、衡阳等郡置湘州，治今长沙，所称"湘州蛮"，应即两汉时的"长沙蛮"。20世纪80年代在桃源县漆家河乡出土了两方银质印章和一方铜质印章，均为西晋王朝颁发的"蛮夷率善邑君"印。说明当时桃源一带还聚居着一支人数众多的"蛮夷"民族。从分布与活动的范围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蛮"相称的民族地域，远较后来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宽。

除"蛮"和"蛮夷"的称呼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族称。从史籍记载看，主要是，在武陵郡境内有"僚"人，零陵、衡阳一带有"莫徭"，学术界一般均认为，"僚"同先秦时代的"濮"有渊源关系，为后来仡佬（革佬）族先民。而"莫徭"即今天的瑶族先民。这表明，"僚"（仡佬）和"莫徭"已从"蛮"中区分出来，开始了形成各个不同的单一民族的过程。

隋唐五代时期，湖南境内土著少数民族，从名称看主要分为"蛮"、"僚"、"仡僚"、"徭"、"夷蜒"等。但仍常以其活动地域，冠以地名相称。如"武陵蛮"、"石门蛮"、"辰州蛮"、"锦州蛮"、"溪州蛮"、"叙州蛮"、"飞山蛮"、"武冈蛮僚"、"梅山蛮"、"桂阳监徭"、长沙郡"夷蜒"、朗溪"僚"等。据《隋书地理志》载，"夷蜒"又名"莫徭"，也即"徭"。新出现的"仡僚"，也就是原"濮"人的后裔"僚"。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仡"与今天侗族的自称"干"、"金"（其意为峒、洞）相近，"仡僚"应是侗族的先民，为古越人之后。唐代的朗溪县，为今会同、靖州、通道等县地；当时武冈，包括今天的武冈、城步、新宁、绥宁县地。这些地区至今仍为侗族主要聚居区之一，这些地区此时所称的"僚"，显然与"濮"和"仡佬"已没有关系，而是指侗族的先民。梅山，含今新化、安化等县地，唐属长沙郡地所说的"蛮"，实际上也就是当时长沙郡的"莫徭"和"徭"。唐辰州治今沅陵，锦州治今麻阳，溪州治今龙山，叙州治今黔阳，飞山在今靖州自治县境，所称的"蛮"，依旧是对这些地区土著名族的一种泛称，应包括着今天聚居于这些地区的土家族、苗族、侗族和瑶族的先民。从分布的情况看，隋唐时期，湖南土著少数民族生活与活动的地域较前已有所收缩，主要集中于湘西、湘南及部分湖中地区。

唐末五代，江西庐陵（今吉安）彭玕兄弟率部投奔湖南马殷，授为辰州刺史。后彭战败当地土著"蛮酋"，占据溪州，马氏又授其为溪州刺史。彭氏军家族及所率田、向诸姓部属和百艺工匠，遂落籍上下溪州即今永顺、龙山、保靖诸县地及其附近地区。彭氏数百年的割据和封闭式的统治，促进了湖南土家

族的形成和发展，而彭氏家族及其部属的部分后裔，逐步融合于当地土著“蛮”族，也就成为了今天土家族的另一个来源。

两宋时期，湖南土著少数民族，常被统称为“溪洞诸蛮”。宋王朝又曾按不同地域，将他们划分为“北江诸蛮”、“南江诸蛮”等。沅水的支流酉水又称北河，“北江”系指沅水中游及酉水流域地域；“南江”，指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辰水、巫水等地区。除此之外，史籍中以“蛮”相称的还有“梅山蛮”、“邵州蛮”、“辰州蛮”、“桂阳蛮”等。在继续统称“蛮”的同时，两宋时对瑶族的单独称呼更加常见。如“徭人”、“山徭”人，还有较多的“峒丁”、“峒民”、“洞蛮”的记载，这为后来侗族名称的由来。说明继瑶族之后，侗族在两宋时也初步形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在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两宋史籍中出现了“仡伶”称呼，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应是侗族自称在历史上的一种汉译，为古越人之后。作为“蛮”族系统最重要组成部分的“苗”，从中区分出来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族称，也始于两宋。在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中，除“蛮”、“徭”、“僚”、“仡佬”之外，已多次出现“苗”的称呼。叶钱的《溪蛮丛笑·序》第一次将“五溪蛮”分成五种：“曰苗、曰徭、曰僚、曰僮、曰仡佬”。朱熹出任湖南安抚使时，招抚“苗蛮”，特于岳麓书院右侧建《谕苗台》。可见，“苗”作为一个特殊族群的概念，当时已比较明确。两宋史籍中所出现的“土丁”、“土人”的称呼，虽含义较为广泛、还不是单独的民族村的称呼，但在古“五溪”地区应主要是指土家族的先民，表明自唐末五代溪州为彭氏割据之后，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两宋时也开始逐步形成。

由于宋神宗时（1068—1085），首先“开梅山”，在“梅山蛮”地区设置安化、新化两县，并实行“变徭为汉”的政策，原聚居于这一地区的徭人，或被迫南迁，或逐步被同化。据道光《宝庆府志》（卷末上）记载：章淳开梅山，设置新化、安化二县后，“流亡渐复，而新著籍者，强半江右吉安人”，“而土户反寥寥”。即基本上就变成了以江西移民为主的汉族地区。继之，又“恢拓南江诸蛮”地区，先后设置沅州（治今芷江）、靖州（治今县城），以及渠阳、时竹等县（今会同、绥宁、城步等县地），将当地土著“苗徭”、“蛮僚”民族重新纳入统一的经制州县管理之下，进一步强化统治。这都导致两宋时期湖南境内各土著少数民族聚居和分布地区，较唐代又进一步有所收缩。

元明时期，湖南土著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已主要局限于湘西和沅、澧水中上游；其次，是湘南和湘西南。在当时留下的文献中，往往被统称为“蛮”，或“苗蛮”、“蛮僚”等，但单独记载“苗”、“徭”、“峒丁”、“山僚”、“土民”、“土蛮”，即今苗、徭、侗、土家等民族的资料日益增多。从元朝开始，“以蛮治蛮”，在唐宋羁縻州的基础上建立了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至明代在湖





南境内发展为大小十八土司。即永顺。保靖、桑植3宣慰司，茅冈安抚司，南渭、施溶、上溪3土州，腊惹洞、麦著黄洞、驴迟洞、施溶溪、白崖洞、田家洞、上洞、下洞、五寨、竿子坪等10长官司，两江口土舍。其地域，主要包括今天张家界市和湘西自治州所属各市县。居民则以今天的土家族为主，其次为苗族。在以腊尔山为中心的湘西和湘黔边方圆数百里苗族聚居的区域内，既未设置土司，又未派流官治理，逐步形成一块独特的所谓“生苗”区。从此对苗族开始有“生苗”、“熟苗”的不同称呼。居住在“生苗”区内，不通汉语、不习汉俗的苗族人，被称为“生苗”；居住在土司或州县流官管辖区和苗汉杂居区，通汉语、近汉俗的苗族人，被称为“熟苗”。

元明时期，湖南境内少数民族的结构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即在原土著的苗、瑶、侗、土家等民族之外，又有新的民族的一些支系和家族进入湖南境内定居。元初，一支以白族为主体的“爨僰军”，从云南北上，抵长江中游一带，后有一部分落籍桑植，繁衍为今天的湖南白族。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之后，西域“回回”（当时为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及我国新疆各族的统称），归附元王朝随征各地，其中回回人阿里罕等被派遣至宝庆路（治今邵阳市）等地为官，这是回族进入湖南之始。元末明初，大批回回人从军追随朱元璋，称“达军”，不少受派遣进入湖南，其后定居下来成为湖南回族的主要来源。自明代以后经商进入湖南的回族人也不少。湖南的维吾尔族也源于元明之际。据《翦氏族谱》记载，其先祖哈勒，为西域回部望族，从元太祖征战有功，封折冲将军，后东迁内地，历代仕元。明兴，其后人八十佐明太祖征伐，以功封荆襄都督、镇南定国将军，并赐姓翦，后来落籍常德、桃源，子孙繁衍，即今湖南维吾尔族。至今聚居于江华县境内的书、廖等姓壮族，也是元、明之际出广西迁入湖南的。

元、明时期所形成的湖南民族结构和分布格局，入清后大体沿袭下来。但也有些变化。首先，由于清王朝对湖南少数民族的多次军事镇压，特别是对苗民乾嘉起义的大规模血腥镇压，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缓慢，尤其是苗族。如据道光《凤凰厅志》（卷十一）记载，凤凰厅（今凤凰县）从康熙四十四年（1707）至道光二年（1822），全厅苗族人口由31 221口增至49 605口。前后经过115年的时间，仅增加18 384人。又如龙山县，从雍正七年（1729）至乾隆六十年（1795），全县“苗籍”人口，由1 244户、5 657口发展为1 195户、6 138口。66年间，仅增加481人，而户数不增反减。在清代二百多年间，由于天灾人祸湖南少数民族外迁的也不少。如今天仍聚居于湖北宣恩的部分苗族和广西南丹一带的田、唐等姓苗族，都是乾嘉起义失败后从湘西凤凰、永绥（今花垣）等地迁去的。又如，自康熙到乾隆年间从晃州（今新晃）经贵州迁往湖北

宣恩、恩施、咸丰等地的侗族，达千人之多。（参见新编《新晃县志》，三联书店 1993 年 5 月版）。同时，随着清王朝对“苗疆”的开辟和“改土归流”的实施，大批汉族官吏、兵丁、商人，以及一般平民百姓，涌入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客民”，以各种手段逐步占据土著民族的土地，“客民”人数越来越多，原土著民族生活地域必然日趋缩小。如魏源记载：设厅之初，“永绥厅悬苗巢中，环城外寸地皆苗，不数十年，尽占为民地。”（《圣武记》卷七）。据统计，永绥设厅编户时，全为苗族居民，无民村汉户。20 年后，已有“民村”109，迁入客民（汉人）1 914 户、8 721 口。（乾隆《永绥厅志》卷三）。永顺，雍正十二年（1734）归流设县时，全县有“客民”1 443 户、5 226 口。至乾隆二十五年（1706），“客民”达 9 155 户、46 123 口。不到 30 年，移入以土家族为主的永顺县的汉族居民户、口数，分别增加 5.8 和 7.8 倍。由于“客民”（汉人）的大批迁人，带来了汉文化，在另一方面，自然又加强了当地土著民族与汉族的交往和交流，促进了汉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和普及，各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都开始了“汉化”的过程。这也是清代以来，湖南居民和民族变迁的一种趋势。

（作者系本馆馆员）





# 苗族姓氏考

伍新福

汉文献载：苗族“有名无姓”、“婚姻不避同姓”。这虽不能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但并不符合苗族的实际情况。因为所谓“姓”，在苗族中既有现在广泛使用的汉字姓氏，即所谓“汉姓”，又有源远流长的传统的苗语姓氏，习称“苗姓”。在未使用“汉姓”之前，苗族内部早有自己区分血缘宗亲和族系的“苗姓”。历代汉族文人及其他外族人，往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以汉族通行的汉字姓氏为准，从而产生错觉和误解。现特作苗姓氏考，以辨明有关事实，并期能增进人们对于苗族历史传统和文化的了解。

## （一）“苗姓”考释

苗族的分布地域广袤，内部方言土语和支系繁多，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各地、各方言区和各支系的苗族，都曾有自己世代相传的苗语姓氏，而且至今依然在内部流行的还较多。

湘西方言（即东部方言）、西部土语的苗族流传的《古老话》说，苗族有十二个宗支，即十二个苗姓。据石宗仁先生整理翻译本，为“仡濮”、“仡楼”、“仡僚”、“仡芈”、“仡灌”、“仡卡”、“仡削”、“仡徕”、“仡侃”、“仡宿”、“仡劳”、“仡雄吾”[①]。龙炳文先生的整理翻译本有“仡莱”、“仡恺”、“仡卢”、“仡弄”、“仡辽”、“仡芈”等[②]。二者基本相同，只是所用的一些记音的汉字有别。“仡”为语气词，有时又可汉译为“果”、“禾”，加在姓的前面带有尊重的意思。平常也可加“代”，而不用“仡”。

又据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湘西苗族文人石启贵记载，乾城（今吉首）、凤凰、永绥（今花垣）等地的苗族，传说有十二个系别（即苗语姓氏），当时尚保留的有七个。即禾孝、禾蔑、禾瓜、禾卡、禾枷、禾列。“禾”，即为“仡”（“果”）的不同汉字的记音[③]。与《古老话》对照，“禾孝”即“仡削”，“禾蔑”即“仡芈”，“禾瓜”即“仡灌”，“禾卡”即“仡侃”，“禾列”即“仡徕”，相互可对应，仅汉字记音不同而已。可见，东部方言的几大苗姓，一直在苗族内部世代相传。

在黔东方言（中部方言）苗族地区，苗族内部流传的苗姓至今亦大多可考。如福泉县流传的苗姓，有“喀编给”、“喀乾打”，“喀编打”、“喀香卡”、“喀往觉”、“喀卯”等。前面所加的苗语“喀”相当于汉语的“人”或“客”，也有尊称的意思，可直译为“编给人”、“乾打人”、“香卡人”等[4]。台江县境内有“寨方”、“寨黎”、“寨向”、“寨勾”。“寨柳”、“寨嗄闹”等苗姓[5]。苗语“寨”相当于汉语的“家”，意为“方家”。“黎家”、“向家”等实际是方、黎、向、勾、柳、嗄闹等姓，这也就是黔东南地区苗族内部至今仍存在的一些不同支系和宗支。

川黔滇方言（西部方言）苗族地区，次方言和不同土语特别多，所以苗姓比较复杂。

据黔西北赫章县调查，其境内西部方言滇东北次方言苗族，有“卯简”、“卯档”、“卯漏”、“卯蚩”、“卯远”、“卯懒”、“卯鲁”、“卯让”等苗姓；川黔滇次方言苗族内部，有“姆叽”、“姆赤”、“姆吾”、“姆扒”、“姆绕”、“姆陇”、“姆尤”、“姆髦”。“姆低”、“姆举”等姓[6]。

据威宁县调查，在其境内滇东北次方言苗族中，至今仍流行的有八大苗姓。即“卯展”、“卯荡”、“卯娄”、“卯蚩”、“卯简”、“卯鲁”、“卯绕”、“卯日”；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苗族，有“蒙优”、“蒙儿”、“蒙蚩”、“蒙荡”、“蒙鲁”、“蒙嚷”、“给蒙”、“格支”、“格宾浪”、“喀居”、“蒙汪”、“格芊”等，共12苗姓[7]。

1987年10月笔者在滇东北昭通地区考察时，彝良苗族代表人士张荣等人介绍，他们属“大花苗”（西部方言苗族的一个主要支系），内部有八大姓（宗支），即“蒙周”、“蒙当”、“蒙阶”、“蒙雌”、“蒙绕”、“蒙扎”、“蒙耶”、“蒙竹”。

又据川南珙县调查资料记载，当地苗族（属“白苗”支系），内部有28姓。即“夸叶”、“夸卯”、“夸洛”、“夸让”、“夸挡”、“夸虑”、“夸皆”、“夸杠”、“夸众”、“夸乃”、“夸两”、“夸这”、“夸路”、“夸抓”、“夸告”、“夸巴”、“夸暂”、“夸合”、“夸查”、“夸那”、“夸插”、“夸故”、“夸勒”、“夸耸”、“夸干”、“夸拿”、“夸捏”、“夸策”[8]。

从上引资料看，“卯”、“姆”、“蒙”，应是西部方言的大多数苗族的自称“Hmong”的不同汉字记音和谐音。加在姓氏的前面，其意即为“苗族展”、“苗族蚩”、“苗族绕”等。“夸”，相当于东部方言的“仡”、“代”，为语气同，同样有尊重的意思。西部方言地区各次方言和土语的苗族姓氏，各有差异，但相互参照起来看，依然有不少姓氏是共同的。如“蚩”（“雌”、“赤”），“绕”（“让”、“嚷”），“当”（“挡”），“尤”（“优”），“阶（“皆”、“给”），“叶”





（“耶”），“巴”（“扒”）等。显然是各地方言土语发音的差异，对同一个苗姓使用了不同的汉字记音。

由于苗族有自己民族语言而无民族文字，所有的苗姓均系口耳相传，没有文献记载，因此其最初形成的年代和得姓缘由，现在已无法一一加以考证查实。若依据现有材料作综合考察，笔者认为各苗姓的历史由来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得姓于远古氏族部落和首领的名称。如湘西方言苗族中的“仡濮”一姓，很可能同先秦时代聚居于湘西和武陵五溪地区的古濮人有联系；而“仡灌”，则应得姓于被舜放逐于湘西“崇山”的灌兜（欢头），这支苗姓至今仍奉灌兜为自己的先祖。据考证，湘西苗族十二姓中，“仡徕”、“仡恺”、“仡轲”、“仡侨”等，均为原远古苗族首领和氏族部落名称，后发展为苗族姓氏[9]。又据《苗族史诗溯河西迁》记载，苗族先民们由“方”、“柳”、“恭”（“勾”）、“希”、“福”等祖公率领，西迁到黔东南地区，经杀牛祭祖后分散于剑河、台江、雷山等地定居下来，发展成各个不同的宗支和姓氏。至今仍流传的“寨方”、“寨柳”、“寨勾”等苗姓，显然就是得姓于相应的始迁祖之名。

第二类，源于图腾崇拜。苗族的某一支系以某种动植物为自己的保护神和图腾加以崇拜，后即以该动植物之名为姓氏。例如：西部方言苗语称羊和山羊为“雌”，苗姓中的“蒙雌”，以及“卯蚩”、“姆赤”，应与羊有关系。这一姓氏和支系的苗族很可能长期以牧羊为主业，同羊结下不解之缘，故将羊作为图腾加以崇奉，后遂以羊（“雌”）为姓，称“蒙雌”或“卯蚩”、“姆赤”。又如，西部方言苗语叫“龙”为“绕”，苗姓“蒙绕”和“姆绕”、“卯让”，即源于对“龙”的崇拜。苗族这一支系和姓氏，历史上曾以“龙”（“绕”、“让”）作为自己的保护神和图腾，后遂以“绕”（“让”）为姓。而他们的子孙后代至今仍保留着“接龙”、“安龙”的传统，对“龙”十分崇敬。

第三类，以祖居地之名为姓。如上引黔东南福泉等地苗族所流行的“喀编给”、“喀乾打”、“喀编打”、“喀香卡”、“喀往觉”等苗姓，其中“编给”、“乾打”、“编打”、“香卡”、“往觉”等，均为原祖居地的苗语地名，至今依然沿用，但又早已演化成苗族内部的宗支名和苗姓。

**（二）苗族“汉性”由来**

中国的苗族，现在已普遍使用汉姓，而且汉族的大多数姓氏在苗族中都可以找到。但不同地区和不同支系的苗族，则各以某些汉姓为主，相互有些差异。

东部方言地区，湘西凤凰、花垣、吉首等地的苗族，以吴、龙、麻、石、廖为五大姓；黔东松桃、铜仁等地苗族，以吴、龙、麻、石、田（或白）为五

大姓。此外，还有杨、张、赵、欧、伍、刘、梁、施、罗、王、邓、满、滕、胡、向等姓。据《古老话》记载，苗族共有148个汉姓。可见，东部方言苗族的汉姓相当多。但以“五大姓”为主，其他姓的人数则较少。

中部方言地区，如剑河县，苗族中有杨、龙、王、李、张、姜、吴、刘、邰、万、彭、潘、罗、黄、周等数十姓。而其中杨、龙、王、李为四大姓，人口均在1万人以上[10]；福泉县，操中部方言的苗族，有吴、潘、文、雷、龙、杨、王、刘、杜、侯、宋、江、熊、张、罗、李等，共52个汉姓，其中则以吴、潘、文、雷、龙、杨等姓为主[11]。又据笔者调查，雷山县掌背等地苗族，汉姓有张、白、韩、莫、向、蒋等，而以张姓的人数为最多。

西部方言地区，属滇东北次方言的贵州赫章县苗族（大花苗），主要有16个汉姓，即李、罗、汪、王、张、安、杨、韩、朱、潘、陶、吴、苏、马、龙、陆等[12]；威宁县的苗族（大花苗），以朱姓为大姓，其他按人数多少分别是张、王、李、雷、韩、龙、吴等姓。属川黔滇次方言的云南文山地区的苗族（白苗为多），以杨姓人数最多，其次为马、李、陶、熊、项、王、吴，人数最少的还有邓、刘、宋等姓[13]。

从历史情况看，苗族采用汉姓，是随着汉文化进入苗族地区，以及苗、汉民族之间接触和交往的增多而逐步实现的，而且各地区和各支系先后不一，时间有早有晚。在某些地区，由于较早接触汉文化，因而也就较早地采用了汉姓；在愈偏远、愈闭塞的地区，采用汉姓的时间则愈晚。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古武陵郡和“五溪”地区，即今湘西和湘、黔、渝、鄂交界地区，为中原和长江、黄河中下游汉族发达地区通向少数民族聚居的大西南和云贵高原的中介地，同汉族地区和汉文化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些地区的苗族出现汉姓的时间也就最早。

据湘西流传的苗族古歌《傩公傩母》传述，“洪水漫天”后，姐弟二人成婚以繁衍人类。结果姐弟二人生下一个大肉团，弟弟就将肉团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甩向四面八方。共甩出148块，变成了148姓的人。古歌说：“甩在岩石上的肉块啊，后来变成了人，取汉字姓为石；甩在稻田里的，变成人，取汉字姓为田；甩在水里的，变成人，取汉字姓为吴（苗语叫水为“吴”）；甩在李树杨树上的，变成人后，就取汉姓叫李、杨……”[14]这是笔者所见到的关于苗族得汉姓的一种最原始的说法，当然是属于神话，是苗族在使用汉姓之后由民间传人将其添加到神话中去的，不足为据。但该古歌同时提及“桃源洞”、“桃源县”，并说“傩公傩母”居住在桃源县。所谓“桃源县”，即今常德地区的桃源县，处武陵地区北部，西汉属临沅县（治今常德市），东汉至南朝置沅南县。隋唐五代改属武陵县（治今常德市）。宋乾德元年（963年）始析武陵县地置





桃源县，沿袭至今。这说明，现在流传的苗族古歌《傩公傩母》，应是在宋代设置桃源县之后，经民间传人整理加工而形成的。由此可以推断，湘西地区苗族开始采用吴、龙、麻、石、廖、田、梁、张、杨等汉姓，应是在唐宋之际，或更早一点。

从汉文献资料看有关苗族汉姓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樊绰的《蛮书》。据其记载，咸通三年（862年）三月，时任安南经略使从事的樊绰，奉命去安南都护府所辖云南境内一些羁縻州，招抚闹事的“蛮”军，见到了“蛮”将杨阿触、杨酋盛等。“蛮”将诉说：他们乃“盘瓠之后”，原住在“黔中”、“巴东”等地，是被征调到安南来的。并说：“盘瓠皮骨今在黔中，田、雷等家时祀之”。在“巴东”，有“田、雷、冉、向、蒙、吴、叔、孙七姓”，均属“盘瓠”后裔[15]。所谓“盘瓠之后”，当然还包括了瑶族和畲族，但这里主要是指苗族。“黔中”、“巴东”，即今重庆市东南部和贵州铜仁地区、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市、怀化市所属各县（市），大体属古武陵五溪地区。说明这些地区的苗族，在唐代后期已有杨、田、雷、冉、向、蒙等汉族姓氏。这与苗族古歌《傩公傩母》所传述的苗族采用汉姓的年代，大体相合。

唐宋之际，武陵五溪地区的苗族，开始采用了汉姓。但还只是一部分，并且从人数看，在整个苗族中只占少数。苗族大量采用汉姓，特别是在云贵高原和西南偏远地区，是始于明代，而在清初“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所谓“生苗”区）之后，才形成高潮。这不仅与汉文化教育在苗族地区推广和苗、汉民族间交往交流的加强相关，而且明清王朝和地方统治当局以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起了重要的作用。

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王朝废除思州、思南二宣慰使司，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置贵州行省。从此，贵州苗族地区有相当一部分被正式纳入经制府、州、县的行政管辖范围，对苗族实行编户入籍。为编立户籍，于是开始替“有名无姓”苗民定立汉字姓氏。如据记载，巡抚贵州都御史刘洪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奏称：“所属土苗，族类渐蕃，混处无别”，请“以《百家姓》编为字号，赐之汉姓。”经兵部“覆请”，上曰：“华夷有定分，可随其俗称呼，定与姓氏，不必用《百家姓》。[16]”明朝廷首先肯定了为苗民定立汉字姓氏的必要，同时认为可随其俗用相应的汉字称呼，不一定都按照汉族流行的“百家姓”来定。

由于强制性的自上而下在苗族中推行汉姓，从明代开始，各地苗族采用汉族姓氏的已比较多。以当时留下的《明实录》的记载为例，据笔者查阅，明人先后出现于历史舞台的苗族首领们，有相当一部分都已使用了汉字姓名。如永乐年间，有竿子坪“生苗”廖彪、思州台罗寨“苗人”罗哲，竿子坪称“苗

王”的吴者泥，以及吴担竹、吴亚麻等；宣德年间，有领导苗民起义的治古答意长官司长官石各野、竿子坪长官司长官吴毕郎，“镇竿苗”龙三、白大虫、黄老虎、石计聘等；正统年间，有贵州称“苗王”的“播州苗”韦同烈，都匀“草塘苗”龙惟保，“新宁苗”杨文伯等；景泰年间，有在镇远、清平一带称“苗王”的王阿同，“洪州苗”田总干，平越“苗首”王阿榜，横岭峒“苗首”吴英头和称“苗王”的蒙能等；弘治年间，有率众起事的“武冈苗”李再万，“镇溪苗”龙麻阳，“铜仁苗”龙童保等；嘉靖中叶领导湖贵边苗民大起义的“竿子坪苗”龙母叟、“亚酉寨苗”龙求儿、“腊尔山苗”龙计保和吴黑苗等，还有铜仁“旦逞寨酋”吴朗拱，“苗头”廖羊保等；明末在各地起事的，有“辰州苗酋”张五保、“镇竿苗酋”吴老文、“武冈苗”袁有志等。上引人物所涉及的地域，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包括湖南西部和西南部的湘西自治州、怀化地区、邵阳地区，贵州东部和东南部的铜仁地区、黔东南自治州、黔南自治州等所属县（市），范围已从武陵五溪地区进一步向西、向南扩大；采用的汉字姓氏有廖、吴、龙、白、田、石、黄、杨、王、韦、蒙、张、罗、袁等，数目已不少，而且这些姓氏至今仍为这些地区苗族所通行的一些主要的汉姓。

但同时出现于《明实录》的苗族人物，有许多仍只有苗名汉译而无汉姓。如洪武年间，贵州领导江力、江松等“四十寨苗”起义的叫“把具”、“播共桶”等；永乐年间，在思州与罗哲一道共同领导起义的还有苗首“普亮”；景泰年间，有平越等处“苗首”阿拿称“苗王”；正统年间，有贵州“计沙苗”金虫、总牌起事；天顺年间，领导都匀龙里“东苗”起义的首领叫“干把猪”；成化年间，陈蒙烂土长官司所属夭坝干“黑苗”，以“赍果”为首起事；正德年间，有“清平苗”阿旁、阿阶、阿革称“王”；嘉靖年间，都匀府平浪司苗民起义，“头目”叫阿向、阿四、老脚、普俄、老亨等；天启年间，兴隆、清平二卫苗民天保、阿秧、阿买等起事。这些“苗酋”、“苗首”、“苗王”等，显然均为苗名汉译，他们都尚未采用汉族姓氏，还是“有名无姓”。

在清初“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生苗”区）的过程中，云贵总督鄂尔泰于雍正四年（1726年）曾上奏《经理苗疆事宜》。其奏曰：“苗人多同名”，应“令各照祖先造册”，而对于那些“不知本姓者”，则“官为立姓”[⑦]。所谓“照祖先造册”，就是在编户人籍时按其祖先和支系名号确定姓氏。“不知本姓”，即没有汉姓又已记不清自己始祖和支系名号，这些苗民就由官府为其择用汉族通用的一些姓氏。各苗族地区，在设置府、州、县、厅后，苗民由官府登造人口、编户入籍时，都普遍实行了这种政策，因而苗族在历史上出现了采用汉姓的高潮。从此以后，绝大多数的苗族人户才都有了汉姓。

依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要对现在各地苗族通行的汉姓一一加以考察，





弄清其最初的由来，也是不可能的。但大致可归入以下四种途径和方式：

一、民间自己改用汉姓。这是苗、汉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自然出现的，早在唐宋以前即已开始。如据民间传说，东汉早期率领“五溪蛮”起义的相单程，他的亲族和后代在起义失败后都改为向姓，至今仍聚居于湖南沅陵县莲花池一带的向姓苗族均为其后裔[⑧]。在唐代樊绰《蛮书》中记载的苗族杨、雷、向、田、冉等姓，《明实录》记载的，明初出现的“苗首”廖彪、罗哲、吴者泥、石各野等使用的廖、罗、吴、石、龙等姓氏，都应是在部分地区苗族民间自发采用的汉姓。又如据记载，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贵州都匀平浪司苗民起义被镇压之后，苗族的一些头领改用了汉姓，其中“阿四”取汉名叫“王聪”，采用了汉族的“王”姓[⑨]。

二、由原流行的苗姓或氏族头领和户主的名号按汉字译音而演化成的。这主要是在苗民编户人籍登造户口时采用的一种方式，即所谓“各用祖先造册”。如川黔滇次方言苗族中苗姓有“所古”（或“夸古”），汉字音译为“古”；还有苗姓“姆尤”汉字音译为“尤”。这应是现在云南一些苗族地区仍流行的苗族古、尤等汉字姓氏最初的由来。又如。据民间传说，贵州雷山一带姓白的苗族，本无汉字姓氏，其头人叫“绍白寡”，编户入籍时就按汉族姓氏改为“白绍寡”，“白”变成了姓，此后这支苗族都姓白[⑩]。

三、官为立姓。明初年，即有个别苗族首领在归顺朝廷后，由朝廷和官府赐予汉字姓氏的。如募役长官司（治今关岭自治县西南），长官原则阿辞，为“有名无姓”，归附明王朝后，授长官司职。传至阿更，朝廷赐姓礼，更名山。即姓礼名山，有了汉姓[⑪]。在苗族地区“归流”和“开辟”后，官府在登户造册时更普遍地采用这种“赐”姓，即“官为立姓”的方式。但由于年代久远而又缺乏文献资料，现在很难作具体考证。

四、由汉人带入苗区。汉人以各种不同的原因进入苗区定居，后逐步融合于苗族，苗族中也就有了相应的姓氏。如，贵州中部地区苗族，姓蔡、宋的不少，历史上称“蔡家苗”、“宋家苗”。据文献记载，他们本是中原的“蔡人”、“宋人”，被放逐于黔地，“流为南夷”即演化为苗族，故苗中有蔡、宋等姓[⑫]。又据20世纪30年代，凌纯声、芮逸夫和石启贵等人在湘西苗区实地考察，乾城（今吉首）、凤凰、永绥（今花垣）等地苗人有“吴、龙、廖、石、麻五姓”，他们称之为“纯苗”。由于一些“外姓人”（多原为汉人），“人赘于苗而习其俗”，即逐步融合于苗，因而“五姓”之外，在苗族中又有“杨、施、彭、张、洪诸姓”[⑬]。由于近代以来，苗、汉之间通婚的现象日渐增多，其中汉族男子入赘苗家者其子女往往从父姓，苗族中的汉姓也就日益增多。据贵州福泉县调查，其境内萱花乡的柳、陈、何、舒、陆、谢、汤七个姓，翁羊乡的兰、

刘、罗、唐、廖五姓，均为苗、汉通婚和汉人入赘苗家后，新增加的汉姓[24]。

### （三）苗族姓氏与婚姻

苗族采用汉姓，无论是通过哪一种方式，都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没有什么定则和规律可循。但其传统流行的苗姓，却是十分严格的，且世代遵循不变。这就造成在苗族中汉姓与苗姓的关系的复杂性。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或因时因地而异，本属一个支系和一个苗姓的成员却采用了各不相同的汉姓；另一方面，往往又有不同的几个支系和几个苗姓的成员采用了同一个汉姓。一个苗姓包括着二个以上的汉姓，一个汉姓为两个以上的苗姓所采用，在苗族地区都是常见的。

如湘西东部方言苗族，苗姓“禾蔑”（仡芈），有廖和石两个汉姓，汉姓石的苗族，又分属“禾蔑”和“禾卡”（仡侃）两个不同的苗姓，前者称大石，后者称小石（又写成时）；“禾卡”中除石姓外，有一部分还采用了汉姓麻，而麻姓苗族有一部分又是属“禾流”（仡辽）这一支系和苗姓的；“禾孝”（仡削）这一支系和苗姓的苗族，则分成了吴和伍（武）两个汉姓。黔东方言地区，汉姓吴，在福泉县包括“喀乾打”和“喀编打”两个不同苗姓的苗族；黄平、福泉等地分属“喀编给”和”喀香卡”两个不同苗姓的苗族，现在汉姓都姓杨[25]。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苗姓“卯简”，汉姓分成李、罗二姓；苗姓“卯漏”，汉姓分为张、安二姓；苗姓“卯让”，有苏、马、龙、陆四个汉姓。川黔滇次方言等二土语区苗族，苗姓“蒙优”汉姓杨，苗姓“格蒙”汉姓熊，苗姓“蒙鲁”汉姓祝、陶，苗姓“蒙荡”汉姓分为张、王。在赫章县苗族中，汉姓杨，除苗姓“蒙优”采用外，还有属滇东北次方言文系的“卯蚩”；汉姓罗、既有滇东北次方言支系的“卯简”，又包括川黔滇次方言支系的“蒙哧”[26]。

苗族在历史上与汉族一样，都奉行“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所谓“同姓”则是指苗姓，只要苗姓相同，即同属一个支系和宗支，无论采用的汉姓是否相同，双方就不允许缔结婚姻关系，由于同苗姓就是同一个祖宗，有血缘关系。苗族先民们在生存斗争的实践中，早已认识到同宗结婚有害于后代的发展。所以对“同姓不婚”十分严格。只要同姓，同一个宗支，不管年代已隔多久、血缘关系已经多么疏远，也不能结婚。汉族也是如此，只是近代以来才逐步有所改变，认为虽然同姓只要出“五服”，男女双方就可以结婚。现在汉族同姓结婚的已十分普遍了。但各地苗族，只要传统的苗姓还没有失传，同属一个苗姓的男女，至今仍然不得通婚。因而在苗族内部出现了外人难以理解的“异姓不婚”的特殊现象，即有时汉姓不同也不能结为夫妻。如湘西地区，苗族中石与廖、吴与伍、张与陈等姓均不能通婚。又如云贵地区滇东北次方言苗族，李与罗、朱与潘、陶与吴、苏与马等姓不得通婚。这都是因为他们采用的





汉姓虽不同，但同属一个苗姓，宗支相同。

由于苗族中苗姓与汉姓并存，且二者的关系又颇为复杂，所以在出现“异姓不婚”的同时，又有“同姓可婚”现象的存在。如湘西地区的苗族，石与石（时）、龙与龙（隆）、张与张（章）等均可婚。因为他们所用的汉姓虽相同，但实际上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支系和苗姓，不同宗，没有血缘关系，当然相互可以通婚。外人不了解内情，片面以汉姓为准，故明清以来的一些历史文献多有苗族“婚姻不避同姓”之说。这完全是误解。

**注　释**


[1] [12] 石宗编译.《中国苗族古歌》.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 12 月版.

[2] [9] 龙炳文编译.《古老话》. 岳麓书社，1990 年 11 月版.

[3] 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增订本.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8 月版.

[4] [11] [22] [23] 福泉县民委.《福泉苗族》. 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年 9 月版.

[5] 新编《台江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 6 月版.

[6] [12] [24] 赫章苗族志编写组.《赫章苗族》. 1996 年内部印刷.

[7] [13]《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志》. 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 年 5 月版.

[8] 珙县民委.《珙县苗族志》. 1996 年内部印刷.

[10] 新编《剑河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2 月版.

[13]《蛮书校注》卷十.

[14]《明孝宗实录》卷 207.

[15] 转引自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十九.

[16] 参见伍新福.《五溪蛮考释》,《苗族历史探考》.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 8 月版.

[17] 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二,《艺文志》.

[18] 据龙伯亚、伍新福实地调查资料.

[19] 乾隆《贵州通志》卷二十一,《土司》.

[20] 参见《皇清职贡图》卷八.

[21] 凌纯声等.《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商务印书馆，1950 年再版.


（作者系本馆馆员）

# 新晃——夜郎古邑考

弘　征

从历史文献看，夜郎并非一个真正符合我国古代邦国概念之“国”，而是一个比较大的部族。但是名声很大，比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许多诸侯王国要响亮得多。但凡略识之无，没有人不知道“夜郎自大”这句成语。然而，一提起夜郎，人们可能立刻会想到是在贵州（主要来自几种重要辞书和古诗文的注释），而不了解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才是古夜郎的发源地。为此，笔者曾就此分别写过几篇拙文，现在再就这一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探讨。

## 今湖南新晃一带是夜郎古邑

“邑”有多义，此处当古代的“国”与部族称。如《春秋左传·宣公》载“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以及《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说的“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考夜郎之名最早就出现在司马迁的这篇《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接下来叙其历史：“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文中有一处明显的笔误，即楚威王与时间不合，应为楚顷襄王。其次，太史公惜墨如金，没有说楚军“循江上”的江名，也没有说伐夜郎，只是让读者连缀上下文自然明白。（见拙文《读史献疑两则》，刊2001年5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在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就写得十分清楚了：“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蹻），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尤详。

从楚国在约公元前370年以前就置有黔中郡，郡治在今湖南沅陵，爱国诗人屈原于公元前296年遭流放时已经到了溆浦，可知这楚军要征伐的古夜郎部族必然是在今怀化市以西的沅水上游及其支流㵲水（古人亦每将其称为沅水）范围。问题是楚军登岸的且兰究竟在哪里？

然而，不仅古且兰现在不知何处，连西汉与西晋时所置的故且兰与且兰县在几种重要辞书上也说法各殊。《辞海》说：“在今贵阳附近，一说在今凯里西北。”《中国历代地名辞典》说：“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南。”《辞源》说：“地在今





贵州福泉县。”前者与㵲水相邻近，后二者皆属于㵲水上游。

考㵲水发源于贵州福泉县罗柳塘，经黄平、施秉、镇远、玉屏入湖南新晃经芷江、中方至黔城汇入沅水，全长444公里。本来就不是一条大河，水源有限。在湖南段由芷江至新晃间，河谷便多穿插于坚硬的板岩与冰碛地层，每每构成长长的峡谷，有无数险滩，溯流已经困难。从新晃入贵州境更是两侧高峰峭壁，峡险滩危，楚军的大船队要逆流而上而且能找到一大片能系船登岸击败对方之处是不可能的，其发源地福泉在《水经》中已明白说是“旁沟水”就更加不可通航了。

现在的夜郎研究者多只从汉、晋置的且兰出发，而忽略了其地当时能否“椓船登岸”这一重要前提，乃至讳言“从沅水伐夜郎”或将沅水改名。实际上为现代夜郎研究者所推重的清道光间贵州学者郑珍在《牂牁十六县问答》中也只说“且兰为沅水、沅水（即㵲水）所出，今之溯沅入黔者，舟可直抵镇远城下。”镇远当时为府，府治在今镇远县，与今新晃接壤而距福泉尚远，在清代也仅是顺流可下，逆流在非涨水的季节乘小船拉纤由新晃勉强可行，与楚军是一支大的船队而且是去打仗，两千多年前的原始河道从未加清理完全不可比拟。

这一点，我们只要从明清人的诗中就可得到证实。例如，清代著名诗人赵翼从镇远乘一种“趺坐不得起”的麻阳小舟东下时还是顺流，在其《舟发㵲阳》中即状其艰险云：“急流方奔腾，一束起怒瀑……波吒命欲拚，邪许声似哭。苦恨天设险，创此扼隘酷。”林则徐于嘉庆二十四年经此去赴云南乡试正考官任，作《镇远道中》诗，开头一句就说“两山夹溪山水恶”。因为走水路不可上行，他走的是陆路，亦不免“肩舆十步九扶掖，不尔倾蹶肤难完”。明万历时官贵州布政司理问的葛一龙去上任时，也是坐船到了芷江（当时新晃为芷江辖地）便登岸陆行。其《次平城》诗有云：“言从撷香芷，五日濒江路。倾危赴偃仰，逼仄谢回顾。”由芷江至玉屏，就在路上走了五天，如果乘舟能顺利上行，他何必这么辛苦！

历史和事实说明，战国时楚军伐夜郎登岸的那个且兰，绝不可能是今贵州福泉，连镇远都不可能，只能是今湖南怀化西部中方至新晃之间。新晃则正是古夜郎部族的基地。

那又何以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在置且兰县时不在今新晃一带？这是因为即使当时已经弄清楚了古夜郎与且兰的位置，这一带亦早已在高帝五年（前202年）便归入了武陵郡所属的镡城县（今洪江、中方一带）和无阳县（今新晃、芷江一带），自然不可遽然更改。而新置的且兰乃是刚归顺的“蛮地”，而且正属于当年楚军溯沅而上的㵲水源头，也并不太乖历史。而牂牁郡之命名，

即源于“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这一问题在唐初重置夜郎县时便完全解决了。

史载唐初曾三置夜郎县。起因可能是由于唐高祖武德三年（620），时㵲水流域今贵州瓮安、黄平间的部落首领谢羽龙向朝廷纳贡称臣，朝廷乃“授龙羽为牂州刺史，封夜郎郡公”。（《旧唐书·南蛮传》）显然是认为这一带乃夜郎故地。然而并没有在其地置夜郎郡或县。第一次置夜郎县是于次年在更靠近今新晃的石阡，但不过几年在贞观元年（627）便被废除了。经过了好几年的考查与斟酌，才又于贞观八年（634）析龙标地再置夜郎县，县治就在今新晃，至天宝元年（742）改名曰峨山县为止，长达有百余年。第三次是在今湖南新晃置夜郎县后过了十年，又在今贵州桐梓置珍州夜郎县，两县并存。可能是考虑到前者是古夜郎的发源地，后者是有一部分迁徙后的集中区，两处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正因为溯源知其有先有后，故在隋唐宋的史志与大作家的诗文中每涉及夜郎，皆是指它的发源地。最著名的如唐代大诗人李白约作于天宝八年（749）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末句“夜郎西”是“西夜郎”的倒装句，也就是指王昌龄的贬地龙标，治所在今洪江市黔城镇（原黔阳县城）。另一位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于贞元元年（805）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期间作《楚望赋》云：“武陵（西汉改黔中郡名）故郢之裔邑，夜郎诸夷杂居。”亦是指古黔中郡今怀化所属一带为夜郎各民族所居之地。宋祝穆《方舆胜览》云：“沅州潭阳（宋郡名，辖今中方、洪江、麻阳、芷江、新晃诸地），盘弧之后，俗好巫鬼。山川风物之所荡，牂牁武陵之交。”牂牁，即夜郎之代称也。《隋书·地理志》载“沅陵郡（开皇九年置辰州）辰溪”县云：“旧曰辰阳，平陈改名，并废故夜郎郡……有郎溪。”郎溪即后来在唐贞观八年与夜郎同时分龙标地所置县，故治在今怀化市所属的原黔阳县西南。

由于历史的无可置疑，现在乃出现了一种“东夜郎”之说，让人觉得这是后来夜郎从今贵州东部扩大到了湖南西部；实际上，应该是古夜郎部族曾经有一部分西徙而不是东移。

### 夜郎的西徙和“夜郎国”究竟有多大

《史记》和前后《汉书》均载楚将庄蹻在攻克了夜郎并远至今云南境内“以兵威定属楚”之后，“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这便是《史记·秦本纪》所载的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这里所说的“楚黔中”，郡治就在今湖南省沅陵县，与新晃同属于今怀化市。





本来，如若以常理度之，当楚军远走之后，夜郎部族正可乘机重整旗鼓，但在强大的秦军面前，连楚军都不能立足，遑论夜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也没有一支职业的军队。加上人口日繁，“畲山为田”，需要不断地寻求耕地。在安全感已日趋受胁之际，更促使部族中有一部分人开始西徙，有些青壮年则可能在遭楚军攻击时就已经逃了。从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只有一条向西的路可走，加上在迁徙过程中和日后的生产、生活都必须傍水，因而同属于㵲水流域的今贵州东部就成了最初向西南发展的活动地区。今贵州福泉县乃㵲水的源头，这也是后来汉代与西晋在此置故且兰与且兰县的依据。新版《辞源》的说法是准确的，大率出自以郑珍《牂牁十六县问答》为依据的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沿革考》。

自此后至公元前百年的近二百年间，由于西南“夷地”相对地为中原王朝所无暇顾及（庄蹻能以其众王滇便是明证），夜郎部族随着其自身的壮大及与一些小部族联盟，活动的范围便愈来愈广。但所至之处或停留不久或留下一部分又分头继续迁徙，并非有目的地扩大疆土，因而现在也很难划定它的活动范围，以致今日除了湖南与贵州外，还有云南、四川、广西都有县、市称是夜郎故地，只要言之有据，原是很自然的。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并没有一个疆域很广的大夜郎国。即使在汉元封二年（前109）绶王印时，朝廷也只厚赠缯帛而并无封地，行政权都掌握在朝廷任命的地方长官手中，与汉初郡国制并行的“国”完全是两回事。

设想夜郎国曾经很大的误会源于《史记》与《汉书》中所转述的唐蒙上奏汉武帝的那一番话，诸如“窃闻夜郎部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出辞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今广州市）城下……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数百步，足以行船”之类，全是唐蒙“风晓指南越”（又作南粤，今两广地）和回到长安后道听途说来的，矛盾百出，全属子虚乌有。实际上，唐蒙自己在当时连夜郎的方位都没有搞清楚，当汉武帝听了他的话派他去时，他率领一千兵卒加后勤队伍万人，茫然地至今四川汉源又几经绕道方才寻找到所传说中的夜郎部族。后来为了要修通这条“夷道”，又“数岁，道不通。士罢饿馁，罹暑湿，死者甚众”。可知在这之前，长安的商人也肯定不曾去过，又何以知道“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好像夜郎真有一个大都市似的，而且可以与今广州市直接通商，纯属是天方夜谭罢了。

关于唐蒙所至的那个“夜郎国”的人口，我们现在只要从《汉书》的《地理志》中便可得知。当汉元鼎六年（前111）置牂牁郡时，连同故且兰与夜郎县在内共十七个县，总计才“户二万四千二百二十九，口十五万三千三百六十”。平均一个县不足万人，即使全部加到夜郎头上也无论如何不能组建一支

十余万人的军队，更不用说需要有多少人耕织才能养活他们。

实际上这一问题我们在《汉书》转述唐蒙讹语的同一篇《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就已经有答案了，那就是在河平二年（前27），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等联反，牂牁太守陈立率从吏数十人至夜郎且同亭去召见兴，兴带数千人与从邑君数十人前往，陈历数其罪状，立即就将他杀了。接着夜郎王的岳父翁指率部为兴报仇，二十二个邑君全部参加了，朝廷并没有派出大军，仍只是由郡守陈立领兵应战，很快也以翁指为其部属所杀而告终。可知夜郎国在当时能召集和联合起来的队伍也就是几千人，更谈不上有什么很强的战斗力，整个夜郎国老幼加起来有多少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其时整个夜郎部族都已经在那里集中。正如前面已一再提到的，夜郎本是一个迁徙的部族而不是国家，其发源地和分散在各地的后代们此后还继续其部族的存在，留下的传说也很多，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夜郎民族。

### 夜郎的种属及与今侗族的关系

如果包括后来扩大了的范围，夜郎的种属当不止一个，但在最初的发源地应是濮人。

濮或称卜在历史上出现很早，可追溯到帝颛顼。后来又是助周讨殷的西南八大联盟部落之一，《尚书·牧誓》中有记载。《史记·楚世家》载熊霜六年（前822）“（霜）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乱于濮”，亦即《国语·郑语》中所说的“熊逃难于濮而蛮”。与楚人相融合后来又多有战争。如《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楚子为舟师以伐濮”，使得濮人只有从长江、洞庭间陆续向西南方向迁徙。现代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中说：“濮西周之初在巴中，东人荆，居江汉间，由楚之西南下人江，东人岳州，南入湘沅，又至永昌，先后迁徙之迹可寻也。”

从历史文献稽考，夜郎是濮的族属早已见于《华阳国志》。书中在述及夜郎王兴被杀之后，其部族去牂牁郡府“咸怨诉夜郎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其后”，便称“夷濮阻城”。然而，在《后汉书》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中，“夷濮”已改作“夷僚（音老）”。这一改动并非种属不同，而是夜郎在不同历史时期史家笔下的称谓，同在《华阳国志》中犹见有“濮僚”连称，如谓“谈稿县有濮僚”；到了南北朝以后的典籍中，便皆只称僚而不见称濮了。

《太平御览》卷171引《十道志》云：“珍州夜郎郡，古山僚夜郎国之地。”说的就是唐代比今新晃晚十年所置夜郎县的桐梓。今新晃一带既为夜郎古邑，当然更为僚所集居，典籍中被提到的尤其不可胜数。如隋黄闵《武陵记》称沅辰间有“仡僚”。《元和郡县志》云：“潕溪僚、浒之类。”《新唐书》载“贞观





十二年，巫州（故治在今黔阳）僚叛”。《宋史》载：“宋仁宗宝元二年，辰州（故治在今沅陵）佶僚三千余人款附。”宋黄庭坚于崇宁三年作《过洞庭青草湖》诗云：“行矣勿迟留，蕉林追猲僚。”陆游《老学庵笔记》说“辰、沅、靖州蛮有仡伶、仡僚”，等等。

然而，正如前已论及僚是夜郎部族之后，但夜郎并不都是僚人一样，现在要将僚完全归人今天的哪一个民族也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某几个少数民族长期共居一地，风俗习惯基本相同，经过了几千年之后也无法从血缘上去作出很准确的判断。现在只是从历史渊源、风俗习惯、文化特征等多方面去进行稽考，可以肯定今日湘黔桂境内的侗族乃是古夜郎族属的濮后来又称作僚的一支，并不等于说古夜郎与别的民族就完全没有关系。

侗的命名来历大约始于唐代在西南边地置羁縻州所属称峒或溪洞，宋代更已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州县下类如今日的区乡。唐宋时已通称侗族为“侗僚”或“仡伶”。明邝露《赤雅》云“侗亦僚类”，说明在元明时皆已称僚为峒。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说“峒人，一曰峒蛮，散于牂牁、舞溪之界”，实际上就是“以牂牁、舞溪（即潕水）”代称夜郎，说峒人乃夜郎部族的后裔。现称为“侗族”是1951年所定。

再从《北史》卷九五记僚人“依村积木以居，其名曰‘干栏’”，这也正是今侗族是僚的又一有力的佐证。“干栏”式建筑为侗族的传统住宅，现在仍然保留。古夜郎部族的住宅肯定也就是这一种。

### 夜郎古邑与古夜郎部族的三大特征

《史记》诸书在述及夜郎部族的特征时，强调的都是“椎结，耕田，有邑聚”这三个方面。

从历史上看，头发的式样乃是古代区别一个种族最明显的特征。诸如汉人束发、戴冠；越人“断发文身”（《史记·越王勾践传》）；氐羌“披发覆面”（《后汉书·羌人传》）。椎结，就是将头发盘结成椎形于头上。古代侗族的男子皆结髻，戴圈环，现在仍包青侗布帕；妇女的结髻今日在乡村仍然十分普遍，未婚少女尤其花样繁多，常见的便有单顶髻、双顶髻、盘龙髻、凤尾髻、螺丝髻等十多种。古代的苗族男女也皆蓄长发，挽椎髻；瑶族和土家族也是一样。

“能耕田”是指种水稻而非旱地作物，所以史家们才特别指了出来，否则，那时已经是农耕时代种地天下皆然，没有必要给予突出。宋乐史著《太平寰宇记》卷119中就曾经明白地提到“自夜郎、滇池、邛都，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知耕田，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今湖南广大地区正是我国稻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道县玉蟾岩已出土了一万二千年以前的稻种姑且不论；仅从新晃于1987年在多处出土的许多旧石器来看，早在5—10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劳

动生活。邻近的靖州侗族苗族自治县出土了约五千年前的稻谷炭化标本，还有一件有稻作文化特征的饭篓，与今日侗族的饭篓一模一样。可以想见，今新晃一带在楚军未来征伐之前，水稻耕作技术已经颇为发达，后来随着一部分部族的西迁又带到了新的栖息地。

正因为是种水稻，所以夜郎人特别重视水。夜郎"王以剑击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的传说便由此产生。《汉书》载夜郎王兴被杀后，其妻父翁指率众要去复仇，正碰上"时天大旱，（陈）立绝其水道，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完全是为了水的原因，使牂牁太守陈立能不战而胜。也说明了当时已注意修水渠这种灌溉设施。

"有邑聚"中的"邑"在此处是指村落。"邑聚"就是大家习惯集中住在一起，在《华阳国志》和《后汉书》里都写作"邑聚而居"。这也正是湘西少数民族尤其是侗族的传统。从历史上一般都是同姓同宗集中住在一个寨子里，若二三姓同寨，则分片集居，以致现在还保留了许多称为某某寨的地名，有的即以姓氏名之，如"张家寨"、"李家寨"等。凡称寨者，并非都是因为自宋以来曾在此设有基层军事行政机构，而是指住户很集中的村落，因此又称"村寨"。

**竹王之后与夜郎的命名**

《华阳国志》与《后汉书》都记载了一个很美丽的传说，说古代有一女子浣于江边，"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这大概是由于最早的夜郎部族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是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来的，因而披上了一层很神秘的色彩。

既然夜郎部族自称是竹王之后，所以竹文化就必然要渗透到他们的所有生活当中，而不只是一般地爱竹与使用一些竹制的器皿。侗族最普遍流行的乐器芦笙以及萧和笛子都是竹制的。用竹蔸雕镂成的竹王面具是人人见了都喜爱的艺术品。祭祀竹王更是一项极隆重的活动。

新晃自昔在竹山坪溪口有一座气象恢宏的竹王庙，每年三月三日（上巳）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和盛大的集会、游村，然后赛歌、赛舞、赛鼓、赛锣、赛牛、赛鸟……称之为"赛竹工"，影响遍及四方，湘、黔、川桂邻近地区都有群众赶来观看。

有一年，清代诗人王渔华经这里去贵州上任，作《题竹王庙》诗云："竹林溪口水茫茫，溪上人家赛竹王。铜鼓蛮歌争上日，竹林深处拜三郎。"记录了当时所见到的赛竹王的盛况，诗见于道光《晃州厅志》。三郎，即在汉代夜郎王兴被杀后，经过部族众的请愿，朝廷乃立其第三子为侯，死后从祀竹王庙的那一位，后人称竹王三郎。诗中所提到的铜鼓，也是夜郎部族及后来被称作





僚与侗族的一种重要乐器。《太平寰宇记》载僚人"铸铜为器，大如盘石"，指的就是这种铜鼓。《隋书·地理志》云："俚僚……铸铜为大鼓。"《宋史》谓"夷僚击铜鼓以祀鬼神"。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则称"此鼓南蛮至今用于战阵"。1979 年在新晃林冲乡出土了一只黄铜质铜鼓，高 29 公分，鼓面直径 58 公分，重 15 公斤，经鉴定为明代遗物。而鼓楼更是侗族的标志性公共建筑，集议事、休闲、娱乐于一体，可谓凡有侗族处必有鼓楼。

由此，我想到夜郎这个名字的来源，可能是起源于古夜郎族在大山中互相呼喊打招呼的"耶罗""耶罗"，后来在击鼓出征时，便以短促的大声齐呼"耶罗""耶罗"应着鼓声前进，因而被外人听了据音以命名，现在的"夜郎"则是出于史家笔下的音译。

这一想象可作为印证的是至今仍在侗族中很流行的一种集体舞，也经常请外来的客人参加。跳时男女围成一圈将右手搭在前一人的左肩上，大家一起连声唱着"耶罗耶""耶罗耶"随着节奏身子向内外摆动前进。连唱时最后一个"耶"字是收尾音，实为"罗"字的长声，与"夜郎"音正相谐，能说这不是古夜郎部落留下来的遗韵？

清贵州主考王协和经新晃去赴任时有《晃州道中》之一云："楚塞行将尽，江流去转长。万峰悬马首，一线人羊肠。土禁丹砂穴，风吹白芷香。牂牁犹数驿，此处竹郎王。"（诗见道光《晃州厅志》）其中所提到的丹砂即朱砂又称辰砂。宋郑樵《通典》载"辰州贡丹砂"。时宋太祖建隆中平湖南得奖、叙诸州，分授一些部落首领为刺史，皆隶属辰州入贡，新晃即在其中。历史上新晃的朱砂矿藏甚富，建国后的新晃汞矿曾很有名，为湖南重点矿山之一。追溯到《逸周书·王会解》载在公元前十一世纪濮人已将朱砂向成王作为贡礼，可见其开采朱砂也是有传统的了。

（作者系湖南省政府参事、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 李东阳与茶陵诗派

伏家芬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湖南茶陵陇匣（今高陇镇龙集村）人，因其曾祖父于明洪武初年在北京当武官，遂定居于北京西涯（今德胜门附近的积水潭），乃自号西涯。当时茶陵属长沙府，故人常称李氏为"李长沙"或"李茶陵"。明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编修，累迁礼、户、吏三部尚书，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前后经历五朝，卒谥文正。有《怀麓堂集》。死葬北京城西宛平县畏吾村。

## 一、李东阳的诗词创作主张

李氏关于诗词创作之主张——诗论，概见于《怀麓堂诗话》，亦散见于其他序跋文稿之中。总的来说，离不开儒家"诗关教化"的大前提。具体分析，有以下五个特点：

### （一）诗主声

李氏以为："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则古之教，何必以诗律为哉？"又曰："观《乐记》论乐声处，便识得诗法。""陈公父论诗专取声，最得要领。"他认为：诗词有声律韵调，能使人反复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方能发挥"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达到"取类于草木鸟兽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的目的。他说："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者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韩退之之诗为角，以此例之，虽百家可知也。"他又说："诗有纯用平侧字而自相谐者，杜子美好用侧字。如'有客有客字子美'七字皆侧，'中夜起坐万感集'，六字例者尤多，至五字皆人，而不觉其滞，此等虽难学，亦不可不知也。"他说："五七言古诗仄韵者，上句末字类用平声，惟杜子美多用仄，其音调起伏顿挫，独为矫健，似别出一格，回视纯用平字者，便觉萎弱无生气。"他不惜金针度人，启后学津梁，举出杜诗《玉华宫》、《哀江头》作





教材，又举出韩愈苏轼作示范，以为学杜有成，健于诸作，说："此虽细故末节，盖举世历代而不觉也。"

### （二）诗言志

李氏说："夫诗者，人之志兴存焉，故观俗之美与人之贤者，必于诗。今之为诗者，亦或牵缀刻削，反有失其志之正。"（《王城山人诗集序》）。诗既言志，则贵有个性，所以他又说："故观兰亭之诗，而王羲之之骨鲠、徽之之放诞，谢安之简靖，万之矜傲，孙统恬退，绰之剀直，皆得具见。"（《游会稽诗后序》）。

### （三）诗须学力

李氏在《怀麓堂诗话》中说："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读诗者执此以求之，亦可以自得矣。"为什么诗有传世不传世之分呢？李氏认为，"诗人必博学以聚乎理，取物以广乎才"。然后"比之以声韵，和之以节奏，则其为辞，高可讽，长可咏，近可以述，而远可以传"。他针对严沧浪的"诗有别材"论，评析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读书之多，明理之至者，则不能作。"他曾举杜甫为例，他说："昔人谓必行万里道，读万卷书，乃能读杜诗。盖杜之为诗也，悉人情、该物理，以极乎政事风俗之大，无所不备，故能成一代之制作，以传后世。非惟不易学，亦不易读也。"（《琼岛吟稿序》）。这强调的就是学力。他又举僧诗为例，他说："僧最宜诗，然僧诗故（固）鲜佳句。齐已、湛然辈，略有唐调，其真有所得者，惟无本（按：即贾岛）为多。岂不以读书故耶。"（见《诗话》）

### （四）诗贵求工

李氏云"杜子美以死殉癖，语必惊人，斗酒百篇者方嘲其太苦，而秦少游之对客挥毫，乃不若闭户觅句者之为工也。"（《沧州诗集序》）他还说："巧迟不如拙速，此但为副急者道，若为后世计，则惟工拙好恶是论，卷帙中岂复有迟速之迹可指摘哉！对客挥毫之作，固闭门觅句者之不若也"，惟其求工，所以他写诗，反复推敲，与友人切磋，一字不苟。他曾自述甘苦："予尝有诗曰'鹦鹉笼深空望眼'，或欲易为'空昨梦'；又曰'翠笼鹦鹉空愁思'，或欲易为'空毛羽'，予不能辨，姑以俟诸他日，更与商之。""予北上得句曰：'山色画浓淡'，两日不能对。忽曰：'鸟声歌短长'，罗冰玉殊不首肯，曰：'对似未过'；然竟不能易也。"惟其求工，所以注意做好起结句，他说："如杜子美《白鹰》起句，钱起《湘灵鼓瑟》结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岂易得哉！"惟其求工，所以他教人注意转语，他说："人但知律诗起结之难，而不知转语之难，第五第七句尤宜着力。"惟其求工，所以辨析用韵（平仄之论，已如前述）。他又说："诗韵贵稳，韵不稳则不成句。"惟其求工，所以强调在虚字上

下功夫，他说："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盛唐人善用虚，其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皆在于此，用之不善，则柔弱缓散，不复可振，亦当深戒，此余所独得者。"他曾经总结作诗之难易，以为："作凉冷诗易，作炎热诗难。作阴晦诗易，作晴霁诗难。作闲静诗易，作繁扰诗难。贫诗易，富诗难。贱诗易，贵诗难。"最后概括一句："非诗之难，诗之工者为难也。"

### （五）诗贵创新

李氏说："诗贵不经人道语。自有诗以来，经几千百人，出几千万语，而不能穷。是物之理无穷，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他举例说："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韩愈《雪诗》，得人赏识。"贵在意象超脱，直到人不能道处耳"。他反对模唐仿宋之风。他说："诗兼比兴，协音律，言志励俗，乃其所尚。而或者曰'必为唐，必为宋'，规规焉，俯首缩步，至不敢易一辞，出一语，纵使似之，亦不足贵矣，况未必似乎？""岂必模某家，效某代，然后谓之诗哉！"

家芬按：李氏四岁举神童科，十七岁中进士，数十年写作生涯，论诗皆甘苦有得之言，故薛雪《一瓢诗话》云："李西涯说诗极正。"

## 二、李东阳的湖湘情结

李氏尝自谓："东阳楚人而燕产。"说的是祖籍湖南茶陵县，自己却出生在北京。明成化八年（1472年）二月，李氏陪同父亲回乡扫墓，作生平唯一的一次故乡之行。南行北返，历时七月，所写诗文。编入《南行稿》。在茶陵居留18日，题句云："我家陇匣水，滚滚入南溪。"至今茶陵李氏子孙犹保存此珍贵遗墨。

李氏甚关心乡邦教化及典章文物。诗文集中曾写有《祁阳县学重修记》、《华容县学重修记》、《衡州府学重修记》、《岳州府新筑永济堤（城陵矶）记》、《修复茶陵州学记》、《宋知潭州李忠烈公祠记》、《汉长沙王太傅贾公祠记》、《长沙府学尊经阁记》、《新宁县石城记》……等等，皆有所表述。李氏论诗，除前述五项特点外，亦看重"情"字。他说："长歌之哀，过于痛哭。歌发于乐者也，而反过于哭。是诗之作也，七情具焉，岂独乐之发哉！"观李氏诗文集，其乡情、亲情合而为湖湘情结。触景生情，缘情布境，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南行稿》之所以感人心者，皆此一情结之体现。

李氏尝自谓"溯洞庭，经长沙，耳目所接，兴况所寄，左触右激，发乎言而成声，欲止而不可止。"《南行稿》皆纪实抒情之作也。李氏写有《长沙竹枝词》十首，其一云："三十六湾湾对湾，人家多住白茅间。直过洞庭三百里，长沙城北是彤关。"（按：即铜官），其三云："汨罗江头春水生，汨罗江上楚歌





声。人间若解三闾苦，水底鱼龙亦有情。"其四云："马殷宫前江水流，定王台下暮云收。有井犹名贾太傅，无人不祭李潭州。"按：马殷，五代长沙楚王，建楚国，以长沙为都城，今开福寺所在地，即马氏宫国故址。李潭州，南宋末年，湖南安抚使李芾率军民抵抗元军进攻长沙，城破后，全家自焚，其民族气节为后人称道，称之为李潭州。其《宋知潭州李忠烈公祠记》，记之甚详。此诗王船山评曰："低昂不觉，正使生动，此则竹枝体，命意大耳。"其七云："湘江女儿愁落晖，湘江江上鹧鸪飞。行人试看君山竹，竹不成斑君始归。"王船山评曰："翻新自远。"其十云："长沙少年无奈春，青衫白面不生尘。劝君莫向湘潭住，江燕衔泥解涴人。"（涴，沾污）按：李氏尝谓"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又谓："刘梦得竹枝亦人妙。"所以他欣赏这种七绝民歌体裁，用来表达自己的湖湘情愫。还有《茶陵竹枝词》十首，其二云："杨柳深深桑叶新，田家儿女乐芳春。刲（割也）羊击豕禳瘟鬼，击鼓焚香赛土神。"其四云："绿鬓荆钗双髻螺，青裙高系小红靴。阿婆旧是茶城女，教得娃儿能楚歌。"其五云："拍拍东风燕子寒，卷帘花絮若为看。夜深雨脚何曾睡，春水平于养鸭栏。"按。雨脚，一作"两脚"。其六云："依饷蒸藜郎插田，劝郎休上贩茶船。郎在田中暮相见，郎乘船去是何年？"其七云："春尽回家郎未归，小池凉雨试絺衣。园桑绿罢蚕初熟，野麦有时雉始飞。"其八云："白纸黄坟野草生，柳烟榆火照清明。楚娥不识秋千戏，两两沙头接臂行。"其十云："溪上春流乱石多，劝郎慎勿乱经过。莫道茶陵水清浅，年来平地亦风波。"家芬按：这两组竹枝词，有的是记录山川胜迹，有的是描绘民俗风情，词意高妙，贴近生活。昔山谷评刘梦得竹枝词云："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同工而异曲。"余窃以为李氏之作，比之刘禹锡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歌行如《竞渡谣》云："湖南人家重端午，大船小船竞官渡。彩旗花鼓坐两头，齐唱船歌过江去……须臾欢声动地起，人人争道得标归。年年得标好门户，舟人相惊复相妒。两舟睥睨疾若仇，戕肌碎首不自谋……"楚人好斗，每年龙舟赛，多发生聚众斗殴之事，疮眉血首，习竞如仇，此皆深切陋俗之弊，古今同慨。

七律如《游岳麓寺》四首，其一云："衡岳地蟠三百里，群峰将断复崔嵬。岩间古刹依山转，谷口晴云满树来。北海书存谁问价，少陵诗罢独怜才。扁舟已谢长江险，又是匆匆一度回。"其二云："路转村回一掌平，水回沙树绕溪行。居人尚说潭州守，书院犹存岳麓名。荒芜旧基俱寂寞，断碑残篆失分明。钱侯亦有招贤意，潦倒无能作颂声。"按：组诗原题与钱太守诸公同游，席上作。其三云："危峰高瞰楚江干，路在羊肠第几盘。万树松杉双径合，四山风雨一僧寒。平沙浅草连天远，落日孤城隔水看。蓟北湘南俱人眼，鹧鸪声里独

凭栏。”晚近写岳麓山离不开：霜枫、爱晚，层林、百舸，词汇贫乏，意境狭促，缺乏俊伟气象。这组律诗，却无酸腐气，无规仿迹，今日读来，犹觉新颖。又李氏说：“风雨字最人诗，唐诗最妙者，曰‘风雨时时龙一吟，’曰‘江中风浪雨冥冥，’曰‘笔落惊风雨。’”又云：“诗中有僧，但取其幽静雅淡，可以装点景致。”悟此，可知：四山风雨一僧寒，亦未必真有其人其事。

又：《钱太守招游开福寺，不赴，奉答一首》云：“潭州城北楚江边，此地招提父老传。十里青山斜鸟外，满庭芳草闭门前。题诗自足骚人兴，爱客深知太守贤。多病屡惭招不起，故园花柳为谁妍?”开福寺，已见前写按语。李氏以长沙作自家的“故园”，亦犹今人之言“故乡”，特别有亲切感。南行诗曾一再提及。又：《登岳阳新楼》云：“突兀高楼正倚城，洞庭春水坐来生。三江到海风涛壮，万木浮空岛屿轻。吴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庙古人情。中流或有蛟龙窟，卧听君山笛里声。”按：此诗第一联，春水坐来生，“生”字既具动态感又具时态感，妙在“坐”字映衬。试看：李白“云傍马头生”，妙的是“傍”字陪衬；张若虚“海上明月共潮生”，妙的是“共”字陪衬；卢纶“舟人夜语觉潮生”，妙的是“觉”字陪衬。李氏采用这一手段，优于朱熹“昨夜江边春水生”百倍。又：李氏《怀麓堂诗话》载：予尝有《岳阳楼诗》云，“吴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庙古人情”，镜川杨文懿公亟称之。有同官者不以为然，驳之曰：“吴楚乾坤之句本妙在拆字、浮字上，今不见此二字，则不见其妙矣。”杨曰：“然则必云‘吴越东南拆乾坤日夜浮天下句’而后为足耶?”后以语予，为之一笑。按：此诗第三联上句概括杜诗，下句概括范记，对仗工巧，使事精妙，具见大家风范。且“万木浮空岛屿轻”句，预为救失而暗寓“吴楚东南拆，乾坤日夜浮”语意，何可再添蛇足哉？此同官者，亦妄人也，李氏只好付之一笑！李氏于岳阳楼情有独钟，曾在《岳阳楼图诗书后》一文中，详述明代重修此楼的经过与规模。又写《谢宝庆洞庭图，湖中作》云：“湖南巨郡称岳阳，楼前大湖春水长。周回九江带七泽，颠倒万象随三光。洪涛巨浪拍山动，风雨却洒炎天凉。君山远在湖中央，苍梧不来断人肠。南寻汨罗不知处，屈子堕地魂茫茫。……”题画《岳阳楼》云：“层楼百尺楚江边，望尽名山复大川。已觉身从天上坐，不须重泛水中船。”

李氏钟情湖湘山川之美，不独岳阳、洞庭如此，其他地区亦然。长沙、茶陵有竹枝词为证。又如《怀郴州，为何郎中孟春作》云：“郴州形胜天下稀，千岩万壑劳攀跻。山高地峻水清驶，此语吾言韩昌黎。……吾祖昔闻生此州，吾家近住茶陵头。扁舟三日不一到，空负平生作壮游。”

李氏之湖湘情结在《南行稿》中多处体现。如《留别京中诸友》云：“云霄别路八千里，江汉归心二十年。”“微官未敢轻离思，不待秋风棹已旋。”思





归情切，跃然纸上。

《张家湾旅宿》云：“万里江山名胜地，百年心事远游篇。清流短棹催将发，旅馆初灯试不眠。路隔红尘燕市境，望穷青草洞庭天。”初上旅途，便兰舟催发，望断楚天。

《闻湖南大熟》云：“闻道湖南熟，书传郡国遥。桑麻随地足，亢旱隔年消。政喜征科拙，天教雨露饶。腐儒忧国愿，何补圣明朝。”湖广熟，天下足。湖湘既是故园，岁之丰歉有切肤之感，何况“腐儒”先天下之忧哉？

又：南行谒高祖处士府君墓，写有《荷木坪二十韵》。谒族高祖提举府君墓，写有《雷公峡二十韵》，皆五古长篇。写其“祭告返乡国，路入茶溪深”。特别申明：“古人重水木，兴岂在泉石。”重在慎终追远，尽其水源木本之孝思，固不在林泉竹石也。又：《诸族父兄皆会，感而有作》云：“京国辞家万里行，故园今日再逢生。……天涯异物还甘旨，随意樽前舞袖轻。”李氏处处点明故园，湖南诚第一故乡也。

李氏诗艺，当代学人王芸孙以为：“清新工丽，流利俊快，风韵悠然，令人读之别有一种亲切熨贴之感。”说他完全学唐，颇有成就，“作风神似许浑”，“作品以七律为最佳。”（王船山于李诗不轻易首肯，却选其七律六首。评其春兴二首属杜陵的传，得杜之髀。）王芸孙举例如《寄彭民望》云：“斫地哀歌兴未阑，归来长铗尚须弹。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按：集中有赠彭民望五古三首、再赠五古三首，王先生独推其七律，盖李氏学许浑，新颖、工整、宛约、隽妙，此诗却兼有警策，道尽人情世道。又李氏在《诗话》中说，“吾楚人多不好吟，故少师授，彭民望少为诸生，偏好独解，得唐人家法。”故李氏重之如是。又李氏《诗话》载：“彭始见于诗，虽时有赏叹，似未当其意。后失志归湘，得所寄此诗，乃潸然泪下，为之悲歌数十遍不休，自是不阅岁而卒。”长歌之哀，过于痛哭。李氏诗，亦善用其情者也。另如《奉送朴庵先生归湖南省墓》云：“冉冉青衿白鹭行，十年趋走向门墙。文章北斗心长在，杖履春风坐不忘。宫省楼台通翰苑，洞庭山水过潇湘。故园只隔孤帆外，有意扁舟系草堂。”又《送王侍御用之巡按湖广》云：“帝遣台臣出北州，绣衣青盖拥行驺。传词禁阙双龙曙，揽辔高城匹马秋。吴地青山当楚断，洞庭春水入江流。故园东下无多路，使节归来是昼游。”窃以为：二首亦佳。一再以“故园”为念，其湖湘情结可知。又如《湘皋书屋为蒋敬所阁学先生题》云：“从来五岭接三湘，谁道衣冠各异乡？岩树总多南鸟柏，溪流犹带楚苹香。人言家世归公琰，天遣江山助于长。老我缁尘空白首，几回云水望青苍。”《冯子佩光禄携酒见过，席间限韵予得四首》其四云：“莫将名姓问谁何，榜下文章复几多。

太仆少卿能楚调，翰林学士解吴歌。曾闻小贴泥金报，又见高轩织翠过。纵使得归归未得，秋风休起洞庭波。”此二诗系休致后所写，读结穴句，可知他暮年身居蓟北，犹心系湘南也。

## 三、李东阳的乐府歌行

王船山重李氏之七律，谓李氏“以此雄艺圃”。却轻其乐府歌行，在王氏的《明诗评选》中，一首也未选，他说：“西涯不作乐府歌行，不至生屈北地（李梦阳）下。”又说：“（西涯）于五言古体、乐府歌行，通身插入宋人窠臼，拈眉弹舌，为北地所鄙；何其欣小利而忘大纲也。”盖王氏在明诗中，力排宋调。后来王闿运评《李茶陵》，亦云：“李杜中兴宋派亡，翰林终是忆欧阳。西涯乐府成何调，琴里筝声枉擅场。”王闿运论诗，力主学习汉魏六朝，反对宋诗，故于李氏亦有微词。以上是清初与清末两大儒——“二王”对李氏乐府歌行的贬抑，但是清代也有颂扬的舆论，如清康熙间参与修《明史》、著《明诗综》的朱竹垞则以为：“昔贤以大谢繁芜为累，大陆才多为患，此翁（李东阳）亦然。若其拟古乐府，因人命题，缘事立义，别裁机杼，方之杨廉夫、李季和辈，似远胜之。”（见《静志居诗话》卷八）。又如清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尝慨叹：“近日时局，可惊可怛可哭可笑之事，层见叠出，若以西涯乐府之笔写之，真一绝好诗史也。”（见《饮冰室诗话》五八节）。清末湘乡陈瀚论诗以为：“不傍古人，别开生面，浸淫陶铸，脱尽窠臼，其失也创署立新，不嫌违古破体，如唐之杜韩，宋之苏黄，元杨铁崖（廉夫），明李东阳之新乐府，皆所谓开来者也。”（《湘雅摭残》卷十二）。

就选诗来说，王船山不选李之歌行乐府，别人不一定不选。明末以来，就不断有人突破王氏的藩篱。明末陈子龙主编《皇明诗选》就曾选其五古一首，七古一首。七古《画马》云：“前马奔腾后马逐，沙苑东来曲江曲。相遭意气两不平，踏尽长堤春草绿。奚官一骑高如山，金环玉勒声珊珊。会呼群骏出云雾，同立春风十二闲。”李舒章评曰：“颇俊爽。”现在读来，犹感情新可诵。

清代陈田“罄一家之财力，聚一生之精神”（陈石遗语），编著《明诗纪事》，“极为淹雅”（钱锺书语）。陈田尝曰：“西涯宏才硕学，汲引风流，播之声待，洵足领袖一时。”集中选有李氏乐府歌行多首。如《尊经阁》云：“尊经阁，阁高不可攀。前有文宣宫，后有锺陵山。”按：周是修，明建文初为衡王府纪善，北兵渡江，是修入应天府学，拜（孔圣）先师毕，自缢于尊经阁。又如《题清明上河图》云：“宋家汴都全盛时，四方玉帛梯航随。清明上河俗所尚，倾城士女携童儿。城中万屋翠甍起，百货千商集成蚁。花棚柳市围春风，雾阁云窗灿朝绮。芳原细草飞轻尘，驰者若飙行若云。虹桥影落浪花里，捩舵





撇篷俱有神。笙歌在楼游在野，亦有驱牛种田者。眼中苦乐各有情，纵使丹青未堪写。翰林画史张择端，研朱吮墨镂心肝。细穷毫发夥千万，直与造化争雕镌。图成进入缉熙殿，御笔题签标卷面。天津一夜杜鹃啼，倏忽春光几回变。朔风卷地天雨沙，此图此景复谁家？家藏私印屡易主，赢得风流后代夸。姓名不入宣和谱，翰墨流传藉吾祖（原注：上有先提举跋）。独从忧乐感兴衰，空吊环州一抔土。丰亨豫大纷披徒，当时谁进流民图？乾坤俯仰意不极，世事荣枯无代无。”还选有：《花将军歌》、《过安平镇减水石坝有怀刘司马长句》、《学士柏》等，不具录。

近代学者钱基博著《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版），认为：“永乐以后，崇尚台阁体，李东阳力挽颓波，使诗道复归于正。李氏近体雅驯清澈，律圆而调响，亦深得唐意。”并说：“东阳文非秦汉，诗则盛唐也。”说他的乐府歌行，“纵横跌宕能盘硬语，极意规模杜陵。”他曾录《灵寿杖歌》为例。诗云：“吾闻武当之山四万二千丈，半在云根半天上。不知三十六宫何处称绝奇，产出灵株非一状。蛟螭盘拏露头角，熊经树颠虎山脚。根蟠节错相纠缠，含风饱云经炎寒。九年洪水之水浸不杀，十日之日暴烈何时干。梯悬蹬接跬步不可上，谁采青璧红琅玕。见之羡者不容口，锡以嘉名曰灵寿；爪之不入行有声，金可同坚石同久。吾家此物旧所有，神与相扶鬼为守。自从病足跛曳不得前，已觉山林落吾手。一病经旬不出门，手中此杖嗟犹存。下床欹足立不定，此时托子以为命。不顾四体无微疴，但愿谢病归山阿：左扶右策夹以二童子，下可涉园径，上可陵陂陀。愿栽万木截万杖，穷崖阴谷生森罗。灵兮寿兮此物倘可致，直遣四海赤子头俱皤。”家芬按：从这首诗看，朱竹垞赞李东阳，“长短丰约，高下疾徐，滔滔莽莽，惟意所如”是比较中肯的。又：当代学人金性尧先生曾评论道：“东阳的《诗话》，颇多诗家甘苦之言。在他自己的创作中，那些乐府诗还是写得很出色的，如《灵寿杖歌》，规模杜甫，纵横跌宕，心事浩茫，在三杨的台阁作中就绝对找不到。”（上海古籍社《明诗三百首》前言）。金先生还推重李氏的《新丰行》：“长安风土殊不恶，太公但念东归乐。汉皇真有缩地功，能使新丰为故丰。人民不异山川同，公不思归乐关中，汉家四海一太公。俎上之对何匆匆，当时幸不烹若翁。”金氏评曰：“前六句一路行来，极写高祖娱亲之孝思……。但末二句随之逼出，不禁令人哑然而又慨然。当时如果不是项伯的劝阻，太公早已被杀了。亦见高祖为人，到利害关头，虽父子之间，也是顾不上起码的亲情的。”此外金先生还推重李氏的《白杨行》、《风雨叹》、《竞渡谣》、《题清明上河图》（文长不具录）。金先生说：“李东阳写过不少歌功颂德的诗，但也写过好些揭露时政黑暗，悲叹流亡载道的诗。这些诗多是属于古风，也是他离开庙堂之后，于旅途中目击或访查所得，在他是作为采风看待

的。他是重臣达官，能于歌颂之余，犹关心赤子，亦复不易。”

关于选诗，李东阳曾说：“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而欲以一人选之，不亦难乎！”李氏生于王船山之前一百七十余年，此语若预为船山道也。船山虽淹博，其识岂必能兼有明诸家与一代之长，然则，李氏早有以自解矣！而况船山窜伏穷山，限于当时之条件，李氏休致以后所为诗，不一定都能读到。据《湖南日报》2002年12月25日《尘封数百年，辑校重见天》略云：清初刊印《四库全书》时，尚不知有《怀麓堂续稿》（致仕以后之诗文稿21卷），早于明正德十二年（517）刊印，误以“前集”作“全集”。直到上世纪末，学人钱振民才将上海、北京、南京所珍藏的《续稿》拼合，辑录佚诗、佚文若干篇，为之补遗，整合成现今岳麓书社出版之《李东阳续集》。所以，李氏的全部作品，当年王船山不一定都能看到。

总之，对李东阳氏之歌行乐府，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然，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不一定循一家之言或拘一时之识以为断。我以为：王世贞与陈仅二氏的观点是可取的：王世贞《书西涯古乐府后》曾说：“余晌者于李宾之先生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议论，过尔剪抑，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创造，名语叠出，纵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陈仅《竹林答问》曾说：“西涯乐府，有直刺时事者，自是不可磨灭之作。”王陈二氏之论，比较客观公允。

## 四、李东阳联语拾萃

李氏才思敏捷，学识渊博，一生联语甚多。但见于当代著录者甚少。如《中国楹联鉴赏辞典》（湖南文艺出版社版）选采历代联目，达一万五千条以上，李氏联语仅选采一副，又如《古今名联选辑》（黄山书社版）选辑名联3000副，李氏仅只三副。兹据明清笔记，摘录部份，以飨读者。

### （一）题赠类

题曲阜衍圣公府联云：“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按：弘治十二年（1499），李氏将女儿嫁给孔子62代孙孔闻韶，弘治十六年，奉旨监工修建孔府后花园，翌年4月奉旨祭祀孔庙。题联当在此前后。

题明山草堂联：“草屋三间，门前花树随开落；幽人一个，檐际烟云任卷舒。”按：明山在华容县南，明代户部侍郎王民望筑明山草堂于此。此联，当代某楹联集转载，“李东阳”误刊为“李冬阳”。

题岳阳楼联云：“吴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庙古人情。”家芬按：馆友方授





楚先生著文说，此联现仍悬挂在岳阳楼上。原为七律《岳阳楼》中第三联。作于明成化八年（1472），（本文前已介绍）。据吴敏树《湖上客谈》云：“张兰史先生云，‘岳阳楼惟李西涯诗句十四字，若以为联，最包括矣。’兵后，诸联匾尽撤，余独念此，欲书悬之，却易得数字：‘乾坤吴楚双开眼，廊庙江湖一倚楼’”窃以为：吴氏为清代湖湘名士，诗文被人许为“桐城一脉”，乃自谦抑，不予承认，即如此联而言，声明尊重原著，仅改易数字，何其慎重！近阅黄山书社《古今名联选辑》（1994年版）载：岳阳楼有李东阳题联云：“杜老乾坤天下句；范公忧乐古人心。”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显系经过窜改，较之吴氏之作，又弗如远甚。前贤如此之谨慎，今人如此之草率，可胜浩叹！又据《湖南名胜楹联》（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载，胡林翼题岳阳楼联云：“杜老乾坤今日眼；范公忧乐昔人心。”是否上述赝劣楹联本此，待考。

赠商辂七十寿联：“自古年华稀七秩；本朝才望重三元。”按：商辂，明正统十年（1445）状元，历官兵、户、吏部尚书。为明代“三元及第”第二人。

### （二）敏对类

召对联：东阳四岁能作大书，景泰时以神童荐，内侍扶过殿阁，曰“神童脚短。”应声曰：“天子门高。”既入谒，命书龙凤龟麟十余字。上喜，抱置膝。时其父拜起，侍丹墀下，帝曰：“子坐父立，礼乎？”应声曰：“嫂溺叔援，权也。”——据明陈洪谟《继世纪闻》。清查继往《罪惟录》。

又召对联：“鹏翅高飞，展风云于万里（帝）；龙颜端拱，依天地之两间（李）。”

按：梁章钜《巧对录》云，李东阳六岁时，与程敏政以神童同被英宗召对，进御膳有蟹，上曰：“螃蟹一身甲胄。”程曰：“凤凰遍体文章。”李曰：“蜘蛛满腹经纶。”帝又曰：“鹏翅高飞，展风云于万里。”程曰：“鳌头独占，依日月于九霄。”李曰“龙颜端拱，依天地之两间。”

雨中拈句对云：“五风十雨黄梅节（李）；二水三山李白诗。（程）。”按：此系李与程敏政过采石，雨中拈句对，切地切时切人，可传也。

祭神对云：“修撰进馐馔，馐馔饱充修撰腹（武职）；指挥烧纸灰，纸灰飞上指挥头（李）。”按：李在翰林，见一武职指挥祭神，因属对云。

人名对云：“孟仲季，春惟少仲；夏商周，鼎独无商。”按：弘治丙辰（1496）进士有孟春、季春、夏鼎、周鼎，李氏即席出对，诸进士无能对者，李乃代为之对云。

闻蝉对云：“蝉以翼鸣，不啻若自其口出（友）；龙从角听，毋乃不足于耳欤（李）。”按：李氏同友人闻蝉声，友人出对云。

怯寒对云：“地冻马蹄声得得（杨）；天寒驴嘴气腾腾（李）。”按：杨一清

冬日气盛，而李西涯怯寒，二公尝并坐，西涯屡以足顿地作声，杨遂出联以嘲，西涯见其吐气如蒸，故对语以讽。又：“驴嘴”一作“象鼻”。盖云贵有象蛮之消，杨原籍云南也。以上均据梁章钜《巧对录》。

答客对云：“李东阳气暖（客）；柳下惠风和。（李）”

又云：“庭前花始放；阁下李先生。”按：《评释巧对》卷三载：“李西涯居政府时，庶吉士进谒，有言‘阁下李先生’者，公闻之，既相见，因曰：‘请诸君一对。’而以前句示之。众疑其太易，转思未工。各沉吟间，公曰：‘何不对阁下李先生？’相赞而笑。”

答学士对云：“花本木形，何自草头而化（李）；星为夜象，却从日下而生（学）。”此乃析字对也。

又答学士对云：“李家十八子（学）；奏事二三人（李）。”按：“奏”字上部为三人合成，下部为二人合成。答师对云：“砚向石边见口（师）；笙从竹下生声。（李）”此亦析字对。

召见对云：“新月穿云梳插髻（帝）；晚霞铺岭锦缠头（李）。”又云：“金殿晓钟开万户（帝）；玉阶仙杖拥千官（李）。”

学士答对云：“东风吹倒玉瓶梅，落花流水（李）；朔雪压翻苍径竹，带叶拖泥。（学）”此系李氏出对，学士答对。

答父对云：“虎豹关中，不是关中虎豹（父）；麒麟阁上，皆非阁上麒麟。（李）”按：以上均据《评释巧对》。

答外使对云：“朝无相，边无将，玉帛相将（外）；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李）”按：据祝枝山《猥谈》云：明弘治中，外国遣使入朝，以一联请对，李东阳闻而答之。

### （三）集句类

李氏集句联甚多。如：“文章宇宙千年事；江汉风流万古情。”“老去诗篇浑漫与；晚来幽独转伤神。”“欲知世掌丝纶美；肯信吾兼吏隐名。”“纵饮欲谋良夜醉；殊方又喜故人来。”“乘舟取醉非难事；送客逢春可自由。”“登第往年同座主；抱琴何处觅知音。”“疏檐看织蠨蛸网；远信闲封荳蔻花。”“四海交游更聚散；十年京洛共风尘。”“漫说简书催物役；犹将谈笑出风尘。”“未央树色春中见；茂苑莺声雨后新。”“自叹马卿常带病；也知光禄最能诗。”“春浮玉藻寒波落；水滴铜龙昼漏长。”“佳节每从愁里过；远书忽向病中开。”“江淹采笔空题恨；荀令香炉可待熏。”“小院回廊春寂寂；北湖南埭水漫漫。”“敢于世上明开眼；莫怪先生懒折腰。”“苦节难违天子命；梦归偏动故乡情。”“举世尽从愁里老；暮年初信梦中忙。”“酒酣懒舞谁相曳；客至从嗔不出迎。”“缓带轻裘成昨梦；浊醪粗饭任吾年。”“古来贤达知多少；旧日人民果是非。”“新结草庐招隐逸；便应黄发老渔樵。”“合欢却笑千年事；奉使虚随八月槎。”“复有楼台衔暮景；但将怀抱醉春风。”“故国山川皆梦寐；昔年亲友半凋零。”按：李氏诗集中有”集句录”、“集句后录”。集句联不过集句诗之骈枝或派生。明代朱竹垞《静志居诗话》卷三孙仲衍条附载明人集句联甚多，今据该书迻录如上。





## 五、茶陵诗派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活跃于明弘治正德年间。沈德潜说：“永乐以后诗，茶陵起而振之，如老鹤一鸣，喧啾俱废。”（《明诗别裁集》）钱谦益说：“（李氏）历官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奖成后学，推挽才隽，风流弘长，衣被海内，学士大夫出其门墙者，文章学述，灿然有所成就，必曰：此西涯先生之门生也。”（《列朝诗集小传》）。茶陵诗派的成员有三部份：一是同年进士，如谢铎、张泰、陆鼎仪等；二是门生，如邵宝、石邦彦、罗景鸣、顾清、鲁铎、何孟春（以上六人为骨干）以及汪俊、储巏、陆深、钱福、乔宇、张邦奇、杨慎等。三是同乡，如攸县彭民望、华容王民望，均曾受其沾溉。此外如儿子李兆先，则曾亲蒙庭训等。这样，围绕在李东阳周围就形成一个诗词创作的人才群体，明末《皇明诗选》的编者陈子龙曾说：“文正网罗群彦，导扬流风，如帝释天人，虽无与宗派，实为法门所贵。”当时文苑艺林对茶陵诗派的评价，可见一斑。

谢铎字鸣治，台之太平人。与李氏同年同馆十余年。李氏曾说：“（谢）每出一诗，必令余指疵，不指不已。予有所质，亦倾心应之，必使尽力。予尝作匡山诗一联，渠意不满，予以为无可易。渠笑曰：‘观于胸中似不止此。’最后曰：‘庙堂遗恨和戎策，宗社深思养士年。’渠又笑曰：‘微我子，不至此。’予又为端礼门乐府，以为末句未尽，往复再四，最后乃跃然而起。”

张泰字亨父，太仓人。卒年四十九，著有《沧州诗集》。李氏说他：“纵手迅笔，众莫能及。及其凝神注思，穷深骛远，一字一句，宁阙然而不苟用。”唐元荐评价曰：“弘治间艺苑，则以李怀麓（东阳）、张沧洲（张泰）为赤帜，而和之者，或流于率易。”可见，明代当时即有李张并称之誉，可后人知之者甚少。

陆釴字鼎仪，昆山人。与李氏同时登第，赐进士第二名。李氏时年十七，陆有醉归诗云：“行过玉河三百骑，少年争说李东阳。”朱竹垞《静志居诗话》载：“西涯好推挽人才，求诗者至填塞户限，乃赋诗以止作诗，（陆）鼎仪闻之失笑，戏作八止诗贻之，西涯申鸡酒之约，未践也。会谢鸣治、陈师召促西涯题咏，西涯遂渝止诗之约，偕谢陈两公，载酒鼎仪邸舍，即席分韵，诗成，书之卷轴。”

邵宝字国贤，号二泉。无锡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介绍："公举南畿，受知于西涯，及为户部郎，始受业西涯之门，西涯以衣钵门生期之。……西涯既殁，李何之焰大张，而公独守其师法，确然而不变。""竟陵钟伯敬尝语予曰：'空同出，天下无真诗，真诗惟邵二泉耳'。"

石邦彦：槁城人，成化二十三年与兄价同举进士。初入词林，李长沙亟称之，曰："后进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 长沙又评其诗曰："邦彦诗词，皆中矩度，而七言古诗，尤超脱凡近，众所不及。"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博洽誉为明代第一，《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钱谦益云："用修垂髫赋黄叶诗，为茶陵文正公所知，登第又出门下，诗文衣钵实出指授。"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长沙异其才，拟入史馆，以父能忧罢。后为太仆卿，吏部右侍郎，本文前引《怀郴放州，为何郎中孟春作》中有句云："何郎少年美文藻，"盖嘉之也。今行世之李氏《拟古乐府》一百首，为"何孟春音注"。（岳麓书社版作"何孟春解"。）

《四友斋丛说》云："西涯当国时，门生或朝罢，或散衙后，即集其家。有一门生归省，兼告养病，西涯集诸门人饯之，即席赋赠。汪石潭诗先成，中一联云："千年芝草供灵药，五色流泉洗道机。"西涯将后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众请曰：'此诗绝好，师何故以为未善。'西涯曰：'归省与养病是二事，今二句单说养病，不及归省，便是偏枯，且近于合盘（掌）。'即援笔改曰：'五色宫袍当舞衣'，众始欢服。"读此，可以想像当年茶陵诗派成员，切磋诗艺情事。靳文僖《麓堂集后叙》云："出其门者，号有家法。虽遐陬荒壤，无不窃模其词规字体，以鸣于世，岂不盛哉。"可见当时茶陵诗派之凝聚力与影响之大。

后来，陆深有《题邵国贤哭文正公诗后》云："重游东观真如梦，再过西涯定惘然。白发门生思往事，每谈忧国泪双涟。"李氏身后，门生犹缅怀往昔，眷眷不已。

李氏之儿子兆先亦能诗，其《哭子录》小引云："是物也（指诗），乃吾子所深领而笃好者。"《怀麓堂诗话》载："柳子厚'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坡翁欲削此二句，论诗者类不免矮人看场之病，予谓若止用前四句，则与晚唐何异？然未敢以语人，儿子兆先一日过庭，辄目及此，予颇讶之。又一日，忽曰：'刘长卿，白马翩翩春草细，邵陵西去猎平原，非但人不能道，抑恐不能识。'因诵予《桔槔亭》、《响闸》、《海子》、《夜坐》诸篇结尾，以为：三四所前尚疑此语不可解，今洒然矣。予乃顾而笑曰：'有是哉!"（按：刘长卿句原出《献淮宁军节度使李相公》一诗，昔人评曰："高华伟丽。结句入妙，





言外多少馀味不尽，所谓言在此而意寄于彼，兴在象外，何可删去?）又《诗话》云：兆先尝见予祀陵诗'野行悉夜虎，林卧起秋蝇'句，问曰：'是为秋蝇所苦，不能卧而起耶?'予曰：'然'。曰：'然则愁字恐对不过。'予曰："初亦不计，妨字外，亦无可易者。"曰：'似亦未称，请用回字如何？盖谓为夜虎所遏而回也。'予曰'然'。遂用之。当日趋庭鲤对，天伦之乐固俨然也。兆先才华横溢，可惜英年早逝。李氏有诗哭之云："少日才华满帝京，衣冠四座一时倾。去来今事总成梦，一十七年空此生。老有箕裘谁继业，病中骨肉转伤情。不知精力缘愁减，犹向深山问药名。"又曰："遗文不多得，往事何能追。……今我复触目，读之但嗟咨。一读废宵眠，再读废晨炊。三读辄掩卷，起立向阶墀。平生趋庭事，所得仅如斯。他日蓼莪篇，谁当歌父兮。"语挚情真。血泪俱下。

建国后，由于某些误解，学界不甚推重茶陵诗派。我最早读到文学史，是1965年我姨妈杨开英寄给我的北大中文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说的是：明代永乐到成化的80馀年间，整个文坛被台阁体所垄断。"台阁体的作品，只有华靡的形式，而无真实的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被称为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立朝50年的李东阳"。其后又读到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说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论诗有标榜台阁体倾向，创作上也未脱台阁体气息。""他的名作《拟古乐府》实际是以乐府诗体作史论，道学气味很浓。"这些，都是大加贬抑的不实之词。后来，人们可以看到，朱东润撰《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社200年版），明代诗家，突出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三家地位，而将李东阳附录之，说"西涯于诗，大抵祖（严）沧浪之说。"不甚看重。又：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社1980年版）明代诗歌部份，高启、于谦之后，选了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等人的诗，李东阳没挂上号。郭预衡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明代诗歌，也和上述情况一样，没有李东阳的份。于非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亦复如此。

其实，茶陵诗派之影响，郭绍虞在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上海古籍社1979年版）——这是他1955年、1961年改写两次的旧著的新版，早就以重要篇幅，专论及之，他说：怀麓堂诗话，"有一些重要的理论"（文长、从略）。他引《四库总目提要》的话说："李何未出以前，东阳实以台阁耆宿，主持文柄，其论诗主于法度音调，而极论剽窃摹拟之非，当时奉以为宗，至何李既出，始变其体，然赝古之病，适中其所诋诃。"郭先生说："自李东阳主持文坛以后，奖掖后进，推挽才秀，一时出其门甚众，天下称之为'茶陵诗

派’。‘茶陵诗派’之于诗文，前变台阁体啴缓冗沓之习，而后启七子句摹字窃，矜才使气之风。”他又说：“李何论诗可以渊源西涯，而终究与西涯不同。李何宗主可以单纯，而西涯则不主一格。西涯既不主一格，所以也不主摹拟”。蔡景康在他编选的《明代文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中说：“从明初到成化的百馀年间，诗文创作比较沉寂，统治整个文坛的，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李东阳的茶陵诗派，论诗重在辨体和音律法度，力主宗唐法杜，在理论上对前七子有直接影响，对台阁体那种令人窒息的诗风，有一定的冲击。”在分析李东阳文论时，他说：“他能较好的认识。”又说：“东阳论诗虽讲法度，但无三杨台阁之弊，虽讲格调，京不至流于前七子剽窃摹拟之习气。”郭蔡二先生立论：把李东阳及茶陵诗派与台阁体区分开来，与前后七子之复古区分开来，是公正公平的，也是能令人心服口服的。我省研究李东阳的名家、湖南师大文学院教授周寅宾先生，在《李东阳集》前言中说：“李东阳的诗，在今天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与审美意义。首先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当过四十多年的文坛领袖，我们不能割断中国文学长河中这一段流程，应当给予他一定的地位。其次，他的诗歌，不同于弄得’真诗渐亡‘的台阁体诗歌，也不同于自认‘余之诗非真也’的李梦阳的诗歌，而是一些真诗——洋溢着真情实感的诗。”“这些诗歌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与美学价值。”他在《学林漫录》（中华版）第十集中，曾谈到茶陵诗派的问题，力排众议，辩证地作出公允中肯的评价，他说：“由于茶陵诗派是一个’导源唐宋，具有典型’的诗派，因此，以‘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为宗旨的前后七子，对它虽能‘掩而胜之’，但是不能‘挤而忘废之’。由于前后节子这个复古的文学流派‘渐久而摹拟剽窃，百弊丛生’，而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又早就‘极论剽窃摹拟之非。’因此，明末，程孟阳等人又重新宣扬李东阳的诗论，作为治疗前后节复古派剽窃摹拟之病的药物。加之（明末清初大学者）钱谦益等又‘论诗则推此，我们今天重新评价李东阳与茶陵诗派，恢复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对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传承湖湘文化，振兴中华诗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愿以周先生的论断作为本文的结语。

（作者系本馆馆员）





# 《潇湘八景图》考

刘国强

《潇湘八景图》是中国山水画艺术的传统题材，载誉千年，名扬四海，从五代至今，代代相传。潇湘八景及潇湘八景诗画，是大自然给湖南人民的慷慨馈赠和历代文化名人创造的珍贵遗产。在进入全球旅游文化热和打造湖南文化强省的新世纪，对这一传统文化，要用大手笔进行建设保护、挖掘和开发利用。现不揣浅陋，对潇湘八景和《潇湘八景图》略加考证。

“潇湘”是潇水和湘水的简称，二水在湖南省永州市北苹岛汇合。

湘江发源于广西临桂县海洋山。湘水至苹岛与潇水汇合后，流域面积陡增一倍以上，遂成大河，就像一条宽厚的碧绿线条，曲曲折折，绕丘山，越田洞，源远流长，直下洞庭。两岸花红苗绿，田园似锦，时有鬼斧神工般的石灰岩摩崖踞岸削立，奇兀壮观。尤以湘水流域的永州、回雁峰、清凉寺、昭山、橘州、湘阴、洞庭湖、武陵源等8处风景最佳，称作“潇湘八景”。

最早创作《潇湘图》的五代南唐画家董源，锺陵（今江西南昌）人，又称“董北苑”。他是中国江南山水画派的开山鼻祖。目前存世作品仅3幅，其中就有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该图绢地完整细密，开卷便可看到沙碛平坡，近处为芦汀沙坡，远处为山峦茂林，水面上有船只荡漾，船上、滩头及坡边均有五分许大小的设色人物。山幅以花青远墨，没有奇峰峭壁，全是长山复岭，平淡幽深，所画小树多用台点点缀而成，平远山峦均用短笔披麻皴和淡墨点子皴、水墨淡赭色烘染。用笔有力，人物虽小而神态逼真，不愧为描绘江南山水的早期杰作。此画曾载《宣和画谱》，传至明代，董其昌为之题跋并命名为《潇湘图》。董死后，《潇湘图》为袁枢、姚际恒、卞永誉、安歧、毕沅和清宫相继收藏。历经千载和战乱兵灾而安然无恙，实乃吾湘之幸。

继董源之后，北宋初期的山水画大家李成（919—967，字咸熙，人称李营丘），首次创作了《潇湘八景图》，后归米芾所得。李成画迹北宋也难见，当时博览精鉴如米芾者，平生也只是见过两本真迹，而赝本却有三百之多。今传世真迹仅有《读碑窠石图》、《塞林平野图》2幅，亦尚存疑问。李成的画一生中

以画山东的实景为主，是否来过潇湘已无考。米芾收藏了他的八景图，宁信其有，李成乃成为开创《潇湘八景图》之先驱。

北宋画家宋迪，字复古，洛阳人。擅画山水寒林，早年师法李成。曾任荆南转运判官。于嘉佑八年（1063年）春来永州，画成潇湘风景平远山水八幅。沈括《梦溪笔谈》载："宋迪工画，其得意者，有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当时诗人李宗澍见到后，当即集景成诗，题为《八景》云："雨入潇湘阻夜游，月华空忆洞庭秋。帆扬远浦归心切，雁觑平沙落势遒。夕照封村渔唱起，晚钟出寺茗烟浮。晴岚山市宜沽醉，莫待江天暮雪稠。"潇湘八景作为文人们所接受的诗画题材，实际上始于宋迪。元丰初年（1078年）宋迪还作了《潇湘晚景》图。《宣和画谱》著录宋迪作品31件。《潇湘八景》为雍熙寺僧旧藏。

就在宋迪画成《潇湘八景》的同年，当政者在长沙城驿步门外（即大西门，今湘江北大桥引桥附近）建成八景台，上嵌八景图，引来无数名人墨客题咏，及一时之盛。清乾隆进士张九镡写有《八景台记》以记其事。

米芾（1051—1107）是潇湘文化的"好事者"，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因慕唐代李邕撰书的"麓山寺碑"，至岳麓山游览，于碑的侧面题词留念。又购得李成的真迹八景图，自称"拜石余闲，逐景撰述，以当卧游对客，即如携眺"。于是写成《潇湘八景图诗序》，并书传天下。此后潇湘流域八景景点所在地分别建有不同形式的观景建筑，如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陈傅良在长沙做官，就在八景台旁建亭两座。

自宋迪、米芾之后，潇湘和潇湘八景成了山水画的热门题材，各地画家包括宋宫廷画院的画家纷纷泛舟潇湘，争相摹绘。米芾、米友仁父子都创作了《潇湘白云图》。惠崇（？—1017，北宋画家、诗人、僧人）作《潇湘芦雁图》。林生（北宋画家，杭州人）作《潇湘暮雨图》。苏轼（1036—1101）作《潇湘竹石图》。夏圭（宫廷画家）、释玉间（宋天台僧人，金华曹氏子）、释法常（？—1281，又名牧溪，禅僧画家，蜀人，在日本影响很大）、王洪（宋绍兴年间蜀人，习范宽山水）均作《潇湘八景图》。元赵孟頫作《潇湘白云图》。明初画家陈叔起、王绂作《潇湘秋意图》（藏北京故宫，1989年赴美国展出）。文征明作《潇湘八景图》册页（后为严嵩父子所得，见《严氏书目》）。董其昌作《潇湘白云图》卷（藏辽宁省博物馆）。张龙章（字伯云，苏州人，号武医山樵）作《潇湘八景图》卷著录于《宋元明清画家年表》）。文征明曾孙文从简（1574—1684，号枕烟老人）崇祯十六年作《潇湘八景图》册（8页，藏中国美术馆）。夏昶（1388—1470，苏州人，官至太常寺卿，擅画墨竹，时有"夏卿一竹，西凉十锭金"之誉）作《潇湘风雨》图轴。清王宸作《潇湘图》（藏青岛市博物馆）。郑板桥作《潇湘八景》浪淘沙词8阙。据不完全统计，近代和当代傅抱石、张大千、黎雄才、刘海粟、朱屺瞻（作《潇湘烟雨图》，1953年参加全国首届中国画展览并获奖）、陆俨少（作《潇湘水云图》，其仿品曾于1999年5月在长沙湖汇大酒店拍卖）、邓辉楚（《潇湘四季图》选人全国8届美展）。书法家王一新（居北京，写板桥体，号半桥）、王超尘创作了郑板桥《潇湘八景词》书法作品。





历代有关潇湘图轶闻较多，兹举数例：

米芾之子米友仁（1074—1153），人称小米，海内外传世画仅5件，其中潇湘图有二：《潇湘奇观图》（藏北京故宫）和《潇湘白云图》（《藏上海博物馆》）。他自题《潇湘奇观图》云："余平生熟悉潇湘奇观，每于登临佳处，辄复写其事趣。"该图是米氏"米点山水"的代表，以水墨烘染和横点法，表现云山、雨雾、烟雾自然景色，扩大了中国山水画创作题材和丰富了创作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与米芾同时代的文学家苏东坡也是潇湘文化的"好事者"。他在惠崇《潇湘芦雁》上题六言诗一首："惠崇烟雨芦雁，坐我潇湘洞庭。欲买扁舟归去，故人云是丹青。"宋迪作《潇湘晚景图》，他题诗三首，第一首云："西征忆南国，堂上画潇湘。照眼云山了，浮空野水长。旧游心自省，信手笔都忘。会有衡阳客，来看意渺茫。"除此之外，多才多艺的苏东坡还创作了《潇湘竹石图卷》。此画历经900余年，画上有历代题跋26家凡3 000余言。20世纪60年代初，邓拓在琉璃厂发现后，用自己收藏的20多幅明清名画与之交换，写出《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考证文章，发表在《人民画报》。"文革"中邓拓被抄家，此图为叶群所窃。1981年国庆节《邓拓藏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笔者在京有幸得观此画。画为手卷，绢本发黄，单柜陈列。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石头，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渺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潇水相合，遥接洞庭，景色苍茫，隽逸之气扑人。同时陈列的还有《人民画报》（1962年6期）那篇文章，天头写有邓拓蝇头眉批。那天睹物思人，徘徊良久，不忍离去。苏轼画作珍若拱璧，文献记载仅有10件，当今海内外仅存2件，另一件《枯木怪石图》存日本私家。东坡倡导潇湘文化，功在不朽。

董其昌是明代潇湘文化的发烧友。十年中曾三次漫游湘江。万历乙巳（1805年）九月泛舟湘江，舟上为载于《宣和画谱》的董源山水图卷题跋，命名为《潇湘图》，一锤定音，成千古绝唱。一次携米友仁为翟伯寿作《潇湘图》长卷在洞庭湖览胜，惊叹米友仁的写生本领说："斜阳蓬底，一望空间，长天云物，惊惊奇奇，一幅米家墨戏也。"得出"米法"源于写生的结论。他自己

还参照"米法"作《潇湘白云图》，今藏辽宁省博物馆。

清代宁乡画家刘愔，字黔台，一字书舫，家富有，与当时名流胡达源、邓显鹤友善。曾作《潇湘八景图》赴京进呈，诏命充内庭南苑供奉官。后辞官遍游吴越及湘中名胜，在家乡筑悟香亭，以书画怡养天年。

兹将历史上所传诵的潇湘八景分述于后：

**潇湘夜雨** 景点应在永州城东。湘水在永州境内与潇水汇合以后，称为潇湘。雨落潇湘的夜景，是旧时文人藉以寄情的著名景观。"涔涔湘江树，荒荒楚大路。稳系渡头船，莫教流下去。"（元揭奚斯）凄凉而无助的心境，就像夜雨本身一样哀婉缠绵。千百年来，不少文人雅士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米芾题潇湘夜雨云："大王长啸起雄风，又逐行云入梦中。想像瑶台环佩湿，令人魂断楚江东。"明代王寅、周星均有诗。

宋、元、明、清画家宋迪、夏圭、玉涧、法常、王洪、文征明、张龙章等都作过《潇湘夜雨》图，今均不存。当代岭南山水画巨擘黎雄才，1932年作《潇湘夜雨图》，参加比利时国际博览会获奖，成为其代表作。1994年12月15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黎雄才从艺80周年回顾展中展出，此幅列为榜首。开幕式上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此画前与众交谈甚欢，端视良久。

**平沙落雁** 景点应在衡阳市回雁峰。湘江自永州下泻数百公里，到达南岳七十二峰之首的回雁峰。当北方大气转冷，雁阵南行，南方则金风送爽，艳阳高照。旷野平沙，芦苇丛丛，常常引来雁阵栖宿。"阵断衡阳暂此回，沙明水碧岸莓苔。相呼正喜无矰缴，又被孤城画角催。"（宋米芾）"西风万里雁，一叶洞庭秋。群浴金沙软，潇湘霜气流。"（明李梦阳）好一幅秋雁戏沙图，所以此景名曰平沙落雁。

宋僧法常所作《平沙落雁图》被日本称作重要的"文化财"，现藏日本山光美术馆，在横幅1米的宽阔画面中，远方的雁群依稀可见，近处则有4羽形态各异的大雁，表现了日暮时分和湖边湿润溕朦的空气。作品大量留白，点睛之笔偏于画面一角，给人留下一种空蒙清寂的韵味。当代画家傅抱石《屈子行吟图》中曾作人物画《平沙落雁图》，载《中国画》1984年第2期。

**烟寺晚钟** 景点应在衡阳县城北清凉寺。湘江又北行30公里，经过佛教胜地南岳衡山。晚来风急，万物人眠，唯寺内报时的古钟，不时敲出悠扬宏亮的声音。清凉寺又名方广寺，但同南岳名刹方广寺不属同一座寺庙。

根据这一景象，宋僧法常作《烟寺晚钟图》，被日本列为"国宝"，现藏于东京白金台富山纪念馆明月轩，画面大部分为淡墨表现的浓雾，左侧有树木丛生于浓雾之中，树丛深处隐现着山间寺院的房檐。宁静而淡泊的房檐，暗示作品主题——"烟寺晚钟"。诗云："绝顶高僧未易逢，禅林常被白云封。残钟已罢寥天远，杖锡时过紫盖峰。"（宋米芾）"朝送山僧去，暮唤山僧归。相唤复相送，山露湿人衣。"（元揭奚斯）按：紫盖峰在南岳衡山。"音随晴雨落随风，两岸霜钟听不同。最是夕阳云外寺，渡江声在白云中。"（佚名）悠扬的钟声仿佛穿透云烟飘然而至，提醒江舟中的旅行者，在这种钟声中系舟或者远行。





**山市晴岚** 景点应在湘潭易家湾昭山。湘江由衡山北行150余公里到达昭山。紫气缭绕，岚烟袭人，云蒸霞蔚。一峰独立江边，秀美如刚出浴的仙子。宋代米芾曾在微寒的早春游昭山，看见依山为郭，列肆为居，商贾云集，酒旗猎然的景观，特作诗："乱峰空翠晴还湿，山市岚昏近觉遥。正值微寒堪索醉，酒旗从此不须招。"元揭奚斯亦有诗云："近树参差见，行人取次多。板桥双路口，次处几回过。"《善化县志》转引《图书集成·职方典》对昭山山水之记述："绝岭而奔秀，起于湘岸，亭然翠立，皆怪石磅礴，异木层荫，微露岩甍，而无倾落之势，舟过其下，往往岩牖石窗，窥攀莫及，洵异境也。"昭山下有深潭，《水经注》说潭无底，与洞庭湖相通。

南宋僧玉涧曾作《潇湘八景图》，其中仅有纸本《山市晴岚图》轴传世，现藏日本山光美术馆。据日本美术史家铃木敬教授考证，此画用笔与玉涧《庐山风》极为相近，书风较《庐山风》光彩，画上钤"三教弟子"朱文印，无名额印记。1930年著名书法家曾熙病逝于上海，其弟子张大千扶柩归葬衡阳并守墓一年，曾来昭山写生，画有《山市晴岚图》。

**江天暮雪** 景点应在长沙市橘洲。旧指水陆洲的雪天晚景。宋代湘江中有四洲，水陆洲位于今橘洲的中部，水陆洲上历代建有江心楼、水陆寺、屈贾祠、拱极楼等观景建筑，尤以拱极楼壮观无比。据《图书集成·职方典》说："拱极楼在水陆寺后，约七八尺。西瞻岳麓，俯瞰湘流，草树参差，帆鸟映发，若出若没，亦近亦远。风纹霞绮，月练烟鬟，自然情移。"旧时楼上挂有对联："拱极楼中，五六月间无暑气；潇湘江上，二三更里有渔歌。"描述了一种令人惬意快适的境界。拱极楼后毁于清末。

宋米芾咏江天暮雪云："蓑笠无踪失钓船，彤云暗淡混江天。湘妃独对君山老，镜里修眉已皓然。"元揭奚斯诗云："孤舟三月住，不见有人家。纷纷竹篱处，却恐是梅花。"米芾所写是否长沙？明周星曰："六出飞花未是奇，地因湘浦弄幽姿。都从米芾高寒画，散作王维澹远诗。钓罢渔蓑收艇后，醉归驴背叩门时。不知溪阁骚人笔，评到疏梅第几枝。"周星诗也是咏潇湘八景中的江天暮雪，将地点锁定在湘江，似为米芾的诗画作注脚。现存的《江天暮雪》图有南宋王洪所作的绢本水墨画，23.7×91.4cm，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

**远浦归帆** 景点应在湘阴县城江边。从橘洲沿江北去，约行70公里，便

到湘阴。湘阴是古代水驿要塞，北至洞庭，南通长沙，水域十分辽阔，自古迄今都是渔民商贾的栖宿地。每当黄昏，远山含黛，岸柳如烟，归帆点点，渔歌阵阵，等待归船的渔妇和企盼宿客的青楼女子站在晚风斜阳中，衬托出一片温馨企望的繁忙景象。米芾作潇湘八景诗，独独这一首表现"闺中红粉正思君"的情景，盈溢着粉脂气息，寄寓着一个漂泊他乡、渴望温情的旅客的归泊之心。明周星《远浦归帆》云："鼓棹白衣休借问，倚楼翠袖欲遥呼。"实取米芾诗意。

宋僧法常作《远浦归帆图》，被称作日本的重要"文化财"，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法常是出家人，不近女色，没有米芾那样浪漫和温情脉脉。左下角以疾驰之笔描绘狂风中飘摇欲倒的树木，不见枝叶，只见风雨卷袭中歪斜的树形。墨与水和谐交融，绝妙地完成了西方绘画中远近透视法所追求的效果。宋僧玉涧也作有《远浦归帆》图，现藏日本。

**洞庭秋月** 景点应在洞庭湖。无际的洞庭湖，秋天的夜晚，月色如银，长烟一空，不杂任何痕迹，八百里湖面，碧水如镜，风息浪静。月光和湖光相互交融，泛舟湖上，则别有一番情趣。米芾咏洞庭秋月云："李白曾移月下仙，烟波秋醉洞庭船。我来更欲乘黄鹤，直上高楼一醉眠。"揭奚斯则云："浩气自澄穆，碧波还荡漾。应有凌风人，吹笛君山上。"写的都是这种意境。

南宋宫廷画家夏圭曾作《潇湘八景图》8幅，目前仅剩下《洞庭秋月图》，藏于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博物馆，佛尔氏于1919年得于中国。此幅为水墨淡设色，暑臣字款，画上题有七绝一首（《傅熹年书画鉴定集》）。宋僧玉涧所作《潇湘八景图》，遗留《洞庭秋月》图传世，现藏日本。庆历六年（1046）六月，宋代滕子京为重修岳阳楼，派人绘出《洞庭晚秋图》和《求记书》，送给范仲淹参考，于是范仲淹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当代国画大师刘海粟于20世纪50年代怀着对江南旖旎风光的一往情深，也创作了《洞庭渔村图》。

**渔村夕照** 景点应在西洞庭武陵溪。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说"武陵人捕鱼为业"，武陵人因为捕鱼，而发现了桃花源。世人又因为桃花源，而对武陵人抱有一份好奇和好感。因而，武陵人所居住的渔村也就成了文人墨客所憧憬的地方。米芾咏渔村夕照云："晒网柴门返照新，桃花流水认前津。买鱼沽酒湘江去，远吊怀沙作赋人。"揭奚斯云："定从海底出，且向平沙照。鱼网未曾收，渔舟还下钓。"都抒发了向往的情怀。

传世的法常作《渔村夕照》图，日本列为"国宝"，藏日本东京青山根律美术馆。画上云雾弥漫，有三条光带从密云间隙倾泻而下，左侧是隐没于险峻山峦之中的小小渔村，画的正中摇荡着寥寥几笔划出的一叶渔舟。

潇湘八景不仅是山水画题材，而且是享誉千年的风景名胜，湘楚文化的璀





璨明珠。在今天，她还是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饱含商机的风水宝地，有必要从全省的角度和长远规划进行宏观策划和经营，把各方面力量组织协调好，为打造这一湖南品牌各尽其力。比如文化出版部门可广泛征集国内外潇湘八景诗图，编辑出版《历代潇湘图全集》、《潇湘八景图志》、《历代潇湘八景诗集》；八景所在地可按照史籍记载，保护、恢复重建历来标志性建筑和人文景观，开辟"潇湘八景"游水上旅游热线；切实保护好湘江母亲河水质和沿岸绿化、生态环境；新闻报刊、广播电视可加大宣传力度，把"潇湘八景"品牌推向国内外等等。总之，在新世纪我们应有超越前贤的雄心壮志，与时俱进，把潇湘八景建设得更美更好，让它在湖南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单位：湖南省方志馆）

# 魏源与佛教的因缘

胡光曙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晚年号菩萨戒弟子魏承贯，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是清道光年间进士，官至高邮知州，是我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中最优秀的代表，留下了《海国图志》等许多博大精深的著作。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源的家庭是一个居士世家。几代人笃信修持，均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魏源曾孙女魏韬（1914—1992）生前曾告诉笔者：她高祖父春煦公（魏源之父）是个生性仁慈、乐善好施之人，乡间凡有佛寺修建及修路架桥之事，他都是出面组织的“头首”；她高祖母陈太恭人（魏源之母）更是一位虔诚的女居士，每月朔、望之日，必在家中素食祈祷，“三元”、“三九”之期则必去佛寺朝拜，数十年如一日，一以贯之。魏源老家金潭本是梅山文化的发祥之地，山明水秀，佛寺林立，民风淳朴。魏源出生在这样一个家族环境里，耳濡目染，自小对礼善信佛便有了朦胧的向往。

魏源在他早期的诗作《游山后吟》中有“溺仙溺佛溺山水”之句。溺，沉湎也。这一夫子自道，明显地反映了他像钟情山水一样地“溺佛”。这不单单由于他出生家庭的熏陶和生长环境的影响。作为一代哲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本与佛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连。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的文化、学术、思想，均与佛教有较深的因缘，研究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史，佛学研究从来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故近代的艺术家、思想家、学者，有不少人喜欢佛学，除魏源外，如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等皆是。从文化借鉴和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观察，自佛学中吸收的营养，也扩大与丰富了他们的学术领域。

梁启超说：

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





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

——《清代学术概论》

魏源的正式接触佛教，开始学习佛教理论，在戊子道光八年（1828年），已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

戊子，游浙江杭州，晤钱伊庵居士东甫，从闻释典，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博览经藏。延曦润、慈峰两法师，讲《楞严》、《法乘》诸大典。

——《邵阳魏府君事略》

这一年魏源三十五岁，他在杭州法师处住了一个多月，“潜心禅理，博览经藏”，临别时还写了《武林记游十首呈钱伊庵居士》。

这是一个伏笔，了解魏源年轻时的这一经历非常重要，我们就不会对魏源后来要选择杭州东园僧舍作为他的最后归宿感到突然了。

大器晚成的魏源，到了他五十二岁（乙巳，道光二十五年）才考中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先是任东台、兴化县令，后补高邮知州。老年为官，公务繁忙，虽无暇专诚礼佛，但仍常与一些僧人来往，如南京盔山四松庵僧人、镇江焦山寺借庵和尚、理安寺悟坚上人，以及天台寺、盘山寺和四川僧人（蜀僧）等。他先后游历了普陀山、庐山、泰山、恒山、华山、衡山、嵩山、黄山、九华山、五台山、天台山、武夷山、雁荡山等，在这些名山古刹里，每与高僧谈禅论佛。而在他管辖的地方，特别注意对于佛寺庵院的保护。升任高邮知州后，更加着意于寺院。庙宇的修缮，如在城内的禅明教寺、护国水清寺都于大门外加筑照墙一堵，使寺院更显肃穆庄严。笔者20世纪90年代去高邮寻访魏源遗迹时，看到魏源亲笔题写的“乾明禅寺”四字石刻牌匾犹存，仍然陈列在高邮名胜文游台内供游人观赏。

魏源的仕途却并不惬意。任期短，坎坷也多。就在他高邮知州任上的第三年（1853，咸丰三年），太平军攻下江宁，改称天京，一路势如破竹，旋即占领扬州。与魏源素有过节的江北防剿杨以增挟嫌报复，乘机以“迟误驿报”为由，参了魏源一本，罢掉了他的职务。这年年底，经人保奏，才恢复了他的官职。

经历了这些变故，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这时的魏源已经心灰意冷，加上年事已高，体质羸弱，终因“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仕宦……至是辞归”。（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无官一身轻，马上搬迁到他任过县令的老根据地兴化乡下，整理自己的著作去了。

魏耆这样描述他父亲这一时期的生活：

全家时避兵侨居兴化，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终日静坐，户不闻声。

——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

就在此时，魏源开始专心净业，潜心于《净土四经》的会译与编撰了。在他为《净土四经》撰写的叙言后面，启用了自己新起的法名“菩萨戒弟子魏承贯”。

魏源的好朋友周诒朴云：

余友邵阳魏默深源，精通宗教，晚岁专心净业。……经序皆署承贯名，盖默深持戒法名也。

——周诒朴：《净土四经序》

耗时两载，废寝忘食，《无量寿经》终于会译完毕，汇编成《净土四经》一部大书。但魏源的心愿不止于此，他还要将经书付诸梨枣，刊刻出来送与友人，“以广流通”，“同跻正觉”。他把这件大事托付给他的好友周诒朴办理，给周写信说：

老年兄弟，值此难时，一切有为皆不足恃。惟此横出三戒之法，乃我佛愿为所成，但办一心，终登九品，且此念佛法门，普被三根，无分智慧男女，皆可修持。若能刊刻流布，利益非小，子其力行毋怠！

——《净土四经》卷首

《净土四经》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普贤行愿品》。魏源信佛，为什么倾向净土？是因为禅宗认为：心性本净，佛性本有，即心是佛，见性成佛，所以重视人性的顿悟；而净土宗则认为要以心力感佛，所以重视诵念佛号，修炼方式比较简单易行。永明寿禅师认为禅宗和净土宗应同时进行，收效会更为显著。所以魏源认为循序熟读四经以后，即可断尽烦恼，普渡众生，这是自然的事。那么又为什么要根据各种版本，重新会译《无量寿经》呢？是因为原来云栖大师的译本顾此失彼，偏而不全，致使该经“古不流通，今亦不流通”。魏源的重新会译，一是弥补云栖大师的缺陷，使四经易于流传；二是删繁就简，使该经成为“法门之善本”。

据此看来，魏源的皈依净土，会译佛经，汇刻《净土四经》，不能不说这是他对佛教所作的重要贡献。

魏源晚年所作的《叹救生船》诗云：

利舵名帆日夜牵，水行多似陆行便。
虽然生死由天定，毕竟多翻浪里船。





这首诗表现出他对世上争名夺利之徒的鄙视，对那些见利忘义之人的冒险行为发出警告，也流露了他此时一心向佛的出世思想。

“四经”汇刊之事既毕，魏源的一桩心愿已了。此时已是1856年初秋了。天高气爽，气候宜人。魏源感到已经卸下重负，一身轻松，心静如水，遂渡江南下，直达旧游之地杭州，他来到西子湖畔的南屏山麓，但见水光山色，风物佳妙，正是西湖八景之一的“南屏晚钟”所在。这里有一座古刹——杜庆庵（又名东园）。在青灯古佛的僧舍之中，魏源安顿下来，度过了一个安谧的冬季。

魏耆记载他父亲这最后一段的生活情况时说：

丙辰秋初，游杭州，寄僧舍，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客至亦不纳，即门生至戚，接二三语，便寂对若忘。

——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

魏源自己最后写的一首《偶拈》则说：

扫地焚香坐，心与香俱灰。
沉沉寥寂中，冥冥花雨来。

可以看出，身居兰若的魏源，此时是如何的心无旁骛，情有独专的了。

待到来年（1857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魏源，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在焚香寂坐中溘然长逝。以其生平喜爱西湖，遂葬于清波门外，南屏山麓。笔者曾亲往探访，荒烟蔓草之中，其墓冢所在处知情人尚能指点不误。魏公陵寝至今在焉。

哲人已杳，他家与佛的因缘却还没有了结。此后他家祖孙几代，家中均设佛堂，长年礼拜不衰。

到了1864年，也就是魏源去世七年后，竟又出了一件奇事。此时太平天国失败，金陵克复，天王宫眷从臣多被搜索逮杀。有王妃熊氏者，装成难民易服逃出，慌乱中来投魏源家宅小卷阿。魏源的媳妇汪夫人知非常人，礼待之至，请她料理家中佛堂。三年后熊氏以实情相告，并泣请引渡释门，汪氏商于夫君魏耆，乃遂其愿，辟小卷阿之半赠之，且月奉薪米用度，是谓皇姑庵，亦称普渡庵，其住持世系，共达六代，直至建国初期。这一段传奇故事，算是魏源这个居士世家的后话了。

魏源之孙魏繇，生有子女五人，其中三人早卒，剩有魏昭、魏韬姐妹二人，极敦孝道，又为了属恪守祖业，姐妹矢志均不成家，双双入佛门，相依为命。姐魏昭佛名丁香，妹魏韬佛名蕙香。其从兄伯和早年即寄名于元妃名下，取名佛慧，1956年去世。魏昭去世于1970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之中，魏韬

去世于 1992 年 6 月，她是魏源直系亲属的最后一位传人。

至此，魏源这个绵亘数代、长达二百余年的居士世家才算最后画上了句号。

纵观魏源一生，他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一位贤明的官员，晚年还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但论者往往对他晚年皈依佛门的原因作出片面的推断，认为魏氏致力于社会弊端的改革受到挫折，清政府的腐败、社会黑暗和世态炎凉使魏源产生了消极的思想，于是逃避红尘，选择投身释门以求身心的解脱。

这只是一种表象，其实远不尽然。魏源在《净土四经总叙》中说："夫王道经世，佛道出世，滞迹者见为异，圆机者见为同。"所谓"经世"与"出世"，是有内在的深层思想联系的，不能简单地分割和对立。在魏源的心中，"入世"与"出世"并不矛盾。他以自己的生平行状、言论、思想和著作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诠释，他并没有因为崇尚佛教而影响他事业上的辉煌成就，我们仍然处处看到他作为一封建社会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他的言行，仍然处处显现出一个大哲人的风范和一个杰出思想家的耀眼的光辉。

（作者单位：湖南隆回县文物管理所）





# 湖湘学与洛学的思想渊源关系

陈先枢

宋代理学，学派林立。在诸多理学学派中，人们习惯把北宋以河南洛阳二程（程颢、程颐兄弟）为代表的学派称之为洛学；把南宋在湖南地区形成的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代表的学派称之为湖湘学。湖南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他对儒家伦理有着"推本太级"的历史功绩。二程则是理学思想体系的奠基者，他们使儒家学说向着更具哲理性、思辨性的理学过渡。而真正完成这个过渡的，当数湖湘学的功劳。这个过程不是一种巧合，湖湘学与洛学无论在师承关系上，还是在思想体系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一、程颢、程颐与周敦颐的思想渊源关系

湖湘学源于二程洛学。洛阳程颢、程颐可以说是湖湘学承前启后的人物。二程都受业于周敦颐，因而二程哲学观点的形成，最早是吸收了湖湘大地的营养。二程自称"受学于周茂叔（敦颐）"，但对周子之学进行了较大的改造，首创"性即理"说。二程把"心"分为"道心"和"人心"，认为"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黄百家也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指北宋哲学家张载）大儒辈出，圣学大昌。"（《宋元学案·濂溪学案》）文中"元公"即周敦颐。周敦颐（1017—1073），湖南道州人，字茂叔，因谥号元，称元公，后人称之为濂溪先生，其学说亦称濂学。二程思想明显受禅宗人性化了的濂学的影响，程颐就明确表示同意"人性本明"的说法，认为"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此须索理会也"。

周敦颐在哲学上提出了以"诚为核心"的心性伦理体系，长沙湖湘学派尊他为理学宗主，岳麓书院内建有濂溪祠，予以供奉。周敦颐的主要学术著作为《太极图说》和《通书》。这两部总共不满 3000 字的著作，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融合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为宋代的理学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太极图说》仅 249 字，另附一个上下 5 个层次，大小 10 个圆圈的"太极图"。它融

合儒、道两家思想，以道家思想补儒家不足。与儒家不彻底的宇宙生成学说相比，道家特别注重对宇宙最终本源的探索，颇有寻根究底的精神。道家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本源，但不是宇宙的最终本源，“太极”之前还有别的物质。周敦颐打破门户之见，大胆吸收了道家的这种有益思想。《太极图说》与宋代道士陈抟的《先天图》有着密切联系，但对《先天图》的丹法思想进行了改造，将其衍变为宇宙生成程序，认为无极和太极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太极动而生阳，动极则静，静而生阴。阴阳生出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生成万物，在阴阳二气和五行的相互相作用下，万物变化无穷。

如果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以道家之长补儒家宇宙学之不足，那么，《通书》则是扬儒家之长，补道家伦理学之不足了。同时，《通书》也吸收了佛学的有益成份。《通书》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又说“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这无疑吸收了佛家“心是诸法之本”、“善恶报时”等学说的有益成份。周敦颐以“循理为静，以不妄动”、“动而正”为静，以中正为至善，以中节为达道的人性学说和修养理论，就思维方式来说，与禅宗“离相”、“无念”为明心见性是遥相契合的。至于他所倡导的心性之学，周敦颐本人曾叹道“吾此妙心，实启迪于黄龙，发明于佛印”。这说明周子之学，得益于佛学者甚多。（梁绍辉：《周敦颐开宋明理学三教合流的先河》）

正由于周敦颐的学说受道家、佛家的影响如此之深，故在当时理学界的学术地位并不高，被视为非正统。但洛阳二程慧眼识真珠，拜其为师，将濂学发扬光大，从而奠定了宋代理学的基础。包容并蓄、吸收其他学派优点为我所用，正好成为后来湖湘学派的一个特点。

湖湘学的代表人物胡宏十分强调周敦颐对程氏兄弟的影响，并由此确定他的“道统”地位。胡宏说：“程明道（颢）先生尝谓门弟子曰‘昔受学于周子，令寻仲尼、颜子所乐者何事？’而明道先生再见周子，吟风弄月以归。道学之士皆谓程颢氏续孟子不传之学，则周子岂特为种、穆之学而止者哉？……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周元公集》卷一，《通书序略》）胡宏如此推崇周敦颐之学，开启了南宋推崇周敦颐为道学宗主的先河。

然而，周敦颐只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真正奠定理学思想理论基础的则是程颢、程颐兄弟。正如侯外庐先生在《宋明理学史》中所说，二程“洛学才是理学的典型形态”。而二程之学正是湖湘学派的主要思想渊源。因而长沙岳麓书院建有四箴亭，祀程颢、程颐，将程颐所纂“视、听、言、动”箴言四则嵌于亭壁，以作书院学规。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1033—1077），





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程氏兄弟年少时皆从学周敦颐。二程之学的主要范畴是“天理”，宋明儒学之所以称为“理学”，是由于二程提出了“天理”的最高哲学范畴，使理学成为一种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相区别的学术思潮，开创了一种新兴的学术风尚。

二程理学思想的最大特点，首先是将儒家伦理规范抽象为“理”，并以它作为超越时空的宇宙本体，建立了理本体论。他们认为：“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他们还将宇宙万物划分为理与气两个范畴，并进一步提出：“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经说》卷一）通过理气关系的论证，确立理的宇宙本体地位。其次，二程又将此作为宇宙本体的理置之于人的本性之中，提出“性即理”的著名命题。程颐说：“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建立起了以天理论为本的心性论。第三是提出了主敬、致知的道德工夫论，要求一切人经过道德修养，以回复到天理之中，《洛阳程氏遗书》载：“或问‘进修之术何先？’曰：‘莫先于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 二、湖湘学与洛学的师承关系

二程在长期授徒活动中，培养出了一大批弟子，著名者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尹焞等人。经过这些弟子的传播，二程洛学影响日盛，绵延不绝。南宋理学得以发展并走向集大成，主要是二程洛学南传的结果。

二程洛学是湖湘学的主要思想渊源。这可从湖湘学者本人的论述中得到证实。胡安国说：“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宋史》本传）他还建议朝廷对二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胡安国肯定自己的学术思想源自二程之学，声称“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发”。（《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胡宏在学术上主要是传其父胡安国之学，故也十分推崇二程之学，并以私淑二程之学而自居。他感叹说：“予小子恨生之晚，不得供洒扫于先生（指二程）之门，如集其遗言，行思而坐诵，息养而瞬存，因其所言而得其所以言，坚固耐用其所以言而得其言之所不可及者，则与侍先生之坐而受先生之教也又何异焉。”（《程子雅言前序》）张栻也同样尊崇二程洛学，称其“天理之揭，圣学渊源”。（《南轩文集》卷三十六）他反复研习二程之学，认为“惟觉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看愈无穷，不可不详味也”。（《南轩文集·答吕伯恭》）可见，湖湘学派的大师们皆肯定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二程治学的直接渊源关系。

胡安国、胡宏对程颢、程颐推崇备至，但胡氏与程氏毕竟相隔一代，胡氏

接受二程之学除私淑外，主要是通过二程弟子谢良佐、杨时等的再传而完成的。洛学与湖湘学的师承关系见下图。

周敦颐 →程颢 →谢良佐 —→ 胡安国 ↓
周敦颐 →程颐 →杨　时、侯仲良 →胡　宏 →张栻

## 三、胡安国与洛学的思想渊源关系

胡安国（1074—1138），福建崇安县人，人称胡文定公，晚年率全家及弟子结庐湖南衡山紫盖峰下，潜心学术事业。南宋初召入京，建炎（1127—1130）年间辞官，携其子再次来潭州碧泉，建碧泉书堂。后隐居衡山，创文定书院，集中精力完成了自己毕生撰写的《春秋传》。

全祖望说："私淑洛学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杨时），盖晦翁（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皆其再传也。"（《宋元学案·武夷学案序录》）据朱熹、真德秀等所说，二程之学，是经大弟子谢良佐传给胡安国的。

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上蔡（今河南省汝南县）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是洛学的重要传人。谢良佐和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安国的具体学术关系，朱熹认为是师徒的授受关系。朱熹在《上蔡祠记》一文中认为胡安国"以弟子礼禀学"，肯定胡安国是谢良佐的弟子。现存谢良佐的重要著作《上蔡语录》，即由胡安国、曾恬记录。胡安国、曾恬曾将谢良佐和他的讲学内容记录下来，编成"语录"两篇，流行于世。后来朱熹获得曾恬、胡安国两个"语录"本子，通过参校删定，编成现存的《上蔡语录》。当时这种记录讲学内容之事，一般都是及门弟子所为。南宋真德秀认可朱熹之说。明代学者黄宗羲编《宋元学案》时，也持这一看法。他说："上蔡之传，始自胡文定公入衡湘。"（《宋元学案·武夷学案》）因此，把谢良佐看做二程之学和湖湘学派的中介人物有充分历史依据。正由于谢良佐处于这种中介关系中，他的学术思想及风格也影响了湖湘学派，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思想渊源。

学术界普遍认为，谢良佐之学主要继承并接近程颢之学。今湖湘学学者朱汉民教授认为谢氏的三条独到见解，都和湖湘学派有着思想渊源关系。

第一是论道。谢良佐曾强调道就存在于洒扫应对的日用生活之中。湖湘学者在论述本体性的"道"、"性"、"理"时，十分强调这种超越本体民日用伦常的不可分离的关系。胡安国说："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昼作入息……只此是道。"（《宋元学案·武夷学案》），他把超越本体的"道"置于"冬裘夏葛，饥





食渴饮"的日用生活之中。

第二是论仁。谢良佐仁说有一个十分著名的提法，就是以知觉言仁。湖湘学派的学者高度赞扬这种观点。胡宏之弟胡广仲说："'心有所觉谓之仁'，此谢先生救拔千余年陷溺固滞之病，岂可轻议哉！未知者，知此者也；觉者，觉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无时不觉，则视听言动莫非此理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宋元学案·五峰学案》）胡广仲之说反映了谢良佐的仁说对湖湘学的影响。

第三是关于穷理居敬的工夫。谢良佐继承程颢《识仁篇》所说"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的为学工夫论，主张"既有知识，穷得物理，却从敬上涵养出来"。（《上蔡语录》上）湖湘学派大师胡宏、张栻在为学工夫论方面也一向主张"先察识，后持养"。湖湘学主张的"先察识，后持养"的为学工夫论，与谢良佐的"先有知识，以敬涵养"的一脉相承，反映了他们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

其实，胡安国早年就受二程思想的影响。元祐五年（1090），即胡安国17岁时，他获得入太学就学的机会。在大学修业期间，胡安国的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开始形成并为他后来的政治活动、学术活动打下了思想基础。在这段时期，胡安国所受影响最大者，是朱长文、靳裁之二人。朱、靳恰恰是二程的同道和私淑。胡安国长子胡寅在《先公行状》中说："遂入太学修懋德业，不舍昼夜。是时元祐盛际，师儒多贤彦，公所从游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长文及颍川靳裁之。裁之才识高迈，最倚重公，与论经史大义。"

朱长文，字伯原，吴县人，人称乐圃先生。《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介绍说："从泰山（孙复）学《春秋》，得《发微》深旨。"孙复是北宋理学思潮的先驱，为"宋初三先生"之一，以研治《春秋》学而著称，著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而朱长文即是从孙复"学《春秋》，得《发微》深旨"。胡安国在太学期间从学朱长文，并通过朱长文而受到孙复"《春秋》之学"影响。这一点，对胡安国在以后重视《春秋》学的研究，以毕生精力撰述《春秋传》，起了决定性作用。

靳裁之，颍昌人。《宋元学案·明道学案》将其列为"明道私淑"，并载："少闻伊洛程氏之学。胡文定入太学时，以师事之。"靳裁之十分器重胡安国，经常给他讲述二程洛学。由于朱、靳两人的影响，胡安国开始接受并尊崇理学，并以此作为自己从学的目标。此外，胡安国与程门四大弟子中的杨时、游酢也有密切的学术交往。

## 四、胡宏与洛学的思想渊源关系

在家庭教育的熏陶和影响下，胡安国之子胡宏（1105—1161）从小就仰慕二程洛学。胡宏从出生至青少年，正值其父胡安国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处于上升时期。在政治上，胡安国被提举为湖南学事；在学术上，胡安国开始研治《春秋》之学。胡安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其《胡氏传家录》即辑有从事家教的言论。胡宏所受家庭教育，对他以后的治学和为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胡安国的“过庭之训”，使胡宏从小立下了治学的愿望。而且，由于胡安国推崇理学，更使得胡宏对二程洛学服膺不已。他在15岁时，就自撰《论语说》，编《程子雅言》并为之作序。在《程子雅言·序》中，胡宏批判了王安石、苏轼、欧阳修诸家的学说，认为“王氏支离”、“欧阳氏浅于经”、“苏氏纵横”，而肯定程氏兄弟的学说继承了孔孟之学的真传，所谓‘“唱久绝之学于今日，变三川为洙、泗之盛，使天下之英才有所依归”。所以，胡宏明确表示了他依归二程洛学的思想倾向。

宣和七年（1125），胡宏至京师，入太学就学，得有机会从学程门高弟杨时。杨时（1053—1153），字中立，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从学程颢、程颐，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程门立雪”的典故说的就是杨时拜师的故事。其学成后南归，程颢声称：“吾道南矣。”晚年隐居龟山，人称龟山先生。全祖望评价说：“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宋元学案·龟山学案》）杨时晚年重被召用之时，恰值胡宏入太学。杨时又是胡安国的世交，因此，胡宏在此期间从学杨时，正式成为程门二传弟子。胡宏之兄胡寅也曾从学杨时。

胡宏虽然不完全认同老师的哲学思想，但在伦理思想上却与杨时有着明显的沿袭关系。关于格物，程颢主张“涵养须用敬”，高度强化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自身精神的涵养。杨时秉承师说，直接将格物界定为返于自身。杨时与胡安国论学道说：“夫通天下一气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虚盈尝与天地流通。”（《龟山文集·答胡康侯》）胡宏更认可“仁心”与主体的自我密切关系，他说：“事至而知起，则我之仁可见矣；事不至而知不起，则我之仁不可见也。自我而言，心与天地同流。”（《知言·好恶》）胡宏的“与天地同流”和杨时的“与天地流通”仅一字之差。

杨时对湖湘学形成产生的影响，除了亲授胡宏、胡寅外，还曾亲自到湖南长沙办学，传授理学。绍圣元年（1094），杨时出任长沙浏阳县令，创办了浏阳第一所书院——文靖书院，大力传授二程之学。当时，县民历年赋税积欠甚多，他因不忍心催征被罢官。杨时在浏阳当了4年县令，免职后仍寓居浏阳，一年后，才离浏归里。杨时在浏阳所建的归鸿阁，至今仍是“浏阳八景”之





一，名曰“鸿阁斜阳”。杨时的再传弟子张栻在其《归鸿阁记》中这样赞誉杨时：“先生晚识陋，何足以窥之蕴？惟公师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鸢飞鱼跃之传，于言意之表，践履纯固，卓然为一世儒宗”，“公之德及邑民也深矣”。

此外，胡宏还与同辈的理学家张久成等人密切交往。张久成（1092—1159），字子韶，南宋理学家，是二程理学向陆九渊心学过渡的重要中介人物。此时他也游学京，师受业于杨时。胡宏与张久成皆崇奉二程洛学，又同学于杨时，学术上十分相契，故过从甚密。

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徽、钦二帝被俘，酿成靖康之祸。21岁的胡宏只得离京，与父兄一同寓居荆门。是时恰值另一程门高弟侯仲良避乱荆门，拜贤若渴的胡宏遂与其兄胡宁一道又从之问学。侯仲良，河东人，程颐的妻弟。胡宏从侯仲良学习理学，颇得《中庸》意旨。以后胡宏提出的心性之学即与《中庸》旨趣十分接近。胡宏曾回忆说：“靖康元年，河南门人河东侯仲良避乱来荆州，某兄弟得从为游。议论圣学，必从《中庸》为至。”（《题吕与叔中庸解》）建炎四年（1130），战火逼近荆门，胡氏一家再次迁往湖南。

胡安国逝世后，胡宏独立治学。胡宏在吸取其老师杨时、侯仲良思想的同时，注重对宇宙本源的探讨，认为宇宙是由“气”推动的无限演讲过程。对于天理和人欲的关系，胡宏认为是“同体而异用”，不同意老师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当时，一批批志学求道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至此，在思想体系上和人才群体上完全奠定了湖湘学派作为南宋一个重要理学派别的基地。所以，后人评价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

胡安国终生治《春秋》，并没有能够为湖湘学派建立起理学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完成这个任务的是他的儿子胡宏。胡宏的代表作《知言》是一部哲学著作，它汲取了先秦儒家典籍《中庸》、《易传》、《孟子》、《论语》的哲学思想，兼容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的理学成就，从而创立了一个包括本体论、人性论、理欲论、致知论等内容在内的理学理论框架，建构了一个包括心性、性气、有无、体用、知行、理欲、义利在内的范畴体系。而且，胡宏在探讨理学理论时形成了本学派的思想特色，他率先提出了“性，天下之大本”的哲学本体论，使得湖湘学派在哲学本体上区别于以理为本的洛学和闽学，也区别于以心为本的陆王学派。为了说明其性本论思想，胡宏又主张性体心用的观点，认为“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使性本论趋于完善。从这种由人道而及天道的性本论出发，胡宏继续提出“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的性超善恶论，提出先察识、后持养的修身工夫论。胡宏所建立的理学思想体系为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本学派自己的学术思想特色。胡宏的《知言》遂成为湖湘学派的不刊之典。（朱汉民：

《湖湘学派史论》)

## 五、张栻与洛学的思想渊源关系

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张栻又是胡宏的学生。张栻（1133—1180），四川绵竹人，南宋抗金名相张浚之子。张栻早年随父迁居湖湘，绍兴三十一年（1161）至碧泉书院从学胡宏，受到老师的器重。《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载：张栻“从五峰胡先生问程氏学。五峰一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也。五峰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可见，正由于胡宏在湖南衡山、湘潭创办书院讲学，形成了湖湘学派的学术、教育基地，培养了张栻等一批著名的理学家，终于肇启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张栻继承了胡宏的学术思想传统，他学成后回长沙，主持了号称宋代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他因此而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岳麓书院也成了湖湘学的大本营，一批批湖湘弟子在此得以成长。

在胡宏的悉心教导下，张栻后来成为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大理学家。张对宇宙的构成、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变化，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组织一个和谐而理想的社会，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张栻还注重“力行”，反对空言，“不汲汲于利禄”，强调道德践履，“知行并发”，主张办学要以“成就人材，传道济民”为方针。这正是湖湘学派的特色所在。

从这里可以看出，由湖南本土思想家周敦颐开创的理学思想，经程颢、程颐、谢良佐、杨时、侯仲良、胡安国、胡宏、张栻等数传后，又回到了湖南，并得到发扬光大。正如王闿运所云：“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张栻曾不止一次地说：“某尝究二极之所根，渊源精粹，实自得于心。而其妙乃在太极一图，穷二极之所根，极万化之所行，而明主静之本，以见圣人之所以立人极，而君子之所当修者。”张栻又发展了周敦颐的太极思想，他认为“太极”虽是一种精神性实体，但不是人的一种自我意识。他说“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物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者矣。”张栻在太极理论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理”、“性”、“心”等重要哲学范畴，堪称湖湘学继承光大二程洛学的典范。

## 六、洛学南传的不同走向

值得指出的是，二程洛学虽然是湖湘学的思想渊源，但二程的理学思想还是有区别的，湖湘学主要是吸收了程颢（大程）的学术思想，而程颐（小程）的学术思想主要传向了朱熹，成为闽学的思想渊源。在哲学本体论上，二程兄弟虽皆以“理”、“道”为形而上的宇宙本体，但又有各自的特点。程颢追求“道、物一体”的境界，不注重二者的形而上、下的逻辑划分，他说：“此道与





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程颐则建立起以天理论为本的心性论。程颢往往从内在人格探寻“道物一体”的统一基础，从人道的心性论来说明天道的本体论。他说：“心是理，理是心。”（《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湖湘学派的哲学本体论明显接近于程颢，他们主张由人道而及天道，重视心性论的本体意义。胡宏所建立的哲学本体论是以“性”为核心的，他提出“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知言疑义》）以人道的心性论建立宇宙本体论。张栻的哲学思想也具有这一特点，他强调心的本体意义，提出“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该遍者，本体也”。（《南轩文集・桂阳军学记》）这也体现了湖湘学派由人道而及天道，注重心性的本体意义的思想特色。

在人性论方面，湖湘学者的一些独具思想特色的主张，也是对程颢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大程认为性、气是一体不分的，说：“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性。”（《宋元学案・明道学案》）小程则坚持儒家传统的性善论原则。程颢的观点对湖湘学者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胡宏明确肯定性、气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他说：“性外无物，物外无性。”（《作言・修身》）这种性气一体的哲学观念，使他坚持从人的感性生命活动本身来理解形而上的性体，得出了“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性”（《知言疑义》）的结论。这与程颐及朱熹的“灭私欲则天理明”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为学工夫方面，程颐注重格物穷理的方式，而程颢注重“识得此理，以诚警存之”（《宋元学案・明道学案》）的方式，主张从人的内心体验人伦之理。湖湘学派的为学工夫也受大程的影响，十分注重尽心的工夫。胡宏常把尽心、识心作为主要的为学工夫，主张通过察识、操存、扩充“本心”的方式，达到“与天同”的本体境界。故胡宏把尽心与“立天下之大本”结合起来，认为“心也者，知天下、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尽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知言疑义》）张栻的为学工夫继承了其师胡宏的学说，常提到“尽心”问题。湖湘学说如此重视、推崇“尽心”的工夫，显然受到了程颢之学的影响。

（作者系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长沙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 简说湘军及其历史影响

刘泱泱

如今，在湖南，以至在全国，“湘军”的称号愈来愈多，有的叫得震天价响：文学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体育湘军、建筑湘军、路桥湘军、劳务湘军，以至导游湘军，等等，几乎遍及各行各业，其实，这里的各类湘军，与本来意义上的湘军，历史上的湘军（军队和军事政治集团），并不是同一回事，历史上的湘军，纯属军事、政治范畴。而今天的各类湘军，则除表述地域概念外，主要还有一层意思，即借用历史上湘军的辉煌，来表达、宣扬或企图塑造各自行业今天的辉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湘军的历史影响至于今仍然存在。

## 湘军的本来涵义

湘军和湘军集团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政治集团。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区域文化背景下，由特出的领袖、精英人物创建和领导的，具有鲜明思想文化特色和地域特色。它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活动了近半个世纪，不仅在当时叱咤风云，左右军政局势，踪迹几遍全国，对往后历史发展也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的影响。

湘军诞生和活动的特定历史时代条件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起义和各少数民族起义席卷全国，这是湘军组建的主要动因；其二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这是湘军特别是在其后期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其三是清王朝已经走向衰落，内政腐败，军事废弛，既不能抗拒外来侵略，又无力镇压民众起义，病入膏肓，岌岌可危，这是湘军兴起并取代清王朝经制之军绿营的重要契机。

湘军的发源地为湖南。湖南不仅是湘军领袖和重要将领的家乡，也是湘军兵源、饷源的主要后方基地。这与湖南的地理环境和区域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湖南南邻两广，北达中原，东通江浙，太平军出境征伐首先经过湖南。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古为四塞之地，经济文化发展较迟。但两宋以后，教育文





化较为发达，书院林立。明清之际，农业又有较大发展，获得全国粮仓的美誉。湖南是屈、贾伤心之地，柳、刘流放之地，继后，理学鼻组周敦颐生长于道县，朱熹、张栻讲学于麓山，王船山著述于衡阳，湖湘文化源远流长，至近代初期，更经陶澍、魏源、贺长龄等力倡经世致用之学，发扬光大，湘系经世派享誉全国。在湖湘文化熏陶和时代召唤下，湖南知识精英相与讲求忠义，敦尚气节；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强调学用结合，经世致用；注重躬行实践，务实苦干。这些，就构成湖湘文化的主要精神特质。而湖南民风纯朴质直，刚劲强悍，吃苦耐劳，勇于从军。这些都构成湘军兴起与活动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条件。

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以及后期的刘坤一，如果计及它的前身楚勇，则还应包括江忠源。主要将领，则陆师有罗泽南、王鑫、塔齐布、刘长佑、鲍超、多隆阿、李续宾、李续宜、刘典、蒋益澧、刘松山、刘锦棠等；水师有杨载福（岳斌）、彭玉麟、黄翼升、李成谋等。这些人，都身经百战，坚忍不拔，在各自辖域为湘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同于绿营，也不同于其后的新军等，湘军的主要特点，概而言之有四：一是“书生领乡农”，以备受封建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子为将弁；二是以“礼”治军，“训”重于“练”，注重向官兵灌输忠君卫道、“辨等明威”和尊卑上下的封建礼法思想；三是“兵为将有”，先层层选将，后招兵，饷由帅筹，兵随将转，将由帅制，形成一种上下相维、各护其长的私人隶属关系；四是浓厚的地域性，统帅、主要将领和绝大部分士兵均为湖南人，在其初期，更主要为湘乡人。

湘军创建于1853年，其时距鸦片战争结束11年，距太平天国起义爆发2年，而与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同年。湘军组成后，于1854年开始出境作战，以其较高的战斗力和“扎硬寨、打死仗”的顽强作风，逐步取代处处不堪一击的绿营兵，成为清王朝的主要军事支柱。它先是以12年（含江忠源楚军为14年）的时间集中力量镇压清王朝的心腹之患太平天国起义，接着又参与镇压捻军和西南、西北各少数民族起义。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边疆危机的频频发生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湘军的对外职能逐步加强，成为清王朝的国防军，先后投入了收复新疆的战争、中法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湘军的地位逐渐为新军所取代。

## 湘军的历史影响

湘军在中国近代史上虽只存在了40余年，却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挽救了处于危亡边缘的清王朝，并使之出现了短暂的“同治中兴”局面。湘军首先是作为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起义的对立物，为着“救天下”与“保桑梓”而组建的，它全力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地人民起义，就使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暂免于被推翻的命运。在此过程中，清王朝也适时调整政策，重用和依靠湘军与湘军集团，改善满汉关系，并着手“师夷长技”，发展经济文化等，从而使政权又获得相对稳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同治中兴”，实际上属于清王朝在覆亡前的回光返照。

第二，促使晚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开创了督抚专政的局面。清初确立的政治体制，中央设有内阁、六部，地方设总督、巡抚，均直隶于皇帝。总督、巡抚在所辖地方虽拥有重权，但其下另设有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号称两司。两司首脑都不是督抚的属官，只是在名义上受督抚督率。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直属于吏部与户部；按察使主管一省的检察与司法，直属于刑部，他们均只听命于部臣。这就在体制上确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到湘军时代，便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因在于，此时的清王朝，经制之军绿营已是残破不能复用，部库复陷于空虚困竭，兵、饷两缺，不能不依靠湘军支撑危局，依靠督抚就地筹饷；而湘军将帅们，不仅手中牢牢掌握着兵权，无可摇撼，而且不少人实际已经跻身于督抚的行列。据统计，仅1860—1864年间，湘军集团头目就有21人先后担任督抚，其中1864年夏湘军鼎盛时期，其头目任总督者达6人，任巡抚者达8人，分布于13个行省。而当时全国总共才18个行省（东北、青海、西藏、新疆尚未设省），湘军集团竟控制了行省总数的72%！且这时的督抚，已完全不同于昔日受两司牵制、完全由中央控制的督抚了，他们凭藉手中的兵权，把持包揽地方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等各项大权，首先将两司降为自己的属官，任意易置。这样，就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而且愈演愈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至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督抚纷纷独立，清王朝无力无权，一筹莫展，很快就覆亡了。

第三，实现了晚清军事体制的第一次变革，开创了近代兵为将有的恶劣先例。清王朝的经制之军原为绿营。绿营为世兵制，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士兵登于名册，家口著于兵籍，兵部可以稽核；将弁由兵部铨选调补，军饷则由户部拨给。军权集于中央，这一原则本来无可非议，但绿营在具体操作上，也存在许多缺陷，如运掉不灵、营制不严、兵饷偏低、技战术落后等，随着清王朝的衰败，绿营也腐败不堪，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湘军则一反绿营所为，“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改世兵制为募兵制，变军权集于中央成兵为将有，将受帅制。其组军原则是，先择将，后募兵；将必亲选，兵必自招，将弁层层递选，大帅选统领，统领选营官，营官选哨弁，哨弁选什长，再由什长招





募勇丁，以期达到“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勇丁则“必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考晚清军制，大体经历过两次变革，即由绿营制度到湘军制度，再由湘军制度到新军制度。湘军制度属第一次变革。湘军取代绿营，虽然暂时起到了挽救清王朝危亡的作用，但其兵为将有的制度，却在往后历史发展中屡屡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从清末的督抚专权，到袁世凯的逼宫和窃位，再到其后的军阀割据，都是明显的例证。

第四，举办“洋务”，迈出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步。湘系经世派的思想家魏源睁眼看世界，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响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在其后20年内，并无人付诸实现。开始将这一光辉思想付诸实践的，是一批湘军将帅们，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湘军将领（李鸿章原也属湘军，并且淮军也是按湘军制度建立的），为着有效地镇压人民起义，实现富国强兵理想，也为着抵抗外侮的需要，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30余年间，陆续建立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兴学堂、译西书、派留学、派运动。洋务运动具有两重性，其领袖们主观上有着对付人民起义的一面，并且存在着对外来侵略者的妥协性，但其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经济文化等，则客观上迈出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步。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两位杰出的外交家，就是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和继之出任驻外使节的曾纪泽。

第五，抵抗外来侵略，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首先表现在“湖湘子弟满天山”，左宗棠督师收复新疆的战争。这是功在国家，功在民族，功在千秋的伟业。在中法战争中，湘军将士也取得了淡水、镇南关、谅山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湘军将士在极其不利的状况下浴血苦战，虽然失败了，但表现了对外来侵略者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以致到1902年湖湘青年志士杨度作《湖南少年歌》，仍然自豪地写道：“若道中华国可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第六，促进了绅权势力的膨胀和哥老会的兴起。这点从上下两个层面反映了晚清基层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绅士是介于官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由退职官僚、拥有功名尚未仕的士子、获得军功的还乡人员和湘军遣散后回籍的众多中下级军官等组成，属于基层社会的上层，拥有掌理社务、武断乡曲和勾通上层社会的权力。哥老会则主要由社会最底层的无业游民所组成，而游民阶层的扩大显然与湘军遣散后大量勇丁与下级军官的投入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这两种势力的膨胀和发展，都构成晚清社会愈加动荡和不安定的因素。

此外，湘军对其家乡湖南的影响尤为巨大而深远。它造就了近代湖南第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并由此开创了往后湖南人才辈出的局面。它使湖南在全国

的地位急剧升高，由此“名闻天下”。它使湖南志士生发出无比的自豪感，湖南士风民气由此更为激扬。愈来愈多的湖南志士关心国事，以天下为己任，身体力行，忘我奋斗。至于湖南成为全国绅权势力最发达的省份，也是哥老会势力最活跃的地区，造成社会持续动荡不安，阶级斗争一直十分激烈，等等。这里就不再展开论述了。

（作者系本馆馆员）





# 邓湘皋为湘学复兴之导师

## ——兼论近代湖湘文化

弘　征

这个称号是近代维新派领袖、国学大师梁启超给封的。他在《说方志》中说：“邓湘皋为湘学复兴之导师，於湖南文献搜罗最博，以独力私撰道光《宝庆府志》、《武冈州志》，最称精审。”（《饮冰室合集》之四十一）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一再提及，如“……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进一步肯定了他在湘学中的地位。

邓湘皋（1778—1851）何许人也？先抄一段曾国藩写的《邓湘皋先生墓表》：“先生，新化邓氏，讳显鹤，字子立。晚岁学成，远近称湘皋先生。”《清史稿》卷四八六、《清史列传》卷七三《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四皆有传，称其“笃于内行，博涉群书，足迹中天下”，“客游四方，所至倾动”，“凡海内荐绅大夫、才俊士，多慕与为友。时因事至长沙，治旁舍舍客。造请诗文者日相踵，悉能副其所求。岿然称楚南文献者垂三十年。”曾国藩在《墓表》中更是洋洋洒洒，充满感情。如谓“阐扬先进，奖宠后进。知之惟恐不尽，传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门庭日广，而纂述亦独多。诗歌所不能表者，益为古文辞以彰显之。其于湖南文献，搜讨尤勤。如饥渴之于食饮，如有大谴随其后而为之者……”这篇《墓表》写得声情并茂，在曾的古文中亦属上乘，已被王先谦选入《续古文辞类纂》。

从以上简略的摘引中，我们对这位乡贤已经有了个轮廓的认识。他不仅是一位大诗人，如陶澍在《南村草堂诗抄序》中所说的：“湘皋之诗，导源於魏晋而驰骋于唐宋诸老之场。雄厚峻洁，磅礴沉郁，情深而意远，气盛而才大。”他不仅是一位古文大家，仅在王先谦编的《续古文辞类纂》中就选了七篇，更主要如姚莹在《南村草堂文抄序》里所说的：“湘皋以诗鸣湖湘南北数十年矣！乃其用心尤在访罗遗佚，表彰文献。以为吾楚人也，宜先其近者。世传《楚宝》一书，病其不实不备，乃穷二十年之功搜求考订，以求其实而补其遗。

……更求沅湘人诗选而集之，曰《沅湘耆旧集》。是二书者，岂非楚中文献之大观哉！……其大者莫如表彰衡阳王先生久晦之书，与顾（炎武）黄（宗羲）诸老并列；辑欧阳文公《圭斋全集》，与庐陵并行；编订《周子全书》，与《二程遗书》、《朱子全书》同垂天壤；其所为《宝庆府志》先民、遗民、从臣、迁客及胜朝耆旧诸传，尤多可歌可泣，为史所遗之人。盖楚故也，而天下之大文系焉。论者方之全谢山《鲒埼亭集》，旨哉，可谓知湘皋矣。”

邓湘皋整理乡邦文献的重大功绩之一是首刊《船山遗书》。这是他早就“慨然发愤，思购求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的宿愿，只是“以是强聒于人，无应者”，后来得知船山六世孙承全家藏有各种遗稿，“不敢出以问世”，欧阳兆熊乃“与邓湘皋年丈捐资怂恿出版，由邓亲自主持编校，次年春，遂开雕於长沙”。（以上引文分别见邓湘皋《船山著作目录》和欧阳兆熊《榾柮谈屑》）这是船山遗书第一次得以大规模出版。王先谦在将邓所作列于《遗书》卷首的《船山著作目录》选入《续古文辞类纂》，笺云：“今者船山先生竟与顾黄两先生同垂不朽，刊书之功不可没。”曾国藩在《墓表》中云：“衡阳王夫之，明季遗老，《国史儒林传》列于册首，而邦人罕能举其姓名，乃旁求遗书，得五十余种，为校刻百八十卷。……将非长逝者之所托命耶？何其厚也！”后来原板毁于战火，曾国藩、国荃兄弟乃在这基础增补重刊，也是由欧阳兆熊经理。

《沅湘耆旧集》是邓湘皋在历时二十余载辑成《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并由两江总督陶澍出资在南京刻行之后，“已，念全楚之大，非一过所能赅。自湖外诸郡分隶湖南布政，其间巨儒硕彦，通人谊士，断璧零圭，湮霾何限！文采不曜，幽光永沉，此亦阙于采录之罪也。因发愤推广，展转搜索……起自洪（武）永（乐），至自近日，凡得一千六百九十九人，诗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首，厘为二百卷”的一部诗歌总集。与此同时，又“爰就儿于琮（也是一位举人）积年所拾掇，详为审次编次，自元至汉魏六朝，共若干卷（实为四十卷），名为《沅湘耆旧集前编》”（以上皆引自邓湘皋：《沅湘耆旧集·叙》）上下两千年，计诗人 2 029 家，诗 19 110 首。综观全国，尚未闻哪个省有这样全的。

重要的还不仅此一部规模宏大的历代湖湘诗选，更在其“以诗存人，亦以人存诗”，实以诗存史。而“征考文献，意在表章，知人论事，无嫌详尽”。于“集中各传，为之详细辨正，不惜补《四库》之遗，纠正史之谬。”（引同上）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及此书时所说的：“其宗旨皆在钩沉搜逸，以备为贵，益征文而征献之意亦寓焉。”“诗文之征，耆旧之录，则亦其一工具而已。”

梁启超的后一段话是接着“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之后说的，点出





了邓湘皋不是为选诗而选诗，而是另有更深的用意。考邓湘皋生当乾嘉道之际，前明的文献因畏于文字狱而大多湮灭，特别是湖南乃南明永历的根据地，“其毅然殉白刃蹈沟壑者，不可胜数。迨殊世久远，尺笺寸楮，多随水火劫夺以佚，若灭若没，委同草莽。”（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邓湘皋先生事略》）独邓湘皋以极力表章前明忠烈为己任，在编纂《沅湘耆旧集》时，特别重视搜集王夫之、夏汝弼、潘应斗、方以智、郭都贤、陶汝鼐、邓祥麟、一念和尚等明末遗民、忠烈以及诸如雍正十年因吕留良案而同日被杀的车鼎丰、鼎贲兄弟诗，并饱含赞佩之情为之立传。这些，都成了后来修省、府、县志的重要资料来源，近如 1994 年新出版的《湖南通史·古代卷》便多征引。而在搜集这些佚作的过程中，他历尽了千辛万苦，“偶得片语，如得异珍，惊喜狂拜，至于泣下”。（邓湘皋：《沅湘耆旧集·叙》）因此，当书一刊成，即誉满天下，如魏源在见到后即致函云：“全书网罗百代，体大思精。不朽胜业，无以复加矣。”（《魏源集·致邓显鹤》，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与此同时，他又撰《明季湖南殉节诸人传略》二卷，《召伯祠从祀诸人录》一卷，《朱子五忠祠传略考正》一卷，《五忠祠续传》一卷，《明季湖南十三镇考略》一卷，《邵州先民录》一卷，等等。“至议建会城前后五忠祠及邵州前后五忠祠，尤欲举贞臣烈士为邦人劝，俾各动其忠义之心，用意尤深且远焉。”（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邓湘皋先生事略》）

《楚宝》是明季湘潭周圣楷著的一部多辑有自《左传》、《战国策》各种典籍中有关楚史的书，以评价人物为主，兼及山川名胜。邓湘皋以其“集古今人物勒为一编，其势不能无漏；拾蠹简于古籍散佚之余，其事不能无舛。”（裕泰：《楚宝增辑考异序》）下决心重新编撰。一是对原书所遗漏或不及见的历史人物，特别是明末遗民，广为搜集，进行增辑，如《王夫之》即是其中之一。二是匡谬，即如邓湘皋在《例言》所自述的，“审其字画伪舛灼然无疑者，即为更正；其有错迕不相条贯，未敢率尔涂改，于每卷末附《考异》一卷，随条札记，以便省览”。时人早就评价其“去取慎详，于地理废置沿革，尤多辨晰。所论断皆有依据，足补前书所未及”。充分体现了一位大学者关心楚故，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由于他又是一位大文学家，所作虽属史乘亦文辞焕灿，如《书熊襄愍传后》便被选入了《续古文辞类纂》。

曾国藩在《墓表》中说邓湘皋“自甫掇科名，即已厌薄仕进”，所以他一生只任过一个县的学官；但又如时任两江总督陶澍在《南村草堂诗抄序》中所说的：“湘皋抱负奇伟，慷慨尚气，卓然思有所建白。”在“所交际多一时贤人大君子”中，除了他出色的诗文让他们倾服外，恐怕更主要是因其“煌煌经世平生志，出处须为天下计”的襟抱，与当时一批亟思有作为的大员们同声相

应，同气相求。湖南的一些封疆大吏如陶澍、唐仲冕、贺长龄、李星沅等与之交谊甚深，何绍基、左宗棠、魏源、郭嵩焘等人是皆从问学的晚辈，当时也未身居高位，在此皆不论了，只略举外省的林则徐与姚莹。

林则徐（1785—1850）与邓湘皋于嘉庆九年异地同时中举，因此互称同年。两人在江苏就成为好友。林曾为邓的祖父《松堂读书图》题了一首古风，林任湖广总督时，也出其祖父的《旸谷先生饲鹤图》三轴请邓题诗四首。邓的儿子琮、侄瑶将赴京应试，林还先寄川资，后来往拜谒时又有厚赠。当邓以七十一岁高龄来到长沙与诸友相聚，喜闻林则徐已由新疆赐环入关，即在《后长沙秋感十首》之五中写道："此生久分入山深，结习难忘尚苦吟。壮岁那无经世志，衰年空有济时心。逢卜孤愤言何益，回首中原思不禁。多谢入关班定远，疮痍满眼要为霖。"篇末有自注云："时少穆旧帅已入关，旦夕中当大用。公在关外，见湘人辄蒙问讯也。"全诗既是自嗟更是对林的热情赞美，可知"经世志"、"济时心"乃是他一生的抱负，两人的交谊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姚莹（1785—1853），字石甫，是桐城派古文开创者姚鼐的从孙，自幼由鼐亲授古文义法。邓湘皋早年应陶澍之邀赴皖主修《安徽省志·艺文志》时即两人交好，唱和甚多。中英鸦片战争期间，他任台湾兵备道，会同总兵达洪阿整饬海防，严阵以待，五次击退来犯英军，并一再上书反对琦善撤除海防，力主抗战到底。因此，当1842年8月清廷与英国签订辱国的南京条约时，受到英国代表璞鼎查的诬陷免官。邓闻知后极为愤慨，于《后长沙秋感十首》之四写道："涨海连年苦用兵，沿边列戍少坚城。波光荡日朝无色，蜃气浮空夜有声。稍喜偏师能杀敌，似闻公论狃输成。书生两耳如棉塞，独为孤军抱不平！"篇末亦有注云："英夷犯台，石甫擒斩黑白夷最夥，竟以是被逮。"之后，在《得石甫扬州书兼惠近刻，时已奉旨起用矣，喜而有作》之一有云："贾生痛哭救时策，管子羞称定霸才。相隔三千余里路，俄惊二十五年来。著书已遍地中海（石甫所著书，言地中海四天下甚详，多在魏默深《海国图志》未出之先——原注），阅世真探劫底灰。老我闭门闻见断，双眸今忽为君开。"不仅始终关心老友，也十分赞赏他的著作是开了让国人了解世界形势的先河。

不独如此，当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廷屈辱求和而告终，邓湘皋在《与人言洋事及资遣流民论》（见《南村草堂文抄》）中更是表示了极其强烈的义愤，质问"桓桓诸帅，时势至此，毕竟作何勾当？"并直接谴责了道光皇帝："竭缯币以奉强敌，此南宋偏安小弱，苟延旦夕，无可如何之覆辙！不谓煌煌天朝，据中国全胜之势，甘自蹈之，捐百万之金钱以资逆寇！"字字皆掷地有声，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更不是人人都敢这样说的。

邓湘皋曾任宁乡训导兼长沙府教授十三年，又先后出任常德府学朗江书院





和宝庆府学濂溪书院山长，至1851年在濂溪书院去世，堪称鞠躬尽瘁在教育的岗位上。《清史列传》称"平生尤笃风义，喜振拔孤寒"。但他从未以"湘学复兴为导师"自命，也未标榜要建立一个"沅湘学派"，这些，都是那位于邓逝世四十六年后来长沙时务学堂任中学总教习的梁启超，就其在湖南学界中所赞成的影响而总结出来的。实际上，在梁之前，邓湘皋在这方面已经是众口交誉了，具有代表性的评论可举出现在大家都很称佩的郭嵩焘。

郭嵩焘（1818—1891）比邓要小四十岁，早年就因为"自湖以南言诗文宗邓氏，尤称邓氏家法为不可及……以是得尽交邓氏兄弟（邓湘皋子琳、琮、侄瑶、瑔——本文作者注）。""乙巳（1845）冬"，亦即他中举八年之后，还专程去新化，"谒湘皋先生于所居南村草堂"。可知邓的思想、道德、诗文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他在诗文中论及邓湘皋之处甚多，而且十分深刻。如在《冯树堂六十寿序》中说："兴国陈秋门给谏尝语嵩焘：'楚北人才不足与方楚以南，有由然矣。南士游京师者，类能任事，务实行，以文章气节相高。人心尚如此，欲无兴，得乎？'嵩焘曰：'道光之季，新化邓湘皋先生表章吾楚先贤节烈，闻者感奋以兴，树堂首倡以节义名立京师。邓先生以文，树堂以行，率行楚人，扬其风，士人翕然宗之，不尤烈与！'"而在1873年写的《罗研生七十寿序》中就说得更加透彻了："曩者道光之季，新化邓湘皋先生为《沅湘耆旧集》，论述明季遗老义烈事尤详。大儒若船山王氏，亦至是始显。其后粤寇起，太傅曾文正公倡义旅东南，云集景从，震动天下，论者以为邓先生实兆其机于十数年前。"（以上均引自《郭嵩焘诗文集》，1984年岳麓书社版）直接将曾国藩的成功与邓挂钩。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曾国藩的战胜太平军是按照邓在生前筹划，曾的后来"肆行斩刹"更必不为邓所赞同，（《国朝先正事略》本传云："先生嗜善，其天性。"）太平天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咎由自取。郭嵩焘这位曾国藩的儿女亲家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邓湘皋在此前所极力倡导的"经世志"、"务实行"、"以文章气节相高"所形成的新湘学学风，影响了一大批有志之士，为曾国藩后来的创建湘军准备了有利条件。此后，随着又有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黄兴、谭人凤、宋教仁、蔡锷等一大批志士的涌现，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时，首批会员中湖南人就接近占了一半，邓湘皋的家乡新化，更是被誉为"同盟会员荟萃之乡"，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震动了全国。

近十数年来，"湖湘文化"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只是在前一时期，研究者多承前贤"学案"的遗绪，注意力集中在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衡山聚徒，又南宋朱熹、张栻来长沙讲学，因而理学大张，由此衍生出一个"湖湘学派"。开出一长串名单，凡各个时期湘人治经者皆是当然代表。总之，"湘学"即是

程朱理学的一支，也似乎将“文化”和”学派”并为一谈了。

本来，自宋明理学盛行天下，学者们多专心探讨理义的哲学命题，科举更引导读书人沉溺于《四书》章句，虽然有“学派”各标门户，但却无显著的区域文化内涵。胡安国、胡宏是二程的再传弟子，朱熹乃集二程之大成，论传承皆属于“湘水余波”，“湖湘学派”或“湘学”的奠基人自然更应该是理学的鼻祖周敦颐了。

如果作为一种有区域特征的历史现象，则湖湘文化本来源远流长，楚文化的底蕴十分深厚。地多山岳丘陵，多民族的民风强悍，曾经被称作“南蛮”。屈原的哀民忧国，美人香草之遗，更是一层不可忽视的精神土壤。文化是积累的，自然不能割断传统；文化是发展的，区域文化正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才焕发出自身特异的光辉。现在大家基本上形成共识，“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实际上，“经世”之学亦古已有之，更非一地区所固有或独有；近世之所以成为主流话题，自有它特别的原因。那就是自清嘉道以来，读书人在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下，反思国家何以积弱如此，率先追求要救国拯民。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的：“……清初的几位大师——实则残明遗老——王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年间，大家熟视无睹……他们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能令学者们对二百多年来的汉家门户之争得到一种解放……痛恨八股之汩没人材，到这时候读起来句句有味。”而处于同样的时代，经世致用独成为湖湘文化的主体精神，并涌现出了一拨又一拨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除了离不开楚文化的长期孕育和其他传统文化的融注，更主要是在湖南这片土地上，如前已述及的，自明末清初以来政治斗争就十分激烈，“其毅然殉白刃蹈沟壑者不可胜数”。而遗民们“当运去物故之后，彷徨徙倚于残山剩水之间，悲鸣长号，若无所存其身者”。(邓湘皋：道光《宝庆府志·遗民传》)忧国忧民，发愤为学，出现了王船山这样的大思想家。这时，他的著作已经全面传播开来，影响十分巨大。特别是《宋论》、《读通鉴论》更成为两座光芒四射的灯塔。自邓湘皋在生前谋建王船山专祠未果，后曾国藩诸人皆“岂伊不思”。郭嵩焘在同治五年被黜回湖，主讲长沙城南书院，便发起修建王船山祠，作《船山祠碑记》，完成了邓的心愿。复出后又专折上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以及会同湖湘人士连续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彭玉麟则主持在衡阳大兴土木，改建刚兴办不久的船山书院，并上奏《改建船山书院片》，请将旧址以作祀祠。从与邓湘皋早年即交好的陶澍到唐鉴、魏源、邹汉勋、何绍基、罗汝怀、王闿运、贺长龄兄弟、左宗棠兄弟、曾国藩兄弟、郭嵩焘兄弟及后来的谭嗣同等湖湘学界名人，无不以张扬船山学说为己任，“湘学”顿时成了全国瞩目的中心。至若贺长龄之延请魏源编《皇朝





经世文编》，一所当时在全国堪称最新式的全省最高学府时务学堂在长沙兴办，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湖南事事开全国风气之先。随后，有谭嗣同在戊戌慷慨成仁，唐才常创“自立军”失败而坦然就义，陈天华著《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并在东京蹈海以唤醒国人，举国对湖南人更是要刮目相看了。

章太炎在《重刊船山遗书序》中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言而已矣。”诚然，他在此所说的“光复”实含“排满”之意，但主旨则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振兴，这是近代“湖湘文化”或称“湘学”之所以特别辉煌的本体，王船山正是它的奠基人，梁启超之称“邓湘皋为湘学复兴之导师”亦是不言而喻了。

(作者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

# 左宗棠平议

刘泱泱

根据实事求是的总体要求，我认为，要正确评价左宗棠，从具体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上，有三点是必须明确和坚持的：首先，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历史人物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并在一定历史时代中发挥作用。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当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正如列宁所教导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价左宗棠，必须紧密结合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条件，考察他对当时社会各项重大事件的态度和作为，具体地如实地分析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必须坚持全面分析的原则。社会历史条件是复杂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也是复杂的：既有各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又有各个方面的不同表现。评价左宗棠，不能片面强调其中任何一个阶段、一个方面，而置其他阶段、方面于不顾。必须全面分析，多方考察，才不致失之偏颇。第三，必须坚持看主流、看发展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社会诸种矛盾中，必有一种为主要矛盾，社会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由于主要矛盾的发展，各个历史阶段常表现出一定的发展趋向和社会潮流。一个人的一生也有其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的方面，并表现出基本的发展趋势。评价左宗棠，不仅要全面分析其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的表现，尤其要找出其中的主流方面和发展趋势，考察他在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发展中的表现和作用，看他是否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下面，就根据这些原则，对左宗棠的一生作些综合的考察，以便作出较为实事求是的全面公允的评价。

左宗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或过渡的风雷激荡的时代。在他生活的70余年中，国家发生发展着六个主要方面的重大社会变迁，即：一、封建经济的危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末世。在经济方面，主要标志有两条：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逐步破坏着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为特征的自给自足





的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二是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二、清王朝的衰败。处于封建末世的清王朝，在经历了著名的"康乾盛世"之后，迅速走向衰落，经济凋敝，流民问题日益严重，吏治腐败，仕风日下。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继1796—1804年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之后，又发生了1813年河南、直隶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起义人员曾一度潜入北京，对清皇宫发起武装袭击，全国震动。在左宗棠的家乡湖南，以天地会为代表，反清斗争更是日趋频繁：1832年江华等地瑶民赵金龙起义，1836年新宁等地蓝正樽起义，1844年耒阳大鹏起义，1847年新宁瑶民雷再浩起义，1849年新宁李元发起义。随后便是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人民起义特别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四、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开初，资本主义列强的工业品受到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和清王朝闭关政策的顽强抗拒，于是它们便无耻地向中国输入另一种特殊商品——鸦片烟毒，严重地危及清王朝的两大支柱——军队和财源；当清王朝决心禁烟时，它们便公然诉诸武力，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终左宗棠逝世之年，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向中国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3—1885)，同时，沙俄逐步蚕食和强占我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英、俄支持的西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匪帮又侵入我国新疆。国家四境告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五、社会思潮的转向。原先长期统治中国思想界的宋学和汉学已日趋空虚和烦琐，严重脱离实际，无补时弊。不少士子力图在学术上寻找新的出路，因而高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他们猛烈抨击宋学的空虚和汉学的烦琐，深刻揭露封建末世的黑暗和清王朝的腐败，热切提倡政治与经济改革，积极从事边疆史地和世界史地研究，坚决主张抵抗外来侵略，同时开始呼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股劲势的"经世致用"思潮，成为其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化演进的一个思想中介。六、洋务运动的兴起。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刺激下，在经世致用思潮的推动下，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某些分化：一部分人继续抱残守缺，抗拒任何改革，成为顽固派；另一部分人则适应时局的变化，主张举办"洋务"，学习西方国家某些长处以求"自救"，史称"洋务派"。在"洋务派"官僚的影响、推动或主持下，开展了长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开初主要是以"自强"为标榜的练兵制器活动，创办了许多军事企业；继后则在"求富"的旗号下，重点转向兴办民用的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洋务运动"的主旨虽在挽救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但在客观上却启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面对当时时代和社会的这些重大变迁或重大历史事件，左宗棠的态度怎

样？他是如何作为的？结果又如何？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切实把握的。通过对左宗棠的生平和思想的全面了解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相应的图景：首先，左宗棠在经济思想上，重农而不轻商，他主张“护商”、“利商”，保护和发展商品经济，特别是他在晚年，主张商办厂矿企业，扶持私人资本，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左宗棠对清王朝政治的腐败不满，任职期间，所至之处，大力整饬军政、吏治，反腐倡廉，除弊兴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第三，左宗棠中年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西捻军，随后又统兵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在这方面，他有着历史的负面作用。但是他镇压人民起义，经历了一个由帮凶到祸首，官职和影响由小到大的过程，其地位和作用同曾国藩有所区别；同时，他虽然镇压人民起义是坚决的，而善后抚辑工作又是卓有成效的，在赈济抚恤、敦教劝学、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第四，左宗棠一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毕生致力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早年就关注国事，在鸦片战争期间为反侵略战争筹谋；继后挥戈西征，经武东南，塞防、海防并重，始终与侵略者相周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特别是他督师西征讨伐英俄支持的浩罕入侵者阿古柏匪帮，并以武力支持对俄伊犁谈判，收复新疆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失地，为国家民族立下了千秋不朽的功业。第五，左宗棠早年深受贺长龄兄弟、陶澍、林则徐、魏源等的思想影响，是“经世致用”思潮的崇奉者。他饱读“有用之书”，特别在舆地学、兵学、农学以及洋务之学等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为他往后外抗侵略、内事建设作了学识上的准备。第六，左宗棠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者之一，建树颇多，影响深远。他在洋务运动中独树一帜，主要着眼于“策富强之效”，抵抗外来侵略，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主张“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总之，左宗棠在上述六个方面中，镇压农民起义，扮演了历史的反面角色；但是在发展经济、整饬吏治、抵抗侵略、端正学风、举办洋务等多方面，则都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并卓有贡献。他显然不同于当时一般顽固守旧的官僚，确实比他的前辈们提供了新的东西。他不失为当时统治集团中较有远见的人物，是地主阶级中颇有作为的爱国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起过不容低估的积极作用。

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活动的时间较长。他一生度过了 73 年。如果自 1852 年（咸丰二年）进入湖南巡抚幕府算起，他的政治生涯也有 33 年。他确是由镇压人民起义起家的。从 1852 年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开始，到 1873 年统兵平定陕甘回民起义止，他镇压人民起义共经历了 21 年，占了他全部政治活动时间的将近 2/3，罪过不能不说是严重的。这正是不少论者否定左宗棠的主要原因和主要依据。但是，左宗棠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在镇压人民起义。大体说来，左宗棠一生的活动，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





一、镇压人民起义；二、反抗侵略、收复新疆；三、举办洋务；四、表现于除弊兴利、整饬吏治、处理善后、新疆建省、台湾改制等的政治社会改革。左宗棠镇压人民起义的时间虽长，但反抗侵略更是贯彻了他生平事业的始终。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他尚无一官半职，不过是一个僻处山乡的私塾教师，就已经在为抗英战争筹谋了。即使在镇压人民起义期间，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天津教案交涉时，他也是坚持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尔后，他督师西征，讨伐入侵的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失地，功勋卓著。晚年南下抗法，反对妥协议和，临终仍以未能对侵略者“大伸挞伐，张我国威”为憾。左宗棠举办洋务和进行各项政治社会改革，贯穿于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而又远远延伸于镇压人民起义之后。在临终《遗折》中，他还关心“海军”及“铁路、矿务、船炮各政”，以“策富强之效”。尤希望最高统治者努力学习，勤理政事；“日近正人，广纳谠论”；整理财政，以“充军食”、“济时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他所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总局等军事、民用企业，有益于国计民生，有益于国家经济、军事、社会的近代化。他大力筹划新疆建省，又促成台湾建省，加强“塞防”、“海防”建设等，对于加强国防，维护祖国统一，也有着重大意义。因而，全面来看，左宗棠镇压人民起义，罪过是严重的；他反抗侵略、收复新疆、举办洋务、推动国家经济近代化、进行政治社会改革、促成新疆和台湾建省等，贡献尤其是巨大的。可以说，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功、过两方面都很突出，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代替或掩盖另一方面。不能因为他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西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就将他说成“反动派”、“汉奸”、“刽子手”或“屠夫”，与曾国藩、李鸿章为“一丘之貉”，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因为他反抗侵略、收复新疆和举办洋务、推进政治社会改革等，而笼统地誉之为“民族英雄”、“改革者”，只谈其爱国、进步作用，绝对化地一味颂扬。任何只抓住一面而给予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左宗棠的历史本来面貌。

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尤以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为最主要的矛盾。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反抗外来侵略，求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二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近代化，求得国家的富强和民主。评价左宗棠，不仅要全面分析他在各个阶段、各个方面的表现，尤其要在此基础上，抓住他生平活动的主流方面和发展趋势，看他在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中的表现，看他在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态度和作为，看他是否在总体上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的判断。如前所述，左宗棠一贯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特别是督师西征，收复新疆辽阔领土，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功在国家，功在民族，功在后世；为了反抗侵略，他适时调整民族政策，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在中法战争期间，他甚至将曾经反清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称为“义士”，倚为抗法的力量；他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积极发展经济，举办洋务，加强国防，反对腐败，奋斗终生。这些，显然构成了左宗棠生平事业的主流，也表现了他一生的基本发展趋向。他的主流是好的，是一贯爱国并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晚节也是好的。

总而言之，左宗棠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地主阶级爱国者。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他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其他人民起义；作为爱国者，他又一贯反对外来侵略，为谋求祖国的独立、富强，推进国家社会近代化，奋斗终生，特别是收复新疆，功垂奕世。他有功有过，功远大于过。他是一位在近代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并在总体上顺应了历史潮流发展的人物。从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需要出发，从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出发，对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该予以高度的肯定。

（作者系本馆馆员）





# 从黎氏八俊看湖湘文化精神

彭文忠

湖南近现代人才辈出，“黎氏八俊”即为其中人才奇观之一。“黎氏八俊”即中国现代湖湘八位黎姓同胞兄弟的合称。兄弟八人在国内外个个均卓有成就，在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和科学界影响较大。老大黎锦熙是著名语言文学家、教育家，老二黎锦晖和老七黎锦光是音乐家，老三黎锦曜是矿冶学家，老四黎锦纾是教育家，老五黎锦炯是铁道和桥梁专家，老六黎锦明和老八黎锦扬是作家。黎氏满门俊彦有其家庭因素的影响，也是近现代中西文化风云际会下湖湘文化发展的产物。近现代湖湘文化在“黎氏八俊”身上，我们能够鲜明地看到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兼容并收、经世致用、主新求变。这种精神特质使“黎氏八俊”这样的大批优秀湖湘士人在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变局中，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现实，切实认识中西文化的差距，审时度势，务实求变，以兼容开放的姿态，不断吸收中外优秀的文化成果，这也是湖湘文化之所以流光溢彩、绚丽夺目的重要原因。

## 一、兼容并收、中西融会

湖南北阻大湖，东南西三面环山，早期的湖南，既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等沿海地区很少往来。鸦片战争以前湖南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文化不发达的地方，遂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很不容易接受外界思想的影响。由于落后、保守和闭塞，封建主义在这里比沿海省份有着更深的基础。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华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湖南成了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要冲，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和湖南首当其冲。湖南落后与闭塞的局面被打破了，并成了新旧斗争最尖锐的地方。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爆发，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开学会（南学会等）、兴学校（时务学堂）、办报纸（《湘报》、《湘学新报》），原来被顽固派看作“安静世界”的湖南，成了最富朝气的省份；“五四”运动后，湖南又成了新文化运动和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这种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和开放的社

会环境，使湖南成为有利于中西文化汇流的场所。近代以来，湖南成了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要冲，从而成为新旧思想撞击、中西文化融汇的场所，使湖南在思想解放、对外开放等方面走到了时代的前列，而且为产生这个时期中西文化融合的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黎氏八兄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在今湖南湘潭县中路铺镇菱角长塘村一个书香门第，其父黎松庵（1871—1952）是诗人、书法家，早年在家乡创办过罗山诗社、杉溪学校，著有《楹联大观》等，为齐白石好友。

黎松庵夫妇非常重视子女的培养教育。黎氏兄弟八人都从小启蒙读经，都受到扎实的传统文化教育。如黎锦熙四岁启蒙读经，十岁读完"十三经"；《昭明文选》也读完一半；诸子及唐宋文熟读数百篇；古今体诗读至万首。并进习"八股文"，每晚作一篇。十五岁考中秀才，在古文方面有很深的根基。黎锦晖三岁入私塾，开始诵读经学启蒙书籍，八岁已读完四书五经、经义书论和诗词，十岁曾参加科举。

20世纪初，新文化风起云涌，提倡民主、提倡西学、办实业、办教育的新风尚如清新空气弥漫神州大地。鉴于倾向欧美资产阶级结合自然科学的国民教育兴起，松庵先生认为应该让孩子们读些实用的西学，但又认为孩子们的知识基础仍然是中国的《四书》、《五经》。故特意设立了家庭学校——长塘杉溪学校，聘请了几位有秀才功名能掺用"新学"的教师，开设中西合璧课程，在讲授中国古籍《四书》、《五经》的基础上，也讲授算学、格致、博物、音乐和美术等新课。

黎氏八骏成才的家庭因素显然是不可忽略的。黎松庵夫妇对子女既严格要求，又不"控制"、"管制"得太死，而是放手让他们广泛地接触社会，接触新的知识，自由地阅读各种有益的书籍报刊，参加各种有益的课外活动，促使其身心健康地发展。较早离开家乡的老大黎锦熙常从外地寄来在北京、上海广为流传的新书刊，这些书刊或提倡儿童教育、传播新的知识，或揭露社会黑暗，鼓吹科学和进步，不仅开阔了弟弟们的视野，而且给他们以民主、自由和富国强兵的思想教育。

这里要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黎家似乎有一种提倡自学、自立、自强的家风。孩子稍大一点，就送出了家乡，各奔前程。黎氏八俊在青年时代都及时大胆地走出家乡、走出湖南、走向外界社会，这是他们走上成才之路的重要途径。

黎氏兄弟与同时期的很多青年人不同，他们在青少年阶段专门进入现代学校读过书，都接受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西学教育，走出家乡湘潭，接触了带有近现代色彩的种种新事物、新思想和新文化，加深了对世界的了解和对中国自





身的认识，颇有点得风气之先。如黎锦熙九岁时其父亲和塾师为了让他了解外面的世界，要求他读《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并要默画出五洲地图来；十二岁始看时务、洋务之类的书并自学算术、世界地理等；十七岁在当时"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考入北京铁路专修科，在课余学习研究社会学，主要书有《群学肄言》、《社会学通论》等。后因铁路专修科毁于火，回湘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1911年毕业。黎锦晖青少年时期先后在新式学堂如湘潭初级中学、长沙高师等处求学，也正是在这些地方，他开始接触西洋音乐理论，并开始音乐教育生涯。黎锦耀属湖南高等工业学校采矿冶金科毕业。黎锦炯则曾就读于唐山交通大学铁路及造桥工程系；黎锦纾青年时留学德国；黎锦明先后在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和北师大学习，接受了"进化论"思想，把大批杂志代课本——《新青年》、《新潮》、《东方》等，并有机会广泛接触欧美文学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而黎锦扬则于1940年从西南联大毕业，1944年赴美国留学，后毕业于耶鲁大学。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关系，黎氏兄弟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中西结合，融会贯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行为趋向来。如黎锦熙广采中西，熔铸古今，在西学的启发下大力进行汉语的革新和建设。20世纪初期，他受西洋文法研究新潮的启发，很快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句本位"的汉语语法科学体系和教学体系，同时，借鉴了美国《牛津英文大字典》的"另起炉灶"和"依史则"的编辑原则，着手编纂《中国大辞典》。在黎锦晖的音乐生涯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他成功地融合了较新的西方流行歌曲的某些特点，产生了中国通俗歌曲的创作手法；且融合了语言学的实践成果，产生了完美的词曲结合的审美范例。黎锦晖对于"五四"时期一些突出的做法，曾感慨说："那时的中国音乐家，均以西乐为正宗，唱中国歌就会被人笑话……。可以说，拿民族的东西也是斗争。"黎锦晖写作"家庭爱情歌曲"纯粹采用的是一种新的、从西方而来的形式，但他须臾未忘记发展我国民族音乐的决心，甚至坚持儿童必须学习民族音乐。"体用"之在黎锦晖心中，是现实关怀与时代精神的协调统一。黎锦晖先生作为一位在中国20世纪倚托传统、借鉴西方，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上从事音乐创作的音乐家，为后世的作曲家和音乐学家均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 二、经世致用、不喜空谈

湖湘文化源自楚文化，历经岁月风雨的洗礼，与时俱变，但通经致用、经国济世的传统一直未变。经世致用的传统概而言之，就是强调积极的面世态度，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即学以致用。以

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学风，十分注重引导人们走向实政、实用、实行的经邦济世之路，贵实践而耻空谈，主张通家国天下治安之计，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以天下为己任，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而不是只寄情于山水、埋头于经史，着笔于风花雪月，做到把研习经史和通晓时务结合起来。近现代湖湘人才的成长崛起，与此种精神养料的滋润不无关系。这也是黎氏八俊的另一个突出特点。

“黎氏八俊”的父亲黎松庵一生虽不入官场，清白自持，栖身田园，寄情山水。但他绝非遁世者，他热心于教育，办过“上湘五都”学校和杉溪学校，倾心培育后辈，寄望于他们个个成为国家栋梁，以体现他自身的人生价值。维新派提倡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派人出国留学等主张，黎松庵都为之行动，鼓励儿子为国家救亡图强而读书。长子黎锦熙于 1907 年考入北京铁路专科学校，只是次年该校毁于大火，才只好返乡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此后，他的第三和第五个儿子学习铁路和采矿专业。第四个儿子留学德国，第八个儿子留学美国。黎松庵确确实实顺应时代需要，将自己家庭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紧紧相联。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湘潭县各区纷纷办起农民协会，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黎松庵并不因出身地主而有所疑虑，而是热情投身于这场运动。他把家庭的房子腾出来供农会使用，又组织农民上夜校识字，宣传革命道理。抗战期间，他忧国忧民，写了不少爱国诗。他的孙子、当代作家黎白在《湘潭黎氏》一文中写道：“抗日战争爆发后，祖父黎松庵出书鼓励子女抗日。”

父亲的言传身教使得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之精神在黎氏八兄弟身上得以承传。黎氏八兄弟从事的事业各有不同，但多与社会民生紧密相关，并有着一份“士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的文化承诺。如黎锦熙作为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史志专家，可谓饱学之儒，却并不埋头于“子曰”、“诗云”，而是关注国家命运，渴望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黎老治学，目的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在他看来，中国人的最大福利就是普及教育；且“救国之路必振兴教育，而教育之振兴尤在于教育之普及，以开发民智”。黎锦熙从 1905 年起，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即推广普通话），发起国语运动，无不贯穿“就是要整理改良中国特有的语言，使它统一而易于普及”的思想。黎锦熙一生没有参加过多少实际的革命政治斗争，但在思想上，黎先生不由自主地受毛泽东这位学生的影响。我们只要看过黎锦熙多年珍藏，现已交由中央档案馆印行的毛泽东同志写给黎先生的几封信，就知道当年毛泽东同黎先生绝不是一般的师生和朋友关系，而是有“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交情。黎家的其他几位知识分子也并非固守书斋者，黎锦耀是我国早期的杰出的矿冶学家，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华矿学社主事和《中华矿学杂志》主编。抗战期间回湘潭，为发展家乡的采矿工业，曾花掉大量家产，在故乡开采盐矿、煤矿。黎锦纾是杰出的平民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武汉、中山大学教授。大革命失败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于促进全国平民教育和农村文化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即算是从事文艺工作的黎锦明、黎锦晖等人，也从不“为艺术而艺术”，往往将艺术追求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黎锦晖和他的黎氏兄弟一样，相同的传统情结凝聚成他们关心国事的政治情怀，对于接受外来文化资源的活跃性，也同样有一种道义责任的浪漫：“不懂一点社会科学的‘老粗’也明白‘肚里饥，身上冷凄凄，男中音高唱爱群爱国，一旁陪着妻哭儿啼，凭你的音乐怎样雄壮，到末了一样饿扁归西’。所以用极浅近的常识来断定，所谓‘音乐与国家民族之关系’，国富民强，音乐自然雄壮而快畅，若是国弱民贫，凭你请上六双莫扎特，一打贝多芬，苦于写不出‘治饿驱寒’的曲子，也是枉然。”黎锦晖非常注重新型少儿歌曲的社会作用，因为他看到了少年儿童歌曲与歌舞剧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它的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社会作用之中。所以，他认为应将新的时代精神以浅显易懂的少儿音乐的方式，融洽到他们的日常游戏与生活中。他在他的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的“卷头语”中提出“一切布景和化装，都要儿童们亲自出力，这个除开利用它采入手工、图画、卫生及一般作业的材料外，还可以锻炼他们思想清楚、处世敏捷的才能……”显然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以艺术的方式对社会民风进行改良与改造的文化观念。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德、智、体、美、劳”教育方针，在 20 世纪的初期就被黎锦晖付诸实践了。

作为文学家的黎锦明，从 20 世纪 10 年代中期走上文学道路始，一直关切地注视着社会的兴衰变化，湖湘文化中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社会干预意识促使黎锦明像他的众多前辈和同乡那样，从一个乡村青年成为一个以小说反映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的小说家。综观黎锦明的小说创作历程，从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后，就几乎一直没有放弃以自己的笔来实现其社会关怀的理想，表现出高度的社会干预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功利特征。20 世纪 10 年代中期反帝反封建思潮此起彼伏，刚到北京不久的黎锦明就抱着“进化社会”的理想融入现代社会文化更新的大潮。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为中国新文学献上了富有“五四”精神的十余篇小说。这些作品贯穿着进化社会、新化社会、强化社会必不可少的反帝爱国精神和反封建意识。《一个死者》、《小黄的末日》、《柿皮》、《一幅图画》、《晦》、《冯九先生的谷》等小说可以为代表。这类小说有的尖锐揭露封建卫道者的虚伪、腐朽和旧制度的非理、残酷；有的愤怒抨击殖民侵略者的肆行暴虐、滥杀无辜和民众的麻木不

仁；还有的描绘了中国农村兵匪焚祸、贫困凋敝的景象。这些作品无不反映出作者强烈的社会关怀精神，饱含着忧国忧民之情。大革命失败后，黎锦明的政治热情和社会关怀意识毫无退减。当文坛笼罩着悲观失望、徘徊退缩、消极颓唐时，不属于任何党团派别的黎锦明却无所顾忌地以激进的思想和激烈的言辞批判政治、揭露现实。他不仅参加了海陆丰地区农民运动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还在白色恐怖最甚时写出了具有现实主义开拓意义的中篇小说《尘影》。“九一八”战争爆发，黎锦明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入前线，广泛采访抗日官兵、民众，创作了歌颂上海军民抗击日军保卫国土的中篇小说《战烟》。抗战时期黎锦明仍坚持参加文化界的各种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写出了《赤峰之战》、《战士与武器》等讴歌“为守上海负责”、“将死亡博得胜利”的抗日勇士的作品，表现出高度的关心国家社稷、重视民族安危的爱国情怀。

## 三、主新反旧、不泥于古

近代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有两点：其一是思变。湖湘文化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都主张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弊端，必须变法改革。胡宏认为：“国家之政，必有坏乱不起之处，深知其处大变革之者其功大，小变革之者其功小，不变革者必沦胥以亡。”（《五峰集》）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都主张认清社会发展的总趋势，顺应和驾驭时代的潮流，顺时而动，遇机而发，如魏源等近代湖湘学者坚决冲破顽固派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强调只有变法才是出路，推动着湖湘文化的转型。其次是求新。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是从引进西学、西艺，兴办新式学堂和近代工业开始的。魏源是国内最早倡导改革开放、并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者，而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头目，则是以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实施“师夷长技”，他们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甲午海战以后到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倡导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建立以科学、民主为标志的近代型新文化，湖湘俊彦如黄兴、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

湖湘文化精神内涵中主新反旧、不泥于古、切于时务、为社会变革服务的显著特点亦早现在黎氏八俊身上。良好的家教，湖湘文化精神的传承，使黎氏兄弟都表现出接受新事物快，有着较新鲜活泼的思想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站在传统与现代契合点上，革故鼎新、永不停滞的行为特征。

如黎锦熙一生无论进行学术研究、教学实践，还是从事其他社会活动，都勇于创新，有所发明，与时俱进，不断开拓。他四岁启蒙读经，十五岁考中秀才，对古文有很深的根基。但到“五四”运动时，毅然跳出故纸堆，成为汉语





改革的骁将，反对小学读经，力倡“国语统一，言文一致”，是新文化运动中活跃的战将。最可宝贵的是，当他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时，能够自我解剖，修正错误，超越自我，而绝不固步自封。例如1924年他提出划分词类的标准是“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到三四十年代则订正为：“凡词‘依句辨品’是对的，又说‘离句无品’则是不对的。”20世纪50年代又进一步发展为“四级形态论”。至于那种已被学术界推崇的力著，每次重版时，他总是认真修订，乃至另起炉灶、从零开始的事例，决非鲜见。

黎锦晖的音乐生涯也很好地体现了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精神。他是现代新音乐创作与传播新模式的探索者，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早运用西方现代型的音乐市场运作模式的探索者，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艺术商业化体制的早期确立者。黎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在于他自觉地植根于传统，在此基础上，用新的思维、新的观念将这些传统的音乐材料去重新发展，使之成为富于时代感的新音乐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黎锦晖站在传统与现代契合点上的实践，为后来的作曲家和音乐学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这一点在黎锦明身上也有鲜明的表现。黎锦明可称作一个艺术的实验家。他似乎总是不肯安分，总是追新逐异，多方探索，在其小说创作中尝试运用了各种创作方法，构制上采用了各样的形式体制和不同的艺术手法，有着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在此可以其小说多姿多彩的形式体裁为例：黎锦明的小说有的采用书信体，如《献身者》、《萧条》；有的如诗化的散文一般，如《出阁》；而有的则近于剧本，场面单一，情节集中，几乎全是对话，如《无题的故事》。有的类乎绘画，或如同精细素描，或是简笔勾勒的速写，文笔省净而轻盈。在艺术手法的使用上，黎锦明的创作中既有对唐宋传奇以来特别是对《红楼梦》等小说中传统手法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现代小说手法的借鉴。比如其小说中精妙的心理刻画，除了运用传统的心理描写方法之外，《患心理病者》、《白里帆的疑症》还使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揭示人物心理。前者写患了结核病的女子对待男子的反复无常，表现她的绝望；后者写一公司经理内忧外患，无法处理又难以解脱，终于导致神经错乱，幻觉呓语，喘息不断，不能治愈的故事。皆通过人物精神的变态来分析深层心理，描写人性，达到了一般方法难以达到的效果。显然，黎锦明是一个不安于现状、不拘守一隅、不墨守成规、不满足已有成就的人。而不断追新逐异，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勇于创新，对于艺术来说，恰恰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这也是黎锦明乃至整个黎氏兄弟成功、近现代湖湘文化兴盛的重要因素。

（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中文系）

# 沈从文风雅拾遗

伏家芬

## 一

沈从文（1902.12.28—1988.5.10），湖南凤凰人。原名岳焕，字崇文，亦名茂林。幼年读私塾，后就读于凤凰二小。14岁从军。1923年到北京，先后在京师图书馆、北京大学自学、旁听。192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参与编辑《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到上海，编辑《红黑》杂志，参加新月社。1938年后历任西南联大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北京《经世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副刊主编。建国后，入华北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后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1978年调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沈氏是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第二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综其生平履历，有几个特点：其一，祖父沈洪富，汉族，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贵州提督，死后无子嗣，沈从文的父亲是由叔祖父同苗族女人生的，4岁后过继给他。沈从文的母亲姓黄，是一个土家族人。因此，沈从文一人身上继承了苗、汉、土家三个民族的血统。其二，他小学毕业，走出山乡，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他写的履历表“文化程度”栏里，一贯工整地填上“小学”二字。他一生的生命轨迹，美国金介甫博士概括为：一个青少年时代的兵士——一个作家——一个中国文物艺术史的学者。坎坷曲折，令人吃惊。其三，沈氏一生的沉浮荣辱，多亏了两位作家：他20岁到北京，衣食无着，写信向郁达夫求援。是郁接济扶持了他，并写了有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他指引道路，1924年底才发表第一篇作品，然后逐步蜚声文坛。他转业从事文物考古却多亏郭沫若。建国前夕，沈氏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载《大众文艺丛刊》第一期），指名道姓批判沈从文：“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后来，又在《洪波曲》中指斥沈氏为“无聊文人”。）接着，北大学生将它抄在大字报上，并写大幅标语，打倒：“清客文丐”、“地主阶级的弄臣”、“第三条路线的





沈从文”。1949年2月北京解放，群众欢呼雀跃，他却疑虑不安。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京召开，沈氏榜上无名，心情郁懑。家人埋怨他落后。在困惑中，他割腕自杀，获救。随后调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以上见：《中国知识分子悲欢录》，沈展云等编，花城出版社版；《人有病、天知否?》，陈徒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朱光潜、张充和等著，岳麓书社版。以下同）。其四，沈氏在晚年变成了出口转内销的“国宝”。“文革”中遭“四人帮”迫害，沈氏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1969年又被赶到湖北咸宁、双溪、丹江，看菜园、当猪倌。正当沈从文在国内被冷落的时候，海外却掀起了“沈从文热”。在香港，沈氏的选集出了100多种。美国大学里已经有4个人因为研究沈的作品得了博士学位，有30多个青年研究沈的作品获取了硕士学位；在巴黎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要考取“终生中学中文教员”，必读的4本中国文学作品，内中就有沈从文一本文学作品；香港、日本，正在出版或翻译沈的全集和选集（以上资料截至1980年11月止）。在国内，周恩来总理1964年交待任务，安排沈氏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65年底编写完毕，将要出版，碰上“文革”爆发，试用样本被付之一炬，直至“四人帮”垮台后，1980年，沈氏已78岁高龄，用4个月时间，补充和完成20多万字的说明，虽前后历时16年，终于出版问世，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哄动，翻译成英、法、德、日文出版，并曾作为国礼，赠给日本天皇与美国总统。因此，香港学者曾敏之教授曾有诗颂沈云：“忍抛热泪读《边城》，更羡戎衣一老兵。早岁才情文倚马，晚年研古器精纯。坎坷不坠青云志，报国犹存赤子心。引领京华堪寄慰，鸿篇已共海涛奔。”（《题沈从文文集》）老作家施蛰存教授则在《重印〈边城〉题记》中引用了自己的一首旧作：“辰溪渡口水风凉，北去南来各断肠。终古藤萝牵别绪，绝流人马乱斜阳。浣溪坐老素足女，捉棹行歌黄帽郎。湘西一种凄馨意，彩笔争如沈凤凰。”两诗或叙生平，或写风土，而知人论世，赞沈氏之才之美，则一也。

## 二

沈氏著作等身，以小说、散文名世。但是，他博学多通，会写旧体诗词，擅章草，却鲜为人知。他曾写有《谈写字》一文，于书艺有独到见解。我曾见他写的章草刊载在《二十世纪中国名人书法大成》（北岳文艺社版）与《潇湘风云人物墨迹画册》（燕山社版）二巨册中。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但点画纷披，波磔遒媚，而个中着我，远轶前人蹊径。曾敏之教授评价说：“当代以章草著名的书家，就数郑诵先和沈从文，郑已作古，沈则老而弥坚，他的章草功力，堪称独步。”诗人荒芜曾有诗咏其

书艺云："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新裁。应怜一管七分笔，写尽兰亭醉本来。"可见学界景仰之深。他自己却谦逊已极。1976年书赣州八境台旧作，小注云："沈从文习字。时丙寅（辰）春节，于新新窄而霉小斋中，年七十逾五，始终不为及格。"1977年五一节，为曾敏之写了一幅《续书谱》的章草，加小注云："此四十年前偶书一小幅，今复书之以赠亲友。笔墨棱角尽失，得其轮廓形似而已，甚矣吾衰。"沈氏虽出身书香门第，幼时读私塾，读小学，都贪玩逃学，未过好"学而时习之"这关。自言：从军后，"升作司书，常伏在戏楼上窗口边练字"。"发愤写小楷字，一写便是半天"。看来他的字写得这么好，也是职业逼迫他，自学成材的。他常说："任何一种工作，必须要锲而不舍地从事多年，才能够有点成就。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他的表侄黄永玉说："他几十年来大部分的小说都是用毛笔的蝇头小草写出来的。时间长了，字也好了。所以偶尔写出来一张条幅，可真是比明朝人还明朝人。"他的学生汪曾祺说："沈先生习静的方法是写字，在昆明，有一阵，他常常用毛笔在竹纸上写的两句诗是'绿树连村暗，黄花入梦稀。'"他的章草，确乎是勤而后工，艰苦练出来的。

## 三

沈氏虽只有小学学历，但自言年幼时，"由《包举杂字》、《幼学琼林》到《论语》、《诗经》、《尚书》通常得背诵。"1922年20岁时，随军由保靖去川东，包袱中还背着《圣教序》、《兰亭序》等碑帖与《李义山诗集》。他有个姓聂的姨父，与熊希龄为同科进士，一段时期经常与他谈《宋元哲学》。在军中，他还经常读线装书，有机会就看《四部丛刊》，以致"成天翻来翻去，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地看懂了。"可见他古典文学根基的深厚。在军中，起初不会做诗，却学会了看诗。到17岁时，从当地乡绅那里学会"做点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为了爱一个白脸女孩，无日无夜地作旧诗，"以为，这些诗必将成为不朽作品"，后来，女孩被土匪抢去做压寨夫人，他在小客店题壁云："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再后来，这女人当天主堂洋尼姑去了，他便诗也无心再作了。建国初期，在病中对着收音机独坐的时候，他写过许多诗，又随手毁掉。1961年12月中国作协组织参观团赴井冈山参观，他写有《井冈山清晨》、《建设新山村》、《回南昌途中》、《庐山花径白居易作诗处》、《含鄱口望鄱亭》及《题赣州八境台》。前五首曾于《人民文学》1962年第二期发表（后一首未发）。为此，他曾自注云："1919年在部队中始学作旧诗，1923年赴北京后即从未着笔，已四十年。这次上井冈后，遇事均增感奋，同行又多名诗人，因试用五言古体重学试作。用事不当，走韵出格，均所不免。笔拙意诚，





专家通人或不至于笑胡来也。"

《回南昌途中》云："昔人在征途，岁暮百感生。江山渺萧瑟，关河易阻行。王粲赋登楼，老杜咏北征。食宿无所凭，人目尽酸心。遥遥千载后，若接昔苦辛。我幸生明时，千里一日程。周道如砥矢，平稳感经营。连村呈奇景，远出列画屏。……白头学作诗，感旧还歌今。情深怀居易，才多慕庐陵。诸事难具陈，笔拙意朴诚。多谢贤主人，作客愧深情。"按：此诗使事用典，抒写襟怀，流丽自然，绝无磔格龃龉之处。

《题赣州八境台》云："赣州古名郡，万屋栉比连。八境寓游目，思古慕前贤。遥接郁孤台，缅怀辛幼安。节旄拥万骑，横江多楼船。……登高多古意，风铎鸣悠然。巍巍崆峒立，江水碧接天。双流会合处，千帆自往还。"按：此首应为井冈之行所作，显系《人民文学》当时删去未发之佚稿。

《庐山花径白居易作诗处》云："诗人喜幽独，拄筇乐攀登。不辞跋涉苦，还惊老眼明。山泉鸣玉磬，夭桃迎早春。眷眷如怀人，妩媚自成妍。清琴鸣一曲，浊酒再酌斟（按：1981年重书条幅，省以上两句十字）。缅怀庐山会，难觅栗里人。历世共寂寞，生涯常苦辛。两贤不并世，各保千秋名。佳诗亲人民，人民怀念深。"此诗作于1961年12月12日，合论白居易与陶潜，"缅怀"云云，是否借题发挥，隐喻彭黄张周事，尚待探讨，然亲人民而人民怀念深，各保千秋万载清名，则为千古不易之至理，警策之至。

1963年冬曾赴桂林参观考察，写有《郁林诗草》，包括：《漓江半道花马岩》、《西村》、《漓江半道》、《阳朔刘三姐过渡处》、《新坪道中》、《阳朔公园望郎山》、《曹邺读书台》等篇。其《曹邺读书台》云："百尺高楼凭槛久，琼林琪树罗心胸。只因热爱山川美，缅怀清渭钓鱼翁。"有小序言："阳朔漓江边傍山起楼三层，前人刻有曹邺诗并题记。"追查《全唐诗》及《全唐诗外编》，均不见曹邺咏吕尚钓渭之句，惟《题山居》云："扫叶煎茶摘叶书，心闲无梦夜窗虚。只应光武恩波晚，岂是严君恋钓鱼。"此诗颇切合沈氏心境。然而，此处说严光把钓，沈诗却说太公把钓，是否为了逃避时讳，而出以曲笔，待考。不知曹邺读书处所刻何诗，我曾两次游桂林，未见此诗。

1970年10月写有《喜新晴》云："……老骥伏枥久，千里思绝尘。本非驰驱具，难期装备新。只因骨骼异，俗谓喜离群。真堪托生死，杜诗寄意深。间作腾骧梦，偶尔一嘶鸣。万马齐喑久，闻声转相惊。枫槭啾啾语，时久恐乱群。……"此时作者正下放湖北咸宁之双溪劳动，以物寓人，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反复讽咏，极沉极郁，纯是沈氏夫子自道语。在此期间还写了一首《双溪大雪》。文长从略。

1971年下放湖北五七干校时，在丹江采石区荒山中，写有"七十岁生日

感事”，共分五章，一章云：“大块赋我形，还复劳我生。身轻类飞蓬，随风长远征。虚舟触舷急，回飙坠瓦频。廓落不经意，芥蒂惟累心。日月走双丸，经冬复历春。浮沉半世纪，生存亦偶然。”按：此章“大块句”，语出《庄子·大宗师》，“虚舟”句，语出《韩非子》，意谓一切损害出于无知，不足介意，纯任自然，反得解脱。不忮不求，达观随化。结句言离乡外出近五十年，能够活过来，可谓大难不死，纯属偶然。自嘲耶？抑有所讽耶？二章云：“金风杀草木，木间落叶新。学易知时变，处世忌满盈。祸福相倚伏，老氏阅历深。能进而易（知）退，焉用五湖行？窃名贪天禄，终易致覆倾。黄犬空叹息，难出上蔡门。子房践旧约，萧何善用心。史氏著微言，笔下有深情。”按：“落叶”作者自注：“在此间闻林彪、叶群摔死。”全章为此而发。易占吉凶，老言祸福，史明进退，李斯、张良、萧何等故实，皆“处世忌满盈”一语之佐证，亦即儒家、老家、史氏诸家哲理之实践证明。林彪、“四人帮”对沈氏迫害之深，折磨之惨，人所共知，及其折戟沉沙、林枯叶落，作者不借题指斥，却大谈盈虚哲学，堂堂正正，想当世之大人先生，读之亦当汗颜，自愧辩证法学得不如此公矣。三章云：“洛阳大名都，双阙入青云。朱门金兽环，五侯第宅新。极宴娱心意，为乐忘晨昏。一朝同仙去，唯传帝子笙。还多羽林郎，意气干青云。不必策高足，早据要路津。谄谀累层台，天才无比伦。鹰隼擅搏击，射干巧中人。青蛙能两栖，蝙蝠难定型。不乏中山狼，玲珑九窍心。蚩尤兴妖雾，目迷行路人。朗朗白日临，天宇廓然清。蛾子扑灯火，玩火终自焚。动植各潜骇，惊随冰山崩。日月长经天，大道默无言。自然规律性，世界斗争新。登高望旷野，耿耿长庚明。”按：沈氏写此诗时，林彪集团虽垮，“四人帮”尚炙手可热，“洛阳古名都”实寓指北京，“四人帮”尔公尔侯，宅第“俱新”，鸡犬升天，笙歌达旦，“为乐忘晨昏”。其爪牙——“羽林郎”，“意气干青云”。昔人云：“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此时之王、张、江、姚团伙，分掌党政财文大权，则“不必策高足，早据要路津”矣！而其鹰犬，嗅觉灵敏，深文周纳，故曰：“鹰隼擅搏击，射干巧中人。”令沈氏痛心的，还有一件事：“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作我学生，才经我介绍推荐来到馆中的。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政事，善意告诉他：‘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时了，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大致因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帮人却帮出个现代中山狼”！（以上见《人有病天知否》）这大概就是上述“不乏中山狼，玲珑九窍心。蚩尤兴妖雾，目迷行路人”的注脚。





下面数句：“蛾子扑灯火，玩火终自焚，动植各潜骇，惊随冰山崩”，在“文革”鼎盛时期预言“四人帮”必然玩火自焚，必然有冰消瓦解之日，且说这是“自然规律性”，简直洞若观火，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近人毛大风先生编著的《近百年诗钞》（岳麓社版），录入沈氏此诗，可谓独具慧眼，然本章自“唯传帝子笙”以下，便一笔勾去，辜负了此书“百年诗史”的美誉，删去了一段信史，实在可惜。建议再版补上。四章云：“北宋名园多，民膏积累成。清渠连广厦，松竹百亩荫。牡丹照殿红，芍药百缬新。但乐西园游，易忘北狄侵。物换星移频，独乐特著闻。不因花木好，相许还以人。”按：“照殿红”与“百缬新”均系名种，详见《洛阳花木记》、《牡丹谱》、《芍药谱》。“独乐园”——作者自注云：“司马光之独乐园，只茅屋三间，而观者独多，重其人也。”可见本章篇末点题，主旨在触景生情，说明作者视当年之京华，灯红酒绿，表面繁荣，只是过眼烟云，徒乱人意。千秋万载后，历史将证明：重人不重物也。五章云：“夙昔溯大江，廿载入梦增。白帝耸天云，夔门禹迹新。‘揽辔’同‘入蜀’，文传印象深。李杜佳诗在，旧迹易重寻。丞相旧祠堂，松柏郁青青。还思游青城，山中听杜鹃。如赋新蜀都，烟筒密如林。人间创奇迹，铁路接成昆。犹将锁三峡，人人尽五丁。生当盛明世，人多尧舜民。尺璧非吾宝，寸阴宜所争。”按：作者自注。“‘揽辔’同‘入蜀’，文传印象深，系指范成大、陆游著游记，叙川中人情风俗之醇美。”总之，全诗五章，一题《拟咏怀诗》，顾题索义，重读阮籍、庾信咏怀诸诗，觉沈氏之作，或藉史事，寄托对时世的讽刺与感慨，或藉景物，抒写个人内心的孤愤，苍劲忧郁，颇有几分魏晋遗风。

1971年冬，沈氏因心脏病申请回京。1972年冬，写有《过北海后门感事》一首：“依依宫墙柳，默默识废兴。不语明得失，摇落感秋深。日月双转丸，倏忽万千巡。盈亏寻常事，惊飙徒自惊。”此诗以比兴手法，惋叹“四人帮”之盛极必衰，盖比则言愤以斥言，兴则怀譬以记讽。此虽短章，却极有分量，因其委婉悠圆，有才不露也。

综观沈氏旧体诗，以五古为最多，偶有几首五、七言绝句，如《题张家界》云：“险极腰子寨，幽深金鞭溪。更上黄狮寨，一览众山低。”《漓江半道》云：“绿树蒙茸山鸟歌，溪涧清润秀色多。船上花猪睡容美，岸边水牛齐过河。”虽粗头乱服，不加修饰，然而诗中有画，极富乐府意味与民歌情趣，皆妙品也。概言之，沈氏旧体诗，不事雕琢，真率自然，触物寓兴，抒写胸中所欲言，若使之杂诸“新文学旧体诗”集中，当不后人。又：沈氏诗作，佳处正在不作意，具见古朴。有时非讲几句“官话”不可，也是形势逼迫，沈氏只好违心而作，读者想能谅解。诗人荒芜曾有《赠沈从文先生》绝句数首，其一云：“《边城》山色碧罗裙，小翠歌声处处闻。我论文章尊五四，至今心折沈从

文。”其二云：“能从片楮认前朝，一史修成纸价高。文物千秋谁管领，看君指授失萧曹。”其三云：“新从圆领证唐装，老认天门上敦煌。万卷书加万里路，自应选作探花郎。”（馀略）苏仲湘先生也曾有《奉陈沈从文前辈》云：“卅年微叹面韩迟，待抚流光梦若丝。绿鬓曾悲风雨夜，苍颜欣共绛星旗。《边城》早识千秋重，淹贯还堪一世师。盛世双清娱目处，繁花如锦看多时。”议者以为：两家之诗，再加前文提到的曾敏之、施蛰存两先生之评价诗章，勾勒出沈氏可亲可敬之肖像，现在读来，可算对沈氏一生的“盖棺”之论了。

（作者系本馆馆员）





# 清代方志形成高峰的原因及清代湖南方志的主要特点

李龙如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历时 280 余年，跨越了中国两种社会形态。即 1940 年鸦片战争以前属中国古代社会，1940 年以后已步入中国近代社会的门槛。前者有着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深厚积累，后者又由于中国外交往来的隔绝趋于频繁，为晚清文化开启了先路。同时清朝廷以满洲贵族为主体，是一个满汉合流的政权，满汉文化从剧烈的冲突到认同而融合，也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延伸注入了新的内容。

清王朝在经历了明清更迭的社会动荡后，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起，社会由乱而治，再经雍正、乾隆两帝的励精图治，至乾隆中叶，近百年间，政治刷新，经济繁荣，文教昌明，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最后一个盛世。建立于这一基础上的清代文化，无论是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还是金石考古、天文历算以及舆地方志、诗文等，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超越了历朝各代，取得了诸多足以光耀史册的成就。就地方志而言，已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时期。据《清史稿·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统计，共著录为 2983 种；据有人统计《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为 4889（不含乡土志、里镇志等），但目前一般方志学界普遍认为在 6000 种以上，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无可比拟的。

清代地方志的繁荣发展，除了上述基本原因外，尚有下列三个方面的具体因素。

清初几个皇帝，对于地方志和地图都很有兴趣。康熙帝就曾说过：“朕于地理，从幼留心。”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深知，作为满清异族入主中华，对于关内这么一个偌大的地方，不免感到生疏，故特别需要有地图、地理知识来帮助他们进行治理。康熙帝曾在谕旨中曰：“朕赞基丕绍，抚兹方夏，恢我土宇，达于遐方。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其间风气群分，民情类别，不有缀录，何以固名?”[①] 故清王朝于地方志

的修纂特别重视。首先是康熙编制《皇舆全览图》。曾于其四十七年（1708）下令用西法测量全国，并派遣传教士到实地测量，至五十六年（1717）完成。于雍正六年（1728）又颁降谕旨编《大清一统志》，至乾隆间书成。嘉庆十六年（1811）又重修《大清一统志》，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成书。因其纪事止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故称《嘉庆重修一统志》。为了编修《大清一统志》，于是下诏各省先修通志，限期完成。于康熙年间，先后很快就完成了《陕西通志》、《四川总志》、《湖广通志》等 19 种。因各省要修通志，又命各府、州、县修志以供采择，故康熙一朝所修志书现存已达 1354 种。[②]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时，各省通志也奉旨重修，府、州、县志也纷纷续修、重修，故仅乾嘉期间，全国修成的志书，现在尚能见到书的就达 1434 种以上。[③]这样由上而下，层层修纂，且一种志书修纂后又续修、重修，于是全国各级行政单位就几乎都修纂了志书，且数量多。此其一。

严密的修志制度。清代修志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大清一统志》由皇帝颁降谕旨。全国一般志书，经皇帝批准后，多由礼部转发各省，敕命各省纂修通志。总督（统辖一省或数省）有时也檄令巡抚修志，而巡抚又通饬各府州县修志。如山西巡抚曾国荃向全省发布《修志檄》曰："现已由省聘请博淹雅多识能文之儒，纂修全省通志。所有各州县原书亦须一律修辑，以备采择考证之资，借免舛误遗漏之患。惟当经费支绌，不得不设法变通。应将省志暂缓兴修，州县果有志书，亦毋庸更动。先令各牧令查明原修志书，以后应载各事，另修补志一册，即照原分门类，挨次编纂。其有原修志书以前事实，前志未载应行添入者，另列补遗一门，或前志已载尚须辨正者，另列纠误一门，以期简便。"[④]道（在清代已不是一级行政区域，而只是省府之间的监察区）有时也向府县发文催修志书。至清末，陆军部也行文各省，催修志书。至于各府向所属各县所发布的催修志书的公文，那就更多了。同时为了修志的方便，使所修志书规格一致，体例统一，不至于返工而延误时间，也为了便于上一级志书汇总资料的方便，清代各级政府特别是巡抚一级，经常向所属府州县颁发《志例》、《修志牌照》、《凡例》等。清政府还具体规定了修志的年限，雍正朝"颁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元令"。[⑤]旧志未湮，新志踵起。此其二。

清代封建文化专制制度苛严，大兴文字狱，一些文人学者，躲避文网，不敢轻易作野史，便埋头于经史考证之中，以借修志施展才华。如顾炎武、王夫之、徐乾学、阎若璩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修志，或主修，或总纂，或私撰志书。他们的参与，既提高了志书的质量，也促进了修志事业的发展。此其三。

清代截至同治时止，湖南修纂的省、府、厅、州、县志 363 种。同治以后





又修纂了 50 种左右，共计 413 种。[⑥]现在尚能见到书的是 306 种（不含乡土志、山水志等）。[⑦]

清代湖南方志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四方面。

一、府、州、厅、县无不有志，一志数修，且品类繁多。清初湖南属湖广总督和湖广布政使司。康熙三年（1664），置湖南布政使司，是为湖南省。至道光间，湖南布政使司辖 4 个道、9 个府、5 个直隶厅、4 个直隶州、1 个散厅、7 个散州、63 个县。除道不属行政区划外，其余均为行政单位，几乎每个行政单位都有志书，且一种志又经多次续修，重修，一般都有 3 至 4 次。如《湖广通志》，就有：（清）徐国相、丁思孔修，宫梦仁、姚淳焘纂的《（康熙）湖广通志》。（清）迈柱等修，夏力恕纂的《（雍正）湖广通志》。《湖南通志》则有：（清）陈宏谋等修，范咸、欧阳正焕纂的《（乾隆）湖南通志》。（清）翁元桥等修，王煦、罗廷彦纂的《（嘉庆）湖南通志》。（清）李瀚章、卞宝第修，曾国荃、李元度等纂的《（光绪）湖南通志》。又如《长沙府志》就有：（清）张宏猷修，吴懋纂的《（顺治）长沙府志》、（清）苏佳嗣修，谭绍琬等纂的《（康熙）长沙府志》。（清）吕肃高修，张国图、王文清纂的《（乾隆）长沙府志》。再如《长沙县志》有：（清）王克庄修，朱奇政纂的《（康熙）长沙县志》。（清）李大本修，周宣武纂的《（乾隆）长沙县续志》。（清）赵文在修，刘揆之、易文基纂的《（嘉庆）长沙县志》。（清）赵文在修，刘揆之、易文基纂，陈光诏续修，艾以青、熊绶南续纂的《（嘉庆）长沙县志》。（清）刘采邦修，张延珂等纂的《（同治）长沙县志》。

此外，还有乡土志、山川志、风物志、寺庙志、书院志等等，前代所没有的志书品种，至清代俱已齐备。

二、学者参与修志工作，名作佳志不断出现。清代湖南著名学者，如王夫之、郭嵩焘、王闿运、邓显鹤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修志工作。他们具有一般俗吏都不具备的优势，术业各有专工、治学严谨，惜名自爱，不取容苟合，坚持高标准，因而使湖南的修志事业，出现了新的生机。名作佳志不断出现。如：

王夫之纂辑的《莲峰志》，书成于清顺治三年（1646），当时未能刊行，始见于《船山遗书》。是书问世后，即为史家称誉。章学诚谓山志以形胜景物为主，描写生动为工，夫之此志，可谓当之无愧。郭嵩焘在为李元度《南岳志》所作的序中曰："衡山志代有专书，而迄无传于世，岂果南方僻陋，无与张而大之，固题其文，犹有未厌人心者也？顺治初元，船山王氏纂辑《莲峰志》，为衡山之一峰，其事典则，其文雅驯"，"为兹峰独辟生面"，而"尽揽七十二峰之胜"的李元度《南岳志》，"其体例犹受成船山《莲峰志》载"。

郭嵩焘纂修的《（光绪）湘阴县图志》，梁启超在其所著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云："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以郭筠仙之通才博学，官至督抚，归老于乡，自任本县湘阴图志总纂，书已告成，而为李桓所扼，卒历若干年，仅得以私资付刻"。称誉其所撰之《湘阴县图志》为"佳志"，是志书中的"最表表者"，门目分合增减得当，资料选择排配合理，"诚方志学中有趣且有益的事业"。

王闿运总纂的《（同治）桂阳直隶州志》，问世后，志家称道备至，誉为"鸿篇巨制，条贯古今"、"湘志中之名作"、"佳志"。《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称其"事纪自汉迄于当时，举一州之大政，有关治乱者，编年纪述，赋役工志，于地方古今民生优绌之情，建置盛衰之迹，与夫学校礼兵诸志之化民成俗，靖乱保疆，乃大经大本之常规，尤称详赡，足资征考。"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之为当时志书中的"最表表者"。近代湘中著名学者李肖聃教授在其《湘学略》中，将其置于魏源、郭嵩焘之上。其评论，虽不一定恰当，但在当时众多志书中，确是上乘名作之佳志。

邓显鹤纂修的《（道光）宝庆府志》刊行后，即为志家所称道，被誉为"博赡精详，典雅宏丽"的"最为精善"之作。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其为清代佳志。《续修四库全书》亦称之为名志。

三、清末，乡土志突起。清末施行新政，在教育方面，废科举，兴学堂，培养各类人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等人拟制《奏定学堂章程》，颁行《乡土志例目》，共列15门，即：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民族、家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并称："《奏定学堂章程》所列初等小学堂科，于历史，则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于地理，则讲乡土之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于格致，则讲乡土之动物、植物、矿物，凡关于日用必需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称。盖以幼稚之知识，遽求高深之理想，势必凿枘难入。惟乡土之事，为耳所习闻，目所常见，虽街谈巷论，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平时供儿童嬉戏者，一经指点。皆成学问，其引人入胜之法，无逾此者，故必有《乡土志》，然后可以授课。海内甚广，守令至多，言人人殊，虑或庞杂。因是拟撰例目以为程式。"[8]从光绪三十一年（1906）至宣统三年（1911），仅6年时间，全国就纂修乡土志450多种，平均每年75种以上。[9]而湖南为20种，为全国总数的4.4%。其中抄稿本8种，占40%；刻本7种，占35%；活字本4种，占20%，石印本1种，占5%。（详见拙著《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湖南乡土志》载《湖湘春秋》2003年第1期）。

四、体例、内容及时代特征。清代由于考据学盛行、发达，其严谨的学





风，也为方志的编纂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不囿于成说，勇于考索；不迷信名家，敢于纠谬补缺；不轻信旧志，注重实地查访；不墨守成规，注重科学新法。

体例方面。如王闿运总纂的《（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就能突破一般志书的奉颁条格，不用星野，不列皇言，首列疆域，按建制之缘始，疆域之方位，四至八道，都里之名，次及沿革，为表而明之，开方计里，绘制成分图十七幅，历代形势图三十幅，又附历代正史中的地理，以资考证。又如邓显鹤编纂的《（道光）宝庆府志》，其体例仿谢启昆之《广西通志》[10]而略有变通。全书分纪、表、图、记、书、略、录、传八大纲，计纪一（大政），表十（沿革、疆里、藩封、世职、职官、武职、巡历官司、选举、氏族、士女），图二（形胜沿革、疆里），记三（形胜、疆里、山川），兵六（吏、户、礼、兵、刑、工），略二（五行、艺文），录五（政绩、武功、良翰、使岷、残明），传四（先民、胜朝耆旧、国朝耆旧、列女），共36个门类。与其他志书相比较，确是截然而异。

内容方面。首先是篇目的增与减，内容的详与略，不受陈规的约束，根据实际需要而定。如邓显鹤的《（道光）宝庆府志》，列使岷、残明二录，详载明代武冈岷藩及南明桂王小朝廷活动；于大政记中突出新宁瑶民兰止樽、雷再浩起义军和武冈曾如炷阻米出境的斗争事迹，就非常必要。其次是注重实地查访，如邹汉勋与邓显鹤在编纂《宝庆府志》的过程中，"尝裹粮日走百里，亲历山川以求证验。"邹汉勋在编纂《兴义府志》时，对书中所记载的1500个屯寨，其地名、方位、里数等，均经其实地查访过。再其次是，注重当时最新科学成果的运用。如郭嵩焘在纂修《（光绪）湘阴县志》时，书中舆图，悉用经纬新法，开方计里。邹汉勋在其《宝庆疆里图说》中还提出了：明分率（比例），分准望（方位），定中宫（坐标），测日星等绘制地图的基本原则，故其舆图精审准确。

在史料的搜集方面，不迷信名家，不轻信旧志，注重考证，敢于纠谬补缺。如王闿运的《（同治）桂阳直隶州志》，根据其考证所获得的大量史料，从而纠正了郦道元、顾炎武等名人著作中有关州内山水记载中的一些错讹。又如邹汉勋的《新宁形势说》与《宝庆沿革》，在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又经其多方考证，使之准确可信，给我们留下了其他史书难以找到的珍贵史料，故深为史家称誉。称前者云："征引故事，极称宏富，洵推杰作。"称后者曰："详审精确，纤悉靡遗，实从来识沿革者无与伦比也。"称赞邹汉勋是"存宝庆文献之功臣"。

**注 释**

[1]《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六.

[2] [3]《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附表二。《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 年第 2 期.

[4]《方志考稿》第 5 编.

[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6] 谢华.《湖南省志总序》. 1958 年.

[7]《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1985 年，中华书局出版.

[8] 王晓岩.《方志演变概论》所引之《(光绪)翟县乡土志》卷首.

[9] 王晓岩.《方志演变概论》.

[10] 谢启昆.《广西通志》. 是按章学诚新创建的方志学理论而编纂的。梁启超曰：“谢氏《广西通志》”内容组织与以前不同，是“旧志中号称最佳”者.

（作者系湖南图书馆研究馆员）





# 浅谈烟花诗词

刘 旭

湖南烟花甲天下。湖南人酷爱烟花，每逢佳节或遇到喜事，都要燃放烟花，以示庆贺。不但湖南如此，在中华大地每个角落，都是这样。从古至今，烟花鞭炮不仅是一种商品，成为人类物质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它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伟大的诗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辈出，优秀作品极其丰富。在这诗歌的海洋中，其中有一部分是描述烟花鞭炮的，古往今来，它们开放在诗国的天空，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在我国文学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

## 一

早在隋朝，隋炀帝对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曾有所吟诵，其中有一首著名的《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诗曰：“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一作六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燔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①]

到了唐代，诗人吟咏除夕、元宵节的诗作很多，其中以苏味道、张说、孟浩然等较为突出。苏味道在唐朝前期写了一首《正月十五夜》，全诗如下：“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②]张说在唐开元四年（716 年）写了《岳州守岁二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歌舞留今夕，犹言惜旧年。”[③]孟浩然在唐朝中期写了一首《同张将蓟门观灯》，诗曰：“异俗非乡俗，新年改故年。蓟门看火树，疑是烛龙然。”[④]

在这些诗里，出现了“灯树”、“花焰”、“爆竹”、“火树”、“火树银花”等名词。有人认为，这些诗描述的是烟花、爆竹，火树银花就是烟花的别称或代名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知道，我国以火药为原料的真正烟花产生于宋代，隋唐时期，还没有以火药为原料的真正烟花，因此，这些诗里的“灯树”、“花焰”、“火树银花”不是指烟花，而是对除夕和元宵节灯火的形象描

写。这种误解，延续了好几百年，现在应该真正纠正过来了。[5]

诗词中出现了以火药为原料的真正的烟花爆竹，那已是宋代的事情了。宋朝诗人陈与义于靖康元年（1126年）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写有《除夕两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城中爆竹已残更，朔吹翻江意未平。多事鬓毛随节换，尽情灯火向人明。比量旧岁聊堪喜，流转殊方又可惊。明日岳阳楼上去，岛烟湖雾看春生。"[6]宋朝著名词人辛弃疾写有《青玉案·元夕》一词，全词是这样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7]

我们在前面已指出，我国以火药为原料的真正的烟花、鞭炮发明于北宋末年南宋初年。陈与义生于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除夕两首》写于靖康元年（1126年）。辛弃疾生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卒于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他们的诗、词写于北宋末年或南宋时期。因此，他们的诗、词中的"爆竹"、"花千树"、"星如雨"，才是对真正的以火药为原料的烟花鞭炮的描述。

到了元代，以烟花为题材的诗词多采用比拟手法，形象逼真，光彩夺目，其中元人赵孟頫的《赠放烟火者》，简直就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烟花画卷，诗的全文是这样的："人间巧艺夺天工，炼药燃灯清昼同。柳絮飞残铺地白，桃花落尽满阶红。纷纷灿烂如星陨，爛爛喧豗似火攻。后夜再翻花上锦，不愁零乱向东风。"[8]

明朝以烟花、鞭炮为题材的诗词逐渐多起来，其中明朝诗人翟佑的《烟火戏》和黎淳的《爆竹》当推上乘之作。翟佑的《烟火戏》写道："天花无数月中开，五彩祥云绕绛台。堕地忽惊星彩散，飞空旋作雨声来。怒撞玉斗翻晴雪，勇踏金轮起疾雷。更漏已深人渐散，闹竿挑得彩灯回。"⑨黎淳的《爆竹》写道："自怜结束小身材，一点芳心未肯灰。时节到来寒焰发，万人头上一声雷。"[10]

## 二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当代，烟花诗更以它那特有的内蕴和情韵婷婷玉立于文学园地中，使人陶醉，使人倾倒。当代诗人公刘的《五月一日的夜晚》，讴歌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夜晚天安门广场上空的烟花盛况，气势磅礴，婀娜妖娆，诗中吟道："天安门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空中是朵朵云烟，地上是人海灯山；数不尽的衣衫发辫，被歌声吹得团团旋转……整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中国在笑！中国在舞！中国在狂欢！羡慕吧，生活多么好，多么令人爱





恋，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

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的《天安门看焰火》，以饱满的革命激情，颂扬了国庆十周年在北京天安门观看焰火的情景，场面热烈，璀璨恢弘，诗中写道："灯火灿烂照宽衢，掩映红旗舞且歌。无数火星如网散，人间原自有银河。"

台湾诗人白灵的《烟火》，将烟花拟人化，以第一人称的手法，不拘泥于物情物态本身的描述，而是借物寓情，表达了诗人对那"美的夜空"的神往，隐喻着诗人对"上那广阔的天空"去开花的愿望的深层意蕴，诗中写道："大家看到了没有，我们的四周人山人海。多像一座大型的表演场呵！他们都是赶来看我们的，各位怀里的种子都抱紧了吧！炮管的跑道要看清楚，我们的目标是正上方。那美丽的夜空，记住，越高越好。你们听，这一刻又是多么地安静，人们都在屏息等待，等待我们出发。各位都准备好了吧，好，各就各位，碰!！去呀，弟兄们！上那广阔的天空去，金银花，牡丹花，吊钟花，对对！还有一些只要长成一棵树就好。"

香港诗人张诗剑的《烟花》，将烟花以强烈的对比方法（"炮竹"对"炮弹"，"喜庆"对"战争"，"善意"对"罪恶"），升华出一种深层的内蕴和意境，这种内蕴和意境都包含在"把全世界的火药都制成美丽的烟花"的宏大胸怀中。在这里，烟花成了和平、幸福生活的象征。诗中写道："祖先发明火药，后来制成炮竹，制成炮弹，从喜庆到战争，从善意到罪恶，谁之过？看到烟火，我就想：把全世界的火药，都制成美丽的烟花！"

香港另一位诗人梦如的《烟花》，同样采用拟人的手法，但是诗人却以冷峻抒情的笔调，抒发自己的情怀，在冷峻之中外延丰富的令人思索的人生哲理，诗中写道："为博取世人的喝彩，撕裂自己，任由生命，在五彩缤纷中殒落。"

1991年至1992年，湖南连续举办了两届国际烟花节。"1991湖南国际烟花节"有55个国家和地区的1 500多名外宾出席了开幕式，"1992湖南国际烟花节"有5 000名国内外来宾出席了开幕式。每届国际烟花节期间，都举行了盛大的烟火燃放晚会。"1991湖南国际烟花节"的烟火燃放晚会分别在长沙市橘子洲和烈士公园湖心岛设立燃放点，共计燃放了重200多吨的烟花，其中浏阳燃放队就燃放了2 000多个品种，礼花1.6万发，盆花600盆，夜幕中恰似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五光十色，争奇斗妍。面对这一盛景，诗人写诗填词，留下了许多美丽的辞章。吴仁寿写的《观烟花——写在湖南国际烟花之夜》就是其中之一，诗中热情地讴歌了湖南的烟花，更讴歌了制造烟花的三湘儿女及其未来。诗是这样写的："翘首期待中一声声爆响，刹那间夜空变成梦幻的殿堂；一只只孔雀开屏争奇斗妍，一簇簇盆花吐艳竞相怒放，一团团火轮飞旋流

光溢彩，一盏盏彩灯高悬富丽辉煌，更有那仙女散花，银河飞瀑，倾倒了星星，乐弯了月亮……呵，魔术师般的湖南烟花哟，你凝聚的岂止三湘儿女的聪明、智慧、信心和力量，你展现的是古国的悠久文明，是中华民族明日的璀璨理想……”⑪

三

烟花诗不但在中国文学园地里像五彩缤纷的花朵常开不败，而且在外国文学园地里也占有一席之地。外国文学园地里的烟花诗同样很美很感人。美国诗人非马写了一首叫《花・烟火》的诗，全诗如下："微弱的星光下，一群植根于泥土的花，仰着天真的脸。看！花枝招展的烟火，现身说法，渲染大都市的酒绿灯红，黑暗里，花们看不见，烟消火灭后的凄寂。"

菲律宾诗人和权写了一首叫《烟火》的诗，诗是这样写的："他们都是烟火，拼命地想一飞冲天，想在黯夜的高空中，绽开亮丽的火花，然而——没人知晓，所有的烟火绚烂之后，都会那么忧惧，那么痛苦，痛苦地烟消火灭。"⑫可见，在外国文学园地中，烟花诗的品位也是很高的。

上面介绍的一些烟花、鞭炮诗词，只是国内外诗歌海洋中的极少一部分。但是，仅从这极少一部分作品中，我们不是窥见了我国及国外烟花鞭炮诗词那姹紫嫣红、五彩缤纷之一斑吗？

**注　释**

[1]《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2]《全唐诗》卷六十五，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3]《全唐诗》卷八十九，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4]《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5] 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 大象出版社 2004 年版.
[6]《陈与义集》.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7]《辛弃疾诗文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8]《元诗选》.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9] [10]《中国古诗选》. 岳麓书社 1999 年版.
[11] 以上引诗均见《中国现代诗选》. 漓江出版社 1998 年版.
[12] 以上引诗均见《外国诗选》. 漓江出版社 1998 年版.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唐代长沙窑几件诗文瓷壶赏析

谈雪慧

古人把通俗易懂的诗歌、谚语、俗语和题记等书写在瓷器上，作为一种装饰的当属唐代长沙窑瓷器为首创，用诗歌在瓷器上装饰也是长沙窑瓷器的一大特色。有关长沙窑出土的诗文瓷壶在已出版的萧湘先生《唐诗的弃儿》[1]一书中收录比较全面，并进行了注解。笔者在对一批长沙窑瓷器资料进行整理时发现有近六十件诗文瓷壶，它们大多以前有所收录，如"天地平如水"、"白玉非为宝"、"忍辱成谛政"等诗文题记瓷壶，并且在《唐诗的弃儿》一书中对此也作了较全面的注解，笔者在这里只是对以下几件诗文瓷壶略作赏析并谈几点自己的认识。

本文介绍的十件长沙窑诗文瓷壶与《长沙窑》[2]一书中瓷壶的器型基本相同（应属于 B 型Ⅲ式器）。此类器型的特点是喇叭口（指口沿完整器），直颈较长、腹部较圆、都有瓜棱、多棱流，有的流稍长，有的稍短，平底。多施青釉，底部无釉。诗文瓷壶文字均为腹流下褐彩题字，字体多行书，书写工具为毛笔。字呈褐色，"应为三氧化二铁呈色"。[3]诗文瓷壶题记内容有六首是通俗易懂的五言绝句诗，其余四首均为俗语，不但与"春"有关，而且还带有赞美春酒的广告宣传。

## 一、唐代长沙窑青釉书"男儿爱花心"诗文瓷壶

瓷壶高 17.5 厘米、腹径 13.5 厘米、底径 11 厘米。口部残缺，器身呈瓜棱形，深腹，肩微丰，器表通体施青釉，不及底，施釉比较薄。腹流下题诗一首，字呈深褐色，其内容为："男儿爱花心，徒劳费心力。有钱则见面，无钱不相识。"这是一首男女相亲诗。第一句的最后一字因瓷片脱落已无法辨识，但从整首诗的意思来看，第一句掉的字，此字表示的应为"花心"之意，才能与后一句相对应。这首诗所表现出来是女子在选择对象时对男方的要求。前两句是指男人都比较花心，女人就不必去为他们劳心又费力，而后两句就比较现实了，着重围绕着一个"钱"字，你有钱就见，无钱就不见。诗从侧面也反映

出了古代女子的功利思想和实用主义、金钱至上的爱情价值观。

## 二、唐代长沙窑青釉书“后岁迎乃岁”诗文瓷青

瓷壶高 23 厘米、腹径 16 厘米、底径 11.5 厘米。颈以上均为修复，器身呈瓜棱形，丰肩，下腹稍内敛，器表施青釉，底部无釉，施釉比较薄且较均匀，釉面较有光泽。腹流下题诗一首，字呈浅褐色。其内容为：“后岁迎乃岁，新天接旧天。元和十六载，长庆一千年。”这类的诗文壶笔者曾见李效伟先生所著《长沙窑珍品新考》[4]一书中有收录：“后岁迎新岁，新天后使天。元和十六年，长庆一千年”。这两首诗都是有年号的，为“贺岁”诗。笔者查过《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按年号记载，“元和”实际上只有十五年，而诗中所书“元和十六载”则应为“长庆元年”。两首诗的前两句都是辞旧迎新的意思，而后两句又是写的同一年号。笔者认为唐人当时写诗时心情一定是愉快的，他在诗里写的并不是“长庆元年”，而是希望“长庆”之意。在《全唐诗》里，用“百年”、“千年”表述的吉祥语常见。

## 三、唐代长沙窑青釉书“入池光弄水”诗文瓷壶

瓷壶高 18 厘米、腹径 12 厘米、底径 9.6 厘米。口沿微外撇，器身呈瓜棱形，颈肩之间有折，丰肩，下腹微敛。器表施青釉，不及底，底部无釉，施釉较薄，釉内有细碎的开片，腹流下题诗一首，字呈深浅颜色不一的褐色，其内容为：“入池光弄水，岸上拂轻沙。林里惊飞鸟，园中扫落花。”这首诗是描写鸟的动态情景，通过诗中的“弄”、“拂”、“惊”、“扫”四个动词，从情态到动作，写出一时间连续发生的情景，层次分明而又贯串一气，是非常真切的动态描写，展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幅动感画面。鸟儿一会儿落到池面戏水，一会儿又回到岸边弹沙，一会儿又高飞到林中打落树上的花和叶。这首诗的妙处就在于是以诗代画，把林中的飞鸟描写得活灵活现。这就是古代文人的诗中有画，画中含诗。

## 四、唐代长沙窑青釉书“一双班鸟子”诗文瓷壶

瓷壶残高 15 厘米、腹径 13 厘米、底径 8.6 厘米。颈部以上残缺，器身呈瓜棱形，肩微丰，圆腹微鼓，器表施青釉，不及底，底部无釉。腹流下题诗一首，字呈深浅不一的褐色，其内容为：“一双班鸟子，飞来五两头。借问岳家舫，附歌到扬州。”与此类似的诗在萧湘先生所著的《唐诗的弃儿》[6]一书中也有收录：“一双青鸟子，飞来五两头。借问舡轻重，附信到扬州。”此诗在《全唐诗》卷 875 第 69 首也有《涟水古冢瓶文》：“一双青鸟子，飞来五两头。借





问船轻重，寄信到扬州”。[7]但上面这首还是与《全唐诗》里的略有区别。第一句是“班鸟”，是一对分离的鸟，用“班鸟”来比喻离别的亲人，第二句中的“五两”是古代的候风器，用鸡毛五两（或八两）系于高竿顶上而成，“五两头”是船体的顶上。第三句中的“岳家舫”可以作两种理解：其一，船家有可能是岳阳地域过来的，故称“岳家舫”。因为岳阳在洞庭湖区，在古代远航的主要交通就是水路，而走水道就离不开船。且唐代岳阳窑和长沙窑相互毗邻，两窑相距约 30 公里，船家把两个窑址所烧制的瓷器一同出洞庭湖到长江运往扬州销售。其二，亦有可能是船公姓岳，故称“岳家舫”。第四句，萧湘先生在《唐诗的弃儿》一书中作了详解，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是：“家书抵万金”。[8]因为在家的窑工们经常要船公捎信到远离家乡的亲人。长沙窑诗文瓷壶中还出现过“洛阳”、“长安”、“新丰”、“新阳”、“秦川”等地名。

## 五、唐代长沙窑青釉书“欲到求仙所”诗文瓷壶

瓷壶高 18 厘米、腹径 13.2 厘米、底径 10.5 厘米。口部有残缺，器身呈瓜棱形，肩微丰，腹略圆。器表施青釉，底部无釉。腹流下题诗一首，字呈褐色，色稍浅。其内容为：“欲到求仙所，王母少时开。卜人舟上坐，合眼见如来。”这是一首宗教色彩比较浓郁的诗，诗中的王母即西王母，简称王母，又称金母、金母元君，俗称王母娘娘。据《山海经》之《西山经》记载：“又西北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此外，《海内北经》、《大荒西经》也有关于西王母的记载。王母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后经道教增饰奉为女仙领袖。“如来”是佛的一种称号，指从“如”实之道而“来”，开示真理。“如实”即真如，指佛所说的绝对真理。依照真理行事，便可达到佛的境界。“如来”是梵文“多陀阿伽陀”（TATHACTA），即“多陀竭”的意译。《成实论》卷一说：如来者，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故曰“如来”。这是一首表现凡人想得道成仙就要去见道、佛二仙，即王母娘娘和如来佛。

## 六、唐代长沙窑青釉书“不短复长”诗文瓷壶

瓷壶高 19 厘米、腹径 13 厘米、底径 11 厘米。口沿残缺，器身呈瓜棱形，丰肩，腹微鼓。器表施青釉，底部无釉，施釉较薄，有剥釉现象。腹流下题诗一首，字呈深褐色。其内容为：“不短复不长，宜素宜复粧（妆）。酒添红粉色，杯染口脂香。”这是一首反映江南女子梳妆打扮的诗歌。

俗语类的长沙窑题句瓷壶也比较多，这些题句都有口头语的特点，反映了民间乡言俚语，赞誉长沙窑生产的壶是装美酒的好壶。这几件瓷壶的题句内容为：“奇绝美春”、“盛饮春酒”、“造美春酒”、“春酒美深巷”。一是从字里行间

都能看出与春有关，古代的诗人以春为题材作诗的不在少数：在六朝时有梁元帝萧绎《春日诗》传世，在南朝乐府民歌中《子夜四时歌》，也有《春歌》一首，在《全唐诗》中以春为题材的诗是常见的。在《长沙窑》的诗文壶中也有以春为题材的。如："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9]这些与春有关的诗文，表现了春天里万物和谐，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意境。二是长沙窑的窑工们为了推销他们所生产的瓷壶，就在诗文上做起了广告词，其名为宣传酒，实为宣传长沙窑这种装酒的瓷壶。

## 七、唐代长沙窑青釉题记瓷壶

瓷壶高 14 厘米、腹径 11.2 厘米、底径 9 厘米。口折沿，颈肩之间有折，丰肩圆腹，器表施较薄的青釉，釉有剥落，釉面无光泽。腹流下题记，字迹呈褐色，其内容为"奇绝好美春"。

## 八、唐代长沙窑青釉题记瓷壶

瓷壶高 17.5 厘米、腹径 13.2 厘米、底径 11 厘米。口折沿，长颈，颈肩之间有折，腹部瓜棱，器表施青釉，底部无釉，釉面无光泽。腹流下题记，字迹呈浅褐色，其内容为"盛饮春酒"。

## 九、唐代长沙窑青釉题记瓷壶

瓷壶高 17.5 厘米、腹径 12 厘米、底径 9 厘米。口折沿，长颈，颈肩之间有折，腹部瓜棱，器表施青釉，底部无釉，釉面无光泽。腹流下题记，字迹呈深浅不一的褐色，其内容为"进徐美春酒"。

## 十、唐代长沙窑青釉题记瓷壶

瓷壶残高 16 厘米、腹径 13 厘米、底径 9.5 厘米。口沿残，颈肩之间有折，丰肩，腹部瓜棱，器表施青釉，釉面较有光泽。腹流下题记，字迹呈铁锈色。其内容为"春酒美深巷"。

笔者对前文所述的长沙窑诗文瓷壶谈三点认识：

**一　长沙窑诗文瓷出土地点和年代问题**

笔者初步统计，在国内所出土的唐代长沙窑瓷壶（包括采集品）总计约 4000 多件，大部分没有文字。有诗文、题记的瓷壶，现已收录的近 200 件，但是占绝大多数为长沙窑窑址出土。在国内其他各省所出土的诗文、题记长沙窑瓷壶中，只有在安徽、广东两地各出土过一件长沙窑诗文瓷壶。国外最新发现的是 1999 年在印尼海域打捞的"黑石号"沉船，打捞出长沙窑瓷器 56500





件之多，比国内外出土过的长沙窑瓷器总和还要多得多。其中有一件青釉褐彩题记瓷碗，在碗心用绿彩行书有"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明樊家记"14 字[10]。还有一件青釉瓷碗正面写有阿拉伯文，背面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11]证明当时长沙窑的瓷器生产处于兴盛时期，才有如此大批量的瓷器运往国外。瓷碗中题诗题记也只有及少部分，大部分瓷碗都是彩绘装饰，有文字装饰的也是阿拉伯文为主。而在瓷壶中就几乎未见有诗文装饰。带文字装饰的瓷器则不足万分之一。据窑址调查和窑址发掘报告的记载，诗文瓷壶只在长沙窑窑区蓝岸嘴出土了近 2 百件，而长沙窑的其他窑区出土则很少。是什么原因造成诗文瓷壶只在蓝岸嘴这一窑区有如此多的文化堆积，这个诗文壶埋藏区域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是否文化堆积区域发掘殆尽，还有待今后出土更多的资料来进行研究。

《长沙窑》和《唐诗的弃儿》二书中所录长沙窑诗文瓷壶虽多，却未见有具体纪年的。而本文所收录的唐代长沙窑青釉诗文瓷壶（图 2）上所题之诗则有明确纪年："元和十六载，长庆一千年"。李效伟先生所著《长沙窑珍品新考》一书中也收录有："后岁迎新岁，新天接后天。元和十六载，长庆一千年"。此外，在 1995 年长沙窑窑址出土的一件题记瓷壶上也有"长庆"年号，题记内容为"□外长庆"四字，字体为草书，其中第一个字，因笔者学识浅薄，尚未释读出来，有待专家赐教。这三件诗文题记瓷壶都有唐代"长庆"年号。本文所收录的诗文题记瓷壶和《长沙窑》一书中的 B 型器Ⅲ式和Ⅳ式瓷壶相同。笔者认为，这几件诗文题记瓷壶和长沙窑出土的其他诗文题记瓷壶，其生产年代应该是在"元和"年至"长庆"年之间。长沙窑瓷器的兴起应该是在大历四年（即公元 769 年后），亦即中唐时期[12]。而"长庆"年号正好与长沙窑兴起的时期相距近五十年，也正是长沙窑的兴盛时期，而这一时期很多文人也在长沙活动比较频繁，加之唐代科举制度以考诗赋为主，无形中推动了"全民"的诗歌风气。因此，在长沙窑瓷壶中出现这样多的诗文题记也在情理之中。

**二　长沙窑诗文瓷壶中出现的地名是北方窑工南迁及长沙窑瓷器销往各地的最好实物例证**

长沙窑诗文瓷壶中提及地名的有洛阳、长安、新丰、秦川、南岭州等，这些地名一是与北方窑工南迁有关，二是与长沙窑瓷器销往外省有关。

《长沙窑》所录的诗文瓷壶中，诗文内容提及洛阳、长安、新丰和新阳等地名："自从君去后，常守旧时心。洛阳来路远，还（或凡）用几黄金。""不意多离别，临分洒泪难。愁容生白发，相送到长安。""自入新丰市，唯闻旧酒香。抱琴酤一醉，尽日卧垂杨。"[13]"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13]李效伟先生所著《长沙窑珍品新考》一书中也录有一首与秦

川相关联的诗："君去远秦川，无心恋管弦。空房对明月，心在白云边。"[14]诗中提到的长安、洛阳在唐代都是唐三彩的生产地。《长沙窑》一书中提到："长沙窑与唐三彩的关系：'长沙窑彩瓷中的彩斑不尽见于湘阴窑，而且还更多地见于北方陶瓷器。如长沙窑白釉绿彩装饰即见于河南濮阳出土的北齐黄釉瓷罐、陕西乾县出土的三彩啸马和唐代鲁山窑花瓷。而更多的流动式彩釉装饰则类似唐三彩'。"还有长沙窑彩釉瓷器中的青釉褐蓝彩人物击鼓捏塑，手中抱着的腰鼓，在河南鲁山窑也有发现。[15]李建毛先生在《长沙窑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谈到了"长沙窑与河南制瓷的关系"。[16]主要是从长沙窑出土的器型、彩釉来分析北方窑工的南迁。从文献资料分析唐代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唐玄宗逃往四川，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南迁，有很大部分迁至湖南。《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载"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并邑，十倍其初"；韦庄《湘中记》"楚地不只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湘中"即指湖南。史料记载了在南方有许多北方人，其中也有许多来自北方的窑工。笔者认为长沙窑的诗文瓷壶直接反映了窑工们的生活，诗文中提到的"洛阳"、"长安"、"秦川"、"新丰"等地名就是北方窑工南迁的最好实物例证。

长沙窑瓷壶中，诗文内容提及的地名还有"南岭"、"扬州"，"南海"等。如广东省出土一件长沙窑诗文瓷壶内容为："孤竹生南岭，安根本自危。每蒙东日照，常恐北风吹。"[17]还有长沙窑诗文瓷壶内容为："万里人南去，三秋雁北归。不知何岁月，得共女（汝）同归"。[18]"离国离家整日愁，一朝白尽少年头。为转（寻）亲故知何处，南海南边第一州。"[19]等。以上的诗文内容，反映亲人远离家乡后的思乡之情，从诗文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也反映长沙窑瓷器销往外省，在国内很多省、市均有出土，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长沙窑产品。本文所收"一双班鸟子，飞来五两头。借问岳家舫，附歌到扬州"一诗。扬州是隋唐时期著名的港口城市，也是中晚时期极其繁荣的商贸港口。而反映扬州的诗文则是长沙窑瓷器通过扬州这个商贸集散地销往国内外，从东南亚国家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及印尼海域"黑石号"沉船打捞出的五万多件长沙窑瓷器来看，更加印证了这一点，长沙窑瓷器不但在国内销售，还远销海外。

**三　唐代佛、道的兴盛不仅是帝王统治者的需要，而且已融入百姓生活**

唐代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帝国，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整顿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的措施。在思想上统治阶级大力推崇宗教信仰，对人民进行宗教教化，使得道、佛二教不但在上层社会盛行，在民间也流传甚广。

唐代道教风行，在上层统治者中格外得宠。李唐王室奉老聃为先祖，故唐高宗封为太上玄元皇帝。东都洛阳皇帝庙气派宏大。长安的太清宫中，先是玄宗雕像，后又有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侍立老子雕像左右，毕恭





毕敬。追求仙人羽化的道观发展势头高涨。

唐代的佛教更是兴旺，初、盛唐也是佛教扶摇直上的时代。京畿长安寺庙荟萃，城中坊里的60%都设立寺庙，其中规模最大者，"穷极壮丽，土木之愈万亿"。长安城内的佛塔更难以备数，它们的造型优美，引人入胜。

唐代佛、道作为社会整合力量是跨越阶层的，其宗教内容为皇室所欢迎，其思想资源为士大夫所欣赏，其巫风法术影响了广大民众。佛、道思想也为唐代艺术的精品提供了境界上的推动力。李白被称为道教诗人，又称为诗仙，王维被称为诗佛，都显示了宗教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在《全唐诗》中就收录了不少与佛、道二教有关的诗。《全唐诗》里直接反映道教与"王母"有关的有百余首。直接反映佛教与"如来"佛祖有关的有十余首。《全唐诗》卷857诗人吕岩《七言》中的"欲陪仙侣得身轻，飞过蓬莱彻上清。朱顶鹤来云外接，紫鳞鱼向海中迎。姮娥月桂花先吐，王母仙桃子渐成。下瞰日轮天欲晓，定知人世久长生。""曾战蚩尤玉座前，六龙高驾振鸣銮。如来车后随金鼓，黄帝旂傍戴铁冠。醉捋黑须三岛黯，怒抽霜剑十洲寒。轩辕世代横行后，直隐深岩久觅难。"这两首诗就反映了当时佛、道二教的兴盛。这些带有宗教文化的诗文不但在《全唐诗》比较多，而且在长沙窑的瓷器中以佛教纹饰为题材的也比较多见，也有道教、伊斯兰教的纹饰图案。在长沙窑的诗文瓷壶中也有反映佛、道二教的诗文，如"圣水出温泉"这首诗是宣传佛缘因果的。上文有一首"一双青鸟子"，"青鸟"出自《山海经》"西王母之山，有青鸟"，"青鸟"是西王母欲来的预兆，后人把"青鸟"称为传信的使者。长沙窑瓷壶在一首诗中反映佛、道二教合一的目前只发现本文所录的这首"欲到求仙所，王母少时开。卜人舟上坐，合眼见如来"。而唐代长沙窑是个没有文献记载的民间瓷窑，在瓷器中有很多与佛、道相关的纹饰和诗文，这足以证明唐代的宗教已渗透到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说明了当时佛、道思想在民间流传广远。

**注　释**


[1][5][8][12][15] 萧湘.《唐诗的弃儿》.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2][3][7][17] 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 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4][13] 李效伟.《长沙窑珍品新考》.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

[6]《全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9] 长沙窑编辑委员会.《长沙窑》. 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

[11] 李建毛.《长沙窑研究的几个问题》刊于《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九辑. 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16] 冯素阁.《广东省博物馆藏长沙窑瓷器的整理与研究》. 刊于《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九辑. 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 湖湘文化信息源的采集与分析

李　湘

自春秋始，人们就开始按各地风俗的不同来区别和认知区域文化了，而现代意义上区域文化的萌芽则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事。但是，自 30 年代“吴越文化”这一区域文化概念提出伊始，湘楚、吴越、巴蜀、岭南、三晋等地便相继开始了对本地区域文化的建设与研究，短短几十年内，区域文化研究之风席卷中华大地。尤其是近些年，由于党和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以及区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再造所起的巨大作用，区域文化研究对于提高本民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竞争力、对于以争取本土文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对于地方经济与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体现出来的非凡的意义与价值，使得其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湖湘文化研究正是随着近年来区域文化研究这股热潮再次在湖湘大地上刮起的一股飓风，湖湘学遂成为湖南学术界的一门显学。湖南师范大学将之列为“211”重点建设学科，并成立湖湘文化研究基地以及湖南省中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岳麓书院、湖南社会科学院将湖湘文化作为其专门的研究方向。一时之间，学者云集，湖湘文化研究百花齐放，成果迭出。正是在这样浓厚的湖湘文化研究背景之下，湖湘地方文化资源建设之潮相伴相生：当地政府、文化机构甚至企业单位同时表现出对湖湘文化的强烈关注，纷纷开设相应的网站与论坛，组织专门的机构对湖湘文献进行长期的回溯建设，并根据实际的需要对地方文献进行了全面地收集与整理，湖湘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开始迈出了矫健的步伐，如湖南省图书馆不仅设有专门的湖湘文化阅览室，而且在主页上设有专门的“地方特色资源”栏目，将湖湘文化资源按专题予以集中；湖南大学图书馆在继《书院数据库》之后，则再次推出了《湖南人物库》等等。而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也正是在这一浓厚的学术文化背景之下，组建了集地域性、史料性、学术性、资料性于一体的湖湘文化数据库。但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湖南地方文化数据库建设正处在起步阶段，所以，不足之处尚多。因此，本人希望通过湖湘文化数据库建设实践的反思，并结合湖湘文化学术研究的实际，谈谈关于湖湘文化信息源的采集这





一湖湘文化资源建设基本而首要的问题。

## 一、湖湘文化信息的采集原则

由于湖湘文化数据库建设其目的在于为湖湘文化研究提供一文献信息查询基地，它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所以，其信息与资料的采集原则也不一样。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 （一）针对性原则

湖湘文化信息源的采集主要是应湖湘文化研究用户之需，因此，在信息采集时，要围绕湖湘文化研究的方向与内容进行，并不断追踪湖湘文化的研究进程，及时把握湖湘文化研究的动态与发展方向，以使收集的资料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与现实性。在采集时，还要重点关注本校湖湘文化的学科建设，了解本校专家与学者的研究兴趣，以符合本校学科建设、专业设置以及学术研究的实际需要。

### （二）地域性原则

这里所说的地域性是指文献主题内容的地域性。也就是说，只要文献的主题内容与湖湘文化有关，就不用考虑其文献的出版地和出版形式，也不用考虑文献编著者的籍贯和文献的载体形式，也无论它是涉及本地的地理位置、建制沿革、名胜古迹、风俗人情、物产资源、语言文字，还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都可纳入其中。

### （三）系统性原则

近代以来，由于湖湘文化研究呈现出领域扩大，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等特点，很多课题往往是多学科理论模式和资料的累积，因此，在湖湘文化资源库的建设中，也要求融人多主题、多学科、多专业的资料内容。在信息采集上，它要求系统、全面而完整，凡反映湖南本地的发展并有助于湖湘文化现实研究的一切史料、学术成果和知识信息，均可纳入其中。同时，还要注意考虑资料提供上的连续性，以使资源的建设与学术研究的进展同步。

### （四）学术性原则

因为湖湘文化学术资源库是针对湖湘文化研究而言，因此，它要求采集的信息与数据不仅具有史料性与资料性，还要求其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所以，我们在进行信息的采集时，着重应在考察其是否与湖湘文化研究有关，而不是考虑其是否有助于湖湘文献的保存，或是所提供的资料与信息是否有助于湖湘发展的现实决策等。

### （五）真实性原则

真实性原则是要求采集的信息翔实而准确。由于年代久远，很多资料上所

包含的信息与数据往往会出现散佚不齐、或是无从考证的状况，所以对于一些古旧的文献史料在收集时应该慎重处理，挑选那些信息齐全、文字清晰的史料与典籍。其次是，由于网上免费资源的日益增多，因此，网上免费资源也是区域文献信息收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但网上信息真假莫辨，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在采集时，更要认真筛选，以保证所提供的资料与信息的真实与准确。

## 二、湖湘文化信息的采集范围

就信息与资料的采集范围而言，只要符合上述采集原则并在主题内容上与湖湘文化有关，在时间上无上下限之分，都可以进入我们的收藏视野。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类：

### （一）湖南地方志以及与湖南地方志相关的一切史料

湖南地方志包括湖南省志、通志以及各市、县志、行业志、乡土志等。与地方志相关的资料是指为修志所收集、整理、出版的各种资料，包括在修志过程中收集的各种原始资料。

### （二）湖湘古籍

是指清代以前带有湖南地方文化色彩的一切珍本、善本和普通古籍。同时包括湖南各地市县编制的家谱、族谱以及名人传记及年表等。

### （三）地方史料

地方史料是指与地方历史研究相关的资料与信息。一般由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撰写、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

### （四）地方年鉴、手册与工具书

主要是指那些能给湖湘文化研究提供相关的史料、事实、数据与背景知识的年鉴、手册与工具书。

### （五）报纸与期刊

主要是指与湖湘文化研究相关的学术报刊杂志，如《湖湘论坛》、《船山学刊》。

### （六）地方著述

清之后有关湖南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自然资源、名胜古迹等学术专著与报告、游记、笔记及其他专门著述或是会议记录。

### （七）湖南文化研究成果

包括湖湘文化研究专著、丛书、丛编、刊物、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和会议论文、调研报告、论文集以及湖湘文化研究目录与索引等。





### （八）湖湘人物资料

包括历代对湖南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湘籍或是旅湘人士的作品、传记、年谱、手迹手稿、轶事照片及对其进行研究的各种资料。

### （九）湖湘风土文物资料

湖南境内出土的金石文物图片和碑帖拓片以及考释文字。

### （十）多媒体资源

包括与湖湘文化及湖湘文化研究有关的一切音像资料等。

### （十一）网络资源

湖湘文化网络资源包括付费资源与免费资源。付费资源包括图书馆购买的电子资源中与湖湘文化主题内容相关的部分，免费资源包括网上免费搜索得来的资料与一些重要的线索。如包括湖湘网站、湖南地方网站、论坛、机构、出版社等与湖湘文化相关的知识与信息。

### （十二）灰色文献

指那些非正式渠道难以获得的非正式出版发行的资料与数据。如一些单位的半机密资料数据或机密文件、学术会议纪录、演讲稿、文艺创作手稿、访谈声像资料、文物发掘报告，以及私人往来信函、札记、手稿、照片等。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以上类目中，由于受建库条件的限制，对于方志、古籍、史料、地方年鉴、手册与工具书以及个人作品等地方著作，主要以采集原始的书目记录为主，再根据建库的具体要求，确定其数据的分类与标引方法，建立地方书目文献数据库即可。同时，还可以根据湖湘文化研究的实际确定信息与资料采集的重点和方向。就对近几年来湖湘文化研究的综合考察来看，学术界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对湖湘文化的源流、概念与内涵、湖湘学派、书院与教育、人物、地方文化、民俗与方言、文物与考古、湖湘文学、区域文化比较研究、湖湘文化对外传播、湖湘文化产业以及湖湘文化的反思等方面的研究与探讨上，因此，凡与以上主题相关的资料与信息可以作为重点进行采集。

## 三、湖湘文化信息采集的途径与方法

由于湖湘文化信息源涵盖书目、论文、论著、多媒体资源、图片资料等多种资源类型，相应地可以根据不同信息源的分布情况确定其采集的途径与方法。

### （一）湖湘书目信息

湖湘书目信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馆藏书目信息，另一部分是网上虚拟书目信息。采集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1. 馆藏公共目录查询系统。现在很多高校图书馆都藏有数量丰富的地方

文献，这一部分是我们建库的主要信息源，但是除公共馆之外，很少有编制成熟的地方文献书目，因此，对于地方文献书目的收集，更多的是依赖馆藏公共目录查询系统，通过篇名或是主题检索的途径将湖湘书目数据予以集中。其次，除了对本馆地方文献的书目信息进行集中之外，还可以进入其他公共馆或高校馆的公共目录查询系统，以作为对地方文献书目的补充。如进入CALIS湖南省中心公共目录查询系统或是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的中文及特藏数据库，进行灵活的主题或篇名检索，就可以检索到包括地方史料、方志、人物、典籍、家谱、论著等目录信息。

2. 图书引擎。利用图书引擎可以获得近几年出版的新书数据，一方面可以为地方文献的采购提供有力的依据，另一方面，也为用户购买该书提供了最新的线索。对于图书引擎，目前最有影响的是“读秀知识库”，它是一个面向全球的图书搜索引擎，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图书搜索引擎。还有一个难得的搜书引擎是“孔夫子旧书搜索网”，它是全球最大旧书搜索引擎。通过该引擎可以获得一些缺藏地方文献的书目信息。

### （二）重要研究成果与著作

由于单一馆建库能力有限，所以对于大多数地方文献著作，往往以收集其书目信息为主，但是对于重要湖湘文化研究学术成果与著述，则需要收录整本文献。目前对于湖湘文化研究成果的收集包括纸本和电子文献两大类。收集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 访求。主要是对纸本而言。访求主要是向湖湘文化研究成果收藏的部门与机构、学会、协会甚至是个人通过缴本或是交换的方式获得。如向校科研处与院系资料室、本校湖湘文化研究基地收集本校湖湘文化研究成果，向本省或是外省一些其他机构如湖大湖湘文化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湘学研究所、湖南社会科学院利用捐赠或是交换的方式获得一些重要的著述与成果，通过与知名专家的交流与询求，也可以获得一些个人捐赠的传记与回忆录。

2. 购买。也是对纸本而言。除了常规的通过新书征订目录购买或是现场采购的方式获得一些重要资料之外，通过专门的湖湘文化出版机构直购，也是收集湖湘文化研究著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如向被誉为“湖湘文化典籍出版的大本营”的岳麓书社直购。另一方面是针对电子文献而言。图书馆可以购买数字化产品。如购买《中国分省地方志》后，就可以将有关湖南的部分整合入库。

3. 馆藏电子资源检索。很多馆都订有超星、方正的数字产品，因而可以通过主题或是篇名检索的方式遴选出一些重要的著述与成果。





### （三）研究论文

湖湘文化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民国以来的所有报纸、杂志和会议纪录上收录的湖湘文化研究论文以及各大数据库、或是网站与论坛上可免费下载的论文。收集的途径主要以网络收集为主，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

1. 访问馆藏文献数据库。如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含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报纸等）、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数据库等学术文献数据库上散布有大量的湖湘文化学术论文，可以通过主题或是篇名检索将它们予以集中。

2. 访问专业性的电子报纸与期刊。如湖湘论坛、船山学刊。

3. 访问一些专业的网站与论坛。现在地方性的专业网站与论坛很多，如湖湘文化网、湖南文化信息网、红网论坛、湘里妹子学术论坛、梅山文化论坛都是有名的文化网站或是学术论坛，通过访问这些地方性的网站可以找到大量珍贵的灰色文献。

### （四）其他

其他如人物资料、文化风物、地方基本概况、文化遗迹等一般性的地方文献可以通过网络检索获得。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方式：

1. 访问本地的各大网站与论坛。如上所述，目前地方性网站与论坛很多，对于一般性的研究资料，可以通过访问地方政府文化网站、地方报纸的文化频道与学术论坛，如文化潇湘（中国经济网湖南频道）、长沙里手、湘潭人文社科网、尔雅文化、湘西作家网中有大量关于本地的人物、地方沿革、风土文物、史迹考古、民俗风情、方言土语等方面的知识与信息。

2. 利用百度搜索：除了访问本地的各大网站外，还可以用关键词在“百度”上搜索，所用的关键词主要是本地知名人物、地名、历史事件等。

3. 湖湘文化导航站。湖湘文化信息导航站可以提供一些重要资料或是某一专题文献的网址。通过对湖湘文化导航站的访问，可以获得关于湖湘人物、机构、学术研究、专业网站、论坛等方面资料与信息的线索，从而为用户查找地方信息提供捷径。

可以看出，湖湘文化信息采集的途径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资料类型选择相应的采集方式，但是信息与资料采集的效率与效果则依赖于采集人员的知识储备、技巧与策略。首先，从我们建库的定位与特色来看，所收资料主要以著作和论文为主。在进行采集时，主要采取以网络检索为主、纸本收集为辅的策略。而对于网络资源的收集，又主要依赖于馆藏电子资源，对地方网站与专业论坛的访问，主要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同时，对于一些重要的网站与论坛，则以超链的形式进行处理。

其次，当我们利用各数据库、书目检索系统、搜索引擎进行湖湘文化资源

的搜集时，对于检索词的运用相当重要。为了保证信息采集的全面性与系统性，我们必须从多角度、多方向、多主题、多学科切入进行多次检索。依据笔者对于湖湘文化的了解，从湖湘文化研究相关的学科主题、重要的地名、人名、机构、学术团体、刊名等角度进行切入收集的检索词有好几百个，如从湖湘人物这一角度切入，就可以选择上百人名进行检索，如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等。总之，在检索时，应调集一切与湖湘文献相关的词与词汇，这样才能保证资料收集的专业性与全面性。当然，这有赖于信息收集人员对于湖湘文化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对于湖湘文化资源采集的讨论是针对目前高校馆图书的建库条件与学术实际而言的，随着网络条件与资源环境的改善，以及学者研究兴趣的转移，对于资料采集的范围、策略与方式将会有所改变。同时，由于湖湘文化库的建设仍处于摸索阶段，在资料的采集原则与范围上尚未达成共识，对于信息、资料与数据的采集途径与方法，还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因此，笔者希望广大同仁能加入这一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中来，从而为湖南地方文化资源库的建设提供更为成熟的理论与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1、向常水．《湖湘文化研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湖湘论坛》，1999（5）
2、谢涛．《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湖湘文化研究综述》．《益阳师专学报》，2002（5）
3、乔红霞．《关于河洛文化数据库建设的思考》．《河南图书馆学刊》，2002（8）
4、冯世辉，牛晓玲．《高校图书馆应建立地方特色文化数据库》．《晋图学刊》，2006（2）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文学硕士）





# 樊锥及其维新思想评述

罗海兵

樊锥是湖南维新运动中典型的激进派人物，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全面学习西方的主张。可以说，其思想的进步性丝毫不亚于谭嗣同、唐才常。变法失败后，樊锥仍致力于社会改造与革命，是一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者。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他所知甚少，即使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著中对其也涉及不多。这与其在近代史上的贡献很不相称。本文拟就樊锥的生平及其维新思想作一简略评述。

## 一

樊锥（1872—1906），字一蒲，一字春渠、春徐，在日本期间名时中，后改名诚亮，湖南邵阳人。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可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 22 年是其求学求仕的时期，后 12 年则是其为国家为民族积极奔走的时期。

樊锥自幼家贫，但天资聪明好学，13 岁时便已通群经，旁及诸子。“工为文，奥折自喜，师抑之，益奇恣，不受制科轨范。”（石建勋：《樊锥传略》）15 岁时入邑城。后受到率先在长沙实行课程改革的湖南学政张亨嘉的赏识，入县学为诸生。中秀才后，樊锥即在邵阳城乡设馆授徒，为蔡锷授业师。不久，与同邑石守成、石建勋等到长沙城南书院就读，与苏舆同出经学大师王先谦门下。

1895 年甲午战争湘军大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了正在求学的樊锥极大震动。他说：“夫以堂堂之九土，而至万不如区区之三岛，岂不大可羞可憾可愧可愤哉！”（《樊锥集》以下引文均同）从此，樊锥的思想发生质变，产生了激进的改革思想，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国图强的维新运动中去。是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按察使黄遵宪先后入湘，都以开辟湖南新政为己任。樊锥因在书院所作课艺中倡言“揽子墨之流，证欧罗之续；总绝代之殊尤，辩章乎宏纂”，而受到江标激赏，于 1897 年被选拔为光绪丁酉科拔贡。同年 10

月，湖南时务学堂成立。樊锥又上书陈宝箴，建议“开拓用才之术”，以“转移风化”，“去天下之名高，因天下之材器，择可而断行之”，希望陈宝箴“不忤狂言，其通者取之，其不通者容之，为国家计之”。可以说，樊锥这种“用人唯才”的思想是对当时腐败封建吏治的强有力冲击。

1898 年 2 月，南学会在长沙开讲，樊锥及时响应，在邵阳成立南学会邵阳分会，并自任会长，手订章程。章程内容大略为“一切拘墟狭隘之见，概宜屏除”，“在会人不准谈及词讼案件”，“力除一切浮华嚣张之习”等。同年 3 月，熊希龄、谭嗣同等创办《湘报》，樊锥积极赞助，率先撰文，是《湘报》的六位撰述之一。他在《湘报》上发表了《开诚篇》、《发锢》和《劝湘江》等一系列文章，沉痛论述中国不变法的危险，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积极宣扬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学说，是维新运动中极有影响力的檄文。4 月，樊锥又与熊希龄、谭嗣同在长沙成立湖南不缠足会，他担任董事，大力提倡妇女解放。不久，戊戌政变发生，樊锥因隐匿深山而幸免于难。

1900 年，樊锥参加了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他逃往上海，与陈范、章太炎等人一起办理《苏报》。《苏报》案发生后，他又避祸远走日本，在日本成城学校习军事，后改习法政。此时，樊锥与黄兴、陈天华等交善，思想倾向革命。1902 年樊锥与留日湘籍学生杨笃生、黄兴等共同创办了以译文为主要内容的《游学译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宣传近代民族民主思想。1904 年回国参加了黄兴在长沙举行的华兴会起义。起义失败后，改名诚亮入南京军校任教，后应弟子蔡锷之邀到桂林陆军小学任教。不久因病返湘。1906 年病逝，年仅 34 岁。

## 二

甲午战争后，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樊锥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他大呼：“悲夫！悲夫！……俄人操旅顺、大连湾已，而德人挟山东之全政已，进而法人索四款之利益已，进而英租长江，日不肯还威海卫已，进而列国莫不奋割一脔、归遗其主已，安见有区区之土可以幸全者！”表示：“吾不知连将蹈东海而死，抑南走非，北走墨，毋忍坐而睹其状者。”拳拳爱国之情，跃然纸上。正是这种坚贞的爱国精神与当时形势相结合，导致其维新思想的形成，使他成为湖南乃至全国最激进最有见解的思想家之一。最能代表其思想的，就是他发表在《湘报》上的《开诚篇》和《发锢》、《劝湘江》三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樊锥提出了一整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维新方案。

在政治方面，樊锥迫切要求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首先，他大呼不变法的





危险：“今天下之病，匪直骨髓骎人膏肓已，失此不变，则忍痛终古已；失此不变，则抑终必变已，则亦变之于人已。”他认为：“不穷则不变，不变则不通，不通则不久，不久则中国几乎绝也，则黄种几乎斩也，则孔教几乎灭也。”在这里，他将变法和救亡紧紧结合起来。他指出：变法的目的“不过止于存中国，保教种，勿使数千年神圣之区一旦殄灭以澌尽，蹈波兰、印度、阿非之覆辙而已。”同时，樊锥还对封建专制进行无情的揭露。他描述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抑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沦肌浸髓，梏梦桎魂，嬉酣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逐于醉生魔死之曲，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漫无所悟，一无所识，沉沉昏昏，瞢瞢阒阒。”针对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他驳斥说：“是道也，所谓可常可变可大可小之道也。”他猛烈批判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说这些封建卫道士“自命孔徒，昂昂儒服，以为舍我之外必无天地，舍我之外必无教化”。

其次，他积极宣扬资产阶级民权平等学说，要求兴民权、开民智、行民主。针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他大胆提出“公天下”的主张。他说：“夫天下之理，天下公之；天下之事，天下公之。天下者，天下公之，公天下而为之，为之而效之，效之而成之。”他主张改君主专制为君民共主，认为：“君民共主，救亡铁案。”要求：“起民权、撰议院、开国会，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一切用人之政，付之国会议院，而无所顾惜”；“无满汉之见，无亲疏之见，无京省之见，无远迩之见，人人平等，权权平等”。可见，樊锥提出的变法方案是“民权—国会—君主立宪”。

在经济方面，樊锥主张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抵制洋货倾销。他说：“夫工者劝商之本也，无工是无商也。”这是典型的重工思想。他通过分析认为：欧美列强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工业发达，“欧墨列邦，原本基始，发祥致大，舍工之力，莫或至是。米利坚之富也，……工为之也。英吉利之盛也，……工为之也。日本之兴也，……工为之也。”指出，如果中国的工业能兴盛起来，“则天下事不足成，西人不足畏已”。同时，他指出工业发达的社会作用：“工政立，工业兴，百万穷民，胥经消纳，土匪盗贼，一律收拾，无业有业，无归有归，赈恤出其中，迁善出其中。”至于如何发展工业，他提出要“大兴艺学，众建学堂，宏创工厂，富购机器，广选西法，多聘西师”。建议对那些创新工业的人给予奖励：“国有制一新器，创一新法，有益民生国计者，与奖牌一，以为表异，给凭文一，许其专利十年。”至于农业、商业，他也十分重视。认为：“农家者，抑工之流亚也”；而工业与商业相互影响，“未有工赢而商绌者也，未有商赢而国绌者也”。对于农业商业，提出了许多现在看来仍有意义的

建议："国有一农养十人，养数十人者，编为上农，与奖牌一，以为表异。……国有纠集茶丝公司及别等公司者，与奖牌，给凭文，加保护，与国休戚。"他还认为诸如轮船、火车、电线、邮政也是"调血轮养气筋之大物也"。

在文化方面，樊锥主张改革科举八股制。他愤然指出："时文不废，则孔教必亡无疑也。"认为八股时文之毒使得"异书禁绝，则眉睫之外无剩睹矣；臭腐堘逕，则方寸之隙无徐明矣。要求改革科举，由朝廷下文废除八股取士。对于科举内容，他希望多出"经史时务题"。他还十分重视师范教育，说："天下百治本于学，天下百学本于师。""然则是师范学也，盖天下乡国师道之材之所以出也，可不谓重焉矣乎?"同时，他对教师素质也提出了要求："夫以师范学既如被其重，是故不可以不先修身也。苟身不修，虽学焉无不通，而固不足以为人师也。"他呼吁全社会办学，建议奖励地方官员兴办学堂："有能为农会学堂以兴农学问保本富者，……有能为工会学堂以兴工学问保艺富者，……有能为商会学堂以兴商学问保市富者，得千人给五品衔一，得万人给五品衔十。"还建议："厚遣广选，才臣学生，商工士民，分派数十国游历学习"；"有士农工商诸会学堂能建大力以游历外洋，讲求政学艺学，归而教者，给二品衔一"。可以说，樊锥的教育思想是有远见的，对我们今天如何发展教育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在社会习俗方面，樊锥提倡移风易俗，主张尽革陋规恶习。他提出："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这实际上就是中国近代全盘西化论的开端。他在1898年与熊希龄等人成立湖南不缠足会的同时，也提出了禁缠足方案："自光绪二十年所生女子，有缠足者，人每岁纳税银一两；有放足者，人给奖牌一，以为表异；有能倡为会者，得千人给五品衔一，得万人给五品衔十。"对于"官民之受毒于鸦片，因而软疲无用，作废大事"，他建议："有能卓志戒烟，毕世不复吸者，人给奖牌一，以为表异；有能倡为会者，得千人给五品衔一，得万人给五品衔十。"这些激进主张和建议对当时的维新运动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樊锥的思想是异常激进的，他那高亢昂扬的言论和主张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因而引起了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守旧势力的极大恐慌和疯狂进攻。湖广总督张之洞"驰电主杀锥、爾，以谢天下"，樊锥的同学苏舆先后炮制了《驳南学分会章程条议》和《摘驳樊锥开诚篇中语尤悖谬者》，指责樊锥"叛背圣教，弃灭伦纪"，大骂樊锥"不产于空桑，安得书此丧心病狂之论"，污蔑樊锥为"权奸逆竖，真汉奸之尤哉"，即使"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以蔽其辜"。而邵阳举人曾廉更是纠集当地士绅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





伦常，惑世诬民"的罪名，将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乱"，并四处张贴，播告通省。

## 三

樊锥生平自视甚高，而又意气不凡，曾自署楹曰："顶天立地三间屋，绝后空前一个人。"被王先谦之流称为"狂生"。樊锥又称："生死不能夺其志，贵贱不足换其帜。"以示其维新思想之坚定。事实也确是这样。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作为维新派成员的樊锥，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从本阶级利益出发，积极揭露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文教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当时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在肯定樊锥思想激进的同时，也应注意其思想上的局限性。维新派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维新派虽然朝气蓬勃，但政治力量薄弱，而且缺乏斗争策略。樊锥猛烈抨击顽固守旧派"自命孔徒"，但是他本人却不敢抛弃孔教这个幌子。他既主张"唯泰西者是效"，又坚持"用孔子纪年"，并说："不佞浅于无似，唯学孔子大圣人经世之绪"，"孔教一日存，吾一日必图以济之"。他反对君主专制，抨击皇权，却又忠于皇帝，说什么"水恩土德，二百余年，谁非臣子，谁绝天良?"他找不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源泉，把变法的希望只寄托在"明君圣主"身上，认为："吾皇操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而由于脱离了人民群众，对于光绪的无权，他就只能叹息："而君不能径有其权，而径行其权，此在吾皇每一念及，未尝不惨然下泪，仰天无赖，而莫可谁何也!"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却又对西方列强抱有幻想，认为只有我们向西方学习，拥戴光绪变法，就"可免万国之口实诛讨"，"我自兴之，无待彼兴，彼必不肯惨施杀戮"。这就是其思想互相矛盾的地方，也证明了要救中国走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当然，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是樊锥个人的局限性，也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樊锥是个勇于追求真理的人。他曾说过："如有能力使中国不亡，圣教不危，神种不险者，不问其如何，吾愿举天下以从之。"正是这一思想使得他能够不断前进，跳出变法改良的樊篱，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行列。

(作者系湖南师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 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三题

杨　柳

## 一、近代湖湘文化的优良精神特质及其局限性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是在湖南这块地方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颇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现出不同的优良精神特质和局限性。我们今天讲创新湖湘文化，不可不先了解一下近代湖湘文化的优良精神特质及其局限性。

约略说来，近代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主要有以下五点：一、“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操。从屈原、贾谊的忧国伤时，到《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从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到毛泽东的“身无半文，心忧天下”，都一脉相承。二、“经世致用”的学用一致学风。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们，特别强调“通经致用”。胡安国“治《春秋》，意在经世”。胡宏提出“学以致用”。王夫之主张“知行相资以为用”。这种经世致用学风，在近代以来，经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以及后来的维新、革命巨子们相继阐发并力行，得到了大大发扬。三、“重践履”、“笃实”的务实作风。张栻“贵实用而耻空言”。王夫之说：“君子之道，力行而已。”魏源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强调求实效。黄兴一生身体力行“笃实”二字，并以之作为家教格言。毛泽东更是反复强调“实事求是”，还专门写了《实践论》。四、“趋新”、“善变”的创新意识。皮锡瑞在谈到湖南于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由保守到激进的巨大转变时说：“近日湖南文风又为各省之最，是由地气变而益盛，亦由乡先生之善变也。”当然这种“善变”纯是为了救国而另寻出路。蔡元培也说到：“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时固然守得很凶，趋新时也趋得很急，遇事能负责任。”五、“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陈独秀曾撰专文盛赞王船山“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曾国藩、罗泽南等“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蔡松坡“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并把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概括为“湖南人底精神”，文章的题目就是《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湖湘文





化以上这些优良精神特质，各方人士已多所论述，兹不详述。

湖湘文化的局限性，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稍显闭塞；二是有时虚骄自大；三是倔犟偏激。闭塞容易产生保守，虚骄不免于故步不前和维护旧道，而倔犟包含着固执，偏激则在思想、行动上表现出缺乏理智和好走极端。因此，我们今天要创新湖湘文化，除了要与时俱进地发扬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即其基本精神特质外，尤其需要大大增强其开放性、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不断克服其曾显闭塞、虚骄、倔犟和偏激的局限性，以实现湖湘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健康发展。

## 二、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共性与交汇

湖南与两广（广东、广西，本文主要讲广东）毗邻，古代均属南蛮或百越地区；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历史上曾经互相影响、关系密切；它们同属中华文化的分支。因而二者之间除各有特点即个性外，还有不少彼此一致或近似的地方即共性。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谭嗣同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治事篇第十·湘粤》。文章写道：“吾湘号为能开风气，而近与粤邻。粤又雄区耳，人才蔚起，货宝充牣，表海为藩，环山作砺，亦必道吾湘而通中原，取远势，宏矿产，兴商务，辅车之依，自然之形也。”这几句说两省地理关系和经济联系，湖南是广东通往中原、发展经济的通道，二者有着“辅车相依”的亲密关系。文章接着写道：“近年两省士大夫互相倾慕结纳，情亲迥非泛泛。粤人黄公度廉访、梁卓如孝廉来讲学于吾湘，吾湘亦有张阁学百熙督学于粤以报之。”这几句说的戊戌维新运动期间，两省人士的密切往来，粤人黄遵宪任湖南按察使，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而湘人张百熙则往广东督学。文章又接着写道：“若夫学术抗滥，尤足惊异。自南海康工部精探道奥，昌明正学，其门人克肩巨任，于斯有光，一洒俗儒破碎拘挛之陋，而追先圣微言大义之遗，湘人闻风，争自兴起，喁喁胶序，怀德慕思，几有平五岭而一逵之心，混两派而并流之势。”这几句特别强调两省在学术文化上惊人的一致：自康有为、梁启超等阐发今文经学，倡维新变法，湘人闻风响应，办学议政，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相互交流，并力维新，几乎出现了平五岭而变通途、两种文化交汇合流的势头。

1925年，宫廷璋在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亦说过：“中国民族性以中庸调和闻于世界，惟湘粤人独殊：倔强偏激，猛进善变，酷类法国人。当其信以为是也，牺牲一切，以为必达极端而后已；及悟其非，又易道而趋，必达极端而后已。知无不行，行则义无反顾，纵前后异致，绝不以为歉。故近百年间，湘粤文化进步，湘粤人之活动能力增加，中国遂无役不有湘粤人参与。”“倔强偏

激，猛进善变”，“知无不行，行则义无反顾”，确实表现了湖南人与广东人、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共性的一面，也是两省人士常能互相交流、并肩战斗，两种文化常能彼此接近、并流前进的基本原因。

## 三、再“通湘粤为一气”，加快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文化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它对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起反作用。两种优质文化的交汇，冲撞融合，取长补短，必然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与谭嗣同、唐才常等的交往，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主讲时务学堂，激进的思想解放，使曾经“以守旧闭化名天下”的湖南，迅速跃居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并一度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湖南的现代化也从此起步。时务学堂培养的莘莘学子，不仅在当时成为维新运动的骨干，不少人后来又参加了辛亥以来的民主革命，还有些则在教育和科技领域施展作为，均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辛亥革命时期，广东人孙中山与湖南人黄兴联手，创建了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迈进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大革命时期，湖南以及其他省份众多士子奔赴广州，使广东迅速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国民革命军早期组建的 8 个军中，有三个军的军长是湖南人（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六军军长程潜、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又有三个军的党代表或副党代表是湖南人（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第六军副党代表林伯渠）。在黄埔军校出身的 330 位名将中，湖南籍的有 81 位；著名的“黄埔三杰”——贺衷寒、蒋先云、陈赓全都是湖南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湖南和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曾有过骄人的辉煌，又都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折腾和挫败，进展大体上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经济社会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湖南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见事迟，行动缓，措施不力，远远地落在了后面。近几年，湖南上下各方人士有所觉醒，狠抓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急起直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机遇也是存在的。2004 年 6 月，《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出台，这无疑成为湖南加快发展的难得的好机会。在泛珠三角区的 9 省 2 特区中，由于地缘的密切联系，也由于文化上的接近和有较多共同性，湖南显然更应该特别加强与两广特别是广东的合作，湘粤携手，共谋发展。还在 106 年前，也就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梁启超就说过：“今日救中国，下手功夫在通湘粤为一气。”他接着还说道：“欲通湘粤为一气，在以湘之才，用粤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这是针对当时拟议中的粤汉铁路建设，湘粤人士力争经过湖南而言（最初规划





是经过江西）。

那么，我们在今天又如何“通湘粤为一气”，加快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呢？我以为，下列四点是必须特别注意的。首先，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是一个前提，也是一种动力。110 年前即戊戌维新运动伊始，湖南现代化的起步（这种起步比全国先进省区落后了 30 余年），就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时值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人们迅速从过去因湘军兴起而生发的虚骄守旧状态中猛醒过来，“人思自奋，家议维新”，纷纷开矿设厂、办报刊、兴学校、立学会、办保卫局……使原来极端守旧的湖南一变而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些人又背上“两个主席的故乡”等虚骄包袱，在迅猛发展的改革开放大潮中见事迟，行动缓，有时甚至维护旧道，以至拉大了与先进省区的差距。这些经验教训，是我们应该牢牢记取的。第二，必须加大交通建设力度。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在谈到“通湘粤为一气”时，特别强调了建设铁路的重要性；谭嗣同更提出了“平五岭而一逵”的目标。今天，两省间的交通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还远不能适应现代化高速发展的要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建设，航空设施的改善，以至于湘江水域和珠江水域的沟通整修，都需要加大力度和速度。第三，必须加大开放和招商引资力度。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提出了“以湘之才，用粤之财”的思想。其实，这并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就是拿广东的钱来帮湖南搞建设，它同样意味着广东富余的资金和产业来湖南开辟新的发展地盘，是共谋发展、互利双赢的大好事。湖南已决定在基础设施、产业与投资、商务与贸易、旅游、农业、劳务、科教文化、信息化建设、环境保护、卫生防疫等 10 个领域与广东进行具体合作，前景看好。第四，以我为主，坚持和发扬湖南产业优势。长期以来，湖南在农产品供应、人才和劳务输出、休闲旅游等方面，为广东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也反映了湖南的优势。湖南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即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有色金属之乡。湖南只有坚持和充分发扬自己的优势，打造产业湘军，才不会丧失自我，才能在与广东及其他省区的合作中，真正做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作者系本馆馆员，2004 年 10 月为“2004 创新湖湘文化打造产业湘军峰会”而作）

# 易祓与识山楼

易凤葵

宁乡县千年古镇巷子口之所以有识山楼，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南宋易祓写了《识山楼记》，这篇文章最早石刻于识山楼中，后分别刊载在《宁乡县志》（乾隆志）和《易氏族谱》中，这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

尝观庐山坡翁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盖以此山中人，终日耕桑樵木为生，于是所见益狭，所处益隘，岂识山之所以为山乎！予于山外求之，左江右湖，诸峰耸然，千岩万壑，层见叠出。虽未周历遍观，而庐山高致，已了然于胸次。此坡翁识山之意也！仆于嘉定已卯岁，自湘城归沩浦，复寻三径之旧，正在沩山之外，作楼于所居之南。其下为读书堂，旁一舍环列于其间，设花槛与楼相对。仆老矣，日游息于是。沩山在望，紫翠交错，若拱若揖，相为酬酢。山间以四时代谢，烟云变化，朝暮万状，不越指顾之顷，洞察秋毫之微，兹果山之识者欤？然山外之人，聚庐而处，皆非所见，若乎物态万变，凛夫不可磨灭。系以诗曰："山外如何便识山，白云出岫鸟知还。更看面目知端底，却在先生几杖间。"若质老泉，当领颔一笑，遂摘坡翁诗句以为一匾。

易祓的《识山楼记》以"识山"为主题，通过"识山"透视官场迷雾，抒发人生感慨，寓意极深，是作者久历官场之后才写的。据史料记载，易祓29岁时进京赴考夺得南宋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状元后，历任宋孝宗、宁宗、理宗三朝重臣，官至礼部尚书（其职责相当于今天主管国家外交、教育、文化等工作的副总理），因此，他对官场是有发言权的。

易祓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一方面南宋半壁江山已被北方金国的奴隶主夺去，一方面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有大量社会矛盾没有解决。那个时代优秀的知识分子无不以忧国忧民为己任，其人格力量集中体现在北宋范仲淹所作《岳阳楼记》抒发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中。易祓正是封建时代





一个非常可敬的知识分子，他靠寒窗苦读，由一个山村的农家子弟一举成为状元，他有忧国忧民的强烈使命感，又有农家子弟的单纯和直率，这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场却很容易被人算计而造成仕途的大起大落和人生的大喜大悲，这就是他在《识山楼记》中抒发的心中困惑。当时南宋自高宗、秦桧冤杀岳飞以来，国土丧失，人民愤慨，许多有志之士都想效法岳飞，挥师北伐。宋宁宗开禧二年，即公元1206年10月，面对金兵大举南下，朝廷"主和"与"主战"两派进行论战。当时易祓像陆游一样积极主张抗战，并且是主战派重要成员，易祓指出："敌国有必败之势，中国有必胜之理"，"敌国如外强中干之人，仅延喘息"。宁宗采纳了主战派的意见，决定迎敌，但是由于缺乏卓越的将帅，加上主和派多方阻挠抗战，以至出师不利，结果北伐失败，主战派因战败而被主和派利用，他们推波助澜，逼宋宁宗向金屈服，主战派有的被杀，多数被贬，易祓也因此受到株连被贬职到广西融州、全州等边远地区任太守，他被贬时年仅50岁。易祓在贬所一干就是10年，他为官清正，爱惜民力，深得民心。公元1216年，易祓年届花甲，他在衡阳太守的任上，宁宗又降旨他"去留自便"，易祓只得告别官场返归故里。

易祓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重过平民生活，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新鲜感，每天他起得很早，或散步，或种菜，或挑水，或与老人聊天。易祓住所的对面是风景瑰丽的沩山，他见到了这样的自然景观：沩峰九折高高耸立，但常常笼罩在云雾中，等到太阳一出，雾气散去，才露出山峰。由此他联想到，官场不也经常有浓雾遮住么！他始终认为开禧二年的那场抗战是正确的，朝廷对主战派的惩处包括对他的贬职流放，他不服气，有满肚子的冤情和委屈。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忧虑，他困惑，他恨朝廷中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伪君子。于是他将自己新建的读书楼取名为"识山楼"，并构思了《识山楼记》这篇文章来抒发自己的心绪。公元1219年，在他的精心设计下，这处按照苏杭园林风格建成的楼阁（易祓因在当时的京城临安生活过多年，对苏杭园林十分钟爱）坐落在屏壶山山脚、沩水之滨。园门内，是一座朱红廊柱和青色屋顶的楼阁，易祓亲笔题匾为"识山楼"，并题写了"尺寸井然身有主，行藏定矣梦无惊"的对联，还将《识山楼记》一文镌刻于楼中。他在楼前凿有一池，称"步月池"，池边环植竹木。楼后有一栋木质结构的两层楼房，楼上藏书，楼下读书。易祓在这里过着一种隐居生活，当时他所居住的巷子口极为偏僻，与外界只有一条20余里长的羊肠小道相通。易祓在这样的环境中，抛弃名利，耐住寂寞，苦心研读，精心著述。他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据现代著名哲学史家杨东莼先生《中国学术史讲话》称：易祓对《周礼》的阐释与北宋王安石齐名，其所著《周官总义》

与王安石所著《周官新义》"皆断以己意，与先儒颇有异同"。另据《湖南通史》记载：湖南经学家当首推宁乡易祓。易祓早岁读《易》，后侍经筵，常常以《易》进讲，暇时仔细研读，如此达20余年，终于"略训诂而明大义，合诸家之意而归之于一"，并著成《周易总义》，阐发义理。清人朱彝尊说，是书"每卦先括为总论，复于六爻之下各为注解，于经义实多所发明"。为便于学人，易祓另撰《易学举隅》4卷，集象、数为之图说，"于宋儒所未言发明尤多"，与《总义》互相参考。《周官总义》，《宋史·艺文志》载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不载。此书已佚，散存于《永乐大典》中，计有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记四官，佚地官、夏官。清修《四库全书》时，裒合四官之文编次成帙，"虽非完帙，然十已得其八九"。此书研索经文，断以己意，与先儒颇有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举其论太宰九赋、论宇宙九献、论车舟人之四旗等，指出其要"皆以经绎经，非凿空杜撰"；对内宰二事，酒正式法、园廛漆林诸赋、凌人斩冰等的诠论"亦皆自出新义，而于职方氏之地理山川尤为详悉"。《湖南通史》中还特别提到，易祓两《总义》颇受当时和后世重视，宋人乐雷发有《谒山斋诗》（易祓号山斋），就反映出这一历史情景，诗云："淳熙人物到嘉熙，听说山斋亦白髭。细嚼梅花读总义，只因姬老是相知。"易祓流传于当时的著作有《周易总义》30卷、《周官总义》30卷，此外还有《禹贡疆札记》、《易学举隅》、《周礼释疑》、《汉南北军制》、《山斋集》等。

易祓在文学上的造诣也很深，他还写了很多诗词，有的已入选《全宋词》，未刊入《全宋词》现刊在乾隆《易氏族谱》中的还有：

一宵风雨送春归，绿暗红稀。画楼镇日无人到，与谁同捻花枝？门外蔷薇开也，枝头梅子青时，玉人空自数归期。翠敛愁眉，塞鸿不到双鱼香，叹楼前流水难西。新恨欲题红叶，东风满院花飞。

《调寄风入松·春晚》

不今不古不朝昏，只与南山伴白云。我既无声亦无相，众生当以不闻闻。

《悬钟石》

万事缘从忙处错，寂然不动乃能通。君看开济规模事，却属南山高卧翁。

《赠侄茂》

山林朝市不同僚，到底山林也是高。我愧朝班无补报，君于林下任游遨。方嗟今日成疏阔，急得哀音重郁陶。座阻抚官一怅恸，诗成清血滴宫袍。

《挽茂侄》

我醉欲眠君罢休，谁能扶杖听江流。椒花当户不知夜，榕叶满庭疑是秋。





吾道从来无物景，此心何处不天游。鸿达赖有音书至，春在江南云梦周。

《感怀》

在识山楼，易祓不仅以诗言志，并且经常以诗会友，以诗寄情。他与夫人肖氏乃天作之合，夫妻二人经常唱和诗作，传为佳话。易祓妻本来并非名门望族，而是村妇出身，早年她伴夫攻读，加上悟性极高，亦有诗词传世，比如她的名词《一剪梅·染泪修书》已收入《全宋词》，至今脍炙人口：

染泪修书寄彦章（易祓字彦章），贪却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就不还乡，石做心肠，铁做心肠。红日三竿未理妆，虚度韶光，瘦损容光。相思何日得成双，羞对鸳鸯，懒绣鸳鸯。

古识山楼实实在在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千年文化景观，可惜这所当地名楼现已毁，唯有楼前的步月池至今尚存，水边依稀可见当年堆砌假山石的基座。新中国成立之初，以识山楼遗址建筑为中心，这里还有一片完整无缺的宋代文化遗存，如状元故居（献宝台）、状元祠（屏山祠）。状元易祓墓、状元夫人肖氏墓、状元桥（屏壶桥）、状元井、状元洗马池等等，可惜这些弥足珍贵的古建筑除状元桥、状元井（现存两处）外，其余均在"文化大革命"和后来的学校达标中被拆除或被摧毁。"古树清泉俱已渺，只留情景在心头"，三湘大地一处不可多得的宋代文化村已经完全消失，并且消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这是十分可惜的。站在识山楼遗址前，遥想当年伊人青灯黄卷、暮读晨吟的情景，我对识山楼主人的敬意不禁油然而生。同时，对于我辈未能在前人开创的文化基业上发扬光大，不能不留下几分愧疚。

据史料记载：易祓乡居数年之后，至公元1225年宁宗死，理宗即位，年近古稀的易祓得到纠错平反，被重召入京，授职为朝议大夫，封为宁乡开国男，食邑千户。至宋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易祓年已82岁，于是告老还乡。两年后（1240年）的春暖花开时节，这位三朝老臣以84岁的高龄在故里病故，遗体葬于识山楼对面二三百米远的屏壶山之腰。据史书记载，易祓身故的噩耗传到临安，南宋皇帝理宗念他对朝廷的贡献和一生经历坎坷，传旨厚葬，并亲撰祭文，其中有句：

嘻嘻！祓臣之生，生受侯封，忠勤不泯。祓臣之薨，薨为渝葬，节义犹新。明明上品，万载留名；金銮之下，左阁忠臣；九重之内，第及皇亲；至德至仁，功满朝廷；朝官石马，敕护坟茔。

易祓为人刚直不阿，敢于抗金。他死后被厚葬，墓地规模宏大，建筑不凡。当年从识山楼通墓地有一条约两米宽的陵道，沿陵道到达屏壶山山脚，易

祓墓前有石人、石牛、石马、石虎，再往前，便是古雅别致的墓庐。墓庐正厅立着易祓的楠木雕像并有记载他生平简历的碑刻。穿过墓庐，再沿36步石级便是易祓的墓地。这里古柏森森，幽雅恬静。墓地自南宋理宗年间起，历经宋、元、明、清、民国，历时七百余年。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人民政府在1959年把易祓墓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以破“四旧”为由把墓庐和墓掘了，幸运的是由于易祓的墓室较深，造反派只破坏了墓围就撤走了。其墓至今（2006）未及修复。

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易祓，他十分重视人格的修养和对后代的教育。在易祓中状元后的一二十余年里，这里先后出了6名进士，其中5名是易祓的弟侄，历代传为美谈。在易祓故居一带，至今还有一个“世科里”的地名，意为世世代代出科举人才的地方。

识山古楼何处寻，状元故里隐情深。识山楼虽然不能同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等江南名楼等量齐观，但作为一处历史文化遗产，它记录着一位文化长者当年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我站在古楼遗址前，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我为故乡这方热土丰厚的文化底蕴而骄傲，而自豪！

（作者系原中共长沙市委副秘书长，刘少奇纪念馆馆长）





# 一片丹心长报国

## ——忆先父刘公武在抗日战争前后的艰难岁月

刘　晓

今年（2005）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想当年胜利之日，是何等震撼人心、荡气回肠。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但历历往事，随着六十周年的到来幕幕展现而又铭记在心。

父亲就读于复旦大学时成为学运先锋，后因闹学潮被退学回乡，随即身体力行地参加了湖南农民运动，到大革命失败后又被迫出走南洋去德国留学。青年时代的父亲目睹国弱民穷，列强环伺，彷徨无路。但正是抗日救亡这条主线，链结了父亲一生中最辉煌的十四年时光，是父亲一生中最值得怀念、使人崇敬的一段经历。

### 一、南洋北上思报国

1931年，父亲留德归来转道南洋，担任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长，突闻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校震惊和愤慨，师生爱国情切，报国有心，无不摩拳擦掌，欲与日寇一拼为快。后又继闻上海“一·二八”事变，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寇进犯，捷报频传，全校师生群情振奋。父亲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奔忙于筹募金钱和物资，支援上海军民抗战，情绪空前热烈。谁料淞沪军民奋勇杀敌、海内外赤子踊跃捐助之际，却闻上海抗战被迫停战的消息，父亲压抑不住自己的悲愤，走进每一间教室，转告这一消息。全校师生立即自动停课，悲愤填膺，更有人失声痛哭。而后全校师生不约而同地自动汇集礼堂，齐唱校歌：“我中华之光……万古其无疆……”这如泣如诉、震撼人心的歌声，是父亲永生不能忘怀的慷慨悲歌。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满怀爱国热情的父亲的人生，从此不再偏居南洋一隅，毅然回国北上追随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亲身投入了中华民族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

## 二、追随冯玉祥抗日

1933年初，日寇侵略日甚，华北危急。父亲奔赴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市，通过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同学李连山（冯玉祥妻李德全之弟）的引荐，担任冯玉祥将军秘书，正式投入了抗日战争。父亲耳闻目睹冯玉祥将军蓝布短棉袄、厚底棉鞋，和蔼可亲，艰苦朴素之品德。不论是会见国民党要员如李烈钧、丁超五、黄少谷，还是接待部将吉鸿昌、方振武，总是侃侃而谈，大义凛然："不抗日必亡，爱国抗日是朋友，是兄弟。屈辱投降就是卖国贼，我是决不妥协的！"父亲亲自身受其教育和感染。

不久，日寇侵入冀东，气焰嚣张地进犯长城各口，而国民党政府则一再妥协退让。在忍无可忍、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冯玉祥将军高举抗日义旗，于1933年5月26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共有十万余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成立大会这天，父亲受冯玉祥将军指派，书写张贴大量的安民告示和标语，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奋起抗日。随后，父亲担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上校秘书，协助冯玉祥将军指挥、开展驱逐日寇的战斗。从6月22日到7月7日，抗日同盟军主动出击，不怕牺牲，相继收复日寇侵占的康保、沽源、宝昌三县，特别是经历五天激战，终于收复日寇重兵把守的塞外军事重地多伦，随之乘胜全部收复察东四县。这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骄横的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胜利，给全国民众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希望。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胜利，鼓舞了平津一带许多青年来到张家口参加抗日盟军。冯玉祥将军为此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干部学校，自任校长，任命张克侠为副校长（解放后曾任林业部部长），父亲被调任为干部学校政治总教官，协助张开展干校的实际工作。干校前后招收了二百多人，经培训而成为抗日军政领导，从此父亲与军校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时，国民党当局认为察哈尔有"赤化"倾向，抗日同盟军则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内外夹击的险境。冯玉祥将军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被迫通电解散了抗日同盟军。而后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继续进行抗日斗争。张克侠和我父亲亦仍率领干校二百多人在悲愤之中，向北撤退到塞外张北、康保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终因缺衣、少食、无弹药供应而难以坚持，后又被国民党第二十九路军围困，强令接管，二人只好离队各寻出路。察哈尔抗战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进行联合抗日的伟大尝试，得到了全国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它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救亡斗志。





## 三、黄埔精神铸忠魂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1929年9月迁至南京，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后因抗战事起增设为9个分校。在轰轰烈烈的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黄埔师生浴血奋战，功勋卓著，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解散后，父亲如离群孤雁，痛感国家多难，但仍然先后到上海、南京等地寻求抗日救亡工作。1936年1月，经同乡同学白瑜介绍，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处南京政训班中校政治教官。6月，该政训班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庐山特别研究班（后改为特别训练班）合并，父亲任上校政治教官和政治总教官等职。9月，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政训科科长，"从此投黄埔，为国育忠魂"。

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父亲神情为之一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三天，父亲就在武汉分校全体师生大会上讲话，赞颂卢沟桥英勇抗战，指出这是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号角吹响了。9月，父亲兼任武汉抗敌宣传委员会主任，积极领导抗日宣传活动，多次亲自到汉口中山公园宣传抗战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号召民众勇赴国难，挽救危亡。

1938年，日寇大举进逼武汉，规模仅次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部的武汉分校被迫迁往湖南武冈，更名为第二分校，又称为武冈分校。当年，父亲带领在武汉招考的二百多名学生，乘火车到湘潭下车，然后一路餐风露宿，一路宣传抗日，徒步到达武冈。

武冈分校主任为爱国将领李明灏，父亲任军校政治部少将主任，兼任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许多有名的教师到此任教，许多热血青年投奔军校。一时间，武冈成为湖南抗日重镇。

武冈分校的正规教育分为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两部。政治教育由政治部负责，在军校推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倡"亲爱精诚，团结合作，卫国爱民，不怕牺牲"校风。父亲主持制定教学计划，亲自上课，慷慨陈词，鼓舞士气。同时，父亲深感武冈地处偏僻，信息闭塞，而抗日必须了解形势，唤起民众。于是在李明灏的支持下，军校政治部创办了《战斗日报》，父亲亲自兼任报社社长，并设立电台，直接收录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共产党新华通讯社发布的电讯。《战斗日报》编排新颖，内容丰富，新闻及时，报道前线战况，大力宣传抗日，深受全校师生和当地广大民众的欢迎与爱好，对武冈的风气开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武冈分校采用军事与教育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

至1945年10月迁往成都，共培养了二万三千多名军事政治人才，大批英勇将士直接开赴抗日前线，杀敌卫国，血洒疆场。

湖南是“黄埔大省”。在历届黄埔军校毕业生当中，湘籍学子数量为全国之冠，现今（2005）仍健在的有近三千人。武冈县现存有武冈军校中山堂旧址，是我省保存完整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建筑物，已被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至今，当年军校学生书写于武冈太保洞的标语：“好男儿杀敌去”色如血殷，醒目尚存。父亲于1984年受邵阳市、武冈县人民政府的邀请重访武冈，受到当地人民的夹道欢迎，睹物思人，感慨万千。著名诗人、民革党员田翠竹闻此，曾写下《七律》诗赞：“旌节当年驻武冈，侵凌日寇正猖狂。八千子弟持军令，万里河山吊国殇。旧梦只余双鬓白，朝暾喜见九重光。重来倍觉风情好，夹道甘棠尚有香。”

## 四、迎接抗战大胜利

1940年10月至1943年初，父亲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政治部少将主任，并兼任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政治部主任、三青团湘鄂赣边区直属区团部筹备处书记、国民党党政战地委员会第九战区分会湘鄂赣边区支委会委员，部队移驻江西修水抗日前线，加强了当地的抗日力量，并整训游击干部、开展敌后工作。后又随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迁驻湖南祁阳，由李默庵任教育长，配合英国军事代表团，负责训练中国远征军援缅甸作战突击队。

1943年2月，父亲参加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班第一期学习。7月，任三青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社会服务处副处长兼中央团校筹备委员。8月，奉蒋介石之命，到湖南视察三青团中央团部举办的“南岳青年夏令营”，并担任该营政治总教官。同时，奉派查验国民党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在衡山修建的“忠烈祠”。这是由有周恩来、叶剑英参加的“第一次南岳事会议”决定修建的，也是目前大陆唯一全国性的纪念国民革命军军抗日阵亡将士的大型烈士陵园。9月，任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第二期少将教务组长兼办公厅主任秘书，积极培训抗日军政人才而竭心尽办。

1944年夏，父亲任湖北省政府（当时在湖北恩施）委员等职，积极开展支前抗日工作。1945年初，兼任湖北省政府江南行政督导团团长，视察正在修建的来凤飞机场和公路，慰问民工，了解民情，准备对日反攻。正在视察途中，欣闻日寇投降，惊喜交集，连夜赶回恩施，旋接省府电报，受任为湖北省政府先遣负责人，兼任第六战区敌战区物资接管委员会委员，并速赶赴于长江边的三斗坪乘一只小邮轮沿江东下，赶往武汉负责接管工作。

其时，长江因抗战以来江流封锁且尚未扫雷，此去武汉，竟是首航，危险





万重。父亲决然登船，孤帆挺进，一路劈波斩浪，如入无人之境。甫抵沙市，只见人们早已汇集码头，顿时欢声雷动，鞭炮齐鸣，人们不断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万岁！万万岁”，自发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久不见这样扬眉吐气的非凡气概的民众和狂热景象！一上岸，沙市人民争相和父亲一行握手、拥抱，格外亲热。一路上，万头攒动，问候声此起彼伏。住定之后，人们仍不断地问这问那，而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面对这仿佛久绝于世之后又重见天日之情景，父亲喜极而泣。翌日继续顺江而下，站立船头，眺望所及，但见两岸战后之满目凄凉，一片疮痍，父亲禁不住吟咏起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到达武汉后，父亲即巡查日军、日侨驻地。其时，日军仍驻防原地区，亦未解除武装，在交通要道、港口、要塞、日侨住地，到处都张贴着醒目的“忍”字，令人触目。这充分反映日本不承认战败、不愿投降的心理，这引起了父亲的忧虑。在集中遣送日本侨民大会上，父亲秉持中华民族君子大国的气度，介绍中日两国的历史渊源，阐述“和为贵”、“不念旧恶”的儒家理念，强调中日必须友好相处，诚恳地讲解和安抚他们。

9月15日，父亲代表湖北省政府并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河等率所部进人武昌、汉口。并特选定于9月18日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受降仪式。

是日，日军驻华中区最高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所部主要官员进入会场，当即被令交出其所佩指挥刀，以示解除武装。仪式开始，冈部直三郎从下席趋前数步，肃立片刻，双手将投降书呈送上席的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将军，日军其他官员也举手谨致军礼。亲历这历史性的一幕，父亲百感交集。从1931年的“九一八”到1945年的“九一八”父亲以一介书生奋然投笔从戎，历经十四载艰难，终于亲自参加接收了日军的投降，洗雪了国耻，胜利真是来之不易！这是父亲人生中一段最难忘怀的辉煌经历。他每与子女、孙辈回忆起抗日战争的往事都激动不已，直到1988年10月因病溘然长逝前，还常念叨着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仍然继续挂念着祖国的统一和富强。

时光如流水，父亲去世，转瞬之间十七年就过去了，但我却从没有感到亲爱的父亲离开过我们，墙上父母亲那慈祥的面容每日注视着我们。父亲那忧国忧民的情怀，企盼祖国统一、强盛、民主、自由的心境，时刻都在教诲激励着我。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刻，回忆父亲亲历的这段历史，体验先辈的赤诚与艰辛，更感自己的责任之重。特别是中华民族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所展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强大的爱国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 白马将军方鼎英

叶　浓

爱国民主人士方鼎英有不平凡的军政生涯，黄埔军校的和平清党，参与湖南和平起义是他一生得意之作。笔者曾为他做秘书工作多年，往事历历，仿如昨日，爰述所见所闻，以飨读者。

## 少怀壮志　投笔从戎

方鼎英，别号伯雄，1888 年生于湖南新化县一个穷秀才家，自幼聪颖好学，4 岁发蒙读书，五岁读家塾，后入长沙明德中学，在校看到陈天华著《猛回头》小册子，文中痛言清政府腐败无能，祸国殃民，亡国迫在眉睫，乃决心从军，挽救国家危亡，毅然投考湖北武备学堂，被录取，得讯时，离面试时间仅两昼夜，方徒步连夜兼程，疾走 500 里，至复试地点应试，以年龄未满 18 岁，身高不够一杆枪高，最终未被录取。乃入实业学堂。

1902 年，方年 15 岁，被湖南巡抚赵尔巽选送日本留学，与时任《民报》编辑的陈天华同住在一起，由陈介绍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

1904 年，陈天华见日本《朝日新闻》社论："清国留学生良莠不齐，应请清政府加以取缔"。愤怒已极，两昼夜写绝命书数万字，以警告我国留日学生，蹈东海而死。方鼎英受到了启发和教育，遂入宏文学院。陈天华之死，激起"取缔"风潮，我国留日学生欲全体归国。经日本政府调停，开放学陆军名额，各省督抚亦可协商保送。方改学陆军，入振武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习炮兵。1910 年，参加同盟会"求知社"，入社的有蔡锷、宋教仁等。翌年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投入汉阳之役。1917 年，再度赴日。在东京陆军炮工学校和东京帝大留学四年。1921 年湖南督军赵恒惕（求知社社员）等联名电邀回国，任陆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军长等职。他体格魁梧，爱骑一匹白马，人称"白马将军"。





## 黄埔军校和平"清党"

1924 年，方鼎英参加北伐，任特遣军总指挥。翌年春，在汉口家中养病。谭延闿多次电邀去广州。到广州后，与谭见面时，谭告知："蒋介石要你去帮办黄埔教育，多次电催，想必是另有妥当安置。"两人正谈话间，蒋介石进来，见到方鼎英，高兴地对方说："你来了！组庵（谭延闿的字）先生想已详细告知你了吧！我想明天就派茂如（王柏龄别名）接你去黄埔好吗?"第二天，王柏龄来了。1925 年冬，在广东召开统一军事教育会议，方以湘军整理处副监名义参加了这个会议。蒋介石以陆军总监身份主持会议。会议结束时，蒋命部力子将黄埔军事政治学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的任命状给方，言明归校长直接领导。

1926 年，蒋介石要方代教育长并以学校全权交给方鼎英代行。方不肯接受校长职权，要求回部队，参加北伐。蒋介石对方说："本党命脉在黄埔，我以党的命脉交给你，责任何等重大，只要把学校办好，将来还怕没兵带吗?"方答复说："那末，我对学员就不能带有色眼镜看人，无论他是国民党或共产党，都一视同仁，凡是好的都要嘉奖，凡是不好的，都要惩罚，必须这样，才是公道，你同意吗?"蒋答复说："当然同意。"于是方鼎英走马上任了。

正当方鼎英开诚布公，全心办学的时候，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腥风吹向了广州，反动派闪出了"清党"的屠刀。方鼎英心想，黄埔军校要被摧残，许多革命青年要遭劫难了。自己对建校所费的心血就要付诸东流了，他痛心疾首，冥思苦想，决心利用自己的身份，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方鼎英提出：这次"清党"有三点要求：（一）自"清党"之日起，给我三天时间；（二）给我一点经费；（三）在我要求的时间内，请在黄埔学校范围三里以内不派一条兵舰、一个士兵来。在"清党"三天之内，不论何人，都可以支三个月薪金，自由离校。如有困难，可支五个月的薪，不过要经过我的批准，将来报销时不要为难。此乃不清自清之法。政治部主任熊雄，是公开的共产党员，他的主张，认为国民革命乃共产革命的必经之路，他在学校是一有功人员，我要他出国，他的需要不在三五个月支薪之列，要以出国川资及在外能生活一年为度，这样来决定付给他的数目。按方的意见，学校特别党部组织清党委员会负责清理。熊雄在方的劝慰下，同意离校。一天晚上，方鼎英用平日蒋介石乘坐的小汽艇将熊送出黄埔湾。他万万没有想到，反革命大屠杀的厄运竟降到熊雄的头上，他被枪杀在黄花岗。当这不幸的消息传到方鼎英耳朵里时，他不禁责问苍天："难道真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吗？老天，你也太不公平了。"不久，方鼎英即离开黄埔军校。

## 襄助湖南和平起义迎接解放

1930年，方鼎英在上海组织“革命同志社”，主办《怒潮》月刊，反对内战，宣扬内战是自杀政策。翌年，“革命同志社”改为“抗日会”，方与李济深三次晤谈，促李济深领导会务。后来为了预防蒋介石的破坏，李返香港家居，将“抗日会”转移到香港活动。

1933年至1936年四年间，方鼎英大都在香港活动，间或到上海，都秘而不宣。

“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调驻福建，在香港酝酿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均到港协商，李济深、方鼎英等亦参与其事。酝酿成熟后，公推李济深为福建人民政府主席，方鼎英被推专返湘西，组织和推动湖南的抗日运动。

1933年，抗日会改组为抗日大同盟，在国内进行了广泛联系，推动了冯玉祥、马占山等的积极抗日。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宣布抗日时，抗日大同盟才公开到上海、南京等地活动。

1938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由南京先后迁到武汉、重庆，李济深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蒋介石自兼），李派方鼎英为第九战区党政分会副主任。方看到了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真面目，非常气愤，只在分会成立时参加过一次会议。年近花甲时，常在新化家乡生活，兼营一小农场，以防蒋介石怀疑他有政治活动。

1948年夏，方鼎英派梁觉到香港与李济深联系。这时，李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要方在湖南搞地下活动；上海中共地下工作同志吴成方来长沙，要方与唐生智合作搞迎解工作。方鼎英积极参加反内战与和平自救，衷心赞助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与马子谷、邹务三等商议，马子谷曾被方鼎英营救过，邹务三则为方的旧部，且系当时新化县警察局局长，段楚贤（锑矿大王，人称银菩萨）赖其保镖。邹向方建议：“迎解必须经费，段楚贤是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要他帮助，当即邀其代理人刘锎参加商谈，刘与段商议后，段可以帮助800吨锑作迎解经费，方鼎英即计划布置分别行动，解决了经费困窘的问题，即策动驻新化国民党军和新化警察局、自卫队、乡公所起义，印发《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和《告黄埔同学书》，劝其起义投诚、迎接解放。

## 欢度幸福晚年　为祖国统一献力

解放以后，方鼎英先后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司法厅厅长、中国人





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湖南省委副主委等职。周恩来总理曾称赞方鼎英是有正义感的人，为人民做了好事。

党和政府对方鼎英关怀备至，安排住在长沙市麻园岭一栋比较安静的平房里。方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积极参与对台活动，他家的客厅比较大，有次邀集黄埔旧友在家座谈，寄希望台湾亲友，特别是黄埔同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身说法，劝告台湾亲友故旧为实现祖国统一作贡献。

晚年，方鼎英常以诗词遣怀，每有新作，都抄送一份给我。1962年中秋，他以《中秋有感》为题，写了一首律诗：

待月麻园岭上圆，月明如镜浴青天。
短垣照耀疑霜雪，华屋凌空映素烟。
成片厂房云样现，如梭输送电波传。
清光普照盈无缺，彩屋群欣大有年。

诗中表达了对新中国的热爱和举家团聚的欢乐情怀。

方鼎英同志1967年6月因病在长沙逝世，享年89岁。骨灰原安放在长沙市革命公墓。1982年，方的儿子从日本回国探亲时，按父亲的遗嘱，把他的骨灰送回新化故乡安葬。

# 抗日将领霍揆彰佚事

刘才武

霍揆彰，字嵩山，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酃县（今株洲市炎陵县）太平岭三口村大破头一个农民家庭。

他曾就读私塾、康乐小学和衡阳成章中学，民国13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学生三队。毕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排、连、营长、团副，随东路参加北伐。民国17年任陆军11师团长，19年底升任11师独立旅长，20年9月升任14师师长，24年1月升为陆军少将，26年5月晋升陆军中将，同年8月升任54军军长，民国31年升任20集团军总司令。

因对日作战有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霍揆彰授予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政府给他授予嘉猷勋章，并升任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副监、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

这里要讲述的是霍揆彰于民国27年即1938年在田南要塞、武汉保卫战、驻长沙、守洞庭湖以及加入远征军期间的几件鲜为人知的佚事。

## 一、注重学习历史，提高部队素质

霍揆彰非常注重学习中国历史，他曾在团以上干部会上说："我们有很大一批人对中国历史一点都不懂，也不感到耻辱。中国人，尤其是我们这些作为党国的高级将领，都不懂中国历史和古代战争史，那是切切不行的，应该多加学习，当然不可能要求有很深刻的研究，但必须要了解一个大概。这是我们部队长官素质问题。"所以在他家里有很多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图册及《孙子兵法》和战争史书，他经常细心研读。

## 二、奋勇杀敌，战功赫赫

民国27年初，霍揆彰兼任田南要塞指挥官，参加武汉保卫战。率部驻守长沙富池口要塞。同年秋又驻守洞庭湖。在这日本人侵、国之存亡的生死关头，他经常对所率的部队官兵作勉励训话。他每次训话中，说得最多的是：





"国难当头尚不努力，等待何时！"所以他的将士在抗日的各个战场上，尤其是后来在入滇，加入中国远征军，担任收复腾冲的恶战中，均无比顽强。在他的"肉搏向前"的战斗口号下，在焦土抗战中奋力杀敌，立下赫赫战功。1944年9月14日上午11时，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中将向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报告"腾冲日军全部消灭，我们已占领全城"。

## 三、戒指触目，立志事业

他有一段时日经常与一些朋友吃吃喝喝，随意花费钱财，而把事业都忘却了。有一天他警觉起来，非常愧疚，感到非常不应该，非常可怕。于是，他第二天一早起来，办完军务便独自一人跑到金行，买了一只金戒指，戴在手上，好让自己一看见这戒指就要立志事业，不要虚度年华。他把这一"戒指"取名为"触目惊心"。好让这个金戒指时常提醒和告诫自己。随后买来笔墨纸砚，重新学习书法。还感到字也没有以前写得那么好了，手生得很。练了一段时日才感到得心应手，并有很大长进。我们从他留存在世的钢笔字和毛笔字，便知其书法功力。

## 四、关爱下属，清正廉明

霍揆彰对下属非常关爱，有好几次他的属下或参谋、或参谋长、或勤务员结婚，他都非常乐意应邀去当证婚人。有几次军务繁忙来不及准备在证婚时的讲话内容，就要身边的工作人员帮他准备讲稿。有一次一个参谋结婚，请他当证婚人，他得知这个新娘子嫁一个军人，心事重重，总感到担心，霍揆彰在证婚人讲话时说："作为一个男人，主要是主外。作为一个女人，主要是主内。作为男人是个军人就要理所当然地时刻准备上前线，为国效力。作为一名军人的妻子也就理所当然地留守后方，操持家务，带好孩子。这样就能使在前方的男人安心安意，无后顾之忧，前方后方志同道合，日子就顺心，幸福就属于这样的夫妇，就能天长地久。"

霍揆彰自晋升中将后，每到年关，他都对属下训示："过大年了，诸位不要登门拜年。你们一来拜年老是送礼，这很不好。弄得大家挺麻烦的。"但拜年送礼者仍不乏其人。拜年最盛的是民国26年的大年初一，将军住宅前车水马龙，挤得停车都没地方。拜客一走，他便在家发脾气说："这对社会影响有多坏呀，我越讲，他们越厉害。这是为什么呢？"他妻子说："你说什么，你的部下都会听，唯独这事他们不会听你的，他们这就是以拜年为名来给你送人情呀！"他妻子接着说："要真正解决问题，光说不行，要想别的办法。"于是在第二年，就是民国27年的大年初一，一大早，打开大门，放了一挂鞭炮，随

即锁门闭户，带着妻子儿女下了连队。在连队的食堂里与士兵们共进早餐。因为他这一贸然行动事先没有通知，弄得连队官兵手忙脚乱，一点准备都没有。霍揆彰笑着说："就这样好，大年初一，你们的伙食也不赖嘛，有什么，吃什么，多好啊！比在家接待客人要舒服得多。"并当众宣布："自此之后，大年初一起至十五日止，我都下来，而且是临时确定去向，要不然我硬是挡不住那些盛情朋友的车轮子。"几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 五、善待友军，宽宏大度

霍揆彰对兄弟部队也非常大度。有一次，自己的部队与兄弟部队之间因误会发生了摩擦，兄弟部队打伤了他的士兵。他知道后，细心地、善意讲清原由，兄弟部队知道自己错了，把肇事者捆绑起来带到霍揆彰部，当面赔礼道歉，负荆请罪，并表示任他处罚，还带来一千块光洋作为慰问金。霍揆彰宽宏大量，只解除误会，不责备友军，取善待之态度，亲自为之松绑，并设宴招待前来道歉的全体官兵。临走时，一千块慰问金分文不收，全数退给了友军，友军感激不已，说："霍将军如此大度，可敬可亲。"

## 六、运动场上，官兵不分

霍揆彰喜欢打篮球，经常下连队与官兵一起打篮球。他也时常去河里游泳，他经常对与他一起打球和游泳的官兵说："运动场不是战场。运动场上不分官兵，大家只管尽情地玩。"他的体育运动比较频繁，官兵关系很是融洽。另外他有运动后要喝点葡萄酒的习惯。有时游泳或打球时，天气突然变凉。他常常回家后立即喝两盅葡萄酒御寒。这样的次数多了，"运动加葡萄酒"便成了他的习惯。他的妻子只要见他去运动了，都会给他准备好御寒酒。

## 七、敬祖心诚，军心在胸

他对他的部队非常关爱。尤其在各个节假日里，他总是惦记着部队战士的伙食。并亲自嘱咐勤务员通知连队要增加酒食。如7月15日，这是"中元之期"，他按老习惯在这一天的晚饭桌上要多摆一套杯筷，并亲自为之斟酒盛饭，以此祭祀其祖先。他还对下属说："7月15日是中元之期，8月15日是中秋佳节，是人们团圆的日子。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官兵们在部队里不能与家人在中元之期去烧纸钱祭祀祖先，团圆节也不能与家人团聚，我们就加些酒食让大家愉快地过节，以示犒劳军心。"这样做，官兵们都很高兴。





## 八、猛烈于疆场，悉心于妻室

霍揆彰的妻子叫德玉，真是金枝玉叶，且又弱不禁风。他对妻子非常疼爱，细心照料。妻子一旦生病，他就陪妻子上医院去看病。他的军务繁忙，经常下师团督查或训话，只要妻子病了，他把军务一忙完就亲自陪妻子去看病。哪怕是小病，就连妻子脸上长了块黑斑，他都悉心呵护，四处求医问方。

霍将军在驻守武汉时，有一次日本飞机在武汉上空狂轰滥炸，防空警报一响，他在蛇山指挥火炮部队对空猛烈射击，因防空的需要，整个武汉都停电了，全城一片漆黑龙江。一顿炮击之后，敌机逃了。这时霍揆彰赶紧料理军务，安排部队打扫战场后，想起在家的妻子在漆黑中会害怕，于是立即驱车赶回家陪伴着正战战兢兢的妻子，在烛光下，他悉心呵护着。妻子回过神来，问他："你们打到了飞机吗？"他说："这么多飞机，好似击中又好似没有击中，反正打跑了，部队还在清理。我担心你，就赶回来了。"

第二天从报上得知击落了一架敌机，他万分欣喜，嘉奖了火炮部队，并设宴举杯犒劳将士。真是猛烈抗战于战场，悉心呵护妻室。

## 九、捐资兴教，宣传抗日

霍揆彰戎马一生，一介武夫，但他勤于自学，知识面很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一直没有放松过学习，所以他对"教育救国"也深有认识。就在他驻洞庭湖时，他在桃源县创办了一所抗日小学，并自捐一千块银元，自任校长，让学生免费入学。接着又在衡阳南岳创办了"五四"中学。后来，他还捐资五千块银元在其家乡三口村创办了一所"望云小学"。在常德还创办了《新潮报》，极力宣传抗日救国。

（作者单位：株洲市火陵县博物馆）

# 吴剑学将军传

吴容甫

吴公剑学，字熙农，湖南湘乡人也。清光绪九年（188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祖荣楷公，道光辛丑恩科会试第125名贡士，殿试三甲第一名，赐同进士出身，历官浙江余姚、浦江、临安、海盐等地知县。父光鱼公，国学生，英年早逝，未有功名。剑学公十岁丧父，母陈氏抚养成人，家庭生活甚为清苦。公幼就蒙学，稍长，慨然有四方之志。得同乡至友陈方度先生之助，乘陈家盐船，直抵武汉，考入湖北武备学堂。毕业时，以成绩优异，官费派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国势日蹙，国土日削，孙中山先生矢志革命以推翻清室为己任，公深为敬佩，乃毅然加入同盟会，自此乃奠定其一生事业之基础矣。当时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对留日学生多所戒惧，以参加革命者多在其中也。故每有聚会，辄派奸细混杂其间，暗中进行监视。公觉之，乃当众怒斥曰："站开些？我就是要革你的命。"此一举动，在留日学生及湖南同乡中一时传为美谈。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公学成归国，应北洋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之召，在其部任职。吴禄贞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同盟会员，公之同学亦同志也。辛亥武昌首义，吴禄贞率所部驻石家庄，多次截留清政府供应清军攻打汉阳民军之军需物资，且拟趁机直捣北京推翻清室。公积极参与此一行动，并多所擘划，深得吴氏器重。未几，吴禄贞被袁世凯暗杀，第六镇为袁氏所掌握，公忿恚久之，乃不再在第六镇任职，而至保定军官学校任步科第二期及第三期军事教官。其时北方为北洋军阀势力范围，公难以展其革命抱负，遂弃职归湖南。湖南督军汤芗铭，亦系北洋军阀，但公通过湘军中之同学故旧等关系，仍先后担任长岳守备司令（辖三个营）等军职。1916年湖南掀起反袁驱汤运动，公立即率部参加。汤芗铭下台后，谭延闿第二次督湘，将湘军整编为两个师及六个守备区，公被任命为第一区司令，驻湘潭。1917年孙中山先生发动护法运动，公立即通电护法，揭橥护法旗帜，改称所部为护法军。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任命之湖南督军傅良佐，已至岳州，公会同其他湘军部队，攻克岳州，将傅良佐逐出省境。





1918年春北洋军阀吴佩孚、张敬尧率军攻入湖南，衡阳、长沙等重要城市皆为所据，湘军退守郴州、零陵一带。1920年湖南全省开展驱张运动，公率部由湘南向长沙方面进击，与湘军其他各部协同，取得了驱张运动的胜利，于是谭延闿得以三次督湘。甫三阅月，赵恒惕利用湘军内部矛盾逼谭延闿离湘，自任湖南督军。为拉拢谭系，乃任命公为第五混成旅旅长兼宝庆镇守使。镇守使一职，民国初年所特设，为府一级之最高军政长官，辖府属各县，集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一独立王国也。公任宝庆镇守使达三年之久，湘乡亦宝庆府之邻县。公桑梓情深，不欲多所更张以招民怨，故为政宽厚、惟求保境安民，即兵源之补充，亦以招募为主，不强征也。故三年之间，宝庆一府战乱暂息，尚为安定，民甚德之。

1923年7月孙中山先生以赵恒惕依附北洋军阀反对广州政府，特命当时任广州大元帅府建设部部长之谭延闿为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入湘讨赵。于是谭乃任命公为湖南讨贼军湘南第二军军长。同时任命者尚有谢国光，湘南第一军军长。蔡钜猷、陈渠珍，湘西第一、第二军军长。宋鹤庚、鲁涤平，湘中第一、第二军军长。陈嘉祐，湘东第一军军长。公率所部由宝庆经湘乡进据湘潭，欲直捣长沙。其他各部湘军，亦分头出击。赵恒惕率部顽抗，战事成胶着状态。十一月间，广州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因变生肘腋，急召谭延闿回师讨逆，驱赵之役，就此作罢，未竟其功也。

湘军入粤之后，中山先生倚为主力，寄以腹心，任命谭延闿为湘军总司令兼大本营秘书长；任命公为湘军第四军军长，第一、第二、第三，分别为宋鹤庚、鲁涤平、谢国光。其中公与宋鹤庚、谢国光均为湘乡人，均在为中山先生之革命事业效其绵薄，邑人皆艳称之，号为湘乡系。东江之役，公会同各部攻取了惠州及粤北诸县。1924年春又率部政克河源等县，嗣瘴痢为虐，士卒病死相望。不得已回师广州，未能一鼓荡平其巢穴也。

1924年秋，孙中山先生任谭延闿为建国军北伐总司令，统率湘赣豫诸军，以湘军为主力，分三路进攻江西，公所部称建国军湘军第四军。出师之初中山先生特电令湘军各前敌将领，尽快攻占江西，会师武汉。公率部前驱，进入赣南，连克十余县，直逼吉安。其时江西军阀方本仁与广东陈炯明部林虎及湖南赵恒惕慑于建国军声威，在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支持下结成赣粤湘三省同盟，对深入赣南之建国军实行夹击。建国军腹背受敌，加之少数将领，犹豫动摇，指挥有误，遂致一败再败，军力大损，不得已退回广东。至此孙中山先生所领导之此次北伐战争宣告失败。

公在广东期间，多次参加孙中山先生主持之军事政治会议，又以老同盟会

员及湘军高级将领资格多次应召至孙中山先生私邸，单独晤谈。孙中山先生北上开善后会议，公赴码头送行，依依握别。1925年孙中山先生于北京逝世，公太息久之，悲痛不已，认为中山先生国家民族希望所系，功未成而身已逝，国步将益加艰难矣。公又见广州政府国民党内部汪、胡对立，水火不相容。湘军内部亦排挤奔竞，各怀私念。且湘军主力，江西一役，损失惨重，回粤之后，欲补充兵源，充实军力，而军饷装备，筹措维艰，即总司令谭延闿亦有力不从心之感。于是公与朱鹤庚、谢国光二将军共萌退志，相约交卸军职，离开广州政府，同赴上海寓居，不欲与闻国事矣，而所率部队两万余人，后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

夫公自民国以来，矢志革命，追随中山先生，驱汤、拒傅、逐张、攻赵，无役不从。入粤以后，又助中山先生镇压陈炯明叛乱，安定后方。不意江西一役失利之后，未能坚持不懈，克始克终，竟至半途而废，惜哉！公时年四十有三，正当盛年也。

山西督军阎锡山，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班同期最为相契之好友也。吴禄贞被刺之后，阎曾折柬相邀。寓居上海之后，阎又亲笔具函并派专使来沪，敦请公赴山西任军政要职。直系军阀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亦系公在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同学，也曾多次派人邀请，欲与公共事。公两游西湖，孙获悉后即派人专程陪侍，曲意趋奉，欲引公入彀也。公以阎盘踞山西，孙对抗广州政府，均不符合孙中山先生统一全国之主张，故不为所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蒋介石特邀公及原湘军第一军军长宋鹤庚氏至南京晤谈，拟任命宋为两湖宣抚使，公为两湖宣抚副使。盖时值宁汉分裂，武汉方面实权为手握重兵气焰薰赫，且反蒋亦极坚决之唐生智所掌握，唐为宋之旧部，宋任湘军第一师师长时，唐任旅长。蒋想利用此一关系诱唐就范，或对其部下进行策反。公权衡再三，以势异时移，且唐桀骜难驯，机智过人，此种手段，恐难奏效，故辞不受命。宋则勉为其难，但至武汉后，即为唐所逐。

1931年，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前湘军四个军，第二军军长鲁涤平曾先后任湖南、浙江两省省政府主席，第三军军长谢国光，已在上海病故，唯公与宋鹤庚氏仍寓居上海。谭念及旧绩，特简任公与宋鹤庚氏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公兼任民政厅长，宋兼任建设厅长。公不喜行政事务，且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在军界为公之后辈，1917年何健任醴陵游击司令，被张敬尧驱赶至湘南时，公曾拒绝收编，何键心存芥蒂，故公对民政厅长一职，辞不受命，即任省府委员亦优游自适，不欲与何键多所接触。平日居处，深自韬晦，自号乐闲老人，寓朝隐之意也。1935年卸职家居。

公，余之族曾祖也。先君崇钦公，任建设厅秘书多年，后任永兴零陵等县





县长，均曾得公之庇荫。故余年幼时即曾随先君往来于公在长沙富雅里之官邸，得以瞻仰公之英姿。公长身鹤立，剑眉隆准，望之岳岳，即之温温，不怒而威，令人敬爱。抗战军兴，公举家迁回湘乡，居县城夏梓桥。后避日机轰炸，又卜居景庆乡八亩冲。均与余家相距不远。每当春秋佳节，或吴氏亲属有悬弧之庆汤饼之会，余辄陪侍其间，其时余年已渐长，少不知礼，每喜问及公昔时领军作战情事，公或笑而不语，然一时兴起，亦为余及其子孙辈讲述之。余在其家，见其厅中悬有孙中山先生相片一帧，上款书“熙农八兄惠存”，下款书“孙文敬赠”，余尝指而问之。公曰：“此余在广东平叛时，总理所手赠也。”盖公行八，亲朋好友邑人部属常以“八胡子”、“八兄”、“吴八爷”、“吴八大人”称之，余亦尊称为“八太公”。今中山先生所赠相片亦称“八兄”，足见中山先生对公非常倚重，恩礼有加，关系殊非泛泛。一日余与公之第三子家钢君、第五子家锄君翻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录，其毕业生大多为民国年间军界名人，故特加注意。与公同期（第六期）者有程潜、阎锡山、赵恒惕、孙传芳、唐继尧、徐树铮，第五期有李烈钧、何成璿、张敬尧，其余则略不记省矣。一日酒阑之余，诸子弟环伺左右，公语及游西湖时，孙传芳派专人陪侍事，余因问：“孙传芳其人何？”公曰：“孙在日本士官学校时居余之对面寝室，以同班而又同科（士官学校分步、炮、工、辎四科）过从甚密，人不甚聪明，每有所言，辄令人发笑。耳朵，一只大，一只小，同学辈皆谓之‘孙宝’。不意其后竟能掌江浙五省之大权，叱咤一时也。”言毕大笑。呜呼！此事垂六十年矣，公之声音笑貌犹历历也。公尝言“在广东时，数与中山先生接谈，或有事晋谒，或先生面召，先生虚怀下士，宽以待人，坚毅仁慈，令人倾服”，余少年好事，因问曰：“见孙夫人否？”公曰：“先生客厅外侧有一办公桌，孙夫人执笔作记录。孙夫人戴发网，着黑色丝绒长袍，华贵雍容，丰姿绝世，给人之印象极深也。”1941年春节期间，吴家子弟廿余人群至八亩冲贺年，公设果饼以饷之，余等围桌争食。公执水烟袋，着长袍，临而观之，笑容可掬也。余倡议，欲公讲一历史故事，众皆鼓掌赞成，公之幼女家培，缠之尤力，公乃曰：“讲一笑话可乎？”余等皆曰：“更好，更好。”公曰：“民国初年，余任保定军官学校教官期间，请同僚为余取一绰号，曰‘黑白将军’。”余等皆愕然，群曰“何谓也？”公曰：“余住处，离军官学校距离甚远，上下班甚为不便，且费时也，因买一毛驴，令勤务兵养之，以作代步。上午乘之上班，太阳晒左脸，下午乘之下班，太阳亦晒左脸，历日既久；则左脸黑，右脸白矣，同僚皆笑之，遂称我为黑白将军。昔孙传芳左耳大右耳小，余则左脸黑，右脸白，可与其媲美矣。”言毕大笑，余等亦笑。嗟夫！公乡居期间，此等轶闻琐事，余侧闻甚多，未能详述矣。初谓公戎马半生，功勋卓著，中年勇退，息影林泉，

应能优游自得，乐享天伦，安度晚年，不意日寇肆虐，湘乡沦陷，公抗节不屈，遂罹大难，悲哉！

1944年夏，日寇大举进攻湖南，湘乡沦陷，公所居之景庆乡八亩冲，距湘乡县城仅十余里，然地处山坳深处，极为隐蔽，不易发觉也。公白天率家人往宅后深林中躲藏，晚上仍回家餐宿，如此数日，公不耐山中热瘴，乃率第三子家钢君回至住宅中，虽白日亦不再躲藏矣。不意当年六月廿八日（农历五月初九日）日寇湘乡驻军司令部两名军官率寇兵及汉奸共三十余人，闯入八亩冲住宅。一寇兵举枪对公叫嚷，家钢君急以身挡之，并举起双手。公低声叱家钢君曰："举手表示投降，快放下。"旋一日酋斥退寇兵，与公同至客厅对坐。日酋先递一封信，公略一过目，即掷还。日酋欲与公对话，公拒说日语，亦拒听日语，故日酋只好与公用中文笔谈。而家钢君则押入邻室，不许旁侍。故日酋之信及与公所谈之内容，无第三者知道。家钢君仅隔门窥见公神情严肃，或疾书数字，或摆手摇头，作坚决拒绝之姿态。日寇进屋后，大肆抢劫，大肆破坏，去时又将家钢君带走，作为人质，欲胁公屈服也。晚间，家人返回，公躺竹床上，忧愤交集，沉默不语，家人环侍于侧，未敢作声。良久，公仅说一句："他们要我出面，我没答应。"翌日（六月二十九日农历五月初十日）一早，公命家人仍上山隐藏，有劝公同往，暂避凶锋者，公云："昨天还过去了，当无大碍，且胜儿（家钢君字胜生）尚未见归来。"遂仍坚持一人留在宅内。大约上午十时许，躲藏在住宅两侧山林中之乡邻，遥睹一日酋率寇兵汉奸若干人闯进宅内，折腾良久之后，数人前推后搡，拥公而出，至地坪中，公挣脱寇兵，昂然回走，如此几番反覆之后，公踉跄数步坐地不起，朝指痛斥之，遂遇害。享年六十有三。家钢君当晚从日寇手中逃回时，已只能抚尸痛哭矣。悲哉。

呜呼，民族气节，人之大节也，名利可弃之如敝屣，富贵可视之如浮云，而大节决不可亏也。不亏大节，舍生取义，虽匹夫匹妇亦当流芳百世，况公功在国家，泽留桑梓者乎。故公之死，邦国之光也，吾湘乡吴氏亦与有荣焉。

公坚贞不屈壮烈殉国之消息一经传出，闻者震惊之余莫不钦敬。1944年8月4日，中国国民党重庆《中央日报》以"革命耆宿大义凛然"标题，中国共产党重庆《新华日报》以"湘乡吴剑学正义凛然不当汉奸被敌杀害"标题，同天发出电讯。于是公之忠烈事绩乃得传播于大后方及解放区，举国皆知矣（电讯全文附后）。1945年9月25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全文如下：

国民政府令：吴剑学早岁志存匡复，隶籍同盟，辛亥首义及护法诸役均在行间，历任湘省军政要职，忠贞勤奋，懋著勋劳。晚年息肩故里，守正不阿，适寇犯湘乡，迫充伪职，利诱威胁，不为屈挠，卒以宿望峻行，惨遭戕害。缅





怀大节，轸悼良深，应予明令褒扬，用彰忠烈。特令。

1946年秋，公之后辈于湘乡景庆乡八亩冲本宅为公举行盛大而隆重之追悼会，先君崇钦公，时任湘乡县参议会参议长，董其事。湖南省政府、省党部、省参议会、湘乡县政府、县党部、县参议会、以及各公法团体、故交旧部、吴氏宗族、亲属戚谊，均派代表或亲临致祭。中国国民党元老及政府要人孙科、居正、覃振、张继、仇鳌、熊克武、宋子文、程潜、阎锡山等人，湘军旧部何键、王东原、李品仙、万耀煌、周斓、唐生智、贺耀组、刘建绪、谭道源、陶峙岳等人，黄埔系湘籍军人黄杰、宋希濂、郑洞国、廖耀湘、李默庵等人，抗战时曾驻军湘乡之将领杜聿明、王耀武、彭位仁等人，以及省县诸政要、名流，均送有挽联或挽词。且曾汇集成册，铅印分送。余当时代表吴氏子弟作有挽联一副以表哀思。联如下：

革命著殊勋，曾扬鞭岭表，开府湘中，叱咤有余威，临难犹能珍晚节；
感时伤往事，忆垂训庭前，拈须酒后，音容悲永诀，抚怀何处仰高风。

追悼会持续一个月之久，与祭者数以千计，可谓备极哀荣矣。

公元配夫人，姓易氏，湘乡人，名范清，字桂容，未育。副室萧氏，长沙县人，字玉莲。子：家铮（字铁民）、家钺（字寿岳）、家镈（字屺瞻）、家铼（字稚熙），女：家璋（字德平）。副室潘氏，长沙县人，字秋圆。子：家钢（字胜生）、家锄（字肖农）、家镰（字力农）、家锃（子幼农）。女：家琨（字德申）、家璿（字德麓）、家玮（字德午）。公之子女，除家铮、家钺、家钢已去世外，余皆健在也。

公之幽宅，位于湘乡梅桥镇杨柳村前山湾瓦屋滩郑家冲。

呜呼！自公殉难至今，整整六十年矣。代异时移，今非昔比，公若有知，见国家强盛，民生安乐，小康在望，大同可期。亦当含笑于九泉乎！

2004年2月15日完稿于师大景德村

**附件一：**

《中央日报》民国三十三年八月四日第二版载文：

革命耆宿大义凛然湘乡吴剑学氏拒敌惨遭杀害

[中央社宁乡二十七日电]（迟到）

湘乡吴剑学先生，早岁隶同盟会，追随总理参加辛亥护法各役，历任宝庆镇守使，湘军第四军军长及省府委员等职，卓著勋劳，晚年息影家园，守正不阿，此次湘乡沦陷，寇酋一再派联队长命其出组维持会，均严辞拒绝，并掌掴说者，寇酋恼羞成怒，遂遭杀害。似此临难不苟，大节凛然，实堪矜式，业由

专员公署呈请省府，转呈中央抚恤。

**附件二：**

《新华日报》民国三十三年八月四日第二版载文：

湘乡吴剑学正义凛然不当汉奸被敌杀害

[中央社宁乡廿七日电]（迟到）

湘乡吴剑学先生，早岁参加同盟会，追随总理，参加辛亥护法各役，历任宝庆镇守使，湘军第四军军长，省府委员等职，卓著勋劳，晚年息影家园，守正不阿，这次湘乡沦陷，寇酋一再派联队长命他出组维持会，都严辞拒绝，并打说客的耳光，寇酋恼羞成怒，遂遭杀害。

专员公署已呈请省府转呈中央抚恤。

（作者系本馆馆员）





# 漫谈近现代湖南外交的几位名人

周千里

近代以来，湖南向以人才众多著称。然而突出的人才大部分集中于政治和军事方面，外交界的人才似乎有些逊色，屈指可数。在近代史上，清末有郭嵩焘和曾纪泽，民国时代有陈介、唐有壬、蒋廷黻、何凤山、李铁挣、周鲠生等。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他们对中国近代湖湘文化的贡献和影响却不容忽视。以下对他们作一些简介：

## 中国最早出使国外的钦差大臣郭嵩焘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湘阴人，17岁补弟子员，19岁中举，29岁中进士。1983年随曾国藩办团练。1985年赴天津僧格林沁处帮办军务。1862年任苏松粮储道，旋任两淮盐运使。1863年署广东巡抚。1875年受任为福建按察使，未到任，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同年以兵部侍郎候补。1876年充任出使英国大臣，1878年兼驻法公使，是我国第一位出使外国的钦差大臣。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传统的高级知识分子中首先转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学习西方的科技、教育、经济和政治。受到顽固派和洋务派的猛烈攻击。攻击的焦点集中在他赴英途中五十天的日记《使西纪程》一书。此书全文约五万字，其手稿的影印本现存湖南图书馆。在书中，他认为当时已不是中国的政教优于西方，而是西方的政教优于中国。所以中国应该向西洋学习，彻底揭穿了统治阶级自欺欺人之谈，反对统治阶级的某些根本观念，从而激起了一场思想斗争。由于受到各方攻击，他被迫销差，回乡蛰居，不复起用，于光绪十七年忧愤而死。他一生对外交事务的建树虽不多，但他的《日记》在我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价值，却远远超过了外交史上的价值。

## 弱国外交家曾纪泽

曾纪泽（1839—1890）是曾国藩的长子，字劼刚，湘乡人。通经史，工诗

文，此外还精通英语，并懂得几国文字，有“学贯中西”之誉。1820年任户部员外郎。1822年守父丧，1876年袭父爵封一等毅勇侯。1878年接郭嵩焘任驻英法钦差大臣。他在外交界的声誉与郭齐名，时人并称“郭曾”。他在外交方面的建树比郭嵩焘多，仕途也比较顺利。1987年，他促成清廷与巴西建交。同年他奉命兼驻俄大使，赴俄谈判收复伊犁地区问题。在俄谈判历时十个月，反复争辩，折冲樽俎，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挽回了崇厚所订《里瓦几亚条约》中所丧失的部分领土和主权，举世闻名。连当时俄国外交大臣道格尔斯也对他的外交才能称赞不已。弱国无外交，但有外交家，在他身上具体体现了。1883年，他任驻法公使。在中法战争中极力主战，反对退让。但清廷软弱，最后承认越南为法国保护国。他在家书中表示“一腔愤血，寝馈难安”，悲愤之情，令人敬佩。1884年，他与英国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为国家争回每年税银二百多万两。1886年返国，仍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890年卒于任，是一个爱国的职业外交家。

## 供职北洋、南京政府、官运亨通的陈介

陈介（1884—1951）字蔗青，湘乡人。1902年夏毕业于杭州府中学。当年9月赴日本留学，入宏文学院。1904年4月毕业，留校任助教，后回国。1905再度赴日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学法律。1908年转入法国柏林大学，毕业后漫游欧陆各国。1912年归国，任北洋政府工商部主事、商务司司长。1914年任农商部工商司司长。1916年任国务院参议。后历任江汉关监督、水利局副总裁等职。1928年任上海中华汇丰银行经理，上海盐务银行经理等职。1935年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1936年继程大放任驻德大使。1940年我国与德国断交，回国。1946年后任南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大使。1951年殁于任所。前后从事外交工作十六年。

他在工商界任职，隶属于北洋政府。进入外交界，则任职于南京政府。他任职驻德大使时，正值蒋介石对希特勒十分向往，与德关系十分密切的时候。那时将不仅聘用德国军事顾问，还派儿子蒋纬国赴德国学习军事。两国关系火热，这说明蒋对陈介是很信任的。时人评论他为“南北逢源，从政有术”，也是不无根据的。他与我省明德中学有一段渊源，他年轻时曾在明德教书，明德校长胡子靖先生为了挽留他在明德工作，曾当面向他下跪，一时传为佳话。后来他终身担任明德中学校董，对明德倍加关怀。这种关心桑梓、热心教育的精神是令人敬重的。





## 亲日派唐有壬

唐有壬（1894—1935）字寿田，浏阳人。是清末维新派人物唐才常之子。肄业于长沙高等实业学堂；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应庆大学。历任关税会议专门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上海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主任，湖北省银行行长兼金库库长。1927年10月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翌年去职。1931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2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并推为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1934年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是汪精卫派系中的策士。汪系在上海办的《上海民报》，专门诋毁当朝显要。这份报纸在汪氏的政治赌本中占了相当的比重。其经济来源即由唐氏措办。1934年中国外交情势紧张时，汪以行政院院长兼掌外交部，任命他为次长，一则因为他曾留学日本，是一名“日本通”；再则因为他办《上海民报》和日本特务有关，对于日本情势容易疏通之故。1935年12月唐在上海寓所被刺身亡。他究竟为何人所杀？一说是“政杀案”，还有一说是“桃色纠纷”所酿成。他一贯恃才傲物，风流自赏，被人情杀很有可能。不过此事至今仍是一个谜，未得结论。

## 我省外交人才中的翘楚蒋廷黻

蒋廷黻（1895—1965）字清谷，邵阳人。1921年赴美留学，入奥伯林学院，主修历史。1917年毕业，赴法一年。1919年再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近代史，四年后获博士学位。1923年间任南开大学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1930年与胡适等创办《独立评论》。1935年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翌年任驻苏联大使，至1938年回国。1942年开始参加战后救济准备工作，1945年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被委派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达十五年之久。1961年任国民党驻美大使。仍兼常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退休，同年逝世于纽约。

蒋是历史学家，知识渊博，坐而论道是他的专长。发言中他可以旁征博引中外古今史料，常使对方瞠目以对。例如有一次他和苏联代表辩论时，引证中俄关系史实，对中俄的人文历史，如数家珍，归结到苏联的侵略政策，更有甚于帝俄，使苏联代表一时语塞。又一次，他指着帮苏联代表说话的波兰代表说：“你知不知道，在1772年你们的国家被瓜分时，中国的乾隆皇帝曾向俄国提出抗议，你可以到莫斯科的档案馆找来看看！”暗示他不要忘恩负义。这种突然袭击，竟使这位毫无准备的波兰代表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当然类似这样的手段，保持不了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但是他历史知识的渊博，却广为联合国代表所公认。他的短处是不能更好地组织代表团团员，制定工作纲要，使全

团发挥集体力量。有了这些短处，更加速了国民党外交上的失败。不过他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至死不渝，却是值得特别肯定的。

## 客串外交官贺耀组

贺耀组（1889—1961），字贵严，宁乡人，1905年参加湖南新军，先后入湖南陆军小学、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因成绩优异，保送日本振武学校。1911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归国。1914年再度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团副、团长、师长。1927年参加北伐，任独立师师长，攻克九江后升任军长、纵队指挥。攻克南京后，任首都卫戍司令部司令。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得贺的协助复职，取得蒋的信任。1929年任参军长，因协助蒋招抚冯玉祥旧部有功，深得蒋的欢心，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代行总书职务。九一八事变后，他与蒋反共主张有矛盾，逐渐失去蒋的倚重。1934年调任土耳其公使。贺是一个军人，进入外交界是一匹“黑马”。为什么会突然让他客串外交官呢？据随他出使的秘书何凤山先生讲：贺在蒋宠信时曾口头向蒋表示“想到外面干干”，贺所指的外面是指外放督抚，蒋曾漫应之。这次恰逢土耳其公使出缺，正好敷衍贺到外面干干的愿望，而实质上是投之闲置。蒋在他临行前嘱咐他到土耳其学习凯末尔将军（即土耳其总统基马尔）的功业，贺也只是唯唯而已。1936年回国，1937年当了八个月的甘肃省主席，后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等职。1942年因放行苏联飞机运药至延安，降为重庆市市长。1945年辞职居上海，后参加民主党派活动。1949年5月在香港起义，回北京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历任中南军政委员兼交通部长。1961年病逝，葬于八宝山公墓。

## 获得“国际义士”勋章的何凤山

何凤山（1905—1997），益阳人。父亲早逝，家贫，靠教会资助毕业于益阳信义中学。后以半工半读就读于长沙美国驻湘雅礼大学。毕业后在长沙市几所中学教授英文。1928年任湖南交涉使署秘书。1929年以官费赴德国慕尼黑（明兴）大学攻读政治与经济，三年后获博士学位。返国后任湖南省政府英文秘书及湖南大学教授。1935年贺耀组出使土耳其，邀他任二等秘书，得以进入外交界。1937年晋升为驻奥公使馆一等秘书。德奥合并后任驻德维也纳总领事。1940年回国。1942年任中国赴美军事代表团秘书长。1943年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1947年派驻埃及公使，后因使馆升格改任大使。其后任驻墨西哥、玻利维亚及哥伦比亚大使。退休后居美国旧金山，不再从台湾领取退休金。1982年及1986年两次回国，受到政府接待。1997年逝世于旧金山寓所。





我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送了花圈。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维也纳任上，冒着种种风险，抵制多方的干预，一反欧美国家的做法，大量为当时德国的犹太人签发到中国的签证，从希特勒的魔掌下救出了数千余人的性命。60年后，以色列据此授予他“国际义士”勋章（由他的子女领取）。这事轰动全世界，何因此而获得了中国辛德勒的称誉。2001年9月在我省益阳举行了千人大会，纪念他百年冥辰，国务院侨办对他作了高度评价，称他拯救犹太人的行动“令人景仰”，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行为”是中国人的骄傲。可惜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职业外交家，却在《湖南省人物志》、《湖南名人辞典》以及国内出版的《世界名人辞典》中找不到有关他的任何记载，实在令人遗憾！

## 外交生涯和教育生涯各半的李铁铮

李铁铮（1906—1990）号铄百，长沙人。雅礼中学毕业后改入金陵大学，后转入东南大学，1928年毕业，获法学士学位。曾任南县县长，不久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助教。1932年入外交界，任驻英公使馆三等秘书，并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1936年获博士学位。1938年任外交部秘书。5月任驻伊朗公使馆公使。1946年调任驻泰国大使。1948年去职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任美国宾州伯利恒威里海大学客座教授，后又在哈福特大学任客座教授。1962年又任该校终身教授。1964年夏回国后任外交学院教授。1976年赴美国密西根、斯坦福等大学任教授和高级研究员。1978年回国任对外友协顾问。1984年教育部授以外交学院名誉教授。曾任5、6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他的私宅在长沙市北门寿星街，解放后仍然保存。死后也葬在长沙，墓地在长沙铁道学院附近郊外。可惜在长沙找不到他的后人，无法进一步了解他的情况。

## 国际法泰斗、外交界智囊周鲠生

周鲠生（1889—1971）原名周览。幼年时随父读私塾，十三岁中秀才，名列案首，有神童之称。后入湖南省立第一高小，十七岁以官移留学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经济等科，并加入同盟会。1913年任汉口《民国日报》编辑。同年获湖南省官费留英，在爱丁堡大学攻读政法，获博士学位，并获金质奖章。1921年回国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次年秋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6年任东南大学政治系主任。1930年任武汉大学政治系主任兼教务长。1939年赴美讲学并任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这是他解放前在外交界担任的唯一职务。1945年回国，任武汉大学校长。

虽然他在外交界没有担任过具体职务，但是他是我国国际法的权威，又是外交史专家。著作等身，在外交界有许多学生，身负盛名。解放后，1950年任外交部顾问，兼外交学会副会长。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为解放后党和政府外交方面的总咨询。如果说解放前国民党在国际关系、外交实务方面，总是咨询王宠惠博士的话；解放后人民政府就是尊周鲠生为外交方面的智囊。许多重要的外交文件，非经他提出意见，周总理是不批发的。1958年我国声明领海宽度为12海里，同时宣布渤海湾作为我国领湾，也是毛主席请他到北戴河商量后作出决定的。他是我国外交界不担任具体职务的重要人物。

此外我省还有一些职位不太高，但在外交界有影响的人物：如邵阳的李能梗，他从雅礼中学预科毕业后进入燕京大学学习，是燕大的高材生。毕业后长期在外交部工作，后来担任驻马来西亚的总领事。那时候，马来西亚尚未独立，当时的总领事就相当于现在的大使。他对南洋的商务和侨务各方面作过许多贡献。还有石门的盛岳，他和卜道明、蒋经国、邓小平、杨尚昆等在苏联同学，担任外交部西亚司司长，驻乌克兰的公使，是一位研究俄国的专家，是蒋廷黻在联合国的得力顾问。他为人正直，敢言人之所不敢言。研究往往有独特的见解，为当时所推重。也附录于此，以供读者参考。

（作者系本馆馆员）





# 张经武的传奇人生

任志伊

张经武1906年出生于湖南酃县（今炎陵县），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湖南警备军连长、副营长。1930年投奔鄂西贺龙部队，1931年起在中央苏区做军事工作，历任军委直属第三师师长、广昌基地司令部司令员、军委第三局副局长、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中央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参谋长、西北军区参谋长等职。解放后任西安警备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参谋长、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等职。几十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1年5月，张经武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参加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1951年6月5日，在《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专门召见了张经武，令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毛泽东高兴地笑着说："西藏可不是一般地方，情况很复杂，地理位置很重要，任务既繁重又艰险啊，你必须在思想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张经武当即郑重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决定，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不久，他仅带领一名秘书，一名翻译，一名助手，两名警卫及随行的几位西藏代表离开北京，经过香港，取道印度，跋山涉水，辗转进入西藏边境重镇亚东。

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年仅18岁的达赖喇嘛因轻听谣言，从拉萨来到亚东，想从这里逃往印度。张经武到达亚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说服达赖返回拉萨。他首先向达赖递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信中充分肯定了达赖"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是正确的"，并希望"你（指达赖）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与此同时，张经武与达赖进行了长时间的恳谈，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使其放弃了逃往印度的打算，踏上了返回拉萨的旅程。

张经武等人抵达拉萨后，除了不适应高原气候，吃不好睡不好外，还面临

着重重困难。首先我们党在西藏没有任何工作基础，一切白手起家从头开始，真是千头万绪，无从下手。其次，西藏社会情况极其复杂，既有国外反动势力的挑拨离间，又有西藏地方政府中某些人严重的敌对情绪，甚至百般阻挠我方开展工作。在此复杂情况下，张经武镇定自若，沉着应对。他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全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向他们耐心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诚心诚意多交朋友，这样慢慢团结了一批中上层人士，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但令人焦急的事还很多，最突出的是达赖虽然回到了拉萨，却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迟迟不表明态度。一直拖到1951年10月24日，张国华、谭冠三将军领导的第18军进藏的主力部队到达拉萨后，达赖才致电毛主席，表示拥护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愿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次日，毛主席便及时复电："达赖喇嘛先生，你于1951年10月24日来电收到了，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通过达赖和毛主席的互相致电，给做好西藏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希望。但是，当时的斗争形势仍很复杂险恶。在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的唆使下，拉萨附近色拉寺、哲蚌寺等地的一些喇嘛手持武器，正在准备开进拉萨市区，甚至扬言要把中央代表和解放军赶回去。一时间拉萨全城风声鹤唳，谣言四起，商人停业，居民囤粮，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严峻的形势，张经武一面及时向中央报告，一面和其他负责同志认真慎重研究对策，认为还是要本着争取团结教育的精神，向噶厦和上层人士讲明形势，晓以利害，希望他们顾全大局，认清少数反动分子的真面目，协助人民解放军维护好社会治安。

为了尽最大努力去争取达赖，张经武作出了一个勇敢而大胆的决定，1952年4月6日，他主动约请达赖面谈。达赖表示同意，时间是4月8日，地点就在布达拉宫。根据当时拉萨的紧张形势，同志们都为张代表的安全担心。先不说遭杀害，就是扣留起来后果也不堪设想。少数反动分子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张经武却异常坚定地说："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去布达拉宫是肯定的，向达赖当面讲清中央的态度和我们的立场，完全符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样既可以争取达赖，教育上层人士，也有利于唤起广大藏族群众的觉醒。这次我上布达拉宫，情况复杂而险峻，有牺牲的可能。即使牺牲了，也是为了革命事业，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也是值得的。"

他这一番庄严的谈话，同志们听了非常敬佩。他大义凛然的气概，有力地感染了大家。尽管对他的安全有点担心，也只好同意他去布达拉宫。为了以防万一，确保安全，张国华和谭冠三立即研究了应急措施，命令部队进行周密的





戒备。

4月8日，张经武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如期登上了布达拉宫。此刻，只见布达拉宫周围一群藏军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呈现杀气腾腾的景象。张经武却极其镇定。面对年轻的达赖，他诚恳说明了来意。他把不法分子近日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通报，严肃指出："他们这样胡作非为，不仅是对中央代表和对驻藏解放军的无礼和挑衅，也是对你达赖的不恭。"张代表义正词严，达赖不得不表示要进行严肃处理。

从这以后，张经武和其他同志一起，又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必要的斗争，使拉萨的紧张局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为继续做好西藏各项工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西藏著名的两位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不和。九世班禅于1923年离开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移居青海塔尔寺。自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后，在中央政府的关怀和协助下，长期居住在青海的十世班禅于1952年4月28日安全回到了西藏日喀则。在此期间，张经武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耐心细致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恢复了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使两位宗教领袖长期不睦的问题得到了和解。过去国民党政府20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得到了圆满解决。这是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胜利。

1954年7月，达赖和班禅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西藏工委副书记范明陪班禅走青藏线，张经武陪达赖走康藏线。

当时，西藏交通极为不便，为了保证达赖旅途安全，张经武的确费了一番苦心，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安排，除了派一个连队随行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外，张经武还亲自带领一批干部，不离达赖左右，宿营时就住在达赖周围。每天到达驻地后，张经武都要亲自去看望，问寒问暖，关怀备至。那时候，他已年近半百，身体也不好，痔疮复发，还常常泻肚，他却不顾自己的病痛，处处关心年仅20岁的达赖的安全，使达赖深为感动。

在张经武的精心照料下，达赖于1954年9月4日平安到达了北京。在北京火车站，达赖一行受到了朱德副主席及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此时，张经武才如释重负，高兴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总算把这位佛爷平安送到首都了！"

随后，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西藏平叛后，1960年10月，他出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62年8月，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1965年调回北京，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然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对党的

事业忠心耿耿的老同志，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却把种种“莫须有”罪名栽在他头上，诬蔑他是“假党员”，是“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在西藏的忠实代理人”，甚至无中生有说“张经武参加了贺龙搞的‘二月兵变’，兵变成功后，贺龙当主席，张经武当总理”等等。

1967年12月的一天，他被关进了监狱。专案组不断进行提审。他们采取逼供信的办法，硬要他交出所谓“二月兵变”的黑纲领。

张经武听完哈哈大笑：“你们太抬举我了，我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呐！”专案组人员气急败坏地说：“张经武，你态度放老实一点！”张经武轻蔑地看着他，一句话也不说。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大灾难。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坏人当道，好人遭罪。张经武也是从残酷的现实中一步一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愚昧和荒谬的。刚开始时他也想紧跟，生怕自己掉队；后来他迷惘，他觉得这是一场可耻的闹剧，再到后来，他却真正怀疑这场运动的真实目的了。

这就是所说的反修防修的大革命吗？这就是史无前例的所谓“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吗？他越想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越想越觉得自己是被人愚弄了。于是专案组再让他交代什么问题，他都不再理睬，他用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抗争。这样他就被认为是态度极不老实，是对抗党中央、毛主席，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此时，他是多么想见到毛主席，见到周总理，向他们陈述一切，想让他们来救自己。然而他写了无数次的信，根本就送不上去，宛如石沉大海。他彻底绝望了，终于有一天，他趁看守不注意，一头向墙上撞去，顿时鲜血直流，其状惨不忍睹。

有一天，他和看守闹了起来。“你们把我写的信送给周总理！”“你一个老反革命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我是老反革命？告诉你，我闹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你骂人，你这个老反革命！”“就是骂了你，又怎么样？”看守挥起了拳头，张经武也挥起了拳头，青年时期，张经武就习武健身，在军校时还学过擒拿格斗。士可杀，不可辱！看守动了手，张经武也动了手。但张经武毕竟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怎么能打得过年轻力壮的看守呢？他的一只手被打得骨折，他身上留下了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被折磨得身心憔悴的张经武更加绝望了。性情刚强的他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斗争方式——绝食。他对每天送饭的人大喊：“你们查不出什么问题，就放我出去；你们不放我，我就绝不吃你们送的饭！”就这样，张经武一天、两人……一直坚持了七天，在此期间，专案组未采取任何措施，也未向上级报告。直到第八天，即1971年10月21日，张经武出现心力衰绝和休克现象，才把他抬进医院。此时，他的身体像一盏耗尽了油的灯，医生为他输液，血管因枯萎而插不进针头，维持生





命的葡萄糖水无法输入。半个多小时后，他吐出了最后一口气，经历了1000多个难熬的日日夜夜，永远地离去了！

张经武去世后，“四人帮”为掩人耳目，百般推卸罪责，给中央统战部发的死亡通知书上写道：“张经武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于10月27日去世。”

粉碎“四人帮”后，张经武的夫人杨岗从监狱刚刚释放出来不久，便带着子女为还张经武历史的清白，四处奔走，寻访调查。她的正义行动，得到了邓小平和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的关心和支持，并积极呼吁为张经武平反。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更是十分关心。当他得知在“文革”中受左的思想很深的同志，说张经武在“文革”中态度恶劣时，他十分气愤地说：“张经武的这种态度，足以说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果我们的老同志在‘文革’中被关押期间都低头认罪，让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那还不知道要制造多少冤假错案！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有这种刚正不阿的气节，宁死不屈！谁说这是态度恶劣，不能平反，那就是颠倒黑白！中央开会，我一定要为张经武同志说话！”

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后，张经武终于得到了平反。1979年9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张经武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悼词，给张经武以极高的评价。可令人寒心的是，他的骨灰早就被人丢弃了，至今尚未找到。

今年（2006）是张经武同志诞生100周年，也是他逝世35周年。他的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

（作者系湖南文艺出版社原总编室主任）

# “其奈长沙后进何?”

## ——毛泽东与易白沙

黄露生

1956年6月，毛泽东巡视故乡湖南，不久创作著名词章《水调歌头·游泳》，开头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里，毛泽东将他这次回湖南之行称作“饮长沙水”，不仅表达了他对家乡人民的热爱之情，还表达了他对曾培养教育他的老师，特别是对易白沙先生的缅怀之情。

易白沙（1886—1921），原名坤，字越村，一作月村，湖南长沙人，易培基之弟。因为他家居长沙白沙井旁，又仰慕明末反清学者白沙先生（陈献章），所以更名白沙，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民主革命家；早年毕业于上海德文学校。1916年下期至1918年上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和历史教师，成为当时正在该校读书的毛泽东的老师。

易先生自幼好学，遍读经史百家，崇拜屈原，才华横溢。后爱黄宗羲、顾炎武、陈献章、王夫之、方以智等明清著名学者的著作，深受其思想影响，力主推翻封建清王朝。1903年，主讲永绥师范学堂，后至安徽，初主怀宁中学，继为怀宁师范学堂、旅皖湖南中学堂校长、安徽省立大学教务长。他好治诸子，尤喜墨家，贵任侠。先后结识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等，交情甚笃，深受其思想影响，力图将墨子“尚同”、“非攻”、“兼爱”等主张，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融为一体，并且贯彻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言行之中。1911年武昌起义后，安徽宣布独立。由于革命武装力量不强，一些旧军人和流氓乘机捣乱，严重破坏怀宁社会治安。易白沙与当时著名革命党人韩衍等，组织青年学生为青年军，并率军击毙乱军头目巡防营统领，从而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他往来湘、皖之间，力劝当事者讨袁。此事失败，遭袁世凯通缉，被迫流亡日本，与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并发表《广尚同》、《铁血之文明》、《教育与卫西琴》等文章，揭露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独裁者袁世凯相互勾结的罪行，痛斥为“天下之强有力者，负墨子而趋，假尚同之说，混人视听”的伎俩。特别是《教育与卫西琴》，阐述物质与





精神的关系，认为“道为神明（即精神），器为物质。以学术论，同有上下之别，以竞争论，道必赖器而后存”等唯物主义思想。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第二卷即改名《新青年》)。他先后在该刊发表《述墨》、《孔子平议》、《战云中之青年》、《诸子无鬼论》等文章，抨击儒学，宣传民主与科学。其中《孔子平议》，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最早檄文之一。他认为“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为了打破思想和学术的专制主义，他明确提出“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的口号。1916年袁世凯死后，易白沙从日本返湘，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文史教师。1918年赴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1919年，自沪归湘，隐居先人墓庐将近一年。次年春去上海，稍居即归，在岳麓山僻处独居，亲戚故旧不相见。在此期间，激于袁世凯复辟建帝制，著述《帝王春秋》一书，列举数千年君主专制的恶习，委婉陈述，思启蒙感，孙中山亲自为该书题签，盛赞该书：

> 从历史事实，唤起知识阶级诛锄独夫民贼，可谓严于斧钺矣”!

1921年2月，孙中山两次致函易白沙，谓：

> 弟甚欲得一能文者与共听夕，以素所怀抱主义政策，见之文章，勒为条教，不审能助我否?

当时，易白沙闻北京军阀政府“以统一之命诓骗中外”，镇压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制造“3·18”惨案，义愤填膺，遂于4月末，只身赴北京，短衣束裤，身怀短炮，日常徘徊新华门前，谋刺北京封建军阀政府首要。但因警戒森严，未能得手。于是南下广州，会晤孙中山，要求“组队赴北京杀贼”。胡汉民等劝说“宜文章报国，不必赴险”。他发现孙中山身边“鼠辈作祟”，感到绝望，遂于当年端午节，乘小轮赴明儒陈献章故里新会陈村，效法屈原和陈献章以身殉国，蹈海自尽，遗体未获，终年35岁。

毛泽东与易白沙交情，可以追溯到1914年，易先生与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毛泽东就是该刊物的忠实读者，其中很多文章，特别是易先生《教育与卫西琴》等文章，他反复阅读，甚至背诵于口。1915年，该刊被日本军警封闭而被迫停办，毛泽东不知道，还到处写信，借阅《甲寅》新出的期刊，充分说明毛泽东对该刊的钟爱。同年9月，《新青年》出版，毛泽东在他老师杨昌济推荐下，成为该刊热心读者，不仅认真阅读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的文章，还认真阅读易白沙先生《孔子平议》、《诸子无鬼论》等抨击儒家，宣传民主与科学的作品，深受其影响，更对易白沙先生其人其文产生爱慕之心。

1916年6月，易白沙从日本返湘，当时民主教育改革家孔昭绶，任湖南

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特聘易先生为该校国文、历史教师。他的强烈爱国主义热情和渊博学识，深受学生敬仰。当时，他的学生回忆："历史教师易白沙先生是一位爱国心极强的老师，他利用上历史课的机会，满腔怒火地痛斥了袁世凯反共和，复辟帝制的滔天罪行。他态度激昂，声音高亢，吸引来了许多人在教室外的过道上听他讲话。他讲到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时，更是声泪俱下，悲愤不已。我们深深感到日本灭亡朝鲜，使韩人三家共一把菜刀的命运即将在我国实现，当时教室内外一片同仇敌忾之气。我们时常结队分组上街游行、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妄图吞并我国的阴谋，唤起同胞的爱国心，共同抵制日货，反对日本的经济侵略。"毛泽东更是敬仰易白沙，除了认真听好课之外，还经常找易先生"开小灶"。易先生当时住在长沙白沙井旁，就在第一师范的妙高峰山下，相距只有一两里路远。毛泽东以"人有善者，欲千里求之"的精神，经常利用课余去白沙先生家里请教。白沙先生非常欣赏"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毛泽东，有问必答，特别是听到毛泽东，要探索"宇宙之真理"、"改造中国哲学和伦理学"，盛赞毛泽东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并戏称毛泽东是"平民天子"，悉心教诲，听说毛泽东喜欢阅读他在日本主编的《甲寅》杂志，特地将该杂志各期汇集，装订成一本，送给毛泽东，以资留念。1921 年夏，易先生离开长沙前，还将自己新近的著作《帝王春秋》，赠送"平民天子"毛泽东，以资记念。后来，毛泽东《沁园春·雪》中说："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斯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等对"帝王"的批评，显然受易白沙《帝王春秋》的影响。

1921 年 6 月，易先生以身殉国，唤起国民反帝反封建意识。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非常悲痛。当时，他正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创建中国共产党。8 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一边筹建中共湖南党组织，一边组织新民学会成员，发动"长沙后进"一千多人，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大礼堂，为易白沙先生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毛泽东为了突出易先生追悼会主题，还精心创作了一副挽联，悬挂易先生灵堂两边。其挽联是：

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
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这副挽联意味深长，铭刻人心。上联写对易先生沉重哀悼，其中"民国"，既是当时"中华民国"的简称，又含有人民和国家的意义；"民国前途"是区分衡量前面所说的"无用之人"、"有用之人"的标准，也就是说，损害"民国前途"者为"无用之人"，即指当时祸国殃民的反动卖国的军阀；还有"无用





之人不死"，既表达对祸国殃民的卖国贼的愤恨，又怀念易白沙曾经谋图刺杀卖国贼的爱国之举；"有用之人"，指为"民国前途"战斗献身的人，这里具体是指易白沙先生和后面"杨公"，即杨昌济；"愤死"，指易白沙先生之死的"悲愤"，与"无用之人不死"构成鲜明对比，揭露抨击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我为民国前途哭"，其中"民国前途"，揭示易白沙之死是"民国前途"的重大损失，肯定颂扬他的历史贡献；"哭"既表达对先生去世的沉重哀悼，又暗示易白沙先生生前在课堂中，讲到帝国主义人侵，卖国贼的罪行时，经常"声泪俱下"的情景，和"我"深受恩师教诲之情。下联，写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发扬易白沙先生为"民国前途"战斗精神。"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将易白沙先生与"学贯中西"，"欲栽大木拄长天"的杨昌济先生，相提并论，充分肯定和颂扬白沙先生为"民国前途"的巨大贡献和教育事业的成就。"其奈长沙后进何?""其"代指前面杨公、易公的先后逝世；"长沙后进"，指长沙的青年和学生；"奈……何"，怎么办？是请问，是呼唤长沙青年，即杨公、易公的学生，要牢记先师的教育之恩，为实现他们反帝反封建的事业，奋斗不止。

这副《挽易白沙烈士联》，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人读后"声泪俱下"，还有许多人抄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1956 年 6 月，正值易白沙先生就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40 周年。毛泽东回湖南视察，特地邀请当年老同学周世钊先生，来到他学生时代经常前来求教易白沙先生故居遗址——长沙白沙井，饮水思源，缅怀白沙先生高风亮节和教育之恩。不久，他创作了著名词章《水调歌头·游泳》，开头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1958 年 9 月，《文物出版社》刻印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收录该词。同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该词中"才饮长沙水"的书眉上，亲自批注说：

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长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

毛泽东这次回湖南，意味深长地称为"饮长沙水"，形象地表达了他对养育和成就了他从事革命事业的家乡人民的热爱之情，其中包括对曾教育培养他的恩师的饮水思源深情，特别是着重说明"长沙水"，就是指"白沙井"之水，更表达了他对恩师易白沙先生的缅怀。因此，有学者认为：该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是毛泽东当年《挽易白沙烈士联》中提出的："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的最好答

案……

**注　释**

[1]《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志》中《人物表》. 1918 年.

[2] 参阅《辞海》中"易白沙"词条.

[3]《黎锦熙日记》，1915 年 7 月 4 日记载.

[4] 毛泽东 1915 年《致萧子升信》，《毛泽东早期文稿》. 湖南出版社，1990 年出版.

[5]《第一师范》校刊 1983 年第 3 期，作者罗驭雄，是毛泽东同年级同学，曾任湖南省立一中、第一师范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

[6] 杨浪明.《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1983 年。湖南第一师范 80 周年校庆特刊。作者是甘肃兰州医学院教授、院长，著名病理学家，曾是毛泽东任教第一师范时的学生.

[7] 周仁济.《毛泽东同志雅语选释（下）》，《第一师范》校刊，1981 年第 1 期. 后见季世昌.《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 南京出版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 黄宜人行述

杨昌济

外大母，长沙葛桥黄氏女。父澹斋公，以博闻强记著称，长于数学。外大母以前清嘉庆癸酉八月二十一日卯时生。岁壬辰，年二十，适平江向氏。外大父讳国源，字肇崑，崇祀乡贤鲁斋公之孙，永州府儒学教授晓渠公之长子也。外大母于归之后，随侍永州学署。岁甲申四月初七日，乃生吾母。是岁九月，外大父偕两弟应试岳州。舟过洞庭湖，猝遇狂风，波浪大作。公见前有无数船沉溺。泣曰："使我兄弟三人俱死于水，父母闻之，将如何痛哭流涕！"以此悲伤，呼天抢地，遂成心疾，战栗、昏迷，长睡不醒。抵宅家后，数日而逝。外大父天资颖敏，攻诗书，能文章，不幸早死，士林惜之。后数月，外大母闻之，痛不欲生，以舅姑之劝慰，又顾恋吾母，忍死抚之。后自永州归。久之，乃立夫弟达亭公之次子泰椿为嗣，即我舅父寿吾先生也。外大母上则孝事翁姑，下则爱抚孤女及嗣子。贞固之节，久而弥坚；哀慕之诚，老而犹笃。鲁斋公固理学名儒，继之者守寒素之风，尚诗礼之教。外大母精勤节啬，有艰苦卓绝之行。早眠早起，终身不暮食。少壮之时，夜不点灯，早携吾母就寝。所节诸资，并积贮之。勤于纺绩，常服嫁装，皆取给焉。有余布，则复售之。故初承受遗产时，岁人谷数十石，经数十年之辛勤储积后，乃岁人谷二百余石。资遗吾母者，其数甚巨。呜呼！艰已！外大母与吾大母，本同父姊妹。吾父讳象洛，字书樵。积学不第，廉直温厚，外大母爱重之。吾母恭让仁慈，孝友勤俭，天性之厚，里党咸钦。吾母生吾兄昌运、吾姊与吾、及吾弟昌凯，会兄以痰疾逝，吾外大母哭之；舅父始娶郑孺人，生四女而卒。吾外大母又哭之；后舅父以肺病逝，吾外大母又哭之；而其悲吾母也尤至。幸舅父续娶童孺人，复生三子一女，含饴弄孙，足娱晚景。外大母素康强无病，以光绪丙申十月十九日卯时，无疾而终。时年八十有四。先是，舅父于同治时，已为外大母诰封宜人，旌表节孝如例。郑孺人之女子四人，长适平江锺氏；次归于我；三适平江江氏；四适长沙黄氏。童孺人所生三子：振燮、振武、振凡。振凡出继。均已娶妇，能自立。所生一女适长沙王氏。吾舅父今年七十余，犹康健。有孙男

数人。

昌济书外大母行述，既，乃谨书其后曰：语云："节孝之后，必有达人"，吾外大母苦节如此，吾舅父复以厚道承之，其子孙之方兴未艾，可预卜也。昌济八岁失恃，十四岁失怙。幼承吾外大母之爱甚至，至吾父母之爱，又不待言。述吾外大母事，思慕亡者，不胜风木之感也。自念粗有知识，实本于家庭之教育，祖父之遗传，外大母之遗泽，不独荣其枝，且有以及于其所出，可不念哉！吾考吾母之世系，上溯至于鲁斋公，又以见君子之泽，源远而流长也。书此以示两家子弟，俾于先世有所考焉。是则区区之微志也。

长沙廪生外孙杨昌济谨述

（录自平江石洞向氏族谱，誊录人：伏家芬）





# 张百熙的政治理想及其崇高风范

谭承耕

**编者按：**今年（2007）是晚清名臣张百熙逝世一百周年，为此，本刊编辑部特约请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谭承耕教授撰写此文，纪念这位名垂青史的湖湘先贤，从而使读者了解其政治理想及其崇高风范。

张百熙是湖南省长沙县沙坪乡人。生于1847年，卒于1907年。历任清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尚书、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管学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要职。是我国近代一位颇有影响的进步的政治家。

张百熙一生最大的功绩，是进行教育改革。他将原为封建大书院的京师大学堂改造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大学，成为中国"大学之父"；他主持制定《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并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公布、实行；他要求废除科举制度；他要求派遣学生赴东西洋学习，以求培养高校教师和新型科技人才。这一切，对于提高民族素质，提高民众智慧及知识水平，突破封建愚民政策的牢笼，确实具有开天辟地之功。在这方面，人们已多有议论和肯定，兹不赘述。然而人们对张百熙的政治理想和崇高风范却所知较少。

今年是张百熙逝世一百周年，我们应该纪念这位先贤。兹趁此纪念之际，略述其政治理想与崇高风范。

## 一、不是一般洋务派，而是早期维新派

许多人认为张百熙不过是一个洋务派，其所作所为，与洋务派相同。我认为此看法不够全面。的确，他与洋务派有许多相同之处，如他主张兴修平汉铁路，主张与民开发矿产，主张开办银行，主张兴办工厂，兴办官报等等（见张百熙著《条呈时事疏》、《敬陈大计疏》)。但我们应该知道，张百熙尚有许多方面超越于洋务派之上。兹举一、二：

其一，冒巨大风险，推荐康有为作经济特科。

戊戌变法前夕，张百熙曾以礼部侍郎、主考官之身份，推荐康有为作经济

特科。所谓经济特科，即认为此人有经世济民的非凡才干，可不经过一般科举考试，即委任高官，以施展其才能。后来康有为其所以能一朝突发，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与张百熙的推荐不无关系。张百熙为什么要推荐他呢？他与康有为非亲非故，毫无个人私交。显而易见，他就是从康有为所公开发表的政治见解，认为他主张的君主立宪、维新变法这一系列措施，能够救国救民。显而易见，在张百熙内心，是赞同、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当时较为民主、进步的的君主立宪主义。这是一般洋务派所不及的。戊戌变法大败，清廷追究此事，张百熙遭受处分。当然，有的洋务派也起用维新派人士，但只是用作幕僚，助其兴办洋务。如张之洞就是这样。更加令人痛恨的是，在变法失败、清廷捉拿维新派人士时，他们为着向慈禧太后献媚邀宠，不但不保护维新派，反而为虎作伥，落井下石。如张之洞在这方面，就是恶名昭著。由此可见，对待变法维新，张百熙与洋务派态度明显不同。前者是支持、拥护，而后者却是利用或打击。其所以这样，就是因为张百熙自己本来就是个维新派，有变法维新的思想。

其二。张百熙主张彻底改革官制，实现官员专业化；主张地方自治。希望在国家制度方面，达到逐步变革维新的目的。

在官制改革方面，张百熙曾提出："任官之法，莫善于一事分任诸人，莫不善于一人普任各事。如京员尚、侍诸职，今日习礼者，明日使之知兵。外吏藩臬等员，此处掌刑者，他处使之知赋。弊不可胜言也。其实中国庶官久任，与夫专门分治诸法，本极精详，徒以辗转变通，致防弊之意太多，任人之意极少。今欲因时制宜，特加厘定。"（《清史列传》六十一）这里就是说，当时封建官僚机构，已呈现出全面畸形状态，即各个机构的长官，只要懂得并坚持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伦理，就能普遍担任各个机构的长官，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现在主持礼仪工作的，明日又可去领导军事；这里掌管刑罚的，又可到他地领导财政、商务。用现在的话来说，只要你能坚持君主专制的政治挂帅，就甚么都可领导。这种反动的"政治挂帅"，本来就必然工作效率低下，腐败无能，而进入鸦片战争后的通商开放，那就更百弊丛生，成为腐败的温床。而其所以会这样，主要是由于最高封建统治者，为着巩固其统治，故用人只问其政治态度如何，只问其是否忠实于君主专制，丝毫不问业务。故而"辗转变通"，形成此等局面。张百熙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要改革官制，首先必须实现官员专业化。即一方面，按与各国通商后的情况，按照业务分工，设立外务部、商部、税务部等；另一方面，各部长官，必须懂得并熟悉本部门的专业事务。既要懂得"政"，又要懂得"艺"，艺就是专业。这个建议，一方面，当然可使各个行政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腐败；另一方面，也是削弱封建君主专制主





义的反动而野蛮的统治。

到清末光绪三十二年，朝廷实行新政，张百熙不但提出官制改革，还提出要实行地方自治。《清史稿》是这样叙述的："百熙以变法宜先统筹全局，若支节而为之。则先后均于寡效。因疏论官制及地方自治两事。谓：'非速定官制，则提纲絜领，无以集政权于中央。非速兴地方，则至纤极微，无以被精神于通国。盖官制者，政治之机关，而地方者，国家之分体。诚使内外官制定，而地方制度兴，则诸事易行，而万端可理也。'因考历代成法之精密，外国成绩之显效，以备采择。"（列传六十一）这里就是认为，地方情况，"至纤而微"，有各种具体特殊情况，故必须制订地方自治制度。我们知道，地方自治，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产物，在当时，对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具有一定的限制和削弱作用。张百熙能提出此，自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其三，清末，清廷为缓和矛盾，实行新政，预备立宪，召开国会。其时，有一部分以瞿鸿禨为代表的保守派，向慈禧太后建议，在建立国会的同时，仍然保留军机处。对此，张百熙强烈反对，他当即以官制编纂大臣的身份，向朝廷密奏：认为既然建立国会，实行宪政，就应废除军机处，建立责任内阁。同时，他还建议以荣禄为总理，以袁世凯、瞿鸿禨为副总理。我们知道，清代军机处，乃雍正时期对西北用兵时建立，以后沿用，军机处成为清朝最高行政机构，直接由皇帝掌管，成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最高政权机构。要实行君主立宪，为扩大民权，限制并削弱君主权利，自然就必须废除军机处，建立责任内阁。责任内阁由国会通过任命，向国会负责。由此可见，张百熙的密奏建议，是正确的，是进步的，是符合君主立宪原则的。由此也可见，张百熙是信奉当时较为进步的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的。

综上所述，张百熙的确不是一般洋务派，而是早期维新派。

## 二、坚持爱国理想，甘冒风险，顽强拼搏

张百熙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热爱祖国，他一生奋斗理想，就是希望祖国富强，洗刷国耻，战胜帝国主义侵略者。他曾有这样一首诗：

> 昨夜王师大合围，骁腾万马尽骈骈。八方草木森兵气，一震雷霆壮国威。天上喜看飞将落，车前生系左贤归。涛声卷地惊残梦，孤艇灯昏百事非。（《退思轩诗集》卷第二）。

诗中所言及的"左贤"，并非真正指我国少数民族的首领，而是以此比喻帝国主义侵略者。此诗说明，张百熙梦寐以求的，就是祖国的强大，就是能彻底消灭侵略者，洗雪国耻。

当然，张百熙所热爱的祖国，包含有清王朝的成份。但我认为，他热爱的祖国，其主要成份，是指正在受苦难的人民。他内心牵挂着广大人民的痛苦。每当触及一草一木，以至听到一声秋雁的鸣叫，也想到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北方人民，而发出哀吟："秋夜夜半天雨霜，卧闻雁声声断肠"；"天边碧月顾影失，地上黑风摧羽伤。起坐为汝一愁叹，江湖万里心苍茫"。(《退思轩诗集》卷一《秋雁》) 由此诗可看出，张百熙的爱国主义，所爱者主要是人民，所忧者主要是人民的痛苦；其爱国理想，也就是祖国富强，人民过着幸福安康的生活。

正由于张百熙坚持爱国主义理想，所以他数十年如一日，拳拳报膺，执著追求，甘冒风险：他冒刑戮之风险，推荐康有为作经济特科；他不避嫌疑，不畏毁谤，将京师大学堂办成传播新思想的阵地；他不怕得罪权贵，招来杀身之祸，请求废除军机处。而表现张百熙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最为强烈、激越的时期，则是甲午战争及其前后。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前，张百熙正值班南书房，随侍光绪帝左右。参与国事机密，他亲见光绪帝为中日交涉及有关备战而操劳、忧伤。他当时官只五品，人微言轻，但仍以天下为己任；主张积极备战。他向光绪帝屡陈军事要略，即"集师接济之法，固本捍卫之方，捐助军饷之策，拘治奸细之律"共十条，并得到采纳（见《清史稿·列传》六十一）及战争爆发，中国初战失利，继而屡战屡败，不可收拾。张百熙多次上奏，指出失败根本原因，乃在于李鸿章执行一意求和，备战不力。尽管此时情况严峻，但张百熙仍力主加强后卫，抗战到底。就在这关键时刻，清廷还在忙于为慈禧太后准备祝寿。许多官僚，为向慈模太后讨好献媚，以便捞取政治资本，竟然不顾国家困难，大肆铺张，不但在宫中布置祝寿，且于北京城内到处布景设坛，祝慈禧万寿。此时张百熙不顾得罪慈禧的巨大风险，倡官必须以国事为重，降低祝寿规模，除宫内布置外，宫外一切景点、坛场一律撤销。他的这个建议，虽遭到攻击，最后还是得到采纳。不久，战争结束，中国惨败，订立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蒙受奇耻大辱。消息传来，全国震惊、悲愤。悲愤之余，张百熙一再弹劾李鸿章执行投降路线，备战不力，贻误战机，要求朝廷对其罪行，彻底查办。同时，还揭发满洲贵族、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结党营私，不理国事，一切依赖北洋大臣李鸿章。对战事更指导不力，蓄意投降苟安。因此，要求朝廷，撤换首席军机大臣。后张百熙又与文廷式等五十名高官联名向朝廷弹劾李鸿章几大罪，如结党营私、和谈误国等。按当时，世铎、李鸿章乃当朝最显赫的权贵，而张百熙当时只五品官员，而张敢如此直言不讳，敢如此于大庭广众之中，声讨其罪行，真令人钦佩，也令人瞠目结舌。因此，张百熙虽未鏖战沙场、血洒边疆，但其一心为国，不避权贵，甘冒政治风险，亦足为





世人楷模。

## 三、为政清廉，执法严明，礼贤下士，待人宽厚

张百熙在为政、执法、待人接物方面，确具有进步政治家的崇高风范。

张百熙为政清廉，可谓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如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因八国联军陷北京逃亡西安。后与列强订辛丑和约，战事平息。慈禧乃决定于1901年上半年（即光绪二十七年）回北京。这时北京正是大兵之后，一片废墟，弹痕累累，道路桥梁毁坏无馀。慈禧回来，车马无从通过。于是清廷命张百熙为工部尚书，限期修好跸路。据原来通用常规，即负责修路官员，对款项可大量抽成。用今天的话就是可拿回扣，中饱私囊，大发横财。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除以张百熙为首外，还有桂春、景澧、陈夔龙三人，皆为侍郎以上的朝廷大员。在此三人中，除陈夔龙外，皆认为必须沿用陋规惯例，让官员参与抽成，工程才能快速进展。但此时张百熙力排众议，下令所有官员，一律不得参与抽取回扣，而且必须自备车马，到工地督促。违者，一律以贪污渎职论罪。后来，工程按期完成，为国家节省款近百万。在这一巨大工程进行中，张百熙不但坚持原则，而且以身作则，不拿回扣和捞取任何好处，并且放下卿相之尊的架子，自备车马，亲临工地，管理督促，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这在当时，真是难能可贵。

张百熙不但为政清廉，而且执法严明，做到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如光绪二十七年任左都御史兼署刑部尚书，巡视京城，深入调查，听取民意。而后分别举劾、不徇私情，该奖的奖，该罚的罚。如御史陈璧，治理街道，防治盗贼有功，即请朝廷嘉奖提升。如翰林院编修马恩岷行为不轨，不知自爱，肆无忌惮，鱼肉平民。对此，张百熙即上奏，请求立即将该员革职查办。当时，该员已调云南省副考官，也请不管他行抵何地，立即追回，进行严惩。在这次司法活动中，张百熙不负众望，真正做到了执法严明，一秉大公，因而名声大著。

张百熙一生，深知人才对民族国家之重要，故一向礼贤下士。如办京师大学堂时，聘请著名桐城派散文家吴汝伦为大学堂总教习。当吴拒绝时，张百熙竟不惜以尚书之尊，在吴面前长跪不起。此事至今仍传为佳话。

张百熙虽执法严明，但对人异常宽厚。如有个江西小商出身的人，为张百熙所识拔，当了衙门高级职员，从生活待遇直至文化学习，张百熙皆对他优惠照顾。后此人多次做了对不起人的事，张仍然原谅他，赡养其家人。直到最后，此人已堕落到犯罪的边缘，并经常以张的名义在外干坏事。不得已，张才将此人找来，好言相劝，赠以百金，说："你要自爱，京城你住不下去了，好

好回去吧!"(事见《清稗类钞》)从这小故事，可看出张百熙对人多么宽容。

综合张百熙各个方面，可以这样说，他既有包拯、海瑞的气概，又有君子之风，长者之风。

## 四、既不是清流派，也不是浊流派，而是真正的进步派

在清末政坛，有人将其上层人物分为两派，一是清流派，以瞿鸿禨为首；再就是浊流派，以荣禄、袁世凯为首。有人认为张百熙属浊流派，其根据就是张百熙是袁世凯的亲家。我则认为张百熙既不是清流派，也不是浊流派，而是超然于两派之上的真正的进步派。

张百熙与清流派的人物如瞿鸿禨有深厚友谊，联系密切，经常书来信往；在行为上也有些相类似，如关心民生，敢于弹劾权贵，注意名节，清廉自守。但在政治路线方面则相径庭。清流派人物较为保守，而张百熙则较为先进，提倡改革。如清末实行新政，瞿鸿禨则倡言必须在建立国会的同时，保留军机处，而张百熙则提出必须实行责任内阁，废除军机处。因此张百熙与瞿鸿禨为首的清流派在根本政治问题上，并非一样，当然不属清流派。

张百熙与浊流派人物如荣禄，特别是袁世凯有密切联系，他与袁还是儿女亲家，在有关政治改革问题上，如建立责任内阁，也相互支持。但浊流派人物，大多贪污受贿，拉帮结派，不注意名节。而张百熙则一生为政清廉。逝世之后，在北京的家眷，连吃稀饭也成问题。在一些具体政治问题上，常与浊流派人物发生冲突。如1906年张百熙等组建邮传部。该部侍郎唐绍仪专横跋扈，提出该部行政人员，必须任用江浙富商，实行任人唯亲。而唐绍仪此人乃袁世凯之心腹，浊流派之中坚，他的意见也正代表浊流派的意见。但张百熙坚持原则，一律拒绝。后来，袁世凯干预，请求张百熙宽容，张毫不含糊，严辞痛斥。由此可见，张百熙也并非浊流派人物。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张百熙完全超越于清流、浊流两派之上，既有两派之长，又无两派之短。他考虑问题，处理问题，不从派别利益出发，而是从改革、进步的原则出发，正确的则支持，不正确的则反对。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是进步派，是一个进步的政治家。

## 五、儒学与湖湘文化的发展的硕果

张百熙整个生平业绩，如果从学术源流来看，可以说是儒学的新发展，其中既有传统原始儒学的因素，也有经世派儒学的成份。原来张百熙出身于儒学书香门第，其父张启鹏乃儒学理论家，著有《心言约编》。张百熙成长于这样的家庭，当然深受孔孟民本思想的影响。如他在同治十三年殿试时所写的文章





《大禹以五音听政》中就这样说："夫天之生民，非为王也；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政平者天与之，政失者，天夺之。"这里说得非常清楚，即认为人民生来不是为国王服务，而国王的出现，则正是为人民服务。这里一方面接受了孟子的思想，即民心的归向，决定了上天把国王的职位给予谁；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发展了孟子的原始民主思想，即认为在人类社会，国王其所以产生，就是为了给广大人民提供一个服务者。因此，归根结底，不是人民为国王服务，而是国王为人民服务。国王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权利，而人民却有享受被服务的权利。正由于张百熙有这样明确、朴素的原始民主思想，所以也就能在君主绝对专制主义风行一时的年代，较容易地接受了西方的扩大民权、限制君权的君主立宪的思想；所以当康有为宣扬君主立宪时，他也就欣然赞同。因此，可以说张百熙的政治思想，实为传统原始儒学的新发展。

自然，张百熙也接受了经世派儒学的思想，即在今文经学术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儒学必须与时俱进，懂得世务，深通国计民生之道，从而能实现内圣外王之大道。我们湖南的魏源，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命题，开辟了几代人的变法图强的事业。张百熙也正是沿着这个思路，认为必须由表及里地从技术到制度，从经济到政治，逐步引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制度，在与中国特点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维新变法之宏愿。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张百熙的思想，正是原始儒学与经世派儒学的结合，是儒学的新发展。

还有，我们如果从文化源流看，张百熙的生平业绩，也是与湖湘文化分不开的。张百熙生于湖湘，长于湖湘，早年受湖湘文化的主要代表魏源学术之影响，同时，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直接受湖湘文化的重要传人——郭嵩焘之直接教诲。如同治九年郭嵩焘在批阅张百熙乡试中所写的文章时，对张推崇备至。后来，在京任职时，张与郭更是经常诗歌唱和，相互关怀、鼓励。总之，张百熙的生平业绩，可以说是湖湘文化发展的硕果，他体现了湖湘文化的求真务实、敢为人先的特征。为发扬湖湘文化，我们应该纪念他。

# 磨剑室主与知生靡乐斋主

## ——柳亚子和傅屯艮的交谊

李海珉

柳亚子先生（1887—1958）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书斋叫“磨剑室”。书斋名源于唐贾岛的《剑客》一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持君，谁有不平事?”早年的柳亚子确实一身豪侠之气，20岁那年还学习过实用化学，准备制造炸弹以期为革命搞暗杀，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长，柳亚于脱尽了游侠之气，他磨砺的并不是宝剑，而是那支毛笔，用笔杆作刀枪。拿柳亚子自己的话说，笔虽然比不上坦克与火炮，也可算是匕首与投枪。磨剑室的取名还与科举考试有点牵连。1902年，柳亚于遵照父母之命，赴县城参试，中了秀才。柳氏合族庆贺，期望他中举人、中进士，飞黄腾达，荣宗耀祖，不料，柳亚子因为考试而开了眼界，结识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从此他决心走上反清排满之路。次年，年仅16岁的柳亚子就把自己专攻四书五经的书房，取名为“磨剑室”，自称“磨剑室主”，决意磨砺自己手中那支如椽大笔，为国家为民族贡献才力。

柳亚子早年的交往中，有一位湖南醴陵籍的傅屯艮（1883—1930），原名熊湘，字文渠，一字钝根，也作屯艮、钝庵、钝安、屯根，号君剑，幼慧聪颖，14岁就读毕六经，诗赋韵文，各体书法，件件皆能。傅屯艮早年就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知生靡乐斋”，自号“知生靡乐斋主”。这位斋主从少年时代起就注重修身，很早立下宏愿，此生不求发财，不求腾达，更不求享乐，只想为国为民作出奉献。16岁那年，傅屯艮负笈外出求学，先后在醴陵渌江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和湖南省高等师范学堂学习，聪明再加勤奋，成绩卓著，备受前辈赏识。在打下学问功底的同时，傅屯艮与宁调元等思想激进者结为知交，开始为反清排满而奋斗，真正走上了“知生靡乐”的漫漫征程。

1906年夏，傅屯艮来到上海，由宁调元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迁居到同盟会江苏分会的秘密联络点“夏寓”。“夏寓”是健行公学附近的一个寓所，当时居住着柳亚子和高天梅、陈陶遗三人，他们公开的职业是健行公学教员，





暗中从事同盟会地下工作。这时，正值保皇的立宪派与革命的同盟会进行论战最激烈的时候，革命派的主要阵地是《民报》，章太炎主编，立宪派的主要基地是《新民丛报》，梁启超主编。柳亚子将他在同里自治学社创刊的《复报》作为论战的法宝，以邹容赠予的“中国少年之少年”为笔名，撰写文章，向腐朽的清王朝发起一次次的猛烈进攻。为了适应论战，柳亚子将《复报》油印改为铅印，单张扩大为单行本，每期达三万字。不用清廷年号，改用黄帝纪年，封面“复报”二字使用反文印刷，寄寓反清光复之意。

同在夏寓，傅屯艮感受到了柳亚子义无反顾的昂奋，一颗勃勃雄心顿时也燃起了熊熊的求战烈火。正好同盟会的领导黄兴找到了傅屯艮，要他主编《洞庭波》月刊。说来也巧，上海竞业学会正好要创办一份《竞业旬报》，也邀请傅屯艮出任主编，傅欣然奉命。1906年10月28日，一刊一报同时问世，都由傅氏主编兼主笔，反清的色彩异常浓烈，悲歌国魂，颂扬民族英雄，倡导办学建校，热情关注妇女解放问题。傅屯艮兢兢业业，夜以继日，甘洒一腔热血，谱写历史的新篇章。武装反清是《洞庭波》杂志的主题，要求湖南“首倡起义”，主张联络会党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主力。傅氏的诗作更是铿锵激越，掷地有声：“我告健儿莫叹息，明年破虏收山河。三户灭秦迹犹在，千秋霸气未销磨。”“汉土西看日色昏，伤心满虏据中原。衣冠谁是先朝制，东海翻然认故园。”《洞庭波》“每期数千册，散布各省，流入醴陵、萍乡、浏阳等县尤多，粗解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穷乡僻壤之民，亦知革命之不可一日缓矣。”（以上引录均见刘谦《宁调元先生事略》《建国月刊》第三卷第二期）1906年12月的湘赣边界爆发的萍浏醴起义，《洞庭波》的宣传鼓动功不可没。

武昌起义爆发，傅正在上海与南社社友陈去病、张默君一起编辑《大汉报》，他异常振奋，不避风险，亲赴前线采写稿件，创作诗词和激情澎湃、恣肆汪洋的文章，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也为中华民国的建立推波助澜。

风华正茂的柳亚子，一向自负才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可是，面对傅屯艮的健笔，特别是那文采，那激情，不得不由衷佩服。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那时，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正在柳亚子、高天梅和陈去病等人心中酝酿，柳亚子多次征询傅屯艮的意见。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当时远在湖南长沙的傅屯艮立即驰函柳亚子，随即填写了入社书，入社号是35。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柳亚子应邀来到南京担任总统府的骈文秘书，可是他对总统府内弥漫着的主和气氛十分反感，仅仅三天就

辞了职，来到上海，进入《天铎报》社，以“青兕”为笔名，间日撰写社论抨击主和派，反对优待清廷皇室，揭露袁世凯的狼子野心。

二年以后，傅屯艮与柳亚子应姚光的邀请，来到江苏金山张堰镇（今属上海，张堰镇别称留溪），与高燮、高旭叔侄相聚，傅感念这些年来与柳亚子两人在反清反袁斗争中的桴鼓之应，专门为柳亚子题写了“磨剑室”三字匾额，又以他特别擅长的指书，撰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联语是：

青兕后身辛弃疾，红牙今世柳屯田。

落款“钝根指书时客留溪”，下钤一方朱文印章“知生靡乐斋主”。

对联写得很巧妙，把柳亚子当时的姓、名和别号都镶嵌在里面了。

南宋词人辛弃疾文武兼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很符合柳亚子的理想；辛词豪放婉约兼而有之，且多用典，这也很合柳亚子的胃口。那时，柳亚子爱慕辛弃疾其人其词，就改名“弃疾”，辛弃疾有别号“青兕”，柳亚子也以青兕作为自己的别号，一度作为笔名使用。

柳屯田就是柳永，他中年以后考中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柳永是北宋专力填词的作家，擅长以慢词描写都市风光、市民生活和羁旅行役之情，开辟了词作的新题材。有人曾经将苏轼同柳永两种不同创作风格进行过形象的比较，说苏东坡的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而柳永的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见俞文豹《吹剑录》）所以有“红牙”“柳屯田”之说。当然，柳亚子的诗并非一味婉约，他的忧国忧民之作更多的是接近于辛弃疾。这里主要是取它一个“柳”字。

“老朋友，概括得好啊，不愧为知交。”柳亚子非常喜爱这副对联，特别是“青兕后身辛弃疾”一语，说他柳亚子犹如辛弃疾再世，像青兕那样，敢于冲锋陷阵，犀利而老辣。所以，柳亚子生前一直将它挂在磨剑室书斋里。直到今天，柳亚子故居的磨剑室里，那匾额和对联仍然高高地悬挂着。

也就在1912年，傅屯艮由沪返湘，出任《长沙日报》总编辑，面对声威赫赫的袁世凯及其爪牙，面对世俗之流大唱非袁莫治之说，力排众议，认定袁氏一旦得势必定称帝，犀利地著文讨袁，言辞激烈，锋芒毕露。与柳亚子一样，所见略同，旗帜鲜明，不屈不挠。

可是不多久，二次革命失败。炙手可热的袁世凯及其爪牙，对反袁情绪高昂的湖南加紧了控制，袁特派汤芗铭督湘。汤因嗜杀成性，故外号屠夫，手下的军法课长华世羲也是有名的活阎王。汤一到湖南，立即照内线提供的黑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和反袁人士，傅屯艮名列黑名单之首，而且附有“于叛反时





著言论，无不狂悖。悖逆之论，日出日奇，湘祸之大，该记者与有力”等言辞（《辛亥革命丛刊》五《关于湖南二次革命的几束史料》）。傅屯艮一介书生，自知凶多吉少，立马从长沙微服出逃，奔回醴陵。可是醴陵城内也已缇骑满布，屯艮避祸乏术，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最后找到南社社友刘𫘤，求助于玲珑馆妓女黄玉娇。当时玉娇正脱籍家居，闭门谢客，看到屯艮，柔肠顿生侠胆，毅然收容下来，藏匿到了她的妆楼之上，面对军警的盘查，玉娇从容应对，滴水不漏，最终使傅屯艮安然脱险。

事后，当地人们纷纷传说，“玉娇’，一名暗藏“王乔”二字。王乔是神话人物，相传是东汉河东郡治（今山西夏县北）人，曾任叶县令，有神术，常自县至京师，而不见车骑，临至必有双凫飞来，一日有人用网扑而得之，竟是王乔所穿的一双鞋子。王乔殁后，所葬之处名曰王仙镇。傅屯艮早年曾在王仙镇开馆授徒，听老一辈讲起这古老的传说，对王乔仙人颇为神往。因此，王仙镇盛传，黄玉娇就是王乔仙人再世，专为救护傅氏而来。有人说这是巧合，也有人说这是仙机，不同信仰者总有不同的解释，解释尽管不同，不过，人人都称之为奇遇。

幸赖玉娇姑娘，傅屯艮终于逃出了虎口，但是长沙和醴陵都已经没有傅氏的立足之地了，他只得避居山野。那里有三狮洞、清源山，章龙诸胜，知生靡乐斋主坦然独居，天天吟啸其间，面对蓝天白云、草莽群兽，以苦为乐。他在致柳亚子的信中说：“卜居万山中，捐妻子，弃朋友，块然独处，名其林曰繁霜，署其阿曰息影，字其居曰鹪借，文其卧曰梦甜。读书灌园，长眠饱食，风梳露沐，木居豕游。酌松露以为醪，引清泉而作供。红叶间落，寒山着花，白云归迟，疏林滞晚。风振衣而虎啸，月满槛而鹿啼，日夕所经，神思为豁”（郑逸梅《南社丛谈》246页）。穴居野处的艰苦生活，在傅屯艮笔下，竟然充满如此的诗情画意，可见傅氏的达观与坚定。

傅屯艮的奇遇，感动了南社主帅柳亚子，柳专门为此创作了52句五言长诗《玉娇曲》，寄奉傅屯艮。傅屯艮经此际会，自署别号“红薇生”，铭记玉娇姑娘救命之情。红薇生，红，红妆；薇，如果去掉“廾”字头，那就是微，隐身藏身之谓，加上一个“廾”字头，似乎更加隐蔽一些；生，双关，既可解作“书生”，又可释成“使之生”。有了“红薇生”，傅屯艮又取了个“红薇馆”的斋名，请人刻成印章，随时钤用，在赠予柳亚子及其堂弟的墨迹里，就出现了多次。以后，还有“红薇”、“红薇馆主”等等名号。记得南社社友姚鹓雏，专门为傅氏创作了一部《红薇记传奇》，传奇中径直把傅屯艮称为“傅红薇”。

傅屯艮自己写作了《红薇感旧记》，怀念侠骨柔肠的玉娇姑娘，痛斥血腥横行的北洋军阀，然后广征题咏。先有了柳亚子的《玉娇曲》，又有南社社友

的种种丹青墨宝。总计起来，诗有柳亚子、高天梅等 15 人，词有王西神等 3 人，黄宾虹、蔡哲夫各绘了一幅图，汪兰皋、蒋万里各作了一篇记，吴梅作了四套曲子，达一百余通。傅屯艮汇集起来，辑成《〈红薇感旧记〉题咏集》，留作一段佳话。不幸的是后来长沙燃起了烽火，题咏集在战火中全部焚毁。不得已，傅氏再从《南社丛刻》及《长沙日报》中去寻找，详加摘录。柳亚子慷慨资助，刊印问世。一部《〈红薇感旧记〉题咏集》，尽显了南社文人的不同流派不同风格，这绝不是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而是民主革命夭折、北洋军阀横行的历史见证。

1916 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一命呜呼，“屠夫”汤芗铭灰溜溜地退出了湖南。傅屯艮重返长沙，受到入驻湖南的护国军司令程潜之请，再掌《长沙日报》总编辑。可是，风云变幻，一年不到，张勋复辟，再加段祺瑞执政，湖南来了个军阀吴光新，鱼肉人民，无恶不作，傅屯艮揭露鞭挞不遗余力。恼羞成怒的吴光新，指使手下潜入报馆，纵火焚烧，意欲置傅氏于死地。恰好那天傅有事外出，才得以虎口余生，所有书籍文稿衣物尽数成灰。

1917 年开始，南北军阀在湖南进行了多次拉锯战，虎去狼来，受害最严重的要数醴陵和株洲两地。1918 年军阀张敬尧（1880—1933）督湘，张的第七师打仗不行，而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样样在行。当时醴陵在京的议员致电张敬尧，要他制止部下的暴虐行为，张竟然蛮横地以“覆巢之下无完卵”回复。傅屯艮的家乡醴陵，当时“仅遗 28 人，此 28 人每对人云：我们妻离子散，骨肉分离，零丁孤苦，并不想活”（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416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1918 年底，北京政府与广州政府拟于上海召开“南北和平会议”。傅屯艮等人赶赴上海，傅立即动手，将耳闻目睹与搜集到的资料汇编成《湘灾纪略》一本小册子，又将南社社友文湘芷和刘今希在湖南灾区拍摄的照片，编成《醴陵兵灾图》，傅氏挥泪撰写了《题醴陵兵灾图后》绝句二首：“人民城郭是耶非，孤鹤重来累涕欷。凄绝冻云帘雨尽，空余残堞恋斜晖。”“谁省流民郑侠图，哀鸿遍野待来苏。天高听远殊难问，哭向穷途泪已枯。”1919 年 2 月 20 日，所谓的南北和平会议终于召开，会议开了 11 天时间，可是毫无结果。会上，傅屯艮与文湘芷捧出《湘灾纪略》，展出了《醴陵兵灾图》，“历陈张敬尧在湘之暴与醴民被灾之惨，泪与词迸，指抵几，振振有声”，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刘约真《醴陵县志·人物传七·文启蠡传》。可是，南北军阀们只顾自身利益，根本不把处于水深火热的湖南百姓放在心上。傅屯艮等人奋起大声疾呼，从 1919 年 5 月 14 日起，《民国日报》一连几天在第一版刊出通栏大字：“张敬尧不去，湘祸不了。张敬尧不去，和议不成。总代表注意，分代表注意，湘代表注意！不议





决去张敬尧，湘人誓图相当之对付。旅沪湘人公决。”

《醴陵兵灾图》，动人心魄的长卷，更是催人泪下的图画，南社社员汪兰皋、徐仲可、胡朴安、凌景坚等先后作了题咏。柳亚子读了图画，作了《题醴陵兵灾图》二首绝句：“坐大江东是祸胎，不征不战费疑猜。会师武汉徒虚语，长岳终教弃甲来。”“平西卖国诚堪杀，营窟臣佗亦盗名。流尽湖湘万家血，可怜护法竟何成”。（柳亚子《磨剑诗词集》294 页）柳亚子感慨万端，护法不成，军阀混战，致使生灵涂炭。

1920 年 7 月后，傅氏先后担任过湖南沅江县县长、安徽棉税局局长和湖南省中山图书馆馆长等职。对于傅屯艮来说，当官并非所长，也非所好，所以业绩平平而已。主持中山图书馆，可谓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到任后仅用 70 天时间，采用杜威十进法加以整理，编成《中山图书馆目录》二卷，直至今日，仍是我国目录学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主要得益于傅氏深厚的旧学根底和认真的治学精神。

然而，也许正因为傅氏的旧学根底太深的缘故，在新旧文化交替的“五四”运动中，傅屯艮落伍了。1923 年 10 月，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创建新南社，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傅屯艮没有参加，他于次年在长沙创南社湘籍，虽然成立于湖南一隅，但参加者不限省籍。傅屯艮作为湘籍社长，明确地在《南社湘集导言》中声称南社湘籍要“保存南社旧观”，“继承南社精神，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傅氏的南社湘籍反对写作白话文，所有著作均以文言为准，文学创作方面复古的倾向十分明显。

1930 年，傅屯艮三掌《长沙日报》总编辑，与反动当局斗争的精神依旧顽强，报馆再度遭到焚毁，这时傅屯艮所患的肺结核日益严重，仓皇出奔，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踉跄蹒跚，挣扎到了安庆，1930 年 12 月 15 日，病逝于旅馆，终年仅 48 岁。

一个月以后，柳亚子闻知傅屯艮逝世的消息，悲痛异常，回顾二人间的“肺腑之谊”，“凄然搔首”，连续撰写了《傅钝安挽词八章》（柳亚子《磨剑诗词集》上册 664 至 665 页，以 640 言的长诗记述了两人相交、相知和相歧的全过程。“海上初相见，俄惊廿六秋。”1906 年两人上海初识，整整 26 个春秋过去。“一卷红薇集，湘思籀梦魂。幸君脱罗网，吾亦挟青丘。”回忆傅屯艮遭受军警通缉最终脱险，柳亚子曾作《玉娇曲》长诗，后来又为他付印《红薇感旧记题咏集》一书。“旧隐图还在，怀芳志亦存。”柳亚子自己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段祺瑞执政期间，隐居家乡分湖侧畔，请南社诸友绘《分湖旧隐图》，傅屯艮既为亚子题写刊头，又奉献了诗词。可是，“我已新机昵，君犹故步封。行藏一相左，踪迹两难同。劫后搜遗札，寥寥几雁鸿。”“五四”以后，新南社

与南社湘籍道不同不相为谋，书札寥寥，二人的联系日益稀少。

傅屯艮这位“知生靡乐斋主”，从小就决心奉献自身，下定了吃苦为民的志向。纵观傅屯艮的一生，也确实没有享受到人间的一丝荣华富贵，拖着病体竭尽全力地写作、操劳。平心而论，傅屯艮的品性和才气、学养及毅力，均不在柳亚子之下，可是，傅屯艮其人其事，未能与爱国诗人柳亚子同日而语，究其实，在于思想的认识及深度。柳亚子先生，也有消沉彷徨，也有满腹牢骚的时期，可是他最终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因此，不断磨砺以须的“磨剑室主”与“知生靡乐斋主”，最后终于分道扬镳，柳亚子与傅屯艮划下的人生轨迹，真正令人深长思之。瑕不掩瑜，傅屯艮虽然抱着古文古诗词不放，但他反清、反袁世凯、反军阀的种种表现，值得后人敬仰与学习。

（作者系江苏柳亚子纪念馆馆长）





# 几间老屋万卷藏书

## ——晚清数学家丁取忠

王晓利

白芙堂遗址在今望城县高塘岭镇。虽然在高塘岭镇鳞次栉比的建筑群中，再也寻找不到白芙堂的一砖一瓦，但是白芙堂主丁取忠的名字与他的著名的近代数学著作集《白芙堂算学丛书》却已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一章中的重要段落。丁取忠与梅文鼎、阮元、李善兰等被列为中国近代早期科学界的重要人物。

丁取忠，字肃存，号果存，又号云梧。清嘉庆十五年（1810）生于长沙县（今属望城县）高塘岭镇白芙堂内。丁取忠的父兄均为名儒。其父曾因总修过《丁氏宗谱》而具文名，其兄致力于经学，著有《读易通讯》。这样一个诗书世家，为丁取忠读书习文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所以他自幼便热爱读书，并对数学格外偏爱，常为思考算题而废寝忘食。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无非就是希望科举入仕，丁取忠也如此。然而他早年却在科举应试中屡试不第。丁取忠并未为此懊丧、消沉，而是更加专心致志，埋头钻研起数学来。

清道光十七年（1837），27岁的丁取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城南书院的先生们津津乐道传授的经史子集及儒家思想，根本没引起丁取忠的学习兴趣，他与书院里爱好数学的邹汉勋、黄朗轩结交，突破书院课业限制，潜心钻研数学。邹汉勋精研基学与地理，他和丁取忠通常通宵达旦地切磋数学。道光二十四至二十五年间，丁取忠的表弟李锡蕃进入城南书院求学，精于代数的他也加入一起对数学的探研。李锡蕃比丁取忠小13岁，在丁取忠的帮助下，李锡蕃写出《借根方勾股细草》手稿。丁取忠、邹汉勋、李锡蕃等广泛搜集算书，相互切磋，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启发。后来，丁取忠得到一本讲求弧度与弦矢互求法（几何学）的残缺不全的手抄本算学书，他决心把这本残书的内容弄个明白。残书中讲解弧度与弦矢互求的方法，文辞隐奥难懂，又无具体算例，但这并没有难倒丁取忠。他详演书中若干算例，阐释了弧

度求弦矢、弦矢求弧度之全法，他将此辑为《数学拾遗》，此书由邹汉勋作序，并附录着他研究《张邱建算经中“百鸡术”问题心得和自创的“三色贵贱差分解”等方法，于1850年刻印成书。

咸丰元年（1851）冬，丁取忠在邵阳与邹汉勋之弟邹汉章、邹汉池结识。邹汉勋的两位亲弟均通地理，擅计算。丁取忠得到邹氏兄弟的协助，运用三角学知识，以魏源的《海国图志》为依据，将起点在英国格林威治的经度换算为以北京为基点，对全国各州县与北京距离详加计算，推出相距距离与所处方位，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学术专著《舆地经纬度里表》。丁取忠的推算虽然“未尽精核”，然“足备参证”。

咸丰十年（1860），丁取忠年过半百，却仍是一介生员，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慕名诚邀他去武昌校改目类图书。

咸丰十一年（1861）冬，翰林院编修吴嘉善为避兵乱来长沙。丁取忠经常去请教吴嘉善，请他仔细讲解数学疑难。吴嘉善与丁取忠一起磋商，并动笔剖示演习。与吴嘉善对数学的研讨，使丁取忠受益匪浅，他将和吴嘉善一起磋商剖示的习题及心得整理成章，对难题补以演算过程；从二十篇中选取十七篇于同治二年（1863）夏，以活字版印制了这本名《白芙堂算学十七种》的数学专著。此书使不少数学界同仁深得教益，并在十年后增补再版。

湖南数学界同仁对丁取忠充满信任与敬仰，他们的遗稿也由丁取忠负责印行。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在上海开设江南制造局，他敬重丁取忠的为人与学问，便邀请他去上海参与翻译西文科学著作，并代为李善兰校勘《则右昔斋》丛书中《天算或问》一书。于是丁取忠便一心在江南制造局做起了他的学问，展示着自己在数学领域的才华。

同治十年丁取忠年已六旬，他感到自己进入暮年，便再无心在他乡异地居住，而渴望回到家乡将毕生之余力用在刊刻算书和培养后学方面。这样，丁取忠返回了长沙，后任于城北的荷花池精舍。他穿行于长沙求忠学院和荷花精舍，悉心辅导着一群有志于算学的学子。书院初定收监生世职正附课、重生正内课共40名，后增至56名。此书院废后，改为忠裔书院。当时在此就读的均为湘军将领之后。拜在丁取忠门下的后学中尽是湘省数学界的新秀，如新化的黄宗宪、湘乡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湘阴左宗棠之侄左潜和殷家俊及长沙黄传祁等，他们共同研究数学，孜孜不倦地从事数学书籍的整理编辑。众弟子在数学研究上均有建树，各有著述，并因此形成了我国南方数学一大流派——长沙数学学派，而丁取忠为此学派之宗师。

丁取忠在几位弟子的帮助下，增订《算学十七种》为《算学二十一种》。





他编写的《粟布演草》，阐述了用高次方程解整存零取付利息的问题。他还将一些有价值而版本稀缺的古今数学著作如《益古演段》、《测圆海镜》、《四元玉鉴》、《开方说》、《天元勾股细草》、《辑古界经细草》等自元至清前期的古人著作6种，时人著作8种，以及他和弟子的《对数详解》、《求一术通解》、《圆率考其图解》、《割圆八线缀术》等8种，及日本崎加悦博一朗著作1种集成32种算书，于同治末年（1874）一并与《白芙堂算学丛书》刊刻付印。

丁取忠之所以将此套与学生们耗费六七年时间编成的数学巨著取名“白芙堂”，是因为丁取忠家庭属于丁氏宗族中的分支“白芙堂”。可知丁取忠将此部数学巨著视为他一生心血凝集的珍爱之物。

《白芙堂算学丛书》自1874年首刊出版后，风行海内，曾再版八次之多，成为清末流传最广的一部传统数学丛书。英国科技界权威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白芙堂算学丛书》是著名的古代数学著作。人们这样评价这套丛书：“裒然成艺圃之巨观，风行海内，遂为畴人家必读之本，厥功不甚伟欤。”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在浏阳开办算学馆，无一不是受到丁取忠的启发，他在数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丁取忠暮年在长沙倡导数学，授徒编书，对湖南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丁取忠从事算学研究之初，既无名师指点，又缺乏资料参考，凭着顽强的自学精神，苦泅学海，终致大成。他虽曾受胡林翼、曾国藩高酬礼聘，但却痴心不改，倾尽一生所有去购书、藏书，以与朋友互赠算书为乐趣，到暮年时已是两袖清风，惟留下“几间老屋，万卷藏书”。

聪敏而又勤奋的丁取忠治学严谨，为人谦逊，时常与国内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吴嘉善、徐有壬、邹伯奇等书信来往，共探数学之奇奥，甚至与外国传教士交往，请教数学问题。他的学生左潜在《求一术通解序》中言及丁取忠先生：“凡近日言算者，先生皆订交焉。”这样的广纳贤言，使丁取忠获得更多的知识，也使他编著的《白芙堂算学丛书》具有高水平与特色。

光绪三年（1877）四月二十七日，丁取忠这位中国近代杰出的数学家积劳成疾，于贫病中逝世于白芙堂老家，享年67岁。

清末前期是湖南及长沙科举人才的鼎盛期，但其人才无外乎三种，一是官至显位的政界要人；二是以诗文、学识闻名的名流贤达；三是卓有政声的地方官吏。然而，细数湖南近代人才，尽管成群结队，但如丁取忠这样卓有成就的数学家仅他一人，独领风骚地走进了史册。

# 教书育人　潜心学术

## ——皮名举教授

李长林

皮名举先生1907年生，湖南长沙人，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之孙。1923年8月至1928年7月在清华学堂留学生部学习，1928年8月去美国留学，先在耶鲁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斯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皮名举先生在这种人文氛围中成长，培养了良好的素质。多年来，他一直把这一校训铭刻在心中，并身体力行。

皮先生1935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在西南联大期间又在云南大学兼课），讲授西洋通史、西洋近世史、西洋十九世纪史、西洋现代史等课。在西南联大时，皮先生与共事的资深外国史教授雷海宗先生齐名，当时学人称"南有皮名举，北有雷海宗"（雷海宗教授系山东人）。

皮先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热衷教育，潜心学术，不愿涉足官场。20世纪30年代驻美大使胡适请他出任使馆秘书，教育部长王世杰请他出任教育部次长，均被皮先生谢绝。

1942年皮先生回湖南，任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史地系主任、教务长、代理院长。期间皮先生在贯彻"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的构成有赖于教育"的办学方针上全力以赴，在课程设置时代化、聘请名师授课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皮先生学识渊博，不仅精通史学，还熟悉教育学，他常为国师教育系学生作学术报告，讲到中外近代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时，分析透彻，评论精当。对这些名家的名言，背诵如流，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后，听讲者还能记起报告的内容。在国师每年除夕，皮先生照例要作一场国际形势演讲，全院师生自动前来参加，礼堂座无虚席。皮先生纵论天下大事，分析时局动态，揭露帝国主义扩张的行径，及其必然失败的命运。他慷慨激昂的语言和恰当的手势，深深打动了听众的心弦，他的演讲使人看清局势演变及其趋势，帮助人们清醒地度过那扑朔迷离的岁月，皮先生的演讲传遍国师，听众如闻警





钟，多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1942年冬季，抗日战争已进行五年多了，我国大部分繁华地区已经沦陷，长沙也面临日寇侵占的威胁，其时国内存在着失败、畏敌情绪，怀疑抗战能否取得胜利，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就在这时，皮先生作了题为《抗战前途》的演讲。开头便说："抗战必胜，这不是一句空话，是必将实现的。"接着分析了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指出德日意法西斯貌似强大，但是他们是侵略者，残暴无比，罪恶滔天，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切齿痛恨、奋力反抗。而日本又是小国，资源少，必不能持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战线拉长，兵力更加分散，中途岛会战，日军惨败，已转入守势，在中国断难发动大规模进攻了。在欧洲，苏军正在斯大林格勒阻止德军的猛烈进攻，并使德军损失惨重，正是强弩之末。他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阐述了法西斯败局已定，告诉听众盟军必胜、抗战必胜，这是毫无疑义的，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演讲中，皮先生又指出：胜利首先将在欧洲实现，美、英、苏将集中兵力，花三年时间，打败德、意，然后回兵东指打败日军。后来战局的演变发展证明了他论断的准确性，演讲时在1942年冬，德军投降是1945年5月7日，接近三年。他这次演讲，消除了听众的恐惧情绪，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司马迁说过：历史学家要"述往事，思来者"，皮先生专攻历史，既能科学阐明过去，又善于预见未来，这说明他是一位高水平的历史学家。

1947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正好一年，全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爆发了。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示威游行。这年6月2日下午，国师学生起而响应，也进行了示威游行。当时皮先生正担任代理院长职务，他出于正义感，也参加了示威游行，拄着一把布伞走在队伍前面。他参加游行也是考虑到利用自己在社会上和教育界的声望来保护学生，他认为，这样反动军警就不敢公然开枪镇压游行队伍，皮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爱护同学一马当先，深深感动了全院师生并传为佳话。

1948年8用皮先生来湖南大学，讲授世界通史、西洋史学史。这时他虽然离开了国师，可对国师仍然关怀备至，他为同学们开设的世界史课程没有讲完，还是定期回院讲授，国师师生有求于他的事也照样帮助。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即将渡长江南下，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已处在崩溃的前夕。这时社会经济恶化到极点，国师师生的生活十分艰难，几经请求，国民党省府当局才于五月份拨下银元一万三千元作经费，不幸在领款中途遭袭击，去领款的五人蒙难，银元全部被劫。噩耗传来，全院悲痛，眼看师生就要断炊了。在十分焦急中，大家想起了在湖大任教的皮先生，于是我地下党领导的国师应变

委员会当即派人去长沙，请他出面向国民党省府交涉救济。皮先生慨然应允，多次奔走于当时的教育厅和田粮处，终于拨得田粮赋谷一千石，国师的师生员工依靠这笔赋谷，解了燃眉之急，度过了那黎明前夕最艰难的几个月。此事一直鲜为人知，皮先生从不谈起，其德行如此，能不令人敬仰！

1949年8月长沙解放后，皮先生投身于新中国教育事业，仍任湖南大学教授，除讲授世界史之外，还担任马克思主义史学名著选读课，指导学生研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先生早年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涉猎过马恩著作，如今经过深入钻研，把比较难懂的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讲得明晰透彻，学生受益匪浅。1953年6月，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皮先生来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大前身）历史系任教授，讲授过世界古代史、世界现代史。还曾任湖南省政协委员、院科研委员会委员、院学报总编辑、院工会委员。期间还曾在长沙师专兼课。先生授课史论结合，内容丰富、观点明确、条理清晰、重点突出、逻辑严密、语言生动、口若悬河，善于用图示讲解复杂内容。先生备课充分，内容熟练，计划性强，常常是讲完有关段落，下课铃便随之而响，从不拖堂，也不留下应讲的内容。师院的同学们反映说听皮先生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皮先生在师院主持教研室工作期间，鉴于当时世界史教材奇缺的情况，积极鼓励支持教师编写讲义，他自己就带头编写过世界古代史和世界现代史讲义。他常组织举行读书报告会，交流学习心得，商讨问题，这对于教师开阔学术视野，提高学术水平，更新教学内容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1954年夏，皮先生应邀参加全国高校历史学科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讨论会，会后他负责拟订的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在全国推广。1955年湖南师院工会举行首届业务会议，交流教学经验。皮先生作为工会委员主持了这次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加强教学大纲建设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两项建议，对全院教学质量的提高起了推动作用。

皮先生毕生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他早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是《胶州湾租借史》，论文以丰富的史料，鲜明的观点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国山东省的罪恶行径。解放后，我国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皮先生有鉴于此，决心做些基础工作。他同国内世界史专家商议，有计划地翻译了一批世界史学术名著和原始资料。1957年他同另外几个教授合作编译的《1760—1917年的美国》由三联出版社出版后，皮先生格外高兴，打算编译下去。可惜他这时已患有严重的肺病，加之被错划为右派，心情不快，未能如愿以偿。1959年他与世长辞。先生生前写有读书笔记百万余字，他潜心研究德国史多年，所记应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心得，若天假





以年，当有巨著问世。这批读书笔记，经十年动乱，已不知去向。

皮先生为中国教育事业、世界史学科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为此，在1987年纪念皮先生诞辰八十周年之际，与他共事多年的雷敢教授和先生的侄儿各赋诗两首，现抄录如下：

《忆皮名举先生》（雷敢）："青年驰誉海西头，博硕词科并上游。家学渊源今学派，服膺改革有原由。""相邀讲学聚名山，八座春风接笑颜。史学中西联讲席，政坛休咎共时艰。"

《缅怀从父名举公教授》（皮崇伟）："报国拳拳矢赤诚，重洋远渡一书生。超然归去轻名位，讲席堂堂木铎声。""茹苦含辛数十霜，清风两袖一诗囊。亲栽桃李千枝秀，为喜乾坤有栋梁。"

（作者系湖南师大历史系教授）

# 胡元倓先生评传

刘瑞清

## 引　言

1992年9月，为一代教育家胡元倓先生120年冥诞，1993年，又是他亲手创办的明德中学建校9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中国教育界的先驱者，并系统地探讨、了解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我写了这篇传记。由于前此已有"胡子靖先生家传"——陈瑬涛著《明德学校校史》，"胡子靖磨血育人"——吴相湘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百人传》、《胡元倓先生传》——黄中编著、台湾中华书局印行）。我这篇文章，着重于探讨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办学思想与办学措施及其对以后的影响和对现实的意义与作用，这样，在系统地叙述他的历史（包括思想与行状）时，自不免叙中有议而议中又有叙；又考虑到上面提到的三个传在体例上有的采用编年，有的采用记传，因此，我就将我写的这个传，名之为评传。

## 一、一介书生

胡元倓先生字子靖，号耐庵，晚年自号乐城老人。他生于清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七日（1872年9月9日），湖南湘潭人。

他生于一个书香家庭，排行第九。他的祖父曾任广东南海知县，与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广东的陈澧、湖南的王先谦有密切交往，并与王闿运有姻亲关系。年轻的胡子靖受到了很好的家庭及戚友的学识熏陶。不过，这时他对姚江学派特别感兴趣，他服膺王阳明的学说，以"存诚"为立身治事的根本。也和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他也是遵循科举这一条路。早年他就考取了秀才，并被选为丁酉科拔贡。后来，他鉴于甲午庚子国耻之深，且清政府也以废科举、派游学、兴学校为推行新政的中心，这对胡子靖的思想起了很大的触动。恰好这时湖南巡抚俞廉三选派十名学生公费游日学习，胡子靖得以获选，并在1902年3月东渡日本。到达东京之后，胡元倓入学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经





过半年的学习和参观，他了解到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主要在于教育的普及；而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储材建国一事，尤给他以深刻印象。这些，都为他以后矢志以教育救国，培养人才，复兴民族为己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03年1月胡元倓由日返国，即同他的富于新思想的表兄龙璋（字研仙，时任江苏泰兴县知县）商议设立学校的计划，同时还获得了龙的叔父当时任刑部侍郎的龙湛霖的支持和赞助，于同年3月在长沙创建了明德学堂。从这以后，胡元倓就与这所学校同生死，共休戚，主持明德校务达三十八年之久。在这期间，他以一介书生，筚路蓝缕，艰苦经营，奔走呼号，为办学育才而付出了毕生心血。他一生不做官，民国元年南京中央政府成立，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被他谢绝。民国二年熊希龄组阁，邀请他人阁，也被他固辞。他始终保持了一个书生的本色。

## 二、一个宗旨

胡元倓自东渡留日之日起，就决心以教育救国，培养人才复兴民族为己任。而一到日本后，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储才建国的事迹，又大大加深了他对教育救国的认识和决心。这样，他从日本一回来，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办学校的实际活动中去。

这时正值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夜，在湖南，以黄兴为首的一批仁人志士，纷纷起来从事推翻清封建统治的革命活动，并在胡创办的明德学校建立了"华兴会"。其实，胡元倓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并不亚于黄兴等人，不过，在同一问题上，他有他自己的见解。他曾经这样对黄兴说过："养成中等社会人才实立国之本图，唯其事稳而难为。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人也。"这些话的意思是够明确的了，就是说办教育事业进程比较平稳，不用时刻冒生命危险，但却很不容易做好。它必需长期坚持不懈，把自己的心血，一点一滴地去消磨。这与那种悲歌、慷慨、石破天惊的流血革命斗争似乎显得平凡一点，但要真正做到并且做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综观中国近代史上，真正做到并做好了的也仅只胡元倓一二人。

这样，"磨血育人"，就成为胡元倓的一生的宗旨。他以一个穷书生的身份，手胼足胝，奔走呼号，办起了并发展了明德中学。他一生不做官，不加入任何党派，而是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他用的图章，刻的是"磨血人"。办公室挂的条幅是"虽九死吾犹未悔"。甚至到了晚年，当他的好友谭延闿逝世前寄书告胡以"死不难，不死难"时，他还写过这样的话："良友徂逝，边患日深，三十年前以教育救国之志，未得少酬，不知藐躬热血尚堪更磨十年否也！

然身苟幸存，敢忘死友？国犹未破，事尚可为！”——从这都可以看出他生死不渝献身教育的意志和品格。

## 三、一所学校

要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首先得有一个战斗的阵地，于是明德中学便应运而生了。而要办好一所学校，又离不开这么几个主要条件：充足的经费，良好的教学设施，优秀的师资队伍，明确的办学方针，坚强有力的主持人。作为一所由一个穷书生所创办的明德中学，一开始除了胡元倓自已具有明确的办学方针与坚强有力的主持人这一条件外，其他都是不具备的。这样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 募捐办学，甘当叫化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武训乞丐办义学的故事。此事对胡元倓有无影响，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还找不到什么痕迹。但是胡元倓创办明德中学，却获得了“胡九叫化”的美称。

1903年3月明德中学一开办，胡元倓就从表兄龙璋的叔父龙湛霖侍郎那里募得银元二千元作为开办费；同年7月2日得到翰林谭延闿的赞助，除当即捐款一千元外，还答应每年捐款一千元为延聘英文教员的薪金。此后，对湖南的当政人物，胡元倓都请他们赞助。当时身任湖南巡抚的俞廉三、赵尔巽等人都曾资助过明德，特别是后来的巡抚端方，锐志兴学，他看到明德成绩卓著，除豁免原来的四千元贷款外，还每月增加津贴一千元，同时还用官费资送中学甲班全体学生留学日本，这对胡元倓都是很大的帮助和鼓励。

胡元倓为办明德中学，募捐对象是多方面的，有政界首脑，有湘籍闻人，有华侨，有本校毕业学生，有政府机构，有民政团体。他募捐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示之以诚，有的动之以情，有的甚至拼之以命。当学校初创办时，除龙、谭两家赞助的一笔经费外，胡元倓还以同乡之谊向当时任上海道的湘潭人袁树勋（海观）募得一万元，为此胡向袁还下过一跪！他还多次向当时的内阁总理湖南凤凰的熊希龄募捐，遇到熊外出或者门房不给通报时，他就携被子卧在门房等待。熊希龄常对人说：“我最怕见到胡老九，请他做官又不来，来就问我要钱。要钱办教育，不能不见，又不能不给钱。”胡元倓听了这些传言之后，反而撰了一副对联“心如老骥甘伏枥；力尽关山未解围”，并请熊希龄亲笔书写悬之于室。这副对联其实无异于给熊希龄通个信息：官我是决计不做的，钱嘛，对不起，我还处在重围之中，说不定哪天还会向你要！

当然，募捐不都是一帆风顺的事，有时甚至逼得使人想寻短见。光绪三十





年，由于学校经费万分紧迫，过不了年。胡元倓只好向端方求援。端方写信叫他亲赴九江裕宁钱局借兑万元，不料到九江之后，总办孙某竟不肯付款。当时已是农历腊月二十七日，风雪横江，他大窘欲死。廿九日他乘船到镇江，已经四更了，在旅店中坐以待旦，并写下了一首诗：“途穷腊尽成亡命，风雪横江倍怆神。独倚高楼待天晓，茫茫尘海已醒人。”

处境如同亡命，而偏偏自己又是这茫茫人海中的“已醒人”，此时胡元倓内心的痛苦，恐怕还不是一般庸俗的人可以理解的。

不过，他在募捐中也有过“金刚怒目”的时候。民国五年，胡元倓特地跑到北京教育部为明德争一笔公款，竟和当时的教育总长汤化龙冲突起来。当时，他指着汤化龙的鼻子愤激地说：“我是胡元倓，不像你们这班糊涂蛋！”北洋军阀的教育总长对他没有办法，反而乖乖地拨了一笔款子给明德。以一个地方的私立学校而取得国家的中央经费，以一介书生而迫使大官低头，当时除胡元倓外恐怕也再没有第二个人。

民国十一年九月，胡元倓奉教育部之命派往南洋调查各地华侨教育情况，他又借这机会为明德募捐，受到华侨的欢迎并慨捐礼堂建筑费贰万壹千元。为此，胡元倓曾感慨不已，赋诗记其事：“万里海行成背水（在上海赴南洋时，国内同仁有“持三日粮，为背水陈’之语），此心难与俗人言。谁知绝域炎荒地，尚有真情古道存。新月出林看委宛，秋虫入夜竞烦喧。幽居寂静纤劳瘁，俨把申江旧梦温。”

此外他还向湘岸淮商募捐壹万五千元为中学部建筑费，向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争得津贴壹万元（南开中学也争得壹万元），当时政府还拔中俄庚款十五万元作为建筑校舍之用。

为了解决学校经费困难，胡元倓有时也找学生要钱。但他找学生是有分寸的，穷学生不找，不得意的不找，对于有钱或有办法的学生则找得最厉害。比如明德学子陈果夫当了江苏省政府主席，他经常去找；对几个担任中国、交通、金城、大德等银行经理的学生，他也经常去找。这些学生为母校筹款虽感到麻烦，但也都乐意为之，因为他们都为老校长的人格与精神所感动。

当然，对一般人来说：被人要钱而且非给不可，总不是一件乐意的事，因此当时流传这么一句幽默的口号：“人生大不幸，遇着胡子靖！”而“胡九叫化”这顶桂冠，也就一直戴在胡元倓的头上了。

### 殷勤罗致，建立师资队伍

优秀的师资队伍是办好一所学校的关键，而要建立起一支这样的队伍，办法不外两途：一是重金礼聘，一是至诚邀请。但对于上述经费如此拮据的明德

来说，重金礼聘这一点是无法做到的。当然，就只有凭至诚来邀请了。

为了聘请优良教师，胡元倓不惜长途跋涉、甚至不惜屈膝以求。明德开办时，曾聘请周震鳞、张继、王正廷、苏曼殊、陆鸿逵等名流担任教师。当时外文和理化、博物等科教师最为缺乏，于是胡元倓又亲赴杭州聘请华龙回湖南教英文，又从日本聘请理化教员掘井觉太郎、博物教员永江正直来校授课。当时日语教师李倪还未到校，恰好陈介从日本回湘省亲，胡元倓就邀他相助。不料暑假后李倪仍未到校，而陈介又急需赴日本完成学业，坚决不肯再留。在这种情况下，胡元倓竟当着全校教师的面向陈介下跪，如果陈不答应留下，他就不起来。陈终于被感动，答应继续教课。

胡元倓对聘请的教师不但处之以诚，待之以礼，且护之以勇。他从上海聘请黄兴来校主办速成师范并教授体育。由于黄兴进行革命活动被发觉，清政府欲将他逮捕。胡元倓当即找湖南学务总办张鹤龄，自己担起责任。他对张说："诸事我均与闻，君如须升官，我的血染红你的顶子（清一品官制服），拿我就是！"张鹤龄受到感动，答应缓于追捕。胡于是与龙绂瑞尽一夕之力将一切证据焚毁，并设法掩护黄兴与张继等出逃脱险。

由于胡元倓尊师重教的名声远播，所以一些为当时各大学所欲罗致担任教授的人，一经胡元倓殷勤礼聘，都愿屈就明德中学教员。如刘永济（弘度）、吴碧柳（芳吉）、张石樵等教国文，王凤喈、李味农、陈友生等教英文，曹志武教历史、曾约农教公民，辛树帜、曾省斋教博物，俞劲教理化，何经谓（公望）教体育。以后陆续聘请曹典球、周震鳞、夏义可（挪威人）、汪根甲、罗元鲲、刘宗向、魏先朴、黎锦熙、任邦柱、胡庶华、陈奎生、周谷城、李肖聃、陈鹿苹、左景鉴、郭昆、劳启祥、刘寄踪、周世钊、周亮枝、吴晦华、文士元、胡少煃、鲁立刚、吴相湘、易仁荄、陈崧涛、傅任敢、袁鹤皋、黄培心、杨伯峻、杨少岩、金岳霖、管竹、钱歌川、易君左、郭德垂、钱无咎、邬干于、杨笔钧、陈剑秋、曹赞华、唐梅村……这些人可说既是一代学人，又是一代名师，由于受胡元倓诚敬精神所感动，多不计较待遇到明德中学任教。曾省斋连续任职十三年之久，"屡欲改就他校较优之待遇，但一念及老人之诚敬，即去志顿消"。白屋诗人吴芳吉任教明德多年，曾写过"明德虽俸薄而精神甚安，不思他就"的话。他写的《西园操》三首中有这样的句子："谁怜此老热心肠，廿载走风霜。犹凭肝胆渡重洋（赴南洋向华侨募捐），鬓发已苍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受胡元倓精神的感染是何等的深刻。

由于明德中学拥有这样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因此它的教学质量，在湖南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在全国的私立学校中，也获得"北有南开，南有明德"的美誉。





## 千方百计，优化教学设施

明德刚开办时，先是租赁长沙左文襄祠的屋宇作校舍。这只是权宜之计，尔后经胡元倓多方奔走募捐，先后建起了新校舍，包括图书馆、理化实验室及当时长沙唯一的一座四层钢筋水泥框架结构的教学大楼——乐诚堂。这样好的校舍，在当时确是备受人们羡慕的。在教学设备方面，明德开办的第二年，胡元倓即亲赴上海购置一批理化仪器及博物标本，奠定了理化博物等教学设备的基础。以后从德国购置了一大批这类的仪器标本。当时上生物课，学生两人可以用一台显微镜，每人有一把解剖刀；上理化实验课，人人都有动手操作的机会。这在当时的中学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胡元倓在优化教学设备这一方面，除大力充实仪器标本外，还十分注重图书的添置。明德图书馆的藏书是非常丰富的，除拥有较系统的线装书外，其他各种新书均能及时购置。由于图书非常丰富，因此明德的学生养成了浓厚的读书风气。

## 明确的办学方针

胡元倓于明德初创时，招中学两班，随即又招速成师范一班，第二个附设高等小学，以后又设中学补习科、中学预科、东语、英文、理化、银行保险、法政等专修科，商业且以本科、预科，并及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分校。民国二年，又创立明德大学于北京，曾因抗议袁世凯称帝而停办，后又迁汉口复校，到民国十五年以后，才专办中学。

胡元倓设校设科，完全是适应形势的需要，如办小学，是为了扩大中学的生源；办速成师范，是为了造就小学师资；开设语文及商业等专修科，其目的是针对社会需要，并解决学生出路问题；而始终以办中学为主，又主要是培养中等社会人才，因他一直坚信"养成中等社会人才，实立国之本图"，因此，他就生死以之地来办好明德中学。

胡元倓特别注重对学生进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

德育方面：从"明德"这一校名来看，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根据儒家思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说要求学生以明"明德"为本，充分发展个人天赋，为人群社会服务，达到做人的完善境界。

其次从校训来看，明德的校训为"坚苦真诚"，即是教育学生树立远大的人生目的，真诚淬砺，艰苦奋斗。在这一点上，胡元倓确是用心良苦的。他先是请龙璋作"坚苦真诚"四箴，再请谭延闿、蔡元培作跋，悬之于礼堂，时刻对学生进行教育。为辅助"坚苦真诚"教训，胡元倓还经常自撰或集古今人名

句，请当代名家书写，悬于校中各处，使学生于休息闲游之际，随时随地能接受教益。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胡元倓的教育思想，特录“坚苦真诚”四箴及序跋于下：

### 坚苦真诚四箴并序

龙　璋

昔胡安定教授苏湖，立经义治事二斋，务为明体达用之学。出其门者，人虽不识，皆知为安定弟子也。於戏！其学风可谓盛矣。盖一校之垂教，必有其特殊之主旨，久遂著为学风，而后教有本源，是以育人才，供世用。学者亦当尚其志，修其业，勿徒为弋名干禄之想，而后学有根底，体用具备。至是，而教育之功效始有可记也。明德学校始建于光绪二十九年，时外患迭乘，内忧潜伏，先取侍郎芝生公总理其事，讲师悉一时闻人，务开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恒以坚苦真诚与学子相淬励。青年来学者，识其师说，多激昂奋发，致力于斯四者。其魁杰有为，艰辛卓绝，以是自见者，亦既有其人矣。癸甲之际，湘中公私学校以百计，清政府特以广励学宫，灌输新识为名，又恐士风不戢，格其专恣，辄抑制之。各校有因以辍讲者，明德亦岌岌焉。赖胡君子靖维持匡救之，不蒙影响。胡君膺膺阳明之学，知无不行。明德历经困难，胡君备尝艰苦，卒不渝其志，因揭四字于礼堂，使夫学者见而警焉。尝谓璋曰：“斯校之创设，吾尝与子共策艰苦，今十有年矣。四方来说，先后毕业者数千人。偶有表现，人皆知为明德弟子，则亦以学风有所自来，能守侍郎公坚苦真诚之训于不忘者也。愿子为之文，以昭示来学。”璋不敢以不学辞，乃为之箴：

何以任重？曰毅与弘。志趣既一，守之坚贞，磨而不磷，攻而益莹。莫刚如钢，及经百炼而绕指功成；莫韧如革，揉之鞄囊而巩莫与京。莘莘学子，归为士程，勿脆其志，勿骄其行。惟明德之学风，永坚贞而不更。

——坚箴

好逸恶劳，理因欲胜；志士苦心，操守宜定。假薪胆以淬神，去逸豫而若酰。毋曰棘口，而良药可以已病；毋曰劳身，而拂乱可以恶性。莘莘学子，不敢乐耽，若心衡虑，大任克安。惟明德之学风，庶困苦而回甘。

——苦箴

道义所在，当识其真，是谓诠宰，实出笃纯。彼夫作伪，劳抽纷纭；行坚言辩，至道日沦。惟力祛堪念，始受福以祯，勿假托以绐已，勿矫饰以诡群。莘莘学子，日进无垠，浩浩其气，肫肫其仁。惟明德之学风，本真实以传薪。

——真箴

大学始基，先诚其志，亦曰诚身，中庸所示。择善固执，中道一致，何以





孚远，信自诚暨；何以前知，明由诚至。其始也，慎退藏于独居；其终也，参化育而焉倚。莘莘学子，笃行惇挚，体立诚正，功成平治。惟明德之学风，道一贯而无贰。

——诚箴

### 坚苦真诚四箴跋后

（一）

龙砚仙先生依明德学校校训，作坚苦真诚四箴，手书以治学子，未毕而奄逝。后十年，胡子靖先生始续书三纸足成之。龙先生所为箴，说理精实，训辞深厚，诚能身体而力行之，于下学上达之义，必有得矣。今学者恒好高骛远而忽视老生之言，一旦逢小利害，辄匡弱不能自主，则何如反求诸己，以植其本根于平日乎？明德立学三十年，所成就至众，谓非得力于校训不可也，读是箴者，其将憬然自力而不徒求其文字矣乎！

——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谭延闿记

（二）

惟坚苦故对事忠，惟真诚故待人恕，违道不远，故藏诸己者睟然，任重投艰，于是乎在。明德学校以艰苦真诚为校训，诚者知其所本矣。立校三十年，非坚苦无是久也；一堂讲诵，和蔼融怡，非真诚无是乐也。龙砚仙先生依此四字著为四箴，并手书以垂久远。今观宣劳党国之同志，出于明德学校者甚众，则此四字校训，谓非陶铸人才之宝训乎？

——中华民国十七年三月十五日蔡元培

（三）

坚苦真诚四箴，乃十三年前龙砚仙表兄作而书以治明德校子者也。书未竟而卒，后十年余赓之，殿以谭、蔡两公之跋，镌示各生及任事诸子，期践所训，毋或逾初志尔。昔归自东瀛，砚兄宦江南，予以兴学走商，明德而于是孕育，今忽忽垂三十年矣。几经艰难困踬卒不坠，亦共矢此初志而已。则斯遗训遗墨，尤宜与校并寿。爰监藏之，不敢忘也。

——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一日胡元倓识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胡元倓办校始终是将德育放在第一位的。他希望他的学生培养成“明德人”——即具有“坚苦真诚”这种美好品德的人。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从明德毕业出去的学生，普遍地没有辜负校长的这一期望。

智育方面：

胡元倓特别注重对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传授。对于理化博物等科，他从国外聘请教员，购买仪器标本，教学中又特别提倡手脑并重。对于工具学科，他也极为重视。如对英文教员，除亲自奔走物色名师外，还给予特别津贴，使之

能安心教学。胡元倓还深知，要收智育的最佳效果，关键在教师。因此，明德聘请的教师都是当时教育界的名流。自然，名师出高徒，明德学生学习质量普遍很高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体育方面：

胡元倓非常注重对学生的体魄锻炼。明德开办之初，就邀请黄兴来校教体育课，而且从那时起，就培养成了良好的体育风气。学校除注重正规的体育课程的实施之外，还开设学生课外的球类活动以及与体育有关的课程（如童子军与军训都极为重视）。当时明德的排球，就有“泰安球王”的美誉。据明德校史记载：“民国十九年三月，开第一届全省运动会，本校参加球赛，获足球、排球、网球、棒球四项锦标，代表全省出席华中运动会，仍获排球、棒球两项锦标归。”民国二十年年底全省军训检测，明德也获得冠军。

总起来说，胡元倓一生就是办明德这一所中学，他以明德学校为家，为明德学校鞠躬尽瘁。他以教育始，以教育终。他不但生前把所有心力贡献给学校，并且预立遗嘱，选定学校继承人（从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遗嘱还几度更改），好使自己去世后明德仍能够继续发展。他为明德中学，真可说是到了“死而不已”的境界。

## 四、一份题名录

人们多崇敬孔夫子，尊之为“大成至圣先师”，而“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又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是的，衡量一位教育家，既要看他在教育实践中的表现，更主要的是要看他的教育成果。胡元倓一生磨血育人，成果也是非常丰硕的。从创建明德起到他逝世为止，接受过他教诲的学生多达五千六百余人，可谓桃李满天下；而毕业学生中成为国家英才的又多得不可胜数。只要看一看下面的题名录就可以略知端倪。

明德名人录：

陈果夫　陈嘉佑　胡庶华　张平子　彭国钧
唐伯球　欧　震　易君左　黄一欧　谢祖尧
余籍传　钟伯谦　萧元定　俞　劲　向绍轩
黄少谷　刘永济　刘公武　龚德柏　蒋廷黻
吴相湘　周凤九　曹圣芬　曾约农　钱歌川
余先励　谷崧高　任弼时　周小舟　林　蔚
萧敏颂　潘基磌　龚育之　郑　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胡元倓“磨血育人”精神的影响，明德毕业的学生献身教育事业的不少，而且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薪尽火传，说明胡元倓





磨血救国精神在不断地被继承、发扬、光大。

明德教育家名录：

胡庶华　湖南大学校长
姚宏业　中国公学创办人
彭允彝　教育总长
陈果夫　教育部长
任绍选　湖南大学校长
向绍轩　明德大学校长
萧元定　湘雅医学院院长
任邦柱　湖南广益中学校长
彭国钧　湖南修业、长郡中学校长
方克刚　湖南妙高峰中学校长
刘宗向　湖南含光中学校长
谢祖尧　湖南第一师范校长
彭锦云　湖南兑泽中学校长
胡冀如　湖南复初中学校长
曾约农　湖南艺芳女中创办人
刘经骥　湖南省立一中校长
蒋　嵝　湖南福湘女中校长
杨宙康　国立十一中校长
欧阳予倩　中央戏曲学院院长
胡彦久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邬干于　湖南行素中学校长
傅任敢　重庆清华中学创办人
萧敏颂　湖南省教育厅长
刘佛年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魏泽馨　长沙市教育局长
左景鉴　重庆医学院院长
萧常斐　云南农业大学校长
傅震垣　重庆南开中学校长
朱耀庭　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
李迪光　湖南师大附中校长
袁宗凯　长沙市一中、五中校长
徐　继　长沙市六中校长

桂多荪　祁阳一中校长
李人琢　长沙教育学院院长
雷普文　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彭庆遐　北京四中校长
王志昆　长沙市十二中学校长，培粹实验中学董事长、校长
李传信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黄实君　长沙市一中、雅礼中学副校长，培粹实验中学首任董事长

## 五、一代教育家

在中国历史上，教育一直是由官办的。孔夫子作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开了私人办学的先河。而湖南之有私立学校，是自胡元倓所创办的明德学堂始；而且明德创办的当时正值科举尚未废除，"洋学堂"又受到一般劣绅迂儒的强烈反对，因此从这一点来讲，胡元倓创办明德学堂，确有其划时代的意义。

明德中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其很重要的地位，它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总起来说，大概有如下几点：

1. 从实际中树立中国学制。中国学制分初、中、高三级，明德则兼而有之（以后专办中级，初高级停办），在它之前，仅有西洋中学设过这样的学制。

2. 从实验中树立私立学校规制。中国各省的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中学以湖南为最多，又都各有它的传统作风和优良的人事制度，因此都有良好的校风和优异的成绩。而明德确实起到了倡导的作用。

3. 倡导爱国教育。明德从创办之日起，就"恒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教育学生"，所以明德学生在求学时期，都能关心国家大事，这与当时那种"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风气有鲜明的区别。这样，不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明德的学生中都涌现出了不少仁人志士，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4. 贯通中西文化。胡元倓强调"以中华优秀文化教育学生"，同时，他也注意向学生灌输西方文化，他在《明德之精神》一文中特别提出"吾人兴学育才，自当急起直追，特重自然科学，以为振兴实业，利用厚生之具"，在校歌中也提到要"中西文化贯通"。这与当时那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是迥然有别的，而从明德学生中大量的科技人才、两院院士来看，也说明了学生受这种教育思想影响之深刻。

明德中学取得上述各项成就，主要归功于作为校长的胡元倓本人。胡元倓为明德制定了"坚苦真诚"校训，事实上他本人也在身体力行，他认为"惟坚苦终能任重致远，惟真诚始能择善固执"，这一点他本人也是切实做到了的。





不是吗？为了办学筹款，他不惜四处奔走呼号，"气虽馁而心益坚"；筹款数十万元全用于学校，自己却过着清贫的生活——这种对困难的不屈不挠，没有"坚苦"精神能做得到吗？数十年如一日，生死以之地办明德这所学校，有高官不做，有名位不争，为办学磨尽心血，"虽九死吾犹未悔"——这种对事业的固执，没有"真诚"精神能做得到吗？

然而，胡元倓真正地做到了，他用毕生的心血，成就了他孜孜以求的事业——明德中学。所以，当谭延闿当了行政院长后仍感慨地对胡元倓说："我之事业，如过眼云烟，一瞬即逝。惟有你的事业，与国同体。民国万年，明德亦万年。"当胡元倓逝世后，曹典球在其墓志铭中有这样的赞语："心绝纤尘，磨血于庠。血有时竭，心无可量。千秋万龄，遗泽孔长"。

人们视胡元倓为"民国以来教育家的第一人"，应该说一点儿也不过分！

（作者单位：明德中学）

# 杰出的教育家匡互生

张志浩

## “五四”运动的先驱

匡互生（1891—1933）出生于湖南邵阳县宝善乡长沙冲（现属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从小聪敏好学，兼习武术。1910年19岁到长沙入驻省邵阳中学堂读书。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他加入学生军攻打巡府衙门。焦达峰、陈作新占领长沙，被推举为正副都督。不久，焦、陈遇害，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匡仍回学校读书。他写过一篇《时事感言》的作文，痛骂袁世凯、汤芗铭，竟酿成民国史上一桩骇人听闻的文字狱，校长刘武被判刑十年，国文教师李洞天被判处死刑，他因及时逃避得以幸免。

1915年秋，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岳云中学，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匡互生痛感袁世凯复辟卖国，民族危机深重，又值巴黎和会列强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中国代表竟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五月三日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开会，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决定五月四日下午汇集天安门示威游行。匡互生深夜回到学校，当即召集“工学会”（匡与志同道合同学组织的“同言社”，后改为“工学会”）全体会议，讨论对这次示威游行应采取何种手段。匡慷慨激昂地说，以前请愿示威，皆遭驱赶殴打，以失败告终，毫无结果，这次必须“以暴对暴”，要惩罚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卖国贼，并相约准备牺牲，写好了遗书，并把后事委托了同乡好友熊梦飞。

五月四日午后，三千多学生在天安门前集合，经总统府、外交部，一路高呼口号，直奔赵家楼曹汝霖宅，传说曹、章、陆正在此开会。曹宅大门紧闭，荷枪实弹的军警虎视眈眈，如临大敌。这时匡互生猛地跃起，攀住围墙上的窗口，一拳捣碎玻璃，从窗口纵身跳进宅内，军警拦腰抱住，匡武术高强，把军警掀倒在地，这时又有几个同学跳了进来，打开了大门，人群蜂拥而入。三个卖国贼仓皇逃逸。匡互生梭巡了好几间房，终不见人，便对同学周予同说：“曹贼不知去向，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就把这阴谋作恶的老巢烧了！”说完走进一卧室，扯下帐子，浇上煤油，顿时火苗四窜，一会儿火光冲天。这时军警及救火队赶到，大部分学生已离去，仅有小部分人还在撤退，当下被军警逮捕了三十多个同学。五月五日，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北洋政府下达禁令，不准学生集会游行，并限时复课。匡互生再挺身而出，召集“工学会”全体会议，决定分批去街头演说，如遇军警阻拦，不惜冲突，任其拘捕。捕者任捕，讲者自讲，直到全体捕完为止。各校同学响应“工学会”的无畏行动，纷纷上街，并随带食品，准备坐牢。结果两天就有八百多同学被捕。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的共愤，各大城市齐起罢课罢市罢工，支援北京学生，在强大压力下，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撤消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宣布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就此落幕。





## 任教第一师范和春晖中学

1919年秋，匡互生北京高师毕业，回到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务主任，当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匡比毛大两岁，参加了毛泽东、何叔衡等创立的新民学会，他们一起又组织了文化书社，并参加了毛泽东策划的“驱张运动”。匡互生想聘毛到一师范任教，但一师范有明文规定，教师必须是大学毕业，毛没有进过大学，怎么办？匡互生就在规定中加了一条，附小的主事可到一师范兼课，于是毛泽东破例担任了一师范的国文教师。

匡互生一直抱着教育救国之志，坚持教育改革。在一师范，废灌输式，兴启发式，将课本上颂扬封建礼教的文章删除，增加反封建的内容，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试行亦农亦学，他的这些新举措，使当时在湘的军阀势力极为反对，他不得不被迫离开。

1923年秋，匡互生离开了一师范，应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导主任之聘。春晖中学是国民党元老、杰出的教育家经亨颐创办的。经是上虞人，说服实业家陈春澜捐献银元二十万元，在白马湖创建春晖中学。1920年破土建校，1922年秋季开学招生。经亨颐办学有两大主张：一是师资，二是设备。他聘请的教师有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杨贤江、匡互生、丰子恺、刘薰宇、王任叔、张孟闻等，都是当时教育界有声誉的人物。春晖的校舍是当时全国最好的校舍之一，设备也是一流的。在象山之麓，有一幢幢的教师住室：如经亨颐的“长松山房”、何香凝的“双清楼”、夏丏尊的“平屋”、李叔同的“晚晴山房”、丰子恺的“小杨柳屋”等。这些居室，后来都成为国内著名文化遗迹。

匡互生在春晖任教约两年，他一直坚持教育体制改革，学生要以德育为主，提倡学习自由，男女同校。一次，学校要辞退一名学生，匡互生出面力保，他认为学生偶有过失，应以说服教育为主，使他有改正的机会，不意竟遭到校方拒绝，匡愤而辞职，去了上海。

## 组织立达学会创办立达学园

1925年，春晖中学自匡互生离开后，朱光潜随即辞职去了上海。期终，夏丏尊、丰子恺、刘薰宇、周为群都相继离开春晖也去了上海。这时，匡互生遂出面邀请原在上海的胡愈之、周予同、刘大白、夏衍、章锡琛及春晖去上海的老同事朱光潜、丰子恺等组织立达学会，并提议创办立达学园，经过学会协商同意，立达学园遂从此诞生了。

当时匡互生一钱莫名，怎么办？恰好丰子恺把白马湖的“小杨柳屋”卖了八百元，在匡互生的精心策划下，在上海买来别人拆房下来的木石砖瓦，盖起了四间简陋的房屋。1925年秋，立达学园就借这简陋的房屋开学了。命名“立达”，是借用孔子在《论语》中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办学宗旨；不称“学校”，而称“学园”，也有它的意义，通过学生习园艺、种蔬菜、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通过劳动，认识自然并改造自然的意义和目的。学园分文、理、艺术三科，还办起了养鸡、养蜂、园艺三个专业。匡互生在江湾办了比较先进的养鸡场、养蜂场，是学校经费的一项收益。教师们不但改革管理制度，还改革教材内容，刘薰宇、周为群、章克标以新的体系编了算术、代数、几何一整套教材；夏丏尊、许钦文、唐弢等教语文，从不让学生去背“主题思想”、“段落大意”，而是主张多读范文和好的文学作品，使学生博闻广识。学园还两次请鲁迅先生去讲演。

匡互生是一位极有创见又富于实践的开拓者，他两年来南奔北走，出入于达官贵人之门，周旋于九流三教之间，不亢不卑，争取社会多方面的支援，屹立于江湾的新校舍居然落成了，真可说是筚路蓝缕，白手起家，他不愧为近代史上一位先进的杰出的教育家。他创办立达学园曾提出两大办学宗旨：一是人格教育，二是生产教育。所谓“人格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优良品格和高尚道德的人；他又认为要使学生具有高尚品德、远大理想和丰富的科学实践知识，必须同时进行生产教育，使受教育者有专业知识和生产技能，认识劳动创造财富的伟大意义，从而服务于社会。

1932年“一·二八”日寇入侵上海，十九路军奋起英勇抵抗，战争就在大场和江湾一带，日机肆意轰炸，立达学园的农场、鸡场、蜂场全被炸毁，校舍也被炸毁大半。匡互生的父母也在这一年先后去世，匡两次奔丧，办完丧事





又匆匆赶回上海护校，战事一停，他即时动工恢复，这年秋季，立达居然又恢复开学了。而筋疲力竭的匡互生此时已重病在身，上医院检查，发现已到了癌症晚期，他还舍不得住院吃药，拖到1933年4月22日竟溘然长逝，享年仅四十二岁，可叹是赍志以殁。

立达学园在匡互生的主持下，虽只办了短短八年，在上海，在中国，赢得了声誉，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匡互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可悲的是他的名字早已被人们淡忘了。

## 请看今日之立达学园

最近我读了赵兰英同志写的《巴金与匡互生》一文（见2006年1月4日《文汇报·笔会》）令我非常感动。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立达依然屹立于松江的情况，我就把赵文最后一段抄录在下面：

今天，立达学园已经走过八十年风雨历程。匡互生先生过世后，陶载良先生挑起了立达的重担。战乱时期，立达多次迁徙，最后落户松江。1953年，这所私立学校改为松江三中，2002年，恢复立达校名。走进今天立达，教学楼上刻着校训：“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校门右侧，草坪中矗立着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陶载良、刘薰宇的青铜雕像，五位立达的创办人，似乎正在商讨立达的前景。往前走，左侧是楚图南、朱自清的雕像。再向前，教学楼前，是夏衍和吴朗西的雕像。右侧草坪中，乃胡愈之、李叔同、毕修勺的铜像，他们都曾是立达的教师。不知道中国有几所中等学校，能与这么多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上海，也许只有立达。生活在大师们的怀抱中，立达的师生是幸福的。立达的思想和精神，也将会传承下去。

巴金与匡互生，有着多年的友谊。他在1983年写就的《随想录》第103篇《怀念一位教育家》中写道：“我把他当作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一盏灯。”这位教育家就是匡互生。只此一句，也就知道巴老对匡互生的评价和友谊了。

（作者系湖南日报离休干部）

# 湖湘现代名人刘建绪

谌 震

刘建绪，字恢先，1892年10月3日生，湖南醴陵人。早年就读于长沙长郡中学，辛亥革命后曾入伍湖南陆军第一师。嗣后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4年毕业后，升入保定军官学校，为第三期炮科，与何键为同乡同学。1916年，刘建绪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与何键一同回湘，分派在第一师第一旅见习。

其时，掌握北京政府的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于1918年3月派北洋军大举南下，湘军败退。刘建绪随同何键回到老家醴陵，组织游击队抗击北军，并击溃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进剿。何键被湘军总司令程潜委为浏醴游击队司令，刘建绪为营长。翌年，游击队被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团长唐生智收编，改为骑兵营，何任营长，刘为连长。在张敬尧被逐后，所部进驻岳阳、桃源等地。在参加了1921年7月湘军援鄂之役后，何键升任骑兵团团长，刘随之升为营长。1923年秋，骑兵团参加"护宪军"，在赵恒惕、谭延闿之战中，击败了谭系蔡巨猷部。战后，何升任第九旅旅长，刘升任第二十七团团长，隶属于唐生智第四师。刘在历次战役中，听从何的指挥，率部奋勇作战，深为何所倚重。

1926与夏北伐战启，唐生智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何键升任该军第一师师长，刘建绪先任团长后升任旅长。收复湖南后向武汉进攻时，第一师隶属江左军直趋汉阳，在攻占龟山和汉阳兵工厂的战斗中，刘建绪身先士卒，立有战功。攻克武汉后，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共三个军，何键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刘建绪为该军第二师师长，后兼副军长，先驻汉口，后进兵河南。1927年8月唐生智东征讨蒋，何部与刘兴第三十六军奉命夹长江东进，占取芜湖、安庆。何键被唐生智任命为安徽省主席，刘建绪率领三十五军为后盾。11月桂系讨唐，唐生智因战事失利通电下野；1928年3月4日何键、刘建绪向桂系求和，得以退居湖南，保留三十五军建制集结湘西。同年夏，刘任湖南清乡第三区代指挥官，负责邵阳、芷江、麻阳、晃县等16个县的"清剿"任务。10月，三十





五军缩编为第十九师，刘为副师长。1929年1月，兼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部第五路司令，进犯湘赣边区工农红军。

自上次与桂系交手失利后，何键、刘建绪认定今后只有跟蒋介石走才有出路。同年2月，何键虽经桂系任命为湖南省主席，刘建绪被提升为第十九师师长，但在同年4月发生的蒋、桂战争中，刘担任蒋介石的讨逆军第四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南下对桂系作战；9月率部去宝庆一带堵击张发奎军；翌年初八入桂参加讨伐张、桂联军。此后刘建绪率部参加对工农红军的"围剿"。1930年秋刘升任第二十八军军长。同年12月第一次"围剿"时，刘率部在修水、铜鼓一带协助"进剿"；1931年4—5月第二次"围剿"，则在湘东南堵击红军；嗣后参加了对湘赣、湘鄂赣根据地的"扫荡"；1933年7月任赣粤湘鄂"剿匪军"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参加第五次"围剿"。红六军团1934年7月从江西永新遂川进入湖南后，刘部奉命进击，一直尾追至贵州石阡。10月，中央红军退出瑞金西撤长征，突围至赣湘粤边，刘部奉命在湘江东岸堵击。11月，刘被任命为"追剿军"第一路司令，率章亮基第十六师、李觉第十九师、陶广第六十二师、陈光中第六十三师等开赴贵州追击红军，直至云南。在何键主湘时期，刘还兼任湖南省政府委员、省保安副司令、省清乡会办等职衔。

1935年9月，蒋介石剥夺了何键军权，任命刘建绪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部调赴江浙，与湖南脱离关系。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翌年9月被授予陆军上将。是年冬兼闽浙赣皖边区绥靖主任，驻衢州，指挥所部"围剿"留在东南坚持游击战争的工农红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建绪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担负浙江海防。1937年9月下旬，奉命增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10月继张发奎任右翼军总司令。由于执行蒋介石的防御战、消耗战战略，虽然将士斗志高昂，英勇杀敌，但在敌人强大炮火轰击下伤亡甚众。加以守卫海防的兵力只剩陈光中第六十三师，于11月5日拂晓奋力狙击强行登陆金山卫的日本侵略军，坚守竟日，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旅长李伯蛟阵亡。日军大举登陆，淞沪我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被迫全线撤退。刘率部撤往浙江，担负浙西防线，司令部驻衢州。12月并兼第二十三军团军团长。所部最盛时达18个师，为第三战区兵力最多之集团军。但自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刘部与日军接触甚少。1940年7月，刘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他驻江浙数年，与浙省主席黄绍竑相处融洽。黄在浙江曾重用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发动民众抗战，后被蒋抑制。刘对黄深表同情。

1941年8月，刘建绪改任福建省主席，并兼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所属仅一个军，翌年由李觉继任，刘仅保留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名义。刘上任

后，废除了前任省主席陈仪试行的“统制经济”政策，取消由“公沽局”专卖粮食及由“运输公司”包揽全省运输的做法。同时，他继续奉行陈仪推行的人事制度，省、县级公务人员均由省政府人事室统一管理，各县县长赴任时只带秘书、总务，不得随意更换其他人员；委任级公务员都须在省训练团受训，保证具有相当文化程度和业务能力。

刘建绪自知本人资历和经验均不如陈仪，和蒋介石的关系更不如陈仪，鉴于陈仪因侨领陈嘉庚的抨击而失败，他上任伊始，即以“清、慎、勤、实”自律，处事谨慎，谦和待人，力求俭朴。为节省财政开支，他将省保安团由8个团逐步缩减成5个。他对于CC、军统以及地方各派，也尽可能求得平衡；对于一些前来投奔的旧部，或在省政府任专员、参议等闲职，或安排到各县担任田粮处副处长、国民兵团副团长、军民合作站副站长（以上均由县长兼正职），负责征粮、征兵、派伕，有些人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因此民间有“三副三腐”之说。但许多旧部还有“三寡”的怨言，说刘“优柔寡断、轻诺寡信、刻薄寡恩”。当时国民党和三青团之间的“磨擦”甚剧，各县参议员、乡镇长等职位以及屠宰税、渔业税等，均由党团瓜分，各县县长穷于应付，刘亦只能听之任之。1943年刘任程星龄为秘书长，程星龄为程潜的族弟，曾以“战地党政委员会”专员名义访问华北敌后区，会见朱德、刘伯承，常向刘建绪谈到共产党在敌后抗战情况，并引荐王亚南、杨潮等学者。1945年7月，“永安大狱”发生，程星龄受牵累被押送重庆（1947年始释放，后参加湖南和平起义）[1]

抗战胜利后，刘建绪满怀希望能恢复侨汇和获取美援，在福建大兴建设，乃规划修建福州厦门公路，疏浚沙溪；结果皆因工款不济、人事不协而延不完工。更为难堪的是全省财政收人告绌，省级各厅、处局机关仅千余人，但工薪常不能按月发给。各部门的行政经费奇缺，地政局的预算在1948年折成金圆券只抵5角。公教人员主要依靠每月配给的平价米维持生活。刘建绪虽然处处精打细算，压缩开支，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刘建绪在闽曾试行“保农社”，各保以佃农与自耕农为主体，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向地主集体租地、纳租，按土地法规定，实行二五减租。这在龙岩（原闽西苏区）试行尚有效，后在全省推行，即受到地富豪绅的明顶暗抗，最后只办起了300多个，平均每县不过四五个。

自1946年起，福建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学生强烈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专制统治，集会、游行此起彼伏，刘建绪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力加疏导。1947年4月，福州中学师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刘令警察向师生道歉。翌年6月福建农学院两学生被宪兵打伤，保安司令部发布新闻又错怪学生，刘为平息事态，由省府登报道歉，并批评了保安司令部。随后，协和大学学生进城请





愿，刘命令警察徒手站岗，派总务科长招待茶水；同时调人送米到农学院，把前来响应的学生半途劝阻回去。他在向学生讲话中说学生有参政权，但希望学生不要感情用事，不必和当局造成对立情势。有人说省府向学生道歉有失威信，刘说政府错了便已失去了威信，再不认错岂不更失威信！由于刘的疏导，福建没有发生捕人杀人等流血事件。

1948年秋，解放大军包围济南，刘建绪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如退守台湾，必不容他留在福建，因此向蒋辞职，并于9月9日他任职七周年之际，在报端公开向福建人民告别，希望由此促成闽人治闽的愿望。蒋介石于1948年9月任命闽籍的第十二兵团副司令李良荣继任，任命刘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李良荣任职不过数月，即为朱绍良所代。

1949年初，刘建绪返回长沙，不久移居香港。同年8月13日，他与龙云、黄绍竑等44名国民党中委、立委联名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1951年秋，刘携眷属赴巴西定居，即专心于子女的培养教育。长子奇凯是地球物理博士、教授；次子奇立是电力专家；三子奇曙是电脑博士、教授；四子奇明是水利工程博士、教授；女儿友珍为著名妇科医生，曾任福建省政协委员。

1978年3月22日，刘建绪病逝于巴西，终年87岁。

**注　释**

[1] 永安大狱：起因于美国新闻处永安分处于1944冬遣周璧赴浙东游击区搜集敌后军民抗战资料，1945年春返闽时在浙江龙泉被扣，牵连到省政府参事杨潮，秘书谌震等二三十人被捕。1946年1月旧政协开会前夕，杨潮病死狱中，曾激起文化界抗议，以后被捕人员陆续释放.

（作者系本馆馆员）

# 湖南著名教育家周调阳

曾弥高

周调阳先生，1893年12月1日生于湖南省武冈市大甸乡栗山园。祖父周仑岗是个廪生，在当地是颇有名的塾师。元配唐氏生三男：长名顺煌，号明斋；次名顺豫，号新斋；季名顺毅，早殇。先生的父亲是周明斋，太学生（国子监生，或称国学生），逝世早，遗下田土近百亩，家境小康，其时先生刚七岁，家中只有寡母欧氏和十四岁的兄长元耿三人。幸赖母亲的督促教育，两兄弟从小读过几年私塾。先生谱名官篪，学名调阳，字仲篪。清政府实行癸卯（1903）改制，兴办新学，武冈办起一所官立高等小学堂，学制四年。先生在这里只读了一年，就考入宝庆中学。毕业后，1913年又考入省立长沙优级师范（后改名高等师范）。在校与陶菊隐、舒新城、许彦飞等同学一起在长沙创办了《湖南民报》。虽只办了半年，却是湖南较有影响的报刊。1917年高师毕业后，历任私立岳云、寥湄、宝郡联中、省立三中教员兼教务主任。

1921年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在教育救国论的支配下，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深造。他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而且加入了"以研究宣传及实施平民教育为宗旨的平民教育社"，担任该社所办的《平民教育周刊》（后改为半月刊）第四届主编，发表了《根据社会原理决定中等教育应采取的方针》等论文十余篇。《平民教育》是《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影响下的产物，与北大学生的《新潮》并称为当时北京两个最出名的学生刊物。同年他还同朋友创办了《教育日报》，通过两年的学习和办教育报刊的实践，坚定了他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志向。

1923年，先生从北师大毕业后，应聘担任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教员，编著了《教育统计学》，由中华书局出版。

1925年暑假，湖南省政府电促先生回湘出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先生随即回到长沙，但并未就职。

国共合作以后，广东革命形势蓬勃发展，1926年北伐军连克长沙、武汉，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中的共产党员夏曦为首，会同长沙教育界名人朱剑凡等，





准备召开省民会议，结成农工商学民众革命大联盟，"开展湖南民主政权之建设"，以期政权归革命群众，成立了筹备处。先生被聘为省民会议筹备处教育专门委员，次年一月，又被选为湖南省教职员联合会候补执委。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员，接着湖南的刽子手何键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早在省立一师毕业的武冈籍共产党员欧阳东、邓中宇、邓成云等先后被捕押到长沙。这时先生刚从河南回到长沙不到两年，同这三位革命志士素不相识。可一听到都是武冈私立思思小学的主要领导人，即与刘寿祺联名，写信给当时正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法处工作的杨韶华先生，请他从中设法营救。因这三位革命志士是关在长沙警备司令部铲共法院，杨亦无能为力，终被杀害。于是，先生资助可靠人士把三位烈士的遗体运回武冈安葬。先生这种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的崇高品德，真是值得我们敬仰学习。

我是1931年元月考入一师的，编在第七班。先生教我们七、八班的《学务调查》与《教育统计》。我怀着景仰的心情，在一次下课后，主动去接近先生，告诉他"我是武冈荆竹铺附近的，今春在长沙考上的"。他显得特别亲热平和，一再勉励我要好好学习，争取回武冈农村去做个好教师。没想到刚上了两周课，先生即被调往教育厅，历任秘书、督学、第三科科长、主任秘书等职，一干就是十四年。为了抗日救国，先生和朱经农厅长精诚团结，无论处理什么事都配合得很好。（厅长外出，曾几度代行职务）。

1932年，先生的同学和好友、平民教育家周方，在长沙郊区办了一所枫林中学。他很想推行梁漱溟办乡村建设学院的经验，要求先生帮忙，先生便商请朱厅长批准，派刚从省立一师毕业的严晨前往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学院学习。期满即回到枫林中学，协助周校长办学，取得可喜成绩。抗日战争中长沙疏散时，先生又支持枫林中学迁往周方的老家新化。

1936年，北平平教会总干事晏阳初博士，从河北省定县实验区来到湖南设立平民教育实验县。先生立即与朱厅长报请省政府批准，指定衡山县为实验县，建议彭一湖为县长。为了给实验县培训一批品学兼优，能吃苦耐劳，既是好干部，又是好教师的双优人才，特在衡山县设立一所衡山乡村师范学校，全部经费由教育厅负担，以定县实验区原社会服务部主任汪德亮为校长。这年10月开学时，晏阳初博士曾莅校做了《无教与误教》的演讲。抗日战争发生后，因日寇滥施轰炸，该校又在先生支助下，连续辗转迁移到新宁县城照常上课。

1938年，先生暗中支持吕振羽、张天翼等在武冈塘田市（今属邵阳县）创办战时讲习学院。先生还多次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支持进步学生去

延安。

先生在省教育厅工作时，薪俸是比较高的，可他自奉甚俭，生活简朴，节余用以收买珍贵书籍与古代钱币。抗日战争发生后，当长沙面临日寇轰炸与侵占的威胁时，他把所有图书装箱运回武冈，经过兄长与县城有关方面的商讨，决定在武冈县城建立都梁图书馆并自任馆长。1940年，借武冈县立女子中学所属的内城老南门东城墙上文昌阁作为临时馆址，所有开支概由私人负责。那时我正在县立女中任教务主任，曾多次去文昌阁阅读报刊，因而认识了管理人员欧毓兰、毛昭明、欧华璋等。据他们说：从长沙运回的书共有五六千册，由于场所过窄，没有全部开箱展出。其中古书有商务、中华等书局出版的《丛书集成》、《四库全书珍本》、《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等；一般读物有《万有文库》、《日本大百科全书》、《小学生文库》等。都梁图书馆是当时湖南四个私立图书馆之一。

1943年，朱经农厅长调重庆任中央大学教务长并主持校务（校长名义上由蒋介石兼），曾邀请先生去任教授。但他看到国民党益趋腐败，重庆更是是非之地，就谢绝了。这时湖南情况也日趋恶化，省政府要职大都由国民党中央、CC等派系有关人物把持。这时的教育厅长是王凤喈，仍留先生继续工作，先生坚决要求辞职回乡。王厅长只好以“督学主任”的名义准他请假离厅。1944年秋，先生从宁远出发，绕道广西阳朔、桂林到湘西绥宁，徒步千里回到武冈家中，决定从此就在家休养，不再过问世事。

1943年秋，我承先生特别关顾，以我在一师毕业的成绩请教育厅把我保送到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科学习三年。1946年秋毕业后，应聘到省立六师任国文教员。先生则于1947年夏，应武冈私立洞庭中学董事长李明灏的邀请，出任洞庭中学校长。为了把学校办得更好，有关学校大事都同董事长商量。李明灏则先后将私宅和庐山军官训练团的铜钟，送给洞庭中学；在对共同事业关心的同时，他俩增进了私谊和互信。李明灏对国民党的不满和意欲投奔解放区，都在来信中有所透露，先生对李的行动表示向往。从此，他默许进步学生在校内阅读进步书刊，支持进步学生社团。洞庭中学有不少学生社团，大都倾向进步，其中以“法相岩社”最著名，经常出墙报、唱进步歌，先生还应该社副社长周清澈的请求，作《法相岩社社歌》。在歌词中，先生明确表示：“寻求真理，争取自由，不达目的誓不休。”表现了他完全厌弃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向往解放的心情。当时，省立六师也有进步学生组织，其中以“新生社”为最著名，经常在校内出墙报、画报、开座谈会，并利用校内石印所的石印机、教导处的油印机，翻印不少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文件，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土地改革法大纲》等在同学中秘密传阅。该社早与洞





庭中学的“法相岩社”有秘密联系。这两个进步组织是在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潘中、唐义源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后来两社秘密联合并走向社会，统一组织的名称是“法相岩社”。先生对此似有所知，并且默默支持。武冈解放后，该社成员有的参军，有的参干，大多成为党的骨干力量。

解放前夕，先生为加强学校师资和领导力量，设法请来一批学有专长、思想进步的名教师，如中山大学毕业的张玉玲、中央大学研究生向实、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毕业的刘渭仲等，终于克服一切困难，把洞庭中学建成为湘西南著名的完全中学之一。解放后，私立中学难以维持，他前往长沙与教育厅商定，改组旧董事会，成立新董事会，推选李明灏与刘寿祺为正副董事长，萧国汉为副校长。1952年暑假，政府正式宣布接收洞庭中学并改名武冈第二中学，其现有规模实现了先生当年所拟定的鸿图。该校现为省重点中学。

1949年10月武冈解放后，先生当选为武冈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任邵阳专署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

1951年元月，先生调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任参议（后改任湖南省政府参事），据先生的女儿周凝秋回忆，“在逝世前十天犹在艰苦坚持工作”，先生积劳成疾，引起慢性粘性白血病急性恶化，在那特殊环境下得不到妥善治疗，于1964年8月8日逝世，享年72岁，安葬于长沙郊区。

先生的遗著：早期的有《儿童心理学》、《教育统计学》、《教育行政概要》、《学务调查概要》、《教育测量法精义》等书，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对古代钱币的收集与研究，他自称已达到“集小成”的地步。后来在长沙时，将所存古币全部捐赠给湖南博物馆。1957年冬，湖南省委决定编辑省志，他参加了《文物志》中金石部分的编撰工作。20世纪60年代，先生负责整理校勘《王船山遗书》，著有《王船山著作版本的研究》（校勘，标点、考证）、《王船山遗著未刊刻稿》、《论王船山的民族思想》（以上三书系1956年中华书局约稿，前两本已完成，第三本因故未完成），《王船山学术思想》未出版，原稿现存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王船山著作的版本和未刊稿》，1958年以湖南文管会地名义发表于《湖南历史资料》第二期。《王船山未刊稿》1959年以湖南博物馆名义发表。《王船山各种著述完成的时期》1962年12月发表于《江汉学刊》。《王船山著述考略》与《王船山各种著述完成的时期》后又发表于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上。还有《王船山馀稿校阅记》手抄本现由周凝秋保存。此外，还有早年在主编《平民教育》（半月刊）时所写的教育论文十余篇。

先生教育子女有方，夫人欧氏，生二男：长名清一，次名清宇，养女凝秋。清一，湖南大学毕业，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理学硕士。回国后，初任西北工学院、湖南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大连海军学校电讯

系教授兼系主任，南京雷达学校系副主任，后参与筹建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任副校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雷达教研室主任，四川国营780厂工程师，辽阳电子厂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程部高级工程师兼研究员。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雷达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曾主持研制我国第一架轰炸机炮尾炮瞄雷达，开发生产炮兵目标指示雷达。1980年任高能物理研究所质子直线加速器技术总负责人。1991年主持建成35兆电子伏质子直线加速器，获国家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著有《微波测量技术》等书。现已退休。二男清宇，1953年武汉大学农学院毕业，1969年英年早逝。养女凝秋，武冈私立洞庭中学高才生，品学兼优，擅长演剧，武冈解放后，在先生鼓励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毕业于湖南医学院，曾任娄底卫生学校高级教师，现已退休。

关于先生的事业功德、智慧、才华，在他未去长沙前，1949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李明灏，在向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王首道推荐先生出任省参事的信中，赞誉“他在湖南教育界很有地位，外号‘一条龙’，而办的洞庭中学在湘西南确居第一位，为人正直无私。”先生驾鹤西去后，刘寿祺、陶蒲生写的《周调阳二三事》中，对先生的评价是：“周调阳一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处事大公无私、是非分明。”“多智善谋，品德高尚。”“晚年无论政治活动，或是学术活动（指文史研究）无不是鞠躬尽瘁，因而积劳成疾，终于病逝于长沙。”这两种公正的评价，先生确是当之无愧的。

**参考书目**

[1]《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舒新城传》第七辑.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2] 周清澍.《回忆我的叔父周调阳》(洞庭中学校友编《洞庭诗文集》).
[3]《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省近百年大事记述》. 199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4] 萧国汉.《回忆周调阳先生》,《洞庭诗文集》，原载《邵阳文史资料》第十辑.
[5] 周民攸. 2004年12月1日来信.
[6] 根据周清澍.《回忆我的叔父周调阳》、周凝秋《悼念父亲周调阳》、《湖南名人辞典·周调阳》、《湖南历代人名辞典·周调阳》汇集而成.
[7]《湖南当代名人词典·周清一》.
[8] 周凝秋.《悼念父亲周调阳》,《洞庭诗文集》.
[9] 刘寿祺，陶蒲生.《记周调阳二三事》.《邵阳文史资料》第十辑.

（作者单位：湖南怀化学院）





# 刘永济生平及著述

程千帆

刘先生名永济，字弘度，别号诵帚，斋名易简，湖南省新宁县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12月25日诞生，1966年10月2日逝世，享寿七十九岁。

## 一

先生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祖父刘长佑虽曾做过清朝的直隶、云贵总督，但却一直保持着读书人的家风。他父亲刘思谦就只在广东、云南等省做过几任知县，因为不能随波逐流，而弃官归隐了。

在祖父、父亲身边读书的先生，从小就培养了对于文学、学术的爱好，为后来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十九岁离乡，先到长沙明德中学，后去上海复旦公学学习。1910年，考入天津高等学校，次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是从该校在各省招收限额学生的极为严格的考试中选拔的，所以可算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与先生同时考入而后来同样卓有成就的学者，有梅光迪、吴宓、吴芳吉等。入学不到一年，因有学生不满校当局的一些措施，加以批评，反被开除学籍。这事引起了全校学生的公愤，于是推选代表，向学校要求收回成命。不料校方仍然采取高压手段，将十名代表一并开除。后经教授调停，要由代表写具“悔过书”，才能恢复学籍。但先生和吴芳吉却认为无过可悔，断然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放弃了官费留学的机会。辛亥革命发生，先生受当时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便由北京赶到海南岛，动员和协助任琼崖道道台的四哥滇生起义。民国成立，回到上海居住。

辛亥革命以后到1917年，先生一直住在上海。这时，近代著名词人况周颐、朱祖谋都在上海作寓公，先生便向他们问学，得到两位老辈的特别赏识，走上了以后研究词学的道路。1917年，先生应老师长沙明德中学校长胡元倓之约，回湘任教。次年，军阀张敬尧因胡校长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密谋逮捕，胡校长仓皇离开，学校濒于解散。先生就将多年积蓄起来预备出国留学的三千银元，全数取出，作为学校开支，而自己也仍然留在校中教授语文，和

全体教职员一样，每月拿八元的生活费。后来，因为学校经费困难，胡校长始终没有将那三千元还给先生，先生也从未索取。但先生本拟出国学习森林，从事实业救国的愿望，却从此不能实现了。

1924年中秋节，先生与黄惠君女士结婚。黄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结婚以后，感情一直非常融洽。先生能够在其后时局艰危、生活困苦中，精勤治学，始终不懈，她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先生逝世后不久，她也因悲痛太甚而离开了人间。

1925年，在清华大学的吴宓先生介绍先生和吴芳吉先生到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先生因胡校长的挽留，未能应聘（吴芳吉也因故未去，后来清华就聘请了俞平伯、朱自清两先生）。一直到1928年，先生才由吴宓再度介绍，到沈阳东北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先生改任武汉大学教授，中间除了从1938年到1939年曾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及湖南辰溪湖南大学各讲学半年而外，一直在武汉大学。1942年到1949年，并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9年，全国解放，先生已六十二岁，但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从事教学科研，较之中青年教师，有过之而无不及。党和政府也非常尊重先生。他于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并先后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理事、《文学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

先生为人一向热爱祖国，耿直不阿，富于正义感。六十年的生活经历与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又使他明确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努力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同时，作为一个受党重视的老知识分子，也必须对党的事业，十分忠诚；要敢于直陈利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先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但就是因为这些，他却被打成“内定右派分子”，“白旗’，“反动学术权威”，在十年浩劫中，饱受凌辱，终于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先生一辈子服膺屈原，研究屈原。屈原由于“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终身与黑暗势力斗争，最后被迫自沉。但最公正的历史老人却给了他以极高的评价，同意刘安所说的他的志行可与日月争光的话。今天，在万恶的“四人帮”覆没之后，党给先生彻底平反，使先生正直的品德和精深的学术，得以继续发扬和流传，可以说是比屈原更为幸运了。

## 二

先生简单的经历和他丰富的著作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五十多年的学术





生活中，先生在古典文学领域内，从研究到创作，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非凡的成果。除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搜集的单篇论文和未完成的残稿之外，已经成书者，共有下列二十种，今将其分类简介如次：

**[文学史二种]**：《十四朝文学要略》、《唐乐府史纲要》。

1928年，先生初到东北大学任教，主讲中国文学史，便拟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着手撰写一部《文学通史纲要》。当写完第二卷，即写到隋朝的时候，因系中改请先生担任其他课程，便没有续写下去。其后，将已成部分，连载于《学衡》杂志；1945年，贺昌群先生又将其介绍于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并易名《十四朝文学要略》。这是一部在结构和见解上都有特点的文学史，可惜流传不广，现正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

先生同意王士禛“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的观点，以绝句为重点，写了《唐乐府史纲要》。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研究唐代乐府历史的唯一专著。此书也写于在东北任教时期，有讲义本，待正式出版。

**[文学理论二种，附二种]**：《文学论》、《文心雕龙校释》；附：《文心雕龙徵引文录》、《文心雕龙参考文录》。

先生早年即从事文学理论之研究，在《学衡》上发表的《文鉴篇》，对文艺鉴赏有极精微的剖析，传诵一时。《文学论》是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的讲义，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此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印多次。

到武汉大学以后，先生在文学理论的研究方面，集中于《文心雕龙》，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了《文心雕龙校释》一书。先师黄季刚先生所著《文心雕龙札记》，久为学林推重，先生此书乃继《札记》之后，又一力作。诸所诠释，能得刘勰原意。在乐山时，先生曾在闲谈时对我说：“季刚的《札记》，《章句篇》写得最详；我的《校释》，《论说篇》写得最详。”以精于小学推黄师，以长于论议自许，可以说是持平之论。此书解放前曾由朱光潜先生介绍在正中书局出版。解放后，再加修订，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其附录二种，远较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所附录的为详备。《徵引文录》所订凡例若干条，尤其精审。以后出版社重印《校释》时，即便因为篇幅关系，难以将附录二种全部付印，也应当将其小引、凡例、篇目附印正文之后，以供读者之参考。

**[屈赋四种]**：《屈赋通笺》、《笺屈馀义》、《音注详解屈赋定本》、《屈赋释词》。

先生毕生致力于屈原研究。《屈赋通笺》初稿成于1932年，反复订补，1953年才写定。首为序论六篇，然后对《楚辞》中可以断为屈原作品的《离骚》、《九辩》、《九歌》、《天问》及《九章》中的《惜诵》等五篇，每篇都分解题、正字、审音、通训和评文五项，加以考究。其有关全书总义，有待商榷

者，则别为《笺屈余义》十九篇。这两种，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合为一册，于1961年出版，惜印数过少，今已难得。

《音注详解屈赋定本》是先生根据《屈赋通笺》中所作的结论写成，供大学生阅读的。原来只据校文，写成定本，题为《屈赋定本》，附在《通笺》之后，其后才加以注解，独立成书。

《屈赋释词》卷上释虚词，卷中释词汇，卷下释句例。这是先生用王引之《经传释词》及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方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屈赋的一部专著。（先生晚年还有意从这一角度研究《文心雕龙》，想编一部《文心雕龙词典》，可惜没有能够如愿。）以上两种，也待正式出版。

先生本拟写成《屈赋学》五种，但第五种未及写出。就已成四书看来，先生对于屈原研究，创获甚多，确于并世诸家中，独树一帜。

**[古典韵文七种]**：《唐人绝句精华》、《词论》、《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微睇室说词》、《宋词声律探源》、《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

《唐人绝句精华》是先生晚年选注的。前有引言，对唐人绝句的源流正变，它的艺术价值以及此书的选旨，作了扼要的介绍。就某种意义说，它是《唐乐府史纲要》的姊妹篇。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词论》是一部通论词学的著作，其特色是突出了对前代词人作词方法的研究，它分类选辑著名词话，加以按语，论其得失。计分总术、取经、赋情、体物、结构、声采等项。先生曾经对我说："这事实上是一部词话选，前人的精论要语，都在其中。"

先生早年讲词选，曾编《诵帚庵词选》四卷，选录较多。到了老年，由博返约，又撷唐宋词的精华，写成《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将唐五代宋词的主要流派，系统地加以介绍，每篇都有精要的注释。其中还注意到了前人和时人所忽视的流派。如两宋通俗词及滑稽词等。以上二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60年，先生为青年教师讲授南宋婉约派词，以吴文英为重点，并前溯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后及王沂孙、周密、张炎，以见此派源流，撰成《微睇室说词》二卷，上卷专说吴，计七十八首，下卷周（邦彦）六首，姜六首，史二首，王五首，周（密）一首，张二首。这是当代词人陈洵《海绡说词》及陈匪石《宋词举》之后，又一部说词的名著，也是先生晚年对于宋词的定论。他研究之功力及成就，备见此书。现正设法出版。

《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及《元人散曲选》是先生讲曲选时的讲义，书前各有序论一篇，颇多发前人所未发的意见，如认为宋代歌舞剧曲的结构有纵列横列之分，元人散曲风格有阴刚阳柔之分，都值得重视。前者已于20世纪50年代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者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宋词声律探源》是先生晚年研究词律的专著，详列图谱，论证精密，多所发明尚待出版。

**[杂著一种]**：《默识录》。

《默识录》是先生多年积存的读书札记，除已写入各种专著的外，晚年复将其余部分辑为此书，共四卷。《文学遗产》1980年第三期发表了其中十二则，可见一斑。现正设法出版。

**[创作二种]**：《云巢诗存》、《诵帚庵词》。

先生在创作方面，以词为主，诗不多作。晚年经过精选，辑成《云巢诗存》一卷，《诵帚庵词》二卷。词集曾在1964年由武汉大学印刷厂排印，但由于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这一部主要记录了旧中国的苦难，体现了一个正直学者的心灵，并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却被误为有"毒素"，全部被销毁。由于这部"反动词"，先生也以风烛残年而横遭迫害，饮恨而死。但凝聚着先生毕生心血的这些著作，却是永远也不会消亡的。词集在先生冤案平反昭雪之后，武汉大学曾将手稿胶印若干册，但为数过少。这两部集子，都有待正式印行。

## 三

我从1940年在四川乐山谒见先生，直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为止，这十七年中，除了在成都三年之外，一直和先生在一起工作，因而有机会向先生学习。学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学他丰富的知识，特别是他崇高的品德。先生的著作（往往是稿本），我都有先读的幸运。其中许多，我还知道其惨淡经营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事是使我深受教益的。

首先，我觉得求真是贯串在先生五十余年为人治学中的一根红线，基于对祖国学术文化的热爱，对人民的责任感，先生一辈子都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他早年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尤其注重民族气节。所以对于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的崇洋媚外，祸国殃民，深恶痛绝。在乐山时，曾断然拒绝友人约他加入国民党的请求。但祖国往何处去的答案，先生也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并未得到。全国解放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思考，他终于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道理，而且认识到，这正是他所毕生追求的。

在一篇《鹧鸪天》中，先生写道："六十年中百变俱，可怜倦眼眩龙鱼。难抛身外无穷事，补读平生未见书。"说明他最初接触新事物的惶惑和惊奇。但是，在党的教育下，他终于认识到，应当和过去告别了。

检点心魂清静了，春光重豁吟眸。百年过半底须愁？河山皆锦绣，人物足

风流。明日欢欣何处见，百花齐放梢头。好开怀抱乐时休！人生归有道，此外更何求。

——《临江仙》

这一篇写于六十五岁的作品，标志着先生已经进入了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使他为社会主义祖国又努力工作了十多年。

先生为人如此，治学亦然。他的著作，没有一部不是精心草创，然后又反复加以修改的。蝇头细字，在稿本的天地头上都批得满满的，加以誊清，然后再改，为的就是求真。先生曾举《寓简》所载欧阳修晚年改定自己的文章，用思甚苦，不是为了怕先生生气，却是为了怕后生嘲笑的话告诉我，并且说："嘲笑还不要紧，但误人子弟，问题就大了。"所以先生对于学术界一些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恶劣作风，是深为不满的。

其次，先生治学的勤奋也使我深受感动。1941年秋，和先生在乐山嘉乐门外的学地头结邻，居住在一个小山丘上。钱歌川教授与我住在山顶，先生住在山腰，相距不过一百公尺，有一条石级相通，小路两旁，栽满竹子。晨光熹微，竹露滴在石级上，淙淙作声，而先生的读书声则从雾气露声中断续飘来，每天如是。这声音像警钟一样激发着我和祖棻少年好学的心，使我们一点也不敢懈怠。凡是熟悉近代学界佚闻的人都知道，北大中文系老教授林损以狂放出名，他曾当面痛斥胡适的洋奴哲学而博得人们的尊敬。有一次，先生和我谈起林先生，说："大家都以为公铎（林损字）只会使酒骂座，可是我和他在东北同事，看到他每到冬天必然温习经书。书，是要反复读的。'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知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话。"到了晚年，先生更是爱惜光阴，天还没有亮就起床工作，午餐后，睡一觉，又工作到深夜。他说："我是把一天当作两天过，但还是恐怕'所为不及所欲为'。"一直到最后，先生还以没有完成《屈赋学》的第五种和《文心雕龙辞典》为憾。从前曹操认为，只有袁遗和自己才老而好学，先生不也正是这样的人吗？

由博反约是先生治学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先生所经常开设的课程是《屈赋》、《文心雕龙》和词。学林便也很自然地推崇先生在这些领域中的造诣。但在我经常和先生的往还谈论中，在我将自己的一些习作呈请先生教诲时，我才逐步发现，先生治学之广，读书之多，是惊人的。他在群经诸子、小学及古史方面，在目录、校勘、版本方面，在沿革地理、名物制度方面，修养都很深厚。所以研治古籍，就能左右逢源，多所创获。从有关《屈赋》等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对古文字学和古史的造诣；而从其有关《文心雕龙》等著作中，又可以看出先生对于玄学（特别是《庄子》）的造诣。但先生除了偶尔谈论有关这些学术的问题外，几乎完全没有发表过文学研究以





外的文章。我曾对先生说："您论《庄子》如此之精，即不肯著书传世，难道是'善《易》者不言《易》'吗？"先生只是微笑，没有回答。先生的著述，篇幅都不大，要言不烦，取其足以达意为止。显然属于"简约得其英华"的南派，而不是"深芜穷其枝叶"的北派。黄庭坚评陈师道说："其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有开有塞，至于九川涤源，四海会同者也。"先生治学由博反约，不废考据，但主要的是着眼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正是如此。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是我国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先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先生平时比较严肃，言语不多。初见到他的人，往往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他崖岸很高，难以亲近。但和他处久了，才知道他非常谦虚谨慎而且平易近人。先生的著作生前正式发表的较少，我每每劝他及早公布，以利后学，但他总觉得自己的一些见解还不够成熟，谦让未遑。例如他讲《史记·屈原列传》中有错简。《天问》中的"鲧何听焉"的"听"字应为"圣"字之误，以及论述魏、晋、南北朝的学术对当时论辩文的影响，吴梦窗词的艺术特征等等，都是发千古之未发的卓见，其中有些生前迄未发表。由于我和祖棻往往有幸读到先生的手稿，常蒙先生不耻下问，有时我们也提出一点幼稚的看法，先生无不乐于接受。我们曾经保留了将近一百幅先生手写的词稿，都是精楷；其中有些在稿后还附有先生斟酌字句要我们帮同抉择的意见，可惜这些极其珍贵的文物，在十年浩劫中，已经被造反派抄我的家时抄去销毁了。先生还给我写过一副斋联，上联是："读常见书，作本分事。"下联是："吃有菜饭，着可补衣。"这一副对联足以说明先生为人治学的根本态度，可惜也在前些年"焚书坑儒"时被焚掉了。

先生为人治学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太多了，很难说全，这只是举出了我感受最深的几点而已。

## 四

先生不但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从先生所写作的诗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是多么热爱；而对于他和他们在解放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多灾多难的情况，又是多么悲愤和忧伤。

先生在东北大学教书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吞噬东北的狼子野心已经充分暴露。先生讲课的时候，就对学生反复宣传民族大义，教导他们保卫祖国是每一个人的神圣职责，使学生们深受感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中文系学生苗可秀为首的爱国青年，便组织了东北大学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日。先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为他们谱写了一篇《满江红》作为军歌。后来苗可秀不幸壮烈牺牲。有人曾把他的事迹写成名为《凤凰城》的话剧。1939年先生在

湖南大学时，同学们演出了这个剧本，先生因为不忍看到苗可秀最后被杀害的场面，提前退场。回到家里，就写了下面这三首诗，来怀念这一位“国殇”：

无端皂帽落穷边，曾见苗君正妙年。今夕氍毹表忠烈，如尘如梦最凄然。

苌弘碧血成秋磷，精卫冤魂塞海东。为问当年六千士，几人还唱《满江红》？

已惊碧月凄魂夜，忍见黄沙授命时？独向青灯忆俦侣，故关风雪到书帏。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着大西南，表面上说抗日，实际上是在反共反人民。沦陷区的人民处在敌伪统治之下，物质精神饱受磨难，而国统区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却剥削压迫，花天酒地，无恶不作。这些现象使这位正直的诗人心情十分激动，写下了许多使人读了都会感到作者心灵正在燃烧的作品。下面就是其中之一：

闻道锦江成渭水，花光红似长安。（“地转锦江成渭水”，又“花光不减上林红”，皆李白诗句也。）铜驼空自泣秋烟。纳罗兴度外，歌酒死生间。野哭千家肠已断，虫沙犹望生还。金汤何计觅泥丸？西南客有地，东北更无天！

——《临江仙》

在另一首《浣溪纱》当中，先生写道：“终古鸡虫谁作主？野坛狐鼠自通神，山川能语定酸辛。”可以看出，由于当时反动派的封锁，先生没有条件接近共产党，没有机会学习马列主义，但他追求光明，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极其不满，则是肯定的。在垂暮之年，他终于找到了能使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这就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在1951年国庆日，这位六十四岁的老诗人就写下了这一篇欢欣鼓舞的词：

四座且安坐，听我唱新词。中华古称神胄，文物久衰微。溯自蛮烟东犯，（林则徐词：“蕃航别有蛮烟”；指鸦片也。）四境重关都启，欧美竞凌欺。魑魅与饕餮，相率吸人脂。到而今，已百载，更谁悲？识时赖有英杰，奋起树红旗。万里长征伟绩，八路雄师苦战，灿烂建弘基。天地顷清朗，民物共雍熙。

——《水调歌头》（国庆颂）

在《诵帚庵词》的自序中，先生曾经叙述了自己从近代词学大师况周颐、朱祖谋两位学词的经过，而且强调创作必须反映现实生活，以及它既要继承又要发展的道理。先生说：“历世既久，更事既多，人间忧患，纷结交午，有不得不受之；受之而郁结于中，有不得不吐者，辄于词发之。复值日寇入侵，而窃禄者阘茸淫昏，绝无准备，国势危于垒卵。中情激荡，所为渐多。斯事之艰苦，亦知之渐深。然衡以古词人之所为，每以自愧。而所遇之世，有非古词人





所得想像者，其艰屯则皆倍蓰之。故其所以为言，有非可范以往矩者。既已不得起朱况两先生而质正之，终恐弃之乱烟衰草中耳。”关于这最后一点，先生是过虑了。那些摧残祖国优秀文化的刽子手，不是曾经千方百计地想消灭它们而终于可耻地失败了吗？

从18世纪末叶，张惠言兄弟推尊词体，认为过去被人们视为小道的词，也可以反映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和作者对这些事件的思想感情，使得词在这以后的一百多年中，无论在创作上，在理论上，都有较大的发展。其中像周济、陈廷焯在理论上贡献较多；王鹏运、朱祖谋在创作上显出了实绩；谭献、况周颐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成就。先生的词学正是继承了这些前辈的业绩的。他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总是缘事而发，绝无无病呻吟之作。他特别赞成况周颐词要“重、拙、大”的理论，字里行间往往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之境，万不得已之情”。这是与一般吟风弄月的作者毫无共同之处的。

晚清以来有成就的词家，都能够熔铸古人，自成面貌。例如朱祖谋的作品就兼有东坡、梦窗之长。先友卢冀野教授在《望江南》（题清名家词）中说：朱氏是“老去苏吴合一手，词兼重大妙于言”。这一评论是很正确的。而先生的词则取径更广。也不独如席启駉教授所作的《诵帚庵词集序》中说的“为梦窗词，而往往似白石，意其胸襟性情或近之欤”，而且对于南唐的冯正中以及东坡都下过很深的功夫。所以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将冯之深婉、苏之豪放、姜之清刚、吴之丽密，合一炉而冶之。例如下面这两篇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证。

秋老山空，乱蛩里，露草光摇玑玓。鸾驾应怯新凉，霓衣皱轻白。愁记省眠云俊侣，暗萦惹、十年尘迹。涨海铜琶，明湖翠盏，都到胸臆。算谁有九月疏星，向天末依然伴岑寂。多少瑶情霞思，总而今抛掷。伤换劫、河山坏影，堕玉尊特地凄碧。那更残曲重录，故人难觅。

——《琵琶仙》（辛巳乐山中秋，约子苾夫妇，味橄薄饮云巢。念辛未，甲戌此夕，曾与綦龙叠和波仙水调，以写幽忧穷蹙之音。今时境远非昔比，而綦龙深隐衡云，予乃窜身荒谷。奇情胜概，久随苍茫，顾影婆娑，怅然成咏）

万缘吹剑首，忍遥吊，楚兰魂。正残画芜城，斜阳故宇，何限愁痕！乾坤只供醉眼，奈忧时、肝胆自轮？谁惜千经万纬，换来泪雨哀云。前尘去，水炮鄰鄰。情漫苦，梦难温。记乱雪榆关。惊涛汉渚，恨墨空存。孤坟甚时酹酒，唤灵旗、赤豹出荒榛。为语沧江淡日，故人垂老酸辛。

——《木兰花慢》（挽綦龙）

唐人律绝诗是词的来源之一，所以词当中的小令与绝句非常接近。由于篇幅的限制，它们都比较难于用来写莽苍的景物和壮阔的胸怀。但先生的小令却

往往显得波澜起伏，有咫尺千里之奇观。这一点也很突出，是在古代和当今词人中少见的，试看下面这两首写在不同时期的《浣溪沙》：

行到蚕丛地尽头，凄清云物又成秋，销忧难觅仲宣楼。剩水吞声过楚峡，斜阳凝血下神州，欲呼辞魄吊高丘。

久缺高情作胜游，尘埃长负归盟鸥，荒城一上抵登楼。晴野大云含雨度，平江浊浪拍山流，又收残暑入新秋。

先生词学造诣很深，而我对于此道所知又极少。以上所论，不过是管窥蠡测。如先生的词集能正式出版，广泛流传，那时，读者将会证明我所说的绝不是"阿其所好"；反之，很可能是没有能够把先生的成就充分地、准确地表达出来。

## 五

先生晚年带的词学研究生马昌松同志回忆说："刘老师对我们和青年教师既严格又热情。例如为了使我们弄清楚俗传诗律中'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这两句话的来历和是非，他除了要我们阅读有关材料外，还要图书馆设法从外地借来只在《三续百川学海》这部丛书当中才有的《阳关三叠图谱》，给我们看，并且教导我们怎样读。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先生认为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尽可能地详细占有资料和深刻理解这些资料的谨严学风。我们写的读书笔记，先生都详加批阅，连错别字也一一改正。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即使卧病，到了该上课的时候，他仍然躺在藤椅上照常讲授，同样坚持批阅我们的作业。为了培养接班人，先生真是呕心沥血地工作着，死而后已。"

从我个人和先生的接触中，也完全可以证明昌松同志的话都是"实录"。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先生，因为先生早年在长沙的时候，就曾经向先叔祖子大先生（名颂万，别号石巢居士，又号十发老人）问学。后来我又在《学衡》杂志和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读过先生许多文章，非常钦佩。所以一到乐山，便去拜见先生，并把自己和祖棻的一些习作呈请批改。先生不以我们为愚顽不堪教诲，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而且送了我们一首词：

鼙鼓声中喜遇君，硗硗头玉石巢孙，风流长忆涉江人。画殿虫蛇怀羽扇，琴台蔓草见罗裙，吟情应似锦江春。

——《浣溪沙》

后来先生便推荐我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这是我到大学教书的开始。先生在学校威望很高，但从来不轻易荐人。在武大十年，就只介绍过刘豢龙先生（名异，湖南衡阳人，是晚清今文经学大师王闿运的弟子）。我是他介绍的第二





个人。那时，我才二十八岁。先生怕我不能胜任，就在我讲课的课堂隔壁，旁听了一个星期，才算放了心。这件事，一直到 1948 年我已经是武大中文系的教授兼系主任了，惠君师母才在闲谈当中告诉我，但先生始终没有对我说过。几十年来，每当想起先生对于后辈是如此地提携、爱护，就深深地为自己学业无成，辜负了先生的关怀而感到悔恨；同时，对待自己的学生，也总想以先生为榜样去做，虽然还差得远。

先生是十年浩劫中含冤死去的。身后的情况，真很像宋代诗人张舜民在《画漫集》中追悼王安石的诗里所写的："乡闾匍匐苟相哀，得路青云更肯来？若使风光解流转，莫将桃李等闲栽！"这种世态当然是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和邪恶势力的压力所造成的，不足深责。但也正如张诗另一首中所说："江水悠悠去不还，长悲事业典型间。浮云却是坚牢物，千古依栖在蒋山！"先生的道德文章将在祖国文化史上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1966 年先生逝世的时候，我正在农村被监督劳动，没有资格前去吊唁。1979 年党为先生平反，开追悼会，我并没有收到正式通知，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借用陈师道挽他老师曾巩诗中的两句话，托人写了一副挽联送去，但却被某些人以礼仪改革为借口，拒绝悬挂，因此我始终没有机会公开地表示对先生的哀思，现在我愿意把陈师道的那两句诗录在这里，向先生致敬致哀，以作为这篇传记的结束：

丘原无起日　江汉有东流

一九八二年春于南京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 忆恩师柳敏泉先生

马少侨

## 一、立品定须成白璧，读书莫忽过青年

我能立足诗坛，永远忘不了我的恩师柳敏泉先生对我的教导。

柳敏泉先生（1884—1958），号蹷庵，晚号正二斋主人。湖南湘阴县人。清光绪甲辰科秀才，后毕业于湖南官办政法学堂讲习班。曾一度出任临武县知事，后长期从事幕僚工作。工诗词，擅骈文，并精书法，为南社湘集中巨子。抗战胜利后在湖南大学文学院任教，与刘腴深、曹典球等共组麓山诗社；并受聘为湖南文献委员会委员，解放后任湖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旋受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8年逝世于湘阴故居，终年74岁。著有诗文集若干卷待梓。

我认识柳敏泉先生并执弟子礼，是1939年在新化复初中学读初中之时。那时先生在新化县政府任主任秘书。裱画店中，经常可以看到他所写的对联、屏条；那种秀丽中见苍劲，肥厚中见清韵的行书，笔饱墨恬，毫无火气，也毫无俗气。加上所写诗联，大都是他自己的作品，诗人而兼书法家的身份，更令我倾倒。一天，我居然挟着我的一卷习作去县政府求见这位我为之神往的诗人。柳先生个子偏矮，形骸清癯，举止文雅，虽年仅50余岁，但状似60许人。有点咳嗽，却又一把水烟壶不离手。他慈祥地接见了我，我作了自我介绍，以诗为贽，执弟子礼。柳先生含笑地接过诗卷；才看了我在1937年写的《山中吟》："客自山中来，遗我山中蕨，为道山中人，年来多菜色。"就十分惊喜地说："好！写得很有古意，也很有时代性。我们订个忘年交吧，衙门不方便，到青石街晏府来找我吧！"这次相会的情况，他在14年后的1953年为我写的《二十四番花信楼诗存后序》（以下简称《诗序》）中还清楚地回忆说："忽有款关而至者，则马生少侨也。投刺罄折，执礼甚恭；容止雍闲，出言唯谨。以诗为贽，请点正焉。披而览之，心乎爱矣。风裁通脱，意致便嬛。英俊之气，荡盎于毫端；悱恻之情，流露于字里。清源自浚，绣绪纷陈，逸藻不停，琼思密布。写无题之艳体，一点犀心；托遐想于游仙，九重鹤背。盖欲学温李而未还，求无白而蕲工者也。从此每有吟咏，辄就琢磨，青蓝互资，黄墨无隐。"





这次相识以后，我们建立了七八年如一日的师生感情。先生送给我一副对联，一张诗笺。对联上写着："立品定须成白璧；读书莫忽过青年。"诗笺上写的是一首七言绝句；"皂帽乌丝两鬓皤，鸢肩火色待常何。伫看槐柳荣新市，勋业遥承两伏波。"诗和联从风韵上说，都不是先生的得心应手之作，但可以说是先生对我的无比关心，无穷爱护。他不只是鼓励我要好好学习，莫使青春虚度；特别是勉励我要注重品德修养，做到白璧无瑕。他把我们的相逢相识，比作是常何与马周的相逢相识。可我毕竟不是马周。1958年我头顶"右冠'流放农村，接到先生逝世的噩耗，哭师哭己，肝肠寸断："已过青春羞短发，不堪白璧有微瑕！"当年伤痕，至今仍隐隐发病！

## 二、心殷报国家何在？泪洒思乡水不流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化，可算是一处比较安定的后方。许多国内有名的诗人，如常熟宗子威等都流亡到了新化，与新化当地著名诗人谢玉芝（著名女作家谢冰莹之父）、苏鹏、邹觉人及邵阳贺汇川等组织莧江吟社，一时海内名家如杨云史、张默君等均联翩入社，使莧江吟社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诗人组织。众请宗子威任社长，柳敏泉、谢玉芝任副社长。我和萧湘雁同学就是这时先后加入吟社的两个最年轻的社员。

我加入莧江吟社是1940年秋。这时我因投考国师附中落榜失学，困居农村，写下了《秋兴》七律四首，对国计民生，吐出了无限伤感。如末章云："萧萧落叶楚山秋，风鹤声中战气浮。东亚共荣甘屈膝，新亭孤泪岂空流？红尘世界三千劫，金粉南朝十二楼。天下兴亡人有责，不闻李广为封侯！"柳先生和宗先生对此极为赞赏，都依韵和诗四首以资鼓励。两先生皆为外地人，因为战乱流亡来到新化，新化本来就是一个贫困的县份，加上匪祸天灾，民不聊生。先生在《诗序》中说："戊寅、己卯之际，倭寇方张，进窥湖湘，焚我庐舍。铁鸢与征尘相逐，火燕共弹雨齐飞。负耒窃而先逃，席不暖而靡定。飘零断梗，流寓上梅。碧柳门垂，风来眉约；绿蕉荡漾，雨滴愁缄。"真是国难家仇，一齐涌上心头！因此，先生在这一时期的诗也就充满了国破家亡、民生凋敝之痛。在和诗中一则曰："薯芋供餐嗟岁歉，萑苻越货感时艰"；再则曰："短发渐添芦荻白，饥肠犹恋稻粱红"；三则曰："心殷报国家何在？泪洒思乡水不流！"简直是一字一泪，裂胆撕肝！

## 三、世乱曾吟人似草，愁深应赋鬼披萝

1941年，柳先生随县太爷的迁调，由新化到了益阳，我亦考取华中艺校，由新化到了湘潭。我们虽然遥隔关山，但书信往来仍很频繁。1942年，我有《春草四首》之作，先生和了四首，那种丧乱之悲，家国之恨，仍倾注于笔底毫端。

1943年冬，我在华中艺校毕业。1944年闲居在家。这年秋，敌陷长、衡，邵阳危急。穷愁潦倒，深感离乱之苦。以诗抒怀，因有《秋草十二首》之作。时先生因避寇复由益阳返回新化，寄居在其亡友陈恳阶先生的别墅“忆佛轩”中，侍妾黄氏又不幸早逝。先生精研佛典，笃信佛法，与陈先生既是诗朋，也是道友。陈先生在世时极崇拜宗、柳两先生，拜宗先生为师，认柳先生为友，请人绘《南台师友行吟图》，遍征名家题咏。1942年初，因坐禅走火入魔；悬梁圆寂。柳先生在这国破家毁、妾亡友丧的逆境中，也以《秋草》为题，写七律十二首。这一巧合诗缘，先生后来在《诗序》中回忆说：“叵奈寇势深入，音书屡梗，余乃遭回萍水，转徙萸江，忆佛而旧雨添愁，悼亡而霾霖助虑。感怀时物，赋《秋草》诗十二首。恨长吟而无病，惜共赏之乏人。适生亦感离乱，以《秋草》命题为诗，远道请益。律体七言，章分十二，视余所作，若有夙期。嗟乎！遇合之偶，胡乃异乎寻常？沆瀣之道，竟无间乎幽隐。是称巧构，弥见遐思。”1945年秋，我在宝郡联中教书，把先生同我的诗合编成册，付之石印，先生在跋文中说：“而题同、体同，章之数亦同，殆所谓伤心人同此怀抱欤？默契之感，如磁引针，亦有莫之喻而喻者。”我们师生的这一诗缘，永远是连系感情的纽带。

先生在文字中曾多次赞扬我的《秋草》诗。1946年春，我以《春日重游六岭亭》诗寄先生，时先生已返长沙，任教于湖南大学文学院，境遇比过去是好些，但不幸的是其长公子在耒阳病逝！先生接到我的诗后，在和诗中说：“世乱曾吟人似草，愁深应赋鬼披萝”，指的就是《秋草》诗。先生在和诗中还深切地盼我去长沙：“著书几净浑宜懒，问字庭虚正待过。何日长沙来载酒，麓山残碣共临摹。”嗟乎！先生对我的恩情，一何深且厚乎！

## 四、南社秋高，风雨续重阳之句

从1946年春末到1948年冬残的近三年中，我一直在长沙，有机会和先生朝夕相处，对诗词的写作水平，也大大地有了提高。令我终生受益的也终生难忘的，是幸运地参加了南社湘集的诗会活动。南社湘集是著名诗人傅熊湘先生创建的，意即南社湖南分社。抗日军兴，无形瓦解。抗战胜利后，社员先后相





继回到长沙，共商恢复。公推先生为社长，并新发展了一批社员，我和萧湘雁是湘集中最年轻的两个。在湘集活动中，我认识了萧仲篪、张平子、陈长簇、曹典球、刘世善、黎泽泰等老一辈诗人，并得到了他们的一致好评。1946年南社重九雅集，我在诗课中写道：“羞弹长铗邀青眼，喜有微名重白头。”一方面以混迹仕途而自羞，另一方面却以在老一辈诗人中受重视而自喜。许多往事，我写有《我与南社湘集》一文，载《文史拾遗》2000年第二期，在此不再重复。

1948年5月，是先生60生日，我与湘雁都参加了他的家宴。二哥热忱劝酒，我们喝得酩酊大醉。后来我在《悼亡诗》中写的“醉眼惺松忆寿觞”，指的就是这一次宴会。这年重九，湘集诗会我没有参加，原因是我又偶然喝醉了酒，先生为我代拈韵得“长”字，当时我正在以辘轳体续“满城风雨近重阳”句为七律四章，就在末章及之：“江楼今日醉飞觞，槛外湘波翠带长。如我情怀偏病酒，输公旗鼓各登场。雅将韵事联高会，天许骚人聚此邦。敲碎唾壶人悄悄，满城风雨近重阳。”张平子先生对这组诗一再称许，并携去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柳先生更念念不忘，1953年在给我写《二十四番花信楼诗存后序》时还着重点了一笔：“南社秋高，风雨续重阳之句”。其推重如此。可我就在这年冬天离开了长沙，投身革命洪流，从此没有机会再在长沙参加南社湘集的活动了。

## 五、岂云借以师资，深幸堪为寄托

1948年12月，中共地下党在湖南布置迎解起义，我受命以建设科长的名义随新任安化县长晏忠承“走马上任”，离开长沙，到了安化。1949年3月，因架设乡村电话线率技士蒋渠赴长沙采购通讯器材时拜谒了柳先生，特邀湘雁一起请先生同摄一影留念。这就是先生在《诗序》中所回忆的“怜余年事渐高，愿长留有形之影”。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受聘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又改聘为省文史馆馆员。仍住在长沙。我于安化解放后奉派回新化，通过学习分配在洞庭中学任生活辅导主任，后调省立六师，即现在的武冈师范。1951年寒假调来长沙领导最后一批中学教师思想改造，得与先生重叙别情。1952年参加省人大会议，又一次来到长沙，与先生作了多次长谈。解放初期写传统诗词好像是一种犯罪行为，我已声噤寒蝉，闭口不谈此道。而同先生凑在一起时却旧梦依依，心中极其留恋。我说：“我的工作是培养新的青年一代，我现在已不再写诗词、搞书画了；但内心却对诗词书画充满了留恋。先生过去给我写的诗序等，都在土改运动中丧失，希先生为我补写。”先生慨然承诺。他在《诗序》中回忆说：

解放后“余仍养疴星渚，生遂讲学都梁。两度趋公，几回访旧。自谓吟怀久辍，绘事中停，慨瀹新知，不以无益而害有益；低回往事，曾是多情而似无情。”“生有旧作，余曾弁言，待写乌丝，祈庋黄卷。龙无睛而竟去，稿非腹而善忘。亡羊底用穷追，断凫何难再续。不嫌才尽，重生梦笔之花；却笑情痴，再撷相思之豆。”最难得的是先生还精选了自己的几十首诗写成册页，后附萧仲篪、曹典球、黎泽泰等名家的题词送给我，并在《诗序》中恳切地说：“岂云借以师资，探幸堪为寄托。昔者因何讲《易》，喜得子襄之情，孝穆赋诗，欲附总持之集。余于生也，有厚望焉。”可是这些寄有“厚望”于我的手泽，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劫火无存了！幸《诗序》的抄件得在湘雁手中保存下来。

1957年5月，我以邵阳市中学教师的代表出席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扩大宣传工作会议，先生时已迁回湘阴故居，闻讯特地赶来长沙，我与湘雁赴火车站迎接相左，第二天清早就返邵阳，师生竟未相逢！后来当我在接到先生逝世的噩耗时，只有在《悼亡诗》中作“太息楚天三月暮，缘悭一面痛长沙”的痛哭了！

我回邵阳不久，即被卷入了“反右”狂飚，先生为我着急，曾寄赠重写的《和春草四首》斗方，并嘱我为他绘制《杏花吟馆图》，用意在探听我的情况。我当时已经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条件，连信也不敢回他。“池塘旧梦寻春草，彩墨新缣负杏花”，椎心之痛，也只能发泄于《悼亡诗》中了！至今细细想来，我又岂只“负杏花”？我所负于先生者多多，而且都成为终身憾事矣！夫复何言?!

——2002年5月于邵阳市

（作者系本馆馆员）





# 回忆外祖父陈墨西

王璧　王延

我们的外祖父陈墨西，字贞瑞，晚年号潜斋，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二十五日。原籍衡阳县三湖镇繁荣村。清廪贡生。他自幼聪慧过人，曾以优异成绩考入两江优级师范。在校受到革命思潮影响，萌发了反清的思想，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09年东渡日本留学。当时日本是中国民主革命者聚集的地方。在东京，他结识了黄兴；经黄兴介绍，又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和蔡锷将军。中山先生很赏识他的抱负和才华，不久他就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底学成回国。武昌起义胜利后，他去南京协助孙中山先生组织新政府。又与湘籍同盟会员发起为新政府募捐活动，撰写了“募捐公告”，其中有段词是这样的：“洗大地之旧污，几多湖湘碧血；建新都之宏业，无量桑梓头颅。然而放牛归马之途，何胜烹狗藏奸之慨；矧金陵胜地，久为湘鄂荟萃，其玉垒浮云，徒增故乡流离之众。或青年失学，或赤子无依。冯生弹甲之徒，接踵而过；阮籍穷途之哭，触耳即闻。”在新政府筹组告一段落后，他又应甘肃提学俞明震（衡山人，台湾前“国防部长”俞大维之父）之邀，前往甘肃办学，于1911年底到达甘肃。适逢在甘革命党人黄钺（湖南宁乡人）图谋反清武装起义，他参与其事。他们于1912年3月11日在秦州（现甘肃天水市）起义成功，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被选为军政府都督，他被任为军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司司长。时值天旱，他慷慨解囊，捐献衣物，救济灾民，深受当地人民爱戴。后来，甘肃临时军政府受袁世凯胁迫，被迫解散，他随黄钺回湘。

此后，外祖父不满袁世凯当政，一直在衡阳南路师范学堂等地任教。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1923年他应孙先生之召，赴穗任大元帅府咨议。1924年随孙先生赴北平与段祺瑞进行谈判。次年3月孙先生病逝北平，他返回广州，参加第一次东征。收复广东惠阳县后，他被任命为惠阳县县长。当时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他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听过毛泽东的讲课。毛对外祖父很尊重，在课堂上向学员介绍：“在座的有革命老前辈陈墨西先生。”结业时同学送他一副对联：“勤学不懈，群推先觉。”这些事，

老人和我们多次谈过。1926年革命军誓师北伐，他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顾问，随军北上。吴佩孚败退后，他出任湖南宁远县县长。1927年因与当道者政见不合，毅然退出政界，并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掩护共产党员及革命者逃脱敌人的追捕。1928年，他赴北平，在辅仁大学任教，至1935年回故里衡阳。

外祖父从北平归来，我们就去他家——兰芝别墅拜见他。当时我已15岁，仅在家乡（长乐乡）的王氏族校读了一年多的小学。外祖父见到我，满怀深情地说："代训（即王璧），你过来，让我好好地瞧瞧你。"又说，"你跟你妈妈长得一模一样，看见你就像看见了我惠子一样。"（惠子，名祥惠，我们的妈妈）外祖父还问我："你想不想读书？"我一下子跪在他的面前哭了说："外公，我想读书，我要读书。"外祖父摸着我的头说："代训，你只读了一年多的初小，年龄又大了，我资助你读书，你必须刻苦学习，要走捷径跳班才行，你先跟七舅补习几个月，准备考高小吧。"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同年考上了七区女职读高小，1937年又考上了省衡女中。外公当时在省衡女中任国语教员，我亲聆他的教诲，感到莫大的幸福。以后我又跟他从省衡女中到南华女中（高中），度过了7年的校园生活，于1944年高中毕业。他老人家在生活上对我关怀备至，在学习上对我谆谆教导。他教书育人，身教重于言教，常以自己的举止言行为学生作出表率。他黎明即起，终生不闲；生活有度，饮食有节；宁静少言，勤于考究；书写行文，严谨不苟；坚持真理，富贵不淫。慕陶潜之高风，归隐田园，晚年自号潜斋、潜叟，以明己志。他常教育我们：写字要横平竖直，刚劲有力；做人也要和写字一样，要秉公正直，一身正气。

1944年10月，日寇入侵他家乡衡阳渣江一带，烧杀抢掠。外祖父怒不可遏，命其长孙继佛在堂屋墙上画了一大幅中国地图（至今仍保存在兰芝堂别墅的墙上），并亲书"此乃中国之大好河山，凡我黄胄须誓死捍卫之。"鬼子到了他家乡，他宁死不离故土，独居兰芝别墅，毫不畏惧，怒目而视，以日语斥敌。他的浩然正气，使侵略者望而生畏，诺诺而退。光复后第一个春节，堂前撰有门联："再造山河新改岁；后凋松柏又逢春。"以表示他老人家喜悦之情。居乡期间，他与同乡友人成立诗社，交流诗艺，整理家藏经史古籍，陈列于书室。书室撰有门联："愧无令德行乡里；幸有余龄守缺残。"（缺残指不完整的书）抗战胜利后，他老人家再次入教坛，先后在省衡女中、南华女中、衡阳县中（现衡阳市二中）任教，一直到1949年。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外祖父十分尊重。衡阳县政府委任他为衡阳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和民革负责人谢晋写信给他，聘请他担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嗣后他连任湖南省第一、第二届人大





代表。1954年受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同年他受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托，调查王船山先生故居沿革状况。当时他已有85岁高龄了。他先后两次到湘西草堂和船山墓地实地考察，反复核对，力求准确，写下了近3万字的《船山故居沿革及其坟墓状况的调查报告》。他终生手不释卷，勤于写作。每当去长沙开会，就在我家小住，向我细叙思亲之情，并写下了不少诗篇，召唤游子还乡。可惜这些诗篇当时未能收藏，深感遗憾，其能背诵者仅只两句："皓首常登南岳岭，远招回雁向衡阳。"他还常教育我们：一个人写文章要首尾并重，做人也要像写文章一样，要善始善终，越到结尾，越要做得好。他本人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一生追求真理，不与邪恶、虎狼为伍。

外祖父有二子一女。长子陈道，又名菊池，字祥趾，留学英国，归国后一直任前海军学校教官。陈道生二子，长名继佛，次名继良，均在国外工作。次子陈致平，字祥均，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先后在北平辅仁大学、光华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台湾大学任讲师和教授，现是台湾历史学家。陈致平育二女二子，大女及次子是双生，大女名陈喆，乳名凤凰，就是当今誉满海内外的小说家琼瑶。次子名麒麟。老三是男孩，乳名巧三。老四是女孩，叫景春，乳名小妹妹。外祖父三女名陈祥慧，毕业于金陵女子师范学堂，就是我们的母亲。母亲是一位聪慧贤良的女性，文章写得好，通晓英语、日语。她对我们姐弟既锺爱又严格要求。由于生子女较多，损伤了身体，不幸早逝，终年仅39岁。当时我才7岁。

1960年，我们敬爱的外祖父未能实现与子女团聚的愿望，就与世长辞了，终年91岁。当时代训闻讯与丈夫刘哲立即赶往渣江，悲痛地与老人遗体告别。友人赠外祖父题词："身系安危，而忘情名利；肩担道义，而不计穷通。昆阳绩伟，刘皇叔口不言功；绵上田虚，介子推禄终勿及。"这是对外祖父一生的评价和真实写照。前几年，我们为老人扫墓，立了墓碑，以表我们的寸心。

外祖父，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王璧，又名代训，衡阳市退休教师
王廷，又名代杰，湘潭电机厂退休工程师）

# 怀念羊春秋

李　蟠

羊春秋同志离开我们快两年了。他去世时我恰巧在外地休养，没能同他做最后一次告别，非常遗憾！

羊春秋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享誉文坛的诗人，又是从教数十年的资深教授，桃李遍地！他长我9岁，我不是他的专业同行，认识的时间虽然很长，真正密切交往的时间却不长，对他的学术成就和教学业绩没有资格置喙。但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所以我有许多话要说，有的在他病重住院时说了，有的还没来得及说他就走了……

在我的印象中，羊春秋是一条硬汉子。我在知识分子的行列中混了几十年，接触过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数以千百计，但真正称得上是硬汉子的却不多。有人告诉我，这原因有二：一是"先天不足"，我们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哺育给他们的是软性的饲料；其次是"后天失调"，所以得软骨病的越来越多，年龄越大，病情越重。在一时一事上硬得像个人样的，也许不少，但一生硬到底的，却少得可怜。

但羊春秋却不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的骨头似乎特别硬，而且一硬到底，终其一生都没有得过软骨病。

我第一次见到羊春秋是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1958年的秋天。当时我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进修俄语，他在那里的中文系读副博士研究班。进修生和研究生都住在一栋宿舍里，又都在一个食堂里用餐，几乎天天见面。但见面管见面，说话却很少，往往是点点头，笑一笑而已。他留给我的只是他那矮胖的个子和亲切的微笑。

我们的第一次交谈，是在一次露天批判大会上。这次批判大会，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那原因至少有三点：一是被批判者钱基博名气大，是一级教授，全国闻名的大教授；二是批判会的规模大，全院数千名师生都参加，而且是在露天之下举行的；三是被批判者已经死去。钱基博生前参加了"鸣放"，放出了许多"毒草"，被划成"右派"，帽子还没来得及戴就病死了。学校领导





原则性强，政治上不含糊，右派死了也要批判，于是有了这次奇特的批判会。被批判者已经死去，怎么办？"父债子还"，由死者的儿子钱钟书捧着灵牌接受批判（羊春秋说捧灵牌的不只有钱钟书，还有钱基博的女婿石声淮）

参加这样一次严肃的会议，照理是应该集中注意力倾听批判者的发言的。可惜广场太大，扩音效果奇差，批判者义愤填膺的批判，我们听到的只是一片嗡嗡声。

我和羊春秋带着各自的座椅，坐在远远的山坡上，因为听不清批判者的发言，便低声开起了小会。首先开口的是我：

"这钱基博究竟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钱基博是一位名气很大的教授，资格老，在我们国师（指国立师范学院）教过书，我听过他的课，他儿子钱钟书也在国师教过英语。他女婿石声淮还是我的同学呢！"

其他还谈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但从此我们的认识算是进了一步，我知道了：他是湖南邵东人，解放前国立师范学院的毕业生，是国学大师马宗霍、骆鸿凯的高足。

此后我们就没再交谈了。实在太忙，没有时间。他忙着学习，也忙着参加"火烧教授"，写大字报、写文章批判指导老师方步瀛。题目是领导布置的，文章后来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中，临终前不久他告诉我，他为此懊悔了一辈子！那是人人力争上游的大跃进日子，谁不忙呢！

一年以后，我进修期满，回到了湖南师范学院。又过了一年，羊春秋研究班毕业，被分配到了我院的中文系，于是我们由同学变成了同事。

照理我们之间应该来往多了一点了吧？但是情况却不是如此。这原因有三：一是我们住的地方相距甚远；二是忙，他忙我也忙，没时间串门；三是没有这种拉关系、套近乎的愿望，确切点说是怕，怕运动一来，难得交待。社会关系还是简单点好。所以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竟然没有见过一面，更不用说倾心交谈了。

到了1963年的下半年，国家的经济形势有了好转，于是阶级斗争又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尖锐起来了。全国展开"四清"，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我校是湖南当时唯一的一所文科高等学校，成为湖南开展"四清"的"试点"单位，省委派出了工作队。

为了教育群众，工作队把明察暗访、辛苦收集起来的"活生生的""阶级敌人"的材料，不点名地进行宣讲。我所在的教研室的一位工作队员忘记"保密"，向我们谈了中文系的"严重敌情"，说那里挖出了一个非常嚣张的反革命

小集团，为首的竟是副系主任马积高和钻进党内的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羊春秋！这一“新闻”有如晴空霹雳，惊出了我的一身冷汗！我感到一丝欣慰的是：马积高我不认识，与羊也没有来往，牵连不到我！

出乎我的意外，“四清”结束后，马也好，羊也好，都没有成为反革命，当副系主任的，还是当副系主任，当教研室主任的还是当他的教研室主任，是党员的，还是当他的党员。我后来在“牛棚”里问过羊春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居然毫无所知：“哪有这种事？工作队一负责人在‘四清’结束时还专门来我家，找我谈心，说我走的是一条革命的路，肯定我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哩！”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拉开，作为“革命知识分子典型”的羊春秋，一夜之间又成了“反革命”。他被揪出来了！他显然对此毫无思想准备，这从他自己的回忆中可以看出：

“1966年6月1日晚，支部大会一直开到斗转星移，气氛沉闷得像暴风雨快要降临似的。支部成员逐个表示，要在这次运动的暴风雨中，冲刷尽沾染在自己身上的脏东西，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组织委员便来喊我去看大字报。只见教学大楼成了大字报的海洋，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几乎都是对准我和一个副系主任开的炮，而且我俩的名字上都打了一把大红叉，什么‘漏网右派’呀，‘三反分子’呀，‘黑帮分子’呀，‘反动权威’呀，帽子大得吓人。来往的人都对我视而不见，冷若冰霜，甚至投以蔑视或仇视的目光，我意识到我已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敌人，我已被划到‘同志’的圈圈以外了。我茫然了，我木然了，我像颠簸在大海里的一叶孤舟，随时都会被大风大浪撕裂、吞噬。我颓然地坐在一张破椅子上，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恍惚看到自己百口莫辩的窘态，妻儿流落街头的惨象。啊！我就这样被揪出来了！……”

他的被揪，我倒并不觉得意外，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出来，在我们这所学校里一夜之间被揪的，多达200余人，约占全校教职员工总数的1/4！像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角色，也列其中，他羊春秋岂能幸免？

羊春秋终究是羊春秋，与一般被揪斗者迥然不同，很快就成了全省的“知名人物”。他的名字上了省报，天天受到全省的革命群众，特别是工人贫下中农的批判和声讨。同他一道享受过如此“殊荣”的，我校教师中只有三位，另两位是林增平和马积高。他们从此三合为一，号称“林马羊”。

与别的“黑帮分子”相比，羊春秋的态度特别“顽固”，他不仅不低头，不认罪，而且嘴巴硬得出奇。比如“革命小将们”第一次拉他游街，他就很不





“老实”，嬉皮笑脸，旁若无人！小将们交给他一面破锣，叫他敲一下，说一声：“我是黑帮分子羊春秋！”然后数一数自己的“三反”罪行。可羊春秋就是不敲锣，不认罪。后来他虽然敲了锣，但说的却是：“我叫羊春秋，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坚决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态度，当然会激怒红卫兵小将。于是他饱尝了一顿拳脚，被打得头破血流！但他并未从中吸取教训，改弦易辙。有一次他刚刚从例行的斗争会上坐完“喷气式”回家，顺手拿起一本《敦煌曲子词》翻看，想以此发泄胸中的闷气，不巧被邻居发现，马上报告红卫兵小将，把他叫到宿舍里，叫他跪下认罪，说他“偷看黄色书籍，对抗运动！”他不仅不跪，反而据理驳辩。于是他被当堂剥去棉衣，小将们的皮鞭便在他的身上跳起舞来，把他全身打得红一块、紫一块！他不仅不求饶，不认罪，反而大声呼叫、抗议：“你们这是私设刑堂，非法拷打！”结果当然很惨：他被打得血流如注，昏倒在血泊中。家人闻讯赶来，含泪用板车把他拉到医院里。医生护士们见了，无不动容，但他们爱莫能助。谁敢收留一个见了省报的大“黑鬼”呢？给他的伤口缝了几针，上了点药，便让他躺在板车上回家了。一位好心的电工偷偷地给他送去中草药偏方，让他躺了半个月，吃了几十副中草药才好！

此类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除开坐“喷气式”以外，他还跪过玻璃碴，顶过盛满脏水的大盆，颈上吊过贴满罪状的大黑板。戴过重达数十斤的特制高帽，钻过长达数十米的狗洞。满脸泼过黑墨水……总之，人世间不堪忍受的凌辱，他都“备尝之矣”！

他的家呢，先后被抄13次，书籍、手稿、讲义、书信、衣服、手表、存折（上面仅有2.4元）……全被抄了去，只差“掘地三尺”了！

造反派给他戴的帽子，也多得吓人，简直难以数计。见诸报端的还算比较“文雅”：“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正式写在铁牌子上面戴在颈脖上的是“黑鬼”。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他的头衔不断变化，帽子也就有所不同：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时，他是他们的“黑爪牙”、“社会基础”；批判湖南省无联的极左时，他是“黑手”、“极左分子”；挖“黑三线”时（这是湖南的“特产”），他是“黑三线”在我校的总代表；清理阶级队伍时，他是“国民党特务”、“土匪”、“漏网右派”；“一打三反”时，他是打、砸、抢、抄的“坏头头”；反击右倾翻案时，他是右倾翻案的急先锋；抓暗藏的“五一六”分子时，他是“五一六”分子……。就这样，羊春秋成了我院第一号“反革命”。在十年“文革”中，他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位“显赫”的角色，一个场场都要出台的“主角”！

这期间，我和羊春秋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期

间，他的活动除了挨批挨斗之外，就是翻案。翻案是他的主要活动，而我又成了他的“同谋”、“副手”、第一号“知情人”。在此不得不多说几句。

1966年8月6日工作组宣布撤走，让革命小将“在游泳中学游泳”，成立革委会。8月8日全院统一行动，大抄家、大搜捕，把200多个大大小小的“黑鬼”关进各个系科里的“牛棚”。当天就有中文系副系主任李祜夫妇和化学系老师魏播等数人自杀身死。羊春秋自然也被关进了“牛棚”，同他一起被关的共有27名，约占中文系全系教职工的1/3，数量之多，为全院之冠！

此后不久，红卫兵小将们开始大串连，杀向社会去了，我们这些被关在“牛棚”里的待解决的囚徒受到了冷落：既没有人来批，也没有人来斗，除了写些交待之外，就是成天劳动改造。

这年的11月，中文、外语、生物三个系的部分“黑鬼”，被送到平江劳改。羊春秋和我便开始有了接触。“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冲出“牛棚”，起来“造反”。

回到学校，他就率先冲出“牛棚”，开始翻案。他以《愚公移山》战斗队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揭发工作组对他的种种迫害，坚决要求平反“翻案”！

“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的大字报《我的控诉》在全院引起了震动，而在“黑鬼”队伍里则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一些胆子大的“黑鬼”便偷偷地聚集在羊春秋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以羊春秋为首的翻案集团，准备集体行动，要求平反，争取参加革命的权利！

激烈、残酷的“内战”，使我们的翻案活动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羊春秋等人不得不联袂出走，直到中央对湖南问题表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成立，他们才回来。

羊春秋回校的第二天，“黑鬼”们的组织便宣告成立，全校被工作组打成的“黑鬼”，几乎全部成了这个组织的一员。羊春秋理所当然地成了它的第一把手，我成了他的副手。

“石破天惊”！这个组织一经成立，就在长沙各个高等学校、文化学术团体里引起了震动，不少文化名人、学者专家，前来我院取经。在短短的一个月中，长沙市的所有高等院校都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负责各组织协调工作的机构也宣告成立，羊春秋被公推为总负责人。几乎在“文革”初期被揪斗过的所有专家学者，都成了这个组织的成员。据不完全统计，总数不下800人！当时各校的正副教授，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都在其中。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要求平反，要求得到应有的权利，这在全省、全国恐怕并不多见吧！

在这个组织存在的那些日子里，羊春秋忙得不亦乐乎。他到处作报告，给





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打气、壮胆、撑腰！他认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是努力工作的，也是听党的话的，所以工作队把他们揪出来是对他们的迫害，应该平反！他主张彻底批判那条长期以来迫害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把颠倒了的历史彻底颠倒过来！他不只是要求给他个人平反，而是给所有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首先要为“文革”中被打成“黑鬼”的冤案平反，然后“像梳头发一样，由前往后”，翻“四清”的案，翻59年反右倾的案……总之，他要把所有的冤案都统统翻过来！

这在当时得要有多大的勇气，冒多大的风险！就差没说要给右派平反了！不过他多次说过，右派摘了帽就不是右派而是革命同志了。即使对当时尚未摘帽的右派，他也没有同他们“划清界线”，视他们为“另类”，而是同他们有说有笑，打得火热，甚至在“牛棚”里同他们开玩笑说：“苟富贵，毋相忘！”

羊春秋没有想到，极左派的势力竟有那么大的力量，他的活动刚刚开始，就遭到无情的镇压，他属下的成员，一个个地又被打进了十八层地狱，等待着他们的是一次比一次更为残酷的批斗……

被斗得最惨的，自然是羊春秋！系里斗，院里斗；各个高等学校轮流拉着他去斗，市里斗完省里斗。这个造反组织拉他去斗，那个造反组织也来拉他去斗！羊春秋身披破席，头戴纸糊的高帽，颈悬黑板，脸上泼满墨水，手持破锣一面，被人牵着游街示众！……

一直为受迫害的知识分子鸣冤叫屈、翻案平反的羊春秋，在受尽凌辱之后，终于在1970年获得平反，和我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道，迎来了充满阳光的春天！

获得平反以后，羊春秋马上要求调走，以便充分发挥出他的作用。南京大学闻讯，派专人邀他去南大，因为有著名的程千帆教授的极力推荐。但省里不答应他出省，怕人说湖南留不住人才，落实政策不力。于是他被调到了湘潭大学中文系，继续他的教书生涯！

进入20世纪80年代，像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一样，他迎来了事业上真正的春天！他鼓起了最大的干劲，充分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论文一篇接一篇地发表，专著一部接一部地出版，一批又一批的本科生、研究生从他的门下走向社会……他成了知名的学者、教授！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就是那些曾经无情地批他、斗他，甚至打过他的人，也有不少前来认错求助的。羊春秋是宽容的，他不曾起过报复的念头，特别是对那些年轻、幼稚的学生，他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受害的人嘛！他固然嫉恶如仇，但他恨的是那条把我们国家引向毁灭的路线和它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我曾经问过他：我们经历的这些灾难还会重新出现吗？他的回答是：“难说啊！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一代了。希

望他们多思考一下道家的‘勿为已甚’！儒家的‘泛爱众而亲仁’，佛家的‘众生平等’这一类的光辉思想，或许有可能不再重复那段史无前例的残暴历史！”

作为一名战士，羊春秋的顽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惊人的顽强，不仅表现在政治斗争方面，学术研究方面！而且表现在与病魔的斗争中。4 年之中 5 次手术，谁能承受得起？但他却一次又一次挺了过来，或笔耕，或舌耕，直至最后一息！他的不少诗文，甚至书稿，都是在病榻上完成的！

羊春秋文思敏捷，才华横溢，诗词歌赋，无所不能，杂文、小品尤佳，散曲更是当今文坛一绝！除了说他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之外，说他是诗人兼杂文、小品能手，亦无不可！加上他文字功夫根底厚，知识面广，往往下笔千言，一挥而就！难怪《南方日报》辟专栏，刊登他的《春秋漫笔》，《湖南日报》连载他的《闲话》，《湘潭日报》发表他的《书话》，《湖南广播电视报》约他谈《茶道》……如果不是病魔过早地夺去了他的性命，不知还会有多少好文章出自他的笔下！

“人生自古谁无死！”羊春秋很懂得这个道理。面对死亡，他无所畏惧，因为他一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死而无憾矣！

他真的不只一次地对我笑着说过：我很知足，就是现在死去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我起码有两点已经超过了孔子：一是我的年龄比孔子大，他仅仅七十有三，我已七十又八了；二是我的弟子比孔子多，他的弟子号称三千，我教过的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加起来，不知比他多了多少倍！”

他可以死而无憾，可我对他的死，却感到无比的悲哀！他的离去，使我失去了一位生死与共的战友，一位不可多得的“棚友”，一位可亲可爱的“难兄”！

安息吧，我的“难兄”，我的“棚友”！

（作者系湖南师大教授）





# 贺绿汀与严怪愚

严　农

那是 1960 年。由于漫天的吹牛和“人祸”，人们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花生壳、树叶、红薯藤，都当成高级“人造蛋白”，供人们“享用”。我的父亲严怪愚——一位被划为“右派”的老记者，全身都浮肿起来。一个月 60 元的生活费用，要负担六口之家，他每天只能靠几两粮食充饥。一分钱，只能掰着几瓣来用。每到月中，家中便出现“财政赤字”。怎么办？借？一个全国著名的“铁杆右派”，人们哪怕用正眼看你一眼，就算是对你的一种“恩赐”了，谁还敢借钱给你？更何况当时人们为了顾命，也确实无钱可借。因而，全家只能在饥肠辘辘中过日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面部越来越“胖”。

一个阴雨绵绵的冬日上午，破窗外突然响起邮递员低沉而略微带点惊异的声音：“严怪愚，你的汇款单！”当时我们全家一惊，这种时候，谁还能给我们家寄钱？谁还敢给我们家寄钱？父亲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门口，用十分疑惑的眼光，上下打量了一下雨中的邮递员：“同志，你弄错了吧？”邮递员将一张被雨水微微打湿的汇单向父亲一亮，十分确切说：“是你的，请签名吧！”父亲用抖颤的手，在单据上签了字，从邮递员手中将汇款单接了过来，拿到小屋里昏暗的灯光下一看，汇款单收款人一栏上确确实实写着‘“严怪愚”三个字，只见汇款人一栏上赫然写着“贺绿汀”三个字。同时，他看到，汇款人留言栏上清楚地写着：“怪愚，知你病重，汇上二十元。供买点营养品之用，请好好保重身体。绿汀。”在弯腰挨斗的日子里，父亲从未流过泪。这时，他的眼睛却润湿了。因为，他深深知道：在这种日子里，一个全国著名的音乐家给一个全国著名的“右派”和“牛鬼蛇神”公开汇款，这需要何等的勇气、正气和骨气呀！

父亲看着手中的汇款单，眼睛慢慢明亮了，因为，从这里，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真诚和正直，看到了他那颗金子一样的心……

他颤巍巍地走到破旧的床边，从陈旧的有点霉湿味的褥子底下，慢慢摸出一张用旧塑料纸严严包好的小包，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照片。这是抗日战争时期

贺绿汀在重庆嘉陵江边的寓所送给他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贺绿汀正坐在一架钢琴旁，在凝神深思。照片后面的题词是："人，应当像嘉陵江水一样，百折不挠，激流勇进。"

划为"右派"被抄家时，什么都被抄走了，唯独贺绿汀亲自签署的照片，他想尽一切办法，将它保存了下来。

因为，这是老师亲自送给他的照片。

抚摸着这张发黄的照片，他想起了久远的过去……

那是1921年。

童年时代，父亲的家境十分清贫。在湖南邵东灵山寺小学读书时，地主的儿子带着大鱼大肉去吃，他却只能带点豆腐乳去吃，有时一顿只能吃上一块红薯。可是，在小时，他就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对再艰苦的环境，都充满了幽默感。他一面吃着半凉的红薯，一面用清亮的嗓子唱道：

红薯好吃口好开，
吃着吃着唱起来。
唱出心中不平事，
越唱心中越自在……

这自编自唱的山歌，传到了正在备课的音乐兼美术老师贺绿汀的房里，他停下笔杆，凝神静听起来。

"一副多好的嗓子！"贺绿汀一面用手轻轻地敲着桌面，一面自言自语地说："难怪同学们叫他做'过山岭'啊！这孩子唱起歌来，真是山这边唱歌，山那边听得见啊！"

歌声越来越嘹亮，它穿过山岭，在苍松翠柏之间久久萦绕着……

"过山岭！"贺绿汀终于忍不住将头伸出窗外，对这一面吃着红薯，一面唱着山歌的孩子喊道："过来！"

"有事么？贺老师！""过山岭"一面唱着山歌，一面以自己特有的敏捷走了过去。

"你的嗓子真好！"贺绿汀由衷地夸奖着："等你长大了，我送你到音乐学校去学习吧！"

"好！""过山岭"高兴得将吃剩了一半的红薯往自己破烂的口袋里一塞，一步跨进了自己敬爱的音乐老师的房间："贺老师，我长大了，要用自己的嗓子为穷人唱一辈子歌！"

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他为人民唱了一辈子歌。——不过，他并非用喉咙，而是用笔，一支战斗的笔。





"过山岭"天天只带点豆腐乳和红薯来学校吃。

"餐餐吃豆腐乳也不行啊！"贺绿汀想。当时，贺绿汀家境也十分艰难，一家多口，全靠他当小学教师一点微薄的工资来维持，要想全力来支持一个穷孩子上学，也十分困难。

"来！'过山岭'！"贺绿汀一边提着一个竹篓子，一边喊着"过山岭"："我带你捉点泥鳅来吃！"

"好！""过山岭"拍着小手跳了起来。一手拿着老师手中的竹篓子，跟在老师后面，一边挥舞着竹篓子，又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泥鳅滑，泥鳅小，
小小泥鳅味道好！
山珍海味尝不到，
捉篓子泥鳅哟我吃个饱！

"啊哈哈！"老师望着自己光着脚丫的学生，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泥鳅连个影子都没见着呢！你这个小肚子就饱了啊！"

"捉泥鳅还不容易么?"学生挂满汗珠的小脑袋一侧："你看我一捉就是一大把！"

于是，老师在稻田的外边，学生在稻田里边，跟自己的老师，分头捉起泥鳅来。

不一会，老师已经捉了半篓子泥鳅。学生呢，泥汗满脸，却连一条泥鳅也没捉到。

"怎么样啊！'过山岭'?"老师抬起头来，微笑着望了望已经满头大汗的学生。

"泥鳅太滑，真难捉呀！"学生有些沮丧。

"要学会对付滑东西呢！'过山岭'！"老师停止了捉泥鳅，他利用每一个可以教育学生的机会教育着自己的学生。

从此，贺绿汀每天放学都带着父亲到稻田里捉泥鳅。一边捉泥鳅，一边教他唱着各种各样的山歌和祁阳戏。贺绿汀只要教一两遍，父亲便学会了。接着便坐也唱，站也唱，走也唱。学校里，贺绿汀房里，到处是他充满童稚的歌声。贺绿汀摸着他的头，微笑着说："'过山岭'，长大了，你就作一个歌唱家吧！"他回答道："是的，我长大了，一定要作一个歌唱家，把人间的不平都唱出来！"贺绿汀微微点点头，说："好！"心想：别看这孩子成天唱唱跳跳，心理成熟得还很早啊！

贺绿汀不但会教音乐和美术，而且，由于他出身农村，农活和杂活样样

会。如上所述，他还是一个捉泥鳅的老手。他和我们家相距很近，放假时，他常常约父亲一起到稻田里捉泥鳅。他们一边唱着欢快的山歌，一边在田里捉着泥鳅。贺绿汀毕竟农村杂活干得多，见一条捉一条，严怪愚一条也捉不着，常常急得他跺着脚直骂："这泥鳅，比地主老财还滑！"贺绿汀听后哈哈大笑，说："那你就得学会比地主老财还滑呀！"

1926年，在长沙教书的贺绿汀回到了家乡。现在，贺绿汀和我父亲见面，就不再光是教唱歌和捉泥鳅，而是跟他讲革命道理了。这时，村里、乡里、县里成立了农会，打土豪、除恶霸，发动农友、工友支援北伐，贺绿汀总是勇往直前，一马当先。父亲总像一条尾巴，紧紧跟在贺绿汀后面，跟他提石灰桶，刷标语，举旗子，喊口号。祖父严静山是县农会秘书长，看到儿子跟贺绿汀一起干革命，越干越有出息，喜滋滋地说："别看贺钦安（贺老原名）教起书来斯斯文文，干起革命来赛过猛老虎呢！我这小子也跟他干出来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处悬赏抓捕贺绿汀，贺绿汀被迫出走他乡。他和我父亲告别后，相继在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在右江参加了右江暴动。在革命的岁月里，他坚持从事革命音乐工作，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为祖国取得了重大荣誉。父亲教一期书，读一期书，从湖南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改行从事新闻工作，创办了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力报》、《晚晚报》、《中国晨报》、《实践晚报》。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又在重庆嘉陵江畔相会。父亲带回从抗日前线采访回来的素材，给贺绿汀以很大的创作灵感。他们像在家乡一样，一边商讨着，创作着。贺绿汀挥动着一支美女牌铅笔，为抗日民众创作着各种激越的歌曲，写好以后，用钢琴弹给父亲听。父亲像童年时代一样，一边轻哼着老师的创作歌曲，一边给老师提着修改意见。

就这样，师生又为抗日用音乐战斗在一起了。

解放以后，贺绿汀在上海，父亲在长沙。但他们书信不断，互相鼓励，争取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1956年，父亲被诬为"胡风分子"，受到"莫须有"的严格审查。这时，恰逢贺绿汀回到湖南。在人们对父亲躲之唯恐不及的时候，贺绿汀却不避嫌疑，找严怪愚谈心。他语重心长地告诉自己的学生，要相信党，青红皂白，是非曲直，历史将做出严肃裁决。历史是一个最严厉的审判官，它决不会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父亲在这特定的环境里，听了老师谆谆教导，十分感动。他跟贺绿汀说："贺老，您说得很对。1935年，我在上海听到流传很广的两句鲁迅的话：'做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1946年，范长江同志陪我到南京梅园与周恩来同志告别时，周恩来同志紧握着我的手，情深意长地说：'中国老百姓还要受三年难，三年后再见，希望你们在国统区的同志好自为





之。'贺老，您放心，我一定会按照您的教导，按照鲁迅先生和周恩来同志的教导，做到'铮铮傲骨'，'好自为之'。"

1957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他异常"顽固"，死不认错。贺绿汀从上海托人悄悄给他捎来了话："坚持真理。"

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贺绿汀回到家乡，一边找民间艺人，搜集民间音乐，一边深入群众，把当时大办食堂，人们饿得身胖脸肿，大"炼"钢铁，户户砸锅"炼"钢的凄惨景象摄入镜头，向中央反映。父亲当时已被划"右派"，处境十分艰难。但当他听到家乡九龙岭的林木滥遭砍伐时，也像老师贺绿汀一样，毅然拿起笔，给县林业局长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长信，要求为后代想，保护树木森林。1960年，有个县委副书记向中央揭发他们师生"纠集牛鬼蛇神，反对三面红旗"。贺绿汀得知此事后，写信给父亲，还是那句话："坚持真理！"

现在，在如此危难的时候，贺绿汀又不顾风险，毅然公开给他寄来了20元钱。

这哪是钱呀，这是老师金子一样的心呀！

父亲拿着被雨水沾湿的20元汇条，捧着这张发黄的照片，手儿微微颤抖着……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卷来，贺绿汀在全国第一个被打成文艺界的"黑帮分子"。上海来人找父亲调查贺绿汀的"叛徒"问题。父亲一听，怒发冲冠，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桌子正好有一颗钉子，殷红的血，从他巨大的手掌上流了出来。他横眉怒对"调查者"，吼道："贺绿汀同志一生革命，他是旧世界的'叛徒！"'"调查者"被他的凛然正气吓坏了，指着怒火中的父亲，哆嗦着说："你，你……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右派！"父亲赫然一笑："那就让你看一看这样的右派吧！"

事后，有人问严怪愚："你当时是专政对象，处境十分艰险，造反派要搞死你，比搞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不害怕吗？"

"害怕？"父亲淡然一笑："害怕就不是贺绿汀的学生了！"

1980年，贺绿汀再次回到湖南。到株洲市参观，市委负责同志为他举行招待会。他见了市委负责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父母官，父母官就要给老百姓做主啊！昨天我看了场电影叫《七品芝麻官》，里面有句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市委的同志听了十分感动，表示一定不辜负贺老对他们的教诲，当好人民的"父母官"。

车到长沙，贺绿汀第一件事，就是驱车前去探望正在马王堆疗养院养病的父亲。师生多年未见，有多少说不完的话呀！贺绿汀紧握着父亲的手第一句话

是："我们毕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1983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举行"贺绿汀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六十周年"庆祝活动，邀请父亲去参加。73岁的父亲绕道北京来到上海，见到贺绿汀，用手杖敲着地板说："贺老，您记错了吧。"贺绿汀问："记错了什么啊？"父亲伸出两个指头说："您从事音乐教育，不是60年，而是62年！"贺绿汀疑惑了："是60年呀？"父亲十分郑重地说："把小学教我两年音乐算在里面，不正六十二年吗？""啊！你这非音乐界的学生，还真不忘旧师呀！"说完，拍着学生的肩膀爽朗的哈哈大笑起来。

1984年1月17日，贺绿汀给远在长沙的父亲来信说："最近身体很不好，湖南、邵阳情况如何，望回信中告我。"贺绿汀重病在身，仍然念念不忘生养自己的家乡。只是，当父亲收到这封信时，亦已卧床不起。送到医院抢救，湖南省委、省政协的负责同志去看望他时，他第一句就是："省里机构改革搞得怎样了？"父亲此时惦记着的，仍然是唯有工作，唯有老师贺绿汀的嘱托啊！

贺绿汀和父亲1983年在上海贺绿汀从事音乐教育工作60周年庆祝活动时相约，过一两年后再在长沙相见。岂料父亲竟于1984年3月1日与世长辞。上海一见，竟成了这对患难师生的永别！

（作者系本馆馆员）





# 怀念四哥陈云章

陈述征

云哥是2004年11月11日深夜去世的。根据他生前的遗嘱：去世后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告知至亲以外其他任何人，不收任何人的礼物，只准许家人开一个不放鞭炮、不搞音响的静静的家祭。11月13日下午在家祭会上我讲了一些话，今天在这讲话的基础上作一些补充而写成此文。并将两副诔辞记在这里：

夜雨独伤神，七十年苦学习、苦奔波、苦工作、苦耕种，一我孑然，端赖兄长多方爱护；

孤身勤奋斗，近世纪为祖国、为民族、为亲友、为家庭，鞠躬尽瘁，换来恩德长在人间。

兄弟姊妹剩我一人，怎禁得者多思念；

围炉谈笑当时片语，都铸成无限亲情。

云哥排行第四，比我大12岁，儿时的我曾得到他很多爱护与教导，小时每年寒暑假，他回家时都爱带着我睡，哄我入梦。大概是八岁时一个寒假里，屋外风雨大作，寒气逼人，我们全家围坐在既作厨房又作烤火屋的矮小的茅屋的火炉边，那时我还认不得几个字，云哥取出北新书局出版的活叶文选中的一篇《思宗殉国记》，先用极沉痛的语调介绍李自成围攻北京前夕皇宫内的情形，再逐句讲解。另一个晚上，讲授了《左忠毅公逸事》一文，当讲到史可法跪在监狱中的左公前，史看到左膝下筋骨全部打断，就抱膝哭泣，被左认出，用手指拨开眼皮，厉声说："庸奴，这是什么地方，国家大事糜烂至此，我已没办法了，你不明大义，天下事谁去支撑。如不即走，我就打死你。"即摸地上刑具作投击状。史出来对人说，吾师肝胆都是铁石铸造的。云哥讲到这里，义愤填膺，声色凄厉。这些都深深感染了我，虽事隔七十余年，但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植上了爱国爱民、疾恶如仇的根。

我生在美丽的水乡，酷爱水，几乎无日不与水为伍，迁入丘陵区南陔堂

(旧名为谭家屋场)后，屋庄前后左右也都是大塘和水沟，七八岁时我在前塘跳板上玩耍，云哥看见，要我站在跳水板架上，他用相机为我拍一张憨态可掬、水中人影与塘边垂柳天然合一的照片，极美，也是我惟一的童年相片。我把它珍藏了三四十年，不幸文化大革命时被作“四旧”抄去。十一岁时。同大哥到长沙与云哥住在一起（在刘寅先伯家），一日他外出，房中有一架他借的留声机（当时这是很少的，价钱也高），我不懂为什么喇叭中能唱歌、唱戏。于是将喇叭筒扭开，发条也被卷断。云哥回来了，我虽十分害怕，但他问时我仍说了实话。他不但没有骂我，还说能老实承认就不错了，还说做人就是要诚实。

1937 年我考入衡湘中学，日寇在长沙丢了第一颗炸弹，就把我炸回到了故乡。1938 年 7 月他从重庆来信，要我在八月上旬以前赶到沅陵考雅礼中学。因交通阻塞，一直到月底才到，幸参加了最后一次考试。在这里，我读了一年，我认为是平生最快乐、受教育最好最多的一年。也被选当了一年的班长。雅礼的学费是较高的，但这一年一切费用，都是云哥事先已寄存在他朋友教数学的谭安琪老师那里。可千错万错，暑假因搭乘连吃饭都在内不要付分文的便船回家了。之后，无法再去，只得跳一级（二年二级）在离家二十来里，由长沙搬宁乡乡下的孔道中学读到毕业（1940 年冬）。这时，家里经济越来越困难，上半年只得帮族兄宗雅教小学。那年自种了所有的三十余亩田，因蝗灾致颗粒未收。下半年只得一个人教一个小学，得俸谷二十八石（约三千多斤）以养活全家三日。年底又接到云哥来信，要我去耒阳投考省立二职（那时他在沅陵任九职校长）学财会，公立学校是不收学费只收伙食费的。他已将所需费用寄到了二职鲁冠球校长那里。在耒阳我无忧无虑的读了二年半，也被选当了两年半的班长。1944 年日寇大犯湖南，传说长沙已失守，四月间我和几位同乡同学开始极艰苦的辗转逃亡，一直到九月上旬才逃到沅陵。路上走走停停，一直搞了五个多月，身体也拖垮了，到沅陵不久就病了。云哥送我住入教会办的宏恩医院，出院后，就在九职当职工，一个人管理全校图书与仪器。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自学，几乎将学校所有的文史和社会科学的有关书看完（这种书数量是很少的），也请蒋仲兰教我数学，作考大学的准备。1945 年秋考入办在所里的国立商学院工商管理系，虽然读的是全公费，但那时物价飞涨，穿衣和零用钱基本上都是云哥供应的。毕业后因为要养母亲，我不愿拿供给制，于是到衡阳高级商业学校教书去了，以后随校合并到南昌。1957 年身陷“扩大化”，1958 年被送劳动教养，在那大恐慌、大灾难、大饥饿的时日里，我日日夜夜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

鄱阳湖畔彭泽这块大湿地啊！狂风、暴雨、大雪、冰雹、如剑的芦苇，如





尖刀的钉螺，对我们这些苦难的人来说，那是一个死亡的地狱。带来的衣服全部穿上了也不够用，衣外面几乎全被雨打湿，结冰，内面则为虱子栖息之所。这时云哥寄来了一套很厚而大的棉衣，它给我一点人间的温暖。那时做这么样一套衣要二丈多布，当时江西每人每年布票最少时才 2.5 尺啊！至于棉花则要特殊供应证才能买到。去年云哥才告诉我说，布票是大哥想尽办法搞到的。这套棉衣补补钉钉一直到 1966 年我回长沙还带着。

1966 年 6 月 4 日，在两百多已摘帽右派分子劳动队里，第一个也是当时惟一的一个，我被批准回到长沙就业（当时场里负责人告诉我到长沙后即可安排工作）。6 号到长沙却碰上“文化大革命”，只能在土方大队担土，以后连这种苦力也被取消了资格。这时云哥也被捕入长沙器电厂禁闭起来，有时也押在汽车上和一些大走资派挂上大黑鬼牌游街。一两年后放出来，但彼此相见只能默默不语，因为都是二十一种人，没有讲话资格，也不敢讲话啊！

我家世代种田为生，祖父聪明，读了四书五经，也是一个自学的儒医，为人义务诊病。祖母生了九个孩子，七女二男。父陈天倪居第七，这时人口骤增，靠自有的三四亩地无法维生，乃佃了族产几亩地，父亲幼年体极弱，但天资卓绝，十几岁即考取秀才，毕业后读不收分文学费的法政学校，之后由教中学而大学，成为著名的经史学大师、大学教授和系主任。也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家既无钱、更无势，云哥则完全是靠他孤身在社会上奋斗而成为一个有所成就，对社会有一定贡献的人。不到三十岁，由曾是湖大校长的胡庶华的介绍给九战区司令兼湖南省省长薛岳，同薛谈了一次话后，就派他到沅陵创办省立九职（土木水利专业）学校，（当时湖南分为十个行署，每个行署办一所师范和一所职业学校）。他是十个校长中年纪最轻也最有魄力的校长。在那个抗战年月，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形下，九职办得十分出色。他的办法主要是：1. 聘用素质很高的教师（抗战胜利后几个老师随他到长沙创办中原实业公司，其中有曾子泉、李植基、米谷生等，后来曾任省建筑研究院总工程师、市建设局长和总工程师等）。他深信只有名师才能出高徒。2. 学校里不准有任何党派组织，（他本人始终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主张学术自由，几乎每周日都请一些学者和名人作学术报告和国家形势报告。这样学校学术气氛和爱国气氛都很重。3. 当时因为抗战，物资供应困难，物价不断上涨，尤其是米价。因为他在军队里有熟人，所以利用军船代他在桃源一带购米运到沅陵，米到沅陵，既能用较高价出卖，又可用米来作工资，这样九职职工的工资，常比其他学校多一点也稳定一点。4. 招生非常严格，在出榜前几周，别人来信一般他都原封不动，以避免熟人讲情。出榜以后才看信，如来信中所荐有未取的，则去信“道歉”。他说我数学不好，我想读水利科，但不准。笔试之后，他还要

亲自面试。他是十分注重人的仪表举止和言语的，如衣冠不整，态度与言语有流气他是不取的。5. 他千方百计充实学校教学建设和设备，为所建立的现代化的教学大楼命名为“大禹楼”，新建的礼堂命名为“国藩堂”（在近代人中他十分崇拜曾国藩，曾自名为仪曾）。另在绿阴深处分别建成有家眷的住宅，名之曰“睦邻里”。另建教师单身宿舍“博学斋”。这里好像是一个学术小天地。

抗日初期，某集团军司令霍揆彰在常德办有四开小报名《新潮日报》，发行量很小，后来请云哥作社长，他聘请名报人陈楚、黄定戎与原救国会常委陈述元等主持编务，改成对开大报，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与报道民情，一时声誉顿起，发行量大增，为救亡抗日作了一定的贡献。

他为人诚恳、热情，常以助人为乐。长交际，善言辞，有幽默感。能对不同的人在不同情况下使用不同的言语。因此交游极广，上至达官贵人，名儒大贾，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他非常好客，几乎每日有客，每餐有客。因此别人都愿与他相交，也愿意帮助他。他为人光明磊落，从不害人，他说他平生没有害过人，去世前夕还如此讲。他一生没有检举过什么人，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写过检讨。在那时长期生活在批斗中的人，能做到以上几点，是很不容易的。

他是一个受过传统文化熏陶和教养的人。我们兄弟中只有他和五哥述元小时受过父亲的讲授。他虽是学土木水利专业的人，但有着较好的古典文学基础，他散文写得极具情趣，畅达有致，这是由于他天资好与基础好的原故。

他对亲情族谊是十分注重的，对父母很孝顺，在他住宅的空地里，他用父亲的名字建有古典式的“天倪堂”。每当春节、清明节、中元节和父母生日等，他必率子女在这里举行家祭和烧包，他保持了慎终追远的作风。

解放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湖南和平解放工作且起了重大作用。这点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就不讲了。不过我要补充一点，就是他一边积极从事用和平的方法，另一边在和平解放行不通时，也策划用武力以协助解放军解放湖南。他在我们家乡益阳通过他的关系，由省府派颜健为县长进行策划，组织益阳很有声望的陈楚良乡长、永乐乡陈常乡长和著名教育家五师校长杨朴庵参与解放策反，他们都为湖南解放作出了贡献。

云哥走了！他没有完成李锐要他写回忆录交其出版的任务，这应是文化上的损失吧！

云哥走了！使我想起大诗人苏东坡给其弟子由的诗中有：“是处青山好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姻”之句。这似乎是九百多年前为我们兄弟的写照。

云哥走了！侄儿们告诉我说：他逝世前日中不断喊着：妈妈，开门！五哥





逝世前也大声喊：妈妈我来了！姐姐在去世前一晚竟喊了一晚的“妈妈”。此时，他们都应当聚合在父母的身边，重新在另一个世界里过着天伦生活，这个地方我也要去的，那时候我们仍是围在父母膝下的兄弟姐妹了。

——满弟述征写于 2005 年 2 月 2 日

（作者系长沙市商专高级讲师）

# 瑕瑜互见的蔡季襄

彭青野

我认识蔡季襄先生是在1951年初春。那天上午，他到湖南省文物委员会来报到上班（长沙市局关祠协和里7号），从那天起，我与他共事八年。此前，为他能否提名为省文物委员，还曾有过争议，有的说他既非耆年硕学，名声不好，羞与为伍。因为在解放以前，他确曾私自买卖文物，长沙人都知道。长沙解放以后，过惯了自由散漫生活的蔡季襄，又将他陆续收购的一批出土文物仍如往日一样，准备运到上海去销售，1950年冬，被长沙市公安局逮捕，全部文物被没收。此事传遍了省城，连省人民政府委员方叔章和陈浴新都知道了。方、陈二人虽与蔡季襄素无来往，却也早闻其名。当时省文物委员会刚成立不久，正需要蔡季襄这样的人材，因此，方、陈二人力排众议，向省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力荐，请程向中共省委统战部提名，保他释放，并聘他为文物委员。

蔡季襄祖籍苏州，其先人几代经商，清代后期迁来长沙定居，经营丝绸和钱庄，颇称富有，在八角亭、福源巷、苏家巷等处都有房产和住宅。他父母有三个女儿，蔡季襄是他家唯一的一个儿子，人称四少爷。季襄生于1898年，天资聪颖，早年读过几年私塾，稍有旧学基础，写得一笔工细的蝇头小楷。他不吸烟、不饮酒、不赌牌。20世纪30年代初，他父亲病故，由他继承了那份丰厚的遗产，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一生只有两个爱好，一是寻花问柳，二是收藏出土文物。由于这两个爱好，给他的命运带来不少的打击。

1929年，军阀何键主政湖南，受蒋介石之命兼任“讨逆军”（讨伐桂系军阀）第四路军总指挥时，蔡季襄在朋友的邀惑下，到那个指挥部一度担任过文书。他以灵秀飘逸的小楷，得到上司的欣赏。然而，他不习惯于那种呆板的工作，不满一个月就辞职不干了。又在几个朋友的煽惑下，合伙办起了一家小报馆，报纸的内容，除了报道长沙市区的一些街谈巷议的新闻以外，主要是有针对性地吹捧湘剧女演员。他一天到晚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出没于茶楼剧院中。

蔡季襄的元配金氏，生了一个男孩，才到中年就去世了。继配黄福莲，原是湘剧名演员，色艺俱佳，也多亏季襄常在小报上吹捧，更是红极一时，后来





终于成了他的宠眷。而且又为他先后生下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连同元配生的，三个儿女，都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

这位演员出身的黄福莲，可算是一位了不起的节烈之妇。抗日战争时期，长沙沦陷，蔡季襄全家避难到了乡下。有一天，季襄偶然外出，有一小股日伪兵窜到乡间扰民，乡民闻风，许多人都躲到深山中去了，黄福莲想等候丈夫回来一同去躲避，因而走迟了一步。当她带着小女霞妹跑出门时，被几个日伪军发现，正朝她母女走来。黄福莲环顾四周，一片空地，无处可以藏身，眼看几个鬼子兵从三面向他们逼近，她明知这一次已难脱魔掌，故突然疾走几步，走到一口深水塘边，纵身跳下。她身后紧随的那个才一十三岁的女儿见此情景，也随同跳入水中，母女二人就这样牺牲了。节烈忠贞，足为中华女儿生色。

几个日伪军失望地走了以后，乡村里恢复了平静，村民陆续回家，蔡季襄也回到家中，闻此噩耗，悲痛欲绝。这一悲剧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伤心痛哭，消沉了很久很久。

谈到蔡季襄买卖出土文物的事，也有不同于一般古董商人之处。长沙古为楚域，历史悠久，两千多年以来，在长沙城内外，到处都有古文物出土。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有一些以专门盗掘古墓为生的“土夫子”，经常盗掘。这些人将古墓中的文物盗掘出来卖给古董商人。那些古董商大都只懂一点皮毛，见识浅薄，只图赚几个钱又转手卖出，因而将收购价压得较低。蔡季襄却不吝小钱，只要他对出土的文物中意，多花点钱他也乐意，故而那些盗墓者都乐于同“蔡四爷”打交道。每当有文物出土，必先送到蔡家去兜售。

蔡季襄在长沙收购文物，他还喜欢研究文物，一旦遇有他感兴趣的文物，他肯下功夫考证一番。可惜他旧学根底不深，常有弄不懂的，但他能虚心向别人求教。有关文献考据方面的，他就求教于著名学者徐桢立和钱无咎；关于如何采用科学方法保养质地不同的文物，他就去求教于湘雅医学院化学专家任邦哲等人。

在1949年建国以前，历朝政府对于国家文物没有严格的保护措施，市场可以将文物自由买卖。因此，蔡季襄以大量的资金收购出土文物，有时成批运到上海销售，常获巨利。而他每次都将所得巨款花消在女人身上，直到挥霍一空之后，还得向别人借旅费返回长沙。他对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丝织品、古钱币、古兵器等各类文物都很有研究，并且还写了不少的研究文章，对鉴别各类出土文物独具眼力。在他一生中，有几件最珍贵的文物考古发现。

第一件是战国时期的缯书。这件文物是1946年在长沙出土的。缯即指丝织物，“缯书”即写有许多文字的丝织物，它的形式颇为特别，在不足一市尺见方的丝织物上，东南西北四边都分布着一组一组的文字，排列不甚整齐，中间还夹杂一些形状古怪的图画，并着有色彩。那些字都是尖头尖尾的篆书，很

难辨认。因为战国时代的文字没有统一，这上面写的是当时楚国的文字。据他考证，这是楚国人的护身符。楚人迷信鬼神，生时随身佩戴护身符。人死之后，习惯用各种方式避邪、镇墓，保佑死者魂灵安宁。宋玉作《招魂》，也就是向东南西北四方呼唤迷途的魂灵，使其“魂兮归来”。这缯书就是覆盖在死者身上用以护身的。它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唯一写在丝织物上的战国文书。当这件珍贵文物被蔡季襄发现后，他如获至宝，细心将它洗漂干净晾干，命其子摹制了一幅，欣然带到上海。许多知名之士都想一睹为快。缯书到了上海的消息不胫而走，此事为美国间谍柯克思所知，便千方百计与蔡接近，并表示愿出二万美元将缯书收购，被蔡婉言拒绝。但柯克思并不就此罢休，更加对蔡亲近。一天，柯克思邀蔡赴宴，两人谈得很投机。忽然柯向蔡诡称：要借缯书拍一张照片，照完立即送还。并交二千美元作押金。蔡季襄一时糊涂，居然同意，柯抓住机会缠着他，随即同蔡去取。就这样，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落入了美国间谍之手。柯将缯书骗到手之后，立即带着这件文物逃往海外去了。蔡受骗之后，一连几天从早到晚丧魂落魄，彷徨在上海街头。蔡在上海的熟人很多，在一些古董商支持下，还抱一线希望，向美国驻华使馆指控柯克思诈骗，要求将原物追回。可是美使馆置之不理。蔡最终只留下了他儿子复制的那个摹本。这个摹本失去了原物的神彩，更失去了原物的文物价值。建国初期，郑振铎在编《历史参考图谱》时，也就只好采用这个摹本的影印本了。这是蔡季襄一生中的又一大恨事，他谈起这些，常流露愤激之情。

蔡季襄发现的第二件国宝级文物，是战国帛画。帛也是指丝织品。帛画即指在丝织品上作的画。这件文物是 1949 年初在长沙市郊外陈家大山一座战国墓中被盗掘出土的。盗墓者当时并没有发现这件东西，那些人只注意有没有铜器，可是同墓出土的尽是一些陶器。这件帛画混在泥水中，已络成一团，盗墓者不留心，将它抖落在一只陶坛里面，当时都没有发现。当他们将这批陶器拿到蔡家求售时，蔡见有几件陶器造型完美，就多给一点钱收购了这批东西。

事后，蔡将这批陶器逐件把玩，在一件敞口陶坛里发现了一个泥团露出一角丝织物，凭着他的经验，便提来一桶清水，将泥团泡在水里，轻轻拨动，泥团渐渐松开，丝织物更加明显，细看丝织物上有笔墨痕迹。他用一支干净的毛笔将丝织物轻轻一扫，清水变得浑浊，他换上一只搪瓷盆，倒入清水，用一张白纸将丝织物轻托起来，再放入清水盆中，画面浮在水中更加清晰了。这时，他高兴极了，再用一张白纸将丝织物托起晾干，原来是一幅战国早期的帛画，是随墓主而葬的铭旌。这一发现，总算是缯书被骗走以后的又一大收获。

这幅帛画是以墨色线条造形手法画的墓主人侧身像。墓主人长袍细腰，头发盘髻，双手合掌作虔诚祈祷状。她长袍拖至地面，前后襟脚张开作喇叭形，袍服上画卷





曲云纹，袖口用黑白相同的斜线纹为饰，领口和腰的前后与下边沿，均以黑色块面为饰。画的线条笔力稚弱，人物形象古拙。在人像的上面，画有一只凤鸟，身姿矫健，双足前屈后伸，作展翅腾空之势。在凤鸟的前方，画一条龙作扶摇直上之势。但龙身形体较小，似处于弱势。全图表示了祈神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的意境。

1950 年，蔡季襄因长期买卖出土文物的劣迹被公安部门侦悉，同年冬天，长沙市公安局将他逮捕，所有文物全部没收。直至 1951 年春，经省文物委员会请求保释，被扣留的文物，包括那件战国帛画，全部移交省文物委员会。

第三件重大发现是战国时期的一支毛笔，这也是全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唯一的一支毛笔，1954 年 4 月在长沙市南郊左家公山一座战国武士墓中出土。由于墓内竹筒、竹篓之物较多，出土时工作人员粗心大意，当时只注意墓主人的遗骸及大件殉葬物如铜剑、铜矛、皮甲等，而将一些竹头木屑之类的东西混杂于泥浆中，一时没有发现什么文物。这些东西随时都有被当污朽废物而抛弃的可能。又是蔡季襄，以他丰富的经验，用大大小小几盆清水，亲手将这些泥浆杂物逐一放入水中清洗了两天。他从一节小竹管中清理出一支毛笔。他又一次感到无比的欣喜。

长期以来，各类古籍都认为中国的毛笔是秦将蒙恬发明创造的，虽有不少学者表示怀疑，提出异议，但是没有物证。这支毛笔的发现，至少说明这是战国时期的毛笔。不过这次发现的战国毛笔，与后来人们使用的毛笔有不同之处，这支战国毛笔是实杆的，即用一根圆柱形的木杆，将一端削成半寸长的（铅笔芯大小）作成杆芯，将理好了的笔毛裹扎在杆芯周围。后来使用的毛笔是空管式的，将笔毛理扎好之后，塞入竹管内的。比较起来，战国毛笔毕竟简陋多了。传说“蒙恬以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谓之苍毫。”这也许是蒙恬对毛笔制作的改进有功吧！而这次毛笔的发现，又不能不归功于蔡季襄。

蔡季襄对于出土文物不仅精于鉴别，他还会修理和保养，他也写过不少文物考古方面的文章。1955 年肃反运动中，他因历史问题受到审查。专案组有个青年勒令蔡季襄交出全部笔记、文稿。这个不学无术的青年将蔡的所有稿件取走以后，直到肃反运动结束，蔡回到了原工作岗位，他还是不将那些稿件退还给蔡，居然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文章改头换面，署上自己的名字公开发表。事后蔡才知道，但不敢得罪这个小小的新贵，只是背地里气愤而已。因此，蔡季襄在文物考古方面的学术成就，很少有人知道。

蔡季襄在湖南博物馆退休以后，基本生活虽已有了保障，但第三次婚姻却很不理想，后妻和养子常在生活方面使他为难。1978 年他瘫痪在床，饥不得食，渴不得饮，于 1981 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作者系湖南博物馆退休干部）

# 湘剧名票胡绳荪

胡渐逵

我的叔祖父绳荪先生，号镜庵，清末民初寓居长沙市通泰街五福堂。叔祖父何以名绳荪呢？因为他的曾祖父达源公为清代嘉庆己卯科探花，亦即清代湖南第一个探花，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总管太子东宫事务。所著《弟子箴言》一书，融会先儒诸说，语皆心得；又有《妙香室文集》行世。绳荪先生的祖父林翼公，是与曾国藩齐名的湘军名帅，官至湖北巡抚，有《胡文忠公遗集》行世。《诗·大雅·下武》有"绳其祖武"一语，"荪"乃香草，故"绳荪"有继承祖先香泽之意。

叔祖父绳荪先生寓居之宅名五福堂，该堂何以名"五福"呢？因为咸丰皇帝念胡林翼战功卓著，故御笔钦赐他五个"福"字。据《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攸好德"即谓所好者德，"考终命"则谓老而能善终其命。皇帝钦赐胡家五个"福"字，祝胡家五福俱全，这的确是极为难得的殊荣。

绳荪先生中过秀才，颇多才艺，会唱湘剧，于清末在五福堂组建全国第一个湘剧票友社闲吟社。他擅长演小生，不但扮相俊俏，而又嗓音嘹亮，身段优美。闲吟社演员阵营强大，道具服装齐全，演出很受欢迎。从清末到民国二十几年，该社成员不仅每逢喜庆日子在五福堂唱堂戏，而且还经常对外演出，从来不要报酬。绳荪先生的拿手好戏是《三堂会审》和《打猎回书》，扮王金龙和刘承佑，简直把人物演得活龙活现，因此受到行家的一致夸奖。已故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徐绍清先生当年常到闲吟社唱湘剧。1954 年初夏，我在湖南省民族歌舞团任歌唱演员，因此有幸和徐老一起代表湖南文艺界在军区大礼堂演出，招待朝鲜访华代表团。当他向我谈及闲吟社的演出活动时，对绳荪先生的表演艺术仍然赞不绝口。

绳荪先生不但粉墨登台唱湘剧，而且还从事戏曲研究、创作。1921 年，他与友人赵少和编印了《湖南戏考》，除搜集整理传统地方戏剧本以外，还和闲吟社戏友根据《红楼梦》中的情节新编湘剧弹腔《探晴雯》等剧本。清末民





初，湖南各剧种均拥有大量的地方戏剧本，仅长沙湘剧高腔和乱弹剧本就有四五百种之多。在《湖南戏考·自序》中，赵少和详述了他与绳荪先生集成湖南地方戏剧本的经过：

> 爰搜求现行各脚本，除淫词俚曲、大戏正本外，得高腔、乱弹计四五百种。惟是一般伶工前传后教，以讹传讹，习惯自然，牢不可破。今欲彻底更张，俾成完璧，诚非少数人心力克奏敷功，尤非数十载时期难收效果。用是与胡君镜庵共事搜罗，稍加润饰，删繁就简，纠谬补遗，选定三十余集，络绎刊行，命名曰《湖南戏考》。

由于闲吟社的演出、创作活动和《湖南戏考》于收集、整理湖南地方戏剧本贡献颇多，因此，著名戏曲理论家周贻白所著《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和湖南地方戏曲研究专家龙华教授所著《湖南戏曲史稿》，对绳荪先生所从事的戏曲事业，均作了很高的评价。

绳荪先生的嫡孙胡再成今已年逾古稀，早年毕业于唐山工学院，现定居台湾，一生从事高等教育和建筑工程事业；绳孙先生的嫡曾孙女胡静芬在美国获理科博士，现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于其祖先，诚可谓绳其祖武，懿行兰荪。

（作者系本馆馆员）

# 送别俞润泉同志

李　锐

俞润泉同志是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但当时我们并不熟识。那是1949年长沙刚解放时的事了。我是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的社长，报纸创刊的同时，就通过地下党的有关同志，筹办起这个训练班。润泉就是当时考入新干班的140个学员中的一个。我日夜忙于写社论、管版面，没有怎么过问这个训练班的事，同学员们没有直接的接触。那时我三十出头，学员多是二十左右。多年之后听润泉说，他对我不多的几次讲课是留有印象的。我想，这就是他后来乐于同我接近的原因吧。

我于1950年底调离报社到省委宣传部，随后1952年秋调北京，转到工业部门工作。就在我们党走着一条曲折道路的20多年里，报社的许多人，1959年后我自己，都经历了其间的种种坎坷与苦难。润泉应该算是其中受害最重的人之一，因为从三反运动开始，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到“文革”，每一次都冲击到他。他是世家子弟，有名士气派，根本与数字、钱财无缘。三反时，他在副刊部管读者群众的“抗美援朝”捐款，一同钱沾了边即“反贪污”，由于说不清，逼得喝洁净剂，以自杀证明自己的清白。后来的长期徒刑，劳动教养，劳动改造，他都经历过。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才还他清白之身。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同他有直接的交往。

“文革”期间，我曾在秦城关了八年。由于知道长期单监会导致失语甚至得精神病，为了脑力不衰，用“奇墨怪毫”保留了四五百首旧诗词。1979年初回京复职，经过朋友们建言，将之打印出来。其中有二三十首以“龙胆紫集”名义，在《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整版。湖南的老熟人老朋友知道了这一情况，就热心出版这本诗集。他们提了不少的好意见，最积极的就是润泉等几位，他写过好几封长信给我，从编排的次序直到版式，以及若干词、句，都有具体的考虑。1980年集子出版时，我在“后记”中写到：“湖南人民出版社收到稿本后，特组织家乡故旧审阅、聚谈。”“俞润泉、钟叔河、朱正三位出力尤多：编目分类，逐首评价，订正格律，直到推敲词句。”（这个集子1980年初





版印了两次，共1300册）。

从此，润泉同我就有书信往来。《龙胆紫集》里有一首词，提到我大姐在长沙熬了菌油，带到流放地给我吃。一次朱正从长沙来北京，他就托朱正带来满满一瓶菌油。礼尚往来，我也把瓶好酒捎去，知道他有此嗜好。不久就听说他患了喉癌，使我极为吃惊，这是一种难治之症，所幸的是手术还成功。大概是1983年，他出院之后，在夫人的陪伴下来了一趟北京，到我家来了。他已不能发声，我们只好笔谈，感到他的情绪还是乐观的。他告诉我，住在一家澡堂兼营的旅店里，当然是为了节省一些。于是我让他们搬出来，住到我们机关的招待所，由我来结账。我的好心老伴还炖了一只鸡送上，让他们更高兴一些。

润泉也好诗词，勤于执笔。他对饮食文化很有研究，自己也会烹调，为此向有关刊物投稿，还出版了一本《湖南饮食丛谈》（让我题的书名）。晚年在病中，他还为我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参加选注《李锐诗词本事》。这事最初由李冰封同志倡议，具体工作是他和胡遐之、谌震、朱正几位做的。他们从选编到注释本事，很负责很细心。此书2000年在岳麓书社出版，装帧也很讲究、很快就卖完了。许多“本事”是润泉执笔的，看来，他对我的一生和为人等等。是相当熟悉和了解的。“小引”中说：“让既可以欣赏诗作，又可以了解作者生平。既是一种诗话性质，又是一种别开生面的传记。”记得润泉对我说过，抗战期间读中学时，他曾是我大姐的学生，对我的家庭情况早就知道一些。他也关心我在武汉大学时的情况。在信中谈到同在台湾的苏雪林有通信来往；由于亲戚关系，同杨端六的女儿杨静远（母亲袁昌英）很熟。（杨是当年武大的法学院院长，袁、苏都是文学院教授，早年女作家。）不了解我过去的历史情况、人事关系，不熟悉我的许多著作，那些长长短短很是中肯的“本事”是写不出来的。关于“咏庆父”两首近2000字的解说，润泉于文末写道：“这一段‘本事’纯系笔者的研究与考察，文责自负。”这真是难为他了。读者真应当感谢他。因为这两位人物同当代国事的兴衰关系至大也。这本《李锐诗词本事》早就脱销，还不断有人向我索取或托我买这书的。

湖南的著名诗人胡遐之前两年去世了，现在又轮到了润泉。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小10岁左右，老天呵，真不能不产生一种人生无常的感觉。“胡杨泪”的主人钱宗仁去世时，我的悼诗中有句：“最怕衰年哭壮年。”辛弃疾诗云：“白发多时故人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吧。

润泉的亲友要为他出纪念集。叔河来电话，嘱我作文，当然义不容辞。现在来不及找出他给我的许多信件，寻求往事的回忆，只能写出上面这几件交往的点滴情谊，为他送行。润泉的经历，一个有才华有志向的人，一生盛年未能

展其才志，只不过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同小异的遭遇中的一例。每一个后死者的责任，就是不要忘记这些事情，尤其要努力彻底消除当年发生这些事情的环境和原因，这样纪念死者才有意义。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 从周达武故宅谈到长沙蜕园

## ——关于刘蜕的故事

谭绪缵

读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友朋书札》，其中载有陈寅恪先生一札，有云："援老（指陈垣先生）所言，殆以丰沛耆老。南阳近亲目公，其意甚厚。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风水亦不恶，惜艺耘主人（援老别号）未之知耳！一笑。"信中所言丰沛，是汉高祖刘邦出生发迹地，南阳，乃东汉光武刘秀出生腾达之区，两处都是"风水宝地"，出了两个有名的开国皇帝。然则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又有何"不恶之风水"，出了什么伟大杰出的历史人物呢？这就是本文欲谈长沙蜕园关于刘蜕故事之起因。

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处城西北湘江之滨，即今长沙市周南女中所在之处，唐时为著名文学进士刘蜕复愚所居，人称蜕园。此见《长沙县志》卷二十三《古迹》，云："刘蜕故宅，在县城西北湘江边，唐进士刘蜕所居。"清光绪年代，据称明藩吉王之后裔，有名周氏达武者（按明亡以后，吉王之裔遂将国姓"朱"改姓周，周字含"吉"，犹存其意），本宁乡人，因家贫佣工，乃投湘军，后因战功，擢升甘肃提督，并"晋尚书衔"，于是在长沙通泰街买地置宅，称蜕园。陈寅恪先生之祖右铭中丞曾赁居此宅，其《侨寓湘中六十初度咏怀》自注："时赁居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提督宅，即唐刘蜕故宅地也。"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上）。寅恪先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生于此宅。

蜕园即刘蜕故园，刘蜕何许人也？有何伟业？又如何成了湖湘文化中的杰出历史人物？此必须从"破天荒"一语的历史典故说起。此典一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二，再见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前书云："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850年），刘蜕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时崔魏公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蜕，蜕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日天荒。'"后书云："唐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蜕始及第，号为破天荒。"以上两书所载，均以"破天荒"为称，此不可不首先了解所谓"天荒"之语意。

据汉王充《论衡·恢国》云："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内服，贡献牛马。"是天荒者，本指偏远未经开化荒外之地，自然亦非中原文化可比为人文荟萃之所，五十年以来解送举人，多不成名，无有及第者，所以号称"天荒解"。

提到解举，此不可不涉及唐代之科考制。唐代科考，名目繁多，而以明经、进士两科为最重要。明经因试帖经墨义，重在熟背群经，士子专门究心于章句之间，于文学无所创发，故多不为时人所重。而进士一科，则侧重诗赋词章考试，讲求词藻格律，发挥个人才华，以文学取胜，故为举子所趋。又因唐代名臣亦多从进士出身，其影响所及，故追求进士及第，又成为士人终生奋斗之目标，但能及第者常百不一二。故时谚有"三十老明经，七十少进士"之语。由此可见，唐代科考进士及第之难。刘蜕以被目为天荒荆南之地的长沙人，能于唐宣宗大中四年，一举府解及第，其出类拔萃，是可知矣。不独打破五十年来"自是人废"的局面，并且获得荆南观察使魏国公崔铉"以钱七十万资蜕"之重奖，而"破天荒"一语，因是广为流传，成为典要，至今不衰。

刘蜕既以文学进士名家，其诗赋辞章如何？著述怎样？因现存资料尚感不足，须待进一步研讨. 仅知《唐书·艺文志》载有《文泉子》十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曾著录："《文泉子》十卷，唐中书舍人刘蜕复愚撰。"言甚简略。且十卷之本，存世不久，亦多亡佚。明崇祯时，闽人韩锡重事搜采，仅辑成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一《别集》四云："《文泉子》一卷，唐刘蜕撰。蜕字复愚，长沙人，大中四年进士及第，咸通（唐懿宗年号）中，官至左拾遗，外谪华阴令。"又云："观其命名之义（按：指《文泉子》书名，其义为'覃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义曰泉'）自负良厚。其《文冢铭》最为世所传（按：《文冢铭自序》文，可在明湘潭人周圣楷所撰《楚宝》卷十七《文苑》查阅）。他文皆原本扬雄，亦多奇奥；险于孙樵，而易于樊宗师，大旨与元结相出人，欲挽末俗反之古。"综上《提要》所载，较陈氏《解题》之著录为详，除得悉刘蜕其人之里籍、官位、经历及其为人自负外，并对其为文之旨，有所评论。约而言之，即可以"奇、奥、幽、险"称，而其立意重在"欲挽末俗反之古。"所谓末俗者，系指唐末文风崇尚绮靡而薄古雅。所谓"原本扬雄"，扬雄乃西汉著名辞赋大家，甚好古文奇字，其为人亦"好古乐道，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汉书·扬雄传赞》）至若孙樵、樊宗师、元结诸家，均在唐代以文章奇险著称，尤以元次山之文，"文章戛戛自异，变徘偶绮靡之习"，为挽末俗反古之古文大家。刘蜕为文大旨既与元结相出人，又"原本扬雄"，似此，刘亦应列人唐代古文大家一流。

刘蜕为文如此，为官怎样？咸通中官左拾遗，又如何外谪华阴令？此不得





不有所述及。刘蜕任左拾遗，本为谏官之职。时任宰相者令狐绹在位已十年，位高权重，其子令狐滈恃父之势，"骄纵不法，日事游宴，货贿盈门，中外为之侧目。绹党援方盛，无敢措言。"《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附绹、滈传》）。刘蜕本其职责，不畏权势，敢于直言严谏，极论令狐绹子令狐滈恃权纳货，把持选举之罪。其上疏文中有"大中之时，其父执政，传家乏子弟之法，布衣干宰相之权。疮痏者莫匪浮憎，进拔者悉皆有谓。凡四方节镇，价同交关；三署官司，专精与夺。潜行游宴，颇类优倡；鼓扇轻浮，以为朋党。筹谋日夜，聚蟁如雷；变化施张，赤地成海。天下侧足，有识寒心。"（《沅湘耆旧集》卷二）。此疏对宰相令狐绹及其子滈之不法，进行了猛烈的鞭挞，体现了刘蜕为官之刚直不阿。指斥了令狐绹之教育子弟无方，纵容了令狐滈之贪赃枉法，把持选举，卖官鬻位，以致政治黑暗，天下侧足，有识寒心。文字犀利，掷地有声。故邓氏显鹤对此疏 置评曰："其论令狐绹一疏，风骨棱棱，宜其文之拔俗千寻也。"（见《沅湘耆旧集》）

以上所述，刘蜕之为文为官如此，其被目为湖湘文化中之杰出历史人物，亦当毫无逊色。无怪陈寅恪先生言"长沙通泰街其地风水亦不恶"者，其来亦有自矣。

（作者系本馆馆员）

# 胡林翼对左宗棠的推荐与评价

胡有猷

郭嵩焘《胡文忠公行状》记胡林翼荐举贤才的情形说：

> 士有志节才名，潜伏不仕，千里招致，务尽其用，又密荐忠亮宏济之才十有余人，今多任封疆开藩者，……公所特荐十余人中，不尽相识也。

十余人中，有两位最出类拔萃者，即左宗棠和沈宝祯。胡在《敬举贤才疏》中说："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又说左"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说沈宝祯"识略冠时，才堪济变。"（见岳麓书社出版之《胡林翼集》卷一——编者。下同。）左、沈虽镇压过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统治，但于抗御外侮，却厥功甚伟，彪炳千秋。

胡林翼推荐左宗棠，真有逢人说项之概。这里先谈一下胡、左关系。二人既是两代世交，又是相契同窗，均受业于湘籍名御史贺熙龄门下。左祭胡之文（见岳麓书社出版之《左宗棠全集》卷二）说："詹事文学，读书麓山。两家生子，举酒相欢。"胡的父亲达源公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左父是秀才，少年时代，两个同在岳麓书院读书。左、胡均生于1812年，都是少负才气，有不可一世之概。故左祭胡之文说："纵言阔步，气豪万夫。我骂公骂，公步我趋。群儿睨视，诧为迂怪。我刚而褊，公通且介。"左有困难，胡极力帮助。左屡次会试不第，后在陶澍家教馆，家里很贫寒。其时胡在贵州黎平任知府，经济上常给他支援。故左说："岁比不登，盎无馀粮。使来自黔，缄金贶我。欣欣度腊，返券举火。"（祭文）

后来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任事很有魄力，故为将吏所嫉。有一次骆秉章劾樊燮，燮疑左从中怂恿，燮与湖广总督官文都是武官班子（官文先是荆州将军），背景很大，因此樊燮讼左为劣幕，说左揽权估势。官文偏听樊燮构陷，故要加罪于左[1]。其时左宗棠已离开骆幕，将赴京暂避风险，路过湖北襄阳。胡林翼正在湖北，驻军英山，于是立即派人劝阻左宗棠入京，恐其受害。这段史实，在左祭胡之文中也曾简述："我方忧谗，图隐京门。晤公英山，





樽酒相温。公悯我遭，俯焉若蠹。忧蕴于中，义形于色。"

胡林翼与官文颇相得，遂向官文说情。后来左宗棠不但没被诬陷，相反的坏事变好事，胡林翼约同曾国藩奏保左才堪大用，加之大理寺卿潘祖荫、南书房行走郭嵩焘均从中协助此事，因而终获解救。于是授左宗棠太常寺卿，襄办军务，督兵浙江，从此青云直上。

左宗棠在科场上是困顿多年的。他中举那次，原本已成落卷。按照以往规定，同考官未荐的落卷，是不再阅取的。恰好这年清宣宗（道光）有旨，特命同考官搜阅遗卷，左宗棠才从遗卷中录取。中举以后，他三次会试落第，情绪消沉。归家途中，经岳阳君山庙（即柳毅祠），一时兴起，撰写一联："迢迢遥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一时广为传诵。

左宗棠这次落第，不但不打算再去会试，甚至不打算再出山问世。他的夫人周氏很贤淑，且能诗，著有《饰性斋遗稿》。在他写给周夫人的信中，具体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情和打算：

> 榜发，又落孙山。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此次买得农书甚多，颇足供探讨，他日归时，与吾夫人闭门伏读，实地考验，著为一书，以诏农圃，虽长为乡人以没世，亦足乐也。君能为孟德耀，吾岂不如仲长统乎？（《左文襄公家书》）

左孝同《先考事略》说左宗棠"日巡行陇亩，自号湘上农人"。此时他尚无田庄，直至32岁，才买田成家。

当左宗棠隐居家乡时，胡林翼正在贵州黎平任知府。其时林则徐任云贵总督，张亮基任湖南巡抚。胡林翼多次向他们极力游扬推荐，并再三劝左宗棠出山。胡致左函说：

> 林翼曾荐于林文忠，文忠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去年冬间，以大名呈荐于程制军，而不能告之先生，固知世有不屑也。（见《历代名人书信续编》卷二上）

第一次胡林翼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其时左因家事羁身，故未至滇相见。但就在这年冬天，林则徐因病请求致仕还闽，路过长沙，故邀左在舟中长谈竟夕。（事见《左宗棠年谱》）

第二次胡林翼向程晴峰推荐左宗棠，其函云：

> 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即陶少云之业师，又其妻父也。在文毅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略，当为近日楚材第一。（见《胡林翼集·书信》）

此信中胡对左虽推许极高，但程晴峰不像林则徐那样爱才，故以等闲视之，并未接受。

第三次胡林翼向张亮基推荐左宗棠，函云：

前举衡湘之士七人……内有左子季高，则深知其才品超冠等伦……此人廉个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赏鉴。即使所谋有成，必不受赏，更无论世俗之利欲矣。（同上）

胡林翼推荐左宗棠，却唯恐他知道，因此又说：

季高处至今不能预告，恐其嗔林翼多事，而违其隐处之初衷耳。

张亮基思贤如渴，即专弁聘请，言听计从。左宗棠回胡林翼的信说：

比见石公于围城中，握手如旧，干以数策，立见施行，自此留置幕中。（见《历代名人书信续编》卷二下）

左宗棠由此始入仕途，若不是胡林翼苦口婆心力劝，他是不会轻易出山的。这从胡与左信中的一段话，即可说明这一情况：

……设程制军听予言而坚求先生，楚祸何至如此之亟。区区爱国爱乡里愚诚，未蒙深察，且加稍让，且入山从此日深，异哉！先生自为计则得矣，须知自古圣贤仙佛，英雄豪杰，无不以济人济物、损己利人为正道。先生高则高矣，先代积累二百年，虚生此独善之身，谅亦心所不忍出也。……张中丞不世奇人，虚心延访。处宾师之位，运帷幄之谋，少授修脯，或竟不受，均足以全其清节。（见《胡林翼集·书信》）

左宗棠入幕后仅两月，张亮基即调升湖广总督，因而邀左至鄂。孰料仅几个月，张又调山东，于是左便辞归。“自是匿居深山，誓不与闻时事。”（左《与胡润芝书》）继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再三专人登门敦促左宗棠就道，他却辞不获已，才勉为一行。

从咸丰四年到九年，左宗棠均在骆幕任事。骆对左信任备至，故左大权在握。

传说有一次巡抚辕门升炮，骆问何事，书差答是左师爷拜奏折。当时制度：奏折出辕门，必须升炮。这虽未免形容过分，夸大其辞，但也表明骆对左不事事过问，左可专权办事。

咸丰九年十二月，左宗棠已辞骆幕，又回乡隐居，终因忌妒者多，故有樊燮控告、官文构陷之事。左答毛寄云中丞函云：





宗棠以桑梓故，勉佐帷筹，九载于兹，形影相共。惟我知公（指骆），亦惟公知我。虽以此为媪相[2]所不容，为小人所共构，未敢以此几微变此初衷也。（见《历代名人书札续编》卷二下）

左宗棠早为陶澍赏识，士林传为佳话。当左掌教醴陵渌江书院时，陶回安化省墓，道经醴陵，因左呈陶一联[3]而得称赏，遂订忘年之交。《左文襄公家书》对此事虽有记载，但胡林翼事先业已先容，故陶对左早有好感。胡是陶的女婿，道光十二年（1832）后，胡在陶的两江总督署住过年余，常向陶称誉左的才识。而陶、左醴陵相识，已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陶若对左先无印象，也不至因一联激赏左，然而陶也确能识才。道光十八年（1838年）春夏之交，左第三次落第，返湘途中，绕道南京谒陶，这是陶、左二次相见。左在陶署中盘桓月余，受到殷勤招待。当陶大宴宾客时，请左上坐。左再三谦让。陶说：“这个两江总督，将来会轮到你做的，而且你的功勋，必在我之上咧！”

胡林翼对左宗棠评价极高，前文所引推崇之语，可以概见。胡甚至称许左：“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观《胡林翼集·书信·致郭嵩焘函》胡在肯定左的才识时，也能指出其缺点，而于指出其缺点时，又不抹煞其优点。胡林翼认为：“君子之论人，亦观其大者实者。”他在《敬举贤才疏》中，说左“其刚直激烈，诚不免汲黯太戆，宽饶少和之讥”。又在致罗少村信中赞左是“以浩气举事者”。（见《胡林翼集·书信》）因此，对左的偏激性格，能从本质上去看。从外表上看，左宗棠虽恃才任气，但其本质上却纯真可靠，临大节而不可夺。左后来在新疆向沙俄争回伊犁，威武不能屈，正是这种性格的表现。胡曾在致曾国藩的信中说：

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诤臣，室有烈妇。平时虽小拂意，临危乃知其可靠。（见《胡林翼集·书信》）

至于对左的短处，胡一语道破说：“公生平所欠，惟知人之明一着。”（同上）胡于致郭意诚信中说：左“有误用人之处，不肯自承其误”。（同上）胡还告诫左不可居功自傲，劝他要能让美，须收敛其气。曾致函云：“让美扬善，学进而识量益宏。”[4]但左却很难做到。后来他从新疆回来，做了军机大臣，和人谈话，多是平回大功，甚至自夸说：“自汉唐以来，无此丰功伟业。”殊不知此说徒贻人讥。胡与左异，他主张为人应“收敛其气，开拓其识，事事必衷于是，事事不自以为是，虚心实心，相辅而行。”

## 注　释

[1] 樊燮构陷左宗棠一事，按《左宗棠年谱》说：“咸丰九年冬（47岁），公既久专军事，

忌者尤众。永州镇总兵樊燮以贪纵为骆公所劾罢，因构于总督（官文），首指目公。总督疏闻。命考官钱宝青即讯，召公对簿武昌。胡林翼力解之，得不逮公。”又咸丰十年，“正月，自长沙起行，三月丁卯，至襄阳。胡公林翼复以书来止公行。……公乃回舟汉川，沿行而下。”

[2] 媪相：对官文的鄙称。官文以大学士为荆州将军，后改湖广总督。宋徽宗时，宦官童贯官至太师，人因以媪相称之。见陆游《老学庵笔记》。

[3] 此联语是：“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4] 见《胡林翼集·批札》之《监利县禀呈现办各条清折批》。

（作者系胡林翼曾孙、本馆已故名誉馆员）





# 湘潭历史上的状元、榜眼与探花

赵　斐

封建科举考试，以殿试一甲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湘潭历代人文炳蔚，中进士者屡见不鲜，但中状元、榜眼、探花者却极少。屈指数来，仅状元、榜眼、探花各一人。

南宋时，湘乡金石大湖出了一位状元，名叫王容（1163—1206），原名午，字南强，又字南涧。少年时读书于县城涟溪书室，从学周奭。5岁时人岳麓书院，从师大学者张栻。曾读张氏所著《希颜录》，心慕之，因又取“希颜”为字。他励志芸窗，刻苦治学，而器识不凡，不久以《人君正心以正朝廷赋》中乡举。

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王容赴省试。相传其过袁州时，夜宿州东旅舍，梦中得《步蟾宫》词云：“玉堂此处春风暖，正飞絮马前撩乱。嫣娥剪就绿罗衣，待来步蟾宫与换。”省试中试后，他又以《文德帝王之利器赋》中进士。

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四月，王容年24岁，赴皇都临安参加了未科殿试。四月十七日，聚英殿廷对，王容上陈奏章三千言，忠爱流露行间。孝宗谓近臣曰：“王容之文质实。”对其赞誉有加。王容本第三名，孝宗亲擢为榜魁。王容遂作殿试诗以谢恩，诗云：“天上催班晓色清，五星伏尽极星明。奏章读彻三千字，胪唱传来第一声。质实两言虽朴语，始终大概悉真情。圣恩浓厚难图报，誓竭愚衷毕此生。”

王容殿试夺魁，是为隋代实行科举制以来湘乡第一位状元。当时湘乡文庙有门联云：“秦王容貌津津喜；黄甲科名鼎鼎来。”人传为王容大魁之谶。为志文运，湘乡人因于邑中塔子山建造文塔；又设状元牌坊，名其故地为状元坪，修状元塔，塔上镌刻楹联：“山有七星联北斗；名高一甲起南强。”下联嵌王容字。

王容官至议政大夫、礼部侍郎。孝宗帝倚为干城，常召对东阁。后王容出任九江知府，勤政爱民，兴学育才，开启民智，并作《建昌学记》，深孚地方

重望。

时南宋朝廷偏安江左，王容忠心辅国，屡上奏疏，陈述御伐之策，深切时务。其立身居官之大节，深为时贤推重。但王容力主用兵复仇，为主和派所忌恨而弹劾之，被贬为绍兴签判。赴幕之日，群僚作饯，陈傅良以诗四章赠行。

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 年），王容得人荐举，复被召回朝廷，任起居郎之职，掌记朝典，敕撰日历。

宋开禧二年（1206 年）五月，金兵南侵，觊觎江岸，半壁江山欲复已晚。王容忧国忧民，鼎力维持，心力交瘁，竟于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赍志而殁，年 44 岁。上谕葬于宁乡乌江天马山，入祀乡贤祠。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 年），赠王容为银青光禄大夫待制，编修《王光禄集》行世。相传宋理宗还亲临湘乡金石大湖状元府举行祭礼。

湘乡人为纪念状元王容，对状元坊、状元塔留意保护。明嘉靖年间重立状元坊，清张天麟《状元坊》诗云："尚有遗规在，魁名启后来。殿前批质实，江畔有真才。月冷亭亭影，云荒故故苔。更无王谢燕，重与叠新杯。"王容府宅尝掘得古器，其款识无宋以后年号。宅前有银杏一株，传为王容亲手所植，荫十余丈，夏日里人恒游憩其下。银杏已历八百载，今被湘乡市作为重点文物永久保护。

龚承钧，字湘浦，湘潭县人。生卒年不详。父龚士璈，勤劳朴俭，有隐德，乡里深孚众望。

龚承钧倜傥开朗，在诸生中无儒缓之习。清同治二年（1863 年）应试恩科，中进士，为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为湖南得榜眼之始。九府人士争相赞美，在湘富豪显贵馈贺至万金。龚承钧更加谦恭退让。在翰林院潜心批阅文字，留意时事。他工诗文，励学行。旋任山西学政，选拔寒士，涤除弊窦，督学甚力。开科考试，取不及额，遂阙之，以戒滥侔。后改任监察御史，奏劾四川吏治纵弛，及总督私人；又奏劾湖南军将放恣奢僭，事及巡抚。

龚承钧身材颀长，容光焕发。光绪皇帝奇其貌，每召对于朝廷，必问其所养，以为堪劳剧。于是口诏命其随巡京城，拟游百川。龚承钧感励勤职，被寒发疾，一夕卒，同朝官吏皆惊惜之。现湘潭市城正街三义井附近有龚氏故宅，风貌犹存。

石承藻，字黼庭，湘潭县仙女山石家坊（今响塘乡日新村）人。生卒年月不详。明按察副使石万程之六世孙。其父石养源，清乾隆四十年进士，授洛川知县。

石承藻少孤家贫，励学进取。清嘉庆九年（1804 年）中举人，十三年（1808 年）成进士，以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调文颖馆，协修《治河方略》。后改监察御史、给事中。《清史稿·石承藻传》称其"敢言有声"。石承藻以文学起家，博览多所通解。其状貌魁梧，为人坦率，崇尚气节，豪气干云，常高谈阔论，语惊四座，无徐步雅语之态，人称"石猛"。

石承藻任御史时，一日巡视京城，入广慧寺，惊见刑部尚书金光悌头顶一水碗，跪于一人面前求医。石承藻上前一呼，金氏大惊，水碗覆地。后查得医者名王树勋，原系广慧寺僧人，扶乩卜筮，勾结官僚，曾被杖遣还俗，复纳资为官，结纳权势，扬言知祸福、治难症，不改故态。清嘉庆二十年（1815 年），石承藻疏请澄清品流，弹劾王树勋及金氏。嘉庆帝褒奖曰："真御史也！"王树勋遂被革职，枷号两月，发配黑龙江充苦役；尚书金光悌因已死，免议；侍郎蒋予蒲、宋镕等被革职或降职。石承藻以此名动一时。旋转官兵科给事中，又迁刑科掌印。因耿介直言，无所顾忌，招致权贵怨恨。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湘潭商民与江西客商发生哄斗，同邑吏部侍郎周系英与湖南巡抚吴邦庆互劾。石承藻时在家居丧，周系英之子周汝桢致书石承藻询问情况，吴邦庆揭发此信，致石承藻遭牵连降职，调光禄寺署正。服满，不敢居家，遂留京师。清宣宗即位，欲起用石承藻，有人说其刚猛不可用，遂罢。卒年 60 余岁。

石承藻工诗文，著有《桐叶山房诗集》14 卷，后人亦辑有《石给谏奏议》一卷，今已散佚。所撰联语典雅清丽，简洁明快。位于湘潭市中心之雨湖，有"双璧无瑕"牌坊。传说清嘉庆年间，有两少女被骗入妓院，因洁身自好，不甘受辱，双双投雨湖而死。石承藻撰二联云："不及黄泉焉避害；有如白水表同心。""青冢芳魂留片石；白波明月照双娥。"嵌于牌坊两旁楹柱上，保存至今。

（作者系湘潭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

# 旧时代的帮会

李寿冈

## 一、引言

旧《辞源》："哥老会，或称哥弟会，一秘密会党也，或谓其成立在乾隆间。同治时，湘军撤营，穷于衣食，多人此会，于是益盛。以赌博盗劫为业者曰红帮，其贩运私盐者，曰青帮，亦曰安庆道友。"

旧《辞海》："红帮，会党名，哥老会之嫡派，为林钧所创。相传初起于洪钧老祖庙内，名曰洪帮，旋称洪门。同以赤心相待之义，改洪为红。其后又称始祖为殷洪盛。徒众较青帮为少，帮规较青帮为严。"又："青帮，会党名，哥老会之旁支。清陈园所创，以安庆道友会为基础，故又称安庆道友。徒众昔皆以运漕为业，岁居粮船，故亦称粮船帮。大江南北，人帮者颇众。"

这些解释都是道听途说，并不确切。七十年前，《湘潭民报》登载过陈浴新发表的有关洪门的连载。六十年前，上海出版过《帮》。解放后的《文史资料》，发表过谭人凤于清末联合全湘洪门，在岳麓山召开大会的记载。就记忆所及，结合残缺的笔录资料，择要介绍于次，不妥和疏漏之处，请读者批评教正。

## 二、洪帮

洪帮原名洪门，是明朝遗民为反清复明而创立的秘密组织，洪门取义于明太祖洪武年号，隐含纪念明朝之意。奉洪英为始祖，长期流传的内口号是"明大复心一"，即以"一心复大明"为目的。帮中举行重大仪式，一定空出中央，表示不做皇帝，留待明皇室子孙正位。在长期流传演变中，有种种不同名称和分支，如三点会、三合会、汉流、袍哥、哥老会、哥弟会。讹为锅底，像圆圈之形，在湘潭者称圈子会，或谐音称红帮，最后沦为反动的帮会组织。

传说有反清遗民集结于少林寺，被清廷侦知，发兵包围，结果多数人被剿灭，寺院焚毁。有 18 个人杀出重围，且战且走，续有伤亡，最后留下 5 人：





蔡德英、方大成、马超英、胡德帝、李式开，后称为前五祖。五人来到南方海滨，走投无路，拟一死报国。遇见明故将万云龙（原名胡德起，后尊为万云龙大哥），劝止他们走绝路，一同到陈近南先生家里，共商大计，议定规章制度，决定分赴全国各地，成立山堂，发展组织，把反清斗争进行到底。一说郑成功建立金台山明远堂，洪门是他创始的，万云龙是他的部将。帮中尊洪英为始祖，郑成功为武宗，史可法为文宗，万云龙为达宗，天佑洪（原名苏洪光）为威宗，陈近南先生为军师。后来又有"中五祖"：吴天佐或士佐、方惠成、张敬之、杨信佑、林大红或大江；"后五祖"：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这些历史事迹、人物名称，连同创立时制订的三十六条、二十一则、七十二款、十禁、十刑等规章守则，为保密起见，都是口口相传。又有诗曰：

五祖赐我天下同，文凭藏在我心中。位台若问根源事，三八廿一（隐洪字）共一宗。

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得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

前五祖分赴全国各地成立无数山堂，发展组织，凡人帮者为"自家人"，相见时"对实"，就是通过问答，考察上述内容和诗句，像对暗语口号一样，证实是否自家人。后来根据《金台山实录》加以改写，记载了有关历史、人物、规章、切口（暗语）等，称为"海底"，又名"金不换"，为各山堂秘本。人会必举行隆重仪式，称为开堂放标，预定日期成批接纳新成员。在山野荒僻之地，划定临时禁区，派人把守，不许"玲拢码子"（官府密探）、"歪崽子"（帮外人）进入。开始哈喝"东方开口子"，依次南、西、北方开口子，引新成员从各路列队入场。场中央立一只斗，上书"木阳"二字，左右陈设旗帜、武器，气象森严，谓之"打木阳城"。对人帮者考问三大信条、三十六誓、七十二条例。如下问答：一、问拜会何事？答反清复明。问有何为证？答有诗为证：反斗英雄在木阳，清君无道甚猖狂。复得洪门兴社稷，明兵发动覆蛮邦。（此诗藏头含"反清复明"）二、问剑与头谁硬？答头硬过剑。三、问：兄弟吃的三分米、七分沙，你能捱得？答：兄弟能受，我亦能受。四、问：你有何武艺敢来投军？答：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文武全才。然后斩鸡沥血，共饮血酒。帮中一切听命于山主，互相以兄弟相称，强调亲如手足，有无相通、急难相助、旅行在外，到处有自家人供应食宿。山堂有重大问题，须经内八堂议决。违反帮规，处罚很严。

如有人犯"同穿绣鞋"（即与帮中兄弟之妻通奸）应处死，由自己选定投水自杀。在众目睽睽之下，向马福益告别。那青年说：来生再来听大哥将令。

马说：兄弟，只怪你生得一副好身材、好面目！我送你一程。于是，一前一后缓缓走向水边，那人行礼后，回身跃入水中，立即淹没，但见大水茫茫一片。

相见行军礼，两手相接拱于胸前，右手握拳，左手竖掌，谓之“扯拐子”。香堂供三把半香，一把香供奉羊角哀、左伯桃，二把香供奉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三把香供奉梁山泊好汉，半把香供奉瓦岗寨秦叔宝、单雄信（因友谊不终只半把香）。暗语切口如：武差事指抢劫，文差事指赌博，白叶子指刀，开花子指灯，撑花子指伞，丢线子指解溲，等等。每个山头内八堂分十排：山主、副山主（龙头大哥）、香长、盟证（客卿）、座堂（宰相）、陪堂（副相）、管堂（人事）、执堂（总务）、礼堂、刑堂、心腹（护印，护剑），以上都是大哥，对外称大爷。外八堂也是十排：心腹大爷（带尚书衔的外江总督，即内八堂最后一排的幺满子，转为外八堂的大爷）、圣贤二爷（军师）、当家三爷（粮台）、金凤四姐、村旗五爷（以及蓝旗、黑旗，负责中军、号令、执法）、巡风六爷（以及花岗、青岗，负责守备，巡查）、银凤七妹（未婚女子、散将）、镇山八爷（以及守小、巡检、白衣，负责守将）、江口九爷（以及检口、守口、斗口，负责山口把守巡逻），大满、小满十爷（以及铜章、铁印，如九门提督，负责侍卫）。发的凭证一般是白布，如 64 开大小，载明山、堂、香、水、口号。

近代民主革命家、同盟会员谭人凤，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邀请湖南各山堂大爷，在岳麓山会集，统一成立“岳麓山道义堂”，后改为联合山堂，酝酿反清革命。统一颁发凭证：眉栏四字横列：洪福齐天。中间大半幅一行直载：岳麓山/道义堂。两旁直载：左为兴汉香、右为华夏水。两旁对联直写：右为“岳峻湘清环大麓”，左为“祥光瑞气拥名山”。下拦中间 16 字分四行直书“乾坤正气/日月光华/黄农神胄/复我邦家。”右边一行上面横书“内口号”，下面直书“同心扑满”，左边一行上面横书“外口号”，下面直书“当面算清”。右外侧直书“天运甲辰”，左外侧直书“九九联盟”。

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很重视和联络会党，与同盟会同志刘揆一（在帮会中封为“恩兄”），到湘潭茶园铺与洪帮首领马福益会见。马福益接受了革命教育，决心投身革命，但不久被清朝官府逮捕杀害。刘揆一的兄弟刘道一，也参加了同盟会。于 1906 年，发动会党和矿工，举行“萍浏醴起义”，不幸失败，刘道一光荣牺牲。会党首领龚春台在这次起义中，称“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打出“平均地权”口号。失败后仍留长沙，后率众响应武昌起义。在此之前，浏阳忠义堂会党响应太平军，还有各地会党先后起义，以反清为目的，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到了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中湖南部分地区沦陷，湘潭一地有集中、





桐柏、两广金钱、兴汉、五圣等山头的圈子会，纠集人员枪械，以抗日为名，号称游击队，却游而不击，敛款自肥。逼迫农民入会，量资产收费，每人银洋二、三、四元不等。有的一人应缴银洋 30 元，全家三兄弟共缴 90 元，为保家保命只得奉献。有的绑票、抢劫，或火并枪战，更招致百姓怨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选总统拉票，指使清、洪帮联合。湘潭洪帮由张碧村为首，张投靠陇海路的向海潜，扯五圣山旗号，与情帮合流，局面一变。解放后，取缔反动帮会，经过登记、调查，坦白从宽，惩办首恶，不问胁从，清、洪帮就烟消云散了。

## 三、清帮

清帮，原名安清帮，帮中自称安海道友，讹为安庆道友，后以同音通称青帮。一说创始于乾隆时，一说到嘉庆、道光时才有的，由清皇室一个没落的王爷发起。或云创始人名翁乾潘，原是洪门中人物，在北京被捕投降，为清廷效劳，组织运粮船帮而成。一说帮中供奉的祖师三位，翁、钱、潘三姓。从命名安清看出，与洪帮的反清立场迥异，专为对付秘密会党而成立的，目的在于维护清皇朝政权。起初只在运河运粮船夫中发展，所有粮船桅杆上高揭“天庾正供”的旗帜，宣布了保证皇家粮仓的供应、为朝廷效力的宗旨。初起有 108 帮，占有 128 个码头，在太平军起义战争中，被太平军所拔除，只剩二十几个帮、七十二个半码头。据所知有江淮泗、兴武泗、兴武六、嘉海卫、嘉白、杭三等为六大亲帮。共同供奉的祖师有罗祖，翁钱潘祖。入帮应拜师，称师父为家长、为老头子，一代代论字排辈。前 24 代的字辈是：“清静道德，文诚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悟学。”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定号寒云，在天津入了清帮，不知什么字辈，死时住在大酒店，穷得剩八个银元。但帮中徒子徒孙多，为他操办丧事，据说比他父亲还热闹。上海滩上的黄金荣、张啸林、季云卿是“通”字辈，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拜在季云卿名下，该是“悟”字辈。杜月笙拜在黄金荣名下，也该是“悟”字辈。后来又规定后二十四代的字辈：“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代发修行。”还有再续的二十四代字辈：“绪结成计，昆芮克勤，宣华转枕，庆兆拔魁，宜燕夜存，换香同流”，以为万世不祧，殊不知逢到解放就传不下去了。

入帮必须有分属三个帮的本命师父、引进师父和传道师父认可，点起大蜡烛，师父端坐当中，徒弟行三跪九叩首之礼。规章戒条有 40 项：

### （一）十大帮规

1 不许欺师灭祖，2 不准藐视前人，3 不准提闸放水，4 不准引水代纤，5 不准江湖乱道，6 不准扰乱帮规，7 不准扒灰倒笼（伦），8 不准奸盗邪淫，9

不准大小不遵，10 不准代发收人。

(二) 十大禁止

1 一徒不拜二师，2 父子不拜一师，3 师过方不准再拜，4 关山门不准再开，5 徒不收不准师收，6 兄进徒，弟不能进师，7 本帮不准与本帮引进、8 师过方不准徒代收，9 进会不准骂会中人，10 香头高不准自高。

(三) 十大成规

1 戒万恶淫乱，2 戒道路行凶，3 戒偷盗财物，4 戒邪言骂语，5 戒讼棍害人，6 戒毒药害生，7 戒假众欺人，8 戒倚众欺寡，9 戒以大欺小，10 戒烟酒骂人。

(四) 十大谨遵

1 要孝顺父母，2 要热心从事，3 要尊敬长上，4 要兄宽弟忍，5 要夫妇和顺，6 要和睦乡邻，7 要交友有信，8 要正心修身，9 要时行方便，10 要济老怜贫。

早期入帮不知是否有凭证，据说杜月笙、张啸林搞“中华共进会”，后来杜又搞“恒社”，有填表的手续。笔者在地方志编委会打工时，从档案馆见到实物，是民国三十五年发给入帮成员的“凭照”，大小和式样像当时的中学毕业证书。上框上面正中，有孙中山遗像，左右是国民政府的党旗和国旗。在写毕业证书的部位是“凭照”二字。下面通栏有“义气千秋”四字。中间横栏一行对联式样。写的是“青叶红莲白藕一根生/万法归宗三教是一家”，中间三竖栏，分别载：“引进嘉海卫帮大字班师太姓某上某下某，字某某，祖居江苏某某府某某县某某大街，商界为业，通字班师爷（姓名字号住址职业），悟字班师父（姓名等等）。”另行载：“满运船四十六只，三十六只行运，十只停修，寻常打白旗白号，阴阳月亮，初一、十五打白旗红镶边，半个月亮，本船乌油雀杆，金钩如意头，又名打金棍，帮中混号石鹰膀子。兑粮嘉兴府石门桐乡二县，每船兑粮一千二百五十石，总兑粮四万五千石。船头当家的姓李上彦下林，腰当家的姓王单字春。靠船太子码头，固粮老铁牛寺。问帮不问锁，锁是海林锁。吃的白流水，烧的昆山柴。”

另行写本命江淮泗帮大字班师太、通字班师爷、悟字班师父姓名、住址、职业、船只、旗号、兑粮、码头、杆、锁、水、柴，等。

另行写传道兴武泗帮三代姓名、船只，等等如上。

右边一大行，横划为四截，分别写十大帮规、十大禁止、十大戒规、十大谨遵。左边一大行，也是横划为四截，分别写前 24 代、后 24 代、续 24 代字辈，六大亲帮。左边填年月日弟子某某某一十四炉香进会。左边与存根联接，已裁开，但见字号、大印的一半，印章约两寸见方，宽边、朱文篆书为“义气千秋”四字。





清帮在上海滩势力很大，杜月笙拥有复旦大学、申报以及银行、工厂等几百个单位的董事长名义。被国民政府利用，与国民党的特工勾结，劣迹累累。杜遁居香港病卒。

在湘潭的清帮人物，据所知有侯荷僧。见其外地来信，信封必书“老前辈”或“老大人”，其人并无文化，盖帮中有地位者。相传晚清时曾在九总当铺巷口投掷炸弹，意在狙击候补道员郭葆荪，未中，遂出逃外地。后混入军界，回乡已在 50 岁左右，个子矮小，但衣冠楚楚，金丝眼镜，金表链子垂在胸前，无拳无勇，像一个和蔼的富翁。名片有广州大元帅府参议头衔，自称定期有抚恤金寄来，人亦莫能究其实。沦陷时期，避地株亭、山门一带。土匪贺石生被避地耒阳的省政府委派为县长，杀人捕人是常事，被捕者多丧生。侯受人央求去保释被捕者，贺必慨允，故百姓对他颇有好感。然占住十八总李姓房屋，包养有夫之妇，终不免强梁行径也。后不知所终。

## 四、余论

洪帮与清帮，原来势不相容。洪帮有“由清转洪，披红挂彩（欢迎其转向）。由洪转清，抽筋剥皮（恨其腼颜事敌）”之说。但在长期演变中，终成一丘之貉，解放前夕的合流，自然之势耳。国民政府首脑授意清帮的杜月笙与洪帮五圣山的向海潜联手合作，事与愿违，终于走向了尽头，趋于灭亡。

名作家某先生，据说精研历史，近日光临湘潭，畅谈心得，实为盛事。但说到：“湘军成就了中国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有点言过，成就不是在湘军的手上，而应该追溯到四川的袍哥组织。”说明他对帮会的历史缺乏了解。洪门创始远在四川袍哥之前，袍哥不过是洪门的地方分支，仅限于四川。遣散的湘军加入哥老会，与鲍超无关。把帮会统称“黑社会”，连民主革命的先烈黄兴、谭人凤，连爱国英雄郑成功，都成为了“黑”人物，这是历史的眼光吗？“社会”本是外来语词，“黑社会”也是舶来品，不必把历史事物去和欧风美雨接轨，这样，我们的历史就变成一桶粥了。此文所言，仅供参考，弄斧班门，见笑了！

# 张舜徽先生治学著述轶事

李绍平

原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沅江张舜徽（1911—1992）先生学富五车、著述等身，被誉为中国现代朴学大师的殿军。二十五年前（1980），笔者有幸忝列先生门墙，得沐春风，饫闻大义。先生的门墙高数仞，余虽未能窥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但先生治学的坚苦精神、博大气象和谦抑风范却深深教育了我，成为鞭策我前进的动力。先生自学成才，其治学、著述很有特点。兹就先生经常讲论、反复强调、常以自勉，亦以诲人的几个问题简介如下。

## 一、早起之益

为学当早起，前人多有强调。淑贤魏源就曾指出："圣贤志士，未有不夙兴者也。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求道则易悟，为事则易成。故相士、相家、相国之道，观其寝兴之蚤宴而决矣。"[①]近人杨树达先生每天起床不超过凌晨四点，数十年如一日。舜徽师受他们的影响，亦坚持早起。他说："余一生自少至老，未尝一日晏起。每日凌晨三时辄醒，醒则披衣即起，不稍沾恋。行之毕生，受益至大。起床后，整顿衣被几案，追盥洗毕，而后伏案观书。其时万籁俱寂，神智清沏，自然事半功倍。语云：'早起三朝当一工'，诚不虚也；每值寒冬夜起，雨雪打窗，孤灯独坐，酷冷沁人肌骨，四顾惘惘，仍疾学不已，自忘老之已至。及天晓日出，众庶咸兴，而余已阅读写作数小时矣。一生述造不少，大半成于未明之时。向顾粗有所得，悉有赖于早起也。"[②]先生这段名言，将早起之益的道理讲得十分清楚。凡是真正想做点学问的人，难道可以不记取吗？

## 二、读无字书

张舜徽先生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包含在两种书里：一种是有字书，另一种是无字书。有字书就是白纸黑字的书，是我们经常所读的。无字书即天地万物，对于这种书却很少有人问津。比较这两种书，"无字书的内容尤为广博，





使人吸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便要通过长期和万事万物接触从中取得很多知识外，又在实际劳动和日常工作中，人与人之间得以交换经验，相互学习，因而积累更多的知识，这便是读无字书的效果。"[③]

读书是学习，实际工作也是学习。远在二千四百多年以前，《论语》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路同情他的小同学子羔家境贫寒，于是设法替他介绍了一个小差事让他去做，孔子却不同意，认为不勉励子羔好好地读书而劝他去做官，这是害了人家的小孩。子路却以为天地间可学习的东西很多，在替人民、替国家办事的过程中，可以取得许多知识，何必整天伏案读书，才是学问呢？"子路强调在工作实际中学习，不必要读有字书才可称之为学。这种见解确很卓越。"[④]

作为一位优秀史学家，就有一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问题需要解决。行万里路，就是读无字书，就是通过调查访问和考察而获得史料，增长知识。例如中国古代史学之父司马迁，他有很好的家庭环境，年十岁通古文，读了很多经传，又天下遗闻占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占有了相当丰富的史料，可"他仍感知识太少，特别是秦汉之际以及汉初开国时期的史实，非到各地进行实际调查不可。他于是出外旅行，走遍了东南和中原、北方一带地区。在实地考察中，解答了以前对古史记载的疑端，找到了近代史事的实况；特别对于刘邦及其同伙们的遗闻轶事，采访尤详。他后来因事到了四川云南一带，深入西南地区，因得乘机向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才有条件写成《西南夷传》，使少数民族的历史开始载人史册。这些大的成就，都是得力于多读无字书的结果。[⑤]又天文学方面的知识，也不是单从书本上所能学到的，更需目验。张先生教我们绘制三垣二十八宿图，带我们夜观天象，一一指授，经过这样的实践，我们对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就了解得具体多了。

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就更需要实践的验证。例如大医学家李时珍，除了博览群书外，又到湖广、江西、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地的山林溪谷进行调查访问，与老农老圃交谈，以验证典籍上记载的旧药材。如果发现新的药材，便一一辨其性味功用，收集标本，绘制图像，成为编述《本草纲目》的素材。是书收药 1892 种，新增药材 374 种。"他对旧有的药物重新辨认，进行考证，纠正过去错误的说法；对新收的药物通过仔细研究后，写出详细的说明；这不是多读无字书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吗？"[⑥]此外，有些长期做实际工作而没有读多少书的人，他们经验丰富，懂得处事、接物的道理很多，这是多读无字书所得到的丰富知识，与之交谈、请益，亦可获得智慧。

## 三、文须朗诵不宜默看

清代著名学者姚鼐教其弟子学文之法，重在多读多作，而读文方式则贵在朗诵，不宜默看。他说："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⑦]舜徽先生对这段话十分欣赏，认为足为后世师法。他说："学习古代文辞，所重在读。必须熟读深思，然后有悟入处，如仅默看，毕竟不能受用也。"[⑧]读的次第，是先读短篇，取其易熟读能背诵。后乃朗诵长篇，如王安石、苏轼之《万言书》，以及贾谊《陈政事疏》、《过秦论》之类。至于时代，则当先明清，进而唐宋，再到汉晋、先秦。对所精读之书，皆手抄熟读；每篇皆朗读百遍，故能历久不忘。这是他的切身体会，他说："余少时所读之文，至今犹能略举其辞。既早养成耐心诵长篇文之习惯，后乃进而看大部书，亦不畏难矣。终身受用，不徒在文辞间耳。"[⑨]这是强调精读朗诵的功用，现代历史学家缪钺也认为古文若能熟读成诵，则可受用无穷。只要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原来不甚理解的，也渐渐能理解了；原先自以为理解的，通过熟读背诵的书，可以在头脑里生根，变成自己的东西，招之即来，运用自如，在思考问题时，也容易联想，左右逢源。前辈学者耐心朗诵精读古文的传统，值得当代青年学子好好效仿。

## 四、善抄书者可以成著述

有人问舜徽先生："昔人尝言：'著书不如抄书'，岂善抄书者即可成著述耶?"先生作了肯定的答复。并指出，这话是清初顾炎武叙述他家的祖训。顾炎武一生尽力于抄书，受益也最大。像他的《日知录》、《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皆其一生抄录群书，取精撮要而成的大著作。"天地间书籍太多，包纳甚广，苟不摘录精要，奚能记忆靡遗?"[⑩]所以南北朝时刘勰《文心雕龙》就告诫说："洽闻之士，宜撮纲要。"唐代韩愈《进学解》也说："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而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则强调读书时"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舜徽先生既同意前人的观点，主张读书要勤做笔记，又指明摘抄应注意方法，不能乱抄。像袁枢摘抄全书而改编为新体，写成《通鉴纪事本末》，像魏了翁撮抄精要编为专书，写成《九经要义》，像黄震摘录历代大事，著成《古今纪要》等，这些方法都可学习。同时又指出，对笔记材料要善于运用，防止光记不用。张先生读书数十年，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以之成书者，有《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经典名言》、《周秦诸子政论类要》、《周秦道论发微》、《读文札记》等十余种，所取得的成绩是相当大的。凡是立志于做学问的人，千万别小看了笔记之功。





## 五、与诗词绝缘

"诗不必人人皆作"，这是清代大学者顾炎武的主张，见其《日知录》卷二十一，舜徽先生与之有同感，认为文科学生主要是将文章写好，不必人人作诗填词。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道："我在二十岁左右，除研究小学、经学外，喜欢读诗作诗，后来感觉到耗费光阴不少，有损读书时间，从扬雄、颜之推、刘知几的名言中吸取了教益，便下决心不再作诗。此后五十余年中，与诗绝缘，把时间集中到做学问方面来，果然有所收获，不断取得一些成就。"[⑪]

舜徽先生之所以要与诗词绝缘，他是基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的。第一，填词作诗须有天赋，不是人人都能作好的。他说："一个人能诗能词，并且造诣很深，这除了功力之外，还要有几分天赋才行。不是每个人所能办到，也不必每个人都要办到。[⑫]"故一般学者自以不作为好，这点与顾炎武相同。第二，受传统学术鄙薄文人思想的影响，把诗赋词曲看作雕虫小技，故壮夫不为。首倡此说者为西汉扬雄，见于其《法言·吾子》。继起而和者乃北齐的颜之推，他目睹时弊，以为诗文无益于世，便教导他的儿子说："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无强操笔。"[⑬]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自谓他与扬雄有四个方面相似，"扬雄尝好雕虫小技，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⑭]宋代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不记载文人，也反映了古代史家的一般看法。他们都以为文人诗赋不算学术，无益时政，故弃而不为。第三，认为旧诗词多为应酬唱和的"俗务"，思想内容消极颓废，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他说："又观古今诗人之作，无病称病，未老言老，不贫嗟贫，忧伤抑郁，所谓'诗愈穷而愈工'者，尤足挫少年志气。……世人多以作诗填词，为文雅事，而競趋之。此乃徇俗情，事俗务，以追逐流俗之好，甚无谓也。"[⑮]舜徽先生曾把他的自学经验概括为一苦、二勤、三多、四不、五有，其四不中一不便是："平时对思想不健康的小说以及充满消极情绪的诗词，少看少读，有些可以完全拒绝，以免无益之妨害有益。"[⑯]第四，作诗填词，费时费力，影响读书和写作，所以应当及早与诗词绝缘，以便集中精力搞好著述。舜徽先生对清代著名史家章学诚"善取不如善弃"的治学原则十分欣赏，认为治学著述"有所取必有所弃，不要因其他爱好，分散治学精力"，他说："由于学问文章之事，本甚广博，一个人的聪明才力，不可能通知尽能，自必有所别择去取于其间。将有些不关重要的或妨碍做学问的小道末技抛弃掉，使心思精力集中到有用之学方面来，才能取得成绩。"[⑰]先生自言二十岁以前，也喜欢作诗填词，但"到二十一岁站上教书岗位以后，每周除讲课外，还要批改学生文卷，自己尽量挤出时间读书，没有闲工夫去强记故实、推敲字句，在诗

词方面花力气。……于是下定决心，与诗词绝缘。四、五十年间，从不作诗填词。也就夺回了许多精力时间，专用于做学问的方面去，成效是很大的。”[⑩] 可见张舜徽先生与诗词绝缘，主要是从时间精力方面来考虑的。

## 六、但问耕耘，不问收获

张舜徽先生以自学成家，却能著书三十余种，成果达千多万字。为什么他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呢？先生的回答是：“但问耕耘，不问收获”，意思是“研究成果多由积累而来，不可急于求成”。[⑪] 张先生十分欣赏荀子的“积微”精神，认为做学问“要从低处下手，从点滴做起。一心向学，刻苦用功，积微小以至高大，自然水到渠成”。又说做学问要戒绝两种偏向：一是贪图虚荣，一是急功近利。所以他说，一个人做学问，“既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对于外界的名利虚荣，一概不介于怀，才能专意致精，尽心学习”。他又指出，“有些青年同志，立志努力自学，偶然发现了他的‘年相若，道相似’的朋友，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便羡慕他，效仿他，急急忙忙，凑合一些零散资料，写成论文，四处投稿，这便是贪求近功的具体表现，既耽误了读书时间，又养成了追逐一时名利的习惯，难于成为大器”。[⑫]

既然不能贪求近功，那应该怎样做呢？舜徽先生总结自己的经验道：“我一生所写的好几种书，都不是预先拟定了一个题目然后着手撰述的，而是将积累已久的素材，加以区处条理，使成为有系统、有义例的专著的。像二百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不消说，是我积四十多年的功力而后写定成书；即如《清人文集别录》二十四卷，《清人笔记条辨》十卷，也是根据我多年读清人文集、笔记时所积累的心得记录，加以整理而成。……从这些具体事实，足以说明一个‘积’字，在治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重大。假若没有几十年时间的积累，想要提出研究成果，也是不可能的。我一生治学，没有急于求成的思想，总是从容不迫，埋头苦干，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等到积之既久，果然水到渠成。古人所云‘欲速则不达’，真是千古名言。”[⑬] 张先生四十年写成《说文解字约注》，单是誊写清稿就花了三年半时间，写秃了大小毛笔五十多枝。其余数十种著作大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晶。这种坚持积累、艰苦卓绝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 七、从事写作力求不假手于人

舜徽先生的治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著作，全部躬自为之，从不用他人代劳。他语重心长地说：“余平生有所述造，未尝假手于人 。自构思草创以至誊成清稿，皆出自己力，从不假手于人。或谓誊稿可分付及门为之。余则以





为彼辈当少壮之年，正努力读书之时，何可责以抄写之役夺其日力耶！亦所以爱护之耳。故一生所写数十种书，量力而行，不能则止。晚年目力衰退，犹汲汲作蝇头小字，不以为劳也。”[⑭] 字里行间，充满着他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这是他著述不假手于人的主要原因。其次，先生对古代那些达官贵人，自己无学无术，而好延宾养士，编书著论，以立言垂后的恶劣行为十分反感，他斥责说：那些“达官贵臣，不能动笔，乃尸监修之名以贪其功，其为剥削劳动，固不亚于出地租、供赋税也。”对照当代，先生感慨尤深，他接着说：“不谓今之名家编书亦复效之，草创属稿，皆分委多人为之，己独居主编之名以观其成耳；朘人以自肥，此与封建剥削何异！余深耻之，生平所不屑为也。”[⑮] 这是先生不愿假手于人的第二个原因。有鉴于此，故先生“从不标立名目，鸠合多士以余共编一书，而自居主编之名。其或有人请余主编一书义不可却者，加校注《张居正集》之类，亦惟发凡起例以总其成。并在序言中说明年老事繁，无馀力亲自动手，而委托多士，分工合作以底于成。且将伏案校注之人，一一列举姓名，俾不没其业绩。区区之心，不欲掠人之功以为己力耳。”[⑯] 同时，在登记学术成果时，凡是他所主编的著作，一概不列入到他的成果之内。这些都说明，张先生的学术道德是十分高尚的。

## 八、不轻为人序书亦不乞人序书

舜徽先生著作数十种，从不乞人作序，早已传为士林佳话。他说：“余平生守顾氏《日知录》‘一书不当两序’之说，每一书成，但自抒所以作此书之意，未尝乞序于人，亦不曾为人序书，所以避标榜之嫌耳。”[⑰] 我国古人写书，多作自序，以叙其家世，述其作意。自魏晋以下，士大夫都崇尚门第，追求辞藻。个别士人由于出身微寒，名气不大，为了使自己的著作能流传于世，于是乞人作序。如晋代左思作《三都赋》成，而贫无人知，因为当时的皇甫谧名声很大，于是登门拜访，请他作序。请人作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初时为人作序，尚能遵循一定义法，出言十分严谨，不像后世为人序书，只写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互相吹捧标榜。“隋唐以后，雕版术兴，文字传播之法日广，于是而成书者有序，刻书者有序，一书累三四序不休，徒令人生厌耳。”[⑱] 对于这种歪风，清代顾炎武十分反感，大声疾呼，主张一部书不管由谁作序，都只要一个序就够了。张先生不乞序于人，就是以身作则，来纠正这种歪风。有些后生小辈若请先生作序而无法推却，则只作很简单的“题记”而不为序。有的学术前辈已经去世，其子孙刊其遗书，若请张先生作序，先生则欣然命笔，因为这与互相标榜无关，然亦未尝多作。

（作者系湖南师大历史系教授）

**注　释**

[1]《默觚上·学篇二》.
[2]《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卷十.
[3][4][5][6]《切庵学术讲论集·我们提倡读两种书》.
[7]《惜抱轩尺牍·与陈硕士书》.
[8][9]《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卷七。
[10]《切庵学术讲论集·养性堂答问》.
[11][12]《切庵学术讲论集·谈读文和写作》.
[13]《颜氏家训·文章篇》.
[14]《切庵学术讲论集·养怡堂答问》.
[15]《切庵学术讲论集·自学可以成才》.
[16][17][18]《切庵学术讲论集·自强不息壮心不已》.
[19][20]《切庵学术讲论集·毋慕虚荣毋贪近功是有志自学成才之士的座右铭》.
[21][23]《艺苑丛话·从事写作力求不假手于人》.
[22]《艺苑丛话·假手于人成书益滥》.
[24][25]《艺苑丛话·不轻为人序书亦不乞人序书》.





# 程潜组织诗社为毛泽东祝寿

黄　琳

1963年夏天，程潜在北戴河避暑。有一天，对当时负责其文秘工作的杨慎之同志说："毛主席快要七十大寿了，我想发起组织一个诗社，相约做点诗词表示祝贺。"杨问："您打算组织哪些人呢?"程潜沉吟后说："人不在多，但诗品、人品都要高!"当天下午，他交给杨一份名单，开列的姓氏是：郭沫若、陈毅、马一浮、谢无量、沈尹默、叶恭绰、章士钊，加上他自己一共是八个人。杨慎之立即把程潜的意图和开列的名单向中央统战部汇报请示。中央统战部的答复是："毛主席历来反对祝寿，郭老和陈总是共产党员，未便参加。党外朋友出于至诚，出于对革命领袖的热爱，如果有所表示，我们亦不便多加干预。"杨慎之把统战部的意思委婉地向程潜作了说明，程潜表示理解，便嘱他拟妥组社约稿信，分寄时在杭州的马一浮、上海的沈尹默、四川的谢无量及北京的叶恭绰和章士钊，并吩咐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出一个简要的提纲附在信后。杨都一一照办了。这个未名诗社就这样开始了积极的活动。

程潜诗，本工于五古，这回作为发起人，破例按照党的历史提纲写了十二首七律。诗云：

灵椿长寿不为寿，至德安仁亦利仁。道大为公天可则，物穷其极理皆真。鸩雏振翼鸮生妒，海若回潮水共亲。远届八方齐拜手，堂堂赤制有传薪。

平生罕说智仁勇，智勇兼仁作一家。天地立心观不灭，痌瘝在抱意无涯。良医肱折自神技，老树高枝皆好花。龙马负来《资本论》，凿开混沌见光华。

竭来手捧西来法，密结宗盟取次传。直北已看经散地，入南真觉道同肩。风开粤海蒙求圣，云暗长江龙御天。一自豫章扬赤旆，亢阳有悔七逾年。

长短纵横未肯齐，谁凭灵宪定高低。害群驿马终归北，得意春风尽向西。月照桂林笼鬼影，道扬遵义踏天梯。朱旗北斗交相映，万水千山路不迷。

左纛飞扬不怕难，征程万里达天山。横过青藏人餐雪，遂听燕云敌闯关。攘遏胜筹犹掌运，陶甄气类互心安。洪图卫国加经野，冲破重围贼胆寒。

八年归马转多悲，奸宄横行世共知。作计败盟张虎欲，甘心鬻国与狼私。

藉无平地成天法，会有崩山竭海时。听到来苏呼满野，看他枯朽一朝夷。

民犹水也民为贵，紧握灵枢定一尊。谋大不遗防鼠窃，助多焉用怕鲸吞。鏖兵辽沈空诸巷，困敌京圻断只辕。陶铸降浮三百万，到头胜利属元元。

徐淮大捷北投戈，舆颂欢娱贵在和。罪表独夫应不赦，章刊战囊亦无讹。月明清浦闻天鼓，风送金陵听国歌。夜半渡江传令急，洸洸正气壮山河。

大军南下气恢张，群丑如鼷早自飏。东起淮扬通百粤，西包滇藏到新疆。远来近悦兄迎弟，女跃男歌酒有浆。我本多年邀默契，喜从中夜挹明光。

天安门启一声雷，中国人民站起来。合德同仇精爽紧，伤穷悯白智谋该。山呼永雪臣奴耻，海纳长储创建才。气象万千光八表，裁成新自斗争回。

迢迢京阙隐茏嵸，大纛高悬映昊穹。建国辛勤弘物质，齐民寅亮代天工。道包本末权衡定，政御初终上下同。正德厚生并利用，万般经制一般红。

万汇人天指画清，要凭主义换和平。早知豺虎非吾类，未必鸱鸮变好声。沧海月明看魍魉，神州日食任亏盈。三多古话应恢廓，大量无虚带至诚。

程潜（朱印）

一九六三年国庆日造

程潜《养复园诗集》的大部分诗作及其散见他处的 170 多首不同时期的诗作，曾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 1984 年出版。《毛泽东主席七十大寿祝诗》亦由该书收人。

1986 年 5 月，杨慎之先生因结核病住在长沙市立第五医院，他说出来行动不自由，便多次传信和电话相邀，要我去医院商量澄清某书稿著作权外间误传一事。每次题外闲聊甚多。有一回，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详细介绍了程潜力祝毛主席七十大寿组织诗社的往事。他说，《养复园诗集》所收章次与原作不同，个别用词亦有出人，他说的才是原作的真实文字。还称家里留有原作的书法影印件，可以借我一看，以证真伪。可惜，后来虽然常常见面，而因每次都有谈话的新主题，竟把这件事情忘记了，始终未能一睹他手边珍藏的原作影印件。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十二首七律的个别内容或许还因带上了某些时代色彩而略存微疵。但是，总体观之，从诗的意旨、气宇、形象、构词等诸多方面来考评，仍不失为上乘之作。“谁知三军帅，诗亦一代雄。”——这是赵朴初先生的结论。人云“赵叟非谀者，评语出至公”，的确如此。“天安门启一声雷，中国人民站起来”，这种气势磅礴、明白如话的诗句，安置在这组长诗里面，不但贴切自然，浑然一体，而且有如石破天惊，显示出作者驾驭语言的睿智技巧和探厚功力。“罪表独夫应不赦，章刊战囊亦无讹”、“我本多年邀默契，喜





从中夜挹明光”之句，都内蕴着当时的思想脉络和史事依托，稍微细心一点的读者，就可以体察出诗人的命意所在。特别有必要指出来的是，诗人在长篇组诗中所表达出来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深沉执着的爱，一种隆崇尊敬之情，浓烈饱和地凝聚在字里行间，令人读后不能不深受感染。杨老回忆说：“在几个月的创作时间中．程潜经常驱车去北京东四十二条胡同章士钊寓，切磋诗的意境和遣词造句以及用典的安排。两位须发如银的白头老翁，并坐一榻，聚精会神，闭目凝思；有时交头接耳，反复吟诵。那种严肃认真的态度，真是撼人心魄啊!”为了作这十二首七律，章士钊曾写过三四十封长短不一的信给程潜，提出自己的某些看法。慎公说章行老的书法十分秀丽，他曾视为至宝，长期珍藏，可惜在十年浩劫之中，“英雄好汉们”将它付之一炬了。说到这里，慎公眼中露出丝丝怨愤的幽光，用低沉的声音悲叹着：“豸虫们!罪恶啊！他们欠下了永远偿还不清的债!”他说当时面对那些混蛋的暴行，真是怒火中烧，但也只能在内心诅咒，别无一点办法。

程潜写诗，一人境界就像着了魔似的，时刻在心，不断追求尽善尽美。当时程潜最小的一个女儿提出一个问题：“爹爹为什么解大便时还唱歌啊?”慎之先生笑着说：“老人家不是唱歌，是在做诗，在做送给毛主席的诗。”程潜长期习碑帖，书法造诣很深，但他送给毛主席的诗却是写了一遍又一遍，有时自觉稍有不足，就把大半张洁白的宣纸揉成一团，掷之字纸篓。

马一浮先生当时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1963 年夏末（不是外间所称 50 年代初），他给程潜写了一封信，说明体力不济，不能做诗，故只向毛主席呈献一联。联云：

旋乾转坤，与民更始；

开物成务，示我周行。

楹联有上下款，是优质宣纸写的。程潜收到后赞不绝口，细细把玩很久才交慎之先生。吩咐进行照相制版和原作裱糊。

叶恭绰先生住在北京交道口附近一条胡同里面，距程潜时在宽街的寓所不远。叶是誉满国中的捷才，很快就创作了《乾元颂》交稿。

## 乾元颂凡七十韵敬为 毛主席七十生日寿

——依柏梁体用中华新韵十六唐韵

乾元出震临东方，祝融炎德辉衡湘，星云纠缦徵降祥，毓生巨人韶山乡。坐挥神笔施弘纲，群黎来苏和春旸，谁知宵旰犹未遑，危微精一如陶唐。罗胸万卷生光芒，典坟邱索发盖藏，昔之学术儒墨杨，百家诸子韩管商。

顾工身犹百炼钢，拍浮方渡扬子江，破浪不用一苇航，文咏馀事何裔皇。
韩柳欧苏相颉颃，标新领异穷微茫，指导艺苑成津梁，红霞东升明朝阳。
经典九译驰重洋，功绩奚啻绥万邦，摩天巨刃千丈强，障川力挽狂澜狂。
蚍蜉撼树空披猖，反修洞照其肺肠，反帝反殖方喤喤，民族自决成宪章。
普及教化增序庠，人皆识字无文盲，尖端科技蕴奥详，文艺昭然为国光。
百家流派争低昂，百花齐放春风香，高瞻远瞩达四窗，公心劳矣民其康。
普建大鼓声其镗，亚非拉美风泱泱，霆奔电掣势莫当，威弧一彀歼天狼。
建设进步超飞翔，红旗三面云霄飏，讴歌公社登丰穰，农工耕织盈仓箱。
撷其菁英筛批糠，嗤彼伊雒诩圣王，一孔之见走且僵，先知先觉兴明良。
马恩列史齐雁行，辩证唯物洪钟撞，更标实践为之倡，以矛攻盾理论昌。
文模武烈同辉煌，高扬真理开天荒，风雷崛起天戈扬，改革土地兴群氓。
长征万里如户堂，蓝荜手启跻康庄，韬钤只顾销欃枪，东征西望云霓望。
各族同等皆轩鼚，祝公绵算如天长，自今以始方未央，我今耄矣嗟精亡。
仰瞻乔岳森青苍，衢歌巷舞同趋跄，愧无健笔龙文扛，待勒金石铭旂常。

一九六三年冬日
叶恭绰时年八十有二

《乾元颂》“凡七十韵”是一个约数，实际共得六十八句。这种一韵到底的长诗，大多宜于表达情节离奇、曲折迂回的故事。而《乾元颂》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多方面的光辉历史和现实业绩，没有高度的逻辑力量和艺术提炼功夫是不可能创作出来的。年轻时就名噪全国的“岭南才子”叶誉虎，到了耄耋之年，仍然笔力雄健，以诗叙史，气魄宏廓，诗情奔放，真是难能可贵。

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当时正患眼疾，能见度极低，但他也寄来了一首词。词云：

一柱擎天，万里无云，四海无波。喜红旗扬起，乾坤浩荡，东风拂遍，遐迩融和。六亿人民，同登寿域，见者惊夸安乐窝。国庆日，听天安门外，动地讴歌。神州大好山河，人更觉，今朝壮丽多。看马列真文，功高粟帛。孙吴神武，力上干戈。玄圃桃繁，仙山枣大，松柏长青带茑萝。无私颂，为群伦祝福，欢醉颜酡。

毛泽东主席七十诞辰敬献沁园春词一首

沈尹默（朱印）





一千九百六十三年十一月

章士钊先生填了十二首词，词牌是《水调歌头》。他的稿子交得稍晚一些，直接送交荣宝斋裱糊，没有来得及照相制版。慎之先生说，他本来留有一份抄件，“‘文革’中也被那帮文盲们毁了。”他说他将设法和章含之同志联系，希望能找到一份底稿或抄件，希望我能在报纸上帮他再发表一次。我当时高兴地应允了，可惜后来一直没有得到联系果否的消息。

谢无量先生那里则既没回信也没见寄诗稿。我问是什么原因，慎之先生笑着说：“现在我也记不清楚了。”

当时，慎之先生把各家原稿收集齐全后，大多拍了照。原件则交由驰名中外的荣宝斋精制裱糊为一份15×4市寸的册页，配以金褐色的织花缎面，上贴“毛主席七十大寿祝诗章士钊恭书”的题签。1963年12月26日上午，程潜亲手用大红缎子把册页端正严密地包扎停当，派人径送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寓处。下午，毛主席办公室的叶子龙同志电话通知：请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各带一小孩到中南海便宴。程潜带了七小姐程熙，章士钊带了章含之，叶恭绰带了一个男公务员，依约赴会。

当晚10时许，程潜才返回寓所。他径直走到慎之先生的办公室，十分高兴地说：“今天只有两桌便饭，除毛主席的家人外，就是我们三个党外朋友，其余则是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秘书、医生、警卫、司机等工作人员。党内没有任何一位首长参加。主席谈笑风生，说诗论史，情绪特别高。”

慎之先生说，程潜是滴酒不沾的，那天晚上，他大概破例喝了一点葡萄酒，红光满面，神采飞扬，表现出一种罕见的兴奋。慎公在叙述这段往事的时候，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流露出一种按捺不住的愉悦之情。我亦受其感染，因而记得特别清晰。现在公诸同好，让大家一起高兴高兴。

（据1986年5月13日在长沙市第五医院与慎之先生谈话记录整理）

（作者系湖南诗词协会副会长）

# 旧时报人悲愤录

伏笑雨

民国时期，对书刊报纸控制极严，各地设有新闻检查所，凡是与政府相左的言论，常受停刊数日甚至查封、捕人的处分，大兴文字之狱。笔者经营的报刊，不仅受过查封、停刊的重罚，而且曾经被宪兵“禁闭”，深受人身侮辱之苦，令人痛心疾首，悲愤万分。

## 一、《新闻晚报》停刊三日

范长江、孟秋江、陆贻等领导组建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不久，便在长沙物色人选筹建“长沙青记分会”。经过当地部分新闻工作者的努力，长沙分会正式成立。会议由陈子玉主持，范长江致词，日期为1938年7月16日。学会人员满怀激情，表示愿以全部精力投身于抗战的新闻事业。会议最后选举陈子玉、伏笑雨、严怪愚等7人为理事。分会理事会在范长江的授意下，迅速着手筹备出版学会自己的报纸。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于1938年8月创办了《新闻晚报》。这是一张四开小报，但有其特点：①负责人都不拿钱，纯粹义务。陈子玉负主要责任，掌握全盘，陈楚坐镇编辑室，伏笑雨访稿写稿，三个人团结合作，把一个战争前线的晚报，办得有声有色。②消息传递迅速，无论是战讯或省市新闻，抢到就发稿。有时版已排好，访得重要新闻，又拆版补进新稿。大报第二天的新闻要闻，读者先晚便可看到。③富有战斗性。该报出版之后，长沙时时处在动荡中，几乎一日数惊。但是《新闻晚报》却在轰炸与惶恐中，巍然不动，按时出版，并经常刊发进步言论，深受读者欢迎。可是，一条无损于任何人的转载文章，却使这份报纸遭到无理的灾难。原因是我们刊登了徐特立指出《晚会之歌》错误的一段谈话，新闻检查所认为这是为共产党作宣传，下令晚报“停刊三天”，以示惩罚。一张在火线上出版的小报，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突受如此处分，零售大减，打击极大。不久长沙外围紧张，谣言四起，市内各报大都停刊，而《新闻晚报》却坚持到长沙大火前夕，才停止发行。





## 二、《南天日报》被查封

1939年9月，日寇向长沙以北的新墙河进犯。28日，长沙30公里以外的据点，都被日军占领。当时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组织反击。10月初，反攻部队进抵新墙河南岸，日寇退却，恢复原来态势。这便是所谓的第一次湘北大捷。自此之后，长沙逐步恢复繁荣。

我和战友陈是训早就有办报的打算，趁着这个机会，经与长官部参谋长吴逸志接洽，他认为能有一个民办报纸为其作宣传，是求之不得的事，答应由长官部拨给我们位于民主西街几间废置的房屋作社址。我们又找到浏阳行政专员蒋肇周、商会负责人资助一笔经费。经过艰苦奔波，于1940年10月创办了四开《南天日报》，我任社长，陈是训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报纸出版后，军事报道的分量较多，吴逸志很满意，并说薛长官也赞赏《南天日报》有特色。当时电话还是稀有的通讯工具，吴逸志派人为报社装了一部电话机，更增加了我们办报的积极性。

《南天日报》馆内有一口椭圆形的池塘，人称“纱帽塘”，据传是三国时期关羽攻取长沙追赶太守韩玄时，韩为改变形象把帽子丢在塘里，故名“纱帽塘”。我们的副刊，便称为《纱帽塘》。田汉、张天翼、向培良及留日学者张十方和许多青年读者，常有文章发表，颇受当时广大青年的喜爱。在采访编排方面，我们也力求上进，经常到印刷厂看样，协助排版。那时刊头都用木刻，我们常在字房里挑选别人的刊头插入新闻中，以求美观。战时报纸错别字很多，由于我们经常看校样、清样，有错就改，减少了错别字，也因此受到读者的青睐。

当时长沙的报纸很多，我们一个新办的报纸能够立足，算是难能可贵了。但是许多事物，常是祸福倚伏的。正在我们报纸蒸蒸日上时，有一位长沙盐务局的读者写了一篇题为《唯楚有材》的文章在本报发表，他对历代湘籍人士从东汉发明造纸的蔡伦、三国时蜀汉丞相蒋琬以及唐宋到清末民初的湖南人物，如文艺类的怀素、欧阳询、何绍基、齐白石，军事类的曾、左、彭、胡，学术类的周敦颐、王夫之、魏源等，以及维新派的谭嗣同和革命者黄兴、蔡锷等，分别将他们的成就以及对后来的影响，都有叙述。这本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谈的都是古往今来的故事，而“惟楚有材”至今仍是挂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门前的上联。以此为上文冠名，可谓十分贴切，十分得体的。而在宋代岳麓书院又是著名学府，数百年来培养了许多有识之士，这是具体事实，谁也否定不了的。但当时主政湖南的上中层人物大多是广东人，特别是台山人吴逸志，自恃有才，怎能容许“唯楚有材”！权力使人傲慢，他一怒之下，派来

副官，以薛长官的名义，下令《南天日报》停刊。这份新生的报纸，在长沙战斗了 8 个月，于 1941 年 6 月停刊。发行前吴逸志大力支持，却因一篇与他风马牛不相及的论文，下令停刊，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 三、我被宪兵排禁闭一天

1942 年初冬，我从前线采访归来。当时我家已迁居乡下，长沙无处安身，便住在中山路一家小旅社里。贴邻住着一位中年妇女，颇有姿色。有一天宪兵来查房，打开妇女的衣箱、行李，一件一件仔细检查，桌上、床上地板上四处乱丢，还故意搜身，摸臀部、捻乳房，动作下流卑鄙。那妇女受尽侮辱又不敢高声喊叫，气得嘴唇惡白，眼含泪珠，但对此恶棍，而且是宪兵，一个弱女子，又怎能奈何？大约折腾半个小时之后，宪兵才大摇大摆离去。这样一种行同盗匪的行为，被我这个职业感较重的人看见，分外激愤，当即将实情写成新闻，于次日见报。宪兵队见此新闻，怒火中烧，到各报社和记者公会打听写稿人。他们终于找到线索，知道是我写的稿件。事发后的第四天清晨，我正在洗漱，一个宪兵来找我。

“我们排长有重要新闻请你采访写稿。”

我说我还没有吃饭。

“不必了，我们排长说辛苦你，已经准备了早餐。”

我半信半疑地跟着他走，走到教育西街一栋两层楼的房舍，四周有围墙，进门有一块小坪，宪兵引我进入一间小室。

“请你在此等一等，排长正在开会。”

我独坐小室，等了两个小时，还不见排长的身影，心知有异。

“排长事忙，我明天再来吧！”

说完，我走出小屋，宪兵忙说：

“排长马上就来，你再坐一会儿吧！”

他拦着我不让出大门，仍然把我送进小屋。这时我完全明白我已被他们扣押了。我晓得那时宪兵对老百姓关押、禁闭、鞭笞、毒打，无恶不作，加以我到宪兵排来没有谁知道，自然无人来营救。我落在这帮人的手里，不知将要受到何等残害？更不知何时能够出去？惊慌恐惧，心潮翻滚，坐立不安。

到了中午时分，宪兵们开中饭了，他们用筷子敲得饭碗当当响。

“我们开饭了，只有小菜，排长请你吃饭，有鱼有肉，你稍等等吧。”

我明白这是他们故意揶揄。我肚子饿得贴在背骨上，也只有忍着。他们越吃越有味，我却气上心头。我到宪兵队已整整 7 个钟头，还没有见过排长一面，谁知他是三头六臂还是千手千眼。





他们吃完饭，那位原先看守我的宪兵说：

“记者先生，我要下班了，不能陪你，接班的同事会好好照看你的。”

他们吃过饭便去午睡，小室更加清冷，长空乌鸦，呱呱飞过，声声入耳，乌鸦竟为我预报凶信，我凄惶不安，如坐针毡。没想到一条揭露丑恶的新闻，会受到如此意想不到的摧残、迫害。他们没有宣布我的罪行，也没有告知将怎样处罚我，不明不白把我禁闭在小室里，如坐黑牢，这还成什么世界！我彳亍徘徊，焦急痛恨，但又无可奈何。

好容易快近黄昏，宪兵们吃完晚饭，我已是一身瘫软，举步艰难了。他们吃过饭，天快黑了，一个宪兵走来：

“排长今天很忙，没工夫和你谈话，命令我暂时送你回去。”

我拖着疲乏的步伐，随宪兵回到旅社。

次日我将被禁闭的情况报告长沙记者公会，要求合理解决。记者公会当即召开理事会，理事们个个义愤填膺，指斥宪兵践踏人权，但议来议去，大家都觉得在那种情况下，秀才遇了兵，有理讲不清，笔杆子怎能斗得过枪杆子，即算作出具体决定，也是以卵击石，自取烦恼。我的人身受辱，也只能不了了之。

## 四、“积谷防饥”惹的祸

1944 年 1 月，我就任《阵中日报》总编辑。这是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办的军中报纸，社长由政治部副主任蒋肇周兼任，社址设在中山路曾公祠，是对开大报，有自己的印刷厂。但铅字老化，有的已经磨损一半，难于辨认。编辑部同仁几乎经常守在排字房，将模糊不清的字挑出来重铸，逐渐改变了版面模糊难看的问题。为了丰富报纸的内容，还办了几个专刊，如由湖南大学周仁济先生主编的“文学专刊”，由军事专家主编的“军事专刊”等。

当时湖南的粮食比较紧张，粮价上涨，特别是邻省江西、广东等缺粮省份，售价更高。唯利是图的商人，暗中将粮食偷运出境，以图暴利。偷运到广东方面的特多。但薛岳是广东人，有偏袒保护地方的意识，明令查禁，暗中放行，湖南群众，极为不满。《阵中日报》编辑主任方国希，平江人，性情耿介，对此十分愤慨，奋笔疾书，写了一篇《积谷防饥》的社论，刊登于次日头版头条。大意是“据湖南粮食局信息：今年湖南粮食因官商勾结，走私外运者极多，如不设卡严禁，则湖南粮仓将一空如洗，数千万居民将无米为炊，盼当局慎重考虑，严禁粮食外运，积谷防饥”等语。长官部广东人极多，认为此文揭露了湘粮运粤的机密，有损粤人尊严。薛岳当即指示政治部下令《阵中日报》：“着总编辑撤职；《积谷防饥》一文作者逮捕法办。”这对《阵中日报》真是一

个晴天霹雳。因为我和方是编辑部重要成员，我们走了，报纸便无法出版。我是蒋肇周比较亲信的人员，而我的处分仅是撤职。蒋肇周出了一个主意：给我下了一个通知："本报总编辑伏笑雨滥发有碍政府威信文稿，着即撤职。"并以此上报政治部备案！但实际上我仍留社继续工作。

但方国希的问题比较麻烦。当报社收到政治部处罚命令之后，我立即通知方国希，要他暂时躲往乡下，逃避拘捕，待风声过去，再回社工作。政治部派人来抓方国希时，他早已离去。不久日寇大举进犯，4月尾长沙紧张，政府下令疏散，我和报社同人向湘桂线流亡，此后便不知方的下落了。





# 仓石日记中的杨树达、皮锡瑞、陈寅恪

段　炼

仓石武四郎（1897—1957）系日本著名中国学家，尤以汉语研究、汉语教育及词典编纂饮誉学界。从19世纪90年代起，在国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日本的汉学研究体系逐渐形成。仓石武四郎曾先后就学于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受到过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大师的亲炙。

1928年至1930年，仓石武四郎留学中国。在这段异国生活的最后8个月中（1930年1月1日至8月6日），他写下了一册不足三万字的《述学斋日记》，即中华书局刊布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之主体。这也成为作者学术生涯中唯一用中文写就的、记叙学术交往的日记文字。虽然不过戋戋一册，但访书怀人、论士衡文的片断，却俯拾即是，且其中多处涉及长沙先贤及著述。

1月28日的日记中，一连串学人及著述相继登场："夜深回寓，吴（检斋）、杨（遇夫）、余嘉锡三先生在上房，棋声彻夜。阅杨先生积微居新刻《师伏堂笔记》。读书之情，令人佩服。"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长沙人，语言文字学家、史学家。据《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载，1905年，杨树达"激于国难，废业出游"，留学日本，"日治欧洲语言及诸杂学"。1911年武昌起义后，官费断绝，"困饿于京都"，于是返国。归国后，杨树达先后在湖南、北京两地任教。仓石武四郎留学时期，杨树达任私立中国大学国文系教授，为其讲授文词举例，两人过从甚密。杨树达也成为仓石武四郎日记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长沙学人。

有意思的是，在杨氏所著《积微翁回忆录》中，也有不少关于这位日本留学生的记载：1929年7月6日，"日本仓石武四郎来访。此君头脑明晰，又极好学，可畏也"。也许，这就是两人的初次见面。

仓石武四郎学成归国后，两人仍有书信往还。《积微翁回忆录》1935年3月18日记载："阅诸友来札。日本人仓石武四郎札云：'得大著，雒诵百遍，佩服之至。'盖余南归曾以《释旌（生改作兆）》诸篇寄往也。"同年5月8日，

“日本仓石武四郎寄赠《京都大学图书馆经部书目》一册”。1947年6月29日，“前以探问狩野博士近状片问仓石武四郎，今日得复，颇多感慨；见告服部博士已做古人，而狩野先生八旬望九，神明不衰。彼兼任东京大学教授云。”

仓石武四郎在3月20日的日记中还写道：“访杨遇夫，……赠君山师并予以《周易古义》。”按，杨氏17岁在日本留学时完成该书初稿，1928年增订出版。《积微翁回忆录》1930年4月23日记载：“日本狩野博士来书，盛赞《周易古义》之美，盖前辈奖藉之意也。”这里所说的“来书”，当指狩野直喜接仓石武四郎转致杨著后的回函。

1月28日日记中记载的《师伏堂笔记》，为皮锡瑞（1850—1908年，字吉人，号鹿门，宅号师伏堂，善化（今长沙）人，经学家）所撰，凡三卷。《仓石文库临时目录》著录有民国十九年（1930）长沙杨氏积微居刻本，当即日记此处所指。

从《述学斋日记》中可见，仓石武四郎几乎天天都在访书、购书和校书。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日记就留下了他经眼的近八百种书籍。其中清人著述最多。而皮锡瑞，正是仓石武四郎谈及书目时，出现次数最多的长沙人。如3月19日的日记中：“在直隶书局买皮鹿门《尚书大传疏证》（三元）”；如4月9日的日记：“又《俞侍郎还山阴序》，有皮鹿门等文”；又如，4月29日日记：“潘自汭送《经训书院自课文》（按，《经训师院自课文》，皮锡瑞著），付五元七角余”等。

历史学家陈寅恪祖籍江西义宁（修水），出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算得上半个湖南人。5月27日的日记中，仓石武四郎记载了与陈寅恪在一次文人雅集上的见面，虽寥寥数语，而陈寅恪风神毕现：“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先生后起矣。”

根据毛子水的回忆，当时陈寅恪任清华国学院导师，住在北平西四姚家胡同。除在清华上课，他每周必与学者钢和泰作一两次学术讨论，工作相当繁重。因此，夫人唐筼常安排他外出散步吃茶（转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种学人的聚会，大约也是陈寅恪当时的一种休闲方式吧。

有趣的是，与仓石武四郎大致同期来中国留学的日本人吉川幸次郎，在1947年的访谈中，也曾提及此次见面，可见陈寅恪给人印象之深：“这人（陈寅恪）看起来很敏锐，有西田几多郎先生年轻时的风貌。”西田几多郎（1870—1945）是当代日本学界公认的唯一的哲学家。从陈寅恪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看，两位日本留学生的眼光是相当精确的。

其实，仓石武四郎的日记，特别是书目版本中，还有多处涉及湖湘学人。如长沙的王先谦、王先恭昆仲，文选学家骆绍宾、《补晋书艺文志》作者黄木父、叶德辉等。而湘籍学人除前引1月28日的日记中提到的常德余嘉锡外，依日记顺序还有新化邓显鹤（号湘臯）与邓瑶，湘潭陈鹏年，湘乡张眉大，平江苏舆，道县周敦颐，常德王以慜等，还包括曾在新宁任知县的江苏人宋于庭。而对于湘潭胡元仪（字子威）、胡元直（字子正）、胡元常（按，字不详）、胡元玉（字子瑞）等四兄弟，仓石武四郎在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胡氏诗礼世家，有《胡氏世典》，元仪行大，《毛诗谱》、《词旨畅》、《步姜词》外，有文集未刻，胡氏昆弟推大先生为白眉（元玉行四人）”此则日记，或可以近代湖湘“书林散叶”视之。

（作者系湖南日报编辑）

# 黎氏三院士与广益中学

刘　磊

一个家庭的同胞三兄弟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外尚无先例。这三位院士又同为一所中学的校友，自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闻名遐迩的黎氏院士三兄弟——黎鳌、黎介寿、黎磊石就是这个先例；他们同为广益中学（今湖南师大附中）校友，后又同在医学领域有建树，这确是独一无二的。

## 同胞三兄弟都是院士

黎鳌，生于1917年，比二弟介寿长七岁，比三弟磊石长九岁。他是著名烧伤外科专家。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普通外科教研室主任、全国烧伤研究所所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年受到了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接见。1998年被国务院授予“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1999年83岁高龄病逝。

黎介寿是国际著名普通外科专家。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所长。

黎磊石是国际著名肾脏病学家。1994年首批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又是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医药卫生部常委）。现任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

## 黎家与广益中学渊源甚深

黎氏三兄弟的老家在湖南浏阳县（今浏阳市），距省会长沙市仅二百多里。他们家与长沙市的广益中学关系密切，其叔祖父黎尚雯是广益中学创始人之一，1905年他鼎力协助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创办惟一学堂（广益前身），主持教务工作。由于办学经费不足，他以在高等实业学堂所得之薪俸贴补，再不足竟典当衣物以补充之。寒冬授课，仅着夹衣，后来学生唐璜撰文回忆，其“瑟缩之状，恍然在目”。1906年禹之谟被清政府逮捕后（次年被杀害），他与罗介夫等更改校名，继续办学，担任监督五年多。三黎的父亲黎浦堂是20世





纪20年代广益中学的英语教员、校董事会董事，1926年7月至1927年出任过校长。浦堂的亲哥哥赞唐是省会著名的数学教师，与汪澹华、杨少岩、陈鹿平等齐名。20世纪30年代起就在广益中学任教，直到1960年70岁高龄时才退休，任教长达47年之久。他于195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黎磊石在1996年8月给母校校友会的信中说：“先辈多在广益执教，与学校渊源甚深。”

## 三兄弟都曾就读广益中学

黎鳌曾于1923年秋至1927年底在广益附小（广益中学于1916年至1950年办有附属小学，即广益附小）求学四年半。广益中学的薪俸低，1928年，黎浦堂为了全家生计，辞去广益中学校长，到待遇比较优厚的上海工作，举家迁移。1935年，长兄黎鳌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减轻了家庭的负担。但不幸的是，1937年，黎浦堂患心脏病去世，他的夫人只好带着比介寿大四岁的女儿和两个儿子回长沙，投奔仍在广益中学任教的赞唐老师。当年秋季开学，介寿和磊石双双以同等学力进入广益中学初中第32班。1938年秋，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当时长沙城屡遭日机轰炸，市区各中学奉令疏散，广益中学南迁常宁柏坊大坪，长郡中学和周南女中迁安化蓝田。为了几个女儿便于到周南上学，赞唐老师应聘到长郡任教，全家迁兰田，介寿、磊石便转学长郡。1941年春，赞唐老师回到广益中学，家也迁移，介寿、磊石又随着回到广益中学，插入高中第20班读一年二期，到1942年夏季读完高中二年二期辍学。这是由于当时赞唐老师的薪俸每月只及战前的五分之一，教一节课的收入，仅够买一盒火柴，全家十多口的生活实难维持。辍学后兄弟俩随着妈妈投奔在桂林工作的姐姐家，由于他俩的学习基础扎实，经过刻苦自学，1943年秋双双考取了国立中正医学院。虽然他们兄弟俩未能在伯父的支持下修完高中的学业，但黎氏兄弟对赞唐老师仍然十分感激。1996年黎鳌写信给他的堂妹黎季芳说，“我们兄弟的成长，是与伯父的抚育和教养分不开的。”

## “非常感谢母校对我们的培育”

那时广益中学迁到的常宁柏坊大坪是个交通不便、仅有五十来户人家的偏僻乡村，租赁祠堂和民房作校舍，设备极端简陋，学习、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名老教师多，又认真负责，学生特别能吃苦，学习风气浓厚。据一位老校友回忆，“介寿比较活跃，磊石言语不多，都很勤奋”。黎鳌也在1996年说过，我们三兄弟都当选为院士，别无秘诀，只是比较“勤奋”而已。磊石的英语不错，有次英语教研室老师课堂提问：“‘黎石石石石’，磊石立即起立，对答如

流”。学校保存的学籍簿记载着他俩高中三个学期的成绩，介寿各科平均都在80分以上；磊石的都在88分以上；且均以物理、化学、生物三科见长，这为他们后来攻读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黎磊石在1996年8月给校友会的信中说：“我的长兄在广益附小上过学，我和介寿兄二度在广益中学读书，作为广益校友，我非常感谢母校对我们的培育。”2005年2月20日，也就是湖南师大附中百周年校庆前夕，黎磊石执笔代表三兄弟祝贺母校百年华诞的贺信中仍说：“我们兄弟三人均曾先后受业于广益，时值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每为逃难所苦，学习环境严重受影响。然而也正是这段时期，母校老师不辞艰辛，坚持办学，同学们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仍发奋求学的风气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日后在事业上遇到困难不退缩，历经坎坷志不移。”诚可谓终身受益。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附中退休高级教师）





# 钱基博先生在蓝田国师

彭锦棠

钱基博，字子泉，又字哑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县人。生于1886年。兄弟五人，而次居四，与弟基厚孪生。我国近代著名的古文史学家、爱国教育家。五岁从长兄子兰先生受书。九岁，《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古文翼》，皆能背诵。十岁，伯父仲眉公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唐宋八家文选。十二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遍。精研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十六岁，草《中国舆地大势论》，得四万言，刊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又仿陆士衡《文赋》，撰《说文》一篇，刊刘光汉主编之《国粹学报》。既长，父祖耆公以家世业儒，约敕子弟，祇以朴学敦行为范；时江西提学使陶大钧阅其文，赏之，招之入幕。辛亥革命军兴，同县苏浙联军总参谋顾忠琛任其为江苏都督府参谋，授职陆军中校。嗣后历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文史地教员，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经学教员及教务长，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第四中山大学中国语文系主任，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校务主任，上海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暨文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国文系教授及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文教授、国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后返武昌，任华中大学国文教授，1952年起任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1957年10月以胃癌卒于武昌。

## 国师元老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大学校纷纷南迁，以避战乱，如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南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也有许多沦陷区大学无法招生办学，沦陷区人民生计无法保证，更不用说培养人材了。1938年，为维持战时教育局面，国民政府筹建了六所师范学院，其中全国唯一的独立师范学院建置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即现在的涟源市蓝田办事处光明山、辛亥革命元老之一李文燮的府第——李园，全园占地百余亩，

园内林木苍翠，古樟掩映，环境优美幽静。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与主人李云龙订好契约，接收全部房屋，并新建了教室、宿舍、食堂、礼堂、操场等学校必须场地。当时学校大门悬挂的是钱基博先生创作的对联：

山对光明，毋玩日愒月；

士希贤圣，好由义居仁。

1938年11月11日，钱老先生应聘来学院，欲以“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肉血渊之中”。12月12日，国文系系会组织成立，请钱先生讲演《为人师者何以处国难》，为全院师生上了一堂思想政治教育课。这在当时也是时事所需。国立师范学院成立时，抗日艰难，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祖国大地狼烟四起，满地烽火，武汉、广州沦陷，长沙大火。因战火所阻，国师正式上课时，到校学生才几十人，可以说，教职工数量比学生还多一些。偌大一个学院，寥寥几十个学生，环境再美，也让人感到冷清，对国运艰难、国亡家破的感受更加深刻。因此，钱基博先生创作的国师院歌也更显悲壮苍凉：

孰与我少艾，五千年之文明，焕彩霞芳霭。国何曾老大，勤以精业，博爱之谓仁，明德亲民，旧邦命维新。国何害老大，抚万里山河，沧海以为带，万国莫我奈，好作新兆民，一代师表重自珍，莫辜负群伦。

钱先生在蓝田国师任教一共有8年多。也正是因为钱基博先生先期来到蓝田，才有了其子钱钟书与蓝田的一段渊源。

## 言传身教

抗日形势日趋紧张。钱先生认为“国无常强，民奋则强”，“我不自亡，谁能亡我”。“人不自强，何能强国？国者，人之积也。”他力主重在造人，提出教育救国须先重视办好师范教育：“假如师而不范，教训无方，何以造人，亦将何以造国？经师人师，孰为难易？倘其宏此远谟，百年树人；推亡图存，岂异人任！”（见钱基博《国立师范学院成立记》）他认为教师的救亡之道，既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便要从师道倔起，做同人的表率，做学生的表率，这样来改造现实，教育后代。他还认为：只要现实中有一批好教师，将来就有无数的好后代，国家自然不会灭亡，民族自然能够得救；钱先生的教育思想是兴学育才，学以致用；教育方法是言传身教，默化潜移，黾勉夙夜，殚精竭虑。“心丹而颅则雪，容老而意未衰”（引自他赠学生照片上的题字）。他主持国文系，除开设各大学国文系一般课程外，特开设《韩非子》、《孙子》，并亲自讲授。当时抗战后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令不行，禁不止，法令多如牛毛





而国不治。他讲授《韩非子》，申明法治的重要，正是与当时现实紧密结合。自来国文系无开讲《孙子》的先例，然在国危寇深之秋，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一旦见危受命，知兵也就可以临战不惊。他选择《孙子》诸家注释，结合国外著名军事学家的著作，写成《孙子章句训义》一书，参以己见，在课堂上讲授。钱先生还自编《国师文存》一书，除选辑历代名家名篇外，又编进己作《日本论》一文，以宣扬其爱国情怀。1939年，钱先生应国民党南岳抗日干部训练班教育长李默庵将军之请，赴南岳抗日干部训练班讲说《孙子兵法》，断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爱国之情，昭昭可见。

日寇陷沪后，为笼络人心，准备在上海创办一所联合大学，指使上海汉奸维持会长写信给钱先生，聘他主任校长，并命他尚未成年的女儿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蓝田送信。钱先生接到此信，义愤填膺，当即撕毁，他认为“寇深矣！国危矣！吾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安可不思所以自处！”终于稳坐国师任教不动。

钱先生博通四部之学，以治集部之学见称于世。他治学的主要特色是援征博而推阐精，“务为浩博尤涯涘，话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他平日以文章教学后生，著述宏富。先后编著《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读庄子天下篇疏记》、《韩愈志》、《韩愈文读》、《明代文学》、《国学文选类纂》、《版本通义》、《国学必读》、《经学通志》、《后东塾读书记》、《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老子解题及其读法》、《骈文通义》、《中国文学史》（1939—1942年在蓝田印行）、《湖南近百年学风》（1940年蓝田袖珍书店印行）、《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等，达数十种。尤其是他在蓝田期间写作印行的《中国文学史》和以后刊行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规模宏大，是他在通读古今专集的基础上，剖析源流，高挹群言，自出手眼的两部经典著作。

他敬业乐业，身教为先。以上课为例，虽身体不适，从不缺课。每当课前一分钟，即肃立于教室门外，上课铃声止，即入教室讲授，无多费辞。下课铃一响，即停讲。久而久之，学生亦惜时如金，精力集中，自然事半功倍。

钱先生提出“师范生一枝笔”的先进教育理念，注重对师范生国文基本功的训练。这一教育理念至今在全国师范院校流行。他授业尤其注重作文课，自编《模范文选》，分析文章作法，并印刷成册，以授诸生。当时国师学制五年（一年实习），他执教的班级学生就写了四年文章（不包括第五年写毕业论文）。他规定学习作文进程：第一学年为命题作文，限两小时即在课堂交卷，迟交扣分；第二、三学年先生命题，也可自拟题，次日交卷；第四学年一小时课堂交卷。作文体裁，除二学年每周一次散文、一次诗歌外，其余几学期，以所学文

体为类，学了记叙文，就作记叙文；学了论说文，就作论说文；学了碑志传状，就写碑志传状。四年级兼作诗词。学生的作文他精批细改自不待说，更重在个别讲评。此种严格训练，学生受用终身。

## 自请留守

钱先生授课，常利用教材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他的学生今娄底师专教师徐运钧、涟源四中教帅李蹊在《忆先师钱子泉先生》的《去德滋水，思德滋深》一文中写道：

犹忆1941年春，抗日孔棘，国步维艰。余等侍先师讲席于湖南蓝田光明山九思堂，听析庾子山《哀江南赋序》。先师抗音朗畅，论部精微，至“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则怵然变容，喟然叹息：“执政匪人，邦国殄灭，何独萧梁？今日局势，岂异‘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樊篱之固’耶？人民遭屠戮，陷水火，化猿鹤，岂但芟夷如草木耶？”声腔哽咽，泪被面颊。余等莫敢仰视，呜邑相闻。既而又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尔等年富力强，责将奚贷！孔夫子提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耻之于人甚大，国耻实居首位。士子而不思驱倭寇，复河山，雪国耻，博文焉为？诸君勉乎哉！”

这真是声情并茂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又如讲《归去来辞》，钱先生谓“读陶诗，学写陶诗，贵在理解陶之素襟不易，缅怀陶之爱国家、爱农民之古意，如爱国诗人陆游所自勉：‘学诗当学陶’，磨砺以须，为复国成材！”念念不忘国家。

1944年，长沙、湘潭、湘乡、邵阳相继失守，寇军长驱深入我腹地，风警频传，国立师范学院由安化西迁溆浦。钱先生义愤填膺，自请留守，欲以身殉。他为《湖南日报》连续撰写讨论战局的文章。他建议：“倘在安化置一帅兵，配合外国兵势以控制湘中，如曾涤生（曾国藩）之驻祁门，衹须按兵不动，则邵阳之敌，北进西上，皆受牵制，而地形阻绝，又无法取安化，扼吭拊背，看似呆着，其实活势。”当时驻在湘西的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闻讯，驰书钱先生，劝其后撤。而先生不为动。其后，湘西雪峰山之役，我军大捷，寇退危解。钱先生给学生吴忠匡的信中说：“此番坚持不动，亦欲动心忍性，自家作一试验，不意侥幸以免于难，从前读书有会，经此一番体验，乃更进一层认识。”这是钱先生生命史上最见肝胆、锐志献身、爱国意识强烈焕发的重要一页，表现了那个时代正直知识分子的极可珍贵的志节和傲岸精神。





## 爱生若子

钱先生器才爱生，有年学院招考新生，在国文评卷时，他发现一篇考生佳作，便顺手放在口袋里，等到院方发榜时，他到院长处，拿出那篇文章说：“江南出才子，又有石声淮。”院方将石破例录取。该生入学后，钱先生衣钵相传，并将女儿钟韦许配于石，一时传为学院佳话，（石声淮1943年获第四届全国各大学国文系毕业论文竞赛第一名，授教育学士）。又一次，某生与总务处职员龃龉斗殴，被迫退学。钱先生对院方的处理十分震怒，犯颜直谏。后又写信谆谆教诲该生云：

贤弟天性直谅而不免褊急，所以触处荆棘。此后器量宜力恢宏，意气益放和平。宋儒吕祖谦少而卞急，既而读《论语》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再三诵，憬然有警。自此心气和平，终身不与人争。古人读书，变化气质，一句两句，便自受用不尽，不如曲学小儒之博文溺志，徒侈记诵，……吾辈既已不成人，然不能不教育青年做人犹之为人父者，尽管荒淫不肖，而不能不望有贤子弟也。此等心理似乎矛盾可笑，然人道之所以维系于不敝者，或即在此。

由此可见钱先生的思维逻辑、道德规范和爱生若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高尚师德。

钱先生提倡正面教育。1941年，基于校内校外诸多原因，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学生举行了罢课并在院内游行。后来校方开会，有人提出学生某某开除学籍，学生某某勒令退学，几乎与会者提出某一些学生名字，没有人反对，即算通过。其中不无假公报私者。钱先生则认为，学校应重在教育而不重在处罚，大才难于培养而易于摧残。他声言：“学院新创，才三个年级，三百来学生，如此提名，所剩有几？目前交通不便，如许被除名的学生，将到哪里读书？如果继续提名，我虽年迈，也愿同退。”由于他平日的声望，又据理力争，才得以刹住了那股处罚风，保住了不少学生。

钱先生生活俭朴，为人师表。国师在蓝田初创期间，全院教职员和学生在同一食堂用膳。每桌八人，师生混合编席，每月变动一次。但晚餐时，特别是星期六晚餐时，常有些教职员不在食堂吃饭，相邀到外面酒馆饮宴。钱先生门上贴一张条子，婉言谢绝同事们饮宴的邀请。只有院长、训导主任和钱先生等少数教师坚持每顿与学生共餐，直到1940年废止师生合餐制度。他的衣服，从单衣到羊裘面料，大都是棉布制成。非刻意俭朴，而是习性如此。正如他平生不吸烟、不喝酒一样，不是“戒”烟酒，而为习性使然。他自奉如此俭朴，

而解囊捐赠却非常慷慨。他收藏的古代铜器、玉器、铜镜、书画等珍贵文物和数万册线装经典图书是一笔巨大财富，于1950年、1952年先后两次无偿捐赠给华中大学和华中师范学院。

1957年，钱先生不幸病逝，享年71岁。他在蓝田的那段峥嵘岁月，折射出他一生瑰玮的品格。其学识之宏富精深，爱国心之炽热，教书育人之竭诚，治学之严谨，律己之苛求，待人之笃厚恺悌，给后人留下了铭心刻骨的记忆。

（作者系娄底地区教科所研究员）





# 巍然资水一高台

## ——著名音韵学家曾运乾与桃江凤凰阁

龙玉牛　胡则丘

曾运乾，字星笠，晚年自号枣园，中国近现代史上驰名海内外的音韵学家。1884年出生于桃江凤凰山资水之滨的牛潭河乡横木村。1945年逝世于教坛任上，享年61岁。为东北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著名教授。曾运乾对中国音韵学研究有独到建树，开创音韵分部研究之先声，创《切韵五声五一组考》之新学，在音韵学上无人匹敌，被评价为“清代三百年所未有也”，为后人留下了一座座无与伦比的学术丰碑，有音韵学巨著《喻母古读考》、《尚书正读》等传世。著名语言学家杨树达所著《曾星笠传》中说：“曾崛起资水间，不经师授，笃精音韵，过于前人，并时承学之士无与抗手。以湘学论，近数百年来一人而已。”杨又在《凤凰阁和星兄》诗中给予曾运乾高度的评价：“抗衡秦帝争天下，楚国雄风安在哉？何似灵均千载后，巍然资水一高台！”

山以阁名，现凤凰山为桃江著名风景名胜。山头有跃龙塔，建于清道光十四年，耸立资江岸畔，远近可见。塔下为著名屈子钓鱼台，上了《中国名胜词典》，独占山水之灵秀。曾运乾就生长于凤凰山附近，所以对凤凰山情有独钟。

民国35年10月初版的《益阳之胜地与名人》一书，其中载有《曾运乾传》，即为杨树达所著《曾星笠传》，传云：“曾运乾，桃花江人，历任湖南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以精音韵闻于时……年十六岁，补益阳县学生，十三篇《尔雅》咸能成诵，一字不遗。……湖南提学使钱塘吴庆坻创设湖南优级师范学堂于长沙，君往投牒与试，校阅者得君文大惊，拔君为第一人。入选时，掌校事者为善化耆宿刘君钜，主文史者为湘阴郭君焯莹之仲子，精汉刘氏父子流略之学，工为文辞。君即受学于郭君，益窥见古文杂说之流变。民国乍建，长沙报纸风起云涌，君才既高，能为文章，报社请为评论者踵相见。君操觚之暇，亦致力于古书，斐然有述作之志矣。”

“传”中说到他首攻音韵之学，博取唐以来各家之说，加以详分发展，定阴声9部，入声11部，阳声10部，合之为30部，使古韵分部臻于最密无可

复分。所著《喻母古读考》一鸣惊人。“及民国 15 年，任东北大学教授，将所著发布于校刊，当世治音韵者莫不惊叹，奉为定论，虽域外人之治汉学者亦莫不称许也。盖君精气内敛，能为深沉之思，于学无所不窥，上自诸经子史，下至小学训诂天文星象乐律无所不通晓，而尤邃于声韵”（引号内文字均引自“传”文，下同）。

自东北沦陷，曾运乾移讲席于广州中山大学，以《尚书》授诸生，又著《尚书正读》6 卷，其成就“清代三百年所未有也”。

曾运乾晚年喜读《庄子》，深有所悟，所见独到。对于《逍遥游》等之解释，均超过前人。

“曾君为人谦和，性刚毅而又对人以礼，与人言煦煦似老妪，于义所不可，则固执不肯。”直至重病期间，还扶病授课。临终，受其教者无不失声痛哭。他的著作除《尚书正读》及声韵学类已写定外，其《毛诗说》已由岳麓书社出版。至于《三礼说》、《尔雅说》、《荀子说》、《庄子说》及文稿诗稿各若干卷，则有待整理正式出版。

1942 年，曾运乾荣归故里，特设馆于凤凰山上之凤凰阁，体验故乡山川形胜，缅怀屈子情思，深研楚辞屈赋，旁及《尔雅》，曾氏族人请他主修曾氏族谱，他干脆将谱局也设到了凤凰阁，并在这里建立诗社，任社长，写了《凤凰阁诗并序》七律两首，寄发省内外名家唱和。一时名家云集，和诗似雪片飞来，内容均涉及凤凰阁与屈原在此创作名篇《天问》，也对曾运乾之学术成就大加赞誉。前面提到的杨树达之诗，就是此次和诗中的一首。

曾运乾在此驻足经年，对凤凰阁由情及义，发而为文，展卷挥毫，词如泉涌，遂成《凤凰阁记》千古美文。其所写与范仲淹之《岳阳楼记》不同，范未曾到过岳阳，而曾运乾则生于斯，长于斯，驻于斯，加上他是研究音韵学的大师，所以辞章除文彩飞扬，更是音韵铿锵，特别是连串排偶，运字酌句，对仗工稳，自然流畅，琅琅上口，韵味无穷，读来真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知肉味”之感。所以我们不忍独享，特别推介这篇美文于读者诸君，以资共享，更期凤凰阁与《凤凰阁记》声名远播，传之后代。

下附曾运乾《凤凰阁记》全文及《凤凰阁诗》，均是我们从《曾氏族谱》中抄录所得，首次披露，更为难得。这在曾运乾已出版文稿中是无法读到的。

## 凤凰阁记

盖闻游洙泗者，缅邹鲁之风；过广武者，吊英雄之迹；地顾不以人重哉！益阳地介湘沅，县分秦汉，西驰叙浦，道接辰阳；东下临资江，通汨水，则属大夫经行之地也。县治（指益阳城——编者注，下同）西桃谷山者，北临资





水，旁带西溪，望浮丘不一日而达，离县治六十里而遥。花洞春冥，金銮有墓(指花园洞，相传屈女葬于此)，钓矶水咽，岩濑留台（指钓鱼台），则屈大夫流寓之乡也。山腰建阁，窈然深藏，四围茂木，经岁皆春，一院绿阴，当炎不夏。枕流则琴弦悦耳，呵壁则鬼物惊心。当江山繁会之区，动今古苍茫之感。说者谓屈大夫作《天问篇》于此，后人因此筑天问台焉。循麓东行不数百步，是日潭湾，山则蜿蜒起伏于东南，水则荡漾渟滢于西北。竹竿万个，如游渭上之村；江橘千头，不数武陵之宅。梧桐生处，于彼朝阳；竹实累然，最宜阿阁。盖屈赋取鸾皇以媲君子，后人即揭凤德以表忠贤。飞阁流丹，翔鸾舞凤。祝庚桑于畏垒，不逮生前；祀贾傅于长沙，犹隆奕世。是曰凤凰阁。唐虞世远，麟凤偕游，夏屋阴浓，幈幪斯托，没而可祀于社，神有功德在民。祝揽揆于三寅，桂醑与椒浆并馥；竞渡河于重午，绣旗与画桨齐飞。盖自朱明初叶，以逮民国复兴，迩来五百有馀年矣。壬午癸未之交（1942 年），支谱续修，设局兹阁，自秋徂夏，岁序环周。览景物而流连，感先畴之佳胜。盖有萦回往复于吾心者。当夫秋高气爽，境与人宜，落木千山，云天万里，澄江一道，水月双清，塔高则笔势凌云，潭静则鉴明澈底，彼一时也。若夫潦水全收，寒风正厉，钓艇与惊涛出没，江帆偕沙鸟遥飞；岭际贞松，经冬弥茂，江头梅蕊，与雪俱芳，彼又一时也。及夫物换星移，青阳司候，风经花信，时号花朝，新涨初生，渔汀半蚀，春风煦物，岸草全敷。杏桃蒸远近之霞，兰芷分湘沅之气，此一时也。洎夫时当夏节，尤适人和，多竹生寒，更无暑令，垂杨匝岸，满布清阴。钓矶则水夕生凉；远岫则云峰善幻。盈畴禾黍，互祝西成；遍地桑麻，都呈活气，此又一时也。徘徊瞻望，弥历岁时。世德宗臣，百世之衣冠如接；春朝秋夕，四时之光景常新。凡物候之推移，并兹役所经历，不为记载，后景难摹。呜呼！幽谷楼高，是少日读书之地（清光绪壬寅癸卯间与同学会读于天问阁）；名园洞口，亦当年辑谱之祠（清光绪乙己丙午修支谱于董斯桥祠。曾几何时，顿成隔世。二千年之古迹，天问榛芜；五百载之神宫，旧庐宛在。欲问钓游胜处，谁记童年；回思编校同人，半登鬼录。叹沧桑之善变，感兴废之靡常。到眼者历历江山，照水者星星鬓发，盖风景无异，而朋辈则仅有存矣。夫文章为经国之业，功德为不朽之基，炎炎之火未足掩日月之光，赫赫之功宁足摧忠诚所寄。草赋之危档纵圮，来巢之杰阁犹存，虽乏登临，足资观感。事君资于事父，教孝即以教忠。屈大夫之志洁行芳，与吾先祖之兰熏雪白，道惟一贯，把并千秋矣。其惟任重道远，履薄临深，植我嘉树，广《橘颂》于天荆地棘之秋；摅我幽情，振商歌于圣伏神徂而后。民国三十有二年癸未夏月，枣园运乾记。

## 凤凰阁

(一)

凤凰台上凤凰游，(李白句) 芜绝东门沉藻宅，

栖迟南国此椒丘。(资江自桃江滩流至阁前为伏流) 往日遄飞迈九州。

当轩塔尚凌霄出，漫道问天何处所，

畏垒尸祝自春秋。咽石滩仍绕阁流。

(二)

麟凤相依便作家，先公曾此览芳华。

秾桃添得江山色，竹箭争抽雨露芽。

楹有藏书宜子弟，园无杂木碍桑麻。

何当更耸东西阁，收取江天灿烂霞。

(编者注：括号内文字为原注。)

(作者单位：桃江县地方志办公室)





# 傅熊湘先生二三事

廖新民

傅熊湘，又名钝安，字文渠、君剑。1883 年（光绪九年）生于醴陵黄獭咀双井村。自幼聪颖，14 岁学完六经。后入绿江、岳麓两书院。曾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回国后到上海，与宁调元等创办《洞庭波》杂志，又与胡适、丁洪海等创办《竞业旬报》，均以宣传覆清兴汉、倡导民族革命为宗旨。此间与柳亚子结为挚友。继而与柳亚子、高天梅、蔡哲夫一同组织创建南社。又与张默君在苏州创办《江苏大汉报》。1911 年回湘任《长沙日报》总编辑，针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中国非袁世凯莫能治”之说，他以锐利的眼光，辛辣的笔调抨击袁世凯。他不仅是当代的才子，而且是当代倡导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现在他的家乡还流传着他很多动人的故事。

### 避难玲珑馆

因反袁世凯的领袖黄兴和一大批革命志士是湖南人，袁对湖南刻骨仇恨，故选派刽子手汤芗铭任湖南都督，大肆捕杀进步人士达七八千人。傅熊湘也是被汤芗铭列为黑名单上的主要人物之一。傅闻讯后，连夜由长沙潜回醴陵。但此时湖南全省一片白色恐怖，醴陵城内亦侦骑密布，无人敢收留傅。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通过旧友刘镜心去造访熟识的名妓黄玉娇。玉娇其时正闭门谢客，脱籍家居于寓所玲珑馆。她对以逋客身份来访的傅熊湘，独具慧眼侠胆，毅然收留掩护，傅才得以逃过搜捕，免遭杀害。在玲珑馆匿居期间，傅与玉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形影相依。几个月后，傅改避往醴陵北乡凤凰山华严寺。傅为感谢玉娇的救命之恩，在离玲珑馆时赠《浣溪沙》两首。其一曰：“欲写离愁一万重，可堪流水自西东，三更疏雨五更风。未办白头终有约，即抛红豆更何从，浮生踪迹似飘蓬。”其二曰：“好梦如云不自由，是仙是幻是温柔，碧桃花底醉春游。世事沧桑心事定，他生缥缈此生休，人间无地署无愁。”

后来傅又多次与玉娇约会。但因傅已是有妇之夫，两人终未能缔结良缘，只得劳燕分飞。尔后的日子里，傅常思念起这段不平常的经历，又赋诗多首，

皆情真意切。因傅的书楼寓所雅号红薇馆，他便将这些诗词集为《红薇感旧记》。柳亚子读此集之后，为他的情义而感动，并赋长诗《玉娇曲》一首。南社同仁也相继而动，纷纷题咏。傅便将其抄录整理成《红薇感旧记咏集》。

## 湖大演讲　轰动全校

1915 年，蔡锷在云南宣布讨伐袁世凯，西南诸省响应，袁不久被迫取消帝制，汤芗铭被逐出湖南。傅熊湘又重返长沙，主持《长沙日报》。在此期间，湖南大学邀请傅去演讲。当傅步入会堂时，学生见傅个子不高，穿着朴素，身体微胖，台下议论纷纷。傅见此况，不慌不忙走上台，手执粉笔，背向黑板，反手在黑板上写了一“静”字。学生们见傅用反手能写出一个很漂亮的“静”字，顿时鸦雀无声。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博得台下阵阵掌声。湖大的学生无不佩服傅的渊博学识和反袁的胆略。

## 不畏强暴　驱逐警察

1919 年，傅熊湘任长沙《国民日报》总编辑。他主持言论，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刚直不阿，不畏强暴。一次，因评论某事而触怒一政府大员，当天晚上，有三个便衣警察，气势汹汹地闯入傅的住宅，用手枪直顶傅的胸膛，威逼他要在报上发更正稿，并赔礼道歉。傅听了大发雷霆，说：“你们是为了报上登的文章而来的，给我快滚，快滚开!”那三个便衣警察，理屈词穷，便灰溜溜地走了。傅的文章登出后，震动了三湘四水。有一次，傅赴武汉公干，同船的人不知他是《国民日报》总编辑，闲谈中交口称赞该社作者倦还（傅的笔名）之笔如利剑，大胆泼辣，说出了百姓的心里话。

## 关心社会　心系百姓

傅熊湘十分关心家乡。1924 年，当他得知陈盛芳为首倡修渌江桥时，他积极参与，并被推选为主修。为了减轻全县人民的负担，他以湖南省政府秘书长和省议员的身份，发动渌江河往返船只，都要承担运输长沙丁字湾麻石的任务，规定根据吨位大小，每条船承运麻石 2 至 10 块不等。这样一来，大大节约了修建渌江大桥的经费。

有一次，傅熊湘回醴陵公干，刚到县城就听说磅山傅姓有 30 多人抢劫大屋垅吴姓的东西，法院准备捕人。傅直往地方法院询问清楚。他在法院查看了被告名单，大都是老实农民，而且大多数家里富有，为什么会搞抢劫呢？便建议法院一定要调查清楚，再作定论，不要随便捕人。后经法院重新调查，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傅姓有一女子嫁给大屋垅姓吴的，嫁后不久，有一晚姓吴的回





家很晚，妻子怀疑丈夫在外面有隐情，两人争吵起来。吴向傅猛击一拳，傅由于被击中要害而致死。傅姓得知后，便来了 30 多人要讨个公道，吴姓反而恶人先告状，诬告傅姓抢劫。

傅一生著述颇丰，诗词、史实手稿近 30 部之多。这些书籍在土改和“文革”中均被焚毁。值得庆幸的是，省市图书馆还有他的少量著作，如《钝安遗集》、《段注说文部首》、《离骚章义》等。

（作者系原醴陵市外事侨务办主任、离休干部）

# 夏鼐与湖南文物普查

吴铭生

夏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专家，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副院长、学部委员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等要职。先生于1985年辞世，距今已届二十年，斯人已去，他那种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风范，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终生难忘。

我有幸与先生结识于1953年，那时我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先生是该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又是我们的授课老师，彼此虽接触时间不长，但他高才饱学的学者风度，使我们十分敬仰。在训练结业后的1956年，我又出席了全国第一次考古工作会议，在北京饭店再次见到先生，聆听了他和其他考古学家的学术报告，大开眼界，受益匪浅。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不幸于1957年10月被错划为右派，自此与先生中断联系长达22个春秋，失去了向先生求教的机会，深感遗憾。

可喜的是，1979年国家拨乱反正，在政治上还我清白。本人有幸继续从事考古工作，自此又与先生恢复了联系，鸿雁传书，屡有赐教。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古代冶金国际学术会议及以后的全国考古学会年会相继见面时，先生对我所遭受的厄运深表同情，并嘱我振作精神，努力工作，再建业绩。先生谆谆教诲，对我晚年的工作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鼓励和促进作用。

1984年，我在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任副主任时，正值全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省文化厅委我重任，授命为省文物普查办公室副主任，主持普查日常工作。当时，我对此重任有所犹豫，认为自己年龄已是57岁，临近花甲之年，只待3年就要退休，同时感到文物普查任务重、难度大，思想上有一定的畏难情绪。于是，我将此情禀告先生，以期指点迷津，信发出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收到复函，如此之快，诚难预料，表明先生对我的厚爱和关怀。先生来信说："普查工作现在进行得顺利否？此项工作要有耐心，要假以时日，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我比您还大十多岁，明明知道许多工作都没有法子完成，但是





起了一个头，子子孙孙可以继续干下去，终有完成的一天。"我捧读此信，对照自己的思想反思，甚感惭愧。首先，我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不高，年龄还不到花甲，就想坐等退休养老，怕苦怕累，缺乏老有所为的壮志，而先生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长者，仍不辞劳苦坚持工作。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敬业精神，值得我敬佩和学习。十分可贵的是：先生在信中为我指出了文物普查工作的艰巨性：一要有耐心；二要假以时日；三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这"三要"就是搞好文物普查工作的关键，对湖南乃至全国各地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作用。于是我下定决心，秉承先生的教诲，把湖南的文物普查工作当作晚年的事业。1984年11月，我即率队到常德地区临澧县进行试点工作，从中摸索了一些经验。然后，在各地分批用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开展步行拉网式野外调查，经过各地普查队员3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全省106个县市的普查，共发现文物点1万多处，其中有不少重大的新发现：如旧石器遗存、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和彭头山文化遗址等。在野外调查后，我又组织队伍进行重点复查，并在省博物馆举办了"全省文物普查成果展览"。此展览展示了湖湘大地丰富的文物遗存，赢得了正在长沙召开全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会议与会者的好评，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沈竹同志也给予了赞赏。之后，我又不失时机，组织各地整理普查所获得的资料，为全省106个县市编写《文物普查资料汇编》，留下了永久性的档案，并为编辑《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打下了基础。据说类似这样以县市为单位的普查资料汇编，在全国各地不可多得，仅我省做了这件既系统又细致的工作，传之后代，堪称珍贵。在上述野外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阶段，我的确是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既要到各地协助举办普查培训班，参与试点，又要编印普查工作手册和简报，还要召开现场会，总结经验，指导全局。由于我们对工作安排得当，起到了龙头作用，使各地普查有序进行，没走弯路，如期完成了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990年，我省开始《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编辑工作，我被委任常务编委兼编辑组长。为了使这本分册具有特色，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达到精品效果，我不遗余力提高编辑质量。在丰富县市文物分布图内容时，我和文博同志多次到省图书馆求人查阅志书，复印明清时期古城邑图，作为附图，增色不少，效果颇佳；在编写各类文物单位简介时，为了达到体例规范，要素齐全，我和师悦菊同志冒着酷暑，不辞劳苦到各地巡回辅导达一个多月之久，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该分册由我负责统编统校，校对工作量特大，仅条目文字就有100余万，为了尽量减少错误，前后校对过五遍。尤其是索引的校对，更是令人头痛，字型小，行距密，只好用放大镜一行一字去查对文字的页码和地图上的坐标网格，看久了头脑发胀，眼珠好像要挤出来，就用冷水洗脸清醒解

困。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校对无差错，获得省新闻出版协会颁发的校对三等奖。为了使重点文物图 48 版彩照的制作，达到光彩夺目的理想效果，我在彩印公司与电脑作业人员共同制作，不断修改，在质量上下功夫，最后获得成功。当出版社开机印刷文物地图时，我十分不安，其原因是该社设备老化，两色机要印六色图，连续套印三次，能否成功，没有把握。那些日子，我守在车间检查质量，中午与工人一起在机旁吃盒饭，连续跟班作业。经过工人师傅的努力，发挥了他们的技术水平，终于在设备较差的情况下，印出了高质量具有等高线的文物地图，令人喜出望外。

这本分册经过 8 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 1997 年 12 月面世。从其内容而言，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率先使用等高线；二是增加了县市古城邑图；三是增补了全省文物普查后 10 年内新发现的文物点；四是增补了我省全国重点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由于这本分册内容较为丰富，印刷较好，且有地方特色，因此受到北京总编委和国家文物局领导的肯定，尤其是对我晚年的敬业精神给予了好评。

星移斗转，马齿加长，如今我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回顾我参加湖南文物普查工作试点起，到编辑“湖南分册”出版的全过程，苦干了十四个春秋，为本省文物界做了一件实事，也获得了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省文化厅颁发的“全省文物普查特等奖”的殊荣。值得欣慰的是，使我在右派生涯中所虚度的年华，从中挽回了 10 年，弥补了过去的遗憾。同时也可告慰已故的恩师夏鼐先生，学生没有辜负您的教诲，本着您提示的“三要”精神，使湖南的文物普查工作不仅大业告成，而且出版了“湖南分册”，结出了可喜的硕果，并荣获了第五届（2000 年）湖南图书奖二等奖。

（作者系本馆馆员）





# 鸿才鸿图　大德大年

## ——记湖南日报原社长朱九思同志

柏　原　李冰封等

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无论是老新湖南报人，还是其后湖南日报一代又一代的职工，都深深怀念着它的主要创办人之一——朱九思同志。他那坚强的开拓创业精神，规划宏远而又求真务实的作风，既严格要求又爱护部下的领导风格，一直存留在人们的心中。他是报人的楷模。在朱九思同志九十华诞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他当年的部下，心潮起伏，回忆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 声震全国，讨论李四喜思想

《湖南日报》的前身《新湖南报》，是 1949 年 8 月 15 日创刊的，李锐任社长，朱九思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他们都是 20 世纪 30 年代在武汉大学的同学。朱九思原本在解放军中任职，1946 年 6 月在热河时，李锐动员这位老同学和他一起办报。朱九思先后被任命为《冀热辽日报》（后改称《群众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和《天津日报》总编辑。1949 年，两人率部一同南下到湖南。在他俩的主持下，《新湖南报》一开始就办得非常出色；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李锐写作的有关这场战争的一系列社论、时评，是全国省级报纸的首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省委委员、宣传部长周小舟出任湘西区党委书记后，1950 年 12 月，李锐调任省委宣传部代部长，朱九思继任新湖南报社长兼总编辑。

朱九思善于把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与报纸工作的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由此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项就是“派出去，请进来”。“派出去”是于继任的当月将编辑部农村组组长张山林派到长沙县十五区任区委书记；并在 1951 年 2 月在衡阳、邵阳和常德设立三个办事处，派出强有力的记者，负责这三个地区的新闻报道。“请进来”是请有关各个方面的负责人到报社，向编辑记者介绍有关的方针政策和下面的实际情况。很显然，这样做使编辑记者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实践中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心中更有数了，反映到报纸版面上，强有力的报道和生动活泼的新闻更多了，受到了各

方面的欢迎。办事处的设立，即为稍后成立记者站的先声。

1951年6月，张雨林在区委书记任上工作半年后回到报社，向编委会汇报，张雨林谈到，土地改革结束后，农村干部比较普遍地产生松气退坡思想，有一个叫朱中立的，他十二岁起就当长工，受了十二年苦，新政权建立后进行土地改革，他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因而被推选为副乡长和青年团支部书记。土改后，他家分得了田，他结了婚，生了孩子，还当了干部，可说是四喜临门。就在这时候，他提出辞职不干了，说"大家都分了田，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朱九思听完汇报，立即感到朱中立的思想状况具有代表性，是农民小生产者思想的反映，报社应当抓住这一典型向农村干部和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并建议以在报纸上开展讨论的形式进行。编委会一致同意九思社长的意见，考虑到不宜用真名实姓，这位乡干部四喜临门，就起个假名李四喜吧。1951年7月18日起，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1952年1月8日，长达五个多月时间。

数十年后，张雨林回忆九思社长决断这次讨论的情况时写道："九思同志政治上的高度敏锐性和决定问题的明快果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讨论是由农村组副组长柏原主持，柏原回忆说，对于这次讨论，九思社长抓得很紧，体现了他那种认真负责、勇于开拓进取的工作作风。

讨论一开始，报纸上每天都发表干部和群众的来稿，在全省范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编辑部每天收到几十封甚至近百封参加讨论的来信。九思同志不满足于听取汇报，他作为社长兼总编辑，亲自下到农村组了解情况，实施第一线的现场指导。

1951年8月8日发表题为《广泛展开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的社论，论述开展讨论的意义，分析讨论的情况和问题，要求有关各级领导重视这场讨论，加强领导。8月18日，发表题为《更广泛深入地开展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展开讨论后一个月的情况报告》，指出开展讨论的"地区还不够大，范围还不够广泛，有的是自发讨论，没人去领导，问题未解决"。8月25日发表省委第二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的专文：《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强干部思想教育》，这可以说是省里的主要领导人也参加这个讨论了。

9月，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首次对《新湖南报》这一讨论发表评论，在《读者讨论是加强报纸思想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专文中说道："《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这是一次组织得很好的讨论。"《新湖南报》于9月15日转载了这篇专文。

9月20日，《新湖南报》发表题为《各地领导机关逐渐重视和推动了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文章，评述讨论进行到第二个月的情况，肯定已经取得的成





绩，提出了进一步展开讨论的意见。9月25日，发表《朱中立报告克服李四喜思想的经过》，朱中立就是李四喜的原型，由他报告克服李四喜思想等于是现身说法。这篇发表在二版头条的通讯，是李冰封采写的，李冰封是读者来信组的组长，不是农村组人员。这说明，为了进行这一重要题材的采访，总编辑在编辑部内部实行人力的统一调度。

10月，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发表题为《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说明了什么》的社论。此前，该报曾两次综合报道这个讨论的情况，向中南地区各省作了介绍。现在这篇社论说："这个讨论，组织得是好的，发展得是健康的，起的作用是很大的。"社论最后写道："《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为各地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经验……我们郑重地向各级党的组织和各地的报纸建议：在（土改）复查以前，选择你们那里的李四喜式的思想典型，首先在报纸上展开讨论，然后由各地党的组织广泛地有领导地扩展开去，坚持到底。"为了落实这一建议，中南局特地请王首道于11月23日在中南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演，向中南地区各省具体介绍新湖南报组织李四喜思想讨论的情况和经验。《新湖南报》分别于10月13日和12月1日转载了上述社论和王首道的讲演辞。

在李四喜思想的整个讨论过程中，《人民日报》曾四次发表文章，予以介绍，中共中央宣传部也曾发出通知向全国推介。因此说，李四喜思想讨论的影响已经扩及到全国范围。

在湖南日报报业史上，李四喜思想讨论已成为经典之作；一代一代的报人不断地传颂这个讨论的成功经验，"逢十"周年大庆时的大型纪念册，都曾复制了当年重要讨论稿版面，再现往日的辉煌。

## 重视评论，抓典型连续报道

那时报社有一项日报制度，就是各部门每日上午将最新的情况和问题扼要填写在日报表上，交总编辑和编委会阅处。1951年4月初，一份日报表上反映，新学期开学后出现一个新情况：中学生严重缺员，长沙市上期有高中学生四千五百多人，本期只有一千五百多人，减少了三分之二；有的学校的高中甚至不能开班。其他城市学校也有类似情况。省人民政府对此作出增加公私立中学助学金比额的决定，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对地主子女就学给予便利。九思社长认为这是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他立即批示配发短评对此进行评论。4月7日，一篇题为《农村地主子弟出来上学问题》的短评，刊发在二版头条位置。短评指出："对于地主子弟，应将他们从地主中区别开来，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学生已成为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要给地主子弟以

继续上学的便利，鼓励他们出来上学。如家庭经济情形确实困难的，就要给他们打证明，以便领取政府的助学金。"这样的评论是十分及时有力的，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不言而喻。

朱九思像李锐主政时期一样，非常重视报纸的评论工作，做到天天有社论，有时还不止一篇；除社论外，还有其他多种形式的大小言论。1951年4月下旬的一天，李冰封被找到总编辑办公室，朱九思对他说，时事方面有"时事谈话"，农村方面有"农村工作谈话"，厂矿企业方面有"职工生活谈话"，都是短小精炼的言论栏目，很受读者的欢迎。《读者来信》专栏联系各阶层的广大读者，是不是也设立一个小言论栏目呢？李冰封表示完全可以，总编辑立马说道："那就一个星期后见报吧！"4月7日起，《大家谈》小言论就随同每日发稿的《读者来信》专栏和读者见面了。最初几篇的题目是《不要单纯追求形式》、《不要老一套》、《精简开会》、《迷信要不得》等等，议论的话题有针对性，也有吸引力。

1950年党中央发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后，那一时期的报纸很注重这一方面的报道，《新湖南报》也是这样，各个版面几乎每天都有多种样式的批评稿件。九思总编辑的指导思想则是着力去抓典型事件。1951年11月初，一封读者来信摆在总编辑的案头：长沙市居民巢庆元，患卵巢囊肿，6月29日入住湘雅医院，手术后不久，即感腹痛，继续在该院多方治疗，均无效果；10月23日，病人再次入住该院，辗转几个科室，最后才诊断出腹内有异物，再次开刀，原来是一把五寸长的剪刀——前次手术时遗留在腹内的。九思总编辑立即指示首先进行调查，核实情况后以此为典型展开连续报道。11月15日，《新湖南报》公布巢庆元的来信和记者的调查报告，迅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九思社长对身边秘书说，湘雅医院的党委领导人、副院长孟献国，是他战争年代的战友，当过团政委，有水平，也很能干，出了这样重大的责任事故，真让人遗憾。11月18日，长沙市卫生局召集市各医院负责人开会，由市长主持，研究各医院发生医疗事故的原因，提出进一步整顿医疗作风。11月21日，《新湖南报》发表省人民政府卫生处专文，要求全省各医疗单位从湘雅医院此次医疗事故中吸取教训，整顿医疗作风，消除医疗事故。此后报纸先后发表省会多家医院检查医疗事故的文章，以及孟献国代表湘雅医院所作的检查报告。最后，1952年1月22日刊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的专文：《做一个新型的人民医务工作者——对巢庆元、张元瑞差错事件检查讨论的初步总结》。这一系列报道不仅震动了全省医疗界，而且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报纸是实实在在为他们的切身利益说话的。





## 严格要求，一往无前抓到底

"好厉害的总编辑！"有人对朱九思发出这样的评论。总编辑善于抓方向性问题和主要问题，而且一抓就抓得很紧，一着紧似一着，一直抓到底。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他这种开拓进取一往无前的精神和做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理解或者完全接受，但最终成功了，胜利了，于是在心头发出"好厉害"这样由衷的赞叹。不论是写文章，还是作报告，抑或日常处理事务，朱九思的语汇中是没有套话空话，也没有含糊其辞，没有模棱两可的。有时批评人也是毫不容情的。没有严格要求，婆婆妈妈的，也许成就不了大事情。他的批评是从工作出发，是出于好心，受批评者一时也许难过，过后一想也就没事了。如果他发现批评错了，他会向被批评者承认错误，并且道歉的。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在编辑部的飞行集会上，九思总编辑对工矿组的一位负责人说，请你回答：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们的目光都投向这位负责人，弄得他脸红到耳根，但他还是起立作了回答。原来早几天工矿组发了记者写的一篇通讯，反映一家工厂工人战高温出炉碴的情景，稿中把火红的炉碴比作工人不畏艰苦的品格，引起该厂职工的不满，来信提出异议。总编辑招呼这位负责人坐下后，批评道："那么，为什么出自你们工矿组的稿件，竟然把废碴比作工人阶级的高尚品格？把工人和工人阶级置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个批评的方式和批评的措辞都是严厉的。在第二天的飞行集会上，朱九思首先向这位负责人道歉，说他昨天没有深入了解情况就作批评，而且过于严厉，错了。事实是，这篇稿子虽是工矿组发的，但不是他经手，是另一位负责人签发的。领导人公开承认错误，公开道歉，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正好说明总编辑襟怀坦白，他是真心诚意地关心和爱护干部的。至今，在当年的部属中，还流传着他手把手地教人写作、在学习和生活等诸多方面关爱人的动人事迹。

## 百年大计，新闻大厦巍然屹立

在李锐主持工作期间，朱九思侧重抓报社的经营管理方面的工作。虽然接收了几家国民党报社的房屋和设备，那是器材陈旧，厂房狭窄，不用说没有职工宿舍，连编辑部都是分散在几处地方办公。在这百废待举千头万绪的时刻，朱九思的大手笔，或者说他要建立的"王国"，是要在这一片废墟之上，创建一个新闻出版业的"托拉斯"！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无法从国外采购先进的印刷器材，朱九思一面"就地取材"，多次到天心阁下一家私营机械厂去，和精通印刷技术的尹老板商谈改进事宜，并购置了几台对开平面印刷机，以应急时之需；又一面立足高起点，派人到上海金城机器厂定购了国产

的第一台高速轮转印刷机。同时想方设法收购了原私立岳云中学和兑泽中学闲置在荷花池地区的两大块土地，有了这连成一片的土地，他就开始实施蕴藏心中已久的蓝图了，他要在这里建起一座巍峨的大厦！

他首先找到省委书记黄克诚，向他汇报新湖南报办公房和印刷厂房的困难情况，希望批准建立一座集办公和印刷厂房于一体的办公大楼。按照那时情况，是难于一下子批准朱九思的要求的，因为解放才一两年，财政状况不很好（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湖南省内还没有建过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建筑，湖南省人民政府是在国民党时期的省政府里办公，湖南省委也还挤住在原国民党省党部的房子里，都感到房子不敷应用。记得那时省里召开全省性的大型会议，如劳模大会，代表们是分散在几所中学住宿的。最终省委还是批准了新湖南报建房子。朱九思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曾经撰文回忆这件事，他写道："特别是报社的大楼，是我向他（指黄克诚）陈述困难后，经他批准修建的。'三反'、'五反'开始，他又亲临大楼工地，看有无不当之处。我这里之所以用'特别'二字，是因为这是解放初期长沙兴建的三个较大建筑之一，当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也说明他对新闻工作的重视。"

三个较大建筑中的两个都是砖混结构，唯独报社大楼是钢筋砼框架结构，这种结构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楼房设计、原材料采购、施工保障等方面的工作，都是按照九思社长提出的高水平、高质量的要求进行的。报社总编室副主任陈牧天，是原西南联大学生，土木工程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同时又是写社论的"笔杆子"，但为了大楼建设这关乎百年大计的大事，九思社长还是把他派驻工地，负责监督工程质量，保障工程顺利进行。1951 年冬挖基脚时，前门处一段出现淤泥——这儿是荷花水池的底层，九思社长十分关心，多次前往察看，指示要去请教专家，研究切实措施，要做到基础牢固，避免沉降不匀的隐患。1952 年初，"三反"、"五反"开始，有人对兴建报社大楼提出种种责难，以至省委书记黄克诚要亲临现场，看一看有无不当之处。经过听取汇报和实地查看，黄克诚再一次点头认可了。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栋大楼依然巍然屹立。正因为当初采用钢筋砼框架结构，而且基础牢固，后来才有可能在北厢房原有三层上增加了一层，南厢房原有一层上增加了四层，建筑面积由原来的六千多平方米增加到一万一千多平方米。20 世纪 50 年代初建的办公大楼至今还在使用，也许在全国省级大报中绝无仅有！现在不仅湖南日报各个部门在这栋大楼办公，它的一家大型子报三湘都市报也都在这里办公。怪不得这栋大楼里的几代报人，都要由衷地赞赏当年决策者的远见卓识！





## 雄心壮志，筹办新闻出版业"托拉斯"

朱九思除了在新湖南报的任职外，1949 年秋还被任命为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在广播设备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原有设备国民党败退时西迁贵阳），要求广播电台迅速开始播音；1950 年 6 月，湖南省人民政府设立新闻出版处，负责领导和管理全省的新闻出版工作，李锐和他被任命为正副处长（实际由他主持操办）。此时此际，他一手准备筹办出版社，一手又在策划办一份面向农民的报纸，因为土地改革即将开始。当时，长沙市委办有一个面向城市和工人的报纸——《大众晚报》。这份报纸办得不错，李锐、朱九思对它甚感兴趣。在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将要召开，省农民协会旋将成立之际，他们建议省委与长沙市委协商，将《大众晚报》易名为湖南《大众报》，作为省农民协会的机关报。于是，朱九思又兼任大众报的社长。在新湖南报社的工作已经不轻，再加上这么多兼职工作，朱九思不但没有压头的感觉，反而是满心欢喜，因为这正是他心目中的新闻出版业"托拉斯"的第一步。（这"托拉斯"不就是今天的报业集团吗？）面对这么多的工作，朱九思却抓得有条不紊，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主要抓大政方针，充分信任和依靠有关专门人才（包括党外进步人士）和群众的力量，放手让他们去干。

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想方设法，或借用器材，或自行改装，当年 11 月 7 日长沙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尽管效果仅及市区。一个多月后，1950 年元旦，发射范围扩大到市郊。从无到有，毕竟路已经开通了。

新湖南报迅速建起了三个印刷厂，其第二印刷厂不久上收到省工业厅，为现今新华印刷厂的前身。

1950 年 8 月，全省性农民报纸《大众报》问世，四开，三日刊，迅速发行到三万多份，最高达八万份。次年 4 月 15 日，《人民日报》发表《通俗报纸长沙大众报经验介绍》专文，充分肯定了《大众报》的经验。

1951 年 7 月 1 日，由新湖南报创办的《大众画报》出刊，为半月刊，虽然为时不久，但成为《湖南画报》的先声。

这里着重谈到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的情况。为适应湖南广大工农群众的需要，1951 年 1 月 10 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正式成立，在几个月时间内，就作出了令人惊喜的成绩。4 月 29 日《人民日报》刊发《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走对了方向》专文，肯定其面向群众、面向农村的出版方向。中南局宣传部于 5 月 5 日向华南分局和所属各省市宣传部发出通报，指出"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以不多的钱和极少的人力为工农群众作了非常有益的工作，这种作风值得各地效法。"这家出版社是朱九思 1950

年9月参加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后，根据会议精神，遵循《共同纲领》，与民主同盟的康德、严怪愚同志以及民主建国会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亲密合作，以《大众报》为依托而迅速筹建的。当时采用公私方共同集资合营的办法，以解决资金问题，以傅白芦为总编辑的《大众报》编辑部兼任出版社编辑部，以书业经营者中的干才组成经理层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效能的编辑和经营管理的系统。出版社一经正式成立便源源不断地出书，据1951年4月25日朱九思向中南局宣传部的报告，到4月中旬已出通俗读物九种和政策法令一种，发行数达五十六万五千册；正在印刷的七种，计十六万册；正在再版的五种，为十一万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出了如此突出的成绩，并获得上级主管部门如此充分的肯定，真可说是“朱九思旋风”！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是新中国诞生后湖南新建的第一家出版社，是现今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前身，也是当时新解放区各省、自治区最早创建的综合性地方出版社之一。前几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庆祝成立五十周年，许多人回首往事时都深深怀念朱九思社长，称他为湖南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但他谦逊地说：“如果有奠基者的话，出版社创建初期的许多同志都是奠基者，我的主要工作在报纸，最多只能忝列为其中的一员。”

## 献身高教，永远向前

1952年底，朱九思被调离新湖南报，担任省教育厅常务副厅长。1953年6月，中南局将朱九思调往武汉，出任新组建的华中工学院负责人，从此开始了他在那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大学管理和大学教研的生涯，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教育家。

1961年，他在华中工学院任上，因事出差到湖南大学，旧地重游，引发他无限的思绪，他特地来到新湖南报的大门口，他在离开湖南时，曾经为之呕心沥血的报社大楼还没有落成，现在大楼巍然屹立在眼前，可是他不想进到里面去，进去找谁呢？往日大部分同事都被打成“异类”，他们正在受苦受难，人事沧桑，真是不堪回首啊！他只是在大楼外来回走了两趟，便匆匆离开了。

我们这些他当年在新湖南报时的部属，为朱九思在1953年离开湖南而庆幸，要不然，到了1957年很可能逃不脱那一场劫难。华中工学院是一片新天地，在那里，他的智慧和才干，得到很好的发挥。我们曾经读到他一篇谈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文章，一个真正有作为的人，就是希望有这种自主权，只有获得了自主权之后，才能够尽情地施展他的才华。由华中工学院到华中理工大学再到华中科技大学，这种大发展，可以说是得益于高校办学自主权而获得的。因此，他离开湖南，我们不仅为他本人庆幸，同时也为这一著名学府庆幸，为万千学子庆幸！

现在，朱九思年届九十，却耳聪目明，身板健朗，至今仍在华中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并指导研究生。与此同时，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关注着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那永远向前的进取与追求，是向着美好的未来的！

（按：本文系集体写作，由罗印文执笔）

# 出师未捷身先死

## ——章士钊先生在香港

陈书良

时光老人是无情的，他将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少年送到生机勃勃的中年，又飞快地使他们进入暮色苍茫的晚年。1973年，是92岁的章士钊人生的最后一段驿程。

这两三年来，章士钊的生活有苦寂，也有愉悦。1970年，奚夫人因肺炎去世，章士钊失去了相依为伴的老妻，而殷夫人携养女章眉又远在香港。荒原多古意，孤桐立秋风，因此他的内心世界是很寂寞苦闷的。这几年，他的听力衰退得很厉害，肺部也常感染，所以经常缠绵病榻。

令章士钊感到愉悦的事是小女含之的有出息以及她即将与乔冠华结婚。在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下，1971年早春，章含之调到了外交部工作。适逢其时，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始，接着是中国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令世界震惊的《上海公报》，再接着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外交以一系列精采绝伦的行动，向世界表示了轰轰烈烈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最具历史魅力的风采。章含之有幸参加了这些工作，以自己的才华和聪慧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章士钊从电视中看到了毛泽东与尼克松扭转乾坤的握手，看到了周恩来指挥若定的调度，看到了邓小平在联大雄辩的发言，看到了乔冠华在联大落座时惊世骇俗的仰天大笑，也看到了女儿风度宜人的陪同翻译。在医院的章士钊闪动着泪花，对前来探望的章含之说："你现在做大事情了，我很为你高兴。你能到今天，我没有为你做过什么事，你不要怪我。你自己走自己的路更好，你三个哥哥，一个都未能成大业。我没有想到你自己奋斗出来了。你跟共产党走是对的。章家门里能出你这样人才，我也安慰了。"

在外交战线繁忙的工作中，章含之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他们准备结婚了。对此，章士钊十分欣慰。他对冠华和含之说："我一直认为周总理之下冠华是最出色的外交家。记得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我从香港同其他许多党外民主人士一起乘船回北京定居，正是冠华





代表党中央陪同我们回来的。当时他辩才无碍、风度翩翩，我十分喜欢。想不到现在成一家人了，世事是多么难料啊！"

乔冠华和章含之都笑了起来。

说到这里，章士钊又从衣袋中摸出他惟一的那张一万元定期存折，动情地说："这是我的《柳文指要》出版之后，周总理送的酬金。我老了，不能出去为你们买礼物，就将这张存折送给你们，含之去买你们喜欢的东西。"

1973年5月，北京春光明媚，景物鲜丽。

汽车奔驰在去机场的大道上，一路欢歌笑语，章士钊靠在座椅靠背上，微笑着听大家说话，尤其爱听12岁的小外孙妞妞说话。

也许章士钊已经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去香港重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最后一份力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殷夫人也从香港来信，说是阔别九载，希望一聚。于是，他要含之转报总理，希望去港一趟。总理说："行老（章士钊字行严）的爱国赤诚可敬可佩！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去是再适合不过的了。上次行老赴港，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惜这几年搞运动耽搁了。只是我考虑到，岁月不饶人，行老已是92岁高龄了，长途旅行恐怕吃不消啊！"因此，对于章士钊的请求，中央迟迟未作答复。

1973年初春，含之回来告诉章士钊，在一次会见中，毛泽东突然提到了行老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章含之报告了行老的心愿，也报告了总理和家人的担心。毛泽东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以后，毛泽东请周恩来总理考虑个周到的计划，是否可以在保证行老健康的条件下送他去香港。为此，周恩来做了周密、认真的筹备，安排了中国民航派一架专机送章士钊，随机派了警卫并为章士钊配备了北京医院内科张惠芬主任及护士小丁同志。章士钊这边，同去的有大儿章可、小女含之和外孙女妞妞，还有一个秘书，一名女厨工及后来照顾他生活的一个女孩子。一路上章士钊感慨万千，他觉得还是毛泽东主席最懂得他的心思！

一会儿，北京机场就到了，一走进宽敞的贵宾候机室，章士钊一眼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迎上前来，双手捧着章士钊的手，叮咛保重。章士钊非常感动，国家刚经历一场大动乱，千头万绪周恩来是最忙最累的人，可他在百忙之中亲自来机场送行！老人眼眶湿润了，抓着总理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半晌，他才说了五个字："请总理放心！"

外交部为章士钊的赴港与港英当局进行了细致的洽商，当时台湾与香港通航，而中国民航则尚未开通，章士钊的专机成为了第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降在香港启德机场的飞机。这次特殊的航班，加上章士钊本人的资历、身份，特别是他在1949年就担任过国民党"和谈"代表，使这次"探亲"本身就成为

了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的和谈信号。

因此，章士钊的访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香港《明报》6月3日发表社论，称“章士钊来港，目的是为进行国共和谈，国民党方面由张群来港会谈”，云云。传说纷纭，影响所及，甚至股票市场也有人在谈章士钊了。

后来，章士钊病故后，据梁漱溟先生说：“关于要派行严到香港的事，因我常去他那里走动，行严告诉我他要去香港，告诉我他去的使命是经过香港到台湾。提了两个人：一个是黄杰，是个军人，湖南人。一个在外交方面，是魏道明。此二人都是我的后辈。党中央、周总理要我去香港，再去台湾，对台湾做工作，这些话都是行严亲自对我讲的。他之所以去香港，是有意义、有使命的，使命在由香港到台湾，不想病故在香港，没有去得成！”

许孝炎、宋宜山等老朋友在香港机场热情地迎接了章士钊。阔别这么些年，香港变得更加繁荣了，而这些朋友却苍老了许多。在送章士钊去殷夫人寓所的路上，宜山说：“行老92岁还来香港为国事操心，敬佩呐，惭愧呐！”

章士钊只淡然一笑：“这次来是探亲，也顺便看看老朋友。”

许孝炎会心地笑着说：“今天本港的中、英文报纸都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了行老将到港的消息，并且做了种种猜测，很多记者都说行老带有和谈使命。”

宋宜山诚恳地说：“和谈不是早就被蒋公拒绝了么？可惜呀，可惜！不过，我们都愿意通过各种途径来促成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

章士钊没有说什么，只是郑重地点点头。

从表面上看，章士钊的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但他心里却跳动着炽烈的火焰。国内，“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虽然中美关系已经解冻，但总的来说中国还处于与外界接触不多的状况，与台湾的关系更是退缩不前。而岁月不居，人事凋零，自己已92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来港是在履行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苟能促进国共高级和谈，死又有何足惜？想到这里，老人心中充溢着悲壮的情怀，他决心在这场最后的拼搏中使尽自己的最后一点余力。所以，到港的第二天，章士钊不顾殷夫人和家人的反对，也顾不上和全家一起领略香港风光，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

一个星期以后，因为工作的需要，章含之带着妞妞要离港回京了。临行前，章士钊对女儿说：“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我很好，不要挂念。有点困难，主要是于髯老（于右任）等老朋友去世了，新的关系正在设法打通。”他深情地说：“事情办好后我就回去，我很想念北京。最多三个月吧，请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回去。”

章含之等要出门时，章士钊又将外孙女妞妞揽在怀里，再三抚摸着她的手和脸：“记住，三个月后来接爷爷！”





然而，命运无情地使92岁的章士钊壮志成灰。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劳累已使章士钊力不从心，更为重要的是，香港五六月份的气候特别闷热，章士钊的住所处于闹市，又兼之底层，通风较差，制冷空调又与外界温度反差太大，章士钊感到身体很不适应。就在章含之回京后不久，章士钊再一次病倒了。几天之内，他的病情迅速加剧，许孝炎等朋友请来了全港最有名的医生为他精心治疗，也不见有一点好转。延至6月30日，章士钊的病情更趋恶化，高烧持续不退，已不能开口说话了。有一次，他清醒过来以后，自知病体难以恢复，便示意家人拿来纸笔，颤颤悠悠地、费尽全力才写下最后几句话：“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回北京。”然后就昏迷过去。

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得知章士钊病危的消息后，十分焦急，立即通知章含之准备赴港，并指示医疗队火速赶赴香港，尽一切办法稳住病情，然后护送老人回京治疗。

7月1日凌晨，正当一切准备就绪，医疗队和章含之再过30多个小时即将出发时，突然接到香港来电，章士钊已于凌晨带着未遂的心愿和遗憾永远离开了人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章士钊的辞世引起了海内外同胞的深切哀悼，香港大小报纸都争相报道，由香港新华分社主持举行了三天公众悼念活动。周恩来总理指示成立了章士钊先生治丧委员会，决定派连贯代表人大常委与章含之等亲属一同去香港奔丧。

章士钊遗体在香港火化后，周恩来总理派了专机到广州迎接骨灰。飞机到达北京时，廖承志、罗青长等领导人在机场默哀迎接。7月11日，章士钊先生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泽东主席送了花圈，出席追悼会的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王震、邓颖超、廖承志、郭沫若、许德珩、阿沛·阿旺晋美等，可谓备极哀荣。

对于章士钊先生的客死香江，各种说法都有。“身后是非谁管得，满街齐唱蔡中郎。”其中，他的女儿章含之独具慧心，颇为深刻：

当他1973年病逝香港时，中国大地还处于十年浩劫的灾难之中，中国的台湾岛还孤悬海峡的那边。他来不及表白心迹就匆匆地离去，他自然剪不断对祖国对民族的丝丝忧虑。

我不觉感到辛酸，也许父亲一生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知音能够理解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欢乐和他的悲伤。我以为我在父亲的晚年已开始接近他的内心世界；此时我忽然意识到就如我隔着厚厚的隔温玻璃望着他的遗容那样，我始终未曾真正地摸到他生命的脉搏。

斯人已逝，典型日远。寂寞秋桐，深院锁清秋。（作者系本馆馆员）

# 终生相知

## ——章士钊与陈独秀的友谊

徐德驷

章士钊一生跨越近现代历史上三个时代，他是一个由激进的民主革命派退而成为保守主义者。他与孙中山、黄兴、袁世凯、段琪瑞、蒋介石等都有过交往，与毛泽东始终保持特殊的私谊。最后以国民党和谈代表身份进入新中国，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而终其一生，享年92岁。陈独秀是一位从民主革命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先驱，最后作为普通平民，洁身自好，从不接受不干不净的支助，贫病交加，在非常艰难的生活中，客死江津，终年63岁。我们这里要叙述的是他们两位不平凡的友谊。在政治思想上、人生道路上他们有所不同，甚至针锋相对，但友谊依旧。这种思想上有距离的友谊，很值得人们玩味，更值得我们揄扬。

陈独秀“蛊惑人心”。章士钊“煽风点火”。

话不妨从头说起。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名庆同，亦号实庵，安徽安庆人；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名秋桐，湖南长沙人。陈长章两岁，是同时代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满清王朝腐败无能，西方列强大肆入侵我中华的危急之秋。一切有志之士，以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陈章相交于这样一个时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二人相濡以沫，亦时势所趋。

他们最初相识于1902年。陈独秀由日本回国，途经南京，访江南陆师学堂同乡好友汪希颜，汪介绍认识了正在此就读的章士钊。这次虽是一面之交，但彼此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第二年，该校受抗俄运动影响，章士钊意气风发，鼓动学潮，提出“废学救国”的主张，率同学30余人毅然离校，投奔上海，参加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组织的爱国学社，从事反清活动；与章太炎、邹容、张继结拜兄弟，一道为《苏报》写稿，鼓吹革命，后被聘为《苏报》主笔，时年22岁。

这时，陈独秀在安庆与留日同学潘赞化等于藏书楼组织演说会，宣传抗





俄，痛斥沙俄侵占东三省。陈独秀的演说，极富鼓动性，慷慨激昂，满座欷嘘！陈等的活动引起了清廷地方当局惶恐不安，密谕逮捕陈仲甫（当时还没有“独秀”这名字）。幸得内部讯息，星夜逃奔上海，径直找到章士钊。章出示《苏报》，对他说：“仲甫，你们在安庆的抗俄演说和活动，早登报了，遍传上海。”陈看了看《苏报》，幽默地说：“我是动嘴，蛊惑人心，你是动笔，煽风点火。”说着，两人相视大笑。

章士钊主持《苏报》，旗帜鲜明地反对清政府，反对康有为保皇党，成为民主革命派的喉舌。他在《杀人主义》一文中写道：“读法兰西革命史，遥想当年，杀气冲天，悲悯遍地，独夫民贼处于末路，而英雄志士，豪兴勃发，不可遏止。今日之情况亦如此，借君颈血，助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清政府为之震怒，一举封了《苏报》馆，逮捕了主要撰稿人章太炎、邹容等人。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主笔章士钊恰遇查办大员江苏候补道俞明震为原江南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是一位学者，当年满怀“揽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抱负主办陆师学堂。章士钊入学考题是《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章以一小时交头卷，旨义高远，文采斐然。俞阅卷时，拍案叫绝，大为赞赏。由是，他暗中徇情，章得以脱逃。

### 办《国民日日报》，结下终生友谊

《苏报》查封，章士钊又邀集陈独秀、张继等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英租界昌寿里办起了《国民日日报》（下简称《日报》）。章自任主笔，陈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工作。又联络在日故交、诗人苏曼殊加盟，为革命呐喊。这时，他们风华正茂，满腔热忱，同居一室，亲密无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气至相当。”陈、章、苏三人，戮力同心，报纸内容丰富新颖，思想激进，词锋犀利，深为社会各界喜闻乐读，尤为进步人士所欢迎，风行海内。因为民办报纸，无任何方面的接济，生活极为艰苦。夜深人静时，昌寿里的偏楼里灯火未熄，陈、章全神贯注，埋头伏案，不到次日凌晨交付印刷，不能休息。当他们在一张木板床上抵足而眠时，已经鸡鸣破晓。他们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不以为苦，而以为乐。对此，王森然在《陈独秀评传》中有过描绘：“……与秋桐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屋，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秋桐见其黑色袒衣，白物点点，密不计。秋桐骇然曰：‘仲甫！是为何也?’先生徐徐而视，坦然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朝夕相处，感情深笃，在《日报》的患难中，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这段难忘的日子，直到20世纪40年代，章士钊还津津乐道，并赋诗追怀：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
《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友，光气满陆梁。

《日报》的出版，很快为清政府所注视，布告民众：不准商民订阅零售，沿江省抚勒令查禁，邮电部门“毋得代寄”，“以杜其销路，绝其来源”。黑社会组织也乘机捣鬼，自身经费无着，不得已，自行含泪关闭。

## 暗杀斗争失败，章氏“苦读救国”

《日报》停刊，陈独秀回到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没有印刷处，章士钊闻讯，立即来信祝贺，并承应负责在上海东大书局印刷。报纸艰难地维持了一年，因揭露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批判清王朝的罪恶，被清官厅查封。这年冬天，章士钊函告陈独秀、杨笃生、何海樵在上海组织了“爱国协会”，会长杨笃生、副会长章士钊，望陈去上海相商。原来“爱国协会”就是暴力暗杀团，黄兴、蔡锷、蔡元培、陶成章等革命志士都是会员，陈独秀在日本时就听说有个杨笃生组织这个团体，非常赞赏他们反清的勇气和胆量，此次见到这位出生湖南长沙的盟主，深感荣幸，同时又结识了蔡元培、陶成章等革命志士。通过庄严的歃血入盟仪式，陈独秀也加入了暗杀团。后因谋刺清廷大吏王之春失败，多人被捕。章士钊出狱后即流亡日本，目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繁荣进步，意识到教育的重要，于是，倡导“苦读救国”，并身体力行，入东京正则学校学习英语，准备留欧。1907年赴英，入苏格兰大学主攻法政，兼学逻辑。直到1912年回国，留英五年。

## 章士钊创办《甲寅》，陈独秀一鸣惊人

二次革命失败，缉拿革命党人，章士钊再次亡命日本。此时，在安徽的陈独秀被列为首犯，仓促间，携妻儿四人，星夜从安庆老家潜逃，除身上所穿，一无长物。被逼到上海，既无职业，又无其他收入，全家衣食无着，又是一名要犯，还不能抛头露面。原期望清王朝一垮，就会出现一个新世界，岂料胜利果实竟被袁世凯这个阴谋家窃取。无路可走之际，想起了老友章士钊在黄兴的支助下，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自任主编，于是致信章士钊求援。信中写道：“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波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本拟闭门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章士钊将





信在《甲寅》上发表，加上按语：“寥寥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足下无意书之，故愚宁负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读者。”章士钊回信说，“你在上海生活艰难，甚表同情，你我患难之交，当为同甘共苦，我办《甲寅》，正需要像你这样的横扫千军的巨笔，虽然经济不太丰，但饭还是有吃的，你如愿来东京助我，正合我意。”陈独秀又一次东渡日本，如清风明月，飘然而至，陈独秀的到来，对章士钊来说，如刘备之得孔明，非常高兴。他们是章士钊前年自英伦回国时在上海见过面的。当时章士钊读到陈独秀的《存殁六绝句》中，“章子当年有令名”，“文章今已动英京”之句，十分欣慰。陈独秀也记起当年偕夫人高君曼旅居杭州，正春风得意，相得甚欢之际，章士钊远从英伦写给他的贺诗：“江南三月噪阳春，胜友连翩六七人。最是怀宁陈仲子，平生思旧迈苏程。”章亲切地说：“仲甫，欢迎你。不过，你还得同我过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还有数不清的虱子的生活。”两人握手言笑。苏曼殊也来了，三人又合租一间住房，过起了十年前《日报》的生活了。

陈独秀和当年在沪上办《日报》一样，埋头编辑，积极撰稿。在《甲寅》一卷四号上，他第一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批判了传统的国家观，提出了救国之道。观点新颖，文笔洗炼，在留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同期上还用“独秀山人”的名字为章士钊的作品《双秤记》撰写了序。“独秀何许人也?”人们纷纷猜测。章士钊收到十几封读者来信念给他听：“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听了，斥责道：“这才真是狂徒。”关于“独秀”，事后他向朋友们解释：“家乡安庆有座独秀山，秀气挺拔，用这个名字，只不过表明自己是这座山下的居民而已。”当然，也表露了他对故乡怀念之情，别无他意。从此，陈独秀之名，随着后来《新青年》的创刊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声名赫赫，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永不褪色的印记。正如1918年，周树人第一次用“鲁迅”笔名在《新青年》第四卷五号上发表他的成名作《狂人日记》一样，从此，一个世纪以来，鲁迅之名不仅风靡了整个中国文坛，在中国文化史上矗立着一面不倒的旗帜。

## 《新青年》创刊问世，陈章即分道扬镳

次年，因陈独秀妻子高君曼肺病咯血，匆匆返沪，章士钊也把《甲寅》迁至上海继续出刊。只是这时的陈独秀已有了新的计划，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不久，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陈独秀是这个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而章士钊却站在了它的对立面，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包括文学革命，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但是，当听说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

散发传单被捕时，作为南方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立即致函北京政府代总理龚心湛，要求释放陈独秀："钊与陈君总角旧交，……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

不过，从此时起，他们的分歧，从不可调和发展到公开论争。陈独秀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章士钊大不以为然。同样，陈对章的倒退也极为反感，写过一系列批判文章，批判章的"农业立国"说，以《康有为、章士钊、戴季陶》为题，指出他们三人的共同特点是"开倒车"。1925 年，鉴于章士钊在段琪瑞政府任司法总长，颁发内乱罪，镇压共产党。陈在《向导》上发出《一封给章行严的信》。信中说："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已存在了五年，其根本职责是拥护工人、贫农的利益，其目前的政治主张是推翻压迫中国民族的帝国主义，推翻扰害全国人民的军阀政府，建设其真正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其言为天下人所欲言，其行为天下人所当行，别无阴谋异行有损害于国家人民而足以构成内乱罪者。""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陈独秀气急之余，写信要和章士钊断交。信曰："我们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糊涂了，我和你绝交。"1927 年，章士钊恢复《甲寅》，正式提出复古主张，陈独秀气冲牛斗，在报上批判他："章士钊拿了黄兴的钱办《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后来拿了段琪瑞的钱，便是狗放屁了，现在拿了张宗昌的钱办《甲寅》，更是放屁狗了。"章士钊首创《甲寅》，也就是拿了黄兴的钱办《甲寅》时，陈独秀是他的主要助手，现在骂起人来，连自己也不管了。这就是陈独秀，而章士钊恬不为怪，因为他对陈独秀实在太了解了。

## 陈独秀被捕受审，章士钊出庭辩护

1932 年，陈独秀再次被捕，准备公开审判。由于这是举国关注的共产党大案，几无人敢为其辩护，正因此，又有不少律师想接下这个案子，以显示自己的能力、学识、辩护水平，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以有些大律师愿意为陈作义务辩护（因陈早已声称自己是个"穷措大"）。陈独秀谢绝蔡元培、胡适等推荐的律师，但却不假思索地请章士钊为自己辩护，因为他认为只有章是最了解自己、信任自己的老友。章士钊这时在上海设有律师事务所，他得知陈独秀公审的消息，就积极作了为其辩护的准备。

开庭时，检察官以"危害民国"、"叛国"罪起诉。陈独秀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他说："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军阀，如谓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党时，陈慨然陈述三点理由：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没有自由；二、贪官污吏横行，人民民不聊生；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陈独





秀抗辩后，章士钊起而为陈辩护。他说，陈独秀，第一、言论无罪，第二、行动无罪，第三、"叛国""危害民国"罪无证据。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之无罪……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章士钊辩护词洋洋数千言，文情词理，均臻于盛，旁听席上一片称叹。万万没有料到，章士钊辩护一结束，陈独秀立即站起来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整个法庭为之震惊。法庭宣布：判刑 13 年，免于死罪。陈独秀不服，大声吼道："裁决不公，我要上诉。"

这场诉讼轰动全国，陈、章两人之辩护词，各大报争相要求刊登，国民党以"不许为共党张目"而严禁见报，只有天津《益世报》全文刊载了。上海沪江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两所教会学校选作法学教材，其他大学虽有此要求却不敢。章士钊是闻名全国的大律师，他为陈独秀义务辩护，不为沽名，全是为了友谊。各报评介有"古义士之风"，"古风可道"，"古道热肠的大律师"。后来亚东图书馆经理、陈独秀的老友汪孟邹从章士钊处收集到这次诉讼的全部材料，出了一本《陈案书状汇录》，特给陈过目，陈翻到章的一段辩护词对汪说："行严真糟，你看，这成什么话（指托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党）?"说着，拿笔把这段话全删了。

## 改判八年，狱中著书

陈独秀在狱中极受优待，独居一室，室内有两个大书架，经、史、子、集及各种中外书籍都有一点，供他读书研究。他对小学终生研究不辍。在此期间，陈完成了《实庵字说》等著作，在《东方杂志》连载，《宇宙风》这时发表了他的《实庵自传》。章士钊说他"幽居著书，似忧所得"。

陈独秀虽然在法庭上给章士钊以尴尬，但在南京的几年牢狱生活里，有事还是忘不了老朋友章士钊。上诉书就是请江原放（汪孟邹之侄）先交章士钊研究后送交最高法院的。最后改判有期徒刑八年。不久，陈寄宣纸一张与江原放，嘱交章士钊，"请其大笔一挥，……最好能写他的近作诗词。拟择朋友中能书者四人，各书一幅，合为一小屏，朝夕瞻对，以释烦愁。"章士钊专为其写了一首新作，用绫表好，极为精美，成一屏条，摘录如下：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饧。
昌寿里过梅福里，为山声杂博泉声。

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根且尽迎。

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奉怀君子，不尽于言。

士钊甲戌初冬。

## 陈独秀落难江津，章士钊照护如旧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获释，落难四川江津，章士钊以国民参政员身份住在重庆。章士钊不仅去看望他，1940年冬陈病，章又为他安排重庆仁和医院就诊，并作全面检查。章邀陈夫妇去他家过春节，陈不辞而别。回江津不久，又接章士钊信，内有杨鹏升给陈的300元汇票。杨是四川人，时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1917年，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青年杨鹏升就读北大，是陈独秀的崇拜者，虽后来来往不多，但从未忘怀。此后，还常托章送钱送物看望陈独秀。

陈章之间的交好，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事例，在汪原放的《狱中来信一束》中记叙不少。汪去南京看望陈独秀，事先去章律师事务所"看行严老伯。"因陈的消息多从这里获悉。汪说："拿了章的名片去看陈独秀，门岗立刻放我进去。有次陈肠胃病发了，陈只相信上海名医黄钟先生。我把陈翁的信带给行严老伯，他接信后，二话没说，就给黄先生写信，请他跑一趟南京。信中说：'近以陈独秀先生在京 患病，非得先生为之诊治，不足以起沉疴……顷以俗冗未克趋教，一俟台驾返沪，定当专诚奉谒。'当晚我陪黄先生搭卧车到南京。"还有多次给汪信买书。有次信中说："致行严先生信，望便中交去……如有英德及德英小本字典望各买一册。……如觅不着，望询之行严先生，他如有，请他送我一本。"这之前，来信要买罗振玉著《殷虚书契》一书说："此书不知何处出售？……便中可问行严先生知道此书售处否？"从陈汪信札中，不难了解诸如此类生活琐事，陈也不忘找章，而章从不怠慢。至于陈的文章，更要托章售稿。如《老子考略》写好后，即寄汪原放转章士钊"乞兄先告行翁，不知合用否？行翁收到拙稿，系售请书店出版，或暂存行翁处以待价。请询明行翁示知。"又一次："兹托带上文稿一册，请交行翁，无论可用与否？尚望交还。倘能用，俟全部写完誊清后再寄上转送行翁处。"陈独秀为所有这些事写给汪原放的信，不下几十封之多。

## 章士钊既具中国士大夫的仁与恕，又不失英国绅士风度

章士钊晚年曾对人说，交友遍天下，唯有三人最难交，一是陈独秀，另外





两个是章太炎和李根源。但他和他们的私交，一直保持良好。他说陈独秀这个人，"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又说陈是"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板弗上……其人极有主见，对己见坚信不移，而且行事果断、干脆，往往好以己见定是非……"其实，章士钊的思想性格也有特性，也很主观，如提倡"苦读救国"后，不参加任何革命组织，为要他加入同盟会，孙中山、黄兴莫能奈何。又如新文化运动中，《甲寅》遭到围攻，而"先生百折不屈，藉只笔冲锋，交战数年，谓杀之可，辱之则不可"。（王森然《章士钊评传》）但他很讲实际。"中年以后，其行为往往受感情因素的制约，理想往往作了感情的牺牲品。"他一生的失误，恐怕这是其重要原因。这种处世理念，明显包含中国士大夫的"仁恕"，所以值得我们特别推崇的是章先生的宽容和大度，这也是我们民族的美德。他与陈独秀30年的交往，充分体现了这种美德，他始终认为陈是为公，他们之间不存在个人恩怨，当然，对他来说，也不失英国绅士风度。总之，先生之真诚、善良和虚怀若谷的襟怀，应为我们的楷范，在倡导学术争鸣、思想自由的当今世界是不可或缺的，而他与陈独秀这种惊世的终生相知，堪称友谊经典。

（本文参考：《寂寞秋桐》、《章士钊别传》、《陈独秀传奇》、《自述与印象：陈独秀》）

（作者系本馆馆员）

# 由长沙往昔的租书社想起

许 康

解放初期的长沙百废待兴，很快就有自来水、电灯，五一路、儿童公园等基础设施及精神文明载体的初步建设，革命激情充分地反映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土改、反霸、镇反、三反五反、民主改革……，政治运动一浪接着一浪。但民营企事业及个体户大量存在，“新民主主义秩序”仍在建立中，城市生活与这样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小市民阶层的习惯势力还相当大。其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虽然大街上商店的高音喇叭（按：这是解放前店铺少有的，那时除无线电器材料行以外，一般商店没有也不会将扩音器向店外广播）震天响，革命言论（来自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和革命歌曲放个不停，而街头巷尾的茶馆书场书摊书社则还保留不少旧的内容和形式。其中颇受欢迎又不甚犯忌（因无明显政治色彩，反而有诛暴安良内容）的，当数武侠小人书连环画和武侠小说。

离解放路（原中正路）与蔡锷路（原伯陵路）拐角处不远，即柑子园将要出口的南侧，有一家“白沙租书社”，附近还有一片刻字店，叫“黄铁庵铁耕斋”，由于“庵”字和“铁”字都用异体写出，令人很费猜详，故尔引人注目。而白沙租书社铺面的格局也较为特别，它不像一般书摊在路边摆几条板凳小椅，也不同于书店的书架货柜成排，乃是大堂中间纵贯着一张长长的大桌子（案板），四周摆着条凳，三面墙边立着书架（橱），顾客（读者）既可以从书架上取书浏览选择租回家去看（需付几倍书价的押金，再加上每本书按日计算的租金），也可以取书坐在桌旁阅读，那就只按每本的租金付款了。

这家租书社在1952年以前生意不错，光是每天坐在桌旁看书的顾客常常维持着十来人的样子，租书回去看者应当是这个数目的几倍。节假日特别是学生的寒暑假人数更多。

我家住在东门捷径，经东庆街或古家巷到柑子园该书社，均只有200—300米距离，自然成了这里的常客。20世纪50年代初，我正是由高小进入初中的阶段，此前阅读小说的记录，主要有《水浒》、《三国演义》、《七侠五义》、





《小五义》，以及《福尔摩斯侦探案》、《亚森罗苹奇案》等。而白沙租书社琳琅满目的摆设，令我大开眼界，应接不暇。尤其是它远不同于上述古典小说（当然还包括《施公案》、《彭公案》、《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说唐》等，以及志怪一类的《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是令人震惊的卷帙繁多的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似乎当年（1949～1951年）上海有几家出版社（如陆宗植开的正气出版社等）铆足了劲一本接一本地加以印行，而租书社将每一本书都粘贴装订上厚厚牛皮纸的书皮，使其经久耐磨，但每一本又很快地被多人的手汗皮脂抚摩而弄得与油条的表皮相似，可见其当年拥有的众多读者群。

其实，我在租书社首先看的是我馆老前辈“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

向恺然（1890～1957）与我的祖父（许君扬）相识于解放初期先后成立的湖南省文物管委员会和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他们都是委员和馆员，此前也相互知名。我读初小时即已在路边书摊上看过《火烧红莲寺》等等武侠连环画，对一些人物和情节较为熟悉。后来听祖父说，书中人物都有所本，如“柳迟”的原型是柳惕贻，传说武功很高超，由于人还健在，所以阅读时少了一分神秘感，多了一分亲近感。何况小说一开篇头几句话就是“从长沙城出小吴门……”；又如书中浏阳、平江两县在两派武侠支持下争夺“赵家坪”，我从读音上可联想到浏阳门附近的“肇嘉坪”等等，一下子与故事的距离大大拉近了。

至于对武侠们的武术，前有《七侠五义》中的轻功、宝刀、袖箭、夜行衣、闷香，后有“奇侠”们的手段，加之还看过几部拍成的武侠电影（黑白片，忘其名）的特技镜头头脑中有相当的形象认识，既惊叹又不甚怪异。那时我叔父的同学彭敦朴先生，在省人民银行当职员，家住桂花井，偶尔来我家聊天。他从小习武，坚持几十年，每天晨练，与长沙“江湖”朋友切磋武德武艺。对何键时期向恺然老主持湖南国术馆，及南北武师“打擂台”等往事很熟悉，但当时反霸、民主改革（街道上叫“民主建政”，即加强居民小组、居委会组织的建设）等气氛下，他出言谨慎，未作夸张铺陈。而对太极拳的健身和自卫（“四两拨千斤”）作用特加强调（因为我家是知识分子，适合这类运动）。说到吴氏太极的创立人吴鉴泉（曾在长沙活动）及其子女，均非常佩服。不过提到吴氏女婿李春生时，我父亲插话了：“李春生只怕连我都打不赢。”因为他和李氏曾经是同事，从未见过李氏露一手。我后来向林健武（住堂皇里）老师学习“简化太极拳”，林氏也是长沙武术界名师，一度与我父亲同事。他曾赴京参加那套简化太极拳“标准”的制订，我与弟弟学了之后，都坚持练习，不觉半个多世纪了，对身体确有好处，但也都未再深入钻研和提高武术水平。

彭老师特别宣扬两人互动练习太极拳时“推手”的作用，他对吴氏太极的佩服主要也在这项功夫上。他以自己的练习功效为例，说是大西门油行那些挑油鼓（桶）上下码头的师傅（工人），能轻松地挑起200斤担子，力气不小，但4个人还制服不了他一个人。

有了这些耳濡目染，既增加了我看武侠小说的兴趣，也使我相当理性地看待江湖高手、武林人物。何况，长沙市在反霸时，已处决了称霸约二十年的“魔头”柳森严。记得解放前连我们小学生都知道这个名字，班上的几位小霸王有时还拉他的大旗来吓唬同学（假说自己与柳的喽罗有关系），其武功也被吹得神乎其神，简直刀枪不入（金钟罩、铁布衫之类），现在还不是挡不住一颗子弹吗！彭、林两位教师对柳森严也从无赞语。不过，因柳与前述柳迟和柳惕贻同姓，还是容易使人产生对往昔湖南国术威风的某些联想的。

向老的大作，除《江湖奇侠传》以外，还有《江湖大侠传》、《侠义英雄传》等好几种陈列在书架上。但总体的声势已不如前述几位“新”派。这也毫不奇怪，首要原因应当是出版社感到不肖生的作品在社会上的存量不小，故缺乏新印的积极性，加之有版权问题，不能随意重印盗印；对读者群来说，除了老读者均已看过向老的著作以外，新读者之所以垂青“新”派小说，在于写作手法和内容都有“改进”（变化）。如前述几位写家，各有特色，郑证因的“武侠”（技击、功夫、镖师），朱贞木的“情侠”（武功、爱情、女追男）等。但万变不离其宗，他们从向老那里学到的平民化、生活化、社会化（这一点仅对古代小说而言），乃至人物情节描写手法，更不用说各种武术武功武器套路等等，又再加以发展。所谓代有才人，各领风骚，正如现代青少年读者更倾向金庸、梁羽生、古龙或其他后起者一样。然而向老的祖师爷地位，在明眼人心目中是不可动摇的，他比石玉昆（《三侠五义》）等，前进了一个时代。向老的另一重大创新，由《封神演义》法术脱颖而来，即所谓“飞剑”，如“戟指一道剑光”、“口吐一道剑光”、“脑后升起一道剑光”，快客与宝剑（飞剑）实现了“身剑合一”，用“意念”即可驱使飞剑杀敌。这一创新被还珠楼主继承和发展。

我看得最多的乃是还珠楼主的“剑侠（仙）”小说。关于这位拥有奇怪笔名的作者，迄今我对他的了解仍然甚少，所据仅有其女李观承（短期邂逅的）、文友贾植芳、《解放日报》记者许寅及台港的老报人等寥寥几篇文章，知这位“楼主”（按：此词现已成为网络上对发稿引起“跟帖”评论的上栏文章作者的通称了）是四川长寿县人，原名李善基（1902—1961），后改寿民。家庭十几代业儒为官，祖父是进士。其父李元甫亦在江浙宦游，后回四川。楼主九岁时即被县官誉为“神童”，命人抬匾鸣炮到李家贺喜，因小善基一篇《“一”字





论》文长达5000字。七岁即上过峨嵋、青城等名山，十岁时又随王姓塾师壮游。其师知识渊博，口若悬河。楼主受其感染，少年时代饱览群书，善于在同伴中讲述故事，父死后随母东下，弱冠即北上平津谋职，曾任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的中文秘书，与英文秘书段茂澜至好。后在宋哲元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是应对日寇侵占热河、山海关后华北紧张局势的机构）任职，抗战前夕是天津电报局职员。其首部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始作于1932年，本是应《天风报》为该报另一部中断的连载小说应急补缺交稿（按：此前已写好十几回），不意一炮打响，一发不可收拾。单行本一集接一集，交天津的励力印书社印行。还珠楼主抗战时在北平，因不应周作人等汉奸之召担任伪职，被诬为“重庆特务”入狱，备受酷刑，坚持了民族气节，后被保释。故这段时间小说创作很少，仅有几部作品出版。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奋笔写作，新书源源不断，家属也南下，安家苏州。解放初期他感到茫无出路，求教于贾植芳，贾氏建议他结合农民起义写点侠义故事，遂有以张献忠入川为背景的《独手丐》等。由于年轻时即与尚小云义结金兰（尚居长），得以到其剧团当编剧（兼“导演”），推出较多新编传统剧目上演。后随尚小云京剧团入伍，成为解放军总政文工团团员，改名李红。我记得大概在1956年左右（时当“百花齐放”方针的宣传），曾见《北京文艺》介绍北京作家动态（下厂下乡之类）时提到他。1958年突遭某报一篇声讨文章《不准还珠楼主继续放毒》闷棍猛击，引发脑溢血中风，缠绵病榻三年。

还珠楼主阔脸蒜鼻，自幼练有气功，曾染阿芙蓉癖，解放后彻底戒除。故身高体壮，精力过人。写作时玄思冥想，海阔天空。据说“生意好”（稿约频来）时，能同时写作几部小说，每天划分时段，分别进行，以应几份不同报纸逐日索稿刊登。早上先过足烟瘾，即对其秘书（高中毕业生）口述章回故事，由该人记录，不加校阅，就成定稿，一般工作到午后，当天任务便完毕。更令人称奇的是，各部小说均有独立体系，总共涉及几百号人物，相互关系复杂，线索纷纭，有时某一支系又发育成大树，枝叶繁多，人物姓名别字江湖绰号，乃至所用武器法宝魔幻方术，都有根据，即所谓道、释、阴阳、魔教等派人物，各尊所宗（各家经典秘籍所载），名称不能误植滥用。据说他连草稿草图都不需准备，全书完全成竹在胸，精神已整个投入该书的虚幻世界，记忆力之强无与伦比。但原书行文不分段，标点也不规范且极简单，好似一口气说到底。据其女解释，是因受日伪酷刑后，眼睛看字不清，不能自写，靠口授著书，秘书用毛笔记录，速度较慢，所以每吐4字作一停顿，记录者有时便随意打一点，造成这样的结果。

暑假期间，我白天在白沙书社可以连看2—3本这样的小说（每本较薄，

共约 30 万字），晚上还有租回家的书可看。因当时父亲也利用空余时间看看这些书，叔父在工厂更忙，以致吃饭时将书摊在饭桌上抢时间看，这也能解释何以租书社这类书的书皮上油渍斑斑。

还珠楼主的小说，可谓卷帙浩繁，一部《蜀山剑侠传》全集就 50 本，还有 5 本"续集"，好事者估计仅该书就有 500 万字。有人将"蜀山"体系细分为蜀山前传：《北海屠龙记》、《长眉真人专集》、《柳湖侠隐》。正传：《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29 本）。别传：《武当异人传》、《峨眉七矮》、《黑摩勒》、《黑蚂蚁》、《黑森林》。后传：《蜀山剑侠新传》、《青门十四侠》、《大侠狄龙子》、《皋兰异人传》、《兵书峡》、《边塞英雄谱》、《冷魂峪》、《女侠夜明珠》。此外还有其他多种著作，如《轮蹄》（《征轮侠隐》，自述性小说）、《快丐木尊者》、《龙山四友》、《独手丐》、《铁笛子》、《翼人影无双》、《黑孩儿》、《白骷髅》、《万里孤侠》、《虎爪山王》等，有些书或由于出版年代太晚，随出即禁，知者较少。这里尚不包括他改编的大量京剧剧本。临终前还口授完成了长篇小说《杜甫》（未发表）。当他在床上讲述完杜甫穷愁潦倒、病死于长沙至岳阳航程扁舟中之后，对他的夫人孙经询说："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二日后即溘然长逝，享年五十九岁，恰与杜甫同寿。

所以，还珠楼主著作之富、密度之高，允称中国作家第一人。我们这类读者，当时既无经济实力逢楼主的书必买，也感到仅是被书中情节吸引，满足好奇心便完，虽然对作者的想像力和学力非常佩服，但觉得可敬而不可学（按：事实上我在高小毕业前也模仿写过几回小说试笔，觉得难以为继），甚至连长久记忆都成负担，周围也没有听众群能接受你连续不断的唠叨，故无购买的必要。我真正从地摊上买到的折扣书，仅有一部《峨嵋七矮》，实为《蜀山剑侠传》的有机成分和补充之一，是峨嵋派二代掌门人（妙一真人）及其师兄弟和好友的七位男性弟子，属第三代中的佼佼者，如齐金蝉、笑和尚等，他们要对付的敌人，主要是背叛师门的万妙仙姑许飞娘，她专找左道旁门高手庇护，以便应对不久将临的 490 年一遇的"天劫"。这些人被她所惑，屡屡前来向"七矮"挑衅寻仇，由于峨嵋派二代同门都在"闭关"静修增加功力、炼制法宝，不能出关应敌，而这些魔头则垂涎峨嵋派洞府中的奇珍异宝和弟子们手中的法宝利器，试图乘隙窃取抢夺。

此外，如《云海争奇记》、《冷魂峪》等，长沙地摊上也有卖，但有残缺。

我还记得，连《旅行杂志》这样相当畅销的刊物，也曾连载过《北海屠龙记》等小说。

正如还珠楼主在 1950 年以后"金盆洗手"不再撰写出版这类小说一样，我的姐姐参加军干校以后也来信叫我不要看这些会造成"病脑瓜子"（意谓思





想"中毒"）的书。我因进入妙高峰中学（今长沙市 11 中），其南轩图书馆在当时全国的中学都有一定名气，藏书颇多，课余阅览和借读很方便，如五四以来新文学诸代表的"选集"，如俄罗斯—苏联的各位大师和新锐（斯大林文艺奖金获得者）的著作，乃至像描写战争的《日日夜夜》、《为祖国服务》（苏联空军英雄阔日杜布的自传，他击落德军战机 62 架）、《旅顺口》（日俄战争），还有科普作家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雅可福列夫的《一个飞机构造家的自述》等，以及美国进步作家马克·吐温、捷克·伦敦等等的作品，林林总总，文学水平及社会意义当然是武侠俗文学作品不可比拟的，加之我喜读文学史，这些武侠小说在"正史"中简直"不入流"，所以不知不觉被排除到我的阅读范围之外。

这当然与那时的政治气候也有极大关系：批胡适、梁漱溟、俞平伯，抓胡风分子，更不用说后来的反右，公家图书馆早已清理掉武侠言情小说旧藏（即使保留也封存不借阅）。

至于白沙租书社，光景也每况愈下。据闻有次是店主的亲戚来借宿，不戒于火（说不定是彻夜看武侠小说精神不支造成的?），虽说扑救及时，但门面和藏书都损毁大半。于是书社搬到藩正街口对面蔡锷路边（后来的红日照像馆及李合盛牛肉店之间）"夹缝"中苟延残喘，店主形象也潦倒困顿，不到一两年终于销声匿迹。所以今天 60 岁以下的长沙人也不知道曾经有此一家。

20 世纪 80～90 年代，岳麓书社、巴蜀书社等曾率先重印几种楼主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重印种类更多，都加上了新式标点符号，印数不如预想，但现今市面上早已无存书。

关于武侠（含"剑仙"）小说的地位。

中国自古就有《神异经》、《搜神记》、《神仙传》、《夷坚志》、《异闻集》、《拾遗记》、《异苑》等等"志怪"、"神异"类故事集，可见民间在原始巫术宗教遗闻的基础上，加以方士、术士的渲染，阴阳家的渗透及后来的道教、释教的形成或传入（且本土化），以至正史如《史记》即有"刺客"、"游侠"列传。到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清代评书，读者（听众、观众）早已熟悉如《虬髯客》、《聂隐娘》、《红线》、《红拂》等短篇乃至《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大部头章回体小说。它们都被收入《中国文学史》（或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加以评述，何以独独《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之类的近作反而"不入流"呢？

据说，西方发达国家除有科学幻想小说的长期兴盛（按：中国近现代科学幻想恰恰很薄弱，非但不曾有 19 世纪的儒勒·凡尔纳，连 20 世纪的郑文光、顾均正等都后继乏人），也有魔幻小说的异军突起，例如大片《哈利·波特》、

《指环王》之类故事已进入中学教科书。(按：中国的魔幻小说，如本文所举剑侠加剑仙小说，恰好很发达，其丰富的想像力是西方望尘莫及的）固然，中国（华裔）电影人已注意到这一点，如李安，《卧虎藏龙》(按：王度庐有同名武侠小说）赢得奥斯卡；如成龙，为迎合西方口味，有《80天环游地球》(但因生硬拼凑，东西方两边票房都不讨好）；如张艺谋，《英雄》、《十面埋伏》，等而下之；如陈凯歌，《无极》，贻笑大方。为什么独有李安之成功？他根据的本子较好，是真正的中国武侠小说；为什么陈凯歌败得那么惨？看来他们这些第五代影人成长于“文革”时期，除“破四旧”偶见流到手中的少量禁书，对“不肖生”、“楼主”茫然无知（或知之甚少），改革开放后看的是金庸、古龙，故“魔幻”一派知识还得“恶补”。可又名气太大，工作太忙，哪能像港台导演少年读书、看电影拥有的对武侠剑仙的“幼功”知识？据他说，该剧本竟然是与某人电话中“聊”(拼凑）出来的！徐克本来最擅长武侠片，近两年也拍什么《七剑》，又是为了迎合韩国、日本观众而瞎凑高丽、倭国角色。教训班班在：“越是（中华）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果说李小龙开创的中国功夫片征服过世界，“功夫”(港台按威妥玛拼音写为 Kung Fu，按标准汉语拼音应写为 Gong Fu）二字成了全球通识的词汇，那么地道的中国武侠“功夫”(含“剑仙”新内涵）恐怕才是“正道”。

谈深入一点，武侠剑仙片靠特技支撑，西方现代电影的特技革命从《星球大战》开始，而香港的视觉特技的划时代之作却是徐克的《新蜀山剑侠》。在徐克等人眼中（与本文观点类似），中国的剑仙武侠片正可等同于西方的科幻片，后来的《倩女幽魂》系列和《笑傲江湖》系列都是贯彻了这一路线，取得巨大反响。徐克、程小东二人也被西方人称为“香港的乔治·卢卡斯和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到了早几年的《蜀山传》则是典型的剑仙片了，而其票房的惨败却令前景愈发渺茫。但是未来随着中国电影特技的不断发展，在灾难片、科幻片使观众腻味了之后，也许电影人还会把目光再投向本土特色剑仙片的。不过除了电影特技和科技含量外，希望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别的东西，打进国际市场，再创辉煌。

武侠小说“功过”如何？首先恐怕不必夸大它的社会（好或坏）影响，曾有青少年弃学上峨嵋去武当寻师访道，这与其他社会陷阱或歧途相比，当然同样要提前预防，家长老师与子弟的沟通责无旁贷；其次是科学普及的问题，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体力有限的原理应及时讲解，封建迷信、邪门歪道、超自然超人力的谬说谬见要予以揭露批驳；我常向学生举例证明所谓轻功、飞镖点穴之类的高手何以不去奥运显威风夺金牌、扬名立万，为国争光？内功精湛者何以没见到在国际拳击、摔跤、柔道等赛事上一招制胜？尤其是“见识”过还





珠楼主小说人物玄功之后，可称“曾经沧海”，连国外最富想像力的科幻或魔幻作品也小巫见大巫，不在话下。所以中国科学家、院士们多半爱读武侠剑仙小说，可以驰骋玄想、寄情山水、休息脑筋、激发创新。20世纪伟大的科学哲学家波普有“三个世界”(分别是现实、模型、概念世界）之说，“武侠”界已远离尘世，“剑仙”界更是荒诞不经，都从“世界1”跳到了“世界3”，即概念世界—“太虚幻境”，套一句港台电影词：“纯属虚构”。无论怎么“美好、神奇”，与现实人物生活，毫不搭界，苦修、受难、出世、历劫，以无比的代价换取斩断孽缘、孤独寂寞，究竟值还是不值？恐怕一般读者也“愿作鸳鸯不羡仙”。

要体验一下吗？有电脑（网络）游戏！例如买一个《仙剑奇侠传》版本（软件），投身其中，你就可御剑飞行。设计者是中国“仙剑之父”姚壮宪，制作公司大宇。还珠楼主的《蜀山》他并没有通读，所以这游戏并非复现全书所有的故事和情节（事实上也办不到和无必要），只是取了其中的一些概念，比如御剑术、法术，再加入一些苗疆的神秘巫术，搭建了一个神怪奇幻的武侠世界外壳。游戏真正的重心，放在人物的“情”上。这是国产电脑游戏历史上第一次让那么多游戏者发生情感共鸣。

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所写的超现实、超自然的法宝和变化，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现代，不少已可借助高科技近似地实现了，可称作人类的“体外进化”，例如望远镜—显微镜—传真—电视—摄像—网络视频等设备，都是人类眼球的延长（“千里眼”)，它本来不同于人类自身的“体内进化”(五百万年已由古猿变成今人)。但到了现代，人类对自身有目的的改造（借助尖端科技）已经加速进行，例如人造器官，乃至“克隆’(复制）整个人体的技术。那么将来把人直接转化为光电、能量形式的存在，也是可以想像的。这两天见报道：

> 丹麦科学家首次通过将物质转化量子信息，以光子为媒介实现远距离传递，将人化为光束，瞬间传送到遥远的另一个地点，这样的场景目前还只能在《星际迷航》等科幻电影中看到。不过，丹麦的物理学家们已经成功地将物体转化为量子信息，然后用光子进行传递，使物体在不通过外界接触下，实现了远距传送。

这就赋予“不肖生”、“楼主”小说“剑仙”行为以科学的解释。

从中国自古的灵异—志怪小说，到近代“不肖生”、“楼主”的新说，将来都可以真正实现或接近实现，这种情景（和可能性），恐怕超出他们当初的幻想。

(作者系本馆馆员)

# 近代湖南茶业的勃兴

陈先枢

湖南自汉代就有了茶叶的种植和加工，且产生过不少著名品种，但直至清前期，湖南的茶叶生产还处在小型分散的小农经济阶段，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历史进入近代，湖南茶业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促进了湘茶的生产和运销。

据1942年出版的《湖南之茶》记载，清道光年间以后，每到产茶季节，茶农通常“呼集邻近男女老幼采摘”，按量计酬。粗制成毛茶后，茶农除留少量自用外，大多卖给附近的茶庄茶号，茶庄茶号再售与茶厂，或直接设厂制作精茶运销。茶厂将毛茶加工成精茶，一般要经过拣、焙、筛、车、磨、捞、簸以及装箱、起运等工序，均雇工进行，其中劳动量最大的拣茶工序更是大量雇用妇女和儿童。据刘泱泱著《近代湖南社会变迁》记载，至清同治、光绪之交，长沙府安化县小淹、东坪各地，茶庄林立，多达80多家。长沙县高桥有茶庄48家。醴陵县县城亦有茶庄数十家，贫家妇女入市拣茶者多达数万人。加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早年的茶叶加工“均由造茶之人（庄号）发给女工携回家中，拣去茶梗、茶包及黄叶片，缴茶时验视最严”，到光绪中叶，则“皆在栈房雇用女工人拣”。庄号与茶农开始分离，茶农只管茶叶的种植和采摘，茶商（庄号）则专司收购、制作和贩卖。庄号有本帮、客帮之分。本帮为本省长沙、安化、湘潭、湘乡等地的商人，客帮以山西、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江苏、安徽等地商人为主。客帮多以已开埠的汉口为总汇。从上述情况均可看出，茶叶采摘、制作和运销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19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市场以及国内西北市场茶叶需求量骤增，湘茶的生产和销售发展迅速。起初长沙府主要产绿茶和黑茶，绿茶销省内和邻近各省，黑茶则远销西北陕、甘、新疆及内外蒙古一带，故俗称“边茶”。咸丰初年由于欧美市场的开拓，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量骤增，促使沿海外国商行纷纷到内地收购茶叶。咸丰八年（1858），粤商佐帆由广州入湘，抵达长沙





府，在安化等地传授红茶加工技术，促使安化等地茶农于原有黑茶之外，又大量生产红茶，以转输欧美。外商收购长沙红茶，一般都由外国商行或其买办与长沙各地茶庄签订合同，前往各地采购茶叶。19世纪60年代后，茶叶采购的“合同制度”日臻完善，各个环节安排得井井有条。“合同茶”靠外国商人以预付款的方式解决了茶庄的资金问题。茶庄与货栈合一，处于地区中心位置，买主从驻地四出到周围农村，在集市或市场购进茶叶，然后加工制作，装箱外运。依靠这种“合同制度”，红茶出口规模迅速扩大。据统计，安化红茶年产曾达40万箱（每箱70斤）。继安化之后，长沙县、浏阳县纷纷仿制红茶，产量日多，出口大增。浏阳的许多麻农改种茶叶，如谭嗣同在《浏阳麻利述》中所说：“茶船入汉口，收茶不计值，湘茶转运近捷，茶者彻底巨富，于是皆舍麻言茶利。”当时湖南航路两岸设有许多收购茶叶的口岸，刘家传在《辰溪县志》中说：“洋商在各口岸收买红茶，湖南北所产之茶，多由楚境水路就近装赴各岸分销。”长沙就是当时红茶的最主要的集中分销地。《中国实业》第1卷所载吴觉农《湖南茶叶视察报告书》评论说：“此为（湘省）红茶制造之创始，亦即湖南茶对外贸易发展之嚆矢。”

稍后，“边茶”也出现了复苏的局面。同治十三年（1874），湘军统帅左宗棠在平定陕甘回民暴动后，为办理善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着力整顿因连年战争而停顿的西北茶务。他变“官引”为“票法”，广招商贩，除原有的“东柜”（陕西、山西茶商）、“西柜”（回商）外，添设“南柜”，招徕南茶商贩，运销湘茶。湘中巨商朱昌琳出资领得茶引200多张，成为“南柜”总商。他在长沙太平街开设乾益升茶庄，并在安化、汉口、泾阳、西安、兰州、塔城等地设立分庄，大量运销黑茶。从此，湘茶在西北边区的销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并畅销于俄国境内。光绪中叶，安化黑茶年产增达2000引，约合12万担（每引6000斤）。

由于上述原因，同治至光绪间湘茶的生产与销售进入前所未有的兴旺时期。光绪中叶全省茶叶输出量达100余万担，其中安化红黑茶40余万担，占40%。安化东坪的红茶、小淹的黑茶成为湘茶的著名品牌。浏阳县与平江县交界的大片地区也成为红茶的重要产区。据光绪元年所刊的《平江县志》载，同治时“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每当“茶市方殷，贫家妇女相率入市拣茶，上自长寿，下至西乡之晋坑、浯口，茶庄数十所，拣茶者不下二万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一派繁荣景象。《醴陵乡土志》亦载，醴陵“在昔醴茶输出国外，岁值数十万元。县城常有茶号十数家，于各乡设庄，挂秤收买，运至汉口转售。自采摘、运送，以至发拣、装箱，贫民资以为活者，不可胜计。”

19 世纪 80 年代末湘茶出口达到巅峰，年出口量最高达 100 万担，较鸦片战争前增加 3 倍以上。至 1890 年，湘、鄂、赣等省的茶叶每年在汉口交易价银至一千数百万之多，其中湘茶占 6 成以上。然而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茶出口量在世界茶叶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却逐步下降，湘茶年出口量最低曾降至 40 万担。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时的中国已不是唯一的茶叶出口大国，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红茶和日本的绿茶相继大量种植和出口，同华茶激烈争夺国际市场。加之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缺乏自主权，洋商在收购中国出口农产品时故意压低价格，打击了中国茶农和茶商的积极性，如《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所云，由于"自有之货，不能定价，转听命于外人"，因而价格极低，使得"中国贩丝、茶者，几于十岁而九亏"。光绪二十年（1894）湖南巡抚吴大澂在《英商压抑茶价，湘茶连年亏折，奏请借洋款设局督销折》中哀叹："湘茶开市，英商故意为难，仍以抑价为得计。华商无计可施，以致光绪十九年又亏本一百余万两，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自尽者有之。"这也是造成湘茶出口量下降的重要原因。吴大澂在奏折中称"湘省利源，以茶市为大宗"，因而他强烈请求在汉口设立"湘茶督销局"，尽管奏请未果，但从中可见湘官的商品经济意识在增强。

善化（今长沙南部）人士许崇勋在戊戌（1898）年创办的《湘报》上发表《论湖南茶务急宜整顿》一文，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来证明这一事实。他说："查往年中国之茶，运到英国者，约计一万二千三百万磅。印度西伦虽有茶庄，从未及十分之一。近年以来，中茶减至八千八百万磅，印茶增至八千七百万磅，西伦茶亦增一千八百万磅，已渐有驾中国而上之势。至今年春季汉口友人述及茶业近事，谓中茶可以运到外洋者已不及四分之二矣。且欧罗巴、新金山、甘那打一带，向销福州之茶，今则舍福州而图锡兰购买矣。俄人向销两湖之茶，今则舍两湖而图外洋购办矣。"许崇勋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端"，一是茶叶生产工艺上的原因，如"雨水多而香味顿减"、"炒制疏而品色不佳"等，以致"货多价少"。但更重要的原因，他认为是"民智未开也，公司未设也，制茶无机器也，茶树未培植也，采茶不及时也，厘税未减轻也"。当时，日本以及英国、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国家均已设立茶业公司，采用机器制茶。而中国茶叶生产虽已出现诸多资本主义因素，但茶叶加工尚停留在手工制茶作坊阶段，这是华茶不敌洋茶的根本原因。因此，许崇勋在文中呼吁"于湘省觅宽敞屋宇，效外洋于产茶省分聚集一处设制茶公司一所，并于产茶地方设分公司。几所以总其成，又于山头有茶之户，合数家而成一分公司，亦照外洋购用机器，可以随取随制。其章程办法，或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先招集股，分筹积资款，以备购办一切机器，设立公司。"





《湘报》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在长沙创办的一种日报，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1898 年 3 月 7 日）创刊，由熊希龄、谭嗣同等人集资开办，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大力支持。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停刊，前后共出版 177 期。《湘报》在当时全国的日报中被称为"巨擘"，其言论之激进，思想之开放，常能震撼人心。初时印行 5000 份，仍供不应求，从五月初一开始又加印 1000 份，其销量之大在当时实为少见。报端上主张开民智、设学堂、修铁路、造轮船、兴矿务、办公司、造机器的政论文连篇累牍，掷地有声，体现了湖南知识分子要求民富国强的强烈愿望。长沙思想激进的茶人们充分利用这一讲坛，纷纷发表要求整顿茶务、设立制茶公司、采取机器制茶的文章。除了许崇勋的《论湖南茶务急宜整顿》外，还有善化县人士皮嘉福的《劝茶商歌》、浏阳县人士王杨鑫的《拟整茶务章程十四则》等，这些文章除一致要求购置机器设立公司外，还对茶政、茶税、茶叶贸易、茶叶质检、茶叶运输乃至茶叶生产工艺等提出了一系列近代化主张，对促进湘茶的复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湘报》还在全国最先刊登茶业广告，如新开"恒兴祥茶号"连续在《湘报》登广告，广告文称："恒兴祥茶号开设省城柑子园口，专办各种名茶，发客童叟无欺，其价格外公道。凡赐顾者请认本号招牌为记，庶不致误。"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湖南省是全国唯一忠实执行新政的省份，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在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的支持下，在长沙兴学堂、立学会、建工厂、开矿山、设保卫局，使湖南一举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湖南巡抚陈宝箴顺乎民情，采纳民意，敦促湖广总督署迅速开办茶业公司，振兴湘茶的生产。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赞同有识之士的主张，决定开办"两湖机器制茶总公司"，并在长沙设立分公司。公司性质为有限公司，简明章程如下：

本公司共集股本汉纹银六万两，分作一千二百股，每股汉纹银五十两。认股时先付十两，俟派定股后再付四十两为一股。本公司系有限公司，并有权日后可酌加增股分，以期渐推渐广。本公司现议汉口税务司穆和德为督办，席正甫翁、唐翘卿翁、唐瑞芝翁、陈辉廷翁为会办。本公司银两出入系归汇丰银行经理。本公司之设原为买地或租地种植茶树以畅出产，及建造栈房烘屋以烘制茶叶，又购备机器雇外国茶师，并代茶家茶商制茶，或自买自卖，及做各项茶叶生意。查印度、施郎等处开办机器制茶已历年，所获利甚巨。本国绿茶胜于印度、施郎，本公司日后获利亦必能驾而上之矣。本公司虽系商办，然督办穆和德已奉两湖督宪谕定所有本公司雇用之人，及运到之机器，准可保护，并不派官场总办本公司之事。本公司若有获利，每年先派官利八厘，再有盈余，每

年由股东公同会议分派。本公司日后推广生意加增股分，须先将议加之股照原价给有股诸人，每股得若干股。如有多余，则加价给派外人。将所获之余价尽数拨入本公司积项下。本公司之总行系在汉口，所有账目俱用华洋文每年核结一次，刊出送各股分人查阅。督办有全权办理本公司之事及雇用人夫等。若督办因公干出外，可托殷实洋人代理。该代理人所为之事惟督办是问。股东内可择三五位与督办商办公事，若商办之人所议之事揆诸本督办之意，无益于公司者，可不依议。现在股东尚未集，议立会办，是以会办暂由督办选择。欲附股者在上海请问五马路公信洋行；在汉口请问太平洋行使知。如股附认股银先付上海银一十两零三钱三分，即汉口纹十两正。诸君附股务请早降。

两湖机器制茶总公司长沙分公司又名湖南焙茶公司，由谭嗣同任总办。1898年5月19日《湘报》第六十四号报道说："香帅（张之洞）在鄂创立制茶公司，业委穆和德为督办，而湖南茶务实为大宗，长沙亦须设公司。昨香帅由驿排递公文已札本馆谭复生观察嗣同总办湖南焙茶公司，纠集绅商领本购办机器，建立厂基，将来茶务可望振兴也。"在谭嗣同的积极筹措下，焙茶公司于6月开业。8月21日，谭嗣同抵京，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9月28日，谭嗣同被慈禧太后斩杀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仅存在3个月之久的湖南焙茶公司随着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而告终，但由于茶商从中得到了实惠，故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逐步在民间推广，茶业的集约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已势不可挡，如有报道说，浏阳茶"制造亦参仿新法，贵而得善价"，"浏城允升吉、天福祥等庄皆争先收买，每百斤给价四十串有奇"，庄家和茶农皆大欢喜。以致清末民初湘茶又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勃兴期。据记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民国四年（1915）湘茶年产曾达80余万担，其中长沙府各县占其50%，约40余万担，仅安化红茶一项年产达28万担。清宣统三年（1911）湖南茶课税厘达银36万两，占全省岁人的5.6%。

（作者系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长沙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 毁家兴学　为国育才

## ——先父胡有猷先生创办林翼中学纪实

胡渐逵

先父有猷先生（1914—1987年），号恒龛，生前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他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为了纪念其曾祖父湘军名帅胡林翼，他于1942年春在家乡湖南益阳创办林翼中学，该校至1949年停办。在这八年中，先父为了办好林翼中学，呕心沥血，历尽艰辛。本文拟对先父办林翼中学这段史实作一实事求是的简述。

### 一、缘起

20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中期，益阳新调来一位专员，姓彭名国栋，湖南茶陵人，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其时他年已不惑，是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外甥。

彭专员下车伊始，即对益阳各方面作了一番初步了解，他看到当时益阳各业凋敝，心里很不平静。为此，他很想对益阳各业作一番振兴之举。他很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为了纪念益阳乡先贤胡文忠公林翼，他倡议创办林翼中学。

### 二、筹备

彭专员这一倡议，很快就得到了益阳县政府和各界人士的一致支持，但是该校校舍如何解决，经费从何处来，校长由谁担任，这些具体问题一时却尚无着落。

不久，彭专员得知益阳县政府有一位科员胡湘龙，是胡林翼第四代从孙，于是他将胡湘龙找来，询问了胡林翼后代的有关情况。胡湘龙向彭专员特别推介了先父有猷先生，说先父可胜任林翼中学校长。这是因为先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条件：其一，先父是胡林翼的嫡曾孙，任林翼中学校长责无旁贷；其二，先父有大学毕业的文化水平，堪充此任；其三，先父曾在长沙、益阳、宁乡教过好几年中学，具有教学育人的实际经验；其四，先父其时年近而立，膂力方

刚；其五，先父为人正派，士林皆知。彭专员经多方了解，认为先父的确是林翼中学校长的最佳人选。于是，1941 年仲夏约见先父，多次商谈创办林翼中学的具体事宜，确定校名为湖南益阳私立林翼初级中学，校长由先父担任，将益阳县龙磷镇（即今益阳市）头堡学门口胡文忠公（林翼公谥号）祠作校舍。其时先父已无田产，故将先祖母张友竹老人六十三亩赡养田经她老人家慨然同意后，捐给林翼中学作校产。经彭专员和先父半年的努力，创办林翼中学的几个重大问题终于得到解决，继而即向湖南省教育厅申请备案，呈报函件经审议后很快得到批准。

## 三、蒋介石题校名

由于彭国栋是谭延闿的外甥，因此他与国民政府高层人士多有接触，关系非常，如他与国民党大员张厉生（后来他官至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的交往就很密切。正因为这样，所以林翼中学的校名"林翼学校"四个正楷大字，是彭国栋通过张厉生，请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题写的。然则蒋介石在题写该校校名时，何以将林翼中学写成林翼学校呢？原来他当年曾命人转告：他对胡文忠公素所敬仰，因此，当年他将蔡锷所编的《曾胡治兵语录》作黄埔军校必读教材，且高级将领人手一册，奉为圭臬。今将该校校名写作林翼学校，不写成林翼中学，是考虑到如果这所学校办得好，将来还可以办林翼大学。到那时，他写的这个校名还可以用咧！蒋介石如此题写林翼校名，表明他对该校的厚望，这在当时的益阳确属殊荣，影响巨大。此外，为林翼中学题辞的还有陈立夫等多位显要大员。虽然如此，但先父并未因此而攀附国民党当局。

## 四、开办

当创办林翼中学的筹备工作一切就绪以后，1942 年孟春，该校终于在益阳县龙麟镇学门口原胡文忠公祠正式开办了。其时，该校虽因场地狭小仅办了一个初中班，招收的学生仅 40 人，但开学那天却非常热闹。这不仅因为蒋介石为该校题写了校名，而且还因为以彭专员为首的益阳党政军要员及各界头面人物都前来祝贺。彭专员中等身材，光头，微胖，满面春风，恺悌儒雅，风度翩翩。他用浓重的茶陵乡音，代表益阳党政军各界致以热情洋溢的贺词，其他各界代表也都作了简短的祝贺。先父那天，西装革履，精神饱满，显得格外风流倜傥。在致答谢词时，先父表示，他将尽心尽力将林翼中学办好，为国家民族培育有用之才。整个庆祝会鼓乐喧天，掌声不断，自始至终充满了欢乐气氛。





林翼中学第一届董事会由彭国栋任董事长，董事则由益阳的社会贤达及益阳籍知名教授（如周谷城先生等）14 人担任。

林翼中学开办后，在学门口顺利地办完了第一学期。

## 五、迁移

1942 年春，林翼中学建校伊始，我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中期阶段。林翼中学刚办完第一学期，日机即常对益阳县城进行轰炸，尤其是该校所在地学门口，更是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因为益阳专员公署和益阳县政府均设在此地。因此，该校第二学期只得暂迁益阳县城对河（资江）离桃花仑不远的郊区一民房躲避日机轰炸，这是该校第一次迁移。

时局日趋紧张，益阳桃花仑一带已不安全。因此，林翼中学于 1943 年迁益阳泉交河宫保第，这是该校第二次迁移。该第宅虽名宫保第，但却是林翼公逝世后用其奠仪所建。房屋既多且大，先祖父祖荫公晚年曾在此办过农业学校，大围墙内有大操场、大水塘、田土、山林。因场地宽敞，故林翼中学迁此后，即扩三个班招生。但该校在宫保第仅办了一个学期，日寇已侵入益阳，而宫保第离益阳城只有五十里，因此，暑假期间，林翼中学即迁往益阳南部一偏僻山乡妙峰山水满村，这是该校第三次迁移。

水满村虽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但因系穷乡僻壤，故是个避难的好地方，学校办在该处，显然绝非佳处，开学在即的林翼中学下学期往何处去呢？先父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有位朋友建议先父与桃江胡氏家族（与我益阳胡姓于明末均从江西避难而来）联系。先父即从其计，旋得对方慨允，林翼中学于是于 1943 年孟秋迁往桃江石牛江牛迹桥借胡氏光华小学教室上课，这是该校第四次迁移。

然而林翼、光华两校合在一处办学，场地太窄。因此，1944 年春，林翼中学迁往离石牛江约三十多里的楠木塘盆山小学（该校已迁他处）原址办学，这是该校第五次迁移。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林翼中学于 1946 年春迁往离益阳城 7.5 公里的谢林港秦家祠堂办学，这是该校第六次迁移。因其地交通便利，场地宽敞，故扩班招生，该校在此办学三年。

1949 年春，益阳县城学门口原胡文忠公祠后面一栋两层楼的八间新教室已建成，故林翼中学即迁新址，这是该校第七次迁移。

1949 年 8 月益阳解放，继而国民党军的飞机经常轰炸益阳县城。因此，先父只得将林翼中学再迁谢林港，这是该校第八次迁移。最后终因时局不定，人心惶惶，学生来源不足，加之，林翼中学又因建新校舍负债累累，故该校于

1949年冬被迫停办，益阳县城校舍作益阳县卫生院，先父则由益阳县教育科调往安化省立五中任语文教师。

1950年冬益阳土改，林翼中学已无校产，1953年夏，益阳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将益阳县城林翼中学校舍收归公有，学校所欠债务，由政府出钱偿还。

先父创立林翼中学，办学八年，迁校八次。前四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全校师生员工一大群人逃难，多次遇险，受尽了提心吊胆、颠沛流离之苦；后四年因法币贬值（如1947年冬先父去南京募捐，返校即法币贬值，所得无几，即是其例）和建新校舍而经费拮据，负债累累，故常在惶恐中度日，其中艰难困苦，真是一言难尽。

## 六、值得一写的几件事

先父办林翼中学八年，其为人办事，有值得一写的几件事，兹简述于下。

### （一）不建立国民党、三青团支部

如前所述，先父在办林翼中学时，与国民政府官员多有交往。虽然如此，但他非但本人不入国民党、三青团，而且林翼中学一直不建立国民党、三青团支部。1946年春，国民党益阳县党部书记长专程到谢林港找先父商谈林翼中学建立国民党、三青团支部一事，先父不允。该书记莫可奈何，只得悻悻离去。“文革”中先父挨整，工宣队找曾在林翼中学读过书的学生调查先父的问题，他们都证明先父不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也不在校中建立该党、团组织。如著名作家周立波之子、曾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的周健明先生和湖南医学院著名妇科专家陈涤瑕教授就是这样证明的。

### （二）不乐仕进

先父其所以不加入国民党、三青团，不在林翼中学建立国民党、三青团支部，是因为他一贯以清高自诩，对政治、政党无丝毫兴趣的缘故。先父的志趣在办教育，做学问，不在做官。正因为这样，所以先父一生坚持不入仕途。

先父幼承先大父授群经，少时研习先秦诸子及西洋哲学，攻英文，并著《恒金文存》、《恒盦弱冠集》（均为文言文），青年时期在长沙参加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在田汉领导下从事抗日文化工作，用白话文发表了许多抗日文艺作品，继而结集为《恒盦选集》（后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是当时湖南颇有影响的青年作家，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理事。加之先父不久又受长沙湘芬书局之聘编《湖南战时中学国文课本》，故先父文名传遍三湘。正因为这样，故长沙大火以后，先父返乡不久，益阳县县长谢则超欲聘先父为县政府秘书，但被先父致函婉拒。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张厉生拟聘先父为内政





部秘书，也被先父婉却。先母张知织老人对国民政府的腐败黑暗也颇有反感，因此也支持先父不入仕途。

### （三）不挂国民党旗帜

林翼中学虽然办在解放以前，但礼堂中却从来不挂当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只在做早操时举行升旗仪式），也不挂时称国父的孙中山遗像和时称委员长的蒋介石肖像，不张贴总理遗嘱，只挂林翼公画像。不但如此，而且每周星期一上午也不做周会。学生大多虽是十几岁的少年，校中却从未搞过童子军军训。一言以蔽之，林翼中学没有搞过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和军事教育，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 （四）研习教育学、心理学

通过几年办学，先父深知要办好林翼中学，要为国培育有用之才，必须懂得教育学、心理学，否则，遇到学生复杂的思想问题，严重的心理障碍，就会束手无策。为此，年逾而立的先父踏踏实实地刻苦自学原来一点也不懂的夸美纽斯教育学和格式塔心理学。实践证明，有几名转了好几个学校的著名顽劣生，经先父按教育学和心理学方法耐心细致地谆谆诱导，后来终于成了德、智、体均佳的优秀生。

### （五）清廉俭朴，精打细算

先父自1935年21岁时无田产以后，即在长沙协均、妙高峰等中学教国文维持一家生活，此后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他一生清廉，生活俭朴。1942年春林翼中学刚开办，有求于先父前来送礼者络绎不绝，但先父却一律不受。有人送来两瓶美酒和两盒高级点心，先父坚拒，其人放下就走。先父将他叫住，将其礼品放在天井中淋雨，以示坚却。那人只得尴尬地提着礼品走了。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

林翼中学经济素来不宽裕，尤其办到后期，竟至负债累累，十分拮据。因此先父主动减薪，后来干脆停薪。与此同时，先父向该校财会人员学会计，一切经费开支，尽量精打细算。为了节省用费，他经常因算账而忙到深夜。解放以后，益阳县人民政府将林翼中学建在益阳县城的新校舍收归国有，并负责偿还全部欠款。按县法院规定，先父原先主动减、停的薪俸完全可以补发，虽然其时先父经济并不宽裕，但他却分文未要。先母遇事，深明大义，对先父的这一举措完全赞同，毫无怨言。

因林翼中学经费有限，故先父虽爱穿西装，但多年却仅有两件普通西装。先父虽爱骑马，但他任林翼中学校长期间却一直没有买马。先父虽爱美食，但他却一直坚持与林翼中学的教师吃同样的伙食。

**（六）救助贫困生，奖励优秀生**

林翼中学虽经费困难，但先父救助贫困学生却不遗余力。先父办学是为了为国育才，不是为了赚钱发财。因此对学生收费较低，即使如此，但还是有些贫困农家子弟交不起学费。为此，先父允许这一部分学生缓交甚至免交学费。对家中因天灾人祸而赤贫或因家乡沦陷而与家人失去联系的学生，先父不但免去全部学杂费，而且还供应食宿，患病则免费医治，从而使他们能安心读书。多年以后，这些学生中还常有来信来人感谢先父之恩的。此外，先父常年还在林翼中学设立奖学金，凡品学兼优的学生，不管学校其时经济多么困难，奖学金总是兑现的。因此，林翼中学在先父的治理下，校风一直很好。

**（七）注重教学质量，严格要求师生**

在办林翼中学的过程中，先父着意继承林翼公尊师重道，选贤任能的原则。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把学校办好，就必须狠抓教学质量，而要教学质量好，则首先必须有好教师。正因为这样，故先父为林翼中学择师甚严。以国文教师为例，如第一学期请了益阳名师侯怀沙先生（解放初期调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后来又请了我先外祖父张恩海先生（曾与章太炎先生在上海创办群治大学并任文字学教授，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馆馆员）。继而又请了宁乡名师黎惆康先生（刘少奇之师，解放后为湖南文史馆馆员）及长沙县名师唐守砚先生。教导主任则聘请过思想左倾的林柏森先生（周扬执友，解放后任湖南中山图书馆馆长）和精明能干的李金波先生。先父遇事，常向人问策，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决不一己独断专行，他与教导主任共事即如此。抗战胜利后，先父去长沙职业介绍所聘请良师，其中不乏名牌大学高材生，先父一方面要检验文凭，另方面文史、英语还要当面口试，后来请了中山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先姑父刘忠镇先生（1945年芷江受降时曾任美军副司令翻译官，解放后任衡阳基础大学教授）任教导主任，他还带了几位中山大学同学来林翼中学任教。良师严教出高徒，先父是深知此理的。

先父治校，对学生要求甚严，校训为端、敏、恒、毅四字，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先父敬佩的人，除林翼公以外，还有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圣雄”甘地和晚清苦心为穷人办学的武训。1948年，甘地被印度教极右分子刺死，先父悲痛不已，带领全校师生绝食一天，以示悼念。1946年我读高小时，读过一篇赞扬武训的课文，先父赋诗云：“儿吟《武训》颜先愧”。先父崇拜鲁迅，钦佩胡适。抗战时期，先父常向学生讲我国古今民族英雄故事，作《洞庭湖之歌》（音乐教师谢量海先生作曲），演早期创作的话剧《难重的梦》，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将近解放那几年，先父还聘请过好几位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执教，教唱进步歌曲，这对学生的思想进步，无疑是起着良好作





用的。每当学生犯了校规，先父不是一味责怪学生，而是弄清原因，责备自己教育无方，总是推心置腹，苦口婆心，耐心细致地找犯错误者谈心，使其认识和改正错误，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处分。至于处分，则尽量从轻。校中曾有学生躲着抽烟、赌博，先父就利用向学生训话之机，剖析了吸烟、赌博的坏处，并讲自己少年时曾吸旱烟，有次吸得头晕眼花，恶心呕吐，极难忍受，此后终生戒烟；又说自己年轻时也曾赌博，有次输得颇惨，此后终生不赌。就这样，没有处分一个学生，但学生的烟、赌竟无。由于先父总是从正面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常“扬善于公廨，规过于私庭”（林翼公语），尊重学生的人格，因此，林翼中学建校八年，从未出过重大事故。虽然如此，但先父后来对办林翼中学的某些失误和自己做的错事，却常感内疚。

**（八）甘为办校作牺牲**

1947年春，山东震华文学院聘请先父任中文系教授，先父虽欲受聘，但却无人接任林翼中学校长一职，故此事只得作罢。先父在林翼中学治校八年，积劳成疾，年未不惑，即患高血压，他是拼着身体治校办学的。他为林翼中学所作的牺牲甚多，因限于篇幅，故此处仅举几例。

先父茹苦含辛、惨淡经营的林翼中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在解放以后，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贡献。先父晚年对此，感到莫大欣慰。

（作者系本馆馆员）

# 三湘子弟兵南丹剿匪记

## 龙德强

[整理者前言] 在巍巍的望云山脚下，地处隆回县羊古坳乡龙家湾村的一座小院里，一位慈眉善目的古稀老人，临窗而立，手中捧着一张珍贵的照片，久久凝望。这是1953年8月10日在北京参加全国公安首届功臣模范代表会议与朱德、罗瑞卿、甘泗淇等领导同志的合影，这位老人就是全国著名剿匪战斗英雄、优秀共产党员龙德强先生。

这位传奇老人，今年75岁，现离休在家。我与龙老相识在二年前，那时我为魏源故居写点东西，走访过他，印象很深。一年以后，龙老想要我为他写点回忆录。涉世不深的我不敢承担，担心拙笔难书。然而月余，龙老把自己写的回忆笔记和信寄来，信中写道："我写回忆录并非是为了扬名，而是把我所知道的一段曲折历程告诉青年一代，让他们珍惜今天，开创未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后的心愿，心愿不实现，将来见马克思也心不安啊！期责，伯伯了解你，相信你的能力，更相信你的人品。"如此的信任，如此的重托，我还有什么理由推托呢？我受命如此，沿着龙老走过的足迹，一幅惊心动魄的剿匪画卷慢慢展开，画卷中展现出一个平凡人的伟大风范。

### 挺进南丹大苗山

1949年11月，我在邵阳隆回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我同时参军的隆回子弟有数百人。我们被编入158师472团2营2连。当时师长李道之、政委王晓生，都是著名的红军将领；团长张遂也是一个老八路、抗日英雄；连长张自忠兼指导员。我因文化底子好，被任命为连部文书。军营的艰苦磨练，使我的军事素质提高很快，尤其射击在团里都是尖子。

先是1949年10月下旬，白崇禧余部流窜于广西南丹地区的大苗山一带，他们勾结土匪、地主、恶霸、地痞等残渣余孽，公开与人民政权对抗，破坏交通，奸淫掳掠，杀害革命群众，广大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匪情如此猖獗，中央立即召开了剿匪工作会议，拟订了《惩治土匪条例》，提出了"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





12月中旬，158师刚刚肃清邵阳地区境内的匪患，马上又接到上级新的紧急任务。根据军区战略部署，158师472团奉命开赴广西南丹。我们广大指战员个个斗志昂扬，经过半个多月的急行军，终于抵达目的地——南丹大苗山。

南丹大苗山，位于广西省的北部，与贵州省麻尾、荔波、上司等地接界。这里地形相当复杂，大苗山海拔千多米，高山、密林、溪河交织在一起，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终日云雾缭绕，许多地方人畜不能进出，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被人称为"天高皇帝远，有枪便是王"的鬼地方。南丹的土匪就是利用这种复杂的地形建立了自己的窝子。

我们472团驻扎在一个叫瑶寨的小村寨里。刚进寨子时，老百姓根本不和我们接洽，躲得远远的，有的甚至还逃走了，因为土匪在此之前做了大量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并威胁强迫凡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老百姓必须当兵，跟他们干，一时闹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剿匪工作一时无法开展。团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有力措施：①依靠地方党组织，紧密联系群众，多做舆论宣传。②保护群众财产，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③与群众同甘共苦，帮助群众生产生活。④发展民兵组织，进行军事训练。由于政治工作深入，方针政策得当，群众逐渐向我们靠拢，很快与我们打成一片。我协助连长张自忠同志做了不少工作，白天带领战士给群众整地、插田、砍柴，晚上与群众促膝谈心，忆苦思甜，使剿匪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 果辉剿匪擒匪首

1950年农历三月十二日下午，我们接到可靠情报，一股千多人的土匪准备当晚到果辉附近的村寨里抢劫粮食、牲口；这股土匪的司令姓秦，外号"秦老大"，生性野蛮，一脸横肉，长满络腮胡子，亦称"秦胡子"，是个反动而又凶残的家伙。

果辉地处大苗山西边山脚下，一条大沟高低不平，长约12里，直通大苗山，与我团驻地相隔10多华里。听到这个情况，张团长立即召集连长以上会议，分析敌人动向，各连做好战斗准备。时近黄昏，指战员冒着蒙蒙细雨分别埋伏于山沟高地两侧，随时出击。

果然不出所料，晚上9点钟左右，土匪倾巢出动，总共千把人，懒懒散散，大大咧咧地向下游动。根据战略部署，我们二营二连和团部埋伏在这道沟的左侧，居高临下，待土匪完全进人伏击圈内，张团长将手一挥，一声令下

"打"，顿时，我们各种火器一齐开火，子弹像暴雨一样洒向敌人。众匪措手不及，被打得晕头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但匪首秦胡子也非等闲之辈，他马上反应过来，立即抢占有利地形，组织匪队进行反攻。由于坡沟高陡，土匪在沟下不易发扬火力，匪徒们孤注一掷，轮番进攻，先后几次冲锋，都被打得丢盔弃甲哭爹叫娘。经过一夜激战，敌人已溃不成军。黎明时分，阵地上吹响了冲锋号，我们二连在张连长率领下，如猛虎下山，奋起直追。敌人惊慌失措，仓惶逃遁。我们冲入敌阵，杀得敌人落花流水，纷纷举手投降。此仗打死打伤土匪400多人，俘虏500多人。而我团仅伤亡20余人。遗憾的是走了匪首秦胡子。

打扫战场时，我们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抓到了土匪司令的勤务兵。当时他睡在老百姓的床上，整个头用被子捂着，这个老百姓说是他的儿子，正在生病发高烧。我们觉得可疑，掀开被子进行盘问，他假装哑巴不说话。我立即对他进行教育，说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只要投降，不杀你，不打你，要回去给你路费。在强大的政策攻心下，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并承认是匪司令的勤务兵，供出了土匪头子带着两个小老婆逃进了果辉附近的一个秘密山洞里。

兵贵神速，事不宜迟，我立即向连长请战主动承担捉拿匪首的任务。连长点头赞允，并嘱咐我多加小心。

次日天明，雨过天晴，我带着战士肖毅（武冈人）、张士杰（邵阳人）、李文生（隆回人）等，由土匪勤务兵带路，直奔匪首藏身的山洞。

大约走了个把钟头，就到了山洞对面山上，远远望去，石洞处在悬崖陡壁上，四周荆棘丛生，几乎看不到洞口，根本无路可攀。我立即安排肖毅与张士杰在山上封锁洞口，谨防逃脱。我同李文生悄悄地绕到山洞上端。我向下望去，真有点心寒，从这里抵洞口有七八丈高。幸好带了绳子，每人用绳子捆在腰上，一端系在杂树之上，脚蹬石壁之上，慢慢下垂。脚手到处被荆棘划破，鲜血直流，我俩全然不顾。刚挨近洞口，忽然小李虚脚踩动一块碎石，"砰"地一声，惊动了洞内匪首，里面立即射出一梭子弹。我们迅速扔进几颗手榴弹，"轰轰轰"几声巨响，马上又死一般寂静。我俩趁浓烟冲进洞去，里面又是"砰"、"砰"、"砰"几枪，子弹几乎是擦着耳朵飞过。粗略一看，整个石洞进深大概八九丈深，是一个死洞。此时匪首秦胡子的二个小老婆都已炸伤，呻吟不已。张目四望，匪首无踪无影，只有前面一块大石板挡道，其他并无藏身之处。于是大喊"缴枪不杀"。话未落音，秦胡子气势汹汹一个箭步朝我扑来。我将身一闪，他一头撞在石壁之上，一个咧嘴，扑翻在地。我顺势死死地压了下去。但他牛高马大，一个翻身又将我压在下面。这时小李眼明手快，对着匪首脑袋就是狠狠几枪托，终于将他制服，并用绳子将他扎得严严实实。他的二





个小老婆因已受伤，秉着人道主义，没有捆绑。这时守候在对面山上的小肖、小张也进来帮忙，大家欣喜若狂，押着匪首胜利返回。此次上报师里，给我记大功一次，批准入党，被提连副指导员。

## 增援二野炮兵团

1950年5月中旬，第一二野战部队某师一个炮兵团，经广西南丹入云南进西藏，在途经南丹时，被5000土匪包围在一条无名山谷里。

那天早晨，我们正在开饭，忽然来了一位骑兵通信员，风风火火找到我们团长，要求我友邻部队派兵支援。团领导与营长一碰头，马上派我带二连火速增援。

时值5月份，虽是山区，天气却也十分炎热，天空好像挂着一个火炉子。战士们跑得汗流浃背，有的干脆把衣服也扔了，光着背，穿着裤衩疾进，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跑。不一袋烟工夫，我们就接近无名山谷，只见枪声炮声交织在一起，惊天动地。我带领战士们杀开一条血路，很快与炮团领导接上头。我建议集中所有火炮朝两边山上猛轰，趁敌人混乱之际，我带一部分兵力迂回到敌人后背，两面夹攻。炮兵团长马上采纳了我的建议，几十门大炮朝着两边山上猛轰，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整个大地在震颤，敌人惊慌了。我趁此机会，借着浓烟带上战士从侧面飞速迂回到敌人背后，好似神兵天降，机枪、步枪、冲锋枪朝着敌人一阵猛扫。土匪们被打得鬼哭狼嚎，尸横遍野，兵败如山倒，纷纷后退。我左手握手枪，右手拿着一把大砍刀，眼珠子瞪得老大，从山岗上猛冲下去。土匪们看到我这副凶煞模样，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扭头跑得更快了。我在后头一阵猛追猛砍。突然，一串子弹扫来，我双腿一麻，跌坐在地，原来左脚中弹了。我吩咐副连长马上带兵冲下去，不要管我，我硬是一咬牙，又站了起来，一步一瘸朝前冲去……

忽然，号声四起，我们两面夹攻，土匪们乱成一团，犹如惊弓之鸟，全部举手投降。这时，炮兵团领导快步走过来，叫卫生员马上给我包扎伤口，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眼含泪花，激动地说："太感谢你们啦！太感谢你们啦！将来编二野战史时，一定要给你们记上一笔。"炮兵团领导得知我们中间许多是湖南兵，更高兴地说："'无湘不成军'，这句古话果然不假！"此役，打死打伤土匪1000多个，俘虏3000多个，团里给我记一等功，晋升连指导员。

## 参加全国公安功臣模范代表会

1952年8月份，我158师奉调进入广州市，负责广州市政府领导的警卫工作（叶剑英任广州市委书记兼市长）。当时，全国公安部队大概60多个师，

我158师改为公安第10师（师长李道之），师上没有军的建制，直辖28团、29团、30团，都驻防在广东沿海一线。我在1952年8月到1953年8月近一年的警卫工作期间，多次受到师团部嘉奖，并被评为“五好干部”、“先进连队”，被广州市政府授予“英雄卫士”等光荣称号。

1953年8月，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功臣模范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中央特别重视，规格相当高，原来毛主席准备接见与会代表，那几天他由于身体问题，未能接见，很遗憾。选举代表和审查代表资格是非常严肃而严格的，代表应具备三个条件：①出身好，政治思想过硬；②本职工作优良，干群关系协调得好；③以前要立上一等功以上的大功二次。当时代表是这样产生的，首先每个连选一个最优秀的送到营里，营里再从3个连里选一个送到团里，每个团又只选一个到师里，一个师共产生三位，由师政治部整理材料上报，再由师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带队到广州军区开会，最后由广州军区确定代表资格。我有幸选为正式代表。

8月10日10时整，大会隆重举行。在一阵高亢、嘹亮的国歌声中，朱德总司令、罗瑞卿司令兼政委等领导人缓缓步入主席台前排就坐。即刻，大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这幸福的时刻里，我和许多代表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国歌”、“东方红”奏后，朱总司令徐徐站起来大声喊道：“同志们好！英雄们辛苦了！”会场中立即欢呼雷动：“总司令好！首长们好！”声音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大会历时11天。由公安部队政治部主任欧阳毅致开幕词，朱总司令作了重要指示，还听取了甘泗淇、罗瑞卿、李天焕等的报告。然后以省为单位进行小组讨论，讨论的中心思想是“保卫祖国万年长”，讨论会热烈、活泼，个个畅所欲言。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李逸民作了立功创模运动的总结报告。8月20日，由公安部队副司令员邓少东致闭幕词，大会在热烈、欢腾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50多年过去了，往事如在眼前。据我所知，当时在邵阳市参军，由湖南子弟为主要兵源组成的解放军建制有数营之多，他们全部开往广西剿匪，许多湖湘子弟血洒邕桂，可歌可泣。谨以此文悼念牺牲了的战友，并能为我省地方史库添一砖一瓦，深感幸甚。

（刘期贵整理）





# 唱土地：梅山文化中的独特民俗

胡光曙

唱土地，在建国之前，它是梅山区域民间一种普遍的民俗活动。这是梅山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唱土地这一活动始于何时？现在找不到文字方面的记载和其他依据。此地民间传说：“自从盘古开天地，玉帝传旨唱土地。”这不过是对它由来久远的夸张；这一活动是从巫术派生出来的，也由巫师担任演唱，那么它是否诞生得和巫教一样早呢？巫术产生于原始社会时期，唱土地显然没有这么古老。“梅山地区，有文字记载的为五代起瑶人所据，史称梅山蛮地。”（马铁鹰：《梅山文化概论》）又，宋熙宁五年（1072年）蔡煜、章敦始开梅山。唱土地既是梅山地区特有的民俗活动，它总该诞生在“开梅山”之后吧。但即使这样，它也是一种有几百年，甚至近千年历史的古老民俗了。

“土地”何物？为何要“唱”它呢？《辞海》“土地”条说它是“古代传说中管理一个小地面的神，即古代的社神。”梅山地区民宅，凡有一间正屋的人家，均在正中上端极显眼处设有“神龛”。“神龛”是供奉“天地君亲师”和列祖列宗之处，神圣无比，凡有这个“正神龛”的，下端必设一个规模较小的土地神龛，俗称“土地堂”。“土地堂”上节“福德堂”，中间书写“本宅兴修土地之神位”，两边则书“招财童子”、“进宝郎君”字样。这招财童子和进宝郎君虽然一说为土地菩萨的一对子女，常年侍守身边，却不太有人去理会他们。“土地堂”两边的传统对联是“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土地”虽然忝列“菩萨”行列，其地位甚是卑微。但它却掌握着实权，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因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一般“菩萨”懒得去管，就把“管辖”权力下放给“土地”了。故土地菩萨犹如人民公社时期的一个生产队长，官职虽小，在他的辖区内却仍可发号施令，威风无比，故“旧俗祭祀土地，以求年岁丰稔”。梅山地区谚云：“千里来龙，还要问当家的土地”，“土地不发口，老虫（老虎）不咬狗”。所以老百姓也要诚心供奉这座尊神，还不时要向土地许一个“猪头愿”，以求庇保。

一般菩萨民间均有塑像，威风凛凛立在"神龛"或佛座之上，"土地堂"里却是没有塑像的，只用红纸写个牌位而已。在人们心目中，土地并无其他神的威严感，只是一个其貌不扬使人亲近的老人。民间形容那种孤单、寂寞的老人说是"好比一个土地公公"，"一个土地婆婆"。

说土地寂寞是因为他的香火并不旺盛。只在朔、望晨夕，宅主敬奉其他神圣时，才顺便往"土地堂"前的香炉中焚上一炷香纸：只有宅主宰杀鸡鸭时才扯一片鸡毛沾些鸡血贴在土地堂内，因为土地还是掌管六畜平安的神灵。

土地菩萨一年到头这么冷清、寂寞，有个机会把他请出来唱一唱，凑凑热闹，倒也挺合人意，只是到了后来，唱土地的活动已成为演唱者一种获取钱物的手段，与土地菩萨的联系已经不多了。

唱土地的人俗称"土地客"，这是一个人演唱的"独角戏"。"土地客"一般由巫师担任。可能最早演唱的巫师以为，只有具有一定道行的巫师才能启动这么多神祇，确保宅主清泰平安，所以从巫术中衍生出了唱土地的活动。但到后来，巫师已不能独占这种活动的舞台，因为看到它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观，民间一些伶牙利齿、头脑灵泛的人也插手"参教"，当起了"土地客"，但他们到底不是"科班出身"，比起巫师来差了一个档次。

唱土地是为"闹新春"服务的，所以它活动的时间只在每年农历正月上半月。从新年初一开始，过了元宵节就不再唱。但隆回小沙江瑶族聚居区却是例外，一直要延长到土地公公生日——农历二月初二，方才停止。

"土地客"进行演唱时，以下几样道具是必不可少的：一、师杖棍一根。这是一根高与人相等的小型木棍，漆成红色，下端用铁片包一个尖锥座子，便于插入地面；上端将一个草包斜扎在棍上，使与棍身呈 15 度角度，便于插放香火；二、师锣一面。即直径约一市尺的一个小铜锣；三、脸壳子一个。即木制面具。土地菩萨的形象雕刻得白发苍苍，却红光满面，他眯着双眼，嘻着光嘴，面容慈蔼，极具亲和力。土地客戴上时，只透出眼睛和嘴巴；四、"太子"数个。"太子"是木雕娃娃，长约 3 寸许，画上眉眼，穿上彩色衣服，胖乎乎的很逗人喜欢；五、竹卦一副。竹头削制，上圆下尖，劈成两半，向菩萨"问卦"时使用。

"土地客"是不请自来的。光顾的东家及先后顺序均由其自定。即使去了最贫困的农家，不但不会被拒绝，反会受到欢迎。

"土地客"的打扮庄重、大方，一般穿着青、蓝色的布衣衫，进门时手持"师杖棍"，背指"搭链子袋"（一种挂在肩上的布口袋）。这"师杖棍"的插放却极有讲究。内行的巫师要按"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门"（收、生、伤、杜、景、死、惊、开）之道，起"生死门"，将师杖棍





插入堂屋门前之"艮门"方位。不是巫师的土地客不懂这些，也不能随便模仿，就要自己知趣，将师杖棍放置在大门"小边"（左边），使内行人一看便知道这个土地客并非"正宗"，是个"混口的"，可不予理睬，也不与他"盘道"（找麻烦）。

安好师杖棍，土地客在堂屋门口站定，就从搭链子袋里摸出师锣，连连敲响。听到锣声，主人及院中的邻舍，一帮男女老幼马上围上前来观看。土地客看到有了观众，即便戴上面具，把师锣往腋下一挟，一边敲起锣一边打着拍子，很有节奏地踱着方步，一边用类似数快板似的腔调，按照既定程序开唱了。

## 一、请神、变身

锣打中心响沉沉，双脚来到贵府门。
左脚进屋插香火，右脚进屋请神灵。
本家仙祖我相请，地主法官我相迎。
三界伏魔左边站，观音大士右边存。
请了上坛请下坛，又请下坛土地神。
土地二老中央坐，招财进宝两边分。
三洞梅山法力大，请你出位显威灵。
请了神，放了心，转身三步迎紫金。
忽然一阵仙风起，凡民化作土地神。

开场师锣打过，满堂神灵已经请到，土地客也已经变身，就可以进入正题，唱实质性的内容了。

## 二、赞主东，唱香纸

两手平胸做个揖，退步回头赞东君。
东家高楼平地起，油漆金斗亮晶晶。
左边竖起摇钱树，右边立起聚宝盆。
咯个主东仁义好，赛过南京和北京。
客到堂前茶相待，土地一到把香焚。
乞保老者增福寿，寿如彭祖八百春。
乞保耕春春又旺，前仓已满后仓平。
乞保主东生意好，一本万利担回程。
东入财，西入主，南入黄金北入银。
五方八路任你走，春夏秋冬遇贵人。

乞保嫂嫂身康健，喂个肥猪千多斤。
乞保姑娘绣花朵，凤凰插翅不离身。
读书之人多伶俐，金榜题名登龙门。
有妻主人生贵子，无妻配个美貌亲。
手艺之人天天旺，东南西北做不赢。
三岁孩童无灾难，关煞消除易成人。

赞过主东，东家自会拿出香纸，将香插在师杖棍头草包上，将纸钱焚在跟前。这是敬神用的。接下来，土地客要“唱麻线”。要麻线何用？传说“混饨年间发大水，打烂桥亭土地冒座位”，慌乱逃走时，“土地公公扯烂一顶方巾帽，土地婆婆扯烂裙边无布补”，所以要向主东化些麻线和碎布，修补他们的帽子和裙子。

## 三、唱麻线

唱起麻线非小可，艰难困苦我知情。
正月雷公惊动土，二月粪肥铺一层。
三月园中锄青草，四月长得叶又青。
五月吃了端午水，麻杆长得屋檐深。
请起帮工人两个，磨快麻刀进园门。
割麻破麻多费力，绩麻娘子手艺精。
麻线放在河里漂，水漂三日白如银。
漂过又放染缸内，青线染得像乌云。
嫂嫂是个贤良女，贤德赛过宝庆城。
听我土地开口唱，急急忙忙开龙门。
绸缎金银都不取，单扯花线一两斤。
挂在龙头出状元，挂在龙尾点翰林。
龙头龙尾齐挂起，子子孙孙享太平。

麻线是农家主妇经过千辛万苦纺成的珍贵之物，没有人舍得拿一两斤来送给土地客的，她们只是象征性地抽出三五条来，系上些花花绿绿的碎布片子，挂在师杖棍上表表意思罢了。

接下来，土地客就要向围观的“贵人”进攻了。他会把眼光投向一两个穿着较为体面的“当家贵人”，尤其是拜年客中的亲戚和第一次上门拜年的女婿，他们都熟悉乡村这些民俗规矩，囊中早准备有钱物，且出手较为大方。选中对象后，土地客的演唱就集中目标，有“比古人”、“唱字”、“赞好话”等内容。





这些唱词没有现成模式，全凭口齿伶俐，见景生情，临时编纂。在此时便充分体现出了一个土地客临场发挥和应变的水平。下面的举例是土地客向一位胡姓“贵人”演唱的——

## 四、唱贵人

读书参拜孔夫子，土地参拜新贵人。
堂上贵人有几位，都是大名鼎鼎人。
一位就在胡府上，我把古人比一轮。
说起胡府名声响，古今多少大贤人。
胡姓本是舜王后，朝朝代代管万民。
宋朝有个胡安定，他的侄儿号胡寅。
叔侄才学高天下，犹如孔孟又重生。
南宋胡铨为制台，青史留名大忠臣。
明朝大将胡大海，本是开国大功臣。
清朝有个胡林翼，平定江山得太平。
贵人比古比不尽，你比古人更高明。
如今贵人走红运，年胜年来春胜春。
今日土地来唱起，喜在眉头笑在心。
贵人生成大方手，出手便是一百零。
我今领情还个礼，阳雀过山远传名。

一个善于即兴发挥的土地客，往往能将他练就的三寸不烂之舌，“唱得水里生红火，哄得狐狸配斑鸠”，把他瞄准的对象唱得飘飘然，从身上掏出大把钞票，当众赏与土地客，以示阔气、大方。

现在土地客的眼光转向“女贵人”了。对于年轻媳妇来说，当时的社会风尚没有比“早生贵子、多生贵子”更令她们向往和动情了。土地客自然投其所好，就从身上的搭链子袋里掏出“太子”往她们怀里送去，一边唱——

## 五、送太子

昨夜三更观星斗，只见东方现莲花。
选得今天日子好，送子时辰顶呱呱。
求嗣拜佛拜不到，难得土地送到家。
新化土地送不灵，他们尽是讲大话。
我的太子送得准，从来不会哄人家。
咯个太子真漂亮，身上绣起层层花。

一绣双龙来抢宝，二绣喜鹊叫喳喳。
三绣狮子滚绣球，四绣牛牯背犁耙。
五绣五龙来捧主，六绣蛤蟆井里爬。
七绣魁星来拜斗，八绣马牯下长沙。
九绣九龙来拥水，十绣缺子吹喇叭。
太子生得八字好，寻得咯样娘和爷。
太子进了贵府门，贵府必定重打发。
于今角票难得数，大伍大拾把把拿。
再过几年人长大，样样赛过众人家。
贵府坟山真正好，必做司令坐长沙。

现场发挥的"唱贵人"和"送太子"让土地客得到不少赏赐，这是主人正规酬谢之外的额外收入。现在他还要喝点吃点。梅山地区在春节期间，家家户户备有一样美味可口的特产——糍粑。土地客很想主人多送他几个，于是就唱——

## 六、唱糍粑

主东屋里手艺好，七个姑娘攥糍粑。
大姑娘，来攥粑，攥个喜鹊钻梅花。
二姑娘，来攥粑，攥个老鼠偷浆呷。
三姑娘，来攥粑，攥个一根水牯蛇。
四姑娘，来攥粑，攥个麻雀剥谷呷。
五姑娘，来攥粑，攥个缺子吹喇叭。
六姑娘，来攥粑，攥个孩子带宫花。
七姑娘，来攥粑，攥个媳妇回娘家。
咯样糍粑谁不爱，主东打发几个粑。
人也发，财也发，后山黄土变朱砂。
茄子树上结冬瓜，枫树上面结棉花。
鸭笼鸭屎变松花，马栏马粪变斋粑。

糍粑唱过，热情的东家主妇已经在欢笑中把一叠糍粑塞在土地客的搭链子袋里。土地客的目的都达到了。唱土地的活动，也就进入到了最后一个程序了——

## 七、打卦安神

手拿竹头要打卦，转身三步谢菩萨。





我把竹头抛下地，看是阳卦是阴卦。
一阳一阴打得好，三卦团圆显道法。
本家先祖送回家，转身再来安菩萨。
观音伏魔各归位，灾殃就往远处扒。
五郎公公中堂去，三峒梅山回老家。
土地二老下坛坐，招财进宝管鸡鸭。
满堂神圣归本位，各归原位保东家。
高山锯木要起马，平地推沙要留沙。
多唱闲言嘈龙耳，留得好话唱下家。
土地打锣收了韵，师锣一响万年发。

至此，随着一阵清脆的锣声，这一家"唱土地"的活动就告一段落了。主东接过师锣，翻转过来，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升"粮米"（即大米，一升约合1.2～1.5市斤）倒入锣中，再把一个封有多寡不等现金的小红包插在米上，"土地客"接过，一并倒在搭链子袋中，拱手道谢后，取下面具，拔起"师杖棍"，就去另一个屋场，朝下一个目标去做同样的演唱了。

梅山地区"上下梅山峒蛮，其地千里。东接潭（潭州，今长沙），南邻邵（邵州，今邵阳），其西则辰（辰州，今沅陵），其北则鼎（鼎州，今常德）。"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之内，唱土地的活动竟能风靡几百年时间，实属事出有因。开始它只是从巫师中派生出来的一种巫术活动，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一种乡间的民俗艺术了。各个县域、各个地区之间的唱法大同小异，可以根据当地当时实况进行创作加工，自由发挥，所以能赢得广大群众的喜闻乐见。试想，那春节期间，正是我国传统的休闲、喜庆、宴客的最佳时候，土地客前来这么一唱，岂不正中下怀，更添欢乐气氛？一个家境较好的人家，一日之内往往有好几起土地客前来凑兴。土地既经唱过，主人家显得人气特旺，自信有了土地菩萨及梅山诸神庇护，这一年必定人口清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过起日子来就显得充满信心、舒心顺气、精神倍添了。

"唱土地"的活动止于建国之初，这些属于"四旧"，随着巫术和所有迷信活动，一扫而光了。几十年来，有些地区，部分巫术活动在小范围内有死灰复燃之势，但"唱土地"始终没有恢复。闻说曾有个别土地客"遗老"偶尔活动，但终不成气候，那只是他们纯粹以获取报酬为目的的偶然行为罢了。

# 少数民族服饰的审美意识

刘　洋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服饰以传统的精湛工艺、华美大方的款式著称于世，千古流传。但是，每当我们去了解和追溯这些民族服饰的历史和发展过程时，往往会发现一个共同的发展轨迹，那就是，服饰都是从最原始的遮丑、保暖等生理需求功能逐步转化、演变为一种装饰品，而且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得以丰富，以至人们从直观上就能辨别其部落、氏族、民族，也能区分出人的性别和等级。随着民族的形成，各民族在服饰艺术创作上，其特点也就越来越突出，内涵也越来越丰富。服饰作为艺术表现的载体之一，她已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思想、道德、历史和图腾崇拜的集中体现。

## 别具个性的款式

款式就是服饰的造型，这是服饰审美的最基本的要素，也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气质和性格的外在体现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服饰在款式的设计上是十分独特的，如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男子的服饰款式是：头戴宽厚的头巾，上插一根五六十公分长的圆形布管，俗称英雄头。肩上披一个超长的大披风，看上去极具大将风度，体现了彝族男子的英雄气质。蒙古族的蒙袍既长又宽大，脚蹬长靴、腰系长刀，体现了草原民族宽广的胸怀和坚毅的性格。朝鲜族和傣族的妇女穿着细长、飘逸的长裙，走起路来细步轻盈，和她们细腻、温和的性格形成了一种十分和谐的统一。

少数民族服饰款式除了体现性格外，在适用性上往往出人意料。云南的花腰傣女式上衣，是由文胸、短内衣、长套袖三件搭配而成，现代女式的三件套与其有着惊人的相似；吊装上衣，在云南金平哈尼族中非常流行；而广西的茶山瑶中的少女却用一块类似于红领巾式样的青蓝布系于颈部，颇像现代人打的领带；广西龙胜的红瑶少女穿着开胸很低的上衣，袒露的前胸，体现了人类的自然美。还有不少少数民族的长裙、统裙、百格裙、超短裙、裙裤等等，可以





说，现代人服饰中有许多的款式，在少数民族服饰中早在几千年前就流行了。除此以外，少数民族的服饰还有藏而不露的特点，好好的一件绣工精美的服饰，要用一块极为平常的布或衣围罩起来，只让人隐约看见，颇有“半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如贵州苗族的围兜，土族的上衣处的绣花都是如此。

## 五彩缤纷的配色

色彩是服饰美的灵魂。少数民族的服饰在色彩的表现和运用上是十分讲究的，而且在不同的色彩的搭配上都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史书上经常提到的所谓“南蛮”“好穿五色衣裳”（《后汉书·南蛮传》），在其色彩上，红、黄、蓝、黑（青）、白五色，基本上是少数服装的五个基调颜色。色彩的运用，除了本身的协调和谐作用外，在各少数民族中，还有不同的内涵：

回族——崇尚白色，因为白色既代表这个民族纯洁、朴素，也代表着他们心灵的洁净。

彝族的五色裙——蓝色代表蓝天、红色代表火、黄色代表丰收的果实、黑色代表土地、白色代表乳汁。这种颜色的代表性在我国的苗族、瑶族、侗族、土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中都有此类含义。

黑色——表示这个民族朴实、坚定。如苗族中的青衣苗、彝族中的黑彝等等。

服装的色彩还是少数民族决定某个分支名称的根据。人们往往从服装的颜色来区分这个民族或民族分支的称呼。如苗族中穿青色上衣的就是青衣苗、穿花衣的就是花苗；瑶族中蓝靛瑶穿的蓝色上衣、白裤瑶穿白色长裤、红瑶则穿红色织锦上衣、头戴花巾的则是花瑶；彝族也是这样，黑彝穿黑色上衣，连披风也是黑色。红彝则穿红色衣服。云南有一种红头瑶，其女性头戴一个尖型的红色顶帽，传说是为了纪念先祖。这些都是缘于他们的服饰色彩。

另外，服饰的色彩和造型也是男女是否婚嫁的标志。广西红瑶中的少女穿红色织锦上衣，而且不穿内衣，前胸半袒露，结婚后则改穿青黑色绣花上衣，而且穿内衣了。湖南新田的过山瑶未婚女子戴一个大框头套，但一旦结婚后则马上改为了一块顶板。

## 精美细致的饰物

饰物不光有点缀服装的作用，也是各民族的图腾崇拜和工艺水准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件或一套漂亮的饰物加在漂亮的衣服上，不但能烘托出服装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衣着的自身价值和一个民族、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和工艺水平。

以苗族为例：在贵州雷山县一带的苗族，其头上有凤冠，一般是由里三只外三只凤凰组成，周围有“双龙戏珠”或“麒麟送子”等饰物簇拥。在盛大的节庆活动时，头顶再加以一个近一米高的牛角凤冠。胸前戴长命富贵锁，戴一个到几个项圈，上衣的背部戴十个配有吊铃的大银牌，衣的前边沿也镶多少不一的银牌，还要佩有大耳环、大手镯。这一身银器，少则几斤，多则几十斤重。这种复杂且豪华的配饰，在全世界的民族与部落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少数民族服装的饰物造型，大部分都有特定含义。他们在身体不同的部位配戴的或绣制的各种配饰，虽然其繁简不一，但其表现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中华民族以龙为图腾，那么服装上往往绣龙而且还以龙为身份的象征，只有皇帝是“真龙天子”所以才在朝服上绣上龙。土家族以虎为图腾，往往在服饰上有不少虎的图案。侗族是水上民族，服装工艺上的图案也就以鱼为最多。另外，还有不少图案赋予了吉祥如意的内涵。如蝙蝠代表“福”，鹿代表“禄”，青松代表“长寿”，喜鹊代表“喜”。还有“梅报平安”、“麒麟送子”、“三阳开泰”等等。





# 有趣的侗族择偶求婚

君　林

大凡择偶求婚或是经过媒妁之言，或是鸿雁传书，或是花前月下双方自愿以定终身。然而，在我省西南部通道侗族择偶求婚的习俗却饶有风趣。

## 行歌定情

侗家男女婚姻大多以歌为媒。黄昏时，男女青年在寨中的小巷子里聚会，悄悄约定晚上的活动时间地点，俗称“黄昏会”。晚饭后，姑娘坐在自家火塘边静静地等候，小伙子趁着月色悄悄潜入姑娘家中，行歌坐夜。此时的父母长辈视而不见，知趣地予以回避。有的男女青年则不入火塘，而是在紧靠姑娘卧室外窃窃私语。月光如水，银辉满寨，双方发出清脆的歌声。首先是小伙子用歌打探：

单身男子苦楚多哟，打酒归来烧破锅。
自酿自饮喝闷酒，醉意醺醺要困瞌。
哎呀呀，那该死的母狗又叼走了肉坨。

姑娘一听，怜悯之心涌上心头，于是用歌以问候：

阿哥你生来有好歌，为何在吊脚楼下偷偷摸摸？
莫是怕妹家黄狗咬，莫是嫌妹家无板凳坐？

小伙子赶忙答歌：

翻山越岭走小道，半夜更深把妹找。
久久等在篱笆外，几次轻轻把门敲。
一怕嫌我不知礼，二怕惊动黄狗叫。
更担心“扫笑”（你丈夫）哟，不会将我来轻饶。

姑娘委婉地唱道：

花儿打蓓等着春，阳雀声声叫哥名。

有心等个同心伴，偏偏遇着白闹（假装糊涂）人。
有心结情莫扯白，无心你就打转身。

小伙子一听歌声，心中便有了底，于是一马当先，径入歌堂，随行的伙伴们鱼贯而入，都围坐火塘边。此时，小伙子的歌开始切入正题：

家中无妻哟好凄凉，好比日头无点光。
走路不知深和浅，做事不知上下方。
全靠阿妹开路走，单身的阿哥才有望。

姑娘听其言，有意打探，唱道：

寨上有个凉水井，门前有排茅舍房。
屋前铺满侗锦布，包你阿哥如意又称心。

这样以歌为答的话，一般的人是听不出其中之原委的，唯独是聪明的阿哥才知道，善良的姑娘是在有意地奚落自己到沟里喝脏水，到牛圈睡觉。于是，小伙子也不含糊，用歌答道：

鸭嘴哪有鸡嘴尖，人舌哪有牛舌长。
我说一句只一句，你说一句是一双。
你有"扫笑"帮衬你，说话当然你在行。

女方当然不示弱，马上回敬道：

乖人不怕人讲呆，人正不怕人讲歪。
你到鼓楼问寨老，我有"扫笑"哪里来？

小伙子穷追直言地唱：

九十九座杉木山，九十九个盘盘弯。
九十九个俏俏妹，没有一个把身单。

女方力争唱道：

九十九道杉木山，九十九个盘盘弯。
九十九对九十九，只剩阿哥心太寒。

这样来回舌战，若离若即，其实都是在斗智斗勇中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到了天亮时分，双方即在歌中约定了日后玩山坐夜的时间，你来我往，有情人终于成了伴侣。

## 点烟传情

点烟又怎么传情，怎么谈爱定终身？你若不是亲眼到侗寨看见，简直不敢





相信这是真的。

每逢寨中来了新的姑娘做客，全寨的后生小伙子们坐立不安，蠢蠢欲动。吃罢晚饭，他们便聚集到了主家的火塘边对歌。但是双方互不认识，各坐一方。小伙子忍耐不住了，手拿烟斗，无话找话，试探着唱道：

我想过河不知深和浅，要想点烟又怕阿妹嫌。

姑娘则不然，假装羞涩地垂着头，用侗帕遮住半边脸，顺口答道：

点袋烟火按理说来算本份，就怕有人求天拜地骂我们。

僵局打开了，小伙子提条小木凳靠拢来坐到姑娘身边，把火钳递给了姑娘，唱道：

有心栽花花才发，有心插柳柳成荫。
有心谈情莫闲扯，快跟阿哥点袋烟。

此时的姑娘，会出现两种反应：如果大大方方地给对方点了烟，小伙子便一目了然，知趣地提着小木凳走开了。为什么？这是姑娘的表白，意为对方不是意中人，没有深谈的必要。倘若是接过了火钳，又不马上点烟，只是用歌逗趣：

点袋烟火不打紧，只怕有人背后跟。
打骂阿妹犹小可，扯你耳朵羞煞人。

这时的小伙子才心里明白，知道姑娘在有意试探对方是否有偶，打听底细呢！于是，小伙子心里乐滋滋地唱道：

水竹长笋根是根，哪个跟我单身人？
不像阿妹成家早，好比犟牛鼻子拴了绳。

女方一听，心中也有了底，情不自禁地回答：

妹说是真方是真，如今才有心上人。
你若问他在哪里，远在天边近在身。

姑娘这时将火钳夹了一个火子，但还是不马上给对方点燃，只是稍稍向小伙子挪近了一步，又唱道：

高山无路开条路，水中无路架桥来。
你过来，我过去，好比鹊桥来相会。

小伙子伸长脖子想去对火，姑娘却有意左右躲闪，弄得小伙心急火燎，馋

言欲滴，耐不住又唱道：

我求阿妹好艰难，如同摘月上九天。
哥想交情是真意，妹用假意逗哥玩。

姑娘答道：

哄山哄水早开心，哪个乱哄心上人？
架桥哪怕急流水，鹊桥功到自然成。

烟点着了，双方唱着相互赞颂的歌，心心相印，有情人终成了眷属。

## 开荒结情

侗家人惜土如金，凡空坪隙地都要开垦成良田菜土，种上庄稼。即便是坡陡的荒山，也要挖垦过来，种上旱禾、玉米、高粱之类。同寨的姑娘，三五成群，瞄好一片荒山，悄悄地圈好，等待着小伙子们一齐来开垦。

清明时节，阳雀催春，万山吐绿，正是挖山垦地的好时节。姑娘们也春心萌动，她们梳妆打扮，步履轻盈，欢歌笑语，竹篓里装着糯米饭团，荷叶里包了侗家最爱吃的酸鱼酸肉，肩扛锄头，腰系柴刀，结伴来到早就圈好的荒地里，等候心上人的到来。不同房族，不同寨子的小伙子们早就知道了这一好消息，尾追姑娘们赶到。小伙子既不带劳动工具，也不带午饭，因为他们知道，有姑娘们操心，不愁饿肚子。

劳作开始了，他们一边挖土，一边对歌，木叶声声，山歌阵阵，处处充满了生机。还是小伙子机灵，总是用情歌来打探对方的心思：

三月挖土坡对坡，哥一坡来妹一坡。
为愿龙王发大水，打烂上坎做一坨。

知情的阿妹也不答话，也不回歌，只是埋头挖土，急煞了小伙子们。于是再次进攻：

哥在高山打石头，妹在江边看水牛。
石头打在牛背上，看妹回头不回头。

这样三番五次，姑娘们才开始答歌，你来我往，一直唱到太阳西下，快要收工了，小伙子依依不舍，唱道：

画眉衔草为筑窝，挖山不怕汗水流。
只望中秋茶歌节，妹烧油茶款待哥。
阿妹也，





八月十五我定来，千万你要牢记着。

姑娘眉开眼笑地唱道：

画眉噪林日头斜，心中乱成一团麻。
眼看阿哥就要走，两眼含着泪花花。
阿哥也，
歌节定把油茶煮，只望阿哥来我家。

说来也奇怪，这种开荒种地，从圈地到收获，姑娘们只是牵个头，主要是由小伙子们来管理。然而到了收割季节，虽然也是男女一同去，可是果实却由姑娘们来支配，小伙子是无权过问的。当然，这种共同劳动的结晶，也只是用于日后大家聚会时来共同分享。倘若再有盈余，则拿去救济寨上有特殊困难的老人。于是，这种开荒结情的习俗，就这样一代代相传至今。

# 引人注目的少数民族头巾和头帕

君 林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服饰别具特色。在这些服饰中，头巾和头帕不但式样繁多，而且色彩华丽，绣工精美，使用广泛。这些头巾和头帕为各民族的服饰增辉添艳，构成为各民族服饰园地颇具特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头巾，指的是用以顶在头上或包在头上的巾，形状各异，用料讲究，大多都系高级绸缎、精棉纱布、尼龙精料制成，并往往施以刺绣、挑花，工艺繁杂，色彩多绚灿；所谓头帕，指的是用以缠绕在头上的布带或绸带，宽度不定，长短不一，少则一两丈长，有的长达五六丈多。帕子多为单色，以黑、蓝、白三色居多，两端制以缨穗，刺绣着各色花纹。

我国东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使用的头巾，大都简洁明快，朴素大方。朝鲜族中老年妇女喜欢用白绒布巾包头，达斡尔族男子则头包白毛巾，蒙古族无论男女，在春夏秋三季都喜欢用绸巾包头，特别是妇女常用的红蓝色包头巾，尤为鲜艳。鄂温克人的头巾色彩更为丰富，男子用白色，妇女多为蓝色、白色、青色、绿色等。哈萨克族男子，在天热的时候扎三角布头巾。哈萨克妇女，婚前用白色头巾包头，结婚时换上红色头巾，一年后再换白色头巾。乌孜别克妇女戴的头巾却不一样，戴了小帽以后再顶上一种方头巾，色彩多样，鲜艳美观。青年妇女多围花色方头巾，老年妇女多顶白色方头巾。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地方民族特点。俄罗斯族妇女喜欢戴精工制作、色彩艳丽的花头巾，尤以未婚少女为甚。头巾有布巾、绸巾或纱巾，有三角形也有正方形。在长辈或客人面前，要求妇女必须包头巾，这才是对长辈和客人表示尊重，懂礼貌。

在我国西北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哈萨克族中，妇女常喜戴一种长头巾，俗称"盖头"。所谓盖头，就是丝织品或棉织品做成的大巾，戴时从头上罩下，披在肩上，整个头部连两耳也掩盖在巾下，领下扣扣，仅剩面部在外。盖头一般分绿、黑、白三种，从少女开始直到结婚后一二年都戴绿盖头，结婚三四年直到中年则改成黑盖头，到了老年妇女则戴白盖头。

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则以包长帕为主，云南傣族少女喜戴色彩鲜艳的





头巾，质料多为绸子和尼龙纱。贵州的布依族妇女，喜戴绣花头巾和包青色的或花格的头巾。侗族妇女却爱包对角头巾或三角头巾。仡佬族男女都有包头的习惯，有的用六七尺长的深蓝色或黑色布作包头巾，缠在头上，很是英俊。

白族妇女的"顶巾"很讲究，不同的顶巾还包含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少女时，白族姑娘头上都是用一块一尺见方的蓝布包着，叫作"网手巾"，然后把蓝布巾的四角收于脑后，很像一个鸽子尾巴，所以俗称为"鸽子尾"。姑娘结婚后就不再戴这样的"网手巾"了，而是采用别的包头巾和相应的包头形式，如用纱帕包头等。到中老年，则多用蜡染或扎染的头巾系在头上。

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缠头帕的民族有很多。白族、哈尼族、佤族、傣族、侗族等民族的男子中，喜用白、蓝、黄、青色布帕缠于头上，头帕一般都有一丈多长。拉祜族女子头裹包头或大手巾，尤其是她们的包头，是一条一丈多长的蓝色长帕，缠在头上后末端，长长地垂及腰际，显得飘逸秀美。景颇族青年男子喜欢用白帕包头，白布一端绣有花纹，并垂下红须随风摇荡，别具风采。而景颇族壮年和老年一般用黑帕包头。布朗族妇女用黑帕或白帕包头，帕长五尺到一丈。德昂族男子缠黑帕或白帕，帕子缠好后两边缀各色绒球，既显目又漂亮。仡佬族男女都用蓝帕和黑帕缠头，缠法是由右向后再向前缠绕，缠时将头帕叠成五六寸宽，使头帕两端穗头正好在两边鬓角处，向里一掖即可，头顶露在外面，煞是精神。

西南少数民族缠头帕是很艺术的。一块头帕缠于头上，千姿百态，显露出各自的民族的性格和艺术内涵，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大小凉山彝族男子的青蓝头帕长达数丈，头顶右前方扎成一根向前挺起的细长锥形"子帕"，俗称"英雄结"，高高地伸出帕外，配上肩上披的"察尔瓦"，衬托得彝家汉子的英俊威武。阿昌妇女包头很讲究技巧，往上包得密密实实，有的高达一尺左右，上端还扎成一个左右高、中间低的马鞍形，有缨穗的帕头从右方垂下，点缀出女性的秀美。年轻一点的妇女还在头上插鲜花装饰，是真正的锦上添花呢。

头帕最长的，要算云南花苗支系中的"大头苗"头帕了。云南华宁通红甸一带的"大头苗"妇女，喜欢把头发与几根红黑头绳相绞，边绞边盘，在头顶形成圆圈，有如戴一圆箍，再用五块花色头帕，摆成六厘米左右宽，然后便开始紧密结实地向外一圈圈地绕，最后缠成一个比肩还宽，直径达 50 厘米以上的头帕圆盘。圆盘下方为黑色，黑中偶尔露一两个红白圈子，四周彩花，均匀地散于四周。要缠成这么一个头帕盘，每根头帕不下数丈，五根一共长达数十丈。这样的头帕，加上满身苗家盛装，真可谓花团锦簇，耀眼瞩目。

我国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戴头巾、缠头帕也是颇为讲究的。壮族妇女平

时有顶黑头巾、蓝头巾和花毛巾的，尤以新娘的花头巾最为漂亮。黎族妇女戴的绣花头巾，头巾边沿有各种颜色的垂丝。瑶族妇女的头饰十分丰富多彩，广西上思县瑶族妇女头上盖一个镶银的头冠和一小块织成长花纹的头巾。西林瑶族妇女头顶扎发髻，上盖白土布，围扎一块有白色花蕊的蓝巾。壮族妇女有用黑帕、蓝帕、白帕缠头的，他们将两个帕头从顶部拉出，向上分开，犹如两根短短的犄角，别具个性。广西田林瑶族妇女把周围头发剃光，顶上编辫盘于头顶，然后用三丈长的黑帕缠绕，形似草帽。毛南族女子出嫁后用黑色或蓝色布帕缠头，留出脑后头顶。





# 妙趣横生的“挤油尖”

杨盛科　杨光清

《挤油尖》是城步苗族自治县当地苗族群众中流行的一项比智慧、赛力气、增友谊的文化体育活动。活动的形式是青年男女双方为了一条长板凳的“占有权”而发生的激烈“争夺战”，与拔河赛相似。比赛开始时，在板凳的正中划一界线，双方人数基本相符，然后背靠背地互相挤逐，直把对方挤出凳端，占领整条板凳者为胜。在挤油尖时，男女伙伴们常有意识地将正在初恋的一对男女青年安置在正中界线处作“油尖”，背靠背地坐下，其余的人依次在两头坐好后一齐向中间施加压力，迫使初恋的双方“出油”（汗）。初恋的双方为了保护自己的恋人，只好暗中朝相反的方向用力。若男伴们识破了他（她）们的“诡计”，便加大力度，迫使女方被挤出凳端。女伴们见势不妙，便暗中指使两名“大力士”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以闪电般的速度斜挤或横挤插到男伴队伍中间，使男伴们措手不及并在慌乱中被挤得人仰马翻，女伴趁机占领板凳，往往引出哄堂大笑。男伴们出尽了洋相，只好爬起来重整旗鼓再向女伴们进攻。通过反复争夺和较量，男女双方都挤出了油（汗），挤出了友谊，挤出了乐趣，挤出了爱情，有许多夫妻就是在板凳上“挤”拢来的。有一首民歌生动介绍了“挤油尖”的特殊作用：“杂木板凳八尺长，板凳上面挤鸳鸯。妹挤郎来郎挤妹，意中男女挤成双。”

以“挤油尖”活动为基本素材，经过艺术加工后的苗族舞蹈（挤油尖）融艺术性、竞技性、参与性、娱乐性于一体，创意新颖，舞蹈语汇丰富。它以欢乐明快的舞蹈动作，热烈浓烈的娱乐场面，伴以催人奋进的音乐旋律反映了苗乡娱乐场面，反映苗乡青年男女们在劳动之余的娱乐生活，同时也反映了纯朴的谈爱方式，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地方特色，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该节目1997年6月参加邵阳市小戏、小品调演时获一等奖。1998年10月参加湖南省第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评为二等奖。1999年8月该节目到西藏拉萨参加全国第六届民运会获得全国表演一等奖。

# 湖南首次发现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回眸

吴铭生

史前考古学有个旧石器时代，这个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阶段，时间与地质上的更新大致相当。当时的人类（如元谋人、北京人等）以打制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过着采集和狩猎的原始生活。上述的打制石器，称为旧石器。这类旧石器的特征，就是古人类用石头打击石头，打成尖状器、砍斫器、刮削器、锤、大石片等各种形制，作为生产工具使用。

旧石器在湖南而言，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都没有发现，长期处于空白状态，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然而，在湖南周边各省不仅发现了旧石器，而且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如四川“资阳人”、湖北“长阳人”、广东“马坝人”、广西“柳江人”。这些发现情况，给湖南考古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旧石器在湖南究竟是否存在？因此，我们带着这个疑难的课题，期望在 1984 年开始的全省文物普查工作中找到答案，有所突破。

1984 年，我省遵照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开展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部署，相应成立了领导小组，由省委宣传部部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向天任组长、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寿彰任副组长，下设文物普查办公室，由熊传薪、吴铭生具体负责。熊当时任文化厅文物处处长，仅兼任此职，经常工作由我主持。普查伊始，我即组织队伍，培训人员，同年冬在临澧县试点，取得初步经验，然后在各地分批进行，作地毯式的野外步行普查。为了使普查工作取得较大的成果，期望能够发现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熊传薪同志承诺：如果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经专家确认，可以命名为“湖南人”者，颁发奖金一万元。这项奖金数量，在 20 世纪 80 年代来说，相当可观。此一承诺，鼓舞了普查工作人员，促进了普查工作。经过三年艰苦的野外调查，他们走遍了三湘四水的村落，也爬过不少洞穴，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遗存，其中著名的有澧县城头山古遗址（距今 6000 余年）和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约 8000 年），但事与愿违，却没有发现一处旧石器遗存，更没有发现古人类化石，使我们感到困惑和失望。





考古新发现有时是必然的，有时也是偶然的。在野外调查接近尾声时，远在湘西边陲的新晃侗族自治县传来捷报，他们在㵲水（沅水支流）之滨发现了旧石器。喜讯使人兴奋不已，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旧石器，今日得以发现，既填补了湖南历史上的空白，也解决了我省考古界的难题，功不可没。旧石器发现的经过，说来有趣：那是 1987 年 4 月，新晃县普查队员王石（该县大罗湾文化站辅导员）在兴隆乡柏树村大桥溪野外调查时，采集了一些陶片，由于他本人缺乏专业知识，无法确认其时代，但凭感觉判断较为重要，就将陶片带回县文物管理所，找行家识别。适逢省博物馆考古部袁家荣同志（现任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和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队长舒向今两人在该县指导普查工作，袁是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专攻旧石器时代考古，业务精通。他看了所采集的陶片，认为类似白陶，时代比较早，遗址较为重要，为了查实情况，提出要到现场去了解。于是，在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汤宗悟的带领下，袁与舒队长、王石同志一行四人到了大桥溪，经过详细察看现场后，确认是一处有价值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之后，他们又到附近看看，无意之中发现一处红色网纹土层，里面嵌着一块石头，大家都感到很奇怪，舒队长就用工具将石头挖出来，看到石头上有多处打击的痕迹，马上交给袁家荣鉴定，袁仔细看后高兴地说，这就是旧石器，而且是一件砍斫器。当时大家的心情十分激动，相互庆贺，回到县里，即将这个惊人的喜讯上报各级有关部门。这次新晃普查的重要收获，不仅发现了旧石器，而且发现了旧石器与第四纪红色网纹土的地层关系，其科学性尤为重要，同时打破了我们过去单纯从洞穴寻找旧石器遗存的观念。带着这次新发现的启示，新晃县普查队员乘胜跟踪，相继在㵲水（沅水支流）左右两岸阶地的黄土层和红色网纹土层中，发现旧石器地点 10 余处。该县发现旧石器之后，其他各地区的普查队员纷纷前来现场参观取经，从中受到启发，回去之后，也相继发现了旧石器，取得新的成果。

新晃发现旧石器的喜讯，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多方面的关注，受到当地党政领导的重视，怀化地区普查领导小组负责人亲赴新晃现场参观，并对发现人员进行慰问。我作为省文物普查办公室的负责人也赶赴现场察看，并沿着㵲水上下游周边的地貌情况，发现附近均无石灰岩洞穴，地势较为平坦开阔，使我想起有关古人类穴居和巢居的传说，此地遗存的旧石器，其人类应排除穴居，不无构木为巢之嫌。为了宣传我省首次发现旧石器的成果，我特地编印了一期简报，以往各期的简报，都是打印黑字，这次简报作为喜报，改为红字铅印，寄送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及各级领导，并在中国文物报上作了报道，扩大影响。我国辽宁“金牛山人”发现者、北京大学考古系著名教授吕遵锷先生闻讯后，也专程来到新晃县实地考察。在他的门生袁家荣

的陪同下，吕教授沿着沅水对各个旧石器出土地点，作了详尽地了解，并在怀化市举行了学术讲座，对湖南首次发现旧石器的重要意义、沅水旧石器文化的特征、旧石器的用料及打制方法，作了精彩的报告，使听众学到一些有关旧石器的启蒙知识，受到好评。

1987年冬，我省的野外调查工作按计划完成，共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万余处，其中旧石器遗存100余处，硕果累累。旧石器均分布在湘、资、沅、澧四水的新晃、怀化、黔阳、泸溪、石门、津市、澧县、慈利、道县、安化、株洲等地，由于地域的差异，可分为两个类群：即沅水文化类群和澧水文化类群。石器种类有尖状器、砍斫器、刮削器、石锤、大石片等，形制多样。

时至1990年，袁家荣同志在石门县阳泉乡邢家桥村燕儿洞洞穴遗址又发现了古人类骨骼化石，经鉴定属于晚期"智人"。该遗址在1986年普查时，仅发现动物化石，1990年发掘揭晓，内含2个洞穴，总面积约30平方米。洞口朝西南，高约1.5米。两洞文化堆积含猕猴、豪猪、东方剑齿象、中国犀、鹿、牛、羊、猪等哺乳动物化石，出土骨器有锥、铲、装饰品等，石器有锤、砍斫器及石片等。重要的发现有"智人"股骨、牙齿、下颌骨、蹠骨等化石，但无头盖骨化石，因此无法复原，难以命名。

通过以上的发现，我们从出土的旧石器、骨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及"智人"骨骼化石等情况，可以初步了解，远在40万年前的先民在潇湘大地披荆斩棘、繁衍生息的概况，反映了湖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1993年普查圆满结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暨省文化厅举行盛会，表彰文物普查有功人员，其中首次发现旧石器和古人类化石的袁家荣、舒向今、王石、汤宗悟四位同志均荣获一等奖，颁发了奖状和奖金。

（作者系本馆馆员）





# 诗圣之哭泣与启示

余德泉

杜甫有"诗圣"之称，其诗歌之造诣不言而喻。但是每读杜诗，总感到这位诗圣从生活到心灵都太悲苦了。

杜甫之诗，据《杜诗详注》所言，有一千四百三十九首[①]。我作了一个初步统计，其中含哀、伤、忧、愁、哭、泣、涕、泪这些字眼的，至少有六百四十五首之多，约占全诗的44.8%。若把含凄、苦之类字的都包括进去，所占的比例将突破50%。就是说每两首杜诗，就有一首明显地令人心酸。加上那些虽然没有这些字眼而内容凄苦的诗，几乎没有多少令人感到快活的篇章。在有哀、伤、忧、愁、哭、泣、涕、泪这些字眼的六百四十五首诗中，含哭、泣、涕、泪这种字眼的约有一百七十五首，占27%强。这一部分诗歌主要见于杜甫从长安十年，中经安史之乱直到漂泊去世这段时间。

## 诗圣哭些什么

诗圣之哭泣，分别为伤时、哀困顿、思亲友、惜别、悼亡、感人才见弃与其他诸类。下面举例谈一谈。

至德二年春，长安已为安禄山军所占，杜甫身陷贼中，在《哀江头》一诗中写道："少陵野老吞声哭，春夜潜行曲江曲。"潜行者，恐被贼兵发觉也。广德元年十月，杜甫在阆州得知吐蕃兵入长安，在《征夫》中写道："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大历初年，杜甫在夔州，得知成都又有崔旰之乱，在《贻华阳柳少府》一诗中写道："涕泪溅衣裳，悲风排帝阍。"帝阍，指宫门。大历二年，杜甫在岳阳得知西陲又以兵犯境，在《登岳阳楼》诗中写道："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由上可知，每一次战乱杜甫都为之流下伤心的眼泪。杜甫之伤时，主要是伤战乱给国家、百姓与自己带来的不幸。

杜甫的困顿，安史之乱前已经开始，越到后来越严重。天宝十二年，长安一带久雨成灾，杜甫不得不加入领救济粮的居民行列。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八品以下管理门禁锁钥、兵甲器杖的"实缺"，赶紧回家看望老小，谁知一进门，

便碰上一个使他摧心裂肺的场面。他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写下了记录这个场面的悲惨的句子："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饥寒到如此地步，诗圣怎么能忍住自己的眼泪呢！杜甫在羌村、同谷，生活都极艰难。大历四年作《南征》诗云："偷生长避地，适远泪沾巾。"大历五年，杜甫在湖南完全靠亲友救济过活。此时的杜甫真可说是穷途末路了。他在《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一诗中说："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这似乎就是杜甫为一生的潦倒作最后的哀鸣了。

杜甫在飘泊异地时常常怀念亲友。至德二年，在战乱中，思其妹韦氏，作《元日寄韦氏妹》诗云："不见朝正使，啼痕满面垂。"朝正使，指诸道于元日到朝廷朝贺之使者。此言不见，乃谓战乱使亲人隔离也。此为思家人而下泪。也许是因为家境贫寒的关系吧，杜甫如高适、郑虔这样的知心朋友并不多。也许也是因为家境贫寒的关系吧，杜甫对别人的些须恩德也总是铭记于心，久不相忘。大历五年，他开卷见高适之诗，感昔日之情谊，潸然泪下，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有句云："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此为思朋友而下泪。

至德二年秋八月，作《关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云："渐衰那此别，忍泪独含情。"此乃为别友而下泪。

广德二年，吊房琯墓，作《别房太尉墓》诗云："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此为悼亡友而下泪。

上元二年，杜甫作《枯楠》诗云："良工古昔少，识者出涕泪。"此为伤人才见弃而下泪。

杜甫还为一些其他事情而哭。

上元初，杜甫居浣花溪畔，作《蜀相》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此为伤诸葛亮功败垂成而下泪。杜甫在此虽非言自己就在英雄之列，但泪满襟者亦与英雄同。

大历二年，作《课伐木》诗云："不示知禁情，岂为干戈哭。"此为伤虎患而下泪。

大历三年，作《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云："应经帝子渚，同泣舜苍梧。"此为伤圣治难逢而下泪。帝子，指舜之二妃娥皇和女英。渚，指洞庭君山，为二妃所葬之地。

广德元年春，叛酋史朝义在广阳自缢，莫、幽二州收复，杜甫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云："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此又因喜极而下泪。

杜甫之哭泣不完全是单一的。有些哭泣是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如





《醉歌行》云："乃知贫贱别更苦，吞声踯躅泪涕零。"这主要是为离别而哭，但也包含了困顿的因素，是为困顿加离别而下泪。

## 诗圣如何写哭

杜甫之写哭，可以分作两大类。一为写所哭之方式，一为写表哭之技巧。

所哭之方式，至少有五种。

自己哭，此其一。如大历三年身在巫峡，心忆终南，想群盗尚在，归棹难期，作《九日五首》诗云："系舟身万里，伏枕泪双痕。"

以他人之哭代己哭，此其二。这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以亲人之哭代己哭。如天宝十一年献赋求官不成，作《曲江三章章五句》诗云："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谓曲江之上虽然豪华，然自己久已灰心，弟侄又何必为我伤心呢！表面劝慰弟侄，实则心中已盈涕泪，不过借弟侄一洒而已。二是以其他对象之哭代己哭。如天宝中，吐蕃兵犯，朝廷征兵以抗之。杜甫在长安，见送行役人生离死别的情景，作《兵车行》诗云："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行役与送别之人哭到这种程度，一个自己遭遇也不好又特别同情民众疾苦的诗人在一旁目睹这种场景，能忍住自己的眼泪吗！

以鬼魅之哭代己哭，此其三。也在《兵车行》中，杜甫写道："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鬼哭谁曾听之，实乃杜甫见到连年征战带来之国破家亡景象，内心痛楚，借鬼之哭而哭之也。

以动物之哭代己哭，此其四，如大历三年，杜甫从公安至岳阳，对沿途所见所闻，皆有悲哀之感，作《晓发公安》诗云："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听鸡鸣亦如哭泣之声，若内心不带泪，何有此感！

以植物之哭代己哭，此其五。如天宝十五年六月，玄宗逃离长安而入蜀，京师因遭安史叛军劫掠而破败。至德二年三月，杜甫作《春望》诗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尚且溅泪，何况当时就在长安，进退维谷，目睹此场兵劫的杜甫呢！

杜甫以自己的心伤，诉之于物，借物以表其情，这就是代哭得以产生的原因。

杜甫在写哭时用了种种修辞技巧。

乾元元年春，杜甫在长安，得其弟在洛阳音讯，欣喜而作《得舍弟消息》诗云："犹有泪成河，经天复东注。"言泪已成河，是用夸张。

乾元二年，朝廷有邺城之败，调兵益急，杜甫自京都回华州，沿途所见之人，虽秦末之谪戍，无以复加，作《新安吏》云："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言青山之哭，是用拟人。

至德二年初，困于长安，作《一月五日夜对月》云："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言泪如金波，是用比喻。

广德二年春，切盼朝廷信任郭子仪等人，勿使京师再生离乱，作《收京师》云："莫令回首地，恸哭起悲风。"言痛哭亦能使风生悲而起，是用移情。

大历三年，作《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云："此生遭圣代，谁分哭穷途。"明明生逢乱世，偏说是碰上了"圣代"，明明是飘泊途穷，偏说不愿意为之而哭，是为反语。

杜甫写哭之技巧，还有许多，不再赘举。

## 诗圣哭泣之原因与启示

从上文可以看出，诗圣哭泣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战乱，另一个是贫穷。而在战乱与贫穷之间，战乱又占主导地位。

杜甫从长安十年末开始，直到去世，基本上都生活在战乱和战乱的影响之中。不管是安史之乱，还是吐蕃的两次侵扰等，都给国家造成很大的破坏，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痛苦。看看《兵车行》对战乱后果的描写：

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垄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哭战，被趋不异犬与鸡。……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杜甫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这些叛乱、侵扰带来的这种破坏与痛苦，这种经历从安史之乱开始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后期。

杜甫早年的生活尚属可以。长安十年期间，前九年一直居无定所，常常生活无着。为了求得一官半职来改变这种处境，杜甫常常不惜委屈自己，向一些自己既不尊重也不喜欢的权要呈诗献赋。后来虽然得了一个左拾遗的闲官，一则俸禄不多，二则时间很短，对杜甫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冯至《杜甫传》说，这个时期的杜甫，"一方面被贫穷压迫，一方面被事业心驱使，为了求得一官半职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②]。"不择手段"四字虽然过分了，因为这也在唐人习见的"干谒"范围，但是杜甫这种"干谒"常常是违心的，所以其内心之凄苦可以想见。《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的前两首云：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冬天到了，家里粒米全无，他不得不同儿子冒雪到山里去挖野菜甚至随着





耍猴的人到山谷中拾喂猴的橡子粒充饥，杜甫的惨窘真是到了极点。乾元二年末，杜甫迁家至成都浣花溪畔，筑草堂。十年间，茅屋时为秋风所破。离成都东下，展转飘泊，更是贫病交加。这种状况也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后期。

战乱和贫穷，对当时的许多来说，都是痛苦的根源。不停的战乱加剧了杜甫的贫穷，不能自拔的贫穷，又进一步使杜甫不能不在战乱中奔波。二者的交织与循环，使杜甫及其家人始终挣扎在死亡线上。杜甫的心中总是泪水盈盈，于是一有机会就不由自主地洒出来了。

有人将杜甫与李白相比，总说杜甫没有李白那种豪气与潇洒。是的，李白不仅有一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性格[③]，而且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所以他能够借酒兴让权臣高力士脱靴，能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但是，李白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有钱。而这一点正为杜甫所缺。因此，尽管杜甫也不乏诸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这种颇见豪气的诗句，但杜甫平常连求一餐饱饭而不可得，要他也像李白那样"豪气"与"潇洒"，可能吗？两人在气质上也有差异。李白同样经过安史之乱与吐蕃侵扰的岁月，甚至还因为永王璘的事被牵连而流放，但他的诗中就几乎没有什么眼泪。除了经济原因而外，个人气质也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李白似乎什么事情都看得开，杜甫则非常重情义而且多愁善感。天宝三四年间，二人同游梁宋齐鲁之后，李白可能渐渐把他忘了，可他对李白还是久久萦怀，在他的诗里还多次写到李白，这正是杜甫重情义的表现。一些一般人还可能为之动容的事情，杜甫也为之流泪，这又是多愁善感所致。乾元二年，杜甫客秦州，欲寻置草堂未遂，听笳声而作《遣怀》诗云："天风随断柳，客泪堕清笳。夜来归鸟尽，啼杀后栖鸦。"造房子的地方一时没有找到，人世间实属寻常，可杜甫把自己比作"后啼鸦"，不但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这就令人费解。上元二年在成都，见楠树被风雨吹倒，作《楠树为风雨所拔》诗云："龙倒虎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一棵树哪怕是再大的树被风雨所拔，自然界亦属寻常，可杜甫哭了，不但哭出了"泪痕"，而且哭出了"血点"，这也令人费解。也许有人会说这时的杜甫可能联想到百姓和自己的苦难，所以才流泪，但事事都这么联想，又何苦呢！这种情况，如果不是杜甫在感情上也有脆弱的一面，即天生就爱哭，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有鉴于此，我觉得容易伤感的人还是多读一点李白为好。

诗圣之哭泣，至少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这就要千方百计避免战乱，消除引起战乱的根源。因为战乱似乎历来都是统治者得利而老百姓遭殃。尽管引起战乱的人可以把理由讲得冠冕堂皇，头头是道，但是战争胜利了，他们用尸骨

铺垫了晋升的阶梯，可以增加荣耀，稳固地位，得到金钱，而老百姓可能连一杯羹也分不到；战争失败了呢，他们又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推卸责任，甚至逃之夭夭，让老百姓为他们承担后果。这种情况，从古到今见得还少吗？有人说没有当时的战乱，就不可能有杜甫这位诗圣，这话一点不假。但是我们宁肯要和平，也不要用战乱来造就新的“诗圣”。因为就在杜甫生活的几十年间，战乱所造就的诗圣，不过杜甫一人而已，而死伤的百姓则数以十万百万计。过去引起战乱者主要是为了掠夺，而今除掠夺而外则还有意识形态之争。哪怕只是为了其中的一项而不惜将老百姓置于水火，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智的领导人都不会这样做的。

千万不要让诗圣的遭遇在今天和将来重现！

**注　释**

[1] 仇鳌注．杜诗详注［M］．中华书局，1979：本文所引杜诗均出此书．
[2] 冯至．杜甫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6.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70.

（作者系本馆馆员）





# 韩愈在湖南的手迹和碑刻

刘国强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国务院最近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

2005年12月23日，湖南某报文体副刊头版头条新闻《韩愈碑刻我省首次露脸》一文中，说到“韩愈手迹碑刻在我省尚属首次发现”，“在全国也只有广东阳江等寥寥几处”。但据笔者查阅湖南地方文献和曾经实地考察，韩愈在湖南的手迹和诗文却至少有11处。

## 一、永兴县韩愈“昌黎经此”石刻

史志上对此早有记载，并非首次发现。1994年6月中国城市出版社的《永兴县志》第六章文物胜迹的介绍，全文如下：“侍郎寮，位于县东15公里的碧塘乡湘州村，为红砂岩质。寮高10米，宽24米，深8米，上覆中空。唐贞元二十一年（805），监察御史（后任吏部待郎）韩愈谪阳山令泊舟于此而得名。岩旁镌有‘昌黎经此’阴阳两幅题刻，传为韩愈手书。体势浑然，风骨遒劲，历千余年而未损，旁有唐朝议大夫前郴州刺史李吉甫、明兵部郎中李永敷、湖北候补知府杨恩寿、清道光永兴知县王晋庆等人的题刻，保存尚好。”

读了这段文字，和省文物专家12月27日现场考察结果两相比较，结果完全一致。《永兴县志》彩版上还刊载有侍郎寮刻题“昌黎经此”（阳刻）和“侍郎寮”的两张彩色图片。志书早有记载，因此称为首次发现不妥。

报纸这次报道，引起了省文物专家10余人亲赴现场考察。并有“柳宗元经过”石刻和南北朝时期的摩岩石刻新发现，获得“明年将肯定通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评审”的结果，令人高兴。此处韩愈手迹石刻，目前被称作全国第4件韩愈手迹石刻实物。

## 二、耒阳市韩愈"还我本来面目"墨迹

韩愈贬潮州时，路过耒阳。汉代灭秦有功的谋臣张良，主动避祸离开刘邦来到湖南，曾住过耒阳锄云洞（今称张良洞或昭灵寺），韩愈为该洞题写了"还我本来面目"六字，历代住持和尚将此题词制成匾额悬挂佛堂。因此地有汉张良、唐韩愈题词，引来历代官员、文人墨客前来欣赏或题咏作游记。其中有宋进士耒阳上促堡人氏李芮，明地理学家徐霞客，明名士刘季矿、刘芳，清衡山状元彭浚、邑令刘宗沛，清名士彭维新、刘濂、向大观、何绍基、陆绍礼等。昭灵寺在元代以前洞寺合一，明代后寺洞分立，洞前建寺，建国后，寺院改作民居。1960 年新生煤矿在洞前开采矿石，原刻在岩壁上的题字诗词几乎全部炸毁。1986 年由张良洞住持高僧释智光个人捐资 8000 元，当地百姓助修，历时五年，耗资 11 万余元，重建昭灵寺和重刻历代名人题词石壁，现已成为耒阳市一处重要的旅游景点和寺院。

2002 年 11 月 28 日，笔者为撰写《湖南佛教寺院志》，曾在昭灵寺考察并住宿一夜，亲眼见到重刻的张良题写的"洞灵源"石刻（岩洞东壁）、"张良洞"石刻（洞右侧石壁）、韩愈手书"还我本来面目"匾、张良生平简介、碑廊等。至于墨迹是否根据原韩愈手书制作，笔者当时未带相关资料，未作比较，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研究。

## 三、湘阴县韩愈《祭湘君湘夫人》碑和《黄陵庙记》碑

此碑原立于湘阴县三塘乡渔场堤外湘江东岸的黄陵庙，当地又称娘娘庙或二妃墓。黄陵庙历史上被称为三湘七泽第一胜迹，湘阴县第一胜迹。韩愈于唐元和十四年（819）因谏阻唐宪宗（806—820）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途经湘水，因"厉毒所聚，惧不得脱死，过庙而祷之。"曾泊舟上岸到黄陵庙祀娥皇、女英二妃，祈祷平安。第二年（820），韩愈遇赦，官迁国子祭酒，返回京城。他将个人的私款 10 万贯钱送到岳州，请岳州刺史王堪帮助整修已经破损的黄陵庙。并写下《祭湘君湘夫人》一文，"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长庆元年（821），岳州刺史张愉来到京城，请韩愈为重修的黄陵庙写一篇碑记，韩愈欣然同意，很快写成。"遂篆其事，俾刻之。"韩愈在碑记中称黄陵庙自古以祠舜二妃，庭有石碑，断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韩愈考图经记载碑为"汉荆州牧刘表景升所立，题曰湘夫人碑。"他对照残碑考察，实乃晋太康九年（289）所立，额曰虞帝二妃之碑，并非刘景升立。这说明，三国刘表所立的碑，在韩愈所在的唐代已毁或图经记录有误。

韩愈的《祭湘君湘夫人》文和《黄陵庙碑记》于唐长庆元年（821）同刻





于一块石碑上，文后还附有 42 字的跋。跋云："始将既修树旧碑（指晋太康碑），仍刻其文于斯石，因铭其阴，旧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尽识，移之于新（指韩愈所立新碑），或失其意，遂不复刻。"这块韩愈石碑四面皆有字，至宋代有两面字迹模糊已不可读，宋代金石家赵明诚《金石录》作了记载。

据唐杜佑《通典》、《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清光绪《湖南通志》、清乾隆《湘阴县志》等文献记载，唐代黄陵庙后改名为湘灵庙，唐天佑（905）封为懿节庙。宋元丰六年（1089）知县王定民移舜祠像于黄陵庙供奉。明崇祯四年（1632）湘阴县知县余自怡于当年六月十四日乘舟依例祀黄陵庙，只见颓垣短棘，瓦砾满地，发现宋刻韩碑岿然草中，当即捐三百金重建。清康熙七年（1669），湘阴知县唐懋谆重修黄陵庙，祠祀二妃，改称湘灵庙，每年六月十四日致祭，乾隆、嘉庆所编县志，都绘有黄陵图，图中二妃墓系青石券顶，黄陵庙则位于二妃墓后。

据《天下金石志》载："黄陵庙碑韩愈撰，沈传师书。"沈传师（769—827年），苏州吴县人，唐德宗时官至尚书右丞、吏部侍郎，是韩愈的同朝好友。以书名世，《旧唐书》、《新唐书》有传。宋代米芾评价前人书作多有苛求，却对沈传师另眼看待，赞扬沈书"如龙游天表，虎踞溪傍"，笔道粗细变化不大，干净利落，其书风既温和又刚介。

黄陵庙现已不存。三国刘表碑、晋太康九年碑、唐韩愈碑早毁，宋碑、明碑、康熙碑都已不知去向。笔者为撰写《释敬安与湖南》一书，于 2005 年 11 月 6 日下午，和湘阴县民宗局局长黎安平、法华古寺住持释早国与刘京裕，4 人专程到黄陵庙原址考察，听取当地人士冯进华（57 岁）、冯福成（54 岁）、汪迪华（46 岁）、宋庆强（43 岁）等介绍。当地群众称这里为"二妃墓"或"娘娘墓"。墓和庙早已崩塌，黄陵庙毁于二妃墓之前，时间更早。1964 年，二妃墓碑石已作为电排站基石，当年挖掘出墓砖及陶制牛头人身等人物。冯进华说 20 世纪 70 年代在附近水沟还发现两块青石碑，抬时被摔成两截，上面刻有文字，是何时代的石碑和文字内容，他都不知晓。20 世纪 70 年代用推土机将黄陵山削为平地，在平地上挖鱼塘，后成为湘阴县渔场。该村现有人员都没有见过二妃墓，现最早来这里居住的在 1970 年。只有前年逝世的一位 90 多岁的老太婆见过二妃墓。2004 年有郴州和广州两人开车专程寻访二妃墓遗址。当地群众强烈呼吁湘阴县政府帮助恢复黄陵庙和二妃墓这一重要文化遗址。

建议湘阴县政府在原址先行恢复二妃墓，墓旁建《韩愈黄陵庙碑记》碑亭，耗资并不多，留下祖先文化的根，将来资金充足时再恢复黄陵庙。韩愈碑文，建议由当代书法家仿沈传师书风题写，尽可能保留一点唐时风格。沈传师书法有清何绍基藏宋榻孤本《柳州罗池庙碑》传世，日本博文堂有珂罗版影印

本，可供参考。

## 四、衡阳县韩愈岣嵝山诗碑

据《南岳总胜集》记载，此碑在衡阳县岣嵝峰下法轮寺。碑文如下“岣嵝山尖神禹碑，字清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拏虎螭。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洏，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这是韩愈游南岳写下的一首《岣嵝峰》诗。

据《山海经》云，“衡山一名岣嵝”，今天衡山，并没有发现禹碑。韩愈这首诗，常为后代考禹碑者所引据。韩愈诗称禹碑，刘禹锡诗称禹铭，皆得之于传闻，未曾目观。故此诗后段韩愈自为疑词，访碑未遇，心中惆怅。宋代苏东坡《中隐堂》诗云：“岣嵝何须到，韩公浪自悲”，指的就是这首诗。

2002年9月25日，笔者和衡阳市志办主任曾恒华来到岣嵝寻访法轮寺遗址。遗址现存于该县龙头坪村田垅之中，四周群山高耸，中间地势平坦，旧方舆家称之为聚气之脉。据当地百姓言，原寺规模较大，九进十三栏，左右钟鼓楼，数里之外可闻古寺钟声。文献记载寺内曾刊有唐初著名书法家唐大臣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韩愈以及宋代黄庭坚、米芾等碑刻。唐代高僧无量寿佛全真（729～867）、懒残和尚（明瓒）、宋代高僧文悦（991～1063）、慧南（1001～1069）、景齐（黄庭坚之友）、明末清初高僧行炤（字石隐）、淡远等曾在此住持或住锡，寺僧多时高达500余人。土改时该寺改作学校，“文革”中被彻底拆毁。历代珍贵石碑被抬去作屋基、修水利，或作洗衣的搓板。寺旁高峰小学围墙为该寺残砖所砌，皆是千年以上黑色老火砖。详见笔者《东晋法轮寺考碑》拙文。

同年10月国庆节后，笔者又随同衡阳市谭岳生、罗步庵二上岣嵝峰禹王宫考螺祖坟及相关寺碑。宋朝四川人何致，于嘉定五年（1212）游南岳，发现了韩愈要找的禹王碑，他拓印了两份，一份献给连冲曹彦约，一份自己留作古玩。不久，他又翻刻到长沙岳麓山的一块石头上。明万历年间，湖广提学副使管大勋，又拓印翻刻一份放到衡阳石鼓书院。清康熙初年（1671），又有人仿石鼓书院禹碑，再翻刻到岣嵝峰禹王宫。我们在禹王宫看到这块岣嵝碑，正是康熙碑，厚五寸，77字，中间断纹剥蚀六七个字。韩愈的岣嵝峰诗碑随法轮寺被毁，已经永远看不到了，建议当地政府，将韩愈的诗重新刻石立碑，为岣嵝峰增添一处新景观。

## 五、永州市韩愈罗池庙享神祠碑

此碑原存零陵县（今永州市）河西柳子街柳子庙内。长方形，平额无座。





共为4块，每块高240厘米，宽132厘米，厚21厘米。此碑为清顺治乙亥（1659）秋月，永州知府魏绍芳重刻，据重刻跋文介绍，柳州柳侯庙享神诗为韩愈所作，苏东坡书之，与柳宗元的德政，世称三绝。由宋代郴州佥判关公庚等刻于罗池庙内。明代永州刘克勤摹刻于永州愚溪庙，因兵火焚毁。魏绍芳将元本重勒上石，恢复旧观。所谓元本，指的是宋时关公庚所刻之本。关本在广西罗平罗池。

刘克勤本毁后，清代魏绍芳续摹重刻。魏刻在20世纪50年代末仅存石碑4块，内文不全。元本的关跋、续刻的魏跋碑石均亡。1992年笔者参加全国怀素草书研讨会，曾见到柳子庙镶于殿后墙壁中的《荔子碑》，碑文首句“荔子丹兮蕉黄。”匆忙间未能来得及细考属于何种刻本。今笔者已经搜寻到魏绍芳跋全文，如果该碑缺魏跋，可将魏跋由当代书法名家重新书写勒石。

## 六、衡阳市韩愈合江亭诗碑

此诗碑为韩愈所作的五言诗，诗文共40句，款云右唐昌黎韩公诗，张栻书。210字，楷书。分11行，每行23字（诗文略）。原在衡阳市石鼓山，蒸湘水合流处江亭壁间，原碑毁于抗战年代。韩愈此诗乃唐顺宗永贞元年（805），由广东阳山县移江陵法曹，由郴州至衡阳时作，时间在当年8月，故诗云：“穷秋感平分。”张栻书此碑，不记年月，大约在南宋孝宗乾道（1165—1173）年间。

石鼓山峻峭耸拔，风景宜人，禹王碑、武侯墓、大观楼、会讲堂、七贤祠古建筑遐迩闻名，俗有“湖南第一胜”之称。韩愈、柳宗元、范成大、朱熹、张栻、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王闿运等都曾到此游览或讲学。石鼓山的古建筑和碑刻在日本侵华时被焚毁。1949年后重修并新建了合江亭、缘净阁及桥、廊等建筑。1983年秋，笔者曾到石鼓山采访，因天暮未及游览。不知现在合江亭是否重刻了韩愈诗文，如果尚未勒石，笔者可以帮助提供原碑的诗文内容。

## 七、南岳韩愈开云楼题诗

韩愈游南岳广为人知，他任江陵曹参军时路过衡山，住县城苍坡岭圣帝行祠，当时淫雨霏霏，连日不断，于是祷天放晴。次日，果然雨过天晴，遂登祝融峰望日出，游石禀峰，上岣嵝峰寻禹碑，最后回衡岳寺，访僧人承盈禅师。两人见面，倾吐相思，临别时，在寺内门楼写《别盈上人》相赠。他在《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纪游诗中写道：“喷云泄雾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我来正值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如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

扫众峰出，石廪腾掷谁祝融。森然魄动下马拜，松柏一径趋灵宫。”诗里写了他默祷苍天开云放晴的事。韩愈这次游南岳，还写有《岣嵝山》、《祝融峰》、《望日台》诗，这些诗收入清人李元度《南岳志》，但未收入《全唐诗》和《昌黎文集》。

衡岳寺位于南岳云峰下，始建于梁天监二年（503），隋仁寿时高僧净业、著作《十八高僧传》的唐代第一高僧惠日、唐天宝王维诗友瑗律禅师、唐贞元诗名蜚京的高僧灵澈、唐天宝初高僧懒残等驻锡过该寺。由于韩愈祷天放晴，从此衡山县便把苍坡岭改称开云岭，并建开云楼纪念他。现在城关镇叫开云镇，街道便叫开云路。南岳还建有开云堂、开云亭，都是本此而名，用以纪念韩愈这位杰出的文学家。开云亭在高台寺前坪，1936 年，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游南岳捐建。亭为六角，建在路旁，可资憩息，延览风光，亭额“开云”，名山故实。

## 八、武冈市韩愈《曹成王碑》

曹成王李皋（732—792 年），字子兰，系曹王李明（唐太宗李世民之子）的玄孙。李皋曾任衡州刺史，治政有方，“法成令修，治出张弛，声生势长”，引起时任湖南观察使辛京杲的嫉忌，捏造罪状，“诬以过犯，御史助之”。朝廷将李皋贬为潮州刺史。唐大历十二年（777）四月，吏部侍郎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十四年（779）五月德宗李适即位，八月召杨炎回京任丞相。杨炎了解李皋冤案真相后，奏明皇上，将李皋仍调为衡州刺史，并立案查处了辛京杲诬陷之罪。

辛京杲为官贪残，他见王国良家豪富，心生毒计，便令王国良镇守武冈，以死罪相加。王国良恐惧不已，散发家财，聚众反叛。建中元年（780）四月，李皋出任湖南观察使后，奉命带领五万之兵征讨王国良。他致王国良信中说，你和我都是被辛京杲所陷害，我已蒙圣昭雪，不忍心杀你，何不早早归降？王国良羞畏乞降，还在犹豫不决之中，李皋装扮成使者，一人一骑日夜兼行五百里，来到武冈县城，敲城门大呼招降。王国良不得已，马上认错朝拜，全军投降。王国良投降后，唐德宗赦免王国良无罪，并赐国良名为惟新。

《曹成王碑》系韩愈撰文，记述李皋生平事迹。湖南出版社出版的《都梁文抄今编》，节选了《曹成王碑》与武冈有关章节。有的文章称韩愈曾到过武冈，并无充足根据。《曹成王碑》原立何处待考。为了弘扬优秀的都梁古代文化，留住历史文化之根，建议武冈市有关部门在恰当的地方，镌刻韩愈《曹成王碑》，供后人纪念和瞻仰。





## 九、临武县韩愈《韩张亭诗碑》

《临武县志》载：贞元十九年（803），监察御史张署、韩愈以言事分别被贬为临武令、阳山令。次年，并辔南来，抵临武后，韩愈去阳山作县令。别去逾月，韩、张期会临武边界上，宿于韭菜水村（今九泽水）。贞元二十一年（805）春，韩、张先后遇赦移官江陵，并结伴同行北上。唐代以后，临武县人民称韩文公会见的山为韩张山，并在这里修建了韩张亭，建立了韩文公诗碑，纪念韩愈的临武之行。《临武县志》收录有韩愈在临武所作的《忆昨日和张十一署》、《题张十一署官舍三首（榴花、井、葡萄）》诗。

## 十、郴州市韩愈《叉鱼亭诗碑》

位于郴州市北湖西北湖面。唐贞元十九年（784）韩愈因上书德宗皇帝，而触犯京兆尹李实，被贬为广东阳山县令。时与贬为临武县令的张署，同经郴州赴任。永贞元年（805）两人获赦，又同寓郴待命。郴州刺史李伯康，邀其泛舟北湖，入夜，郡民驾舟举火叉鱼者很多。生长在北方的韩愈见此而诗兴大发，即席赋五言排律《叉鱼诗》，描述郴州春夜北湖叉鱼的盛景。后人为纪念韩愈叉鱼诗佳作，遂创草亭，名为叉鱼亭，亭中竖韩文公《叉鱼诗》。元皇庆二年（1313）六月，通议大夫王都中受命为郴州路总管，重修此亭。明、清朝又历加修葺。民国年间倾圮。韩愈在郴州住了两个多月，在这里完成了被称为五原的《原道》、《原毁》、《原性》、《原人》、《原鬼》五篇哲学著作，还写下了《八月十五赠张功曹》、《郴州祈雨》、《送廖道士序》等诗文。

1985～1987 年，郴州市政府拨款 24 万元，在北湖西北距湖岸 37 米的湖心岛山，仿唐建风格，新建“叉鱼亭”，面积 200 平方米，两层楼亭，飞檐翘角，六角攒尖顶，回纹窗，红漆黄瓦。楼檐正额横匾阳刻“叉鱼亭”三字，为原省书协主席周昭怡手书。亭楼正壁置韩愈《叉鱼诗》180 字碑刻，为湖南隶书家王超尘所书。1987 年铸塑韩愈铜像，立于亭前，背西面东。亭周环以麻石栏，绿荫环绕，需乘游艇登亭。这是目前湖南保护、开发最好的一处韩愈文化遗址。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写《谏佛骨表》触犯龙颜，贬为潮州刺史。再一次经过郴州，这时他已经年过花甲，老友李伯康早已去世，物是而人非。他在郊外缓缓寻觅以往踪迹，心情悲痛，他骑的马突然从山坡上滑了下来，颠蹶在地。当地老百姓见到是当年北湖叉鱼赋诗的韩文公和为民请命的好御史，于是帮他把马扶起来。此后，此岭名为“走马岭”，当地世代流传“文公走马”的故事。

## 十一、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诗

韩愈与岳阳地区的缘分有两件事载于史册。一是贞元（803）孟春，被贬为阳山县令的韩愈和临武县令的张署同行离开长安，过洞庭湖时，韩愈作了《湘中》（汨罗）七绝一诗，怀念被流放诗人屈原。二是唐永贞元年（805）十月，韩愈赴江陵作曹参军（管司法小吏）小官，途经岳州。是时，诗人刘禹锡也在岳州，同登岳阳楼，受到岳州知事窦庠的款待。韩愈作五言长诗《岳阳楼别窦司直》诗，记述了他登岳阳楼，览洞庭湖宏伟景色，感谢主人“杯行无留停，高柱送清唱。中盘进橙栗，投掷倾脯酱”的盛情，也抒发了自己遭人谗谤，被贬官的无奈。岳州知事窦庠作诗《酬韩愈侍郎登岳阳楼风赠》（五言长诗），“苦调当三叹，知音愿一听”，对韩愈进行友情劝慰。韩愈的诗已收入《岳阳楼志》等史籍。岳阳楼现建有不少古今名家碑刻，建议岳阳楼管理处镌刻韩愈在岳阳写下的诗碑。

以上11处韩愈在湘活动地点，都有重新开发价值。希望引起相关部门地区领导重视，为文化保护、经济建设、旅游等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永兴县志》、《耒阳市志》、《湖南佛教寺院志》、《湘阴县志》、《南岳总胜集》、《湖南文物志》稿本、《山海经》、《衡阳县志》、《零陵县志》、《衡阳市志》、《南岳志》、《衡山县志》、《武冈县志》等.

（作者单位：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





# 岳麓山的抗战遗迹

胡滔滔

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除了有丰富的自然风景资源外，文化沉淀十分深厚，也是一个地点集中、规模大、保存好的抗日战争纪念地。岳麓山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山中的一草一木目睹过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一幕。

1939年9至1942年1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湖南长沙地区进行了三次会战。在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的指挥下，中国军队积极组织防御，使日军攻击受挫，伤亡严重，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在中国军队前堵、侧击和追击下，日军惨败，中国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

中国在三次长沙会战中获得大胜，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这个时候，日本的南方军，在百日之内，就横扫盟国在亚洲所有据点和要塞，1941年12月25日英军在香港投降，1942年2月15日，英国马来亚最高司令珀西瓦尔率领十万部队，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3月5日，荷兰英军向日军投降；5月7日，美军在菲律宾，向日军投降；整个亚洲战场，只有在中国长沙痛击日军，造成日军成军以来，一次大规模会战的惨败记录。通过长沙会战，打破了日军歼灭第九战区主力、使国民政府屈服投降的幻想，牵制了日军的南方作战；保住了湘赣，并给日军以一定的打击：动摇了“日军部分官兵必胜的信念”，提高了中国军队广大官兵的士气，增强了其抗战必胜的信心。特别是第三次会战，影响范围很广，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卫强国的力量，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立即跻身成为对抗法西斯轴心的主要盟国。长沙会战也为以后的抗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的胜利，系华军的长沙大捷”。蒋介石评价：“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得意之作。”

长沙的地形，对守者来说，岳麓山是很重要的，与长沙城区隔江相望，对长沙城区有钳制之利，优势炮兵占领岳麓山，观测条件好，利于发扬火力。

长沙会战中，岳麓山布置有重炮旅，配以 180mm 榴弹炮，加上平时炮兵早把长沙市内的地形、距离准确地测量，所以弹无虚发，给日军以毁灭性打击，长沙会战之所以取得重大胜利，与岳麓山上重炮所发挥的威力是密不可分的。

通过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 年 5—6 月）的结果可得知，岳麓山在防御日军进攻时的重要地位。

第四次长沙会战，是长衡会战的第一阶段，长衡会战是日军为援助南洋日军而进行的，是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重要部分，5 日，战火烧到湖南，27 日，日军向湘北方向进攻，二线兵团同时南下作战。

各路日军避开我军的侧翼迂回，分途向长沙外围进攻，并占据外围据点。6 月 16 日开始向长沙城和岳麓山主阵地发起猛攻。因历次会战遭受岳麓山炮火的毁灭性打击，所以将岳麓山列为重点攻击目标。岳麓山炮兵阵地受日军重炮和空军压制而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至 18 日，日军以优势兵力，自背后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岳麓山失守则长沙沦陷。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始，岳麓山相继建成了岳王亭、纪忠亭、陆军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名录石栏等。山中仍留有当时的战壕、弹坑和炮台，以及薛岳指挥部、战时指挥所等处遗址，并出土有枪支、子弹、钢笔、印章、电话筒等抗战遗物。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麓山景区管理处已完成了抗战史迹的全面修缮，以慰英灵。

## 一、长沙会战碑

长沙会战碑位于响鼓岭石亭北侧，高 2.35 米，宽 1 米，正面篆刻“长沙会战碑”五字，是抗日战争期间留下的抗日纪念石碑。记述了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九月，日寇以十八万之众，兵分六路会攻长沙，当时国民党第九战区全体将士奋起抗日，忠勇用命，人民协同，合围设状，取得歼敌三万的胜利而立此碑。碑阴刻有记事诗 10 首。碑阴记述：

自古以来一战而决国命者有之矣，长沙一战而系世界之祸福者也有之，长沙会战后三年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先生泐石麓山纪我武威之盛。以□长战区戎幕颇有见闻之切，嘱其事是德。敌驱精锐二十万六路犯湘，薛公妙机宜，诱敌围歼，斩馘四万，修□□汨水为之赤。追奔逐北，大捷空前，邦人胜念益坚，国际视听丕变。不仅拱卫陪都屏蔽，西南已也长沙会战纪实一书已志，其□□亦曾赋七绝十章以纪其事。雪泥鸿爪，足资印登，因移录以实碑阴：

千里长围战洞庭，声声鼙鼓耳边听。





雄师敢洗胡尘恶，重见湖峰入眼青。
人钦百战岳家军，挟策犹惭志不纷。
依旧西南雄局在，朗潭修赣气屯云。
漫天烽火迫罗城，滚滚江流气不平。
正伏奇兵齐杀敌，应知主帅极英明。
形势兵争到眼明，胸中成竹意峥嵘。
将军自有纵横略，报国精忠负盛名。
诸将勋劳智勇全，存诚妙算是心传。
风占鸟角孤虚术，都是临机料敌先。
雄哀健弱钦孙李，进退神迟慕赵班。
六路迎攻寒寇胆，赣湘甲胄尽欢颜。
万家岭外忆驱除，幕阜山前布阵图。
却笑虾夷吞象郡，鄱阳飞渡洞庭湖。
兵家形势扼湖南，山叠江纡锁钥函。
纵有龙蛇侵海界，何难与圣话三三。
胜境时来败境难，静如处子塞如山。
忠城自可回天地，干济方能历险艰。
虏法指日洗山河，痛饮黄龙一放歌。
四万万人心不死，那愁荆棘泣干戈。

陆军上将第九战区长官司令薛岳
中华民国三十年七月七日”

该碑原置放于云麓宫前坪侧，有亭护碑，后移至响鼓岭。现为市级保护文物。

目前，景区已将碑体正反两面复原移正，移至响鼓岭亭内保护。

## 二、战壕、炮台

岳麓山上留有大量的抗战遗迹，像炮台及无数的战壕，遗存长达 10 余公里，曾发掘出大量的弹药、枪支等遗物。

在第三次会战中，薛岳根据岳麓山对长沙的瞰制作用，将战区直属独立炮兵旅配置到岳麓山，以支援长沙守军的作战，令李玉堂以一个营的兵力在湘江西岸和岳麓山占领阵地，掩护炮兵，还令第 10 军的两个炮兵团，先以一部放在第一线阵地后方，支援警戒部队和第一线守备部队作战，而后视情况全部撤到岳麓山，加强岳麓山的炮兵火力，以形成对天心阁方面和长沙东南地区日军的毁灭性火力打击。后 73 军前来增守岳麓山。

据日方记载，在第三次会战中，当天（1942 年 1 月 3 日），日第 3 师团的战斗情况是“横田大队的左侧面已暴露在岳麓山的重炮阵地之下，从正面又受到优势兵力的反攻，终日在反复地死斗中，正在第一线联络的联队副官神野一郎大尉战亡，第 5 中队全体干部负伤，此时，弹药已经全部用尽。”

第 6 师团的战斗情况是：“……重庆军从湘江对岸的岳麓山，以重炮（15 榴）应战，猛死轰击。下午各部队虽继续在城墙外围竭力反击，但战斗陷入胶着。于重炮（15 榴）的集中轰击，我方不断伤亡。”

目前山上的战壕由于年深日久，周边落下的土将战壕垫高了，最深的地方不到 1 米，在两侧的内壁或长满了野草，或露出光秃秃的黄土。炮兵阵地也无明显标示。景区计划筑以标志碑、说明加以标识，并选择几段战壕围以栏杆加强保护，以存史迹。

## 三、薛岳指挥部、战时指挥所

前者在清风峡爱晚亭旁一个山洞内，1941 年 12 月 30 日，薛岳为就近指挥督战，将指挥部从长沙的二里碑搬迁到岳麓山上。后者设在半山亭对面山坡上的湖南省会警察纪念堂。警察纪念堂系 1935 年 8 月所建，为一栋小青瓦祠堂式建筑。景区已对此两处遗址进行修缮，并将省会警察纪念堂建成长沙抗战纪念馆。

## 四、陆军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

位于赫石坡岳王亭后山坡上，系岳麓山大型墓葬之一。始建于 1946 年。前有百数十级宽阔的石级导入，左右各有墓门，墓区十分宽敞。墓塔高约 6 米。正面刻有“陆军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的墓名，左右侧刻有“精神不死”、“风云长护”的赞语。塔座四面皆有文字，正面文字为程潜所题：“誓死卫国家，以诏来者；壮气塞天地，是曰浩然。”其余三面分别为“名山忠骨，万古长青”、“碧血丹心，光耀天地”、“凛冽万古”。墓塔之后，为存放阵亡将士骨灰的洞穴，题额：“忠义观”，两侧有对联：“忠昭大麓；义塞苍冥。”由于“文革”的破坏，所遗骨灰全部被毁，题款人的姓名全部被凿去。墓塔之后，有分层排列的七十三军官兵坟墓。其墓区内还有纪功柱、长明灯、王东原公馆、七十三军七十七师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田广真墓、纪忠亭、归宿亭等。

七十三军在抗日战争中，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支主力部队，原隶属第六战区，驻守澧县、石门一带。在 1939 年 9 月开始至 1942 年 1 月结束的三次“长沙会战”中，奉命参加第九战区的长沙保卫战，与日本侵略军在长沙一带展开了“一寸土地一寸血”的殊死战斗。后又在 1943 年底保卫常德的血战和





1944 年夏天的“长衡会战”中，再英勇顽强地抗击日军，为保卫湖南这片热土浴血奋战，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会战中，73 军广大官兵发扬了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数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给敌人以重创。虽最终未能阻止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但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范围内的正面战场的作战，并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敌后战场的反扫荡斗争，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 年 4 月，湖南各界人民为七十三军阵亡将士建了公墓，供奉阵亡将士的遗骨。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扫荡一切，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同样未能幸免。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墓的破坏程度愈加严重。为了让将士们为国捐躯的浩然正气永远昭示后人，2001 年，麓山景区管理处对公墓进行了抢救性的第一期修复工程。目前，爱国主义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已成为告诫后人不忘国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基地，每年到这里来扫墓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地保护公墓，使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抵御外侮为国捐躯的事迹激励、鞭策更多的人，现景区已完成公墓的第二期全面修复工程。

## 五、抗战阵亡将士名录石栏

该石栏现在云麓宫前坪，用作围栏，计有 19 块，按序列铭着数千名在长沙会战中牺牲的烈士姓名，现已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六、忠烈祠

始建成于 1939 年，原为岳王庙，后纪念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抗战阵亡将士，改名忠烈祠。忠烈祠占地面积 5 500 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 700 平方米，进深二间约为 200 平方米。主体建筑歇山顶，黄色琉璃瓦，空花脊饰，内外均以花岗石柱支撑，建筑规制考究，宏伟壮观。

祠内悬挂“允武且仁”匾。“允武”源于《逸周书 · 允文》：“于时允武，死思复生，生思复所。”即指征伐之事。“仁”指仁德。匾的意思是说革命军将士战功与仁德并具。由原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延闿（1880—1930 年）撰，国民政府原第四路军总指挥、时任第十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刘建绪（1892—1978 年）题款。祠正面石柱上刻有对联两副，十分有气魄，可惜因“文革”之故，题联人的名字皆被毁去。

凭栏望七二峰峦，慷慨念同袍，浩气长存，岳湘增色；

此地瘗三千组练，登临来赫石，忠魂不朽，申甫重生。

“七二峰峦”，指南岳七十二峰，岳麓为其末一峰。“岳湘”，泛指湖南。“瘗”，掩埋。“三千组练”语出《左传·襄公三年》：“(楚子重)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孔颖达疏引贾逵说：“组甲，以组缀甲，车士服之；被练，帛也，以帛缀甲，步卒服之。”“申甫”是周代名臣申伯和仲山甫的并称，源于《诗经·大雅·嵩高》：“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后借指贤能的辅佐之臣。

江水滔滔，共一片斜阳，长写出壮士当年血泪；
赫石珞珞，添几椽庙貌，好留与后人终古馨香。

“赫石”，指赫石坡的石头。“珞珞”，坚硬、刚正。

祠内及祠外左右侧石柱上，也都有对联。

马革裹尸，千载岳云留浩气；
羊碑堕泪，万年湘水吊忠魂。

忠烈祠四周立柱及祠内还有如下对联：

十余年定倾扶危，历湘赣滇黔浙闽之交，内弭潢池，外御暴寇；
亿万代崇功报德，享馨香俎豆烝尝之盛，名垂竹帛，气壮河山。

碧血染黄沙，取义成仁应垂不朽；
精英辉赫石，贪生怕死莫到此间。

扬威国土，靖乱岩疆，铁血铸山河，万里留光荣战绩；
气壮洞庭，风高云麓，旌常兼俎豆，千秋拜忠烈祠堂。

百战裹尸还，宜藏兹猿鹤幽栖，麒麟高冢；
千秋灵爽在，此中有长弘碧血，阁部衣冠。

热血溅国魂，安夏攘夷蒙矢石；
名山埋忠骨，岳云湘水拥松楸。

此祠已于2004年由政府出资修缮。

## 七、岳王亭

位于赫石坡内，始建于1936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我国领土，东北全境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挽救民族危难，全国各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各种不同方式表明抗日决心，岳王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

岳王亭是一座仿清亭式建筑，六角攒尖重檐顶，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亭内石碑刻有岳飞浮雕遗像，以及湘乡名士颜昌峣书岳飞年谱。

## 八、陆军第10军二次长沙会战阵亡将士墓

《长沙抗战》书中记载，原址在二里半，山上墓旁有楼房一栋，挂牌为“兴华中学”，其学生多为阵亡将士之子女。现今在湖南师大文学院樟园内，有残碑及部分构件留存。湖南师大老校门即为该墓牌楼。麓山南路拓改时拆毁，据湖大老教授回忆，牌楼原有对联一副为：“栽培兰芷遗忠爱；整顿湖山树楷模。”

陆军第4军抗敌阵亡将士墓，位于岳麓山南黄、庞墓至五道梯处，仅存遗址。

第10军是第9战区的王牌部队，素有“泰山军”之称。军长李玉堂，山东人，黄埔一期学生，1938年夏任第8军军长。在武汉会战的南浔线战斗中，因战功卓著，被蒋介石授予华胄勋章，指挥南浔作战的薛岳则赠送第8军“泰山军”锦旗一面，“泰山军”之名由此而来。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李玉堂调任第10军军长，“泰山军”之名也随之被带到了第10军。此后，该军就一直在衡山附近整训。

1941年9月19日，第10军接到开拔命令，由于时间紧迫，根本来不及进行充分的作战准备工作，也没有对官兵进行必要的战斗动员教育，接到命令后，各部匆匆启程，连续日夜行军，部队疲惫不堪。22日，第10军接替第37军第140师在金井及其他地区的防务。由于其预备第10师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严密戒备，被敌偷袭，该师驻在金井最前沿的一个营，“鼾睡中被日军突入营舍，乱刀砍杀，猝不及防，受到很大损失，死伤二三百人”，该其他各部，“不知敌人夜间从何而来，有多少人，阵势如何，于是在黑夜中盲目抵抗、搜索，乱作一团，师、团、营、连之间失去联系，及到拂晓以后，师长方先觉，才把情况弄清，报告军部。”9月24日拂晓，日军第4师团在飞机掩护下攻击预备第10师，以骑兵从正面冲锋，步兵两侧包抄，利用空中优势、情报准确及时，并专打指挥机构，使中国军队上下失掉联络，指挥意图无法下达，部队群龙无首，无心应战，一味后退，以致战斗失败。

第190师于9月23、24日与日军作战，师长朱岳在率部行进中突遭日军迂回的一队骑兵的侧击，朱岳负伤，副师长阵亡，师直部队和第570团溃散。不久，另两个团在日军的进攻下也向南撤退。25日，第10军军部由金井向西南转移至孙家桥，被日军围困，军长李玉堂率特务营突围，跑到青山铺，脱离了战场。

日军在击溃了第10师、第190师后，又集中兵力直扑第3师，3师虽拼

死抵抗，无奈日军兵力强大，第3师很快被其分割数段，战至26日，师长周庆祥只好令各团突围。

至此，素有“泰山军”之称的第10军全线溃败。

战后，该军将此次战役中阵亡的将士归葬岳麓山。

第4军在三次会战中，将士奋勇用命，激烈搏杀，给敌以重创，该军战后将阵亡将士归葬岳麓山。

### 九、齐学启墓

位于岳麓山西向山脚，20世纪80年代由孙立人将军捐资修缮，现保存完好。

齐学启（1903—1945年）湖南宁乡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诺维琪军校留学，归国后历任宪兵团长、税警总团参谋长、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2年，齐学启将军率部赴缅协助盟军对日作战，仁安羌大战，歼灭日军1 200人，解救了包括总司令亚历山大的7000英军。后在与敌作战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狱中齐学启将军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后被敌人杀害，壮烈殉国。追赠陆军中将。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孙立人将军电请英军十四军团史立姆派专机将其遗体空运回国，公葬于岳麓山，并由当时湖南省主席王东原和孙立人将军步行送葬。

（作者单位：长沙市岳麓山景区管理处）





# 遭日寇枪杀从血泊中滚爬出来

## ——我亲身经历的日寇厂窖大屠杀暴行

杨乃一

南京是一座大城市，在抗战期间是我国的首都。日寇攻陷南京，残酷屠杀我国军民三十余万！湖南厂窖是一处很小很小的集镇，日寇攻占厂窖后，也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疯狂屠杀我国军民一万多！是日寇继南京大屠杀后在我国杀人最多的地方之一。这是日寇在中国所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以后，天门、沙市等地也相继沦陷，那时我才十二三岁，没有逃到其他地方去，仍在天门一所学校里读书。

有一天（记不清具体时间）上午上完一节课，我们是复式班，当时同学们在做作业，而我却没做作业，拿着一张纸条在上面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时，教室里进来了一个日本宪兵，他从我的后面走来，当时，我只专心地在写这些抗日爱国口号，没注意到日本宪兵，这个鬼子宪兵走到我的身后，突然用手抓去这张纸条，老师和同学们也都惊呆了！鬼子宪兵抓起纸条看了一下，铮狞地笑着摸了一下我的后脑勺，转身就走了。

因为发生了突然事故，当时老师宣布放学，同学们各自回家吃饭。我回家将这件事对母亲讲了，母亲双目失明，吓得直哭。饭还没有吃完，那个看到我写口号的日本宪兵和另一个鬼子宪兵押着老师到我家，一见到我就猛地用力一推，将我推倒在地，面朝下，背向上，用竹根在我的背上猛抽。因天气热，我没穿上衣，每抽一下，背上就起一道紫红色的笞痕，抽打了数十下，我的背上就像被无数条赤练蛇缠绕着！接着，鬼子拧着我的耳朵把我提起来，鬼子宪兵正拿着东洋刀对准了我的胸膛，准备劈死我（当时，日本鬼子大劈了汪琼山等一批烈士）。这时我们本地商会来了一个人，他是卢云亭。卢先生急冲冲地跑过来，用他的身体护住了我，挡着东洋刀，对鬼子说：“小孩不懂事，有痴呆病。算了吧！”鬼子问他：“他家有什么人。”卢先生回答说，就只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瞎子母亲。乡亲们也都这样说。鬼子一看房里的母亲果然是这样，于

是；鬼子在卢先生的引导下恨恨地离去。我用眼睛瞪着鬼子兵的背影，恨恨地咒骂：我将来要亲手杀死你们这些狗强盗！怕鬼子再来，我和母亲逃到乡下去了。

1940年，我逃出了天门，到湖南南县湖西中学读书。到1942年冬，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南县，将南县房屋全部烧光、炸毁。1943年春，大概是四月，学校决定迁至厂窖开学。

我接到学校转移的通知后，就和同学彭力行（现住美国）、彭力成（已去世）、王训谟（去台湾）去厂窖上学。我们乘坐的木船快到厂窖的时候，突然听船后方向有日寇的汽艇声和机枪声，接着船的前方也听见有日寇的汽艇声和机枪声。这时船不能走了，大家只好上岸各自逃生。我和彭氏姐弟一起跑。我们发现前面有一个湖，湖中间有一个小村子，只有一条小路进村。我们觉得比较安全，于是就跑到那个村子里躲避日寇。

进了村子以后，我们在村里休息时，看见一位理发师在为一个少女剪头发，这就启发了我们。于是就找理发师将彭力行长发全部剃光，并脱去她的外装，换上我的一套对襟夹衣，看上去俨然是一个男孩子。又将锅底里烟灰抹在脸上和脖子上，连同手和臂膀也都抹上，简直像一个非洲黑人。大家看了一看，觉得像这样女扮男装还可以，这才松了一口气。第二天鬼子进村也未发现她是女孩子。我们当时清点人数，发现王训谟不在场，于是决定去找他，由我和彭立成去。那时我们只有十四岁，还是小孩，考虑到不会引起日寇的注意。临行前，我们高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我们俩人就来到了河边，找到了我们原来所乘船的船主。结果所有的船都被日寇烧了，还枪杀了很多人，只剩下一些烧焦了的船板。我们看到船主们都在痛哭，没找到王训谟的下落，只好返回。

走过两趟的路，对路线和方向有点熟悉，我们没有走大路，走田埂。鬼子的飞机不时地在空中盘旋，一飞到头顶，我们就卧倒，就这样卧倒过多次。我们继续往回走，这时，我们突然听到鬼子的三八枪“叭”、“叭”的枪声，枪弹向我们这边射来。稍顷看清了在堤角上站着一名鬼子兵，果然正在向我们开枪。鬼子向我们射击第二发子弹的时候，我中弹了，这时我只觉得右上臂和右胸部发麻，有疼痛感，右臂不能动了。我们急忙滚入稻田里，埂上土块飞扬，鬼子大约射击了一夹子弹。鬼子以为我们死了，就停止了射击。我们趁鬼子停止射击的时候，就匍匐着避开鬼子的方向，向右侧滚去。好不容易爬到了湖边，找到了一只带着血迹的划子，我们用手拨水，使船行走。上岸，找到了我们的同伴后一起住下。

我们离船登岸后，在进村之前又听到很激烈的冲锋的吼声，钢炮声，轻重





枪声。事后才知道，这是国军部队和日军交战了。不一会枪声渐渐减少，看样子是国军武器装备差而被迫撤退，只有零星枪声。国军撤退时，有些受伤士兵不能及时随军撤退，落入日寇手中。日本强盗公然违反国际公约，驱赶军犬将这些手无寸铁的受伤士兵逼下湖中，或抛入湖中。鬼子的目的不是要淹死他们，而是要将他们浮在水上的人头当活靶射击，甚至用刺刀劈刺。伤兵们绝望地惨叫，鬼子们狰狞地狂笑……。根据我所观察，日寇将所俘我军战俘全部杀害，真是惨无人道。这是我在湖中村子里亲眼看到的日寇屠杀我国士兵的暴行。

整晚，外面的枪炮声不停，我苦难同胞的呻吟声和哭声不停，冲天大火不停，鬼子们似狼样的嗥叫声和军犬的狂吠声不停。人们都是提心吊胆地过夜。同学们还冒险去买鸡蛋给我补身体，把衣服撕破，帮我包扎伤口。结果发现子弹是从左前方射过来的，弹头先从乳头下边射进去，穿过肋骨缝隙从腋下出来，又从右上臂里边穿透上臂的肌肉穿射出去，一弹四伤（伤疤残留到现在）。当时如果子弹在胸部稍微深一点就伤到肺了，偏上或偏下就会伤到肋骨，在右上臂稍往里一点就会伤着右上臂骨。我虽然中弹未死，但这也是日寇对我所欠下的血债呀！

第二天，日本鬼子扫荡到我们这个避难的村子里。鬼子将这些逃难的男人、妇女、老人、小孩一起赶到稻场里，准备用机枪扫射。在未射杀之前，鬼子们满村烧掳，对妇女进行强奸甚至轮奸，以至有些妇女悲愤自杀。日寇真是无恶不为，较之电影和现在的电视上的情节还要凶残！因为鬼子们干坏事去了，还没有来得及扫射，鬼子的头目相互耳语了几句，估计是鬼子们的上级命令他们离村，百姓们才幸免于死。

鬼子们抢走很多鸡鸭和其他一些东西，并从稻场的人群中点了几个年轻人为他们提着抢来的鸡鸭，其中就有彭力行。我吓了一大跳，她可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呀！如果鬼子发现她是个女扮男装的女孩子那怎么得了！彭力成就在彭力行旁边，我们相互使了个眼色，趁鬼子们干坏事的时候，我从场中出去将彭力行换了下来，我胸前受伤，明知此去凶多吉少，甚至会被鬼子枪杀，但我还是拼死把彭力行换了下来。我胸臂的伤口被稻田污水感染化脓，日寇若发现脓血，我则很难活命。因为若鬼子发现我身上的枪伤，就会被当作国民党伤兵而遭枪杀，且湖的周围都是鬼子的岗哨和兵营帐篷，随时都有被枪杀的危险。可尽管危险，我还是不让同学遭受日寇的蹂躏而冒着生命危险将彭力行换了下来。我和彭力成提着鸡鸭跟着鬼子走，到了湖边，鬼子们和掳来的一些人上了船。因为船小，我和力成上不去，将鸡鸭放到船上，跳进湖中跟着船走。淌到水深至颈脖子的地方，我们就装着不会游水，假装着把水喝进去、吐出

来。鬼子见我们像要被淹死的样子，便扬手叫我们走，怕鬼子开枪射击，等鬼子走远了，我们小声说：不要上岸。又过了一会，鬼子们走得更远了，我们才游上岸，我和力成手拉手捧腹大笑，笑得连头都碰到地上去了！我们回到村子里，谁也不能离开一步，一离开村子，就会被日寇枪杀。

第三天天还没亮，我们离开这个村子，在路上我们每步都要踩着死尸，或跨过尸体才能通过，这些被枪杀的有老人、小孩，还有坐在童椅里只有几个月的婴儿，还有在妈妈奶边的乳婴；被枪杀的还有很多手无寸铁的我国士兵，有的是被子弹击中，有的是被刺刀刺死。真是惨绝人寰，惨不忍睹。

厂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集镇，四周遭日寇枪杀的就有一万多人（抗战胜利以后，我看到报纸上公布，统计被杀同胞为一万多人）。

这就是我，当时在厂窖被日寇枪杀未死的人，亲身经历的厂窖大屠杀之实况，特记录下来，使国人不忘国仇，坚决向日本帝国主义讨还血债。我逃难、失学、失业，人的精神、身体所受到的一切损失，日本政府有责任主动向我进行赔偿道歉，对一切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害的中国人，日本政府都应该主动进行赔偿、道歉、认罪。

（作者系武汉市硚口区建乐村小学退休教师）





# 两张文书藏品见证<br>“衡阳保卫战”的血雨腥风

张才军

这是两张不太起眼的文书藏品。第一张是民国 32 年元月（即 1943 年元月）由国民党 46 军新 19 师师长罗浩、主任副官廖飞签发的《出征抗敌军人家属证明书》。另一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中正签发的恤金给予令。第一张文书证明了民国 32 年元月贵州省黎平县地青乡仁里村青年黄松有参军出征抗日。第二张恤金给予令证明黄松有于民国 33 年 8 月 5 日（即 1944 年 8 月 5 日）在衡阳保卫战中阵亡，时年 33 岁。按当时“陆军战时抚恤条例”规定黄松有第一次应享有 130 元抚恤金，以后每年享受 70 元抚恤金，时间为 20 年。给予令的背面则未见黄松有亲人领到抚恤金的签名。由于给予令是民国 35 年 5 月也是就 1946 年 5 月签发的，当时当值国民党发动全国内战前的准备时期，黄松有亲属是否得到这笔抚恤金不得而知。但正是这两张微微发黄有文书，把我们带回到 1944 年夏天那场惊天动地泣鬼神的“衡阳保卫战”的悲怆岁月……

1943 年 11 月下旬，日本大本营为挽救太平洋战区日军的颓势，接应南洋一带陷于孤立无援的 50 万日军，作出了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的设想，12 月将此作为“一号作战”计划呈报天皇，1944 年 1 月底，日本天皇批准了这个自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作战计划。“一号作战”将打通黄河——信阳间的 400 公里，岳州——衡阳间的 400 公里，衡阳——广州间的 600 公里的漫长交通线。其作战规模之大，远远超过抗战以来的历次会战。为了“一号作战”，日军计划使用总兵力达 51 万之多，战马 50 万匹，火炮 1500 门，汽车 15000 辆。日军部还命令在华的日本侨民、商人入伍以补充兵员。1944 年 4 月下旬前后，日军又调集伪军第二集团张岚峰部、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部、第十一军孙殿英部向汴新一带集结，配合日军进攻。

1944 年 4 月 17 日夜，日军第 37 师团分兵左右两翼向驻守河南中牟的中国军队暂编 27 师阵地猛攻，正式拉开“一号作战”（我国史称“豫湘桂”战役）的序幕。担任河防和正面防御任务的孙慰如第四集团军、卫立煌第十四集

团军及15、19、36、39、28等七个集团军共18个军30万将士，在驻华美军陈纳德十四航空队308轰炸机中队、23战斗机大队的支援下奋起抵抗，豫中会战开始。38天中，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丢失城市38座，牺牲包括36集团军司令李家钰上将在内的官兵20多万。日军取得"一号作战"第一阶段的胜利。第二分阶段作战——湘桂会战的序幕立即拉开。

1944年5月27日，日军兵分三路由洞庭湖西侧地区，以钳形攻势向湖南发起总攻，其左翼于26日突破通城，分趋渣滓、平江，中路陷新墙，趋汨罗江北岸；右翼循洞庭湖趋沅江、益阳。防御在一线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有薛岳的第九战区20万人、张发奎第四战区5万多人、余汉谋第七战区10多万人。还有美国空军及炮兵部队共计37万人。为阻敌南进，守军韩全璞的72军、杨汉诚的20军、关麟征的37军、彭位仁的73军、朱怀冰的99军，在上述各地区分别阻截日军。但均纷纷败溃。沅江、湘阴、株洲、湘潭相继被占，日军逐次完成了对长沙的包围态势。战区司令薛岳无与日军决战的决心，将司令部从长沙迁到耒阳，仅派参谋长赵子立率特务营组成战区指挥所，坐镇岳麓山，指挥长沙保卫战。6月17日晨日军发动总攻，敌58师团攻进长沙市区。19日，守军弃守长沙，向湘南败退。长沙陷落，使后方重镇衡阳完全暴露在日军的兵锋之下。

衡阳地处湘江、蒸水的交汇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不仅是铁路交通的重镇，有粤汉、湘桂两线交汇。而且也是大后方通往东南各省公路的枢纽。湘江东岸的衡阳机场同江西省的遂川机场并列，成为美国空军在中国东南方最重要的基地。衡阳也是战时主要的物资集散地之一。奉命死守衡阳的第十军利用衡阳周围的河川、丘陵、城墙和房屋，在城内各街道挖掘战壕、散兵坑，设置暗堡、机枪掩体、铁丝网等，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

6月22日，骄横的日军开始对衡阳发起进攻，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奋起还击。著名的"衡阳保卫战"打响。23日敌68师团在东阳渡以西强度湘江，从南面围攻衡阳。26日，日军派出一支1000余名官兵组成的敢死队，占领了衡阳机场。28日，日军完成了对衡阳的四面包围，发起了第一次总攻。守军凭借坚固工事和优势炮火，奋起还击。毙敌116师团步兵联队长和尔西降陆军少将、第三师团步兵联队长大桥彦四郎陆军少将以下2000余人。29日晨，敌第34师团一部从长沙赶来增援，妄图破城。遭中美空军轰炸扫射，破城企图幻灭。进攻大西门的敌军的116师团，切断铁丝网冲进地雷区，被守军190师击败。敌68师团主力及34师团一部攻击五桂岭、江西会馆、回雁峰、岳屏山一线阵地，均被守军完全击退。30日，日军的所谓"无敌"联队黑濑联队疯狂攻击张家山高地，被守军用步枪、轻重机枪、手榴弹交织的火网击溃。日军被迫于7月2日暂时终止了攻势。





7月11日，日军经过休整和补充后，又发动了第二次攻势。日军使用了大批的燃烧弹和各种毒气弹，在加强的空军和炮兵配合下，向守军阵地疯狂猛扑，战斗进行得相当惨烈。日军每突破一个口子，中国守军就从这个口子把敌人打出去，持续战斗5昼夜。敌116师团主力集中攻击守军第3师和预10师结合部，守军在支前群众积极配合下奋起反击。双方在莲湖台激烈拼杀一天，莲湖台终陷敌手。莲湖台失守，使青山街、天马山两据点危急，守军拼死力保青山街、天马山阵地，不少将士负伤数次经支前群众临时包扎后，仍坚守阵地奋勇杀敌。黑濑联队以伤亡过半的代价，仍无法接近守军的核心阵地。15日黑濑联队得到针谷联队的增援后，再攻天马山，守军许学超营长率部迎战，连运输兵、炊事兵也拿枪战斗，战至傍晚，全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日军第二次总攻击虽占领了若干据点，但在中国守军的顽强的抗击下，伤亡惨重，攻势受挫，不得不于7月20日终止第二次总攻击。

面对衡阳保卫战的危急形势，第十军军长方先觉连连发电给第九战区司令薛岳乃至直接发电给重庆军委会支援。7月中旬，军委会派王耀武的74军由衡宝公路前来解围。下旬张达的62军沿湘桂公路前来增援，夏威的46军也赶来参战。日军一边补充人员、军火，一边派飞机散发诱降传单，守军官兵将传单全部烧毁。表现了身陷孤城誓与衡阳共存亡的英雄气概。

8月1日，日军从安仁方面调来13师团一部，从长沙调来58师团及重炮部队，开始了第三次更大规模的总攻击。他们以飞机大炮向核心阵地和市区狂轰滥炸，4个半师团的日军从南北西三面猛攻核心阵地，战斗异常炽热。8月2日黎明前，日军如猛虎扑食般攻击虎形巢，被守军54师的一个团和预10师的搜索连、特务连击溃，迫敌抢尸收兵。是日晚日军以毒气开路，重兵夜袭接龙山主峰，守军中毒甚重，日军趁势攻入阵地，守军第3师的一个营和手枪排面贴防毒手帕，赶往接龙山增援，与冲入阵地的敌人猛烈搏杀，夺回阵地。并坚守6昼夜，毙杀日军68V币团第57旅团长志摩元吉以下官佐2000余人。中国守军牺牲也十分惨重。来自贵州边远山区的黎平县地青乡仁里村、时任46军新19师56团1营2连下士班长的33岁的黄松有，就是在8月5日血战中阵亡的。

8月7日，敌机和炮兵继续对核心阵地进行轰炸、扫射和毒气攻击。步兵则趁机锲入。守军靠空投粮草、弹药已相当困难，炮兵因无炮弹而改成步兵，经过47昼夜盛夏酷暑的激战，未得到休整的守军食物匮乏、营养不良、痢疾流行，医药奇缺，非战斗减员也十分严重，已没有堵截缺口的兵力了。日军探知演武坪是守军的薄弱点，于是集中力量进攻，守军的文书、军医、看护兵，以及留城的百姓都自动拿起武器，同入城的日军展开激烈巷战，第3师第9团团长鞠震寰壮烈牺牲，虎形巢、接龙山、小西门、五桂岭、回雁峰、岳屏山守

军亦伤亡惨重。阵地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赤地一片，情况万分紧急。守军官兵抱定一死报国的信念，准备作最后的拼杀。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亦向重庆国民党最高当局发出最后一份电报称："敌人今晨由北门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再无兵可资助堵击。职等誓以一死为报国家……。来生再见。"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亦回电："祝上帝保佑你们。"8月8日的拂晓，方先觉背叛了"军人守土有责"和"一死报国"的誓言，下令挑白旗投降，衡阳陷落。48天的"衡阳保卫战"悲怆结束。由于中国守军中下级官兵的浴血奋战、以死报国，以一万余颗头颅的血肉之躯给执行"一号作战"的日军以沉重的杀伤和阻滞。日军仅高中级将领死390人，战伤520人，士兵战死19000余人。"衡阳保卫战"是日军开始"一号作战"以来伤亡最重、耗时最久、遇到抵抗最坚决的一战。

衡阳失陷后，日军沿湘桂铁路向广西进犯，兵锋所指，中国军队无力抵抗，占桂林、夺柳州、陷南宁……在越南的日军第21军也派兵分路北上攻入中国境内，于12月10日与从南宁南下的日军第23军的部队在淥渌会师。至于此日军期望已久的大陆交通线全线打通，"一号作战"的计划全部实现。1944年4—12月短短8个月中，中国军队损失60万人，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的大部和贵州一部沦于敌手，丧失国土100多万平方公里。几千万同胞沦于日军铁蹄之下。146座中小城市、4个省会城市、衡阳、桂林、柳州、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36个飞机场为日军占领，大大削弱了中国军队的主动权。"衡阳保卫战"的失败是抗战以来最悲壮也是最耻辱的失败。

日军占领衡阳后，将掳获的千余百姓作为打扫战场的苦力。完工后将其关闭在银行内。用飞机投弹将其全部炸死。1945年当驻衡日军获悉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丧心病狂的日军竟将囚禁的500余名参加"衡阳保卫战"的抗日军民集体杀害在湘江岸边的战壕内……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后，当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时，当日本一些政要不顾我国的强烈抗议，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时，当日本在我国的国土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炫耀武力时，作为一个中国人，该作何感想呢？和平崛起是我们既定的方针，我们不需要战争，但我们也不能忘记60年前那场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的、妄图灭我中华种族的侵略战争。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忘却为守卫国土而洒出一腔热血的380万军魂（据资料记载：抗日战争中，中国国共两军共牺牲将士380余万人），更不能忘却整个抗日战争中惨死在日寇法西斯刀枪下的二千万中国同胞的冤魂！

（作者系怀化市公安局巡逻防爆支队队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





# 奇特的江永女书

田武登

在人类姹紫嫣红的文学百花园里，有一簇山野黄花，它带着清晨的露珠，带着泥土的清冷，羞涩地不敢登高雅的文学殿堂，却有着对太阳的执著追求，在巨石的重压之下曲曲折折地顽强生长，它就是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一带的劳动妇女用辛酸而真实的生活、用不屈不挠的精神、用纯朴自然的技巧，世世代代培育的江永女书。

江永女书没有奢侈的装饰，没有晦涩和朦胧，没有赘言闲笔，没有忸怩作态，以实实在在的纯朴展现自己特有的美感和艺术魅力，赢得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青睐和呵护。虽然江永女书还有"起源于何时"、"谁发明女字"等千古之谜；虽然女书伴主人而生、随主人而亡，留下前源难究、文献无求的遗憾，却丝毫掩饰不住"中华瑰宝、世界独绝"的美誉。

## 一、字型结构奇特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记录语言的文字会因语种、历史沿革而不同，女字也有不同于别的文字的特点，是一种由右向左略有倾斜的长菱形字体，右上角一般是全字的最高，左下角是全字最低位置；它的行款方向是由上至下，由右向左，没有标点符号；笔画主要由点（·）、斜（/）、弧（)）、圆（○）组成，线条纤细一致；笔势犀利，既有小篆体匀称的特点，又有甲骨文劲挺的姿态，字体细长秀丽，宛如一群风姿绰约的丽人，排列成行在宣纸上轻歌曼舞，给人娴雅灵秀之美。

别看它是娴雅娟秀的丽人，却"惊动"了中南海。1957年的一天，一位湘南妇女到了北京中南海，她的讲话值班人员听不懂，写出的字更让值班人员一头雾水，没横没竖，既不是英文法文，又不是维文藏文，莫非是"密电码"，值班人员不敢麻痹，将这位妇女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为弄清问题，先请来语言专家，又请来文字专家，专家们只说这种文字奇特，却搞不清是什么文字。1982年10月，中南民族学院讲师宫哲兵前往湖南江华调查南方民族问

题时，听说江水有一种只有女人使用的文字，并循着这一线索，找寻到江永县消江乡白水村和邻近的上江圩乡葛覃村，在高银仙、义年华等女书老人的配合下，收集整理女书资料，并将调查情况写成《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 年第三期上。这篇调查报告的发表，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专家学者纷至沓来，使紧锁深闺、濒临灭绝的文字——江永女书走出江永，走出湖南，走向世界。

## 二、传播方式奇特

新中国成立以前，女书流行地域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特别严重，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盛行，女人在家庭的地位极低，女孩在三岁时便裹脚，"三寸金莲"一般不参与农田耕作，而在家料理家务，纺纱织布、织花带、绣花纳鞋等，女书如花鸟图案一样被她们织、绣在衣服、被面、围裙甚至裹脚布等服饰之中。绣花纳鞋是手工细活，轻巧易带，因此近舍乃至邻村的妇女常常聚集在一起，边做女红边说笑。谁的女书写得好，谁绣花漂亮，谁精通女书，谁就成为大家敬慕、崇拜和结交的对象，于是女书在做女红中传播。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妇女们聚集一起做女红，为交流思想感情提供了方便，相处日久，情投意合者结拜姊妹。一结拜姊妹，关系就非常密切，只要有一个有喜事，其他人便把女书写在毛巾、扇子上充当礼物以示恭贺；遇到不幸，其他人也要写女书劝解、安慰。结交姊妹出嫁，江永有坐歌堂、哭嫁的习俗，其他姊妹要送女书安慰，新婚三天要送"三朝书"。这些贵重礼品送到男家，男方要将其展示，以展现新娘的聪慧能干和新娘家人的才华，于是女书成为了结拜姊妹的信物，互赠的女书成为了妇女之间最珍贵的纪念品。

江永宗教祭祖也为女书流行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江永县城西南有一座专供女性祭拜的花山庙，女书流行地的妇女经常有去那里祭拜婆王。她们祭祀前先将要祈求的内容（如美好愿望、消灾免祸、亲人重聚、早生儿女等）用女书写在纸、扇上，祭祀时边拜边唱，之后奉献在神龛前，不会女书者只有请会女书的代写，遇到别人代写不便时，只得逼着自己学女书。

还有每年的四月初八，是江永女书传播地区妇女独有的斗牛节，到了这一天，青少年子女和结拜姊妹、女性亲友就分别带上柴、米、油、盐、菜等，欢聚一起打平伙，女人们一边干活一边唱女书歌，并把各自的女书作品如三朝书、歌扇、刺绣、织带拿出来陈列展览，既相互观摩，又互相交流，斗牛节成为女书歌会、女书作品展览、观摩交流会。

淳朴的乡俗、独有的节日，使女书代代相传有了承载体，为女书传承和运用搭建了平台。





## 三、流传地域奇特

江永县原名永明县，位于湖南与广西交界之地，又处都庞、萌渚山脉夹缝之中，是长江、珠江两水系的分水处，隋代以前江永县的南北分属楚、越两族系，唐天宝年间建县治，隶属零陵。江永千家峒是瑶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原始居住地，千百万瑶民向往的圣地。零陵历史上曾是南蛮、莫瑶、民瑶活跃地区，《梁书·张瓒传》记载："零陵、衡阳等郡有莫瑶者，依山险而居，历政不宾服"。为镇压莫瑶蛮，朝廷派兵平定的同时，从山东、江西等地迁徙大量汉族移民来繁衍生息。千百年来民族的迁徙，汉瑶民族的融合，瑶民汉化，汉人瑶化，楚、越文化的交汇、碰撞，江永这种特殊地域、特殊的民族杂居环境、特殊的楚越文化合流，对生活在这一地域人群的语言文化风俗产生着特殊的影响。正是这一特殊影响，孕育了"男人可以上学堂用男字（汉字)，我们女人可以用女字的巾帼不让须眉的"君子女"，她们不但互称对方为富贵女以示女人尊贵，还竟敢在皇帝老子才能用的明黄色绸缎上按圣旨的式样绣女书，就是这些敢与皇权、男权挑战的女性，使江永女书流传至今。

据专家考证，虽然在邻近的道县和广西钟山县发现女书的存在，但女书的中心仍是江永，江永以外的发现只不过是江永中心的辐射和内在的亲缘关系所至。江永女书如同它的主人三寸金莲难出门户一样生在江永、长在江永、老在江永。江永女书虽然如此，可 1993 年发生在南京的一件事却让人震惊：民间收藏家冯京三在朝天宫古玩市场的地摊上收集到一枚"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女字的太平天国铜币。为什么湘南深山里的女书竟然出现在远隔千山万水的都城南京？为什么普通农妇使用的妇女文字出现在应该使用国家法定文字的货币上？是什么人铸造？为什么专门造这样的女性货币？解释只能是清咸丰二年，太平军攻占江永，众多江永妇女加入太平军女军行列，且在日后的征战中屡立战功，这枚雕母币便是掌握相当权力且精通女书的太平军女官特制的。作为女性货币，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枚，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枚，而且是最后一枚。

## 四、表达方式奇特

江永女书是一种女人专用的与方块汉字有着血缘关系的斜体表音文字，以自身特定的形体去表现当地土话的全部读音形式和含义。从收集的女书资料中分析出不同的字形近六百个，去掉同音异形或同形异音字，大约有五百来个常用字，用如此极少的字，江永妇女却能随心所欲地编出她们需要的各不相同的七言（少数五亩）歌谣诗。从进一步分析研究中还得知，这些歌谣表达方式、

语句顺序，用词等诸多方面都是当地妇女记忆里耳熟能详的，只要听了上句便可迅速道出下句内容，一首歌只要零星认识几个字就可理解全篇的文字符号。不识汉字的乡村妇女能够学会并能熟练地运用女书来创作自己的作品的奥秘就在这里，江永妇女高明之处也就在这里。

江永女书是江永上江圩一带妇女用独创的文字符号记载个人经历的文学作品，是结拜姊妹、亲友之间倾诉苦情、发泄哀怨、寄托情感、慰藉困苦、传递友情的工具，她们写自己、唱自己，除了亲友，对其他人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女书作品的寿命极短，从现时发现的情况看，最多传两代人。当地妇女迷信死后有灵魂，为能在阴间继续享用在阳间创作的女书，绝大多数女书被烧毁或陪葬埋入坟墓，人死书亡，如同一岁一枯荣的草本植物。

封建社会的妇女受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沉重压迫，她们受教育的权利、书写自己历史的权利、出版文学作品的权利、享受文化艺术的权利都被剥夺。而江永妇女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封建制度抗争、与妇女命运抗争，创造并顽强地掌握着自己的文字，写自己的历史、唱自己的歌，为自己赢得了诉苦的权利、说话的权利，怪不得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第一次听说女书时惊呼："这实在是中国人民伟大精神的表现……能不让人们，特别是我们男子汉们敬佩到五体投地吗？这难道不能够惊天地泣鬼神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妇女地位显著提升，以倾诉苦情为主要内容的江永女书已经失去其功能；女童和男孩一样享受九年义务教育，女书的社会交流功能已不可避免地为强大的汉字所逐渐代替；反右，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大量女书作品被当作四旧销毁，女书历史资料严重缺损；女书传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相继离世，人死书亡，女书已濒临绝境。可喜的是，当地党委政府重视女书的抢救和保护，改善女书传人的生活条件，保护女书传统的"原生态环境"，修建女书园，开辟女书学堂，把千年古字女书同千年古村上甘棠、瑶族发祥地千家峒作为"三千年文化"整体开发。我们有理由相信，奇特的江永女书的前景会更加光明，女书的生命将更加强旺，女书所昭示的人类文明将进一步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湖南省永州市政协）





# 靖港古镇的记忆

王晓利

弯弯沩水曲曲而来扑入湘江，而滔滔湘江沿着河岸一路北去，就这两条一大一小的河流将靖港"画"成一个三角形的洲，犹如一只巨形的船。靖港翘起船头，任湘江和沩水在船舷边日夜不停地流。这两条河流为这座古镇带来哗哗的浪响，还有它百年的繁华。

昔时，湘江上风帆正悬的桅杆如林，在靖港的麻石码头旁生长，从沩水而来的"乌航"数千只地密密挤靠着岸边，像一排排涌动着黑黝背脊的鲤鱼……

在河流商业文化繁华的年月里，畅通的水路繁华着靖港的商业，使它成为一座躁动的集镇。远溯靖港商业的历史，当河对岸的铜官窑火熊熊的唐代，这里已是具有坊市雏形的古镇了。

从芦江到沩港，靖港的历史就是从中国历史的大唐王朝源起。

《江陵县志》的"大事记"中载：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秋，唐河间王李孝恭，行军总管李靖从四川夔州出兵攻占江陵，萧铣降唐被斩于长安。江陵曾为萧铣的帝都。

萧铣何许人也？他为后梁宣帝曾孙，隋炀帝以外戚擢为罗川令，萧铣于大业十二年（617）起兵反隋，称梁王，曾拥兵40万，控制西至三峡，南达交广，北抵汉水范围。武德三年（620），唐高祖不断发兵讨铣。

李靖的军队从四川奉节浩浩荡荡出兵伐梁王萧铣，在攻克江陵前在湘江流域与萧铣的军队摆开了阵势。李靖的唐军开战之前，在铜官北数里举行了誓师大会。然后，西渡到芦江，保靖安民。于是铜官就有了誓港的地名，靖港也就取代了芦江的地名。

过去靖港，应该泛指靖港与乔口，因相邻的这两个古镇，均濒临大江，有着紧密的历史渊源与商缘。沩水汩汩而来，湘江长流北去，清末民初时，靖港已成为商业繁华的"小汉口"而热闹起来。此时镇上祠堂庙宇甚多，商会堂馆遍布，出现"朝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的盛况。

沩水、湘江两岸是土地肥沃的万顷良田，在湖湘大粮仓中的靖港自然凭借

其地理位置，便捷的水上交通，也就成为湖南四大谷米集散地之一。沩水上游的宁乡，在清末民初时期，外销的茶叶、猪鬃、湘绣、酒、禽蛋、稻谷、木材、楠竹等，就或放船或扎排运往靖港而中转。仅谷米，清末宁乡每年运销长沙、靖港等地的就达40多万石。那时，工商税费分为商税和行商税，设在靖港的税卡可没少收宁乡行商的税。可以说，宁乡人和沩水河繁荣着靖港的商业。

靖港历史上商业繁华的时期，应该在1920年至1930年十年间。这时，镇上的街巷中作坊店铺相接，各地老板在此办厂经商设店，雇用劳工，仅学徒就一时达2000多人。

靖港繁荣的商业，也使它的造船业十分发达起来。旧时靖港造船业称大木业，清同治十年（1871）钟鼎泰大木厂的创办，已使靖港造船业颇具规模。在建国前，镇上各沿河岸边就开有炳记钟鼎泰、长记钟鼎泰、谢万顺、任德顺、周兴盛、廖福泰、任兴顺、谈正泰、郭顺兴、梁福盛、侯正泰等29家大木厂，任万泰曾造出能载292吨的大盐船。靖港本地船主并不多，其码头停泊的船只大都为外埠船帮，所以镇上如此多的大木厂规模不大，主要以船家修船为主，而造船为辅。也就是说，靖港沿河水岸边摆开的近三十家大木厂，为泊靠在这里的船只提供着修理。靖港的造船业，其实称修船业更为准确。它的存在更加繁荣着靖港的水运业，并提供着强有力的后勤服务保障，这就是它生存的合理性。

靖港是座人气极旺的消费古镇，商业发达，门类繁多。在其繁荣的清末民初期间，镇上“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商业店铺相连着，曾有粮行、粮栈、米号20余家。银匠铺、铜器铺里整日叮叮当当响着热闹。靖港涂太和铜铺最早开业于清嘉庆十年（1805），可在街面上红红火火地兴盛百多年。民国14年（1925）浙帮商人陈德载、林渔签、杨树堂、陈春生合伙开办的兴记米厂，为此行始用机械，也就成了米业中的首户。热闹的靖港镇上，从饭庄到妓院一应俱全。所以说靖港的美称“小汉口”，绝不是浪得虚名。清末和民国时期，商业相对发达的靖港镇就曾有10多个窑班和堂班（妓院），娼妓有时多达30至40人。在地方并不大的镇上，此行算是红火的一行生意了。除妓院外，旧社会在靖港镇上茶楼、旅店里还设有赌场，《望城县志》载：靖港一刘姓财主，因赌博输掉一栋房子、一间店铺、1 000多块光洋、300多石水田。除嫖赌外，便是“毒”了。清末民国期间，靖港镇上就开有烟馆，群众称之为“国民党手里有钱吸死，无钱关死，他们禁烟是进钱。”充满着对国民党政府禁止鸦片之法的讥讽。

靖港为县境内最早成立商会的集镇，于1920年始建商会，民国22年，就





已有绸布业、百货业、熟食业、烟酒业、屠宰业、木业等公会。在望城县文化局的朋友引领下，我在靖港老街上的木板木柱结构成的有着楼上楼下的窨子屋里，就寻着到了当年妓院里的“包厢”。这种“包厢”由木板在窨子屋二楼隔断成一排数间的单间房，是来妓院寻欢作乐的嫖客的“消魂”处，也是妓院最大的“自动投币机”。

站立早已破旧的窨子屋的天井，斜如刀光劈进来的阳光，使我仿佛清楚地看到靖港镇上往日的那种“娼荣”，已如这座废弃的大屋，高大倒下的坍塌声早已响起，其背影也早已消失在老街的尽头。

浪荡在江湖的船夫排客，在旧时喜欢湾在水边集镇街市分开长腿一半水中，一半岸上的吊脚楼下，因为楼上或许是妓院或许是旧相好的所住。然而，能进入靖港街上建筑如此气派的妓院寻欢的男人，想必不是客商便是有钱人家的公子。腰包里没有成把的银元，是进得门而出不了门的。这座红楼里的女人们的姿色应该不错，妓院老板的“摇钱树”，历来亮眼而魅力十足。

离开那栋陈旧的窑子屋时，我也总觉得从那屋里飘出一阵阵浪笑和一片舞动红手帕的影子在身后飘来飘去。连忙风也似地离了那老屋。

靖港镇上商业繁荣，手工业亦发达。民国19年，靖港镇上有手工业200户，与津市、洪江同列省内三大繁华集镇之一。街市因作坊而形成，也就有了“坊市之说”。在靖港的各种手工作坊中，在很长一段历史里，它的制鞋业最为闻名。

1927年，曹寿林在靖港开设“曹宏泰木屐店”，因生意兴隆，销路甚广而成为这一行业中的龙头老大。其实，在曹寿林开店之前，靖港制作布鞋、木屐的作坊及湘绣等手工业就已形成并发达。继曹寿林之后，谢先桃等5人在半边街又合伙开设了专制手工布鞋的“新美丽鞋店”，一时间制鞋业成为靖港这个小地方在长沙、岳阳等地享有声誉的大产业。建国后，靖港制木屐、制皮鞋、制布鞋的就有前店后坊的制鞋店铺数十家在维持。“靖港的木屐、湘潭的伞、桃花江的女子过得拣。”可想而知，靖港制鞋业的名声至此时仍不衰。

“文革”期间和之后十余年，望城县制鞋厂所生产的注塑布鞋使靖港成为全省布鞋生产的一大基地。“望江楼”布鞋成为一种时尚消费。20世纪70年代末，曾流传一个笑话。长沙人托去北京出差的朋友，带双北京布鞋回来。朋友带回来的北京布鞋，却原来是产于靖港的“望江楼”布鞋。确实，此时靖港生产的塑底布面鞋，可与上海“长征”牌，北京“红叶”牌的同类产品媲美。

兴衰是一种轮回？脚踏今日寂静的靖港镇，四处弥漫的是一种悠闲。这种悠闲，不会被现代化企业的隆隆机声所搅乱。街上的老人在断续聊着的话题都是对过去的回忆。靖港古镇上的繁华，确实如风，已贴着古街光滑的麻石滑落

到了江水里，随浪远去。

寂静是小镇的风景。

古老而又凉如水……

靖港成为一座繁华的水码头，自然为船业提供绳索的棕麻业作坊也就兴旺起来。

江西商人在湖南的商业集镇街市的竞争中，风一样，无孔不入。清光绪十四年（1888），来自江西的洪新吾、洪典吾兄弟就瞄准了靖港这座发财兴业的良港，而从事棕麻制品生产与经营。洪氏兄弟收有众多徒弟，而徒弟们学到本事后，也就分别自立门户，于是靖港的棕麻业也就兴旺起来。此业的兴旺，也如同船业一样，主要源于靖港停靠的船只甚多，而棕麻绳索又是船业必需品，加之农用的箩索、挑索、棕棚索、扎绳、蓑衣、日用的棕扫把等有广阔市场，使生产条件简陋的棕麻绳索加工也便红火起来。

作为传统作坊的靖港棕麻绳索加工，如同其他传统加工坊一样，一遇上工业化的冲击，很快便退出市场，成为老人们的一种怀旧的情结。对这一行，尼龙绳的出现是最大的冲击，尤其是来自沿海地区尼龙绳加工企业，最终导致靖港百年历史的棕麻绳索加工业的消亡。

依仗着地处沩水、湘江及入洞庭之南水利之便，靖港这处天然良港，也就船帆云集，商贾际会了。从靖港镇的街名，我可遥想起其当年的繁华景象。

在靖港古镇巷街的麻石路两侧，尽是前店后坊的酒坊、酱食店、饴糖铺。饴糖铺的老板身穿黑亮的香云纱，梳着流油的巴巴头，一边挥着大蒲扇，一边吆喝着："卖扯麻糖，笔杆糖，姜糖，花生糖……"而临河街面上的染坊里忙着染踩后，将一匹匹靛蓝布在屋后晾成一道道天幕。弹棉花的弓鸣、穿梭的织机响，木屐店里锤子响……可说让整个不大的靖港镇白天黑夜地充满着活力。

当铺巷子不算靖港镇上的热闹街面，但这里的生意却历来红火。许多当铺都密集于此，清宣统二年（1910），就有乡绅合伙在这里开设三家无帖经营的小当铺，受当金银、首饰、衣服，及铜锡器等。民国初由官绅独资或合办开设的钱庄也设在这里，使这条不起眼的街成为靖港镇上办理存款、放款、汇兑、现贴、印花票币和兼营其他方面的"金融一条街"。抗战时期"长沙大火"后，这里的钱庄因战乱而倒闭关门，抗战胜利后又有复苏。在法币、金圆券流行的通货膨胀下，当铺、钱庄老板仅从事金银买卖和放高利贷。建国后，这里的当铺、钱庄不复存在，但这条街巷的历史仍在，就是它有着至今仍在的"当铺巷子"的巷名。

靖港商人们通过商业敛财而富有，但哪个商人又说自家不善呢？早在清光绪元年（1875）这里的商人就在紫云宫大庙后的沙围子堤下创立了从善育婴





堂。其前身因为由从善堂、育婴堂合二为一，也就取了这样一个"堂名"。

从善育婴堂的创办到停办，经历了70多年，确实不易。在开办其间，主要仰仗当地大户徐氏与官、商、乡绅良好的关系，才得以维持。

徐氏是靖港本地的名门望族。徐仑在清代曾为官候选盐提举。光绪初年，徐仑邀户部主事袁锡龄出面，上书创办靖港的慈善事业，得到从靖港淮盐交易中每年千两的定额经费。有钱好办事，在湖南巡抚卞宝弟的支持下，徐仑将卞宝弟所题"诚求保安"巨匾高悬起，便开办起了靖港从善育婴堂，开始了慈善事业。

1930年，全国通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可是靖港从善育婴堂通过各种关系，仍从淮盐交易中获取了经费。

徐仑从创办靖港从善育婴堂以来，的确在育婴、施棺、救火、惜字、点痘等，作了造福一方的善事。当然，这一切源于靖港各商户历年来不断的捐输。"无商不奸"，似乎在此又有另解新释。

在靖港营生的商户最高峰时曾达2000户，所经营的如上述的以外，还有着竹木器、纸伞等，可说凡涉及生活日用及农事、渔业、船运的各种手工业，在这里均有店铺与丰足的货源。

盐在历史上曾是湖南最紧俏的生活必需品，也为朝廷仅限官营的物质。靖港却曾为省内淮盐主要经销的口岸之一，这无疑为它的商业繁荣贯注了底气。

从清末民初以来，往来于沩水、湘江的宁乡"乌舡"船就有3000多艘，平日停泊靖港的船只不下千艘。这样，就使靖港因人气而团聚着财气。

靖港是沩水流入湘江、上长沙下洞庭的扼口。自清咸丰五年（1855）五月，靖港作为通商口岸就设关收取盐、竹木等厘金及各种杂捐杂税。由此以来，宁乡由沩水而入湘江的商船是很难避过靖港厘金局的盘剥的。在这个时期，靖港厘金局虽辖靖港、乔口、新康、湘阴4个分卡，但由于苛捐杂税繁多，其所属湘阴厘卡，曾受到湘阴商会会长澧荫生组织商民的捣毁。宁乡的商民智慧甚多，他们曾在靖港建有势力强大的宁乡会馆，宁乡船帮在靖港设立起八元堂，管理沩水航运事宜。更为重要的是宁乡人的官或商在长沙府或省巡抚衙门里都有自己人，也就极大地保护了宁乡商人的利益。

靖港的繁华随水运而兴，而随陆运的兴起而衰落，这也是一种无法把握住的命运。历史曾给予了靖港无数次机遇。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鄂湘善后轮船局首航湘潭至汉口的客班船，靖港就是停靠港。1914年，长沙、靖港、湘阴三埠商贾组成的长一湘汽船公司，靖港是必停靠港。1918年成立长沙县警察所时，现望城县境内仅靖港设立了警察所。此时，靖港的人口、商业、水运秩序，毫无疑问，是必须设立独立警察分所来维护的。

走进靖港，人们顿时会被其古老的街巷及建筑所吸引，感到这是一种厚重历史的沉积。然而，穿过它条条冷静的街巷，也会发现这座古镇的繁华已远离，被历史尘封严实而冷清。我们从光滑的麻石路面、斑驳的老墙，从那靖港古镇深藏在它泥土深处的记忆，才知道古镇的繁华早已远留在上个世纪，时间的那一头。

离开靖港老远的路程，当古镇在我的回望中成一团隐约黑影时，堤岸下湘江不断的江涛用拍浪声仍在说着古镇的往事……





# 千年古庙

## ——陶公庙今昔

周　敏

陶公庙位于长沙县榘梨镇临湘山，距湖南省长沙市城东北 5 公里。临湘山为浏阳诸山蜿蜒而来的余脉，海拔仅 41.4 米。陶公庙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为榘梨人祭祀陶淡、陶烜叔侄所建，另外配祀着一位杜公真人。根据《长沙市志》载："道教传入长沙的确切年月，无从考稽，东晋陶淡（长沙郡公陶侃之孙）自幼好道，求养生之术，与其侄陶烜弃家结庐，修炼于临湘山，南朝梁大监四年（505），士民始建祠祀之，称陶公真人庙，又名陶公庙，为长沙有道庙之始。"

陶淡字处静，一字炎芝，江西鄱阳人。生于晋武帝太康九年（288）八月十七日。为晋太桓公陶侃之孙。陶侃曾任晋代大司马长沙郡公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陶淡自幼好道，求养生之术，识天文，通医术，初构杉庵于岳麓，复避州举秀才于罗县（今湘阴）埠山，后与其侄陶烜弃家结庐隐居临湘山。陶烜字太仁，生于晋愍帝建兴四年癸酉（313）正月十三日，与陶渊明为从兄弟。精医术，习天文。陶烜随叔父陶淡隐迹临湘山修道辟谷，炼形凝气。据说梁天监三年甲申（504）陶淡叔侄同时登真，肉身不朽，遗蜕如生。乡民惊为异事，又感其厚德，由是讴思景仰，结布仙躯，立庙以祀。黄杰《临湘山．序》云："庙祀二肉身。乃真人叔侄之遗蜕。自晋至今千八百年矣。其遗蜕久存不坏。显灵于群生之愿，大而旱干水溢，小至个人疾苦，有祷辄验，其惠泽滂沛于民，声名洋溢于避迹。"乡民塑筑庙祠祀之，搭台演戏酬神之灵。千余年来，陶公庙香火鼎盛不衰，堪称"山中宰相，陆地神仙"处所。杜公真人传说系襄阳人，名济云，道号云隐。为陶淡之道友，但不见经传。清咸丰二年封陶淡为"孚佑真人"，陶烜为"福祐真人"，杜公为"参化真人"。整个陶公庙是由山门、戏台、石极、正殿和偏殿组成。占地 10.72 亩，建筑面积 1851.74 平方米。

## 一、山门

山门全宽 36 米，分左、中、左三门。“临湘山”三字门额．竖刊于中门上方，门联为“山中宰相；陆地神仙。”右门门额“紫府”，门联为“立德不朽；有仙则名。”左门门额“丹丘”，门联为“六朝遗庙；千古名山。”山门两侧成直角延伸成围墙，左侧门署“康衢”，门联为“鸦林滴翠；狮岭流丹。”右侧川署“道岸”，门联为“竹林春露；榔水波深。”

山门左清道光年间重修戏台以前，位置比现在靠后，紧挨后台，因此山门与戏台之间设有过道和天井。山门前是几间店铺，几乎看不到山门全貌。道光二十六年（1846）重修戏台时由庆福堂花费 360 两银子买下三间铺门，将地基作山门内到后台齐照壁的基址。才成为现在的规模。1983 年由市政府投款曾进行重修。

## 二、戏楼

陶公庙戏台是江南一带保护最完好的古戏台，是建筑史上的辉煌，系砖木混合结构。前台由八根石柱支撑，楼袱下用两根杉木大梁横挑，后台用两根圆柱和六根木柱支撑直达楼顶，中间用石柱顶撑，使整个戏台非常坚固踏实。另用石柱两根由地面到台面，再接木柱到顶。

戏台全高 14.6 米，檐高 7 米，台高 2 米，建筑面积 319.55 平方米。屋面以正脊为界。前部分盖黄色琉璃瓦，后部分盖大青瓦接琉璃瓦，正脊用陶瓷空心径脊，中间竖置琉璃龙宝顶，两侧用龙头吻，各插兵书宝剑收尾。下嵌陶瓷《古城会》浮雕砌块。戏楼正面，前后两重攀撑爪角对称，直指苍穹，庄重雄伟。爪角夹角前用飞龙，后用舞凤填充，各悬檐马。每当清风徐来，叮当作响，仿佛剑阁闻铃，置身世外令人遐想。

舞台左右马门，分悬“来云”、“去雁”扇形门额。中间四扇镂花隔门分隔前后台。隔门上部刻《梨江八景》诗，下部配以浮雕图画。楼顶为弓形卷棚吊顶，中嵌信角彩绘蟠龙藻井。

这座戏楼原额为“大观”。1932 年重建时改辑翁同和手迹的古楼，而将“大观”匾移置“古楼”匾的背面。马门上方正中悬”金石谐和”为当代著名书法家史穆先生补书。

戏楼前后门柱均悬黑底金字对联，台口联“世事何须认真，境过追维成梦幻；人生莫以为戏，眼前法戒当箴规。”正柱联为“邪正忠奸，眼前轩舞皆身鉴；疾徐高下，曲中清婉拔元音。”马门联为“子弟阅六朝，依旧唐宫歌舞；神仙独千古，长留晋代衣冠。”侧门联为“楼阁重新，五千年治乱兴衰，昭于





众目；竹林高会，亿万载声灵赫耀，光被群生。”戏台外柱是柳煌撰写的一副对联：“四百八十寺，皆付劫灰，山水传奇缘，尚留得西晋衣冠，隐逸神仙堪合传；三万六千场，无非戏局，春秋多佳日，戏演出历朝人物，忠奸贤佞看分明。”后台联为“凡事莫当前，看戏何如听戏好；为人须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整个戏台设计精湛，质量上乘，虽经历了 60 多年的风雨，基本结构依然完好无损，像这样金碧辉煌，精致典雅，又几经沧桑能够幸存下来的古典戏楼，在全国范围很少见的。此前，先后有省建六公司、国防科大土木系为抢救这一珍贵的建筑资料，曾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测绘和拍照

## 三、石级

戏台与石级之间，长 21.4 米，宽 34.2 米的戏场坪，坪内左右原有古樟一棵，楠树一棵，夏日浓荫覆地，春季白鹭栖飞，树龄均已数百年，可惜现在只剩河边一棵古樟，也已腹空千裂，老态龙钟了。

石级从殿坪到大殿门口共 48 级。两侧有石栏围绕的平台，其格局宛如北京故宫三大殿前的丹陛，曲槛回廊，调和庄重。石级最初修建于道光九年(1829)，距今已 170 年。这 48 级台阶和相应的平台、石栏，把陶公庙衬托演染得巍峨壮丽，人们到此拾级而上，就会油然而生高山仰止的心情。

## 四、大殿

大殿内长 27.85 米，宽 11.7 米，左右厢殿各宽 4.6 米，从地面到大梁高 10 米，建筑面积 997.63 平方米。殿前阶檐由四根边长 39 厘米的石柱支撑，使大殿更加雄伟。大殿前左边石柱对联为“福地驻灵踪，庇佑梓桑，千古胜地华表鹤；清风被人世，发扬神智，三高真似石湖仙。”是 1997 年由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道长书。右边对联为“本山泽之曜成仙，更难弯鹤排云，伊然穆之三根清，根夫一气；有功德于民则祀，不等丝纶贲野，久矣芸芸万姓，代岩二天。”大殿中门联为：“化鹤三生，迹显萧梁茆港外；驂鸾再见，灵昭湘楚竹林间。”大殿外左右墙角联为：“种宜男卅三年，苦海弥漫，曾历几番魔劫，幸菩提树发，欢喜园开，蔚然小草滋生，稽首望慈云庇护；看长沙千万户，翘轩辐辏，都拈一瓣心香，羡鹿洞风清，鹤羽日丽，从此旃坛拜蒸艺，终生愿佛座皈依。”正殿前柱联为“舍功名富贵而来，踏破红尘，高风远启山中烟；历唐宋元明不朽，是何丹诀，奇踪上轶竹林贤。”正殿中柱联“鹤鹿竞相依，仰晋代风流，处处烟波新岁月；须眉今宛在，看临湘山色，年年花草旧精神”。

正殿左边为财神殿，供奉道教文财神比干，右边为药王孙思邈，后殿为道教信奉的最高天神——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即

太上老君是也，乃道教教主。

### 五、侧殿

侧殿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宽11.3米，长22.3米，也是中接罩亭，由12根33厘米直径木柱支撑，格局和正殿相似。供奉慈航真人、送子娘娘、滴水观音。前殿供奉道教武财神关圣帝君，左为关平、右为周仓。丹池前供奉道教的护法神——王善天君。

陶公庙的整个建筑，无论屋脊、爪角、照壁、墙头、照梁、吊檐、踢脚、栏杆、藻井、门窗等都恰到好处地运用堆塑、雕刻、彩绘等多种艺术手法加以装饰，包括飞禽走兽、花草虫鱼、戏剧舞蹈、古典图案、风景壁画，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举。只可惜在十年浩劫中，均被作为“四旧”而毁于一旦。原有的许多匾额大都出自名家手笔，都被当作炼钢燃料烧毁，陶公肉身也在那时遇难。

打倒“四人帮”后，几经各方呼吁，陶公庙才于1988年列为长沙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交由文管部门管理，还拨款修复了戏台和山门。

1990年7月，经协商始同意道教租住，进行宗教活动。当年8月，重塑陶公神像，于10月1日开光。1994年8月，由县政府协调，始将陶公庙正式交由道教管理。随即开始大规模全方位彻底的修复工程，历时8年，耗资400多万，大殿和侧殿均已基本竣工，其余配套扫尾工程指日可待。199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陶公庙列为省级文化物保护单位。展现在人民面前的是一座闹中有静，殿堂金碧辉煌，神像庄严凝重，壁画赏心悦目，经声悠扬入耳，浑若天然仙府的胜境。现每年接待香客和游人约6.7万人次。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随着国家政府部门对宗教的重视，各级政府领导的支持，旅游事业的发展，我们心有蓝图，手有规划，相信不久的将来，一个规模更完善的人文景点一定会使人们更加流连忘返。





# 黄鹤将军访谈录

戴铁珊

8月，正是湖南骄阳似火的季节。一天，我去文史研究馆办点事，见几位工作人员聚集在办公室里正准备到哪里去，我好奇地问：“你们到哪儿去啊？”业务处赵处长笑着说：“到湘江宾馆去看望参事黄鹤老先生，他白内障开刀刚出院，做了5年多盲人，现在又复明了，百岁老人重见光明，难得啊！”我一听，好奇心更强了，便说：“同你们一道去吧，我还是10年前在汨罗屈原农场他家里采访过他的。”

湘江宾馆距文史馆不远，10多分钟便走到了。在6楼一间客房里见到了他。他正安详地坐在一张沙发上闭目养神。70多岁的儿子老远就朝他喊道：“爸爸，文史馆的同志看望你来了！”他欣喜地睁开眼一边说：“哎呀，不敢当！”一边准备站起来迎接。工作人员小曾连忙上前扶住他的肩膀说：“您坐吧。”

——握手之后，黄鹤的头一句话便是：“感谢共产党，感谢参事室、文史馆的同志，使我这个百岁盲人又重见光明了！”他说：“五年前，我的双眼忽然视物模糊，渐渐地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变成了一个瞎子，当时内心有过苦恼，主要是生活上不方便，过一段日子也就坦然了。看不成电视就听电视，听收音机，自拉自唱京戏，自得其乐。”说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左眼，高兴地说：“我这只眼睛视力已恢复到0.2，还在继续恢复，现在可以在几尺之外辨认对方面孔了。”黄老的另一只眼睛没有治疗，问他为什么不治，他说：“我105岁了，还能活多久？有一只眼睛能见人见物就可以了，何必多浪费国家的钱。”话说得很平淡，份量却是掷地有声，令人深深感受到这位百岁老人的赤子之心！合影之后，我怀着敬佩的心情试探地问道：“黄老，现在国内黄埔一期的学生还有多少，您知道吗？”他不无自豪地用手拍拍胸膛，然后用手指朝上一举，甩出一句英文：“only one!”（唯一的），我笑了，他笑了，大家都笑了，室内洋溢着一派欢快、轻松的气氛。

谈兴愈来愈浓，话题一个接一个。我问：“10年前，我曾到您家采访过

‘南京哭陵’的事，还记得吗？”他侧过脸凝视了我一阵，然后点点头，伸出手搭在我手背上笑着说：“记得，记得。”一谈到“南京哭陵”往事，他的眼睛仿佛更明亮了。当年（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央军官训练团将官班（被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退役将官）认为抗战刚胜利，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现在又面临内战，因此一致强烈反对。此时，黄老主张：“我们何不到中山陵哭陵去，以一纸祭文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昭告天下呢！”大家异口同声赞成，当即推举曾任商震部队政治部中将主任的黄鹤将军为总指挥。经过精密策划，1947年5月5日那天，他率领400多名将官向中山陵进发。他带着60多名年轻一点的将官腰挎手枪走在队伍前面。在陵墓前鸣放鞭炮，大家鞠躬默哀，由黄老宣读祭文：“列强未倒，军阀未除，内战再起，国将不国。鸟尽弓藏，其心何忍……”接着两位将官遗孀哭诉丈夫冤死，生活无着的悲惨遭遇。100多名中外记者和数百名观众目睹此情此景也无不为之动容。依次环绕陵墓时，有的竟长跪迟迟不肯离去。第二天，南京哭陵事件便在国内外一些报纸上以醒目的标题披露。蒋介石大为震怒，派陈诚前往将官班训话。黄老有意识地站在第一排中间靠近讲台的地方，一边听训一边握紧藏在身上的手枪，准备在陈诚下令逮捕他时立即把陈诚干掉。大概陈诚也察觉到会场气氛不对，由开始时的声色俱厉逐渐转向缓和。黄老在回忆这段史实时还情不自禁地做着准备拔枪的动作，引得室内又一阵笑声。

拜访黄鹤将军时，《百岁秘诀》一书的作者李华献同志也在座。他最感兴趣的当然是黄老的长寿之术。他提起这一话题时，黄老莞尔一笑，说道：“我年轻时喜欢吃红烧肉，一天吃10斤肉，连续吃了30年，一餐吃10斤肉，吃过3次，所以我体力好，70多岁还能双手提两大桶水上阶梯。80多岁了，每天到菜园除草、培土、浇水，从不懈怠；天天打太极拳，从不间断；再就是我性格开朗，从不愁眉苦脸；我老伴90多岁了，几十年来相濡以沫，从不吵架；天天读书看报，从不偷懒。”这5个“从不”大概就是黄老延年益寿秘诀所在吧。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黄老很健谈、思路清晰敏捷，记忆力更令人羡慕，10年前他写作的田园诗仍能背诵如流。满口道地的汨罗家乡话听起来格外亲切。但是我们不想多打扰他的休息。告辞前，《长寿秘诀》作者请他为该书再版题词，他提起笔来挥洒自如地写了四个大字：“快乐长寿。”笔力苍劲，颇见书法根底。我从心里赞叹：黄老真不愧是一位儒将！百岁老人重见光明，他又可以投入到晚年灿烂的霞光中了！

（作者系本馆馆员）





# 汪炳璈联艺管窥

胡静怡

汪炳璈，字仙谱，湖南宁乡沩乌乡人。清道光举人。由胡林翼等举荐补授保定知府，后调贵州，咸丰、同治年间，历任贵阳、遵义、安顺、铜仁、镇远、大定诸府知府，沉浮于黔滇宦海凡十三载，足迹遍于黔中。工诗善画，尤精联语，雅爱题咏，所到之处，每留佳构，有“风流太守”之誉。流传最广之作当数贵阳名胜甲秀楼浮玉桥上涵碧亭联：

水从碧玉环中出；人在青莲瓣里行。

涵碧亭位于浮玉桥头，澄碧之南明河水自桥下穿过。浮玉桥原有九孔，由白石砌成，今仅剩七孔。桥孔之半圆拱洞与澄波倒映成像之半圆拱洞吻合，恰成七个碧色玉环，河水便从中淙淙流出。举头四望，环绕甲秀楼周围的是一片群山，层峦叠翠，青葱欲滴，宛如一朵青黛之莲花。人行其间，俨然置身于青莲瓣里。

由斯联可知，汪氏之作，以描写逼真见长。《容斋随笔》云：“江山登临之美，泉石赏玩之胜，世间佳境也，观者必曰如画。故有‘江山如画’，‘天开图画即江山’，‘人在画图中’之语。”江山固然如画，然需丹青妙手写之，方见逼真，方显神韵。胸无丘壑者，欲达此境界殊难。汪氏之撰联，注重意象之营造，借重比拟之手法，刻画典型形象，乃其第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同样体现在题镇远祝圣桥上状元楼联中：

人上翠微梯，蓬岛春阴天尺五；
客来书画舫，桃花流水月初三。

其景之宁谧清幽，其联之空灵雅致，美不胜收，令人叹绝。

传说纯阳真人当年来至㵲阳河畔，见该处青山隐隐，碧水潺潺，不禁留连忘返。沉吟有顷，便由袖内抽出羊毫信手书之：

西来㵲水云山，野渡舟横，两岸晓烟饶画意。

然而，吕洞宾一时续不出下联，只好长叹一声，怅怅腾云而去。吕纯阳所遗半联，历经千载，无人敢续。汪氏一到，随即续之：

东面蜃楼海市，洞庭月落，五溪夜雨沁诗魂。

纵观全联，画意诗情，超凡脱俗，令人读后，顿生出尘之念。至今镇远青龙洞仍有祭祀纯阳真人的吕祖殿在，大概便是这段风流趣事编造者之所本吧。

诗联家不是摄影家，不可专注于造化之奇，风物之美，而应立足于情。王夫之《姜斋诗话》云："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人情物理，可哀而可乐，用之无穷，流而不滞，穷且滞者不知尔。"汪氏撰联，确如《诗品》所言："超以象外，得以环中。"故一题在手，妙趣横生，情景交融，百读不厌。此即汪氏联作特色之二也。

题甲秀楼翠微阁联：

半面江楼，半面山楼，书画舫容我掀髯大笑，邀几个赤松、黄石、白猿，来一评今古；

数声樵笛，数声渔笛，翠微阁尽他拍手高歌，听不真明月、清风、绿水，引万象空濛。

诗中有画，景里融情，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题伏波庙一联尤其大气盘旋，有声有色：

到岸猛回头，听㵲阳第一滩声，浪与篙争，好仗神威资利济；

顺流须努力，看黔国万重山水，风随舵转，全凭忠信涉江湖。

黔国多山，素有"地无三尺平"之说，故贵州江流滩多水急，㵲阳河亦然。其最险之滩曰大王滩，在镇远境内。滩南岸山麓建有伏波庙，供奉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塑像。马援一生，追随汉光武帝刘秀，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曾以男儿当"死于边野"、"马革裹尸"自誓，诛王莽，定乾坤，破隗嚣，肃陇右，征匈奴，伐乌桓，平交趾，出五溪，战功赫赫。年届六二，仍请命南征。汉光武曾当众夸赞曰："矍铄哉，是翁也！"终于征伐五溪途中，染疫卒于军。其勇毅赤忱素为后世景仰。汪氏此联，即表达了对这位古代英雄由衷的敬佩。笔之所至，豪情满怀，明曰过滩，实言涉世，不愧为大家手笔！

风流倜傥，豪放飘逸的性格，决定了汪氏笔下之作。"联中有我，景内含情"，即使是闲暇笔墨，也流露出无穷的雅趣与情韵。其题镇远青龙洞吕祖殿客堂联，尤为潇洒，妙趣横生：





瓮里天，洞中仙，谁造这石头，未曾混沌先开窍？

马蹄云，帆脚雨，我笑那溪水，一出江湖不问津！

汪氏为官清正，关心人民疾苦，贵州各地府志均记录在案。出任黔疆时，便立定为当地作出一番政绩之抱负，为政躬勤，甚有口碑。这种"做好官"的思想也时不时地反映在他的联作之中。题贵阳湖南会馆联曰：

客馆当江舟，推窗共话潇湘月；

蛮疆望霖雨，出岫皆为岳麓云。

寄望湘籍同乡与自己同为出岫之云，为贵州百姓带来甘霖泽雨，这愿望无疑是善莫大焉。"蛮疆"一词虽是贬称，但处在当时的历史时代，我们也毋庸苛责吧？作为封建官员之汪氏，其"民本"观念当然不比现今的公务员们强烈，但从小受到孔孟思想之陶冶，"不做贪官做好官"的想法亦已根深蒂固。白居易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联又何尝不如此？故反映民众意愿，表达百姓心声，便成为汪氏联作之又一特色。

题遵义萧曹祠联：

关内始休兵，总看民庶凋残，灰里图书今尚在；

府中本无事，喜听吏员萧鼓，座间醇酒我先尝。

汪氏任职贵州，正值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且不论汪氏对这一场战事之态度如何，但"民庶凋残"却是铁定的事实。汪氏既是题萧曹祠，便免不了用萧何、曹参之典，方显贴切。然而，汪氏未用"萧规曹随"之典，却用了秦始皇焚书后，人们修建曲阜孔庙发现柱藏先秦遗简，由萧曹搜集整理之故事。能如此匠心独运，借此素材，以谴责致使民庶凋残、文化荒芜之战争，表达渴望太平，令人民安居乐业之愿望，实属难能可贵。

汪氏悯农重农之思想，在题安顺先农坛一联中表露得十分突出：

万世之利在犁锄，务使勿忘先哲；

百姓莫艰于稼穑，知此便是好官。

作为一位封建农业大国的地方官，关注农业的兴衰，农民的丰歉乃其本分，用不着大加褒奖，但为官者万千，"好官"却为数寥寥，个中缘由不得不引人深思。汪氏"好官"的标准是"百姓莫艰于稼穑"，这与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应是一脉相承吧。所谓"不艰于稼穑"，便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要轻赋税，免徭役，绝不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倘能如此，则以足够矣！

汪氏楹联特色之四，使笔如舌，了无拘束。汪氏撰联，不拘一格，随兴挥洒，便是佳章。其律句联，虽谨遵格律，但绝少为同一定式，由上述诸例一览便知。该简则简，该繁则繁，以内容决定形式，随心而变，笔舞墨歌，步入佳境。其散文句法联，尤为洒脱自如，放得开，收得拢，随心所欲。题镇远府署花厅联即其杰构：

吾辈有推不脱事业。天地是撑起的，世界是造成的，莫道苦辛勤，到底辛勤还是好；

人生无带过来福禄。心思怕用得它？手足怕动得它？谁不想安逸，眼前安逸恐非宜。

试想，汪氏距今一个半世纪，早于“五四”运动五六十年，其白话文熟练之程度较之“五四”时期之文坛主将们亦不逊色吧。其联不仅遣词造句如同现代风格，思想内涵与哲理蕴藉又何尝不给今人以启迪？

汪氏白话联还具幽默诙谐的一面。读其题镇远城隍庙联便见端倪：

讼事始刁唆，仁者一言阴德大；
良心终发现，世间还是好人多。

是城隍口吻，亦百姓心声，可博读者会心一笑。

汪氏律句联，格律严谨，对仗工稳而机巧。上述诸多实例，足为明证。其题镇远状元楼另一联，尤见功力。联云：

扫尽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去；
辟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

上联借汉武帝遣中郎将唐蒙出使夜郎典故；下联借用缅甸贡大象朝帝京史实，盛赞名城镇远当年这边陲锁钥之雄，概言了镇远府之地理位置与历史作用之重要。笔锋雄健，镕铸古今，大气盘旋，意象飚动。联中，“五溪”系雄溪、樠溪、清溪、酉溪、辰溪之总称，流经地域乃今之湘西、黔东、渝南、鄂西一带，古属武陵郡。古代中原至滇黔，须越洞庭，沿五溪西行。李白曾有“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之句，可资佐证。浮槎乃古代传说中来往于海上与天河之间的木筏。《博物志》卷三：“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此处“撑斗去”应指浮槎撑往斗牛之间。古代中原至夜郎，镇远㵲阳河（即㵲溪）上之祝圣桥为必经之路。缅人往长安，亦必经此东行，越万水千山，过重重驿道，故云“重驿”。

汪氏之白话联，格律虽不如律句联严谨，但整体观之，其节奏点是大都注意异句平仄相对，同句平仄交错。如上述镇远府署花厅联，除“事业”与“福





禄”，“世界”与“手足”两处平仄未对外，其余均符合联律要求。可见古人对联律注重的程度。

（作者系本馆馆员）

# 湘"目连"与湘风

文忆萱

中央文史馆与上海文史馆合编的《世纪》双月刊中，曾刊载了一篇关于介绍"梁祝故里"申遗的争论与考察，这篇文章对我们为湖南目连戏申遗增强了信心。因为这出戏是绝无仅有的剧目。

"目连戏"是指以《目连救母》这出戏为中心的系列演出。我们计划申请的是《目连救母》这出戏。可不要以为它只是一出戏，这出戏可是煌煌巨制，历来被称为"大戏"，而且是名符其实的"大"，它的"正传"就有七大本，每本可演10—12小时（由于声腔的不同，演出时间也不完全一致）。此外还有"前传"、"外传"、"花目连"之类。旧有"四十八本目连"之说，那是配合中元节打"罗大人醮"，醮期49天，从第二天起便同时唱目连戏，与打醮同时结束。湘西还出现过两个戏班同时对演目连戏达四、五个月之久的记录。这大概是戏剧史上绝无仅有的事。

关于"目连戏"，我从第一次接触起至今达70年之久。最早在我七岁时，住处临近的关帝宫就唱过一次目连戏，每天从午饭后演到晚饭前，再从晚饭后演至深夜，那就是一本戏。但我没看到演出。那年头，家里坚决不许小女孩去看那种有恐怖色彩的演出。但孩子的好奇心盛，终于在一天上午悄悄溜到关帝宫的前坪偷偷看了一眼，戏台正对大殿之门，坪的两边有两米高的围墙，我只能看到围墙上的纸扎，都让些和我当时的个子相等的人物——应该说是鬼物，内容是十八层地狱的种种酷刑。我看了碓舂、磨挨、锯解……之后，吓得回身就跑，哪敢往下看？后来读明人张岱的《陶庵梦忆》说到目连戏的演出："一似吴道子地狱变相"，"为之费纸扎者万钱"，才知道我儿时所见，犹有古风。

从此，目连戏在我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解放后，我被指派汉戏改干部，趁工作之便，我就有意收集有关目连戏的资料。那时，收到一批木刻本，记得有长沙、湘潭、邵阳、衡阳、洪江……各地的坊间刻本，都是上、中、下三本，最早的是清同治年间所印，最迟的是清末、民初。可惜这些刻本已荡然无存，只在我脑子里留下些零星的记忆。





这些刻本，不是湖南各剧种的演出本，而是翻刻的明万历时郑之珍改编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简称《劝善记》），对《劝善记》和湘目连的关系，我十多年前有专文谈过。

正式把目连戏提上议事日程还是20世80年代初。"文革"刚过，资料毁尽，艺人耆宿凋零，深感有抢救的必要。在全省抢救各剧种优秀艺术遗产的同时，我极尽游说之能事来抢救目连戏，终于在80年代分别录制了两套祁剧、辰河戏的录像。

我自以为懂得目连戏了，其实大谬不然，经过20多年的了解，才知道谈"懂得"还远远不够。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提出"目连戏"是中国戏曲的"活化石"，也颇有人认同。后来，我自觉不准确，"化石"即便是"活"的，仍然会是某一历史时期的固定形式，而目连戏在历史长河中却日新月异。由于目连戏内涵之广泛，我又认为更是"中国戏曲艺术大百科"。到了21世纪，经过一些分析，把目连戏与中国戏曲历史来对比，我又认为它是"中国戏曲艺术形象史"。这几次的不同提法，说明在认识上的逐步改变。这种变化是经过了20年漫长的岁月所形成，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对于目连戏，我曾在不同时期写过《认识》、《再认识》等文章，但知也无涯，目连戏像一本读不完的大书。记得1987年在美国柏克莱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放映了湖南祁剧《目连救母》录相片段，有一位外国专家说过："光《九殿不语》这一场戏就可以研究十年。"当时，我以为要么是外国人不懂中国戏，要么是艺术上的夸张。时间又过去了几年，我才理解到，真正致力于研究目连戏，大概得几代人的努力。这样一出代表东方文化、中国文化、三湘文化的古老戏剧，绝对具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目连救母》片段录相在1987年曾经在美国帕克莱大学引起与会各国学者的瞩目。1998年长河戏的节本《目连救母》（100分钟）又参加了巴黎艺术节。随后又在波尔多、巴塞罗那演出，都使观众惊奇。国外的东方文化学者因而引发了"目连热"，而在国内更是引起普遍的兴趣。在我省、外省举行的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吸引了法国、日本、美国等许多汉学家的参与，他们都希望获得我们的录相带。

为什么这出戏如此引人注目呢？

首先，它是一出近千年不绝于舞台的戏。

世界最古老的戏剧首属希腊悲剧，它比我国戏早了一千多年，可是，除了少数文字剧本而外，并没留传下来。其次是印度梵剧，我国前辈戏剧理论家张庚曾亲去印度采访，也只留下文字剧本。唯独中国戏曲，自出现于舞台之后，即绵延不绝。

中国戏曲发生、形成的时间，戏曲史家尚无定论。我不是研究戏曲史的，只能凭我所知的史料来说，而我所知的史料，既是中国戏曲在舞台正式演出的记载，同时也是《目连救母》这出戏在舞台上演出的记载。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中元节”条有如下记载：“构市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此书孟元老“自序”中说，他是“从先人”于“崇宁癸未（即崇宁2年，公元1103）到京师”，“靖康丙午之明年（即靖康二年1127）出京。”说明他在《梦华录》中所记，当为公元1104—1126年间的东京（开封）旧事。孟元老这短短二十六字的记载，对我们戏曲界可是极其珍贵的史料。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更早的关于一出戏的演出盛况的记载。这条史料即是《目连救母》正式在群众中演出的记载，也是我所知的中国戏曲在群众中大型演出的最早记载。

关于这条史料，最初接触时，戏曲界有两种诠释，一种认为是连演8天的连续剧；一种认为是同一剧目重复演出8天。我取前一种，因为一出连演多少场是20世纪的事，即使在20世纪前期，无论梅、程、荀、尚还是谈、杨、言、马，其拿手戏多为轮换演出，很少有一出戏重复连演七八天的习惯，再说现存的南戏最早的戏文《张协状元》长达53出，也能说明中国戏曲正式出现在舞台上之后，篇幅都较长，何况目连戏本身的伸缩幅度又很大呢！

北宋末年有演《目连救母》的记载，元代又有两种杂剧《目连入冥》、《行孝道目连救母》存目。明代就更多了。明万历时的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他的表姐之子胡天禄在“跋”中点明：“取《目连传》括成《劝善记》三册。这就说明不是郑之珍的创作而是改编了。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杂调”条载：《劝善》为109折，显然不足郑之珍本。而明张岱《陶庵梦忆》中“目连戏”条所载：“搬演目莲……如度索舞絙、翻桌翻梯、解斗蜻蜓、蹬坛蹬臼、跳索跳圈、窜火审剑之类……”都是郑之珍本中所没有的。这都说明在明代就有不同的《目连救母》演出脚本。到了清代，更有以张照为首的宫廷改编本《劝善金科》十本240折传世。至于从清代到民国，民间各地的不同演出本更是无法统计，戏曲界称之为“一地一目连。”

一出戏登上舞台之后，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并且在演出中像滚雪球般不断拓展、充实，其中如《思凡》、《双下山》等单折，至今21世纪，仍为各大剧种中的精品，一出能绵延近千年的戏，不能不视之为绝无仅有吧！

其次，是这出戏的从内涵到表演的包容性，也是其他戏剧所没有的。目连故事源于《佛说盂兰盆经》，到唐代又出现多种变文。但是，源于佛经的故事要溶入中国人生活之中，必然是中国化的，特别是在郑之珍这样的读书人改编之后，儒家的伦常便占据了主导地位，突出了傅罗卜（目连）的孝，傅相的





忠，曹赛英的节，益利的义。戏中还穿插了另一些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小故事。但是，佛家仍是故事的源头，目连为救母而拜佛，出家修行，终借佛力救母，同时也插一些有关六道轮回的小故事。全剧中释与儒并不排斥道，和尚、道士往往同时出现，傅相好善，既斋僧又斋道，而且还纳入民间的土特产一巫。特别在湖南的地方戏更突出，郑之珍《劝善记》中有一折“请医救母”，而在湖南则换成了“请巫祈福”或“哑子收魂”，由“师公”唱主角。

在我有限的戏剧知识中，还没发现有任何一出戏如此兼容并收。

至于表演上更可以说是异彩纷呈。

中国百戏起源甚早，它对戏曲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这是戏曲史家无一例外都说过的。这里就要回到我前面说过的《目连救母》的篇幅伸缩性大了。现代的电视连续剧，恕我孤陋寡闻，我看到过的最长的大约是日本的《阿信》，据说原作是三百多集，我们译制时作了归纳与合并，但我还是没有看多少——太长了。《目连救母》动辄演七八十个小时，在凭灯火照明的简陋庙台上，要吸引往来看的人！而且“观者增倍”，靠什么？特别是戏曲早期。我想，靠的就是“百戏杂陈。”宋代怎么演的？目前尚未发现新的资料，但明代从《陶庵梦忆》中叙述的“演武场搭一大台……搬演目莲，凡三日三夜。”表演就有“度索舞絙，翻桌翻梯……”而且是“选徽州旌阳戏子，剽轻精悍，能相扑跌打者”，效果是观众“万余人齐声呐喊”，弄得地方官紧张“太守谓是海寇卒至”。就是郑之珍文人笔下的《劝善记》，也有打莲花落、捉傀儡等掺杂其中。各地方戏中加入当地杂耍更不待言。像祁剧中有一种叫“两头忙”的，一个人两手穿鞋与双脚着地，背上面对面有两个纸扎人头，是一人饰二人的表演，这和北方的民间杂耍“二贵摔跤”相同。我还看过苏联的一个类似的杂技节目，就叫“两个小伙子摔跤”。这些“百戏”掺入戏中，并未完全脱离剧情，而是夹在上天、入地、宴会情节之中，所以各个地方戏班在演出中收入哪些杂耍表演，也可以就地取材，即戏班无人擅长而当地却有著名杂耍艺人，也可以请来临时客串，所以各剧种甚至各班社演出并不完全相同。这恐怕主要是用于吸引观众，但也因之集中和保留了许多民间艺术。

两千年的民间艺术自然成为滋润戏曲表演艺术的养分，前面提到的“两头忙”，还只是掺入剧中的杂耍，而像独脚戏《老汉驮妻》（亦称《哑背疯》）则与剧情、人物融为一体，这是旦行特色戏，头作旦角妆，双手也是旦角动作，后腰扎女性臀部和两脚假肢，胸前扎一老人头，演员下肢迈老汉步法，脚穿草鞋。因为这种一个人演两个人连唱带做的独特表演，使之成为独立的折子戏一直演到现在。这种演法由来已久，在明郑之珍本中就收入《会缘济贫》折中，剧本也有明确的舞台提示：“一人饰二人。”其实，它只说明一个哑巴老头背着

年轻却疯瘫了的妻子来向傅家求周济，演员也只唱一支［孝顺歌］曲牌，内容是劝善词，劝人孝、悌、夫妇和顺，构不成一个单出，却因这一独特的表演而形成常演的旦行拿手戏。目连戏中此类单折或片段，不胜枚举。

在音乐方面，它也具有其特殊价值，在湖南戏曲界，公认《目莲救母》是最早的高腔剧目，全剧中保留了大量高腔原型曲牌，湖南的高腔以“放流”为特色。“放流”即青阳腔的“加滚”，但湖南戏在这方面发展更丰富，特别是湘剧，不懂原型曲牌的人，对原型曲牌和放流往往分不清。目连戏后来虽然同样加入放流，但原型曲牌仍完整、清晰地保留着。所以，前辈老艺人常说：会唱目连，就没有不会唱的高腔牌子。在其他大本戏中，湖南剧种也受昆、弋合唱影响，高腔和昆腔杂唱，唯独《目连救母》却始终保持了全剧的高腔演唱，前辈艺人奉《目连救母》为“戏祖”、“戏娘”、“戏蔸子”，也是说明这是最古老的高腔戏。而其中的曲牌又作为学习高腔的典范。

目连戏的另一大特点是和观众互动，几乎没有哪一天的戏不和观众互动。过去都是庙台演出，台口就有特制的较宽的木梯，供演员、观众随时上下。如“汤饼筵宴”，就是刘氏生下傅罗卜（目连）之后第三天“打三朝”，刘氏娘家人就挑着礼物从台下沿梯上台，接下来摆酒，也是台上台下同摆，台上是戏中人饮宴，台下是办会的首事、执事，当地头面人物，外地来的嘉宾，同时举杯欢饮。那天是素席。而到“大开五荤”时，刘氏违誓开荤，台上台下都是荤席的，而各种杂耍也从台下沿梯上到台上表演。“罗卜拜香”是经剧场外拜入观众中再上台，“罗卜化缘”则由台上下到观众中募化。“锁拿寒林”由五猖神从台上跳下奔往野外去捉，观众也可紧随其后奔向郊外，随着捉到的寒林又一同回到剧场。“按院收状”是演员扮成按院。人役抬着官轿招摇过市，而观众也一齐拥上街头。陶全栏轿告状，被按院认为冲道，当街打四十大板。三次栏轿，三次挨打，按院才收了状子，一同回到到演出场地，沿台口梯子上台审案，观众也跟着同来继续看戏。“刘氏逃棚”扮演刘氏生魂的演员逃向台下观众丛中，还可随时顺手抓小摊贩的各种食物吃，摊主视为吉利，鬼卒也从台上下来在观众中捉刘氏。明张岱《陶庵梦忆》中记“刘氏逃棚”也是如此，观众还“万余人齐声呐喊”，可知这种演法，是几百年的传承，这里只能略举几例，其他台上、台下演出情节还多。这种演出形式，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一地一目连，因此，目连戏的地方特色很强，也反映了许多民俗风情，先以音乐而论，各剧种同为高腔，但高腔音乐却带行极明显的地方音乐特色，祁剧主要以湖南地方音乐素材为其养分，而辰河戏则明显感受到沅水号子的风格，湘剧进化程度较高，所以既高亢又婉转悠扬，与湘中民乐风格接近。戏中的情节也纳入了不少三湘民俗，如。“刘氏产生”中“打三朝”，刘氏的兄





弟刘贾便率领许多人挑礼品上台，礼品中红蛋、红糖都是湖南娘家人打三朝必送的，“海氏悬梁”死后，她的“娘家人”纷纷由台下上台“吵场合”，这是湖南农村中已出嫁之女死于非命后的旧例。旧俗人死后第七天（头七），死者鬼魂必回来一趟（回煞），而刚死之魂还重浊，行路留痕迹，所以家人布灰于地以验死者是否留下回家的足迹。“刘氏回煞”中傅罗卜也照样在家里遍地撒下柴灰。“刘氏下坑”一如今天农村里还保持着的礼仪。1989年辰河戏演出《目连救母》时，一位来观摩的台湾研究生对我说：“这出戏把育俗，丧俗，祭俗都保留了。”

过去，从1949年之后，目连戏在三湘大地自动绝迹，其理由无非是“宣扬封建迷信，因果报应”。其实，在地方戏的演出中并非如此，相反的，民间艺术家的创造，不仅对迷信持否定态度，而且异想天开，创作了别具特色的讽刺喜剧。前面提到令外国学者震惊的“九殿不语”，整出是一场哑剧，不但剧中人不开口，乐队也掩乐停音，一切要说的话都用字条显示，只有为刘氏开荤办厨的李狗儿鬼魂不知道，他上场就说话，马上就挨打，打得他喊冤，因为他并没说错话，喊冤又挨打，三番五次之后，李狗儿才恍然大悟，原来九殿的阎王是哑巴，所以九殿不许说话。这是多么强烈的讽刺！五殿阎罗向来是最严厉的，但那天他要去朝玉帝，叫判官代理，扯谎鬼甘脱身想逃离地狱，一路骗过前四殿，到五殿骗不过了，判官叫油炸他。甘脱身问牛头炸他用多少油，牛头说五百斤，甘脱身说自己瘦小，用一点油炸就行，多余的油送给牛头，牛头果然用一小桶油炸他，他在油锅中大叫：牛头贪污，一点点油只炸得他脚痛。判官发怒，斩了牛头，甘脱身揪住判官，说人王（当朝皇帝）出了圣旨，天旱禁屠，判官执法犯法，私宰耕牛。判官无法，和他“私了”，让甘脱身当牛头；森严、恐怖的冥间十殿，在民间艺术家的创意下竟有层出不穷的喜剧，这大概完全出乎卫道者的意外吧。

湖南历史上是巫风甚盛，那么，目连戏对巫又是什么态度？刘氏病了，明刊本都是请医生诊治，湖南是请巫，湘剧是“哑子收魂”，请了一个哑巴巫师来驱鬼。哑巫师作法之后，祭鬼的“福物”（一副卤猪肠）照例给巫师，巫师回到家里，鬼却尾随去了，巫师取出猪肠切了下酒，切一段，鬼吃一段，巫师奇怪切下的猪肠怎么不见了，赌气不切，拿着猪肠直接用嘴咬。巫师咬上端，鬼咬下端，猪肠吃完，二嘴相接，把巫师吓坏了。祁剧和辰河戏都是“请巫祈福”，巫师毛师公来作法，驱鬼不去，叫人去请老婆毛师娘来协助，鬼却抢了毛师娘的孩子扔下河，夫妻两个忙着下河救儿子，所请师公驱鬼却成了闹剧，全场观众捧腹大笑，真叫人匪夷所思，是剧作家写不出来的剧本。

目连戏中的特技更多，但已不似明代《陶庵梦忆》中所载的“蹬坛蹬臼”

"窜火窜圈"之类，而是和剧情结合紧密的功技，如"大上吊"之悬梁，祝贺观音生日时的罗汉演武，当然最著名的是"打叉"。据老艺人告诉我有七十二种打法，惊险绝伦，我问过最后一位叉手，他说先个人练准头就要练三年以上，光是白天在山上利用已砍伐过的树桩练，练到相当准了，改为晚上练，拿一枝敬神的香点燃插在树桩上，照着香火练准头，个人这样练，要打烂几百个树桩。练准之后，再和受叉（刘氏）的演员练配合，以免失手。我也问过历史上戏班演目连戏，有打叉失手的事没有，老艺人都说从未出事。当然，他们除了对功技自信而外，也有演戏时的虔诚：演目连戏期间全班斋戒，有"镇台"、"收煞"仪式，……我又问捉刘氏时为什么会抬棺材过街——演目连戏有成规：杀叉出事就以那副棺材装殓。老艺人都笑：那是宣传、吸引观众来看戏，戏演完，棺材退回店里，棺材费是叉手和刘氏的分外收人。这副棺材早有人出钱预定了，被认为老人死后能用这副棺材将大吉大利。

从清代到六十年前，在湖南民间，演目连戏历来是件盛事。每到七月十五中元节，办盂兰会，打罗天醮，结万人缘，一般都会吸引方圆百里的人来赶会看戏，清湘潭人潘其炯的长诗《艳火行》，就是描述乾隆十四年（1749）在湘潭石牛铺演目连戏时发生火灾：妇女在特设的看台上观剧"崇台连延人海旁"，大火一来"绿珠纷纷楼头坠"，惨不忍睹。末句诗人告诫："来岁目连还救母，红妆慎勿出深闺。"诗写的是演目连戏时发生的火灾，但却同时反映了目连戏演出的盛况，而且预计，即使遭了这么一场火灾，"来岁目连还救母"，并不影响再演目连戏。

目连戏是在中元节为超幽度亡而演，超幽度亡另一面是祈福，人们都怀着祝福消灾的心情，不专是为看戏而看戏。所以，戏演到"目连化缘"时，观众都会随意布施，有孩子的则将孩子的小鞋、小帽挂在目连的锡杖上。挂的太多，目连无法表演，戏班便另饰一个小和尚，挑担箩筐随在目连身后，盛这些小帽、小鞋。"刘氏产子"之前，燃灯古佛指点在傅家花园扯出一个萝卜，刘氏在台上切成小块，自食一块之后就顺利分娩。家有孕妇的观众，无不备一小红包，上台讨刘氏切下的一小块萝卜，产子之后打三朝，想求子的观众也备红包上台讨一个红蛋。"灵官镇台"之后回到后台不卸妆，而是用黄纸在脸上把油彩画的脸谱拓下来，这就叫"灵官符"，观众中有家宅不宁的便用红包来求一张回去供奉。演完目连戏"放河灯"时，也有观众自制河灯随着同放，满河灯火荧荧，两岸人声鼎沸，非常热闹。

演一次目连戏，所费不赀，一个地方不会年年演，但甲地不演乙地演，三湘大地，几乎没断过目连戏的锣鼓，即使在八年抗战期间，不能作大型盂兰会，但演一天或三天的还是有，不过具体而微罢了。可见目连戏在三湘四水的





影响，一出戏有这么大的影响，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既然一地一目连，为什么我们对申遗独抱信心？那是因为我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演出的祁剧和辰河戏《目连救母》录相，共达近 50 小时，而当时参加演出的都是 20 世纪 40 年代演过目连戏的演员，演出也仍保持那时的年代原貌，不是根据少数人记忆的仿古复制，唯一与当年不同之处就是"打叉"，因为演员都已六七十岁了，我们劝止了他们不再作那种惊险的绝技表演，万一失手，谁也担当不起。这是我国唯一仅在的照原貌演出的录相资料。现在，虽然参与录相的演员大部分作古，但音相犹存，照录像重演的仍不失原貌。这是湖南独占的优势。

（作者系本馆馆员）

# 钟王易顺鼎优秀诗钟选评

吴容甫

编者按：据易宗夔《新世说》载："同光以后，都人士结为寒山诗社，月必数集，雅歌消遣，陈翼牟作《铸钟九友歌》以张之。首赞易哭庵（顺鼎）云：'龙阳才子钟中仙，摇笔思攫榜花元。忽然攫得喜欲颠，一生夺魁数暴千。'"誉之为钟王，原不为过。本文值得一读。

清朝末年有四个人，以他们的聪明和才华为时人所艳称，谓之"清末四才子"。这四个人是曾广钧重伯、易顺鼎实甫、樊增祥樊山、陈三立伯严。这四个人的父亲分别是曾纪泽、易佩绅、樊燮、陈宝箴，都是当时的高官显宦，所以他们四个人又谓之"清末四公子"。

曾广钧是湘乡人，曾国藩的长孙。易顺鼎是汉寿人，汉寿古称龙阳，易顺鼎又被称为"龙阳才子"。他们在长沙时，经常到营盘街王闿运的住处求教，因为王闿运是他们的长辈，又是当时的大学问家、大文豪。王闿运在他的《湘绮楼日记》中经常提到他们，称"仙童"指曾广钧，称"神童"指易顺鼎。得到王闿运的赏识，足见他们名不虚传。

易顺鼎十三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然而此后连续六次参加礼部会试都名落孙山。他一生坎坷，郁郁不得志，三十岁时曾在河南任候补道，闲职，无所事事，未几即引退。四十三岁（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时任广西右江道道员，为总督岑春煊劾罢。五十岁任广东钦廉道道员，三年后清王朝被推翻，蛰居沪上。袁世凯称帝时，他投靠袁之二子袁克文，任总统府印铸局代理局长。袁氏帝制失败，去职。从此漂泊京华，不复再出。1920年逝于京寓，年六十有三。

易氏聪明绝顶，才华盖世，著述甚丰，以诗名世，对诗钟情有独钟。他是这一艺术形式的开拓者、倡导者和积极参加者。他在四川、江苏、北京、河南、湖北等地时，与当地诗人名宿，频作诗钟联吟之会，前后数十年，至老不遑。他捷才敏思，格高调雅，情文并茂，韵味悠然，所作诗钟，数以千计，不少脍炙人口，传诵一时，令人啧啧称赏，惊叹不已，誉为"钟王"。今将其最





优秀者，选若干首，略加评注，以饷同好。

### 《因·七（四唱）》

兄弟结因思世世，夫妻送七誓生生。

### 《九·华（二唱）》

黄九不师怜竹坨，禄华无定比兰香。

有人问易实甫："前数年及近年所作诗钟最得意者为何句?"易应之云："前数年所作，以'因·七'四唱一联为得意。近年所作，以'九·华'二唱一联为得意。""因·七"一联，上句用东坡赠子由诗："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下句用《长恨歌》中李隆基、杨玉环事，皆熟典也。此联之妙，在重一"世"字，又重一"生"字。而"生生世世为夫妇"，则《长恨歌传》中语也。有此一重，不仅气足神完，而且意蕴极深，韵味无穷，真才子也。

"九·华"一联，上句用朱彝尊词："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下句用李商隐诗："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此联"九"为数词，难对。而作者用四人名，两两相对，而又句中自对，则弥缝其不协矣，此浮云遮眼之术也，妙绝。

### 《文·里（四唱）》

钴鉧柳文真妙品，辋川竹里有新诗。

柳宗元《永州八记》中有钴鉧潭记。下联用王维诗："独坐幽篁里。"此联之妙在以"柳文"对"竹里"，字面相对，而词意不对，巧对也。

### 《瓦·云（一唱）》

云如龙虎惊高帝，瓦冷鸳鸯忆太真。

对仗最工，用典最切，陈石遗（衍）评为状元。然当时另一文人杨味春一联，几雷同。联云："瓦冷鸳鸯唐帝怨，云成龙虎汉皇兴。"另一评选者罗瘿公（惇曧）谓杨作较易作为胜，盖杨作"唐帝怨"三字较易作"忆太真"情韵更足也。

### 《举·前（三唱）》

商隐举家吟树碧，刘郎前度感花红。

上联用李商隐咏蝉诗："我亦举家清"，"一树碧无情"。下联用刘禹锡玄都

观诗。此联不仅对仗精工，且“举”、“前”两字，嵌得自然而稳妥，格调亦高。“感”字尤妙，其味无穷。此联陈石遗评为榜眼，陈宝深（弢庵）言若改为“相警举家吟树碧，又来前度感花红”则必得状元矣，盖诗钟中之闽派，忌用人名，陈衍闽派也。

### 《益·诸（六唱）》

徒劳神笔挥诸葛，翻遣楼船下益州。

上联用李商隐《筹笔驿》诗：“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下联用刘禹锡《金陵怀古》诗：“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此联之妙，在上联直贯下联，一气呵成，流水对也，以诸葛高才，而不能救蜀之亡，惋叹之情，溢于言表，“益”、“诸”嵌于第六字，浑若天成，真妙手也。

### 《风·转（四唱）》

春水乍风何与汝，秋波一转怎当他。

上联出冯延己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下联出《西厢记》曲：“怎禁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此联易实甫自认为最得意之作，曰：“此题用此两典，真天造地设，而人工偶得之。”“何与汝”三字绝佳。盖南唐中主谓冯延己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 《掌·烧（三唱）》

野火烧馀皆幸草，歌筵掌上有名花。

此联得榜眼，易公自言非上乘之作。上联用白居易诗，现成，下联则未知确切出处。赵飞燕能作掌上舞，谓赵飞燕乎。“名花”似系泛指。“幸草”二字亦欠圆熟，盖言有幸之草也。

### 《流·鬼（四唱）》

八阵江流难转石，九歌山鬼尚依篁。

上联出杜甫诗：“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下联言屈原《九歌》中之“山鬼”。“尚依篁”对“难转石”绝妙，情韵皆胜。

### 《冬·细（五唱）》

闲抚陶松冬更秀，老耽杜律细如何。

“闲抚”、“老耽”、“陶松”、“杜律”皆工对。“冬”、“细”二题字，词性不合，“冬”名词，“细”形容词。然“细如何”则可作名词与“冬”相对矣，造





语之妙，令人击节。上联出陶渊明《归去来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下联出杜诗：“老去渐于诗律细。”

### 《东·尾（六唱）》

兵法长蛇宜尾应，艳情孔雀自东飞。

长蛇阵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尾”字嵌得最妥。“长蛇”对“孔雀”亦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现成，佳联也。

### 《众·中（一唱）》

众芳摇落悲啼鴂，中道崩殂感卧龙。

“众芳摇落独鲜妍，占尽风情向小园”，此上联所自出也。“中道崩殂”，《出师表》中语，对“众芳摇落”，妙绝。“啼鴂”对“卧龙”亦极工，真才子也。且上下两联，构成一凄清悲凉之意境，感慨良深，令人叹惋。

### 《国·知（一唱）》

国士假王功狗恨，知人先帝卧龙哀。

萧何云：“若信者，国士无双。”又韩信自请为“假王”，招刘邦之忌。蒋士铨诗：“可怜功狗与功臣。”“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古今同慨。上联特妙，七字写尽韩信一生矣。下联用诸葛亮斩马谡事，后悔不用刘备之言也。“国士”与“知人”未为工对，然系题字，又在一唱，未可苛求也。

### 《运·同（三唱）》

仲则运城来死友，杜陵同谷发哀歌。

黄仲则贫病交加，死于运城客舍，洪亮吉不远千里，前往探视，扶其榇归，范张苏李，管鲍潘陈，此古代文人交往中又一令人敬叹之佳话也，所谓生死之交也。黄仲则，洪亮吉皆清代人，故知诗钟，近典亦可用。下联用杜甫同谷七歌事，熟典也。

### 《铜·佛（五唱）》

落日荒台铜雀瓦，神鸦社鼓佛狸祠。

温庭筠过《陈琳墓》诗：“石麟埋没随秋草，铜雀荒凉对暮云。”此上联所自出也。下联则见辛弃疾之《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铜雀台曹操所建，佛狸，北魏帝之小名，皆一代枭雄，往事如烟，惟留陈迹，叹古伤今，溢于言表，此本联之韵味所在也。“铜雀”对“佛狸”妙绝。

## 《带·家（一唱）》

带围渐减都因酒，家具无多半是书。

此联不假雕琢，自然流畅，格高调雅，一风流蕴藉、乐贫守道之文人形象，跃然纸上矣。

## 《圣·秋（一唱）》

秋娘衣尚留金缕，圣女旗曾感玉溪。

上联用杜秋娘诗："劝君莫惜金缕衣。"下联用李商隐《过圣女祠》诗："尽日灵风不满旗。"李商隐号"玉溪生"，以"玉溪"对"金缕"妙绝。此联之妙，在上下联构成一种意境，言男女情事，伤彼美之难求，折花之未能及时也。

## 《湘夫人·兔（分咏）》

楚渚秋风尧女庙，梁宫夜雪孝王园。

洞庭湖君山有尧之女舜之妃娥皇、女英之庙，即"湘夫人"也，故曰"楚渚秋风"。汉梁孝王有兔园，常聚诸名士雪夜饮宴，极一时之盛。此联咏"兔"字绝妙，不愧"钟王"也。

## 《帕·鸡（分咏）》

赖汝一声天下白，拭他双泪枕边红。

"一声"对"双泪"，"天下白"对"枕边红"，"汝"对"他"，对仗之工，竟有如此者。"一声天下白"，非鸡莫属，用一"拭"字，则亦非"帕"莫属矣，咏物之切，又竟有如此者，真天才也。

## 《衾·蝉（分咏）》

断续秋声千树暝，阑珊春意五更寒。

上联出自李商隐咏蝉诗。下联出自李后主词："罗衾不耐五更寒。"点一"衾"字，此联对仗之精工，无与伦比，然最妙者在上下两联构成一优美凄清之意境，令人沉味，令人怅惘，久久难释也。

## 《武则天·苏季子（分咏）》

监称鹤控书犹秘，嫂学蛇行位本高。

武则天称帝时，宫中设有控鹤监，所养者张易之、张宗昌兄弟之流，皆男





宠也。有《控鹤监秘记》一书，专载其淫行，秽不可闻。苏季子，即苏秦也。苏秦佩六国相印归家，其嫂见之匍匐而蛇行。苏秦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其嫂曰："见季子位高而多金也。"此联咏两人甚切，对仗亦工，"鹤控"对"蛇行"绝妙。然用语似嫌平实，韵味不及其他诸联也。

## 《帆·杜牧（分咏）》

三千殿脚春风锦，廿四桥头夜月萧。

"殿脚"指宫女也，隋炀帝游扬州，以宫锦为船帆又令数千宫女挽锦缆以行，故唐诗有："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此联点"帆"字，甚妙。杜牧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点"杜牧"亦佳，此联意境优美，诗味最足，江南好风景也。

## 《李克用·鬼（分咏）》

奇儿帐下多天子，骚客山阿遇美人。

李克用有子十三人，号称十三太保，除李存勖外，其余皆义子也。李存勖，后唐庄宗，李嗣源继之，史称明帝，其余诸义子中，是否有人称帝，手边无书，无从查考。《楚辞·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切"鬼"字，绝妙。化丑为美矣。然亦会屈原原作之意也。

## 《赵子龙·范希文（分咏）》

名将一身都是胆，秀才万甲已罗胸。

此联最切，对仗亦最工。"一身是胆"非赵云莫属。范仲淹任陕西经略，防西夏，西夏人谓曰："“范老头子胸中有百万甲兵。"

## 《刘寄奴·鞭（分咏）》

闻鸡琨逖争先着，司马师昭有后尘。

此联构思极巧，聪明之至，"琨逖"者，刘琨祖逖也，闻鸡起舞，争着先鞭。"鞭"字在其中矣。"寄奴"为南朝宋帝刘裕之小字。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以晋代魏，刘裕则以宋代晋，一报还一报，步其后尘也。"后尘"对"先着"绝妙。"闻鸡"对"司马"则词意不相对，而字面相对，巧对也。咏刘裕不言其生平业绩，而仅言其篡位代晋，步司马兄弟之后尘，此旁敲侧击之手法也，非才识过人，聪明绝顶者，不能作此联。

### 《裴令公·花轿（分咏）》

绿野堂留名相住，朱陈村迓美人来。

“裴令公”，唐名相裴度也。晚年于洛阳建有绿野堂，与诸名士诗酒为欢，白居易、刘禹锡等皆其座上客也。辛弃疾《水龙吟·寿韩南涧尚书》：“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诗酒”即分指裴度、李德裕、谢安三名相。朱陈两村，世通婚姻，白居易曾有诗咏其事，故“朱陈”犹“秦晋”，皆男女婚姻之代名词也。“迓”字看似平常，实则最妙。“迓”者，迎也。朱陈村迎美人，则“花轿”自出矣。

### 《耕·船（分咏）》

辍从陇上兴陈胜，权向江东待项王。

陇上辍耕，发“苟富贵，毋相忘”之叹，见《史记·陈涉列传》。“耕”字在其中矣。项羽兵败至乌江，有船夫权舟以待，见《史记·项羽本纪》。则“船”字亦在其中矣。用典之切，立意之妙，对仗之工，令人啧啧，不愧钟王也。

### 《霞·班婕妤（分咏）》

鹜飞齐落滕王阁，燕啄初辞汉帝宫。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此王勃《滕王阁序》中之名句也，点一“霞”字。骆宾王《讨武曌檄》：“燕啄皇孙，识汉祚之将尽。”“燕”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飞燕妒且毒，后宫有人得幸产子，皆毒杀之。又潜班婕妤于成帝，故曰“燕啄初辞汉帝宫”也。“鹜飞”对“燕啄”绝妙。异想也，而又有典可据。

### 《灯·线（分咏）》

青忆儿时书有味，红传女字剑无声。

青灯夜读，青灯课儿，扣一“灯”字，情韵悠然。下联尤妙：“慈母手中线”，“千里姻缘一线牵”，“苦恨年年压金线”，皆与“线”有关之名句也，然作者皆不用，而谓“线”乃唐人小说中侠女红线之字，引来“剑无声”与“书有味”相对，格高而调雅，其味无穷矣。

### 《前汉书·长城（分咏）》

明月秦时千里戍，扶风班氏一家言。





上联言秦时筑万里长城，“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诗。“扶风”地名，对“明月”，字面可对，妙对也。“一家言”，极切。盖《前汉书》班彪始作，其子班固续成之，班固之妹班昭续补之，故曰一家之言也。班氏，扶风人也。

### 《司马·狗（分咏）》

白傅江州新谪宦，荆卿燕市旧屠人。

“司马”既系官名，又作姓氏。白居易谪江州司马，作《琵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荆卿，刺秦始皇之荆轲也。在燕市以屠狗为业。暗点“狗”字。

### 《刀·菊（分咏）》

捉向床前惊孟德，采从篱下忆渊明。

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千古名句也，咏“菊”字妥贴自然。上联咏“刀”字，用曹操床头捉刀之典，甚僻，不见于《三国志》，而见于《世说新语》。匈奴使者谒见，曹操自以貌不出众，乃命崔琰代之，自己则提刀侍立于床头。事后曹操使人问之，使者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乃真英雄也。”曹操乃追杀此使。“捉”者“捉刀”也，点一“刀”字，此联构思新巧，聪明之至。

### 《炭·烛花（分咏）》

冬意可消非附热，春心争发未成灰。

上联立意极佳，“炭”可御寒而消冬意。“非附热”，双关，自谓非欲“趋炎附势”也，人品自见矣。下联出自李商隐诗：“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或谓题为“烛花”，春花非烛花，似有未切。然李商隐又有诗云：“蜡炬成灰泪始干”。此联用一“灰”字，则非“烛花”莫属矣。作者真系诗钟高手，尽妥尽善，非泛泛者可比也。

### 《雪·十年（分咏）》

海上孤臣苏武啮，军中壮士木兰归。

咏“雪”字有诸多典故可用，作者独选苏武牧羊十九年，饮雪吞毡之事，构思不同凡响，“啮”字妙，情状如绘。《木兰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真咏“十年”之绝唱也。

### 《晏子·二十五（分咏）》

书号春秋殊吕览，弦弹夜月吊湘灵。

"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皆书名。"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司马迁报任安书："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今题为"晏子"，故曰：晏子之书号"春秋"；不同于吕不韦之吕氏春秋也。钱起诗："深渊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下联，"弦弹夜月"即扣紧题字矣。

### 《背·苏东坡（分咏）》

说对韩侯知贵相，语闻宋后叹奇才。

韩侯，淮阴侯韩信也，蒯彻劝韩信造反以隐语动之，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背，贵不可言。""背"字双关，含"背后"、"背叛"两义也。"背"字而用此一典故，聪明之至。东坡兄弟登进士第，宋仁宗之母宋太后叹为奇才，曰："又为吾家得一状元宰相矣。"东坡可咏之处甚多，而独用此典者，盖欲以"宋后"与"韩侯"相对也。

### 《孙春阳（鸿爪格）》

金屋夕阳飞燕子，玉关春草接乌孙。

此格作法：三字中任选两字嵌于一联之中，另一字则嵌于另一联，位置不拘，不连不对。此联中"金屋"语出汉武帝"若得阿娇，当以金屋藏之"。阿娇，汉长公主之女，武帝之表姐也。"乌孙"匈奴国名，汉与之通婚，以宗室女充公主妹之，女作诗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愿为黄鹄兮返故乡。""金屋"对"玉关"精对也。"燕子"对"乌孙"，字面相对，巧对也。

### 《七里山塘（碎锦格）》

一千里接瞿塘水，七二峰连岳麓山。

此格作法：四字分嵌于上下两联之中，每联各两字，位置不拘，不连不对。"瞿塘"三峡之一。用"一千里"者，来自李白诗："千里江陵一日还"乎。长沙岳麓山为南岳七十二峰之尾，故曰"七二峰连岳麓山"。上下两联分嵌"七里山塘"四字平稳妥贴，举重若轻，妙手也。

### 《仙·姬（魁斗格）》

仙露铜盘怀汉武，秋风纨扇感班姬。

此格作法：任选一字嵌于上联之首，另一字嵌于下联之末。汉武帝作银盘承仙露，求长生也。班婕妤作"纨扇怨"，秋风见捐，伤失宠也。





### 《管·瓦（蝉联格）》

陆沉今日嗟微管，瓦解何人论过秦。

此格作法：任择一字嵌于上联之末，另一字嵌于下联之首。《论语》："孔子曰：微管仲吾其左衽矣。""陆沉"指国土之沦丧也。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国土日削，作者岂有感而发乎！"秦朝之亡，土崩瓦解"，贾谊《过秦论》千古名篇也。清朝之亡，更倩何人论之。此联感慨深沉，韵味醇厚，佳作也。

### 《湘影楼（鼎峙格）》

湘帘棐几春人影，玉宇琼楼月子家。

此格作法：任择二字嵌于一联的首和尾，另一字嵌于另一联的中间，即第四字，上下联不拘。此联"玉宇琼楼"见东坡《水调歌头》，而"湘帘棐几"未审其出处，必有出处也。上联第一字嵌"湘"字，第七字嵌"影"字。下联第四字嵌"楼"字，故谓之鼎峙格。

### 《笠泽丛书（双钩格）》

泽国烟波青箬笠，书堂风月紫兰丛。

此格作法：将四字分嵌于上下联之首和尾。诗钟嵌字诸格中，以此格最难，限时尤难，欲求平稳妥贴，格高调雅，更难上加难矣，此联上联首尾嵌"择"、"笠"二字，下联首尾嵌"书"、"丛"二字，皆极妥贴，且对仗精工，意境优美。上联出自张志和之《渔歌子》，下联"紫兰丛"不知其出处，甚自愧也。

以上共选嵌字体、分咏体诗钟四十二联，诸格皆备，出自《寒山社诗钟选》及易顺鼎自辑之《吴社诗钟》、易顺鼎自著之《诗钟说梦》三书，所作注释，因本人寓居深圳，手边无书，仅凭记忆，必有谬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希读者谅察之，并有以匡我。

——甲申冬日于深圳阳光带住宅

（作者系本馆馆员）

# 《万里平生师友品题》序

虞逸夫

20世纪初，方当千古帝统告绝之际，前朝遗存之文艺巨子，岿然负海内人望者，林林也。亡友马万里先生生当其会，少而好学，尤长于画，遂得历事宗匠，深受多师之益，广接群彦，常得切磋之助，其成艺于早岁，非偶然也。骏足初展，风姿已彰。于是前辈爱其才美，朋俦服其多能。一时誉满金陵，声闻海上，延及西南，其画名遂大著于艺林。师友题赠之作，与日俱增，或诗或文，或片言只语，无不词炼指要，品题精当，堪称字字珠玑，媲美琳球。既为万里增辉于当年，复为后生垂范于无穷。况诸家手题原迹，至今墨痕如新，光彩依旧，书法之美，众所共叹。集众妙于一卷，留典型于千秋，诚劫遗无上之瑰宝，艺苑独耀之奇珍，绝非市肆泛泛诗文集所可比量也。

其女慧先，克绍箕裘，继志踵武，足光门楣。近欲尽出其秘藏，公诸同好，彰前惠后，孝思可嘉！远寄资料，属序于予。眷念畴昔，放眼寰中，乃父当日交游，唯我独存，舍我又将谁与商量？于义既不可却，且与吾有两世交谊，更不忍拂其雅意也。固知老笔芜词，徒增白璧之点，无补夜珠之光，亦不得已而为之耳。故人梦觉，久离孽海，永归真宅。而我茕茕一老，独往独来于天地之间，犹在梦中游。从者绝迹，发言莫领，遇目无故，谁与为邻？噫！

癸未春，九十老人虞逸夫于长沙万有楼

（作者系本馆馆员）





# 张家界史话

戴楚洲

旅游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自古有之。旅游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封建社会交通状况为商人、宗教信徒、达官贵人及文人墨客的旅行活动提供了条件。古代旅游有宗教信徒的云游、达官贵人的宦游和文人骚客的壮游等类型。根据旅游学基本理论，联系张家界市旅游历史，笔者认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张家界旅行活动产生于唐、宋时期，发展于元、明、清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张家界市旅游事业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张家界市旅游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张家界市各族人民是旅游历史的创造者。我的这些看法，理由如下：

**首先，张家界市境内旅行活动产生于唐、宋时期。**古人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在古代旅行活动中，一支重要力量是宗教朝圣队伍。一些佛教僧侣向名山进发，修建寺庙，为宗教朝圣者云游提供方便，并在寺庙举行庙会，吸引无数佛教信徒。张家界市境内佛教寺庙始建于唐宋时期的有天门山寺、兴国寺、南岳寺、铁佛寺、玉泉寺和宝峰寺等。天门山寺始建于唐代。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从西而来的旦子和尚奉敕创建天门山寺，自任第一代住持，并铸刻有"天门山玄帝祖"的龙首七星铜剑以作镇山之宝。1972年，天门山寺旧址出土的龙首带铭七星宝剑及铜观音、铜菩萨等唐代珍贵文物，印证佛教在唐代传入天下名山天门山，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五代十国时期，慈利后唐处士周朴隐居天门山寺，著《灵泉诗集》。清《光绪永定县乡土志》载："天门山寺……旧名灵泉院，亦名云钵。后唐周朴有《灵泉院》诗。诗云："华亭参后最幽元（玄），一句能教万古传。猿抱子归青嶂后，鸟衔花落碧崖前。虽知物理无穷际，却恐沧溟有限年。为报五湖云外客，何妨来此老林泉。"

位于今慈利县江垭镇的兴国寺，为唐代尉迟敬德所建，共有金刚殿、大雄宝殿、梅花殿和方丈室等五进佛教建筑。1983年，兴国寺梅花殿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今永定区枫香岗乡的玉泉寺建于五代，规模为三进九间，内供大佛、哼哈二将及观音、送子娘娘等神像。五代后唐处士周朴写有《宿玉

泉寺》诗："野寺度残夏，空房欲暮时。夜听猿不寐，秋思客先知。竹迴烟生薄，山高月上迟。又登尘路去，难与老僧期"。武陵源区宝峰寺始建于南宋末年。明初，李必贵在此修行，称铁禅祖师。2002 年，武陵源区宗教局为宝峰寺颁发了登记证书，使之成为武陵源区合法的佛教名胜。

张家界市境内道教宫观始建于唐、宋者有五雷山、紫霞观和高真观等。清《同治慈利县志》载：唐人李靖自称教祖李耳后裔，在慈利县五雷山草创道观，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明《万历慈利县志》载："紫霞观，宋咸淳元年（1265 年），善人唐绍甫舍基，道士何无瑕建立"。2003 年，武陵源区宗教局为紫霞观颁发了登记证书。2004 年，被省旅游局评为国家 2A 级旅游景点。2005 年，被省宗教局定为全省重点寺观教堂。高真观始建于南宋末年，是普光寺最早道教建筑，内供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太上老君塑像，该道观使普光寺成为市区著名的佛道合一的宗教景观。

**其次，张家界市境内旅行活动发展于元、明、清时期。**元、明、清时期，一些达官贵人、文人骚客从澧水而上，经慈利县城，到达永定卫城，登上天门山，俯视十六峰。或溯溇水而上，到达九溪卫城，欣赏索溪峪景观。这些宦游、壮游的官吏、文人写下了无数讴歌溇澧风光的诗词曲赋。

元、明、清时期，五雷山道观逐步发展。元代至正年间，慈利籍翰林、国史编修张兑归隐五雷山，重修真武祠，增修太子宫、火宫殿，布施福地，胜境初成。明代永乐年间，盖世名道张三丰云游传道南武当五雷山等地。明代万历年间，常德荣定王和澧州华阳王游览五雷山后，称其为"楚南名山"。明神宗闻奏后，封五雷山为"洞天福地"。遂将道教宫观扩建成 36 宫、72 殿。清《嘉庆慈利县志》载五雷山建筑有一天门、二天门、朝圣门、王爷殿、赵爷殿、温爷殿、灵官殿、五龙宫、太和殿、文昌阁、玉皇殿、观音堂、关圣殿、紫金宫、三元宫、白衣阁、万福寺等。明代崇祯年间，华阳王朱敬一"为文敕碑"，称"楚南名山数五雷"。清代，张兑后裔接管五雷山，将原 36 宫更名，除祖师殿、观音堂外，概被称为"内八家"和"外八家"。五雷山既是道教昌盛之地，又是文人雅士旅游胜地。因此，不仅留下了描写五雷山风景区的诗赋佳作，而且留下了 90 多首游览五雷山的古诗，如清代慈利县令曹邦的《登五雷山》，即迸发出一团令人振奋的豪雄之气："非干空谷足音传，隐隐殷其地有天。马首滴鬃和雨泼，剑光射斗与星联。轰轰日御行边度，矗矗云轩坐下悬。消息个中谁解得，冲宵仙吏有奇篇。"

元、明、清时期，天门山旅游活动有所发展。元初，土家文人田希吕首创天门书院于天门山麓。从此，本境文风渐盛，人才辈出。元代至治年间，天门山翰林杨翀按天门山十六峰名分别赋诗一首，使天门山广泛传播。元代至正年





间，翰林张兑旅游天门山后，在《题天门山图》诗中赞道："天门洞开云气通，江东峨眉皆下风。"由于元代两位翰林赋诗赞美天门山，开了明、清以来诗人墨客歌颂天门山的先河，致使描绘天门山的诗歌、散文多达数百首（篇）。明代弘治年间，岳州知府李镜感于天门山风景奇特，把元、明以来赞美天门山的诗文编成《天门山集》，掀起宣传天门山风光的一次高潮。明末清初，南明湖南巡抚堵允锡曾经联合闯王余部转战天门山下，赋诗铭志。大顺军余部被围后，李自成部将李过削发为野拂和尚，从石门县夹山寺来天门山寺任住持，扩建大佛殿、观音堂、祖师殿等寺庙，香客每日多达千人，民间有"三进堂，六耳房，砖墙铁瓦锅如塘"之说。从此，天门山寺成为闻名天下的古刹。

索溪峪是驰名古今的风景名胜区。虽然正史很少提到索溪峪，但是方志却有许多关于索溪峪名胜古迹的记载。明《万历慈利县志》最早记载索溪峪："索溪在九溪西。"明《弘治岳州府志》最早描写百丈峡风景区："百丈崖又名百丈峡，在（慈利）县西一百六十里、九溪卫西南七十里。山崖对峙，高逾百丈。中有小峡，长三十里。流泉峻急，古木槎枒。"《民国慈利县志》认为索溪峪"万石笋立，高秀入云，石并储赤，连峰高卑，弥漫皆遍，闯眼突兀，奇甲天下。"明、清时期，一些文官、儒将发现天下奇观索溪峪后，竞相题诗撰文。明代万历年间，永定卫通判夏子云写下了第一首《游百丈峡》的古诗："远山凝碧洽幽襟，小径牵萝度积阴。峰似劈成侵紫昊，磴当悬绝夹青林。独冲飞雪轻轩过，谁伴寻云古峒深。不为忧时勤使节，结庐何惜买山金。"清代，慈利县土家诗人吴肇端在《咏索溪峪》诗中对索溪峪风景区作过形象的吟咏："人游山峡里，宛在画图中。壁爱双屏列，天看一线通。猿啼声处处，古木叶丛丛。日夕归来晚，泉声两岸风。"

早在明、清时期，张家界神奇风光已被一些文人墨客发现，并非个别人所说："养在深闺人未识。"张家界因明代张姓居民居住而得名，清《光绪永定县乡土志》载：明代成化年间，永定卫指挥使张万聪携家人迁居青岩山，成为张姓始迁祖。明代崇祯三年 1630 年），张万聪第六代孙张再弘设衙署于此而更名为张家界。清《道光永定县志》首次记载张家界："无事溪发源于张家界。"清《同治直隶澧州志》对张家界风景区给予了较高评价："永定峰之聚，涧之源，高人之所居，真杰士之所宣力。灵踪胜概，皆以缒幽入险得之。"清代浙江监生马燧任永定县令后，在张家界朝天观下创建马公亭，共有三进三殿，祭祀祖先伏波将军马援。后来，河南举人郭六宰两次游览张家界风景区，留下《重到马公亭》古诗一首："五年暇日此凭栏，山寺楼台又改观。峰拥翠蓝江月晓，天开屏障画图看。花深高阁三清远，林带泉声一径寒。独有游人芳草思，不堪回首望长安。"

**再次，张家界市旅游事业振兴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8 年 12 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旅游产业的政策。大湘西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讨发展旅游经济良策，因此，旅游资源得以开发利用。1979 年，大庸县向上级呈报了《关于张家界林场划为保护区的请示报告》。这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拉开了发展张家界旅游业的序幕。1980 年，湖南省政府派省旅游局长杨山等 14 人组成考察团首次考察了张家界旅游资源。1980 年，大庸县委发出了《关于成立旅游事业领导小组的通知》。1982 年，湖南省政府将张家界列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受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于 1982 年发出《关于同意建设大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复函》，宣告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在张家界诞生。1981 年，慈利县委决定开发索溪峪。1982 年，湖南省政府将索溪峪列为省级自然保护区。1982 年，慈利县政府成立索溪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后，完成了第一批景区建设工程。1984 年，黄龙洞对外开放。1987 年，经国家计委批准，索溪峪被列为国家自然保护区。1982 年，桑植县组成袁家界农垦场开发调查组，为将军岩和御笔峰等景点命了名。1983 年，桑植县政府发出《关于更改袁家界为天子山的通知》。1984 年，省林业厅等部门发文将天子山列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1984 年，土家族著名画家黄永玉最早将张家界公园、索溪峪、天子山三个风景区合称“武陵源”。1985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了“武陵源”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从此，名扬中外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宣告形成。为了进一步统一开发建设武陵源风景名胜区，1988 年 5 月，国务院发文批复实行市管县体制，同时组建武陵源区。1988 年 8 月，国务院发文将武陵源列人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1 年，张家界石英砂岩峰林被国土资源部批准为全国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4 年，该峰林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首批世界地质公园。近年来，武陵源景区、宝峰湖景区、黄龙洞景点、土家风情园及江垭温泉度假村，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 4A 级旅游区（点），使张家界成为全国 4A 级旅游区（点）最多的城市之一。因此，张家界景区容量逐年扩大，旅游项目不断丰富。据该市统计局统计，2004 年，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 1269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55 亿元。经过多年努力，张家界市已经开发风景区 18 处，开辟游览线 30 多条，形成了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旅游格局，形成了世界著名的张家界旅游品牌，完成了由旅游资源大市向旅游产业大市的转变，带动了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作者单位：湖南省张家界市委统战部）





# 五溪访古散记

李鸣高

2003 年 7 月，随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参观考察团作五溪之行，随感随记，文无体例，故曰散记。

## 唐代大诗人李白与王昌龄的五溪情

杨花落尽子归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唐・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尉》

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被贬谪到五溪的龙标县（今属怀化洪江市）尉时，他的好友李白特为他写的诗。就是这首诗，把“五溪”和“夜郎”连到了一起，也就是这诗中的景色——飘零的杨花、啼血的子归、对月的伤感和“不如归去”的哀愁，勾起了人们对“五溪”和“夜郎”的无限遐想。

其实，夜郎国的腹地是在千里之外的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虽然夜郎国在汉代时已经臣服，但到了唐代，夜郎地区仍然是“羁縻之地”，唐王朝是无法将他的官吏流放到“王化不到”的夜郎国腹地去的。李白等官员所流放的夜郎，只不过是五溪境内的一些已由唐王朝设置了郡县的夜郎故地而已。据地方志记载：今日怀化市所属的新晃侗族自治县㵲阳河畔的龙溪口，就是李白当年流放的夜郎地，与王昌龄流放的龙标县仅一县之隔。早在唐代时，人们便已在龙溪口的李白流放处修建了一座“太白读书楼”。今日楼已无存，但遗址犹在。

我小的时候，看到家乡有许多房子没有“门槛”，不知是什么原因？奶奶告诉我：“有门槛”的人家是当地人，“没门槛”的人家是流放到这里的官宦之家。“没门槛”之家竟然成了我家乡的一个景观，由此可见历代官员流放五溪之多。李白流放夜郎时，还写了“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还”、“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夜郎万里道，西土令人老”、“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等倾诉当时心曲的诗句。就是李白的这些诗句连同他寄给王昌龄的诗，造

成了后人对五溪和夜郎的凄凉印象。

## 人称“蛮荒之地”的五溪，七千年前就已是“文明之邦”

怀化古为“五溪蛮地”。五溪的名称，源于湖南省注入洞庭湖的四大水系之一的沅水流域的五条溪流，大约包括了今日湖南省的西北部和西南部。这五条溪流是：源于川、鄂二省的“酉溪”、“木榔溪”，源于贵州省的“辰溪”、“沅溪”，以及源于越城岭深处的“雄溪”。虽然其名曰“溪”，但大多数地方都是可以通航的，因此，五溪两岸的经济生活从古到今都非常活跃。但由于中原王朝长期视南方民族为“南蛮”，故被称为“五溪蛮地”。

在历史上，人们对五溪的印象，大都来自历代的失意文人，他们被放逐或贬谪到这里以后，在心情沉重的情况下写下了好些哀怨之作。所以，五溪的繁荣很少为人所知，而写五溪的哀怨作品却深入人心。第一个写五溪的“逐客”，是楚国时代的著名文学家屈原，他在《涉江》一诗中是这样描述的：

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屈原把“五溪”描绘成了一个山高林密、云蒸雾绕、猿猴哀鸣的荒凉地区，只是在借景来抒发他哀怨的心情，与历史事实是并不相符的。五溪的繁荣在屈原的诗里就有反映：如他上沅水时所乘的“舲船”，就不是一般的简陋小船，而是有“雕花窗棂”的华丽游船。诗中说的“枉渚”（现在的常德市），是楚国时代很有名气的商埠，专供楚王吃喝玩乐的“采菱城”就在这里。诗中说的“辰阳”（今日的辰溪），从古到今都是闻名中国的“柑橘之乡”，屈原的名作《橘颂》就是在这里写的。现在从美国远销到中国来的大红“脐橙”，它的原产地就是辰溪，美国人把它改良成了又大又红、美味多汁的“脐橙”后，还是叫它做“辰溪”，由于“辰溪”的发音与英语中的“太阳”相似，就被美国人命名为“太阳果”了。特别是近些年的考古新发现无数次地证明：自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后，中国的云贵高原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一个“动、植物王国”，中国的原始人类就是在云贵大森林中的“动物王国”里，告别了他的猿人兄弟后，向四处谋求发展的。五溪不但是他们进入洞庭湖平原的第一站，而且早在距今七千年前，他们就在五溪流域创建了高庙、松溪口、征溪口、火麻冲等多处文化水平领先于中国与世界的文化遗址，以及距今四千多年的怀化高坎垅、靖州斗蓬坡等文化程度很高的文化遗址。五溪地区历代出土的





文物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也证明了五溪自古就是中国的“文明之邦”。进入了“有史时代”后，麻阳的商代铜矿、巴人的周代铜錞、晃州的战国铜鼓、轰动国内外的里耶秦简及“乘法口诀”、沅陵西汉吴阳侯墓的《旅行指南》及《美食谱》、沅陵元代墓出土的“至元通行宝钞”及“商品广告”……无一不在宣布五溪地区自古以来的繁荣富裕。如果五溪真是那么荒凉的话，屈原在这里就品尝不到美味可口的蜜橘，也写不出《橘颂》那样的千古绝唱来了。

## 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命丧五溪，留下了绝望的哀诗

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征五溪蛮”时不但损兵折将，连自己也被瘟疫夺去了生命。他死前为此而写出了“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敢临，嗟哉，武溪水，多毒淫！”的哀诗，更为这一地区增加了几分恐怖色彩。但这是马援对五溪的误解，并不能代表五溪的真实情况。

马援的遭遇，是历代中原王朝的共同遭遇。如以武功著称的秦始皇，发30万大军北御武力强悍的匈奴，很快就取得了胜利，成功而返。而他发50万大军南征不以武力见长的“蛮越”，却遭到了“伏尸流血数十万”、“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的惨败。三国时，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军队多次染上了瘟疫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说了。但赤壁之战，被诸葛亮借东风烧掉了曹军的战船，将80万大军都烧得精光的历史，却完全是小说家的虚构。实际的情况，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曹操“至赤壁……大疫，吏民多死者，乃引军还”。在这次大战后，曹操还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原来，曹军是被南方的瘟疫打败，而不是被南方的军队打败的。问题是：为什么南方的瘟病好像长了眼睛，专害北方军队而不害南方军队呢？原来，北方士兵大都没有到过南方，缺乏防疫知识与免疫能力，遇到瘟疫大都束手无策，不死即病，又怎么能与“五溪”人民拥有丰富的防疫知识与较强的免疫能力相比呢？因此，历史上才出现了五溪是五溪人的乐土，却是朝廷军队的坟场的现象。五溪如果真是荒凉贫瘠的不毛之地，富有全国的历代中原王朝，又何必花损兵折将的巨大代价，来争夺这一块毫无用处的边陲之地呢？

## 怀化是“火车拖来的城市”吗？

怀化是湖南省的西部重镇，是在近30多年来才崛起在枝柳铁路上的新兴城市，有“火车拖来的城市”之称。从表面上看，这里原来只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现在方圆数十里的高楼大厦的确是铁路修通后由火车拖得来的。

但从大局来看，怀化地区却自古都是中国南方的交通枢纽。从这里往西 可以通缅甸、印度，往东，可以到武汉、上海，自古有“滇黔门户”、“南楚咽喉”之称。在当前“西部大开发”中，由于怀化是中国西部的“东大门”和中国东部的“西大门'，是川藏地区东至上海、南下广东出海口之间的中心枢纽站，又是中国通往大西南与印度洋的便捷通道。以上海港为例，如果乘坐沪昆线高速列车直达云南昆明，再由滇缅铁路到达仰光，就可以到印度洋去“乘长风破万里浪”了。这远比从上海坐海船南下新加坡，绕道马六甲海峡，环行完印支半岛之后，才能迂回到印度洋要便捷得多。由于地理位置决定了五溪是一条举足轻重的国际通道，因此出现了在历史上五溪两岸的商埠林立，经济长盛不衰的现象。而在陆路交通取代了水路交通的今天，又由于怀化是不可替代的全国陆路交通枢纽，才会出现用火车拖出一个新城市来的现象。

## 西南第一古商城——洪江市

我认识洪江市，是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二战时期。由于国难方殷，为了不愿做亡国奴，我家曾溯沅水西迁，在辗转流离中，我多次踏上了洪江市的土地。洪江的古老、洪江的繁荣，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洪江市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沅水上的“洪油巨舡”，它被中国著名的乡土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称之为沅水上的“巨无霸”。每艘船的高度都在四五层楼以上，它们沿着沅水码头一字排开，就像一条延绵数里的金龙，它们那被‘洪油”漆得通明透亮的船体，在阳光下颇有些“日耀龙鳞万点金”的壮观景色。这些“巨无霸”的下面几层是货舱。上面才是住人的。五溪的船主都爱争强斗胜，总想把自己的船修建得出人头地。因此，每艘船上都是朱门玉户、金匾辉煌、红灯高挂、彩旗飘扬、假山盆景、鸟笼鱼缸、宠猫爱犬，管乐丝弦、美酒香茗、烟枪赌具、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这船上的“家”除了没有随身家眷以外，与陆上居家没有多大区别。船顶上还有时蔬菜圃、豆棚瓜架、鸡窝猪圈，以备远航之需。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座可以在水上移动的小村庄。

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商船时，我心中纳闷：沅水滩多水浅，这么大的商船怎么能开得下去？又怎么能开得上来呢？当我旅居洪江后，才知道这船是并不打算往返使用的一次性用品。当每年的春水猛涨，淹没了沿途的险滩时，船队便满载着“洪油”与来自黔滇缅印的宝货浩浩荡荡地经沅水、过洞庭，向长江的重镇汉阳府进发。到了汉阳府，商家便把货物及船一块儿卖掉，赶回洪江再打造新船，准备第二年的远航。沿途所及之处，为了迎接这一年一度的巨舡远航，也热闹得像逢年过节一样。有一首《沅水船歌》很形象地道出了沅水船工的酸甜苦辣：





抛妻别子洪江铺（洪江自古商业繁荣，宋朝就有了洪江铺的建置），
求神拜佛辰州府（在辰州府的伏波庙求神保佑一路平安），
兴高采烈常德府（在常德府领到了沅水全程的工资）；
灯红酒绿岳阳府（安全驶过了八百里洞庭，在岳阳府尽情玩乐），
哭哭啼啼汉阳府（化光了盘缠的船工，只好沿途打工或乞讨回家）。

桐油是中国的船舶及“木构建筑”必不可少的防腐剂，洪江品牌的桐油以物美价廉被称为“洪油”，它与四川秀山的“秀油”同为中国的两大名牌。大西南出产的桐油、国漆、木材、朱砂、五倍子、皮毛、金、银、铜、锡、珍珠以及东南亚、缅甸、印度出产的胡椒、肉桂、檀香、龙脑、乳香、没药、翡翠、象牙、犀角、生大象、活孔雀等宝货，都要在洪江换大船，通过洞庭、长江，转运到全国各地去，这一商业优势使洪江成了富甲大西南的商城，获得了“小南京”的外号。

## 中国“宗支文化”的创造者——靖州“飞山公主”杨令公

提起杨令公，人们都会想起山西太原北宋时著名的抗金名将杨令公杨业，而不知道在五溪也有一个被称为杨令公的“蛮酋”杨再思。说起来，五溪的杨令公还是太原杨令公的先祖呢。

靖州有一座名山——飞山。据地方史记载：唐代的五溪“蛮酋”杨令公（杨再思）曾以飞山作根据地，所以被五溪人尊称为“飞山公主”。一个男的，为什么会被称为“公主”呢？原来，“五溪蛮”的语言习惯与汉族相反，主词一定要放在副词后面。如果按汉语习惯，“飞山公主”便是“飞山主公”，就容易懂了。飞山的杨令公有十二个儿子，总称“十二王杨”，按汉语习惯，便是“十二杨王”。这“十二杨王”中有十个为“飞山十峒”的“峒主”，分管湘、黔、桂三省交界的莳竹峒、罗蒙峒、黎平峒等十峒地界。第 11 个儿子应召到澧州为官，成了“澧州蛮”的领袖；第 12 个儿子应召到了山西麟州（即太原）为官，这就是抗金名将杨令公杨业的曾祖。据宋朝著名文人宋濂的《杨氏家传》记载：杨业的后代杨文广奉命到广西“征蛮”时，曾到贵州播州与当地的“杨姓蛮酋”那里“通谱修好”，增进了民族团结，避免了战祸，是古代“民族统一战线史”的一段佳话。

飞山杨姓，由于分支太多，为了便于后代子孙相认，飞山杨令公便在他七位部将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立下了“再正通光昌晟进”七字“班辈”轮流转的族规，凡是飞山杨的后代，都要按此顺序作为“辈名”。上下沿用了一千多年。自此以后，中国各姓宗支都纷纷效法，各创宗族传统。直到民国初年，因为人丁繁衍，重名的太多，飞山杨姓才在“七字班辈”下面增加了许多“字辈”，

解决了重名的矛盾。因此，“飞山蛮”创立的“辈名制”，可以说是中国“户口制度”科学化、规范化中开得最早也最为艳丽的一朵奇花。

靖州山清水秀，民族风情浓郁，如解放初期风靡一时的苗族民歌：“桂花开在贵石岩，桂花开放贵人来，贵人就是毛主席，贵人来了花才开”，就是中央民族访问团来到靖州访问少数民族时，根据靖州三锹乡的苗族民歌改编而成。靖州苗族、侗族的芦笙歌舞，曾在北京得到过国际歌舞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国外的音乐家曾批评中国汉族的音乐单调，只有独唱齐唱，没有多声部音乐，但这里的苗族却有多声部合唱与多声部芦笙曲，曲调非常优美动听，是中国传统音乐“活化石”，如果开发出来，必定能吸引旅游者的兴趣。

## “百里侗文化长廊”争奇斗艳

五溪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特色，如古老的巫文化与傩文化，土家族的“扮毛古氏”与“摆手舞”，苗族的“蚩尤祭”，瑶族的“盘王祭”等，都蜚声海内外。但其中最有民族特色的，还莫过于五溪侗族地区的“百里侗文化长廊”。完全可以说：在中国56个民族中，除了汉族以外，侗族的民族文化，就算是水平最高的了。我的话也许有人不肯信，“一个不大的民族，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民族文化呢？”这又是偏见！我们对待民族文化，怎么能用民族的大小来评判他文化的高低呢？一个小小的葡萄牙，在历史上曾经是所向无敌的“海上霸王”；区区的英伦三岛，在历史上曾经是“日不落帝国”，不就是典型的例子么？

有些人之所以看不上侗族，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由于侗族是一个新识别的民族，无论在中国或外国，对侗族茫然无知的人是很多的。直到“民族语言学”兴起以后，中外学者通过“民族语言学”的研究，才开始发现了侗族这一个小民族，他的语言的代表性竟有如此广泛，不但在中国有壮、侗、水、傣、黎、台、毛难、布依等十多个民族都讲着这种语言，就是越南、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东部地区，也存在有这种语言。甚至在西亚、在欧洲、在英语中，都能找到这种语言的影子。这不是很奇怪么？语言学家因为看到了侗语的典型性，而把侗语和另一个典型的语言“台语”，定名为“侗台语族”。至于这两个小民族的语言为什么会如此典型，为什么会成为除了汉语之外的中国第二大语族，则至今还是一个谜。

一个小民族的语言为什么会这样典型，绝不是毫无原因的。通过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我们将会发现：侗族这个名称并不是侗族的自称，侗族的自称是“chin”，译成汉语就是“粳民”，即种粳稻的民族。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而中国人最早种植的农作物就是粳稻，种粳稻的“粳民”就





是中国最早的文明民族。原来，侗族和壮族等其他一些自称为“粳民”的民族，就是“粳民”的后代，他们继承和保存了中国上万年农耕文化的精华，他的民族文化当然就高于其他的少数民族了。但由于现代人只知道“侗族”而不知道“粳民”，当然就无人知道侗族在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了。打个比方，假若赫赫有名的电影明星卓别林被人另取名为“小胡子”，又有谁会知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卓别林呢？

口说无凭，到“百里侗文化长廊”来看一看事实吧！你到了这里就会发现：侗族除了儒家文化不如汉族以外，在对中国农耕文明各种文化的继承上，侗文化在许多领域都是中国最棒的民族文化。

以传统建筑为例：七千多年前的黔阳高庙文化中，就已出现了有四层扶梯的、上面建有鼓楼的高塔式多层次的土木建筑。这一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其他的民族中都看不到，而在五溪“百里侗文化长廊”中，侗族高大雄伟的鼓楼却一座连着一座，争奇斗艳，络绎不绝。游人流连在鼓楼高大的身影和精美的艺术之中，几千年来古老的中华文明历历在目，即使是看惯了西洋建筑，看不惯中国建筑的人们，看到了侗族鼓楼，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也会油然而生的。

侗族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还不止体现在鼓楼这一方面。侗族建筑是由鼓楼、吊脚楼、风雨桥和凉亭这四大建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庞大完美的建筑体系。鼓楼的高、风雨桥的长、“凉亭”的疏、“吊脚楼”的密、池塘水井的清、绿野田畴的秀、小桥流水的曲、森林修篁的幽、高山深壑的深……将侗乡组成了长短疏密、高低幽深、清秀曲折、依山傍水、云水交映、错落有致的人间仙境。这种与山水浑然一体、妙趣天成的建筑理念，在中国的建筑文化中，是匠心独具的。在世界建筑史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

侗族不仅以独特的建筑科学享誉于世界，侗族的服装艺术也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中少有的。有一位毕生立足于侗乡，从青发熬到了白首的艺术家张柏如先生，发现了侗族服饰的博大精深，积数十年之功，编写了一部大型的《侗族服饰艺术探秘》画册，其中搜集到的侗族服饰，最早到了明代。这些纹饰各不相同而风格一致，不但阐明了侗族文化的起源和流变，还为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棺绘上的许多图案，找到了它的出处。这部书由台湾的《汉声》杂志分上下集出版以后，立即畅销海外，连连脱销。

侗族素有“舞的家乡，歌的海洋”之誉。在五溪出土的七千年前高庙文化的陶画上，就已出现了鸾凤展翅飞舞的图画。五溪地区出土的两千年前的铜鼓上，也有身穿羽衣的舞人跳芦笙舞的画面。这几千年来穿羽衣、戴羽冠、跳芦笙舞的传统，也以侗族保存得最为完整。当你漫步在“百里侗文化长廊”中，

处处都是笙歌声声、艳舞翩翩，其乐也融融。有些游人至此，往往被侗乡的美景亲情感动得乐不思返，我就亲眼见到过数次。

音乐是无法保存的无形文化资源。但七千年前五溪"高庙文化"中鸾凤和鸣的画面、两千年前五溪铜鼓上舞女翩翩、联手高歌的画面，都告诉我们：五溪的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侗族男女联手而歌、投足而舞的"多耶"歌舞，正是五溪先民能歌善舞的继承和发扬。特别是侗族的多声部无伴奏合唱《侗族大歌》，曾到法国演出，当几个侗族姑娘用灵巧的舌头弹出了秋蝉此起彼伏的鸣唱、如行云流水般轻松欢快的曲调之后，巴黎的许多专业素质很高的音乐专家，听了后都觉得大开眼界，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的普通少女，竟能唱出如此整齐优美、发自天籁的自然和声来，无不感到惊讶，巴黎的报纸还以大字标题，发出了"中国侗族的大歌征服了巴黎"的惊呼声。

在"百里侗文化长廊"中，山美水美人更美，侗族男女的"自由交往、自由恋爱"，治安方面的"日不关门、夜不闭户"，伦理方面的"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政治方面的"上下平等、男女平等"，道德方面的"省己待客、舍己为群"，社交方面的"热情好客、乐于助人"……到了这里，你就会感觉到你是寻到了"世外桃源"，进入了"秦人古村"，几千年来的中华美德、灿烂文化、古风古韵，你都有可能在'百里侗文化长廊"找到，还能让你慢慢地领略，细细地品尝。

暂且说到这里，留下的还有很多很多，就让热心于寻根溯源的读者们自己去细心地寻觅吧！

（作者系本馆馆员）





# 后　记

本书是在筹备我馆成立55周年的日子里选编出版的。副馆长阳盛海主持，业务处和《文史拾遗》编辑部的同志具体承担了选编工作。选材范围，依《文史拾遗》重点栏目，大致分"湖湘文化研究"、"三湘故人"、"文史述往"、"民族风情"、其他，共五个方面。先由伏家芬、刘泱泱、熊治祁、陈书良、胡渐逵几位馆员分别查阅所分栏目的作品，提出初选篇目，并进行初步的文字修订，然后经集体三次会议讨论，确定入选篇目。排出清样后，交陈书良馆员统编定稿。在此过程中，所有资料搜集、复印、文稿清理、版式设计以及编排等编务，均由文史业务处李治湘、白帮炎、覃明德、曾令军、陈伯嫦、刘杰等办理。大家密切协作，共同保证了选编工作的顺利进行。本书出版得到了湖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忱。本书文稿整理及编校，容有纰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

2008年10月

